

## 波兰匈牙利事件 50 周年祭

### 波兰匈牙利事件 50 周年祭

#### 1956 年波匈事件纪实

1956 年可谓是多事之年，东西方都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其中最具有影响的就是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群众走上街头抗议当局的骚乱。波兰发生的事变，以及随后发生的波苏矛盾得以和平解决；而在匈牙利，抗议活动演变成为当局无法控制的动乱，苏军的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事变才得以结束。

#### 一颗重磅炸弹爆炸了

1956 年波兰和匈牙利所发生的事件，要从这一年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说起。1956 年 2 月，严寒还包围着莫斯科，但克里姆林宫内气氛却很热烈，从 14 日至 25 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正在这里召开。这次大会是斯大林逝世后首次召开的苏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对苏联内外政策进行一系列调整加以确认的大会。同时，它也是结束“斯大林时代”的重要里程碑。应邀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 55 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在这次会议期间，最具有爆炸性的事情发生在 24 日下午大会宣布闭幕以后。大会于午夜 11 时 30 分又通知代表们还要举行一次会议，有的代表已经离开下榻的宾馆又被紧急召回，出席“已经闭幕”的代表大会。按照大会主席团的专门决定，这是一次秘密会议，因此外国代表团没有被邀请。在这个秘密会议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也被称为“秘密报告”。报告以大量的、惊人的事实揭露了斯大林所犯的错误，论述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和危害。赫鲁晓夫首先公布了列宁给第十二次党的代表大会的信。这封信斯大林在世时被严密封锁。列宁在这封信中对斯大林作了评价，指出“斯大林粗暴”，建议代表大会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务上调开，找一个比斯大林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

心同志、更少任性的人代替他。斯大林后来所犯的全部错误，证明列宁的担心是完全正确的。这样，赫鲁晓夫首先剥去了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战友和合法继承人的神圣光环。接着报告指出了斯大林滥用权力，对反对者或持有不同看法的人，先撤消领导职务，然后从肉体上消灭的事实。揭露了斯大林时期大量的冤假错案，造成了大批忠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被逮捕和处决，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报告还谈到斯大林在农业和民族政策上的种种失误，也谈到了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和战争初期的错误，导致了红军的严重失利。报告披露了斯大林是如何制造和欣赏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并提出了从理论和实践上肃清个人崇拜的有关措施。最后赫鲁晓夫强调，对于这个问题不能拿到党外去宣扬，尤其不准登报，以免为敌人所利用。尽管赫鲁晓夫提出对这个报告要严格保密，但实际上他本人并不想这样做。苏共中央书记处在代表大会闭幕的几天后就发出指示，将报告的全文向党的积极分子传达，不久又在苏共所有基层组织全体党员会议上传达。所谓“秘密报告”很快在苏联家喻户晓，人人皆知。5 月份，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波兰人那里搞到了“秘密报告”的全文，并将此报告发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犹如原子弹爆炸，引发出了强大的冲击波。几十年来，斯大林的名字，他的语录，他的功绩，他的画像和塑像无处不在，斯大林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共产党人中间是一种精神支柱。而现在，在赫鲁晓夫的报告面前，斯大林的神圣形象被打碎了，人们在心灵上所经受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

受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冲击最大的是东欧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由苏联红军从法西斯德国手里解放的。它们都毫无例外地采用苏联的模式，用苏联的经验建立国家政权和进行建设。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国内也曾经搞过像斯大林那样的骇人听闻的政治清洗。当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对

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揭露后，东欧国家的人民要求其领导人纠正过去的错误，为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出现了要求摆脱“斯大林模式”、要求摆脱苏联控制的社会情绪。面对突如其来的冲击，一些东欧国家的领导人被弄得不知所措。当时正在莫斯科率领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总书记贝鲁特在表态时讲道：“我们怀着悲伤的心情得知斯大林做坏事的消息，波兰人民那么感谢斯大林，感谢他的智慧和援助……”他经不起这样的打击，没有随波兰代表团回国，于 3 月 12 日在莫斯科猝然去世。随后，在波兰出现了大的社会动荡。

波兹南的工人走上了街头

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贝鲁特死后，选举奥哈布为党的第一书记。奥哈布上台后，顺应党内和社会上的要求，坦率地承认党在过去犯的许多错误，并在国内政策上进行调整，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如公开宣布对 1948 年在斯大林授意下对当时党的总书记哥穆尔卡的批判是错误的；数以千计的曾遭到囚禁的无辜公民平反出狱；主管保安部门的政治局委员拉德凯维奇被撤职，社会的政治空气悄然地在放松。这时，波兰党也强调维护波兰的独立，提出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是，时间不等人。波党领导人显然跟不上苏共二十大后的形势，没有对个人崇拜进行批判，也没有坚决检讨和纠正党在过去执政时期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对人民群众政治、经济上的要求估计不足。人们的不满终于爆发了。1956 年 6 月上旬，波兹南市采盖尔斯基工厂（斯大林机车车辆厂）的工人要求退还过去三年不应征收的税款，还提出改革工资制度等要求。由于波兹南省委无权答复工人的要求，工人们便推举了 30 人组成了代表团，前往华沙同机械工业部部长罗曼·费代尔斯基谈判，期望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谈判时，部长答复说，减少税款是可以考虑的，但增加工资是不可能的。代表团回答说，如果拒绝了工人的要求，工人们将在 6 月

28 日举行罢工。部长愤怒地说：“如果你们上街的话，你们将会遇到坦克！”谈判破裂了，双方不欢而散。代表团通过电话向厂里工人传达了谈判失败的消息。

在 6 月 27 日的全厂职工大会上，工人们得知请愿失败的消息后十分愤怒，决定在代表团回来之前就到市区自由广场向市政当局请愿。6 月 28 日，采盖尔斯基工厂 1 万多名工人罢工，走上街头。他们向市中心的方向游行示威，沿途又有许多群众加入游行队伍，游行队伍中约有 4 千党员。大约 9 点钟的时候，市中心广场及其附近聚集了几万人。起初，游行队伍是有秩序的、平静的。队伍到达广场后，就派出了代表要求市委领导接见，但是市委领导拒绝接见，这使广场上的群众情绪激愤，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去华沙的工人代表团被公安部逮捕的谣言在群众中迅速传开，人群中激起了怒潮。有人高喊：“到监狱去！”“要找到他们，把他们放出来！”等口号。同时，有人打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标语牌：“我们不要空头支票，我们要面包和自由！”“释放囚犯！”、“打倒秘密警察！”

“俄国佬滚回去！”广场上空响彻着愤怒的口号声。游行的人群冲击了姆温斯卡街的监狱，解除了卫兵的武装，放出了 257 名犯人，并占领了武器库。后来又攻击了法院以及省公安厅的办公楼。在公安厅大楼前，发生了枪战，有许多人倒在血泊之中。游行示威已经演变成为一场流血冲突。波兹南发生的事件震动了最高当局。为了平息骚乱，波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出动军队镇压闹事者，并决定由国防部部长斯塔尼瓦斯瓦夫·波普瓦夫斯基统率部队。他和负责整个行动的约瑟夫·西伦凯维兹总理一起到波兹南。波普瓦夫斯基将军从当地的两所军官学校和附近的训练营地抽调了部队，很快控制了局面。6 月 28 日晚，事件就被平息了。在波兹南事件中，有 53 人死亡，300 多人受伤，323 人被捕。30 日，一场大雨冲刷着波兹南街头的血污，这座城市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然而，

在波兰人民心里却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在波兹南事件被平息后，波兰党和政府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抚恤措施。6月30日，在波兹南各墓地举行了死者的安葬仪式，西伦凯维兹等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也去参加了葬礼。7月10日政府宣布，原来向采盖尔斯基工厂工人征收的650多万兹罗提（波兰货币名称）税款将分期偿还该厂工人们。机械工业部部长罗曼·费代尔斯基被撤职。但是，此后波兰的局势却一直动荡不安，全国各地工厂罢工和游行示威此起彼伏，许多工厂成立了工人委员会。

#### 十月的希望

在对波兹南事件的看法和处理方法上波苏两党发生了分歧，并由此发展成为波苏冲突的“十月事件”。起初，波兰党和政府也认为，波兹南事件是“帝国主义代理人”和暗藏的反动分子利用工人群众的不满情绪挑起的，是反对人民政权的“严重骚乱”。后来波党领导人对事件的看法发生了转变。7月1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七中全会。党的第一书记奥哈布在报告中指出，党和政府应对波兹南事件负主要责任。他说，在寻找波兹南事件的原因时，“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煽动者和帝国主义走狗的阴谋上去，那是错误的。通过对事件的分析，我认为极大部分责任要归中央和地方领导的官僚主义和愚昧无知。”他强调说：“波兹南事件是一个警告，它证明在党和人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着重大错误。”根据这种认识，他在报告中提出应立即采取措施，克服党和政府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实行经济管理合理化和政治民主化，改善人民生活。全会根据奥哈布的报告，通过了《关于政治、经济局势和党的主要任务》的决议。决议认为，波兹南事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上的疏忽，指出在党的工作中严重存在着“个人崇拜、官僚主义堕落和党内缺乏民主”。全会决定从实行经济管理合理化、政治生活民主

化和改善人民生活着手，实行一条社会主义革新路线，以缓和同人民群众的矛盾。

全会为在 1948~1949 年“大清洗”时期被开除出党的前党的总书记哥穆尔卡恢复了名誉。七中全会之后，围绕经济、政治体制的革新，党政干部更换的必要性等问题，党内外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党的革新路线，他们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之火，人民的思想非常活跃，对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辩论。社会主义革新的性质、范围和内容，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关于同苏共和苏联的关系等问题，都是讨论和辩论的问题。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改组党和政府的领导班子，希望哥穆尔卡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在西伦凯维兹的劝说下，奥哈布同意辞去党的第一书记，让哥穆尔卡担任这个职务。那时，在大多数波兰人心目中，哥穆尔卡是维护民族独立的政治家，是个人崇拜时期的受害者，是有能力领导波兰前进的领袖。由于对国内外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不同，波兰统一工人党内出现了对立的派别。10 月 13 日，波兰党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形势和召开八中全会等问题。哥穆尔卡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却参加了会议。会上主张革新的力量占绝对优势，这使保守派感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他们密电向苏联告急求援，并密谋策划一次军事政变，企图在八中全会召开前夕逮捕一批主张革新的领导人。本来对波兹南事件的看法和处理，波苏两党就存在根本不同的看法。苏联《真理报》6 月 30 日发表的苏共中央声明说，波兹南的“反人民暴动”是美帝国主义策划的，目的是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在波兰党中央的看法转变后，苏共领导仍然坚持这个观点。波兰党七中全会以后，波兰局势在急剧地变化着，革新的呼声甚高，要求在各个领域实行革新措施，特别是呼吁把波苏关系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的舆论，这使苏共领导坐立不安，担心波兰失去控制，并在东欧引起连锁反应，因此要求波

兰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波兰党政治局以即将召开八中全会不能脱身为理由，婉言谢绝了苏共的邀请。这更使苏共领导十分恼怒和担心，便决定直接出马干涉波兰的内部事务，阻止波兰的局势向背离苏联意志的方向发展。10月19日，波兰党八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未经波兰党的邀请，赫鲁晓夫亲自率领“一队强有力的人物”驾临华沙，其中有米高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科涅夫元帅（华约组织部队司令）、安东诺夫（苏军总参谋长）等人，突然飞抵华沙。机场事先没有得到通知，不准飞机降落，飞机在机场上空转了近一小时才降落。同时，苏共领导人调动军队，驻在波兰的苏军开始向华沙及其他城市移动，还从东普鲁士调动部队进入波兰，并增派了在波兰港口的军舰，形成了对华沙的包围态势。当时，波兰党八中全会正在举行，首先增选了哥穆尔卡、斯彼哈尔斯基、克利什科和索文斯基4人为中央委员，并决定原政治局辞职，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一个新的政治局。在这项议程结束后，奥哈布向全会宣布苏共代表团抵达华沙的消息，建议暂时休会，因为苏共代表团要求立即同波兰党政治局代表团举行会谈。哥穆尔卡也以第一书记候选人的资格参加了同苏共代表团的会谈。在机场上，赫鲁晓夫对波兰党领导人态度傲慢，怒气冲冲地大声训斥波兰党的政治局代表团成员。他叫道：“我们为国家流了我们的血，而现在你们却试图把它出卖给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这办不到，绝对办不到。”哥穆尔卡回答说：“我们比你们流了更多的血，我们并没有把波兰出卖给任何人。”赫鲁晓夫望着哥穆尔卡问道：“他是谁？”“我是哥穆尔卡，我曾经被你们关在监狱里3年。”赫鲁晓夫惊奇地问：“他在这里干什么？”奥哈布答道：“他来这里，是因为我们决定选举他作为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气得大声叫喊：“反了，反了，发生了一种背叛行为。我们必须来，这不仅是波苏关系问题。你们危害了我们在德国的地位，你们威胁了

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赫鲁晓夫发了一通火之后，就要求驱车前往波党中央委员会会场参加波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这个要求遭到波兰党领导人的拒绝，两党代表团就在贝尔凡特列宫举行会谈。在会谈中，赫鲁晓夫仍坚持让苏联代表团出席波党中央全会，并表示不同意哥穆尔卡提出的新政治局成员的名单，说这个名单“排挤优秀的共产党人”，“你们在为反动派和反革命分子开辟道路。政治局不能改组，你们的新候选人名单将把社会主义毁掉，我们有权要会议听取我们的意见。”这些要求遭到波党领导的拒绝和反驳。波党领导指出，波苏两党间的许多问题都是因为苏联人参加了波党的中央全会造成的。奥哈布指出，苏联人出席会议不利于“良好的两党关系”。在会谈当中，波党领导人得知苏军正在向华沙进军，奥哈布质问说：“那是真的吗？”赫鲁晓夫回答说：“那是真的，华沙实际上已被包围了。”苏共领导人企图用武力威胁使波党领导人就范。奥哈布和哥穆尔卡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奥哈布说：“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能把我们拘留在这里而在外边发动一次武装改变的话，你们就错了，我们是有准备的。”哥穆尔卡说，“除非你们马上把军队调开，否则我们就要离开这里，在大炮瞄准华沙的情况下，我们拒绝会谈。如果你们不停止苏联军队的前进，我就要在广播电台向人民讲话。”由于波党领导人的坚决斗争，赫鲁晓夫只好下令苏军停止前进。赫鲁晓夫看武力威胁不成就变换了策略，他满面笑容地说，我们来这里不是要威胁你们，而是来帮助你们。苏联愿意立即提供 2 亿金卢布的贷款，在波兰人认为适当的时候使用。他又表示支持哥穆尔卡等人进入政治局，但一定也要让罗科索夫斯基等人进入政治局。罗科索夫斯基是 1949 年斯大林派来参加波兰党政治局的，此人虽然是波兰人，但在 1918 年参加苏联红军，是苏军元帅。波党领导人回答说，在新领导问题未解决之前，不讨论经济问题。关于罗科索夫斯基，哥穆尔卡说，波兰人民认为



他是苏联人控制的象征。会谈暂停，波党领导人回到中央全会，奥哈布宣布原政治局集体辞职，宣布了新政治局成员的名单，他本人提出辞去第一书记职务，并提议由哥穆尔卡任第一书记。罗科索夫斯基等人都被排除在新政治局之外。当华沙广大群众得知新政治局的名单和同苏联人会谈的消息后，群情激奋，工人、学生在谈判会场外面的马路上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高呼拥护哥穆尔卡的口号。华沙市的基层机关、工厂和学校已把民兵组织起来了，工人还派代表到军队去争取军官和士兵，希望他们站起来维护民族独立。工人、学生和士兵都站在党中央一边，准备对付苏军的入侵。会谈继续进行，苏联人仍然坚持要罗科索夫斯基进政治局。西伦凯维兹指出，政治局候选人的新名单已经公诸于众，这个新名单是不能变更的。会谈继续到19日深夜，赫鲁晓夫软硬兼施都未能奏效。当赫鲁晓夫从罗科索夫斯基那里得知，波兰军队多数已不听他指挥时，只得让步。他笑着说，把什么人送进政治局，是你们自己的事。他要求发表一个重申波苏友谊的公报，苏联保证命令军队撤回基地。波党领导人向苏共领导解释，民主化是共产党一种革新政策，是为了建立一种使波兰人得到好处的政治制度，而不是破坏华沙条约组织，并强调指出，波苏友好是波兰对外政策的基础。会谈结束后，发表了一个公报。次日早晨苏联代表团回国了。不久，罗科索夫斯基也回到苏联，这就是“十月事件”。波党的八中全会继续举行，改选了新的政治局，选举哥穆尔卡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他在会上提出了革新路线和改变措施。他认为，“波兹南事件”中工人跑到大街上，“他们抗议的并不是人民波兰，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抗议的是我们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并且也是他们痛苦地感觉到的弊病，抗议的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歪曲”。他说：“把痛心的波兹南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挑衅分子闹出来的，这种笨拙的企图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波党

八中全会使举国为之兴奋，人们对哥穆尔卡寄予了莫大的希望，波兰的社会危机过去了。

## 纳吉的沉浮

1956 年匈牙利所发生的事情是同纳吉个人的命运相联系的。纳吉·伊姆雷出身于农民家庭，做过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布尔什维克，开始为匈牙利摆脱旧王朝的统治、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斗争。为此，他曾被捕，并于 1928 年流亡到苏联避难，在苏联农业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吉积极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成为当时匈牙利抵抗运动的领导人。由于他出色的表现，1945 年成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他先后担任了几个部的部长职务。1949 年，因反对搞合作化运动而被撤销了职务。但是他公开承认了错误，因此在下一次的党代会上，又被重新选为政治局委员。1950 年，他出任食品部长，后又任征购部长。1953 年后，纳吉出任政府副总理。随后，由于苏联人对匈牙利内政的干涉，纳吉被推上了总理的位置，从此卷入到一场政治漩涡中来。1953 年 6 月，斯大林逝世后 3 个月，德国柏林发生了要求改善生活的群众游行示威事件。此时，东欧其他国家也出现由于群众不满的骚动不安的迹象。为了稳住东欧国家，苏联新领导人对此十分重视，要求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在对内政策上进行适当的调整。在这种背景下，苏共领导召集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匈牙利政府总理拉科西率领匈牙利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访问。纳吉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次莫斯科之行竟改变了他的命运。参加这次莫斯科之行的除拉科西外，还有匈牙利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匈牙利的头号代理人格罗，匈牙利国家武装总司令法尔卡什等。出人意料地是，纳吉也在莫斯科开出的代表团名单之列。参加这次秘密会晤的苏联领导人有总理马林科夫（斯大林生前指定

的接班人)、赫鲁晓夫、米高扬以及莫洛托夫、贝利亚、布尔加宁、苏斯洛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会晤时的气氛极为紧张。马林科夫冷淡地问候了匈牙利人后,就严厉地对拉科西说:“你们那里的情况很糟。据我了解,在你们的工业中心切佩尔、欧兹德和迪欧什杰尔发生了骚乱。”拉科西开始辩解,但米高扬打断他的话说:“您想用数字封住我们的嘴。我们也有这类的数字,不过和您的不一样。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您进行了极大的冒险。您没有一点点焦炭就建立了一座新型的钢铁工业城。您连劳动人民的吃饭问题都不能给以足够的满足就疯狂地去建造代价高昂的地下铁道。被您强行集体化的农民们连种子都生产不出来。此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正在你们的集中营里受难。”拉科西脸色苍白。的确如苏联人所说,这位被称为“匈牙利的斯大林”的匈牙利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正把他的国家推向深渊。1948年6月,拉科西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拉伊克案”。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政治局委员拉伊克&#8226;拉斯洛被指控为“美国情报机关的代理人”、“南斯拉夫间谍”、“霍尔蒂(二战前匈牙利政府首脑)警察局的特务”、“阴谋武装暴动”、“谋杀共产党领导人”等罪名而被逮捕。几天后,与“拉伊克案”有关的几个主要被告人一一被绞死。1951年5月,拉科西又开始了大清洗。每天,都会有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外出旅行”,从此销声匿迹。军队中的许多高级军官一夜间便不知去向。单是内务部,接替拉伊克出任部长的卡达尔被逮捕,并秘密地判处无期徒刑。继任的内务部长多尔&#8226;泽尔德不久也全家自杀,当局宣布他们是“法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间谍”。此外,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中,拉科西、格罗和法尔卡什&#8226;米哈依组成了“三驾马车”。他们狂热地提出,要在5年之内,把匈牙利变成一个“钢铁国家”。于是,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投资的90%用于发展重工业,全部工业投资的2/3用于

发展采矿和冶金业。这个根本无法实现的计划严重地削弱了轻工业、服务业和农业。拉科西还主张要“在三四年内，使 90%的农民在社会主义的集体中耕种土地”。

于是，许多地方都强迫组织起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多数入社的农民，都是些最贫困、没有土地的人们，他们缺乏生产经验，没有足够的牲畜，几乎没有机器，收割的 70%依靠手工。这使农民的收入下降了 2/3.他们还千方百计地加重农民的负担，实行所谓的“义务交售制”，即制定的交售指标越来越高，而收购的价格却越定越低。对于那些敢于抵抗交售的人，可判处 3 年以下的徒刑。结果，大批的农民只好逃离农村，扔下大量荒芜的土地无人耕种。农村经济的变化，严重地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1951 年，许多基本食品、工业日用品开始凭票供应。商店的门前，排起了长龙般的队伍。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匈牙利政府不得不年年发行“和平公债”，这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到 1952 年，国家职工的实际工资收入比 1949 年下降了 20% ，愤怒的情绪在人民中间迅速蔓延着。但是，拉科西一伙却无视这场灾难。他们制造谎言，掩盖事实，欺骗人民。并且把那些敢于说真话的人投入监狱。在这个时期，匈牙利建立了大量的“拘留所”，成千上万的人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便被长期囚禁关押。他们大多是工人和农民，因为偷了合作社的粮食或杀了一头离规定重量还差几斤的猪等，便被关了起来，而且长期得不到释放。所有这一切，都是拉科西一手造成的。

至此一语未发的赫鲁晓夫对他喊了起来：“您极大地损害了你们的人民！您罪行累累！长此以往，人们将用粪杈把您赶出这个国家。”贝利亚也插话说：“您想当什么？想当犹太人的皇帝吗？”马林科夫较镇静地继续说下去：“拉科西同志，您是运动的老战士，您必须理解时局。您必须分权，把权力分配给在领导班子中精通事务的同志。对此，您有什么想法？”此时的拉科西面如土色，对苏联人的

指责只有唯命是从。赫鲁晓夫建议他选一位能操持国家大事的人。

经过长久的、令人窘迫的沉默后，马林科夫提示道：“您认为纳吉”

伊姆雷怎么样？”拉科西看了纳吉一眼，就像第一次见到他一样。他说：“纳吉

”伊姆雷是个好同志，但是……”然而，苏联人没有容他把后面的话说出

来，就接住了话题：“那么说您不知道把权力分给谁了？我们自革命以来就了解

纳吉”伊姆雷。当 1918 年匈牙利共产党根本还不存在的时候，他就是布尔

什维克党的党员了……他是一位共产党领导中德高望重的专家。再说，他又是你

们政治局委员。

他农民出身，本人也当过农民，又是教授。我们信任纳吉”伊姆雷同

志。

他可以和您一起来改善你们国家的状况。”随后纳吉发言说，他对苏联政治

局的同志们对他的信任表示感谢。他简单地谈了一下布达佩斯新的领导班子的任

务：结束警察恐怖；为无辜者平反；合理的投资政策以及给农民更多的自由等。

莫洛托夫打断纳吉的话说：“不仅是更多的自由，而是完全的自由！谁不赞成集

体农庄，谁可以退出。这无关紧要。”在匈党代表团走出会议室时，曾经不可一

世的拉科西让纳吉走在他的前面，并说：“您请，伊姆雷，现在您是领导人。”

就这样，纳吉被苏联人推上了匈牙利政府总理的宝座，开始了他风云变幻的

政治生涯。纳吉担任总理后，和拉科西之间的矛盾冲突便开始了。拉科西因仍是

党的第一书记，便利用手中的权力，继续主张要加强工业生产，而纳吉则强调要

增加农业生产和提高居民的消费。此外，在释放所关押的囚犯问题上，拉科西和

纳吉之间也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纳吉主张无条件地释放所有无辜的在押犯，其中

包括一些被无端指控为“间谍”的外国人，而拉科西则坚持认为这些人有罪，坚

决不能放掉。由于争执不下，两位匈牙利领导人于 1954 年 5 月双双出访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拉科西受到了赫鲁晓夫的严厉训斥和警告。5 月底，匈牙利共产

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纳吉的政策得到了大会的一致赞同。然而，1955 年刚

过，形势却开始发生变化。1955 年 1 月，克里姆林宫内发生了政治斗争，马林

科夫遭到了他的政治对手的批评。他曾在 1953 年 8 月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

“为了能够迅速地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能够而且必须用种种办

法加速轻工业的发展”的“新方针”。这个“新方针”遭到了责难。而纳吉关于

发展轻工业的政策与马林科夫的“新方针”十分相像。拉科西充分利用了这一时

机。在莫斯科“休养”的拉科西，也在这个时候回到了布达佩斯。拉科西又重新

大权再握。他声称，党处于危急之中，主要是“大权旁落”。他解除了纳吉的总

理职务，纳吉表示反抗并要求到克里姆林宫去进行裁决。1955 年 1 月 7 日，拉

科西和纳吉再次共同前往莫斯科。结果，克里姆林宫那些把纳吉扶上台的人，一

夜之间就翻了脸，通知纳吉说：他已经被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并罢免了

他的总理职务，撤销了他的一切学术头衔。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就像当年被任

命一样。

纳吉束手无策，心脏病发作，被送进医院。1955 年 4 月，匈牙利党中央正

式向全党全国宣布，伊雷姆·纳吉被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并免除

他的总理职务。12 月，纳吉被开除出党。

苏军的坦克两次开进布达佩斯

1956 年 3 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传到了匈牙利，人民群众的愤怒情绪

迅速蔓延，尤其是一些青年团组织和各种俱乐部。这些俱乐部通常是由学者、历

史学家、哲学家、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组成的政治沙龙，其中最著名的是以匈牙利

诗人裴多菲命名的“裴多菲俱乐部”。人们纷纷要求解除拉科西的职务，为受害者平反及要求纳吉重新执政。尽管拉科西采取了最严厉的措施，企图压制这种蔓延全国的风潮。但是，人民的不满情绪已如火山爆发，不可逆转了。匈牙利的局势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1956年7月17日，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前紧张的国际国内形势。在这次会议上，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向拉科西转达了赫鲁晓夫的话：“鉴于拉科西同志的这些非法措施，建议他辞去匈牙利共产党内的一切职务，并离开这个国家。”格罗为他的继承人，而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卡达尔补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第二天，匈牙利报纸上就发表了一份公报，称拉科西因患“高血压症”，必须“离职休养”。就这样，拉科西接到苏联人的指令，携带家眷，前往莫斯科听候发落。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匈牙利。

拉科西下台后，匈牙利共产党和政府为了稳定局势，缓和人民的愤怒情绪，先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试图扭转局势。匈牙利共产党为被拉科西集团迫害而死的拉伊克等人平反，释放受牵连的300人。10月6日，为拉伊克等4名原领导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随后，又在群众的巨大压力下，恢复了纳吉的党籍。

然而，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好转。10月20日，传来波兰党的政治局改选哥穆尔卡当选为第一书记的消息。10月23日，首都许多大专院校的学生涌上街头，散发传单和演说，邀请人们参加定于下午召开的声援波兰人民和哥穆尔卡的集会游行。裴多菲俱乐部提出了10点要求，主要内容是：要求在匈牙利进行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对拉科西时期的错误进行清算；维护匈牙利的民族尊严和反对苏联大国主义。

格罗获悉情况后，立即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禁止游行，并指派政治局委员去各团体、机关解释这一决定。中午，几千名大学生走上街头。他们举着

横幅，扛着旗帜，并在钮扣孔内插着红白绿三色徽章——匈牙利国徽的颜色。他们由市区向英雄广场进发，沿途有许多学生加入。到了下午两三点钟，游行队伍已增至 20 多万人。在贝姆&#8226; 尤若夫的纪念碑前，匈牙利作家协会主席发表了简短的讲演。游行者们高呼着：“俄国人滚回俄国去！”“党要民主化，纳吉&#8226; 伊姆雷要执政！”“俄语不该作为必修课！”“不再容忍欺骗，公审法尔卡什（拉科西集团的主要成员）！”等口号。他们还拆除了广场上的斯大林塑像。局势的发展，使匈牙利政府不知所措。苏联顾问们要求匈牙利政府出兵镇压，政治局却决定由格罗在晚 8 时发表广播讲话。暮色降临了，国会广场聚集着几十万人，他们齐声呼喊：“纳吉&#8226; 伊姆雷，出来讲话！”此时的纳吉，还没有承担任何职务，但人们坚持要他出来讲话。终于，纳吉来到了国会大厦，对那里的人们说：“要有耐心，善良的人们！回家去吧，党会把一切都安排就绪的！”广场上四起的哨声，淹没了他的话音，他痛苦地闭上嘴，在随同人员的簇拥下从阳台走进了屋里。广场上有些人开始散去，但大部分人还聚集在那里。晚 8 时，格罗在电台发表讲话。他说：“亲爱的同志们，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匈牙利的劳动人民！我们毫不犹豫地继续发展、扩大和加深我国的民主……但是，人民的公敌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要埋葬工人阶级政权，松懈我党和光荣的苏联党之间的关系。

我们谴责那些滥用国家给予工人阶级的民主自由权力来制造民族主义示威的人们……“格罗的讲话不但没有平息人们的情绪，反而犹如火上浇油，使群众的敌对情绪上升到极点。晚 8 时半，国家广播大楼前面的广场上突然响起了枪声。9 时左右，广场出现了一支陆军摩托部队。很快，这支部队就被示威群众缴了械。接着，有人号召人们去攻打广播电台。9 时半左右，示威群众开始向广播大楼发



起冲击。他们同守卫大楼的武装人员发生了武装冲突。24日上午9时，广播大楼的守卫部队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示威者占领了大楼。与此同时，国际电信局、党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编辑部和印刷厂、武器仓库和警察哨所等也先后被示威者攻占。布达佩斯街头燃起了战火，匈牙利陷入到一场混乱之中……情况危急。匈牙利党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改组政治局，纳吉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被任命为政府总理。同时，以匈牙利党和政府的名义，要求苏联派兵协助镇压”暴乱“。10月24日，苏联坦克部队开进了布达佩斯。当天中午，纳吉在电台发表讲话，要求人们在当天下午2时前放下武器和停止战斗，否则，将以军法论处。纳吉同时还说，他将恢复匈牙利政治、经济生活的民主化，召开国民议会，恢复他3年前提出的纲领等等。然而，纳吉的讲话并没有使暴乱停止，相反，暴乱向全国蔓延，局势在进一步恶化。10月25日上午，议会大厦广场发生了流血事件，近300人伤亡。事件发生1小时后，在苏联人的授意下，格罗被解除了职务，卡达尔被任命为党中央第一书记。然而，这并不能平息群众的愤怒，广场流血事件迅速传遍全市。下午3时左右，约2万名群众包围了布达佩斯警察局（他们误认为这里是国家保安部的总部），要求警察交出手中的武器。在各种势力的压力下，匈牙利政府被迫妥协，宣布解散国家保安局和情报部，同时也解散了属于国家保安局的公安部队，遣散其士兵和军官。这样，国家政权失去了一切武装力量。

10月28日，苏共政治局代表米高扬和苏斯洛夫抵达布达佩斯，同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商讨了匈牙利的局势以及纳吉政府要求苏联军队撤离布达佩斯的要求。苏匈两国之间开始了撤军谈判。同一天，匈牙利党的领导机构由一个6人团接替，卡达尔成为6人团的主席。31日，6人团宣布解散匈牙利共产党，重建新的党，即“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0月28日，纳吉发表广播讲话，把

他 3 天前还称为“反革命事件”的暴动正式称之为“革命行动”，并同时向人民宣布：苏军将撤离布达佩斯，取消国家保安局，起义者将被编入各武装力量组织，提高低工资和退休金，调整工资，成立新政府等等。10 月 29 日，苏联政府宣布，苏军撤出布达佩斯。10 月 30 日，纳吉在广播中宣布，苏联军队已经从布达佩斯撤出，苏联军队将从整个匈牙利撤出。与此同时，他还宣布匈牙利取消一党执政，允许恢复被拉科西取缔的各政党派别，释放被长期囚禁的红衣主教明普蒂。在此之前，监狱的大门已被打开，9000 名刑事犯和 4000 名政治犯已被释放。随着苏联军队的撤离，一场对共产党和保安警察的报复行动在布达佩斯开始了。据统计，仅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3 日，就有约 2500 人被杀害，3000 人被监禁，1 万多人被列入准备处死的名单中。匈牙利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武装冲突和流血事件接连不断，城市交通瘫痪，人民的生活受到极大的威胁。11 月 1 日，纳吉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信，宣布匈牙利中立，并希望联合国干预匈牙利事务。11 月 2 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宣布，美国将向匈牙利提供价值 2 千万美元的食物和救济物资。此时的苏联，也正在密切地注视着匈牙利的局势，并开始了秘密地部署军队。11 月 2 日，赫鲁晓夫在同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领导人就匈牙利局势进行通报和商讨后，又同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在布里俄尼岛会晤。赫鲁晓夫同这些国家已经形成了共同的意见。他通知铁托说，苏联已决定出兵匈牙利。11 月 3 日，苏军坦克部队包围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纳吉向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提出抗议。安德罗波夫却表示，苏联同意与匈牙利政府谈判关于撤走军队的问题，并希望纳吉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苏军总司令部商谈具体事宜。为此，纳吉派出了以国防部长马勒特尔为首的 4 人代表团前往苏军总司令部。纳吉希望此举能获得成功。然而，纳吉做梦也不会想到，苏联人逮捕了他的 4 名代表。不

仅如此，安德罗波夫还把卡达尔“请”到了苏联大使馆，向他施加压力，劝他离开纳吉政府，在苏联的支持下组织一个新政府。他告诉卡达尔，马勒特尔将军和他的政府代表团已被诱捕，匈牙利抵抗力量的军事首领们已被解决。在安德罗波夫的再三劝告下，卡达尔终于同意了安德罗波夫的“建议”。11月4日凌晨3时，苏军坦克攻入了布达佩斯。凌晨6时，广播里播送了成立以卡达尔和亚诺什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消息。同时还播送了这个新政府的革命纲领，即保卫民族独立，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恢复法律秩序和安宁，保持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新政府还宣布，匈牙利已经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苏联红军部队帮助“恢复国内秩序”。早8时半左右，苏军坦克包围了议会大厦。纳吉和一些政府官员此时已撤离了议会大厦。苏军很快就占领了这里。但是在市区和城郊的一些地方，匈牙利人仍在和苏军进行战斗。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直持续了两天两夜。为了抗议苏军的入侵，匈牙利各级“工人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宣布了总罢工，并宣称总罢工将持续到苏军完全撤走为止。前匈牙利国防军将军基拉伊还组织了一支暴动队伍同苏军进行全面抵抗，但终因力量悬殊而遭失败。经过近两个星期的血腥战斗，匈牙利有2万多人丧生，15万人被迫逃离了匈牙利，沦为难民。除此之外，还有成千上万参加暴动的青年工人和学生被押上火车，强迫运送到苏联各地的“劳动营”和西伯利亚森林充当苦力。苏军开进匈牙利后，纳吉同一些政府成员通过议会大厦的秘密通道，逃到了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苏联获悉后，立即对南斯拉夫大使馆实行封锁。赫鲁晓夫亲自出马，先后两次召见南斯拉夫驻苏大使，要求引渡纳吉和他的政府高级官员。南斯拉夫政府在经过很有分寸的反对之后，同意交出纳吉，前提条件是匈牙利新成立的工农革命政府必须保证纳吉等人的生命安全，而且移交工作必须在南斯拉夫外

交官的监督之下进行。苏联政府完全同意南斯拉夫提出的要求，希望尽快让纳吉迁出大使馆，并保证可以让纳吉回到他的住宅，加以监护。随后，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领导人卡达尔签署了一份协议，向纳吉和他的同事们保证：如果他们撤出南斯拉夫大使馆，回到布达佩斯他们自己的住宅去的话，他们可以完全免除刑事处罚。这份协议是通过南斯拉夫外交部长转交给纳吉的。在得到了这一保证之后，纳吉同意撤离南斯拉夫大使馆。移交是在 11 月 22 日进行的。上午 9 时，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内务部长派来一辆大型公共汽车来到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门前，车上有几名保安人员和一位新政府官员前来执行移交任务。9 时半左右，纳吉和他的随行人员在两名负责监督移交的南斯拉夫外交官的陪同下走出了使馆。按照协议，移交工作待纳吉等人回到他们在布达佩斯的住宅才告结束。移交工作开始比较顺利，但当汽车驶出南斯拉夫大使馆到英雄广场附近时，却被早在那里等候的几辆苏军坦克给围住了。随后，纳吉等人被劫持到了苏军总司令部。当晚，他们便被塞进一架飞机，离开了匈牙利。第二天，新闻界向外发表了一条消息，称纳吉等人“根据自己的要求”，已去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疗养”。11 月 26 日，卡达尔在布达佩斯广播电台也宣布：“我们说过，对纳吉和他的朋友们的言行，将不予法律追究……我们将遵守这一诺言。我们不认为他们的外出是永久性的。依我们看，对纳吉及其随行来说，去国外呆一段时间是有好处的。”12 月 3 日，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普雷奥雷泰奥萨在联合国大会上宣称：“罗马尼亚政府保证，纳吉总理及其一行可以充分享受政治避难权……罗马尼亚政府有义务尊重这一国际权力的规定。”然而，很快情况就发生了变化。1957 年 1 月 1 日至 4 日，苏联、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匈牙利 5 国党在布达佩斯召开会议。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代表苏联共产党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他们讨论了纳吉的问

题。紧接着，1月6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发表了一份公报。公报宣称：

“纳吉&#8226;伊姆雷及其政府的背叛，为匈牙利的法西斯反革命开辟了道路。”

随后，纳吉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叛徒”和“西方帝国主义的走卒”。与此同时，

工农革命政府宣布在暴动期间所成立的一切工人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均为非法组织，勒令限期取缔。紧接着，一场大逮捕席卷了整个匈牙利。仅在1957年1月19日这一夜之间，布达佩斯市就有2000多人被逮捕，

并且在当天夜里，大部分人被集体枪决。1957年12月，纳吉等人被秘密押回匈

牙利布达佩斯福乌察国家监狱，等待接受审判。1958年2月6日，布达佩斯

“人民法庭”在绝密的情况下对纳吉等人进行了第一次审判。6月15日，秘密法

庭在绝密的状况下对纳吉等人进行了判决：纳吉&#8226;伊姆雷被判处死刑。同

时被宣判死刑的还有：前国防部长帕尔&#8226;马勒特尔和记者米克洛什&#8226;

基迈什等人。纳吉在被关押期间拒不承认卡达尔政府。临刑前他说：“在多瑙

河的河谷，我曾在1953年和1956年两次试图挽救社会主义的荣誉，拉科西和俄国

人都阻止了我。如果现在需要用我的生命来证实共产主义者并非是人民的敌人，

我情愿做出这一牺牲。”1958年6月16日早晨6时，纳吉在布达佩斯中央监狱

的小拘留所内的院子里，被处以绞刑。临终前，纳吉高呼：“社会主义的、独立

的匈牙利万岁！”

这个有着40多年党龄、曾在苏联度过15年光阴、在匈牙利党和政府中身居要

职达20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知名人物，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生命。他的

罪名是“阴谋暴动推翻匈牙利合法制度、叛国投敌、军事哗变”。直到1989年1

月底，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宣布，1956年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一场

人民起义。同年5月，匈党中央为纳吉平反，称他“在当时的特殊的环境下，为

拯救国家而斗争。”6月，卡达尔在接受《匈牙利》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必须承认，纳吉及其周围的人不想搞反革命。”波兹南和布达佩斯的流血，皆因对斯大林及其遗产的谴责而发生的。而始作俑者正是后来对波兰党独立处理本国事务横加指责并亲手扼杀纳吉“异端”的赫鲁晓夫本人。他没有想到他的“非斯大林化”给东欧带来了思想解放的暖流。但是，他害怕由此在东欧国家中出现的独立倾向。于是，东欧还没来得及解冻，西伯利亚的寒流便匆匆袭来。然而，原来的冰层毕竟已经裂开了一道缝儿，这是无法弥合的空隙。

刘自立：匈牙利事件五十周年祭\_ 共识网一

2006年，是一个纪念年。文革四十年，是很重要的纪念。

文革发生，远因近果，却可以追溯到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或者简称波匈事件；所以有此说法，是因为毛的文革理论和所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深层根据，来源于对于修正主义之批判；而修正主义之现代集大成者，就是那几个在中国做为贬抑词的象征性人物，赫鲁晓夫，铁托和伊姆雷。纳吉。纳吉此大名，和1956年布达佩斯之所谓裴多菲俱乐部，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名词，就像那些不可或缺的其他国际人物和事件之名称一样，被中国化和党文化化了，被遮蔽和扭曲了。

于是，解释何为修正主义，成为那个时期以来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也许是现在所说的头等大事或重中之重一类。

辨正赫鲁晓夫和纳吉，是怎样一种修正主义，其异同如何，是一件亟待澄清的事情。因为，赫鲁晓夫之修正主义的核心，是批判了，揭露了斯大林。而纳吉，做为此批判之受益者和受害者，在整个匈牙利事件中，其几度沉浮，以至最终毙命，是和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对待苏联——这个斯大林货色的国家，紧紧相系

的；而批判斯大林和保卫社会主义，又使得纳吉成为赫鲁晓夫思想中的悖论。

（虽然，赫氏并不欣赏那个匈牙利的斯大林分子拉科西……）。

这期间，人物之间，主要是苏东人物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批判斯大林，是为了批判社会主义，还是相反？

纳吉之社会主义和赫氏之社会主义区别何在？

中国人介入匈牙利事件，是否成为赫氏下决心镇压的重要原因？

在此以前，赫氏一度支持纳吉而规避拉科西。赫鲁晓夫对于匈牙利的武装干涉，成为匈牙利“民主社会主义”死亡的根本原因。由此看来，纳吉之命运是否胜也萧何，败也萧何。

纳吉是不是只是被赫氏抛来甩去的傀儡呢？答案截然相反，他是社会主义土壤中成长出来的自由化英雄——换言之，社会主义土壤可以产生自由主义。这个英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鄙以为大大超过赫氏本人，铁托本人和中国的胡、赵。正如中国一个诗人所谓，“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出血斑斑！”

在贯彻民主和自由，社会主义转型方面，赫氏也好，铁托也好，胡赵也好，都没有能够找到和具体践行的办法，而留下这样那样的局限性。

也就是说，纳吉在五十年前开创的理论和实践，至少超过铁托和胡赵的转型诉求和转型实效。因为他们还停留在虚伪的巴黎公社原则和所谓“实践检验真理”一类马列主义臼穴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个实践检验真理说，其实来源于当时苏联「真理报」的一个提法。这个提法是，我们提倡各种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实践经验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云云。（「真理报」1956年12月，见「苏南关系」一书英国斯蒂芬·克利索德编人民出版社）——而纳吉，就大大超越了这个检验和实践——他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多党制和脱离华沙条约组织，使得东西

方的人们瞠目结舌。

我们当然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早就演变成为寡头政治。其政治实践，包括经济实践，也只能是思想国有化，权贵经济和独裁者本人的裁定。而纳吉的实践，超越此道，形成一个短暂的，反此之道的，真正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检验政治经济的实践。虽然，其指向真理的实践之脆弱和幼稚，不足以抵抗当时还非常强大的赫鲁晓夫乃至毛主义的正统社会主义势力及其思潮。

更加重要的是，在纳吉实践这一非社，非资的政治路线图的时候，东西方两个阵营，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一个态度，是赫氏积极的武装干预，肆意镇压；一个是美国人，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的新一波绥靖主义。他们当时对于争夺苏伊士运河控制权之兴趣，大大超过匈牙利人的流血！

在许多关于于此的记载中，饶有趣味的，是基辛格的想法。在「大外交」一书中，基辛格对于艾克们的冷淡和怂恿，亟尽批判之能事——而他在文革期间和毛，周的谈话，则完全忘记了他对于纳吉的同情。此公的一头两面思维，使人看到西方此类怪兽的狡诈和城府。

于是，过去的五十年，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对于伟大的匈牙利人都负有罪责，至少美国在道义上是有罪的。虽然，我们看到美国战后认可并维护东，西欧的划地为牢的原则，也许保持了冷战条件下的和平。而其相对的孤立主义态度，使得东欧民主之到来，也许延后了几十年。

是的，维护这个界限的价值，难道只有牺牲匈牙利起义才有可能吗？难道美国的做法，不是让苏联的镇压成本降低到零吗！

同理，当苏联人在十几年以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在北京发生 1989 年事变的时候，美国人表现的态度，都让我们想起他们对于纳吉见死不救的态度——



—这个关于中国政策的“熊猫”化宝贝，迄今还影响着那些被阿伦特称之为帝国主义思维的政客们。

而修正主义，好像的确比起帝国主义，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们的命运，来得更加重要。

毛，在半个世纪以前，正是看到了这种威胁而越发变本加厉地要想对此加以消灭，从肉体 and 心灵上加以消灭。但是，历史的吊诡是，修正主义不但以工党和社会党的面目进入西方社会，而且以中国特色进入毛以后的中国社会和世界社会。虽然，这个修正主义的变种，如今已经变得难以识别——因为他不是朝向普世价值演进，而是再度发展出来一个中国式怪胎。这个怪胎，就是反普世价值的修正之修正——就好像实践了古老的否定之否定，而又丝毫没有辩证法的活力出现那样。辩证法变成东方的，类似基幸格式的相对主义和马基亚佛里主义。

这类马基亚佛里主义者，已经不是当年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者。他们用来自蒙蔽世人的新毛派旗帜，已经不是红色而是黑色。而黑色的旗帜，在红与黑的较逐中，猎物，究竟死于谁手，当下还是扑朔迷离的。

五十年以前，自诩为修正主义批判者的毛派中国人，一直以来，对修正主义忧心忡忡——至少，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毛和邓，没有能力面对这个事实——邓虽然说，对于批修，要“一风吹”，但是，其实他是在悄悄地实行铁托五十年前做过的事情，就是靠拢西方和美国。他知道，共产党对于是不是一定要批判修正主义这件事情，并不是唯此唯大之唯一，而充实政权的实力，甚至可以反对某种反修。他的态度当然和毛相反——而谁也不知道，毛如果多活十年，是不是又是一个邓——因为，他和尼克松的接触，已经使得他懂得了一个西方政治的哲理——越是违背自己的原则，越是产生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但是，毛派的“觉醒”，也许来得太晚。其一塌糊涂的统治，在 1976 年前后，已经气息奄奄，就要崩盘。

1976 年变以后，毛之思想和政治资源已经枯竭。修正主义可以救中国——邓，开始派出人马访问南斯拉夫，邀请铁托，这个昔日之“帝国主义之走狗”访华，并实行某种有限度的转型，引进外资和实行土地承包等等……

于是，至少毛对于赫氏和铁托的批判，已经暂告终结。

这就是毛，邓对于修正主义批判之逻辑的终结。（虽然，在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毛的思想并不是完全僵化的。他对于赫氏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还是表现了自身的看法。下面我们还要提到之。）

## 二

这样看来，在匈牙利事变发生的时候，东西方的政治家们各自表达了他们对于匈牙利事变的看法，产生各自辨正于此的所谓政治逻辑。

这些逻辑，虽然已经逐渐随着一个历史大进程的逻辑的出现和作用之，而变得日益式微和没落，但是，毕竟在当年，这些逻辑，一度呈现了他们的历史强辩之性质，并且以此拖延历史，至少有五十年之久。

这些逻辑的前提，是人们对于历史进程的推断和判别。这些判别的思想和理论资源，来源于各自对于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对于国际地缘政治和利益政治百般的考量——这里，即包涵赫鲁晓夫对于苏东集团的利益考量，也包括西方人，美国人，对于其自身利益的考量——一如前述。现实即合理之原则，在历史本身未发生剧烈错动以前，好像言之成理，而历史的错动，使得历史本身的秩序和合理性逐渐凋落。

重复而言，对待匈牙利事件，毛们，赫氏们，铁托们，纳吉们，乃至艾克和

杜鲁门之流，都不失时机地，表现出他们的政治思考。这些政治思考，于今看来，又是怎样一种逻辑和推断呢？

我们也许可以首先来看看铁托们的态度。

一般而言，在匈牙利事变发生以后，铁托们好像站在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场上，对于苏联人的野蛮和粗鲁，报以某种不乏良知的谴责。而这种谴责，使得历史对于修正主义者的面目，真假难辨，形成似是而非和模棱两可之特色。

我们不得不有些印证，以说明这种貌似公允。

这里，我们引用了赵启强先生的一些资料（「走向绞刑架的改革家——纳吉与匈牙利事件」）。

赵先生对于纳吉和匈牙利人，在事变发生以后表现的，几乎是英雄的和主人翁（这个社会主义形容词）气概，十分赞扬。而对于南斯拉夫人的古道热肠和见义勇为“说”，做出全面肯定。顺着事变的演进，赵说出一系列铁托和南斯拉夫的辩护纳吉之词，使人们看见了铁托们的“正义感”。——“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铁托说：匈牙利事件是”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进步的愿望和国家与政治领导机构的活动之间产生了矛盾，最后导致武装斗争的爆发。“”

这当然是一个很正面的概括。

顺下来是，“1956年10月24日，面对着街头的苏联坦克，……人们要知道此时在布达佩斯街头巡逻的苏联坦克到底是谁请来的……”

“铁托说，‘军队是格罗请来的，当示威还在进行的时候把苏军请来，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请别国的军队来教训自己国家的人民，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举动结果更进一步激怒了人民，因此发生了自发的暴动。’”

“纳吉于11月4日和他的追随者42人躲进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并获得

了政治避难权。”

这是众所周知的。纳吉躲进南使馆。这也多少表明铁托的态度；但是，这个行止只是表面上的——请注意！

“南共领导人卡德尔在 1956 年底就为匈牙利事件中的工人阶级作过辩护。卡德尔说：”硬说工人阶级在获得自己胜利的 11 年后，跟着反革命跑了，这难道会使社会主义的良心感到安慰吗？即使我们假定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毕竟还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应该对工人阶级使用大棒呢，还是应该对把工人阶级弄到使它不得不起来反对自己的历史利益这种荒谬地步的政治制度使用大棒。

““

“11 月 4 日，纳吉和他的 41 名政府要员及家属，刚躲进南斯拉夫大使馆，苏联的坦克装甲车便包围了使馆大楼。

避难者和大使馆都经历着难以形容的困难。苏联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要他们交出纳吉；大使馆受到机枪射击，有外交官被打死：“难民”的治病、吃饭成了问题。“这里，是赵先生叙述的纳吉最后的命运——”纳吉等人在大使馆内渡过了 17 天后，由于南斯拉夫的多方调解、谈判，匈牙利政府终于在 11 月 21 日致函南斯拉夫政府，表示匈牙利新政权“不想就纳吉和他的集团的成员过去所做的事实实行惩处，”“他们将自行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并自由地返回自己的家……”南斯拉夫和纳吉都接受了这一条件。

11 月 22 日，也就是在匈牙利政府发出保证的第二天，匈牙利政府派出一辆公共汽车接这些难民回家。车刚开出了大使馆，就被苏联装甲车包围。

苏联军官闯入车内，将两名监督执行这一协议的南斯拉夫外交官拉出车外。

在苏联坦克的监护下，这辆公共汽车开到了苏军总司令部。纳吉和他的朋友

拒绝下车，但被强行拉出来。难民中的妇女孩子也遭到同样对待，吓得直叫。

第二天，新闻界发表一条消息说，纳吉和他的朋友“根据自己的要求”去了罗马尼亚共和国。“

以后，发生了最终纳吉被苏联人杀死的悲惨结局。

从南斯拉夫人的这些表态看，好像他们是站在纳吉一边，只是出于苏联人的淫威，不得以使纳吉落入虎穴。

但是，在一批被英国人克利索德披露的材料中，南斯拉夫人的面目，就不是那么清晰可辨了。克利索德引用有关历史档案，他写道——

“事情告一段落，可是依然紧张。”

这里，考氏所说的“告一段落”是指，即 1956 年 10 月，纳吉暂时控制了政权。

苏联方面撤出军队，米高扬和苏斯洛夫接见了纳吉政权。但是阴谋没有停止。赫氏和马林科夫飞往铁托的布里俄尼岛，试探南斯拉夫的态度。“同时试探中国，波兰，南斯拉夫和其他共产党可能做出的反映。”

克氏写道，“铁托对于拉科西和格罗下台表示欢迎，对纳吉上任表示赞同，

但是现在对匈牙利事态发展又有了新的想法。苏联领导人满意地离开了布尼俄尼岛，因为他们知道，即将对匈牙利采取的行动，可能使辛苦得来的苏南和解蒙受损失，但却不致破裂。”

赫鲁晓夫在其著名回忆录里也说，“我们向铁托报告我们为什么前来向他提出我们已经决定派军队进入布达佩斯的问题。我们要求他做出反映。我原来猜想，铁托会做出我们和波兰同志讨论这一问题过程中遇到过的更加强烈的反对。但是他的回答使我们有高兴又惊奇。铁托说，我们是绝对正确的，而且我们应该使得我们的部队尽快行动起来。他说，我们有责任帮助匈牙利镇压反革命。他向我们

保证，他完全了解采取这些措施的必要性。我们本已做好和他顶牛的准备，但我们反而得到他全心全意的支持。我甚至要说，在力主采取迅速而坚决的办法解决问题方面，他比我们走得还要远。”（「赫鲁晓夫回忆录」）

考氏补充说，“铁托已经设法使赫鲁晓夫相信，”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为伊姆雷·纳吉及其同伙提供避难权一事是否做得正确，现在并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问题“，而且赫鲁晓夫在写给铁托的信中曾说道：”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自从布里俄尼会谈以来，你已经完全同意我们对亚诺什·卡达尔同志的态度，…他能够在目前艰难的时刻和条件下，领导一个新的政权。“（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摘自恩维尔·霍查的一份报告）

而这个卡达尔（据说他已经精神分裂。基辛格就是这样说法——作者），正是把纳吉交给苏联军队的人。一个不大不小的叛卖者。

考氏还提供细节。“有礼由相信”，俄国人一度准备绕下伊姆雷·纳吉一条性命，以换取南斯拉夫加入苏联阵营“，由于南斯拉夫拒绝了这个交换，纳吉被处决——而且，南斯拉夫人本来准备公开这些文件。

而铁托，还在联合国通过匈牙利案件协议前，指示其代表不投票。

他后来发表了一些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一小撮”论，即反革命利用了群众，多数人被蒙蔽，社会主义制度受到威胁。

这样，我们看到的南斯拉夫人是极为虚伪的。其与苏联幕后交易，和其官面上那些义正词严之说，形成两张皮，变成两个面目，甚至两个心灵。一个是道义拯救者的形象，而另一个，是犹大——虽然有人说，耶稣和犹大联合，才有新世界——而且，是耶稣让犹大去叛卖他的……

我们分析一下南斯拉夫人和苏联人的交易，其逻辑内涵究竟何在。

其一是，纳吉，成为赫鲁晓夫引诱铁托加入苏联阵营的一个诱饵。但是，南斯拉夫人更加看重的，不是匈牙利的自由民主，而是他自身铁托式的独立。

其二，赫鲁晓夫和铁托的牢不可破，或者“不牢可破”的友谊，实质上，建立在他们对于斯大林的否定上。铁托和斯大林的关系，由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变得心有灵犀一点通。而对于斯大林主义者的仇视和蔑视，遂使得斯大林变成铁，赫制定友谊的一个前提。

其三，如果苏联的利益和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因为反斯大林而受到动摇的任何迹象，赫鲁晓夫就会马上变成一个“爱国主义”者；而铁托，也不会因为有可能丧失自身的南斯拉夫模式，而接受苏联的“招安”。

四是，在权衡自由和国家利益方面，铁托的亲西方趋向，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他到底是一个修正主义者，而不是他原来的同事创生的，同样从社会主义土壤中生长的德热拉斯主义。不然的话，南斯拉夫的纳吉——德热拉斯，何以被他的亲密战友所整肃呢！

五是，赫鲁晓夫虽然开启对斯大林的批判，开启现代修正主义之路线图，但是，他并不具备转型到西方价值观的，那些思想路径和精神储备，他不过是一个稍俱常识而反对斯大林屠戮政策的共产党人，他没有自由民主的，实践的 and 理论的前景可言——就像邓，也无此前景可言那样。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南斯拉夫所谓独特社会主义的假面具后面，究竟是一些什么货色，即，他的工人自治，工人委员会等貌似更加马克思主义的那些货色后面，究竟是不是一种纳吉式的，接近西方的社会主义——但是，那却是另外一个课题。

南斯拉夫人确实表现出一种原本意义上的修正主义，或者说，机会主义作风。

他们对于纳吉的拯救像是演戏。铁托这个戏子的表演，至今还受到人们的肯定，或者多少受到肯定。

于是，对于纳吉和匈牙利事件，从赫鲁晓夫到铁托，修正主义者做了充分的表演。一面，是恪守某种原教旨主义的正统，另一面，则则悄然潜入异端，或者在遇到可怕的异端时，招回正统。因为普遍来说，他们没有正面异端的准备和储备。文化和精神上的，都没有。

于是，他们变得朝三暮四，翻云覆雨，看似灵活，却随时准备背叛，翻脸甚至屠戮。

在西方，实用主义表达一种解构，是对于宗教和一元中心主义的解构——而这个解构，在东方，在苏联，则完全变种为撒谎和强辩。本来就没有宗教和政治原则之辈，在违背虚假原则的时候，表现得好像先知先觉。因为没有人可以代替他们的喉舌而取得话语权。而他们，其实是心中没有上帝和原则的一群败类。也就是说，赫鲁晓夫和铁托在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各取所需，从教条主义者演变成政治流氓。而流氓，好像也有流氓的逻辑。他们在所谓的“无间道”玩耍的地狱游戏，也好像产生规则，只是这种规则，只对创造规则的人负责，不对被迫参与游戏者，相应堕入此游戏的人民负责。他们如果可以称得上解构了什么，那么，这个解构，与其说是一种思想，不如说是一种投机——一种没有思想的投机——比如“不要争论”，“猫论”等实利主义行为。

那么，1956年，赫鲁晓夫的逻辑又该如何阐释呢？

赫鲁晓夫的逻辑，首先是反对斯大林，不能不说是他，而非别人，开启了俄

国的新时代，或者用爱伦堡的话说，叫做“解冻”。赫氏此举，对于苏俄是一种



拯救——

虽然，他的短视，引起匈牙利事件的毁灭。但是，这个毁灭，却是苏联毁灭的开始。苏联的毁灭，不过推延了几十年。这个毁灭的逻辑，使得赫氏之后来者，如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之流，得以继承这个政治遗产。虽然，在匈牙利事件上，赫鲁晓夫又回到斯大林的霸权主义上面。一个政治流氓，成长为一个改革者，或者说，一个改革者，最终演变成一个政治流氓，很不幸，历史就是这样开玩笑的。

刘自立：匈牙利事件五十周年祭（2）

如果说，所谓帝国主义有其内，外之别，有其对内民主，对外专制两面——这个两面，正在被如今的伊拉克战争所颠覆——那么，修正主义，也是如法炮制，有他的两面性。在 1957 年，这个两面性表现在，赫氏一要批判斯大林，二要消灭纳吉。须知，赫鲁晓夫就是苏联的纳吉，或者纳吉之半——更加彻底的毛是持此论调的。

所以，虽然赫氏镇压了纳吉，但是，他开创的“解冻”之功绩，依然值得赞许。

也许，正是因为赫鲁晓夫的两面思维，使得纳吉的沉浮，呈现几乎无迹可寻的迷像。这个迷像，表现在他们对于纳吉的支持，苏联在事变发生后，第一次撤军行动，安德罗波夫甚至接纳了纳吉的中立宣言，等等。

从苏联当时的言行上看，理论上，他们并未批评纳吉的行止。实践上，他们也未马上作出检验。他们也在思索和等待时机。

匈牙利事件的缘起，可以说是苏联人启用了纳吉，而惩罚了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分子。

而在事变过程中，苏联人对于纳吉也有过明确的支持。直到最后，米高扬等人还处于支持纳吉的立场上。

而不幸似乎是突然发生的。没有任何有效的解释或者警告，他们逮捕了纳吉，选择了卡达尔，强行翻过了这棘手的辉煌一页。

我们现在还是要引用这些资料，以澄清纳吉一度受到赫氏和苏联人支持的历史——

“1953年6月，莫斯科召见了拉科西和纳吉。……赫鲁晓夫甚至指着这位匈牙利国家元首（指拉科西——作者）的鼻子骂道：”你极大地损害了你的人民！你罪行累累！常此以往，人们将用武力把您赶出这个国家！”

这次召见的结果是拉科西留任总书记，改称第一书记，让出总理职务由纳吉担任。“（赵启强文，下同）

“……纳吉走的太远了，他超越了拉科西，超越了提携他上台的赫鲁晓夫；更主要的是他超越了历史。（指纳吉的系列改革措施——作者）超越历史！”

“1955年初，拉科西重新大权在握，他解除了纳吉的总理职务。纳吉表示抗议，要求莫斯科裁决。

这一次，纳吉被苏共抛弃了。”

纳吉被开除出党。

注意，一个是1953年，一个是1955年。接下来是1956年。这一年“10月14日，中央政治局宣布撤消1955年上1月开除纳吉出党的决议。”

“10月23日，数千名大学生上街游行，声援波兰的哥穆尔卡。”

“请外国军队来镇压自己的人民是一个错误。一涉及到民族尊严和独立，匈牙利事件变得复杂了。10月24日凌晨，匈共中央采取了两项非常重大的步骤：解

除安德拉什。赫格居什的总理职务，由纳吉接替。格罗留任党第一书记。”

苏联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是由匈牙利政府出面邀请的坦克。

“早上，国家电台公布了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同时宣布两项命令：

一、禁止集会；二、请苏联出兵恢复秩序。”

纳吉复位和苏联坦克同时出现在公众面前，是一个谜团吗？！

10月23日，纳吉发表了讲话——

“‘布达佩斯市民们！我现在宣布，所有今天14点以前放下武器和停止战斗的人将不以军法论处。’”

（“在莫斯科的拉科西知道了动乱的消息后，以为是他的一个机会，他报告莫斯科说，他要回到匈牙利去帮忙。赫鲁晓夫的回答是：’您可以回匈牙利去，但那里的老百姓将把您吊死！“）

“苏联都在10月30日发表政府公报说：”纳吉政府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从匈牙利全国各地源源而来的报道表明，工人支持新政府，并赞同它的纲领。‘

“

请注意！这是在纳吉发表了著名的解散共产党（10月31日）和实行多党制

（10月30日）的讲话以后！

“纳吉政府加紧了与苏联关于撤军的谈判；苏联政府也于10月30日发表声明：”鉴于苏联军队继续留驻匈牙利可能导致局势更加紧张，苏联政府已经指示自

己的军事司令部，一俟匈牙利政府认为必要，即将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

以后，发生了前此提到的米高扬赞扬“纳吉同志”的场面。“然后两人拥抱，

热泪盈眶”

但是，实际上，更多的苏联军队正在滚滚开向布达佩斯。

“10月31日，纳吉再次召见安德罗波夫。他说，‘军事专家已无可辩驳地证实，新的部队已越过边境，因此，匈牙利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并立即生效。

’当天下午，安德罗波夫又被请到议会，正式将中立宣布书交给他。”

11月1日纳吉发表了那封言词激烈的，关于匈牙利中立的宣誓书。其中说道

---

“匈牙利人民和匈牙利政府对于人民负有深远责任，为表达匈牙利数百万人民齐一的意志，仅此宣告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永为中立国。”（「大外交」）这就是所谓战后的奥地利模式。

缓兵之计，就是这样表演的！

11月4日。“清晨，纳吉在国会大厦用4种语言向全国、全世界，向人类的未来广播：”我是匈牙利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伊姆雷·纳吉。苏联军队已于今天早晨开始进攻首都，公然企图推翻匈牙利合法民主政府，我们的军队正在战斗，政府依然存在。我向匈牙利人民和全世界通报这一情况。““

匈牙利著名知识分子呼吁救救匈牙利，但是无人/国响应。响应的，都是一些赞成屠戮者，如毛、周和印度的尼赫鲁。而艾森豪威尔们也明言，他们不赞成以敌国包围苏联的做法……

全世界叛卖了纳吉和民主！叛卖了匈牙利！

……一切，就是这样结束的！

我们从历史的瞬间，匈牙利惊心动魄的十三天里，究竟是看到苏联的政治伎俩，还是从这个伎俩中看到，某种被处死的新思想，在处死者那里也发生了影响。他们在获得异端正统的悬念中，突进了这个异端思想，获得了某种合法性和合理性。至少，在赫鲁晓夫和米高扬那里，无论是铁托，还是纳吉的反斯大林主义，

都得到了某种肯定。这个肯定证明，他们对于拉科西，格罗之流的欲罢不能和不能欲罢。只是在超越的时候，黑白反差才逐步显露出来。正想有人所言，斯大林的阴魂不散，他还高悬在科林姆林宫。但是，触犯斯大林，也是触犯赫氏，这个命题看来荒诞，其实真实。

#### 四

最后，我们来看看我们中国人和中国党的态度。这个，也许是我们行文的中心，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议论多瑙河的专家。

如果一定要回顾毛的态度，首先，是他对匈牙利事变的基本态度——就是要杀人！他说，东欧人之所以吃到他们自己的苦果，就是因为他们杀人规模太小，而我们要杀很多人（张戎

「The Unknown Story Mao」）。

“back 1954 mao had dispensed his ideas on statecraft to the man who was to be hungary's prime minister when the uprising started, andras hegedus told us that mao had uerge him to keep a total grip on the army and all but told him that the hungarian regime should make its power unchallengeable through killing.”（1）

毛认为应该帮助匈牙利人来镇压起义；如果因此事件，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他，可以出任世界共产主义之领袖……

——这就是毛对于匈牙利事件的基本思考。一个是镇压，一个是出头——由他取代赫鲁晓夫和苏联人担任世界共运领袖。

张戎说，当毛听说南斯拉夫独裁者，逮捕了铁托的亲密战友和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者德热拉斯的时候，他喜形于色（“he showed such delight），而彭德怀，

则说他是忘乎所以（” that, his face lit up “）。

他对匈牙利人说，因为你们没有杀掉那些后患无穷之阶级敌人，导致今天的局面失控。

期间，毛对于杀人是不是不假思索，也不全是。在波兹南事变的时候，乃至苏联出兵贝尔格莱德的时候，他一是让其小兄弟到波兰教训苏联人，反对出兵，一让苏联人做出“自我批评”（刘少奇语/ 社会主义动词）。但是，在权衡了社会主义大计以后，他的真面目开始暴露。以至于世间对于中国主张干预南斯拉夫的说法比比皆是。

克利索德说了，在他们警告在波兰应该谨慎从事以后，“北京劝说他们以坚定的立场对付匈牙利人。

中国人自从结束了他们的“百花齐放”阶段，并要求莫斯科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以来，南斯拉夫人对对中国同志越来越表现出批判的态度。

“（同上书）

然而，做为一代枭雄的毛也是知道的，只是一管枪杆子是瘸腿的办法，还要有笔杆子，或者说要阴阳兼顾。所以，中国人此一时彼一时也！因为劝阻干预波兰也好，赞成镇压匈牙利也好，这些矛盾之外，有何一线贯穿之原则呢？

有没有一个潜规则呢？

有的。

我们来看看事务的深层真相。

其实说来，中国党就是毛的代名词。他的态度，语言甚至词汇，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脑，唯一之脑。这个脑筋在旋转的时候，不是呈现什么神秘的严肃性和战略格局——就像塔列朗和梅特涅们所设想和框架的那样，因为那些设想和现

实，毕竟是一种实际的操作和明白的罪恶——而是进入一个绝对荒诞的构思框架，毛的世界革命和世界杀人框架——而这个框架的建立，靠中国人的血和肉体，靠他们的奴隶劳动。

毛 1949 年以后的所谓战略格局，是“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之手法的继续。他要人民，人肉赴之战争一百年。此其一。

其二，他把中国人的血汗，完全充当他个人野心的赌资，一开口就是几十亿美元的援助（对埃及纳赛尔代表，说还可以派出几十万人的志愿军到埃及。前此我们说过，英法美等国，之所以抛弃了匈牙利人，是其忙于运河的争夺；）上百成千的战舰潜艇的制造和数十亿美元的原子弹建设——从苏联购进其技术，等等。于是，在张书里，人们讨论了毛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应该有饭吃，有好日子，富裕日子过的问题，且把这个问题和前此波南斯大林分子把国家搞成民不聊生，以至于导致人民起义，联系之，并企图改换一种富民政策之实行。但是，毛对于这个办法嗤之以鼻。他说过，富裕不是好事情。宁肯要草，不要苗一类尽人皆知的看法。而张的英文之说法是——

“people say that poverty is bad, but in the fact poverty is good. the poorer people are, the most revolution they are. it is dreadful to imagine a time when every one will be rich.....from a surplus of calories people will have two head and four leg .....”（2；……“富人热量过度，就会长出两个脑袋四条腿”。笔者）

其三，他说，地球上死掉三分之一人甚至一半，也不稀奇，社会主义就此建立。

这是张戎先生新近著作中披露，或者别的一些作者也已经披露过的，骇人听

闻的毛之世界战略内容。

而张女士书给我们最大启发的所在，一方面是其不厌其详的采访和阅读，带来的详尽之历史档案资料，另一方面，是她总结把握的观点。这个观点新颖独特，极为准确，对笔者启发甚巨！

此观点涉及了毛，做为一个机会主义者和翻云覆雨者的魔鬼伎俩。

做为一个机会主义者，毛首先表现在他思考了苏共二十大的反斯报告。张说，毛整天躺在他的那张床上，左思右想，殚精竭虑。他想了些什么呢？

关于 1956, 57 年，毛的真实想法是，他要接替斯大林成为共运领袖。但是，时机还不成熟——比如说，他要挟苏联卖给核武器。但是这个目的达到以后，他就开始耍弄赫秃子了。

为达到目的，是他提出的，以此为交换条件——苏联人签署提供核子援助的条约，而他，才可以参加 1957 年十月纪念。并且订出“卖身契”之日期，在该年十月十五号以前签署之。而赫秃子出于他的政治危机感，他受到内部人员攻击而地位不牢，所以就草草答应了毛。毛，于是成行。他还带去他专用的入厕设备。

这个卖身契，就是一笔由中国人埋单，价值四十亿美元（“U.S \$ 4.1 billion (in 1957 prices)”）的原子建设项目——合算现在的价值更是天文数字！要

知道，中国人当时的人均收入之低（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57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35 元，就是七八十美元），和来年开始的大饥荒，就是祸始于这个四十亿美元!!!

由此可以知道，以后中国人的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对铁托主义的虚妄！

在和赫氏的武器交易中，毛如愿以偿，只是他的花销过巨，直到他死掉，才

中止其武器竞赛的残酷游戏——而在此期间和苏修的论战，不过是他做秀和做大



之野心的拙劣表演。这个表演，让中国人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如何看待毛论，赫论和铁论之间之间性存在的问题。现在，张戎女士说得异常明白，这个理论，被实际的记载，一拳击得粉碎！

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古巴危机之解决，好像双双提升了他们的地位。基辛格谴责美国政府，在匈牙利事件上不闻不问。不久，就开始了赫，肯著名的戴维营和解。但是，时隔二几十年，对于他和尼克松到北京的和解，却做出大转调。

在此一端，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加上毛的看似原教旨主义，实则拆烂污主义之间，历史被夹杂当中，摒除了所有的貌似公允的理论试探和实践试探。

在彼一端，1956年，北京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之文章，煞有介事地主张一种是非，一种理论，一种政策。

毛们在「三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中，是怎样指南斯拉夫的呢？——说南斯拉夫实行了所谓的私有制。

“在铁托集团公开叛变以后，他们所采取的政策，不是改造和消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而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

——三农问题。“铁托集团在解散大批农民劳动合作社的同时，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种政策之下，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滥，农村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这是铁托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方面。农村的两极分化，首先表现在土地占有情况的变化。南斯拉夫前农林秘书科马尔承认：一九五九年，在农村中，占地五公顷以下的贫苦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拥有的

耕地，只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富裕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他们拥有的耕地，却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科马尔还承认，每年进行土地买卖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左右。出卖土地的农户，多数是贫苦农户。”

有意思的是，铁托的农民是被迫出卖土地的。而我们今天的农民出卖土地又是如何一种“被迫”呢！

——官僚资本主义化。“铁托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数据，不是归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私人资本家所有，而实际上是归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包括官僚、经理在内的南斯拉夫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有。”

看看我们自己的“改制”和“私有化”吧！

我们本文提及的匈牙利事变，“九评”说——“匈牙利反革命暴乱。铁托集团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扮演了干涉者和挑拨者的可耻角色。在反革命暴乱发生以后，铁托发表一封信，支持叛徒纳吉的各项反革命措施。十一月三日，铁托集团通知纳吉到南斯拉夫驻匈牙利使馆避难。十一月十一日，铁托发表讲话，说反革命叛乱是”进步分子“的反抗，狂妄地提出是”南斯拉夫路线“得胜，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得胜的问题。”

——“铁托集团否认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赫鲁晓夫说，苏共已经”成了全体人民的党“。”

这是几个代表呢？

托尔斯泰被人们说成是俄罗斯的一面镜子；南斯拉夫呢，现在，好像成为中国人的一面镜子了。

上述的话语，现在看来是多末熟悉甚至亲切！他们的引进外资，他们的私有制，他们的贫富差别，他们三农问题，……不一而足。

但是，在这些不知所云或者已知所云的幻觉和野蛮后面，毛和铁托的关系，则呈现另一番天地也！

张戎说，“when chou-en lai saw that it was unlikely he could line up the poles propos mao as the head of communist camp , mao turn at once to the other most anti-moscow commnuist country yugoslavia.a envoy already there in january 1957was instantly instructed to request an ultra-private meeting with tito , at which he askd the yugoslav president to co-sponsor a world communist summit with pieking , using the argument that the soviet party in such disrepute that no one would listen to it.at very moment mao was trashing tito to his inner circle as an enemy-just as he trashing gomulka.mao's cultivation of two communist was completely opportunistic , based solely on the fact they were the most anti-soviet.after listening to mao's pitch, tito not only declined to co-sponsor such a confernce , but would not even commit to attend.”（3 ）

而周恩来告诉彭真，在他访问南期间——1957年1月——要单独会见铁托，“向他转达我党的建议，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以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问题。”但是铁托以为“他个人的意见是进行多变以致双边的会谈为好，不赞成召开世界各国党的会议。”（阎明复）

毛，周的这个猴儿急的举措看来极为愚蠢。铁托只是敷衍之，而不愿意和毛为伍。他可能不久就看到了中国人骂他是帝国主义走狗的文章——见到那个很诡

谕的「九评」里面，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文章。

关于于此，在苏联出现反斯报告以后，毛的态度转来转去，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他辗转反侧，不知所终呢？

他放弃了苏联式的经济政治统治方式吗？

如果他晚死几年，会发生学习铁托的事情吗——因为和美国的接触，就是和铁托主义言归于好。

于是乎，会在毛时代出现政左，经右的实用主义和中国特色吗？

这些由匈牙利人呼喊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其气数如何，还是喷薄欲出抑或方兴未艾吗？

刘自立：匈牙利事件五十周年祭（3）\_ 共识网

归结到一点，南斯拉夫主义救党于一时，现在，他可以永远不采纳普世价值，而一味兴隆其权利经济和政治独裁吗？

共产党内，也有人剖析过毛的所谓心路历程。阎明复在一本杂志上撰文说道，毛在 1956 年九月的一天，接见了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塞维林诺夫。毛的谈话说明，在反对斯大林方面，他，也是一个先行者。他说，他是“半个铁托”。他的意思是，铁托反对斯大林，有某种合理性，独立性，值得肯定。

他反对斯大林（并回顾历史），是因为一，斯大林指示王明，在反围剿中归于失败。

二是，斯大林要王明实行服从蒋介石领导抗日。

三是，雅尔塔会议支持蒋介石。

延安整风也是批判斯大林。

四，就是以为毛是半个铁托。毛说，我们批评斯大林，但是“还不能够登报，

不能够让帝国主义知道。”

然后他说他不喜欢斯大林，和他争吵，“和他吵得很厉害”。

但是，众所周知，毛有一个名言，斯大林这把“刀子”不能丢。

他对那个南斯拉夫官员说，“苏联一般而言，总是好的。他们有四个口号好

：马列主义，十月革命，主力军，工业化。他们也有阴暗面，有些错误。赫鲁晓

夫批评斯大林，你们从上到下都欢迎，而我们不同，我们的人民不满意。”

阎文承认，波匈出现事变后，“在中共中央的建议下，苏共出兵用武力解决

了匈牙利事件。”（「炎黄春秋」2005.6）阎文只是一笔带过这个超级严重的事

件，流血和杀人——中共学人和官员的文字，对于人命大事，总是“浓妆淡抹总相宜”的。

这之后，一论，二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相继出笼——“九评”，

相继出笼——赫鲁晓夫下台，产生了偶合和误解，以为是毛把他给骂下去的。事

情其实仅仅是一个偶合。赫鲁晓夫的国内政策，并无让他具备抵御勃列日涅夫和

苏斯洛夫的更多政治资本。也就是说，没有后来的戈尔巴乔夫运用的，那些也许是普世价值的资本。

于是，毛从一开始，基于反斯大林发生的对于南斯拉夫人的同情，在“九评”

时代来了个大颠倒。关于阎说过的，毛指责个人迷信的话语，在1966年后，由于

林彪，妖孽作祟，煽风点火，使得全中国变成毛式疯人院，而被彻底抛弃。

他完全把铁托推到对立面，变成另一个超级斯大林。

魔法是时时变化的。

是的，毛，南关系和苏南关系的拉锯战，持续到1975年，毛改变了对于铁

看法——因为，毛已经可以公开指责苏联人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并在1969年和苏

联公发生武装边界战争——毛已经称呼铁托是“铁”了。

而邓，则大量从南斯拉夫这面镜子中，汲取他的“美学”了……

时隔不多年，华国锋就在北京会见了这个“走狗”。人们开始互相吹捧，说

是一切都过去了。而那时毛刚刚死掉，铁托说，毛的去世是世界人民的巨大损失。

与此同时，他强调走南特色的自主道路——这个提法也许就是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滥觞。（见「铁托文集」人民出版社）

而所有这些变迁的惨重代价，是由中国人承担的，几千万人，在这个怪圈的束缚中死于非命，做了这个革命大祭祀的牺牲品！

注：

（1）（此处英文文字为意译，下同。）1954年，毛告诉一位匈官员，要全面掌控军队并以杀人来确保匈体制不受挑战。

（2）贫困不是坏事是好事。穷人的革命性强……

（3）1957年，毛认为应该举行一次和铁托的单独谈判以谋求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共党高峰会议，以讨论苏共声名狼藉和指挥失灵。毛对铁正在划敌为友，就像他对待哥穆尔卡。依靠这两人，是因为他们都是反苏派。但是，铁则拒绝了毛的“猫腻”。

人。历史。梦幻

赵启强

本文系作者大著《光荣的荆棘路——改革家们》序篇。

该书目录：序篇：《历史。人。梦幻》（1.5 万字）

第一篇：《掀开铁幕——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2.5 万字）

第二篇：《走向绞刑架改革家——纳吉与匈牙利事件》；（3.5 万字）

第三篇：《毁于领袖权力的波兰改革——哥穆尔卡的悲剧》；（2 万字）

第四篇：《被勃列日涅夫扼杀的春天——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7 万字）

第五篇：《华沙，社会主义新曙光——瓦文萨和他的团结工会》；（14 万字）

作者：假如 1917 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如马克思预料的那样，是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取得胜利，你会接受这个事实吗？

历史：至少我会少索讨一些代价。

作者：俄国人怎么得罪了您？

历史：他们竟然无视我的存在，而急于主宰世界。

作者：他们对您并无恶意，只是他们太苦了，不能再等下去。

历史：我专门惩罚性急的人。

作者：可您让半个世界的人付出了代价。

历史：为了让人们记住，惩罚不能不是无情的。

作者：我们愿意尊重您的权威。可是……恕我冒昧，难道我们不可以向您身上的惰性挑战？

历史：……（沉默）

—

疲惫而困惑的历史向列宁屈服了，它顺从地给了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917 年 11 月 8 日，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获得胜利的第二天晚上。列宁走上讲台，面对着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列宁耐心地等待着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停息下来。他用细小的、闪闪发光的眼睛扫射着人群，注视

着历史。

此刻，人是激昂的；历史却萎靡不振——它被二月革命以来短短数月的巨变搞得疲惫而困惑。

列宁感到了人的力量——历史是可以被超越和战胜的。

他等待着，他终于可以向历史宣布了！他的第一句话是：

“现在，我们就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制度。”

列宁没能继续讲下去，他又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了。但已经够了。这一句话已经震撼了世界——近乎于狂热的欢呼和近乎于狂热的诅咒在世界各个角落发出。人类还从来没有如此地震撼过世界、震撼过历史。

列宁使世界和历史黯然无色。这是人对历史的一次空前胜利。历史屈服了，它顺从地给了人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奴隶们解放了，庆贺自己在一夜之间成了历史的主人。

或许我们会责备这种庆贺过于匆忙了，但如果想想他们在压迫和绝望中已经生活了几千年，他们当然有权为初次的胜利而欢笑、庆贺。然而，我们却不能不为他们的疏忽遗憾。

他们从历史手中接过来的只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和社会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在国家长期站立着的地方，社会便难以挺立起来。

被驯服了的历史在这儿耍了一个小小的手腕，潜藏着一个东山再起的杀机。

历史会妥协，会让步，却绝不投降。

几位杰出的人，在这次人与历史空前激烈的交锋之前，就对历史的让步有过不祥的预言，警告人们在与历史的角斗中，不要过于轻信轻易取得的胜利。

恩格斯在 1850 年这样预言：“一个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



还未成熟，为了这个阶级统治必须贯彻一些措施的时机还未成熟，而这个领袖在这种时期被迫出来掌握政权，这是最糟不过的事了……他所能做的事是和他一向的整个主张，他的原则，他的党的直接利益不相容的；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实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七卷 468-469 页）

革命领袖的警告并未遏制住历史的报复。

## 二

列宁利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进行战斗，以制止半个世界的悲剧发生。

1922 年 12 月 23 日夜晩，在与历史的搏斗中耗尽了精力的列宁第三次严重中风，他的右手和右腿都瘫痪了。列宁随时都可能离开人间，但他不愿离去，他的战斗尚未结束。

列宁要求允许他以口授的方式进行工作，要求每天给他 5 分钟。他的要求被拒绝了。

列宁提出最后通牒：如果不允许他每天口授 5 分钟，他将完全拒绝同医生合作！

于是政治局召开了一次包括医生在内的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列宁的要求。

到底什么迫切的事情驱使着列宁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要求这可怜的 5 分钟？

列宁看到了历史隐藏着的杀机——苏维埃政权中暴虐的官僚制，以及将会利用官僚制实行专横统治的斯大林。

列宁要利用他所剩下的以分钟计算的生命，来完成他的最后斗争：改造官僚制；撤换斯大林！

列宁在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出那句想震撼世界的诺言已经 5 年了，可

社会主义理想并未成为苏维埃社会的现实；相反，官僚制却深深地侵入，并牢牢

地成为苏维埃社会的一部分，以至列宁在最后时刻谈到国家机关的官僚化问题时，认为“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

由于这种状况，列宁在临近安息的时刻而不能安息。

从1922年12月到1923年2月，列宁以口授的形式完成了《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五篇批评官僚制的文章。只有与数亿人命运相关的大事，才能使一个人产生如此巨大的意志力。

1923年1月4日，列宁着手处理他生前的另一件大事——在“遗嘱”中建议撤换斯大林。

列宁在遗嘱中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同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

这确实是一件大事，它的严重性在列宁逝世后的几十年中表露得更加清楚——它改变了半个世界的命运。这些，列宁早就看到了，然而他却没能利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制止住半个世界的悲剧。

1923年3月10日，列宁最后一次中风，完全丧失了讲话能力，完全停止了他的战斗。此时，他年仅52岁，距1924年2月21日逝世，还有整整十个月。

列宁退出了与历史的角斗，把位置让给了他的继承者。

1924年5月21日，苏共在十三大代表会议前夕召开了中央全会特别会议宣读列宁遗嘱，并确立党的领导。

这次全会将决定斯大林的命运、俄国的命运、半个世界的命运；还有——历

史的命运。

列宁的继承人里面，托洛茨基是最有威信、最强有力的人物。为了对抗托洛茨基的力量，斯大林与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加米涅夫和兼任共产国际领袖的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结成了同盟。

加米涅夫宣布开会，并宣读了列宁遗嘱。会场一片沉寂。

斯大林绷着脸，面色阴暗。接着，季诺维也夫发言，他庆幸列宁所担心的事没有发生——党的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都没有分裂。因此，他建议，仍然由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

斯大林一直皱着眉头，绷着脸，两眼直视着窗外，等待者决定他命运的时刻。托洛茨基派的人反对这项提案。然而他们不是多数；更主要的是，作为这一派的首领托洛茨基本人，却以顽强的沉默表示出对这场喜剧的蔑视。他那有名的自信、自尊使他不屑于采用相同的手段去争夺权力。这等于放弃了战斗。斯大林获胜了，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然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胜利，换来的却是 1926 年斯大林对他们的死刑判决！

1926 年，当斯大林解除他们的权力时，季诺维也夫曾经痛苦地回忆起这次拯救了斯大林免于毁灭的中央全会，共质问斯大林：“你知道什么叫感恩吗？”

斯大林回答：“我当然知道。那是一种狗的病症。”

到此时，历史与人的较量可以暂时休战了。历史和人都可以按照各自的轨迹和惯性，行进着……

### 三

赫鲁晓夫的报告震撼了人。1917 年是对历史的胜利，1956 年是历史对人的报复。顷刻之间人就失去了用整整两代人的生命去奋斗的目标……

1956年2月24日，在列宁对历史宣战39年之后，也是在苏联，也是在夜晚，我们看到了人与历史的又一次搏斗。

这一天，刚刚从苏共“二十大”选出的135名中央委员，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一中全会，代表们则准备收拾行李回家，因为“二十大”的闭幕式已经在当天举行过了。

可是临近午夜，所有的中央委员和代表又突然被召集到克里姆林宫。

作为党的代表大会，它的所有程序都是事先规划好的——它的大会报告、它的候选人，甚至它的选举结果——那么现在，这个严密的“计划政治”到底出了什么故障？

代表们紧张地期待着，预感到将有非同寻常的事件发生。

他们等来了一个身围肥宽的人，此人跨着无节奏的步子走上讲台。他两腿粗短，双肩壮实，显得矮胖笨拙。但他有一双和列宁一样细小而敏锐的眼睛，这是一个有着巨大生命力的人。

此人正是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

然而，他的战斗方式却与列宁毫不相同——列宁面对着世界、面对着历史，用他那慷慨而宏亮的声音，发出了对历史的挑战；而现在，在这深夜的密会上，这位厚嘴唇、狮子鼻、高颧骨的人，却是诡秘而胆怯的。他悄悄地告诫与会者，他现要作的报告，“不能拿到党外去宣传，更不能到报刊上去发表，应当知道分寸，不应当向敌人提供弹药，不要向敌人宣扬我们的家丑。”

赫鲁晓夫开始了长达7小时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的题目是《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内容是谴责被他称为“历史上最凶暴残忍的罪犯”斯大林。

默默听着的苏共代表们惊呆了，因为十天以前，也就是2月14日“二十大”

开幕式上，全体代表和来宾还肃立默哀，悼念他们的“父亲和导师”斯大林。

赫鲁晓夫有一双非常小的手。然而这位喜欢挥舞着小手的政治家却有着异乎

寻常的力量，他居然掀动了历史的铁幕，让代表们看到了幕后的世界。

那真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世界——那个人类第一次从历史手中争取来的社会主

义国家、那个作为共产主义世界当然领袖的国家，原是一个靠个人独裁和政治恐

怖进行统治的国家！

那是一个世界上中央集权程度最高的国家，这个两亿人的国家只有一个脑子

——斯大林的脑子！

在那里，保安力量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秘密警察成为独裁者斯大林的

主要支柱和权力工具，他利用这个权力工具犯下了使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都相形

见绌的罪行！

赫鲁晓夫在公布一系列血腥的数字：“苏共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 139 名中

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 98 人，即 70% 在 1937—1938 年被逮捕和处决了。”那

次党代会的 1996 名代表，有 1108 名，因“反革命活动”而遭逮捕枪决。

这次大清洗也没有放过军队。5 个元帅被处决 3 个；全部军区司令员被清洗

；海军和空军首脑被枪决；所有的舰队司令员只有一人得以生还……到 1938 年，

红军师以上的干部只剩下 39% 保留住原职。

被镇压的还包括列宁时代的几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

夫、托洛茨基、李可夫。政治局中得以幸免的，只有斯大林的亲信米。加里宁和

维。莫洛托夫。然而斯大林却下令逮捕了他们的夫人。

在列宁建立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 15 名人民委员中，竟有 9 人死于斯大林

的大屠杀，而幸免的 6 人中，除列宁和斯大林自己，其余 4 人都是在大清洗之前去

世的；因此，可以说，斯大林枪毙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全部人民委员。

那么，清洗只局限于上层，只涉及到斯大林的政敌吗？不，政治恐怖从来是针对全体被统治者的。

在 30 年代，斯大林为了强行推行他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竟使 150 万农民被枪毙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斯大林为了使农民屈服，接连两个春季不给富农和未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发放种子。农民无法播种，被迫流入城市，沿路乞讨，饿死街头。农民屈服了，加入了集体农庄。

这是一个领袖对自己的人民所发动的战争，人们第一次因为自己的出身而遭到杀戮，被杀户全家被迫迁出，其子女不许在高年级学习。

被斯大林直接戕害的共产党人有 70 万——且不说被枪杀、流放的成百万其他的人——这个数字比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问世以来，各国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人加起来还要多。

与会者惊呆了，世界惊呆了，只有历史在暗中窃笑。

如果说列宁在 1917 年的宣言震撼了历史的话，赫鲁晓夫这一次的报告却震撼了人；1917 年是人对历史的胜利，1956 年是历史对人的报复。顷刻之间，人们就失去了理想、希望和用整整两代人的生命去奋斗的目标，只剩下人的疲惫和困惑——就像 1917 年历史曾经疲惫和困惑过一样。

这一次历史是清醒的，它迫不及待地宣告自己的胜利——赫鲁晓夫作完报告的当天（已经是 25 日凌晨了）国外就报道了苏共秘密会议举行的消息；几个星期后，美国国务院放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全文的英文文本。

共产主义面临着它有生以来最深刻的危机——全世界所有的敌对阶级和敌对国家都猛烈地攻击共产暴政。

共产党人在这意想不到的打击下沉默了——因为打击来自内部，来自事实。

#### 四

西欧的共产党垂下了头，共产党的东欧面临着灾难性的风暴。1956年是共产党人的灾年；同时，1956年又是人对历史的又一次挑战——艰难而漫长的社会主义改革就要开始了……

当西欧各共产党在秘密会议上传达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共产党人被其中许多惊人的情节而惊呆了。

一位西德的年轻共产党员曾经描写过当时的情景：

我们在莱比锡市议会的地下室感受到最初的震惊。我们十几个人蹲在一起，为刚才听到的本情而目瞪口呆。一切话都是压着嗓子窃窃私语的，似乎有点难以置信不可捉摸，如果大声重复这些话，那就难以使人忍受——多么矛盾啊！

有人在宣读秘密报告中那些绝望的共产党人从监狱里寄出来的信，是斯大林把他们投入监狱的。人民在极权统治下生活了20年多年！这一切果真是真的吗？不可能这样！斯大林是我们力量的体现者，是力量的象征，是朋友、卫士、远方的父亲、是革命的化身，他无所不知，慈祥而正直；而现在的斯大林，难道是一个暴力狂、迫害狂、偏执狂？难道他嗜好虚荣、个性恶毒，是一个卑鄙的独裁者？不可能！我们站起来去街头漫步。我们仿佛在梦幻中，神容憔悴……

西欧共产党人曾经把斯大林当成革命的象征。现在，一切都动摇了、失去了，他们恍恍惚惚、若有所失。他们低着头，躲避着资产阶级政客们咄咄逼人的攻击。东欧共产党人的处境更加尴尬。

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贝鲁特曾被邀请参加了2月24日晚上的会议。赫鲁晓夫作完秘密报告后，要贝鲁特表态。

贝鲁特不知所措，无可奈何地说：“我们怀着悲伤的心情得知斯大林做坏事的  
消息。波兰人民那么感谢斯大林，感谢他的智慧和援助。”

这种在赫鲁晓夫突然袭击下的惊惶失措、无可奈何，是整个共产党国家的普遍情绪。

东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竭力挡住这股冲击波，他们不公开刊登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他们只是改换了几个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街道，撤换了几个特别受牵连干部。

东欧沉默而紧张，因为在那个地区，斯大林式的政权还继续着它的统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与斯大林、斯大林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这种沉默形成对比的是人民的骚乱。人民从西方广播中听到了全部事实真相后，他们愤怒了——西欧共产党人失去的仅仅是理想，东欧人民失去的却是现实、是几代人的代价——

神话被破灭了，他们向我们大嚷大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咬破手指是不疼的。

人们咬破了手指，人们感到疼痛。

人们失去了信仰……

它是靠空话过活，纵然有说教，生活却越来越野蛮。

这首充分表现了人民觉醒的诗，是波兰诗人瓦齐克写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瓦齐克曾经是斯大林主义桂冠诗人。当然，最早的觉醒者，付出的代价总是最大，瓦齐克因为这首诗而被波兰作家协会开除了。

人民愤怒了：他们把斯大林的巨型塑像推倒。斯大林的塑像被人们吐上唾沫，被砸成碎块。人们开始公开讨论斯大林的专制独裁，讨论斯大林主义的全部标志



——党内生活泛化；国家政权日益成为奴役社会的力量，政府机构变成恐怖主义的独裁机关。

西欧的共产党低下了头，共产党的东欧却面临着灾难性的风暴。1956年是共产世界的灾年。

1956年，即使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也很少有人敢于为斯大林的极权统治辩护。人们为赫鲁晓夫披露出来的个人迷信、专制、政治恐怖所痛苦、愤怒，并且不自觉地把这一切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

在资产阶级看来，赫鲁晓夫是给了社会主义当头一棒的英雄；在执政的共产党人看来，赫鲁晓夫是制造混乱和灾难的祸首；对经历了极权统治的人民来说，赫鲁晓夫无疑是争取法制、民主的先锋战士；对历史来说，赫鲁晓夫是它的胜利宣告人……

然而，他们都没有从赫鲁晓夫的行为中看到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另一面——

资产阶级没有看到，这次揭露给重建社会主义所带来的一线希望；

执政的共产党人没有看到，如果没有这种检讨和揭露，在共产世界潜伏的危

机将会加深而造成更加难以控制的局面；

经历了极权统治的人民没有看到，比揭露和打倒斯大林及其在半个世界的追

随者更加艰难的，是对体制的批判和改革；

最后，因为取得了胜利而洋洋自得的历史没有想到，赫鲁晓夫的这一举动将

在半个世界的范围内发起对历史的又一次挑战——艰难而漫长的改革就要开始了

……

当然，这些都是若干年以后才有的认识；1956年，有的只是盲目的欢呼和盲

目的消沉。人没有明白，历史也没有明白；那时，很少有人思考过这一问题：产

生这一悲剧的原因是什么？这些罪行到底是社会主义犯下的，还是一个蜕变了  
政权非社会主义化的结果？

人们没有冷静思考，却匆匆接受了这样的答案——斯大体和苏联的官僚制是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合法继承者；斯大体现象是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注定的  
结果。

这是资产阶级的答案，他们企图使革命和社会主义威风扫地。

这个答案使许多人对社会主义产生绝望。

在 1956 年，尽管在共产党内，少数最优秀的人士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已经  
被斯大林的政治恐怖和官僚制所埋葬，必须以最彻底的改革精神重建社会主义，  
但他们面对的是对社会主义抱有怀疑和绝望情绪的人民，以及对斯大林现象仅仅  
进行个人谴责的上层保守势力……

改革家的困难可想而知。

然而，既然铁幕已经掀开，人们便不可能面对那种触目惊心的罪恶而无动于  
衷——这就是人之所以是人，人之所以能进步的原动力。

人在与历史惯性的对抗中，尽管并不是每次都以胜利告终，但却从未放弃过  
斗争。

在这场战斗中，冲在最前面的，成功的希望最小，因为他们必须孤军奋战，

必须带着历史对他的束缚去攻打历史……

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失败才有更深的意义和更大的价值；

正因为如此，我们同样把改革家的称号送给那些失败了的改革家……

掀开铁幕——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赵启强

本文系作者大著《光荣的荆棘路——改革家们》第一篇

作者：假如您在 1956 年没有采取那次极端的、今人措手不及的方式对斯大林发起突然袭击，那么，社会主义理想是否能免于一次致命的伤害？

赫鲁晓夫：社会主义被斯大林所埋葬已是事实，我只不过宣布了这个事实。

作者：可您的宣告却是那么彻底地破坏了共产世界的秩序，给半个世界造成了至今还未消除的信仰危机。

赫鲁晓夫：必须动摇对斯大林的迷信，必须动摇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信仰，这正是我后半生所致力事业。为此，我才敢于正视和承认那种对我们每个共产党人来说都是痛苦的，难以承认的罪行。

作者：您是一位有魄力的政治家，自从您用自己的皮鞋敲打过联合国的讲台之后，就没有人怀疑过这一点。我只是想问，面对着历史的挑战，面对着整个制度的反抗，您有没有感到过个人的魄力是那样的软弱无力？

赫鲁晓夫：可我将做下去——我枪毙了警察统治的象征贝利亚，我揭露了斯大林对人民和社会主义所犯下的罪行，我将斯大林的水晶棺搬出了列宁墓……

作者：是的，你把苏维埃社会从政治恐怖下解放出来，历史将记住您的壮举。然而，您用水泥浆覆盖了斯大林的水晶棺，却未能覆灭斯大林的官僚制；您结束了个人迷信和政治恐怖在俄国的统治，却未能结束斯大林时代。因此，西方把您掌权的时期称为“没有恐怖和过激行为的斯大林主义时代”。

赫鲁晓夫：我做过了——以一个政治家的责任和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良心去做了。这就够了，我不在乎人们怎么看，何况是西方的看法。

作者：东方也说过，说您是一个失败的改革家，说您只会破坏而不会建立一种新的民主社会主义来取代您谴责过的制度。这是遗憾，历史只承认能建设的人。

赫鲁晓夫：我建立了重建社会主义的希望。

作者：……

—

赫鲁晓夫必须对斯大林的传统政治结构进行反叛才能获得权力；而只有获得了权力才能进行反叛。

把赫鲁晓夫列入改革家的行列，肯定会有争议，何况把他放在第一位。这会激怒舆论的。人们会提出最早的铁托和最近的邓小平，然而，我们并不按成就大小和时间顺序排列，无论如何，在林鲁晓夫成功与不成功、有意或无意的改革实践中，毕竟有许多我们不应忘记的东西。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没有一位世界领袖人物的成败能象赫鲁晓夫的成败如此急剧地和决定性地改变历史的进程。”

1953 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面临的问题还不是如何整顿和改革斯大林所遗留下来的庞大帝国，他首先需要的是权力。他必须对斯大林的传统政治结构进行反叛才能获得权力；而只有获得了权力他才能进行反叛。

赫鲁晓夫无法以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继承人的身份取得权力，因为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在以上两种资格上都是超过他的。

在上述几位元老中，贝利亚危险最大——他长期担任内政部和安全部负责人，控制着情报机关和秘密警察；他的情报人员渗透并控制着相当一部分军队……他是斯大林进行极权统治的头号工具；西方甚至把贝利亚称为“斯大林的另一个我”。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去世，贝利亚是扶灵人之一。

对贝利亚的处决很富有戏剧性。它表明在那个时代，凌驾于法律和党章之上的最高领导人，在秘密警察的权力面前，是显得多么的软弱和无可奈何。

在涉及到对一位部长会议副主席的撤职和枪决这样的大事，法律和手段竟然完全无效。

赫鲁晓夫同他的临时盟友布尔加宁、朱可夫、马林科夫决定先发制人，向贝利亚发动突然袭击。

克里姆林宫内有一支庞大的、效忠于贝利亚的武装警卫，而莫斯科军区中又没有可以信赖的集团。于是他们从乌拉尔调来两个近卫师，并把扣压贝利亚的任务交给朱可夫元帅和空军司令莫斯卡连科。这个反贝利亚的政治联盟，居然有 11 个元帅和将军。

贝利亚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被逮捕的。

开会了，马林科夫突然宣布“我们现在讨论贝利亚的问题”。贝利亚当时坐在赫鲁晓夫右边，听到这话后吃了一惊，抓住赫鲁晓夫的手，以一种受惊的表情问道：“尼基塔，这是怎么回事呀？你们在嘀咕些什么呀？”

赫鲁晓夫说，“注意听吧，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接着，赫鲁晓夫首先发言，谴责贝利亚利用保安机构，企图为自己夺取政权，反对主席团的其他成员。

会议按事先的安排一个接一个发言，不让贝利亚有喘息的机会。可是到了需要形成决议时，问题出现了。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描写了这个场面：

最后一个发言后，会议出现了悬而未决的情况，会议有长时间的停顿。我看情况不妙，就向马林科夫要求发言，以便提一项建议。我建议中央主席团解除贝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及内政部长以及他担任的一切其他政府职务。马林科夫仍处于一种惊慌状态。据我回忆，他当时甚至没有将我的提议付诸表决，就按了一下秘密按钮。这就是对等候在隔壁房间里的将军们发出了信号。朱可夫第一个走进会场，然后是莫斯卡连科及其他人。

马林科夫以一种微弱的声音向朱可夫说：“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要求你们把贝利亚关进监牢，以待调查对他的控诉。”

朱可夫说：“举起手来！”并拔出手枪以防贝利亚反抗。贝利亚的确伸手去拿公文包，我抓住了他的手臂。

据说贝利亚是立即被处决的。而对他审判处决的消息则在半年后的 1953 年 12 月 27 日宣布的。公布的罪行主要是“将内政部置于党和政府之上”以及是“祖国的叛徒和帝国主义间谍特务”，根据特别法律，不准被告出席辩护，不准要求延期执行死刑，经缺席审判后，立即处死。

贝利亚的 6 个同党也被枪决。

赫鲁晓夫以处决贝利亚拉开了向斯大林帝国斗争的序幕。

赫鲁晓夫反对以暴力进行政治清洗，谴责斯大林违反社会主义法制、诛伐政治异己，他自己却以同样的手段开始了他的改革家生涯；或许，我们难以责备赫鲁晓夫，因为在法制已经荡然无存的情况下，他无法依靠社会主义法制来消除违反法制的罪行；而贝利亚这个人确实该杀。在当时的苏联，人们无论提到谁的名字，都不会象提到贝利亚的名字那样怀着刻骨仇恨和无比憎恶。

苏联人将他与希特勒的秘密警察头子、刽子手希姆莱相提并论，把他俩描写成阴险毒辣、残酷无耻的化身，并从他们的鹰钩鼻上的夹鼻眼镜，看到了这两个人在相貌上的相似。

斯大林的女儿继·阿利卢耶娃曾经说贝利亚是巧言令色的侍臣中一个杰出的现代标本（这个比方，实质上是把她父亲放到了帝王的位置上）。说在贝利亚身上“体现了东方到的背信弃义、谄媚逢迎和弄虚作假”。

当阿利卢耶娃被马林科夫召到斯大林身边，向父亲临终告别时，她看到房间里有许多人都蹑着脚走来走去，大气都不敢出，人人都被即将发生的事吓坏了，而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这时，她看到了贝利亚。

斯大林女儿写道：

只有一个人举止是很失态的，那就是贝利亚。他非常激动，他那张即使在最好时刻也使人厌恶的脸，此时被强烈的情欲——野心、残暴、狡猾、对权力无止境的贪婪——扭曲了。在这灾难时刻，他竭力保持应有的平衡——狡猾但又不是太狡猾。一切都明明白白地写在他脸上。他走向病榻，久久注视着垂死者的脸。我父亲时时睁开眼睛，到了这种时候，他还在急于使我父亲相信他是一切人中最忠心耿耿的，一如他曾不遗余力地扮成忠诚的样子。不幸的是，他过去很成功，而且他的成功为时太久了。

## 二

用克里姆林宫的脑子代替斯大林的脑子来对 2 亿人进行统治，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它的结果是数百万囚徒重返了家园，人民开始过另一种生活，开始呼吸得比较自由一些了。

除掉贝利亚后，赫鲁晓夫和他的临时盟友可以舒一口气了。他们暂时不用担心在他们中间会又出现一个新的斯大林。他们达成了集体领导的协议，希望用集体智慧代替个人迷信，用克里姆林宫的脑子代替斯大林的脑子来对 2 亿人的命运进行思考。

就象 15 世纪，历史上以荒淫残暴著称的教皇、亚力山大六世博尔贾死后，他的红衣主教们聚集一堂，直布他们为“集体教皇”。那种令人颤栗的、陪伴暴君的余悸使他们胆怯。

然而，他们害怕的只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会成为新的暴君，却并不拒绝权力；相反，经过了专制统治的人，都明白权力意味着什么，他们已经不相信除了个人的绝对权力外，还有什么其他手段可以用来达到目的——无论是谋取个人特权，还是为了改善对人民的统治。

这种对权力既恐怖又迷恋的心理，在当时的赫鲁晓夫身上肯定是存在的。我们难以肯定的只是他到底是要取得权力去进行改革呢，还是仅仅以非斯大林化为途径而获取至高无上的权力？

不过，至少在客观上，这两者是互为目的的：赫鲁晓夫登上了教皇之一的宝座；同时也为斯大林式的极权统治敲响了丧钟，为几十年来艰难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拉开了序幕。

赫鲁晓夫要向斯大林留下的帝国挑战了。他的第一个战役，便是我们开始提到的 1956 年 2 月 24 日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紧接着，大规模的平反开始了。释放了几乎全部政治犯，为 1935—1955 年死于集中营和监狱的绝大多数人恢复了名誉。

赫鲁晓夫亲自下达指示，成立了近百个特别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包括一名检察院代表、一名中央委员会代表和一个早一些获得释放和平反的党员。这些拥有充分权力的委员会，从莫斯科直达所有的集中营。他们仔细地审查各个案件并迅速予以解决：看申诉书，和犯人谈话，然后宣布释放。

到 1956 年 8 月，全苏有几百万人获得了自由。

大恐怖时期的受害者死后得到了平反，数百万囚犯重返了家园。这是赫鲁晓夫全面改革

的前奏，它对国内的影响，不亚于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

赫鲁晓夫是共产世界的一位有争议的伟大人物，对他的是非功过的评价十分困难，但没有人能否认他在控诉专制暴行和医治历史创伤方面的成绩。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却没有清除历史的罪恶。除了对斯大林的谴责和贝利亚的处决，赫鲁晓夫没有进一步追究政治责任，更没有从制度中去寻找造成这种政治恐怖的根源。他未能认识到斯大林的真正权力是通过秘密警察行使的。几十年来，警察恐怖已经在政治上粉碎了无产阶级、消灭了它的先进骨干；最后，秘密警察控制着党、政府、军队直至社会各领域，甚至连最高领导的政治生涯和家庭生活都摆脱不了秘密警察的控制。

在苏联，从 30 年代起，政府主要官员以及他们的所有家属的生活费都是由国家支付的，而且标准早已远远超出了列宁当年所规定的、苏维埃政权的官员的收入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工资的规定——他们的家庭开支、汽车、别墅和大量的服务人员都是无限制地由国家资金开销。

问题就出在大量的家庭服务员身上。

按斯大林亲自批准的制度，领导人家里的工作人员必须是国家公安部雇员。斯大林的女儿说这些工作人员给他们家造成一种“官式的、甚至是准军事的气氛”，使他的家庭生活“受到秘密警察命令的支配”。她说，这种情况在政府的主要成员、至少是政治局成员的家里都存在着。

这些家庭由政府官员来经管，而“这些人员夜以继日地严密监视着他们的主人”。这些属于警察部队的工作人员，在各个领导人周围形成一个特殊品种的“宫廷”，无形中成为凌驾于他们主人之上的主宰力量。

从 1919 年就跟在场大林身边的一个警卫员尼可拉·符拉西克，目不识丁，粗鲁不文，最后竟然成了一个在幕后操作大权的人——没有他的批准，苏联大剧院的盛大演出居然得不到允许；他甚至向文艺界的著名人士发出关于电影、歌剧、小说，甚至正在建筑中的一些建筑造型的“忠告”或指令。

赫鲁晓夫没有从制度上消除控制了社会的、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机构，但至少在除掉贝利亚之后，秘密警察对党和军队的控制削弱了，而在大规模的平反运动中看到了野蛮的政治恐怖后，赫鲁晓夫已经意识到使秘密警察不敢越轨是何等重要的大事；同样，在处决贝利亚和大规模平反之后，“人们才开始过另一种生活，才开始呼吸得比较自由一些了。”

对普通老百姓是如此，对政府委员也是如此。”

专制统治需要秘密警察，而警察力量最终将成为社会的统治力量，连统治者自身也难以逃脱秘密警察的控制。这是被所有专制国家的历史证明了的。

1957年6月，党章第一次战胜了长官意志，100多人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战胜了11人的主席团……

1956年，对个人迷信及大规模政治恐怖的清算，在苏联国内和东欧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匈牙利、波兰，甚至因为对斯大林及其在东欧的追随者的清算，而造成重大的社会动乱。

这些，都给赫鲁晓夫的政敌——苏联最上层的斯大林分子以攻击的借口。他们把东欧动乱的责任推到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政策的执行上，认为给了人民太多的民主才产生了来自下层的政治压力。

赫鲁晓夫的地位变得虚弱了。在“匈牙利事件”前后半年的时间里，赫鲁晓夫保持着沉默。在一些公开场合，他都一再宣称，表明自己是一个比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还要坚定的斯大林分子。

对于一位政治家，我们或许应该原谅他的这种战略性撤退。

到1957年，赫鲁晓夫打破了沉默，从防御转入进攻。

几个月前，赫鲁晓夫曾提出对经济管理实行权力下放计划。这是赫鲁晓夫最早的改革设计之一。这项改革措施为赫鲁晓夫在上层官僚中树立了新的反对者，因为对经济实行权力下放威胁到他们的利益。

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联盟利用了这些反对情绪，决定给赫鲁晓夫一个决定性打击。

这场斗争同样是戏剧性的。

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的几次关键时刻——1953年处决贝利亚，1956年“二十大”的秘密报告；这一次，1957年6月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的斗争都充满了戏剧性。

赫鲁晓夫身上很少循规蹈矩、因循守旧、不露声色、老谋深算的官僚特征，他更象一位个性鲜明，善于即兴发挥的艺术家。所以，在他政治生涯的几次生死攸关的时刻，留下的往往不是枯燥乏味的历史思考，而是趣味盎然的戏剧情节。

1957年6月17日中午，布尔加宁从克里姆林宫往赫鲁晓夫家里打电话，说要紧急召开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说应该与往常一样，预定主席团会议时间，他看不出为什么要在现在召开……

两人争执起来。

布尔加宁：“我们要求召开。”

赫鲁晓夫：“‘我们’是谁？”



布尔加宁：“在这里吃午饭的一些人。”

赫鲁晓夫：“根据党章和主席团惯例，不存在任何‘中央委员会进午餐集团’！”

然而，布尔加宁的要求仍很坚决，于是赫鲁晓夫来到了克里姆林宫。

在那里，赫鲁晓夫遇到了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和米高扬。

除了苏斯洛夫、萨布洛夫、基里钦科等三人不在莫斯科，这是整个主席团。

赫鲁晓夫仍然坚持刚才在电话里的态度。冲突立即就尖锐起来。

赫鲁晓夫坚持，这天不能开会，因为他要在今天接见一个匈牙利记者代表团，然后接见一名日本记者，这是事先已经安排好了的。

于是所有的人便质问赫鲁晓夫：为什么他一个人接见匈牙利人，要去大家也可以去。

赫鲁晓夫回答说：“可以，大家都去，如果主席团这么决定的话。只是整个主席团接见一个记者代表团是不正常的。”

赫鲁晓夫的意见没有起到作用。主席团果然作出决定：全都去，包括主席团候补委员在内。

可以想象得出匈牙利记者们被这种超规格的待遇弄得目瞪口呆、受宠若惊的样子。

6月18日，主席团会议召开了，由布尔加宁主持。会议谴责赫鲁晓夫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全国各地走动，插手对外政策；指责他发起在“牛奶、肉类和黄油的人均产量上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运动。说这是冒进，是为了在国内外出风头。

马林科夫一派现在占了绝对优势，他们提议莫洛托夫为党的第一书记、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而赫鲁晓夫应该辞职。赫鲁晓夫方面只有米高扬一人支持，处于2对6的劣势。

后来，最初缺席的苏斯洛夫等3人赶到，形成4比7，情况并未根本逆转。

赫鲁晓夫的策略是，竭力干扰主席团作出决议，以便争取时间，动员中央委员会。

赫鲁晓夫的策略成功了。会议继续进行，赫鲁晓夫的几个支持者——没有表决权却有发言权的主席团候补委员——朱可夫、勃列日涅夫、福尔采娃纷纷发言支持赫鲁晓夫。

后来当了赫鲁晓夫的文化部长的福尔采娃作了一篇长达6小时的发言，以拖延时间；同时，赫鲁晓夫动员了以科涅夫元帅为首的20名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前来要求出席主席团会议。

这批人在主席团会议室等着，而主席团里的斯大林主义多数派则攻击赫鲁晓夫，说这是施加压力，是分裂党。

当时，老资格的伏罗希洛夫激动起来，他咆哮说：“你们还可把坦克调来！”

赫鲁晓夫以布尔什维克早期的传统来回答：那时，每一位中央委员都有权出席政治局会议。他质问：“你们为什么害怕中央委员？”

朱可夫元帅的回答更干脆，他说：“坦克是听我朱可夫的命令调动的，可现在在门外的是中央委员，而不是坦克！”

朱可夫没有调动坦克，可他却调动了国防部的喷气式飞机将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空运到莫斯科。

朱可夫元帅又一次证明了他祖国的救星，证明了军队在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又来了 30 名中央委员。但马林科夫等人仍然反对让这些中央委员列席政治局会议。他们决定由布尔加宁出去向中央委员解释；赫鲁晓夫不同意，他要求与布尔加宁一起去。

布尔加宁没有让中央委员们满意。接着赫鲁晓夫讲了话，他讲的主要内容是：中央委员会唯一有资格做出重大决定的机构，是最高权力机关！

事情拖延下来，变得对赫鲁晓夫有利了。

在以后继续进行的 4 天会议中，主席团收到了 83 名中央委员发出的一项书面要求——他们要求的不再是主席团接见他们，而是要求主席团到他们那里去报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事到如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联盟只好同意召开中央全会，并准备为在全会上争得多数而斗争。

这次全会一直开到 6 月 29 日。会上有 60 人发言，150 人送条子要求发言，这是一次真正的中央全会。

这次全会的结果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被宣布为“反党集团”。

1957 年 6 月 29 日，斯大林时代在莫斯科无可挽回地结束了。党章第一次战胜了长官意志，130 人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战胜了 11 人的党中央主席团。

赫鲁晓夫越过主席团直接向 100 多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求援，强化了这一组织的参政意识和权威性。这毕竟是斯大林之后苏联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这种从下面谋求理解和支持的做法能扩大到全体党员和全社会，那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将具有决定性意义。

当然，在 1957 年，党的领导人从下面获取支持的行为也仅仅到中央委员会为止，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全党和人民这个因素是不存在的。

这是历史的限度。谁如果试图跨越这个界限，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将受到惩罚。这一点被朱可夫元帅的免职证明了。

尽管朱可夫是赫鲁晓夫的盟友，尽管他在 1953 年处决贝利亚和 1957 年 6 月除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因他具有超越上述界限的可能而被解职了。

这是离 6 月胜利仅仅 4 个月后的 1957 年 10 月，朱可夫被撤职了——撤职的理由是，在六月事件时期，他曾对一些人说，必要时，他朱可夫要号召军队和人民同“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算账！

他可以利用军队和人民反对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也同样可以利用军队和人民反对赫鲁晓夫，问题就出在这儿！

赫鲁晓夫兼任了部长会议主席，集党政大权于一身，成为斯大林逝世后，第一个握有对党和国家绝对权力的统治者。

很少有人指责赫鲁晓夫竟然成了他所反对过的独裁者，那时，无论在党的上层，还是在人民中都没有考虑过运用民主政治来进行统治、或进行改革。用好的暴力反对恶的暴力；用为人民的极权来反对为个人的极权；甚至用清洗镇压来反对清洗镇压。那时，人们尚把斯大林现象看成个人问题，还不能对他们所看到的罪恶进行历史和制度的批判。

托洛茨基在 1904 年曾经预见到的那种情况，“党的组织取代了党本身，中央委员会又取代了党组织；最后，独裁者取代了中央委员会……”在斯大林时代已成为事实，所以在 50 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斯大林的去世和他的继承人下台便意味着制度的改变。

在六月事件之后，失败了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集团的成员卡冈诺维奇曾从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室打电话给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哭泣着对赫鲁晓夫说，他希望赫鲁晓夫曾大力谴责过的清洗、镇压、蹲监狱、枪毙不致于重演。

赫鲁晓夫回答冈诺维奇，之所以把他们清洗出中央委员会，正是为了避免重演这样的历史。

撤换了人便可以避免过去的灾难。赫鲁晓夫也是这么认识的。

当然，手段毕竟是有变化的——斯大林把不同意官方政策的人从肉体上消灭，这种做法除了对贝利亚，再没有使用过；1957 年 6 月，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集团进行了整整 12 天的辩论，并且还把他們留在了党内。这毕竟是赫鲁晓夫对党的上层民主改革方面做出的一点贡献。

#### 四

赫鲁晓夫总算将人为了革命，还原为革命为了人——尽管革命为人提供的还仅仅是“土

豆烧牛肉”……

在 1956 年，人民对赫鲁晓夫充满了敬意，因为他掀开了历史的铁幕，声讨了隐藏于其中的罪恶，并以令人敬佩的魄力医治了历史留下的创伤。现在，1957 年，对他的敬意变成了希望——希望他能用已经获用的权力，给他们营造一个没有秘密警察、没有集中营、没有消费品极度匮乏的理想社会。

因为这些希望，人们不责备赫鲁晓夫又把集体领导还原为个人统治；相反，人民祝愿这位谴责过暴君专制的君主，能有更多的权力来进行改革。

人民的希望，是对政治家最大的支持，它可以在一瞬间把一位政治家推到事业的顶峰。所以，很少有政治家能面对着这股力量而不动心；然而它也是最危险的武器，它伤害和覆灭了许多使用它的政治家。

1957 年，赫鲁晓夫就有同样的机会和危险。

赫鲁晓夫不愿意让人民失望，他要用幸福的许诺来偿还人民的希望和支持。

政治许诺象是政治家与人民签订的一份合同：人民给予政治支持；政治家给予幸福和富裕。但如果政治家不能在短期内实现合同、迅速交货，那么这份合同书极可能变成一把两边有刃的刀子。

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原动力，但这些美好的未来，遥远得犹如宗教里的天堂、来世。而现在赫鲁晓夫却许诺要在短期内实现。他想迅速交货——

赫鲁晓夫首先宣布要 7 年内超过美国的生产水平，然后他开始用最绚丽的色彩给他的人们绘制共产主义图景。

以下是赫鲁晓夫当政的 50 年代末期的设计：

在即将来临的这个社会里，分工将被取消，人们可以自由发展个人才能并根据个爱好选择职业；

按需分配原则将实现——从 1975 年起免费供应午餐，1980 年起一日三餐免费吃饭；

一年四季免费供应衣服；

那时将实行社会自治，国家从而失去存在的必要性；

最令人头痛的住房问题将得到解决，人们将住进“公社宫”。每座“公社宫”的面积达 4 万平方米，居住 2000 到 2500 人。“公社宫”是人间天堂。它的底层是各种服务行业。由于那时已不需要货币，供求双方不再存在买卖关系。所谓服务行业，只是将人们需要的一切物品放生在一楼，供楼上的居民任意挑选取用而已。二楼一部分做儿童室，一部分居住老人，三楼是已婚者住宅，四楼是青年和独身者的单身宿舍；

共产主义社会将改变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唯独家庭将得到持久性的稳固，一夫一妻将进入永恒不变的时期，那时，将不再有离婚，不再有私通，不再有那种今天同这个拥抱，明天同那个接吻的朝三暮四的人。

总之，那时的苏联社会将不会有无人道、不正义、不文明，将不会有愚昧无知、自私自利，更不会有暴力和犯罪。

一切都是美好的，令人惊讶的；然而，更加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切都不仅仅是远景、是规划、是在书本上谈论的马托邦。赫鲁晓夫要给他的人民一个“可以享受到的社会主义”！

1960 年初，一位印度政治家问赫鲁晓夫，苏联何时才可以进入这种天堂般的共产主义时，赫鲁晓夫又一次显示了他的政治家魄力。

赫鲁晓夫回答：“我们有一切理由希望在 1975 年和 1980 年达到我们的目标。”

今天，当我们读到这种描绘和许诺时，惊讶肯定会变成嘲笑。但希望这种嘲笑是善意的、宽厚的——尽管时间已经证明赫鲁晓夫的许诺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然而他毕竟建立了希望，毕竟将被颠倒了的目的又颠倒过来。

多少年来，革命为了人，已颠倒为人为了革命。人是革命的工具、螺丝钉。为了革命，人们流血、流汗、牺牲；还有无休止的斗争，无止境的奉献。革命成了目的，而人成为手段。

赫鲁晓夫给超过美国定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内容：“要在按人均计算的奶类和肉类生产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赫鲁晓夫没有笼统地讲总产值，因为产值的上升与人民的富裕并不必然成正比。高国民产值可以用来扩军，用来建立庞大的官僚警察统治，可以为特权阶层产生更多的特权。

人们曾经把挖苦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并把赫鲁晓夫的这个奋斗目标作为修正主义的根据——因为他居然将世俗的牛肉与伟大的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这简直是对革命的亵渎。

然而，无论是“土豆烧牛肉”还是“公社官”都是以人为目的的。这至少比那种以崇高的政治目标，来掩盖对人民现实需要进行剥夺的欺骗值得称道；更主要的是，赫鲁晓夫曾经为这些许诺有过一番艰难的奋斗。

## 五

生产水平低下，农庄基层官僚腐败是赫鲁晓夫面对的农业现状。为了收拾这个烂摊子，赫鲁晓夫在 6 年内撤换了 4 个农业部长……

赫鲁晓夫从斯大林手中接过的经济遗产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农业经济。

斯大林时代，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对农民实行强迫的集体化，农业经济长期处于停

滞状态，农业问题成了社会不稳定和政治紧张情绪永久存在的根源。

农民是在流放和处决的压力下，被迫参加集体农庄的。因此，农民以拒绝努力生产的方式，对这种错误的政策实行报复。这种报复简直可以说是几十年来苏联历的一种灾难。

斯大林仅仅是靠非经济的手段、即以警察为依靠的专制政治，才使农业方面的错误政策长期保持下去。

到 1953 年，苏联人口比 1913 年的沙俄增加了 20%，可粮食总产量和牲畜存栏数却与 1913 年相当。那就是说，50 年代的苏联人比 1913 年的俄国人吃到的面包和肉要少 20%。

这就是 50 年代初期的苏联农业现状。用赫鲁晓夫本人的话来说，“在农业方面，我们已经面临一个死胡同”。

赫鲁晓夫农业改革的动作是很大的——

发动了一个开发荒地的巨大运动：他动员了 100 多万人，增加了几十万台拖拉机，在亚洲的处女地上建造巨大的“粮食工厂”，使播种面积扩大了 3500 公顷；

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以增加农民收入；

允许并帮助发展私人畜牧业，以增加肉类产量；

降低农民私人所得税，以刺激个体经济的发展；

赫鲁晓夫农村经济改革的另一重大措施是将大型农业机械直接交给农民使用。

以前，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归国营的机器站所有，这些机器站为集体农庄工作，并得到实物报酬，它为国家取得相当一部分农产品；同时机器站也是国家对农村进行统治的工具，它代表官僚主义集团而与农民处于敌对的地位。国营拖拉机站成了架运转不灵的官僚机器，它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并提高了农业产品的成本。

因为这一系列的农业改革，西方新闻界称这个时期为‘赫鲁晓夫与农民一起度过的蜜月’。

然而，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并没有获得成功。

数字是枯燥的，然而只有数字才能那么无情地说明问题。

1960 年是苏联第 6 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它并没有完成计划所规定的指标；农业产量竟低于计划的 25%；在 1960 年，集体农庄向国家提供的谷物竟比 1953 年还要少。

粮食减产，饲料不足，到 1962 年，由于没有饲料而大量宰杀生猪，结果使生猪头数降到 1957 年的水平之下，随之而来的是猪肉供应紧张。

“1963 年赫鲁晓夫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急剧提高生猪的收购价格，肉价当然当然也随之上涨。”它的连锁反应是肉类、黄油、牛奶、蔬菜等副食品短缺，而且价格上涨。

没有什么能比这件事更能让赫鲁晓夫成为社会所指责的目标了。

这真是一个至今都有现实意义的思考题——这些很有意义的改革措施，得到的竟是相反的结果？

赫鲁晓夫曾经把国家对农庄的控制放松，给农庄以更大的自主权。强而，这只不过是把中央的官僚主义下放到各个农庄——下放了的自主权并没有交到生产者、即农民手里，反而进一步扩大了作为国家代理人——农庄负责人的特权。

在 1958 年，一些农庄的非生产开支，竟比生产开支还大；一些农庄主席的收入高出一个农民五六倍之多。集体农庄的干部已成为一个特权阶层，处处维护着他们的特殊利益。

官僚主义的腐败、弄虚作假也是农业改革的主要障碍。

1961 年，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召开农业会议，对下级机构的某些官僚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无情地揭露：虚报成绩、虚造统计，大量屠杀小牛和奶牛来“完成”肉类生产计划，在市场上购买黄油、牛奶用来“完成”生产指标。

在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一位州委会的第一书记，居然号召各区的主席和集体农庄主席向店铺购买黄油转卖给国家，借以表明完成了生产。而正是这位第一书记，竟被提升为共和国内政部长。

直至赫鲁晓夫在给吉尔吉斯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中对这种犯罪行为予以揭露后，这个新任内政部长才被撤职，并被开除出党。然而在赫鲁晓夫干预之前呢？党纪和法律在官僚主义的犯罪面前起过作用吗？

下面是赫鲁晓夫与吉尔吉斯第一书记拉扎科夫的对话——

赫鲁晓夫：你们所了解的情况只限于我的公开信里所提到的吗？

拉扎科夫：有些党员已经在会上提出过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在那以前，你们对这件事根本不知道吗？

拉扎科夫：我们知道，可是我们没有十分严厉的对待他的问题。

赫鲁晓夫：可是你们又任命他当了内政部长！难道你们竟认为对于犯罪的人最好的惩罚是委派他当部长吗？

赫鲁晓夫揭露官僚主义的犯罪，批评了包庇官僚主义犯罪的上级官僚主义；然而，他没

法铲除官僚主义。

就如他把政治恐怖的罪恶归结到斯大林个人品质的残忍一样，他把官僚主义的腐败也归结为某些领导人的堕落和犯罪；

就如他谴责了斯大林、处决了贝利亚而并没有以民主和法律来取代警察对社会的统治一样，赫鲁晓夫批评和开除了上述官僚主义者，却始终没有将官僚主义作为一个政治体制问题，而提到改革的议程上来。

他只是在处分人，撤换人，而没有从所有制方面进行改革，没有将生产资料——土地，从国家所有，还原为生产者所有。

赫鲁晓夫一定是接受了国家所有即社会主义的戒律，而没有认识到农民直接占有土地，才真正体现了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原则。

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既没有对所有制进行改变，也没有对官僚政治结构进行改革。

他改换的只是人。他当政 6 年，竟撤换了 4 位农业部长，最后让一个农场场长来当他的最后一任农业部长。

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 六

赫鲁晓夫几乎将上下左右的人全得罪了——官僚阶层恨他是因为他的改革使他们失去他们正在过的生活；人民群众不满，却因为他的改革软弱无力，而无法使他们结束正在过的生活……

农业不是赫鲁晓夫进行改革的唯一部门。赫鲁晓夫也曾对官僚主义的、集中制的经济体制进行过改革。

集中制是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它要求企业和社会无条件地服从最大限度集中的统制制度。它决定生产和产品分配，因此它实际上也决定着生产者的命运，成为社会独一无二的调节者和主宰。

在这种集中制的统治下，一个人的职业、单位和报酬都由上级有关部门事先规定好了；甚至一个人小时候上哪一个幼儿团，老死后进哪一个火葬场，也都是由集中的统一计划所决定。

赫鲁晓夫的措施是实行广泛的分散制，扩大企业的自治和独立。

这是一个艰难而又无效的举动——

艰难的是，最上层的中央各部委不愿意放弃对企业的控制——那将意味着失去权力和权



力所带来的许多特殊利益；

无效的是，下放的企业自治权根本没有交到生产者即工人手里，工人无论是给国家干活，还是给“一长制”下的厂长卖力，都未能改变他们雇佣劳动的性质。

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由于这种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劳动者与劳动成果普遍分离的原因，而根本不可能对生产产生主人翁的责任感。

为了克服这个矛盾，取得了自主权的厂长、经理只能依靠强化劳动纪律、强化监督统计的手段来促进工业生产。这结果是进一步加强了“公仆”对主人的控制并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

因此，赫鲁晓夫的工业改革措施同样未能激发工人的创造性和劳动热情而改变苏联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状况。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赫鲁晓夫更无建树。

他把执政期间的主要精力都投入经济改革之中。他以为消除了政治恐怖之后，只要有了面包和黄油，人便可以幸福了。他一定没有认识到人类的进步和解放，除了生存需要的满足外，尚有自由、尊严、创造等精神需要要求得到满足。

吃得再饱的奴隶也还是奴隶。

我们很少在赫鲁晓夫的改革词汇中找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字眼；我们根本没有在赫鲁晓夫的政治许诺中找到民主权利的条款。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依靠民主和法制来改造官僚政治。

这是赫鲁晓夫的局限，也是造成他的经济改革成效甚微，最后夭折的根本原因。

赫鲁晓夫只是在清除官僚主义现象和限制官僚特权方面有所行动：压缩部队开支，减少军官的薪金待遇；精简臃肿的官僚机构，批评官僚主义作风、制裁官僚主义犯罪。

对赫鲁晓夫式的改革，值得一提的是，他也对党的官僚化趋势作过开争，力图使党非理论化和非政治化——

1962 年秋天，赫鲁晓夫把整个党分为两个组织：一个管工业、一个管农业。赫鲁晓夫的这一措施使苏联逐步变成一个技术专家党，并为政治官僚向技术官僚过渡做了准备，尽管都是官僚，但毕竟是一个进步。

赫鲁晓夫所有的这些改革措施尽管是有意义的，却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官僚政治结构，反而得罪了整个官僚特权阶层。

赫鲁晓夫精力充沛，总是不断地四处巡游，寻找他的下级的毛病。他生性活跃，总想进行新的改革，什么都想变个样。他的敌手得到地方保守的土皇帝的支持，他却受到那些苦于频繁变动的官僚们的压力，受到一心想保持常规部队地位的各军区司令的警告，因为他居然

裁减军队，并让将军们去当农场场长；他竟然说“一辆坦克花钱太多。砰！砰！两声，坦克就毁了，钱和那些好样的小伙子们也全都报销了！”

这话让将军们和国防工业的领导人听了会是什么滋味？

所有的这些人——党的、政府的、军队的领导们都希望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希望保持常规和秩序，不要变动，不要轻举妄动。他们已经在动荡不安的斯大林时代生活了几十年，他们已经辛辛苦苦地革命了几十年，他们好不容易才得到今天的安稳和地位，为什么要来折腾呢？谁敢来折腾呢？

想到这一点，他们要眼红的，要拼命的。

赫鲁晓夫自然也感到了这些人的压力。（还是人的问题！）他愤怒过、反击过，然而这一次，这位体格粗壮，精力充沛的人，这位除掉了贝利亚又打败了马林科夫集团的最高主宰的反抗，却是那样的软弱无力。

赫鲁晓夫用新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来摧毁莫斯科的中央官僚机构，并把这些机构中的官员流放到边远省份。

斯大林在大清洗中几乎消灭了他所有的助手，赫鲁晓夫却将 80% 的经济管理人员调往外省。这些官员的家属也跟着他们到荒凉的外省去度过余生，为此，他们把赫鲁晓夫和他的改革变动恨得咬牙切齿。这样一来，当然不能指望这些人去加强地方的经济技术工作。

赫鲁晓夫对官僚机构所作的这点唐·吉柯德式的攻击，纯粹是白费力气。所有这些被赶到外省去的官僚，只要没有在改革之年给折腾死，最后都毫无例外地回到莫斯科，官复原职。这些措施只是加倍地激怒了整个官僚阶层，使赫鲁晓夫几乎跟所有的人都闹翻了——

他跟党的最高领导的成员闹翻了，因为他分掉了他们的权力；

他跟经济、技术大员闹翻了，因为他不断地改组机构，使他们失去了位置，失去了在首都的安逸生活。一个官员最不能容忍的使是不断地有新的工作和新的环境要他们去适应；

他跟将军们闹翻了，因为他地缩减了他们的部队和薪金；

他跟基层官僚闹翻了，因为他老是窜来审去，去视察、去挑剔、去批评、去发火、去骂人——而斯大林从 1928 年起就没有视察过他的帝国。只要能躲过他的清洗和流放，官僚们便可平平安安的欺骗国家。想到这一点，斯大林时代毕竟还有值得怀念的地方。

赫鲁晓夫却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们什么都能容忍，就是一样受不了——那就是没完没了地巡视、检查。

所有的这些不满、干扰，反映在经济上是苏联社会的旧病重犯：消费品供应不足，食物短缺和持续的物价上涨，反映在政治上是赫鲁晓夫面临着失去各阶层支持的危险。

官僚保守势力反对是因为他要改革；人民群众不满却因为他的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体制。他几乎将左派右派、上层下层全得罪了。

赫鲁晓夫的下台只是时间问题了。

## 七

这是赫鲁晓夫的最后斗争——他用水泥浆覆盖了斯大林的遗体；然而，赫鲁晓夫却未能覆灭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最终从无人看管的坟墓中走出来给他和他的改革敲响了丧钟。

1961年，赫鲁晓夫已经深深地感到了自己周围的危机。作为一位坚强的政治家，他决不战而退，他要再一次搏击，他的武器仍然是“非斯大林化”，他想以此来遏制日益复活的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势力，重新赢得他的黄金时代。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了。由会议主席团事先安排的会议议程决定，这次大会不涉及斯大林、也不提“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然而，当赫鲁晓夫于10月17日登上讲台时，他又一次以闪电般的突然袭击向全世界证明，他是一位多么善于制造伟大历史时刻的政治家——他重新提出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问题，而且更不留情面、揭露的规模也更进了一步。不仅斯大林，他那些亲密助手也被公开点名。

赫鲁晓夫发言的临时变动，在大会引起震动，几乎所有要发言的代表都赶忙改写已经准备好的发言稿，揭露斯大林及其同伙所犯下的罪行。

在这次大会上，列宁格勒、莫斯科、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代表团联合提议：将装有斯大林遗体的水晶棺材搬出列宁墓，因为把它放在那里将是对列宁的亵渎、对革命的亵渎。

苏共二十二大闭幕前，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

“鉴于斯大林严重违背了列宁的遗嘱，滥用职权，对忠诚正直的苏联公民进行镇压，再将水晶棺保存在列宁墓是不合适的；斯大林在个人迷信时期的这些和许多行为已使得自己的棺木继续存放在列宁墓成为不可能。”

这个决议第二天就执行了。

1961年10月31日，当赫鲁晓夫宣布二十大结束时，列宁墓已不再有斯大林的遗体。

斯大林的水晶棺被运到离列宁墓不远的地方。在那儿挖了一个很深的坑，水晶棺放进去后，又浇灌了好几大卡车水泥浆。幕上立了一块花岗岩石碑，上面只写着“J·V·斯大林 1879—1953”。

搬掉斯大林水晶棺对世界的震惊不低于“二十大”的秘密报告。

水晶棺是那个时代的明证。斯大林时代比任何时代留给人们的敬意和畏惧都多。水晶棺象一张虎皮，即使挥挥这张虎皮也可驱散狗群，使他们只敢站在远远的地方怯生生地吠叫几

声。

现在，人们可以放心地、公开地谈论斯大林和那个时代的罪行了。

“二十二大”结束后的几个星期之内，人们每天争相读报，因为二十二大所有的发言都公开见报了。

人们为每一件新的揭露所吸引，相比之下，这次大会新通过的党纲反而显得不重要了。

“二十二大”反对个人迷信及专制统治的公开化，给文学带来了繁荣：几百人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下自己在专制统治下的悲惨经历，“集中营主题”的文学创作成为文坛主流。

这些都在政治上给了赫鲁晓夫支持，并给了他获得建立第二次丰功伟绩的机会。

然而赫鲁晓夫没有利用这个时机。就象这一次的文学繁荣再一次证明，文学拯救不了社会一样，“二十二大”以后的事实又一次证明“非斯大林化”不能拯救改革、不能拯救赫鲁晓夫的失败命运。

“非斯大林化”仅仅是一面旗帜，它给予赫鲁晓夫的，是动员更大政治力量的可能，而不是力量本身；是挑战的机会，而不是胜利本身。赫鲁晓夫将“非斯大林化”当作唯一武器几番使用，甚至当作他的政治斗争目标，他没有以“非斯大林化”为武器，去达到“非官僚政治化”的目的。这是他的局限和致命弱点。

赫鲁晓夫的最后斗争必败无疑。

赫鲁晓夫是一个失败的改革家，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认为，赫鲁晓夫的失败，在于他没有采取足够的恐怖手段对改革的反对者进行惩处。

这是西方普遍的看法，即赫鲁晓夫一个致命的失误在于他没有象斯大林那样，对反对自己政策的人彻底加以消灭。官僚主义者在赫鲁晓夫时代最多会丢官，却很少掉脑袋。

这是事实。1937年，乌克兰党的政治局全体成员曾通过一项反对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政策的决议。几天后，斯大林发来了一封邀请书，请乌克兰政治局全体委员去克里姆林宫，对这项政策进行讨论。政治局接受了邀请，并一起前往莫斯科。

委员们一走进克里姆林宫，就被内务部一网打尽。后来全体政治局委员被枪毙了。

赫鲁晓夫没有这么做。这是时代的进步。斯大林将数百万他的真正的、和想象的敌人处以死刑，赫鲁晓夫只能把他的政敌开除出党或发配到边远省份，而勃列日涅夫却只能将赫鲁晓夫送到莫斯科郊区。

然而，这些事实并不能说明赫鲁晓夫的失败在于他没有采取恐怖——用暴力反对暴力不能消除暴力，用专制反对专制不能消除专制，用官僚反对官僚不能消除官僚。这个道理甚至在2000年前就被政治家所理解。

在意大利，当斯巴达克斯的起义队伍俘获了罗马贵族时，斯巴达克斯曾把两把匕首交给两位罗马将军，要他们脱光衣服为起义的奴隶表演角斗。

他说：“当初我们怎样，你们也要怎样。开始吧，至死为止的角斗！”

无论以道义还是以战争条律讲，这都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斯巴达克斯最得力的助手大卫却对此保持着深深的沉默。

斯巴达克斯走过去问：“难道让他们这样做没有道理吗？”

大卫忧虑地说：“对他们有理，对我们却有害。你可以采用他们的方式去惩罚他们，可受害的却是我们自己。别忘了，我们拿起武器正是要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除这种残酷的角斗。”

赫鲁晓夫犯的正是这样的错误。

也有人从赫鲁晓夫的性格中寻找他失败的原因，说他在改革中表现得喜怒无常，反复无常，很少有精心设计和贯穿始终的改革措施。

这类指责从来是保守派对革新者进行攻击的惯用手段。改革策略只能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逐渐成熟。改革就是以多变的斗争方式去冲击简化了的社会结构、陈腐了的条文、章程以及保守的历史情性。

一项改革措施，如果真达到了成熟和一成不变的正确，那离僵化已经不远了。

赫鲁晓夫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在于他没有认识到一个腐败的政权要比一个堕落的统治者有更大的危害性；他没有认识到，真正能体现一个制度的，是那千千万万个中下层官员——即金字塔式的中央集权国家最底层的那个官僚阶层，而不仅仅是实行集权统治的最高领导人。

问题就在这儿。对最高统治者可能推翻、也可以批判——就象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加米涅夫，象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对最高层领导人可以撤职，可以开除——象赫鲁晓夫对“马林科夫反党集团”。

但谁也不能对几百万下层官僚进行清洗、开除和监督，赫鲁晓夫不能，斯大林也不能。

但人民可以、法律可以！答案就在这儿。

赫鲁晓夫没有找到这个答案。他把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作为他的主要任务；他以新的官僚制——即使是进了一步的技术官僚——而不是民主政治来改造官僚政治，他的失败，是一开始便注定了的。

赫鲁晓夫犯这个错误，是出于历史和阶级的限制——他始终未能与斯大林主义真正决裂。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评价赫鲁晓夫的改革时曾说过：“在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体系的同时，却完整无缺地保留了斯大林的体系。尽管他从民族的心灵上消除了这个恶魔，但他从未消除掉自己身上的斯大林主义。”

赫鲁晓夫用水泥浆覆盖了斯大林的遗体，却未能覆灭斯大林时代所形成的官僚体制。

60年代，曾有过一些优秀的苏联公民对此表示过担忧。如今还健在的、被称为“进步领袖”的俄罗斯诗人叶甫盖尼·叶甫图申科，在“二十二大”后曾以一首轰动一时的诗《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发出过警告：

大理石不会说话，

水晶棺在无言中闪光。

默立的哨兵、脸色晒得红黑。

当他们把他抬出列宁墓的大门，

几缕青烟在棺木上环绕，

一丝气息从裂缝中漏出。

棺材慢慢地擦过哨兵的刺刀。

他也不会说话，他也不会！

——他沉默长眠，

紧紧地握着他那经过防腐的拳头。

他只不过装死，

实际却在里面注视着……

他只不过是打个盹，他在筹划。

……

诗人表示了这样的怀疑：

也许在他棺材里还有一部电话，

他还和各式各样的人用电话交谈？

诗人发出了呼吁：

我呼吁我们的政府，我请求他们，

派二倍、三倍的哨兵来看守这个棺材，

不要让他东山再起。

除了怀疑、呼吁、还有深深的忧虑：

我们已经把斯大林搬出了陵墓，

但我们又怎么才能

从他继承者的心里把他搬走？

不幸的是，诗人的忧虑不是没有根据的。“二十二大”后不过两三年的时间，斯大林一步步从无人看守的坟墓里走出来，给赫鲁晓夫敲响了丧钟，给改革也挖了一个和他在3年前得到的一样的坟坑——“到1964年，赫鲁晓夫的许多改革——不论好坏——全都废除了”。

八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政治家，当他告别了政治舞台，告别了人世时，谁也不能给他一个盖棺论定——连历史也只能保持着沉默……

1964年10月1日，苏联3人宇宙飞船《上升号》在拜库诺尔宇宙中心发射前，赫鲁晓夫与3个宇航员通了电话，祝他们宇航顺利，并许诺在返航时，为他们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

赫鲁晓夫通完电话，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也给机组挂了一个同样的、属于最高祝福的电话。

这在等级森严的苏联来说，是一个异乎寻常的行动，一个微妙的、不祥的暗示。

“上升号”在飞行途中，赫鲁晓夫又一次用无线电话与宇航员通了话。结束时，他说了一句奇怪的、预言性的话“我要将麦克风交给米高扬同志了。他干脆是从我手中抢走的。我想我不能制止他。”

宇航员安慰他：“没有关系，尼基塔·赫鲁晓夫同志，您在地球上等着我们，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然而，当“上升号”用7天时间完成了绕地球17圈的航行返回地球时，赫鲁晓夫没有出席欢迎仪式——这次引起全世界注目的缺席，表明赫鲁晓夫已不再是苏共领导人了。

赫鲁晓夫选择这么一个时刻和场合，作为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并告别政治生涯，似乎是为了证明，飞船上天而改革失败；科技发达而政治落后的苏联社会，仅仅靠经济改革是无法进步的。

历史的画笔从 1957 年 6 月到 1964 年 10 月给赫鲁晓夫的统治者生涯画出了一个句号。1964 年 10 月事件是这个圈的衔接点。这次事件表明，争夺个人权力的斗争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了怎样的恶性循环。

1964 年 10 月是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的终点。他的下台与他的上台非常相似，几乎是历史的重复。只是结局完全不一样。

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和克格勃头子谢列平利用主席团会议中的多数地位，与 1957 年一样向赫鲁晓夫发起进攻。

在这次秘密召开的主席团会议上，苏斯洛夫激烈地批评赫鲁晓夫的改革，陈述他的改革给苏联社会造成的政治、经济困难。

赫鲁晓夫故技重演，他用长达 4 个小时的发言为自己辩护，反对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同时，他又一次象 1957 年 6 月一样，提出了召开中央全会的要求。

第二天，召开了中央全会，170 名中央委员，居然有 100 名投了他的反对票。赫鲁晓夫再没有别的力量可以指望了。

10 月 16 日，苏联塔斯社正式发表苏共中央 1964 年 10 月 14 日中央全会的决定——

“满足尼·谢·赫鲁晓夫同志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的要求。”

这位矿工出身的政治家退出了政治舞台。

西方为他们失去了一个争强好斗、浑身是劲而又捉摸不定的对手而松了口气。

共产世界的反应要复杂一些：有人为一个头号修正主义的下台而欢呼；有人为那场不彻底的改革突然断送而陷入深深的迷惘。

当然，这些都是 60 年代的反应。历史的评价要晚得多，一直到 1987 年，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才表示要重新评价赫鲁晓夫！

这当然也不是历史的最后发言；我们现在可以说的是——

这是位历史巨人，因为面对着历史，他敢于正视，敢于挑战，他让人看到了历史帷幕后面的罪行，而让半个世界产生了深深的迷惘和绝望。但他毕竟使血腥镇压的政治恐怖时代在苏联结束了；



他举起了理想和改革的旗帜，唤醒了半个世界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和希望；但他却辜负了这些信任，使人们再一次陷入绝望之中。

我们说他是历史巨人还因为他的许多行为都对历史的进程发生过影响；世界曾多次被他震撼过。

当然，这些影响和震撼并非全是积极的。

我们并不以成败来评说一个人的历史功过，成功的并不一定是伟人，失败的并非一定是罪人。如果从客观后果论，哪一个政治家不是功过多半？哪一个政治家在迫不得已的历史关头不是矛盾的、被动的？

只有一个政客才能在虚伪的帷幕后，扮演一个始终如一的伟人形象。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不能，赫鲁晓夫也不能！

所以，我们在 1956 年的匈牙利事件中看到的赫鲁晓夫完全是另一种形象。

1956 年，当赫鲁晓夫从秘密报告中释放出来的政治力量，在东欧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反斯大林式的官僚专制，要民主改革的浪潮在波兰激起了工人的政治热情后，赫鲁晓夫竟然调动了 3 个纵队的坦克部队包围了华沙城。

他带领着华沙条约国司令科涅夫元帅、苏军总参谋长和十几位陆军上将、气势汹汹地赶到波兰首都华沙，干预波兰内政，干预民主化进程大有希望的波兰改革事业。

这次军事讹诈是在新上任的波兰领导入哥穆尔卡的强硬抗议下才退却的。因为哥穆尔卡坚持认为工人上街游行，不是反对社会主义！

哥穆尔卡说：“他们抗议的是我们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并且也是他们痛苦地感到的弊病，抗议的是对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歪曲。”

同一年，在匈牙利，赫鲁晓夫走得更远，他两次出兵匈牙利，并依靠苏联坦克给匈牙利建立了一个新政府。这是斯大林想做都没敢做的事……

1948 年，南斯拉夫与苏联决裂，并公开宣布选择与苏联完全不同的道路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这曾激怒了斯大林，使他萌发过用武力惩罚共产世界叛逆者的念头。然而斯大林没敢采取的行动，被赫鲁晓夫开了先河，并给 1968 年勃列日涅夫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树立了榜样。

即使在赫鲁晓夫的支持者里，也没有人敢为他 1956 年在匈牙利的霸权行为辩护。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政治家，一个矛盾的历史巨人。所以，在 1971 年 9 月 11 日，当这位矮胖、笨拙、却具有牛的倔劲、野兽的意志的政治家，这位半个世界的领袖，这位给半个世界带来希望、也造成混乱的改革家，这位用自己的皮鞋敲打过联合国讲台的大人物，在失去政治生命 10 年之后郁郁地告别人世时，谁也不能给他一个盖棺论定——连历史也只能保持

着沉默，而只在他的讣告中留下与他留给斯大林的墓碑一样简单的一句话：

“苏联领取特别养老金者尼·谢·赫鲁晓夫逝世。”

走向绞刑架的改革家——纳吉与匈牙利事件

赵启强本文系作者大著《光荣的荆棘路——改革家们》第二篇

作者：1956年，如果匈牙利人民不过于感情用事，您的那次改革会不会有更多的冷静和成熟？

纳吉：没有人民的行动就没有1956年的改革。

作者：1956年是失败的年月。

纳吉：悲壮的失败。

作者：这是一回事。有人说，人民给您帮了倒忙。

纳吉：对于社会主义，我苦苦思索了一生，却没有在1956年10月短短几天里得到的理解深，我与官僚政治苦苦斗争了一生，却没有在1956年10月最后一周取得的成果大。我为此而感谢人民。

作者：您至今不悔？

纳吉：不，从1949年到1955年，我两次失败，因为我企图靠权力斗争来实现我的改革思想。

作者：1956年您依靠民主力量进行改革，而失败却更加惨重。

纳吉：那是因为在改革的敌人背后，有另一个大国的武装力量，在这个武装力量后面，还有更难跨越的历史障碍。

作者：对了，对了，正是人民的狂热才把您推到了历史所不允许的地步。那一次，您走得太远了，以至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

纳吉：您是指取消一党制？

作者：是的。

纳吉：您是指实行普选？

作者：是的。

纳吉：我为我经有过这些政绩而骄傲。

作者：一位社会主义政治家的骄傲？

纳吉：社会主义的。难道一个社会主义者竟然害怕让更多的社会阶级和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国家的管理？

作者：人民的参与会造成混乱；无论怎么说，1956年匈牙利流血了。

纳吉：不为民主流血，就会为专制流更多的血！

作者：除此，别无选择？

纳吉：有，再付出两代人的代价！

作者：……（沉默）

—

匈牙利悲剧的13天震撼了历史，分裂了共产世界。流血的双方都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战斗；胜利者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审判，失败者在临刑前呼喊，社会主义万岁。

1956年是共产世界的灾年，重灾区在匈牙利。

1956年10月23日到11月4日，13天时间，匈牙利内政两次受到外国军队的干预；有上万公民死于动乱；两次撤换和推翻国家首脑。

这13天内，匈牙利宣布过解散共产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宣布过取消一党制；宣布过退出华约组织；宣布过中立。

这 13 天内，它的一届政府向联合国呼吁，要求给予援助以保卫它的中立；而另一届政府却致电联合国，坚决反对把匈牙利问题提交安理会或联合国大会讨论……

这 13 天震撼了全世界——联合国成立了匈牙利问题特别委员会；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都发表声明，对这 13 天进行表态……

一位政治家甚至说过“只要你告诉我对匈牙利事件的态度如何，我就可以判断你是什么样的人。”

这 13 天震撼了历史，使它无法再以半个世纪形成的惯性力量来主宰这半个世界了。

这 13 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很简单，学生和工人上街游行，要求一位政治家执政，要求另一位领袖下台；他们要这样的改革，反对那样的体制。这种介入和干预造成了骚动和流血、死亡……

如此而已，尽管严重，但自从有了政治，这种动乱就在所有的国家发生过。

然而，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骚乱？历史会给这 13 天一个什么样的定性呢？

美国共产党说，匈牙利事件使它“碰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问题”。

面对这个难题，有着共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共产党，却有完全相反的立场和态度——

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说：匈牙利事件“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民族革命’，而是反革命”；

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铁托说：匈牙利事件是“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进步的愿望和国家与政治领导机构的活动之间产生了矛盾，最后导致武装斗争的爆发”。

荷兰共产党中央说：“这次事件是一场暴动，一场企图以武力来摧毁和玷污

匈牙利人民民主新政权的事件。”

美国共产党说这是“一种争取民主化、争取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和争取在他们同苏联的关系中取得完全的国家主权和平等地位的人民起义”。

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说：“帝国主义者和他们指使下的匈牙利国内外反革命分子……利用人民正当的不满情绪，发动了武装暴乱，企图摧毁匈牙利人民社会主义制度，企图恢复资本主义和法西斯的恐怖统治。”

如果再加上西方国家的宣言和声明，这个复杂的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只能从许多声明中寻找这样的相同点——这是一场灾难，一个悲剧。

这悲剧的 13 天，这难以评说的 13 天是伊姆雷·纳吉执政的。

纳吉于 1956 年 10 月 23 日由人民拥戴上台，成为半年来匈牙利第三位国家领导人。13 天后，纳吉和他的政府被推翻；一年后，为了追究他当权 13 天的责任，他被处以死刑。

看到这儿，或许读者会认为这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复辟事件——社会主义的匈牙利被武装暴动颠覆，后来复辟被粉碎，反革命头子纳吉被处以死刑。

然而，这样理解过于简单——因为纳吉在绞刑架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 二

拉科西是斯大林的优秀学生；匈牙利是斯大林牌的社会主义。拉科西也采用了最有效、最省力的统治手段——政治恐怖。

共产党在匈牙利执政的历史并不长，扣除战后头几年与其他政党共同执政的联合政府时期，共产党的匈牙利不过 7 年历史。但由于匈牙利共产党的领袖、

“斯大林最优秀的学生”拉科西。马加什照搬斯大林的统治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强迫农业集体化，用政治恐怖推行极权统治——把一个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原封不动的搬到匈牙利，7 年时间倒是绰绰有余了。

它的灾难性后果是“基本食品和许多日用品凭票供应。经常调整劳动定额意味着降低工资，年年发行和平公债，实际上就是苛捐杂税。1954 年职工的实际收入比 1949 年下降 20%。”人民怨声载道，只是迫于政治恐怖才不敢进行反抗。

1956 年 2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发动的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然袭击，一下就粉碎了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神话。这在匈牙利引起了巨大震荡——讨论经济政策的错误，揭露政治恐怖的罪行并追究责任。

1956 年 7 月，拉科西被解除第一书记的职务，由他的第一副手格罗接替。

拉科西是 1956 年第一个被赶下台的领袖，但不是最后一个。

新上任的格罗并没有带来新的施政方针。他不可能与过去决裂。作为拉科西的得力助手，他同样对过去的政治和经济错误负有责任。所以 1956 年 7 月，当那位被称为“匈牙利的斯大林”拉科西下台并于第二天去了莫斯科时，格罗只是以一份拉科西因“患了高血压症，必须离职休养”的公报，就轻松地把拉科西过去对人民的欠债一笔勾销了。

群众的不满情绪迅速增长，尤其是对新任领导迟迟不给恐怖时代的受害者平反反应强烈。

在许多重大冤案中，拉伊克冤案成为全国议论的中心。

拉伊克是前政治局委员、内政部长、外交部长、人民阵线主席。这位 1909 出生的文学院学生，早在 30 年代初期就从事着党的组织和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他是青年和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因为拉伊克了解他们并同他们有共同语言。40 年

代起，拉伊克就是匈牙利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8 年斯大林与南斯拉夫决裂，于 1949 年通过共产党情报局批判南斯拉夫并形成决议，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复辟资本主义，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这一事件在共产世界造成危机，使东欧各国内政发生急剧变化。

拉科西利用这一事件在匈牙利掀起清洗铁托分子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镇压运动。拉伊克是这次运动的受害人。他被指控为美国情报机关的代理人、南斯拉夫间谍和特务。这个案件中涉及到的国防军将军、警察部队军官还被安上企图暴动的罪名。

1949 年 5 月，国家保安局对拉伊克的逮捕，意味着匈牙利开始了专制和政治恐怖时代。1949 年 9 月 20 日，拉伊克被判处死刑，10 月被绞死。

拉伊克一案牵扯到 8 个匈共高级干部，其中 5 人被判死刑。

紧接着，全国展开了清查“铁托分子”、“拉伊克分子”的大规模清洗运动。

被捕被杀者竟有 20 万人之多。匈牙利进入了历史上的黑暗时期。

斯大林是在十月革命 20 年后，才把社会主义苏联抛入政治恐怖的深渊，而拉科西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他的血腥暴政。

他真不愧为“斯大林的优秀学生”。

在那个恐怖年代，许多蒙受冤屈的人被打成残废，精神被彻底摧垮。

拉伊克——这位多次蹲过敌人监狱的老共产党员，这位多次领教过警察特务各种审讯、拷打而从未屈服过的老地下工作者，在拉科西的保安局的摧残下，精神完全崩溃了。他站在扩音器面前，毫无表情，嘴里不停地念着别人替他捏造的口供：他是美国特务，是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准备搞政变，他要谋杀

共产党的领导人……

在 1938 年的苏联，我们也见过相同的场面：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承认了他是帝国主义间谍的指控。

到底是什么手段能使共产党的保安人员达到连法西斯暴徒都难以达到的目的——迫使如此优秀的人物就范？

这是一个迷。

看到这些令人尊敬的领导人被剥夺了尊严、信仰，精神被彻底摧垮后，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还能在夜里睡得安稳；没有一个正直的公民还敢说出一个正直的人应该说的话。这正是政治恐怖制造者的目的——恐怖气氛可以使统治者睡得安稳，可以使他为所欲为。

在那个时代，许多人未经法院判决，就被隔离拘留，富裕市民及其家属被迁出首都布达佩斯并没收了他们的住宅和财产。在农村建立了类似黑名单的富农名单。“提高警惕性”成了主要的政治性要求。人民在经常出现的“抓敌人黑手”的威胁下，对统治者的暴虐保持着沉默……

政治恐怖是最有效，最省力的统治手段。

三

平反——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为了埋葬一个时代。

人民要为拉伊克平反，要为那个时代数十万受害者昭雪，并要求追究政治责任。

在 1956 年的匈牙利，人民曾经提出要直接责任者以命偿命的口号。

这是匈牙利人的远见，他们并不满足仅仅可以自由呼吸，而是要求向那个时

代永远告别。比起一年前苏联人的平反运动，1956 年匈牙利人民则有更强的历史



批判意识。

如果没有对过去罪恶的声讨和清算，一代人的牺牲便成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灾难。

为了拉伊克案件的平反，由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裴多菲俱乐部召开了两千人大会，声讨拉科西时代的罪恶，敦促格罗检讨并结束靠政治恐怖所维持的专制时代，为民主化进程拉开序幕。

在这次大会上，拉伊克的遗孀、前全国妇联秘书长、律师尤莉奥。拉伊克揭露了她 6 年监狱生活的非人遭遇，以及拉伊克被处死前所受到的骇人听闻的摧残。她的演说使全国为之震动。

在这种普遍愤怒情绪的迫使下，格罗立即将 300 名“铁托分子”释放出狱，并正式为拉伊克平反。

但格罗不愿意为拉伊克举行隆重葬礼。他在政治局会上不耐烦地打断关于这项提议的发言，说不知道遗体埋葬在什么地方。

经过一个由受害者家属参加的小组的彻底寻找，终于在通向巴拉顿湖公路旁的一个小树林里发现了拉伊克的遗骸。

党内反对派和拉伊克的遗孀尤莉奥。拉伊克坚持要举行国葬，并要求允许群众参加。最后，匈共中央决定：于 1956 年 10 月 6 日隆重安葬拉伊克。拉斯洛和其他烈士的遗骨。

10 月 6 日是一个划时代的日期，它证明拉科西和他的继任者无法逾越牺牲者的遗骨，它证明历史终将为牺牲者的生命和无边苦难索讨报偿。

受害者的遗体将把不受法律制约的专横阻隔在 10 月 6 日，并愤怒地拉开了匈牙利事件的序幕。

10月6日，匈牙利为拉伊克等4名原党的领导人举行国葬。

布达佩斯有30万人排着长队静静地向饰有鲜花的4口棺材致哀。守灵者每隔5分钟换一次。

当轮到政治局委员们守灵时，顿时狂风大作。在这种肃穆悲愤的时刻，即使是坚定的无神论者都会认为，这是亡灵在对黑暗时代参与过非法审讯拉伊克、当今仍留在政治局的人表示愤怒。

人们的注意力落到了这些人身上。

接着是送葬。30万人的悲愤组成了一次无声的反政府示威，30万人的沉寂使空气变得象铅一样沉重。它压迫着几十万颗心脏，只要稍加一点压力，空气会爆炸。人群会爆炸，匈牙利会爆炸。

走在送葬队伍最前面的两个人是，拉伊克夫人和纳吉。

纳吉就是在这种时刻回到人民中来的。

#### 四

伊姆雷·纳吉——这位布哈林的学生，在政治斗争中失落一次，在人民中的威信便增高几分。现在，他既无官衔，又无党籍，但在1956年的匈牙利人眼里，他是一个救星，一位能体察人民痛苦，而又多次为之献身的英雄。

1956年10月6日，数十万匈牙利人把拉伊克的棺材送往墓地。他们用深深的敬意和哀伤埋葬受害者的同时，也用无声的愤怒埋葬了那个时代。

在匈牙利人看来，拉伊克葬礼象征着旧制度的覆灭；同时，布达佩斯人并不仅仅满足于过去的终结；在普遍哀伤、愤怒的情绪中，尚有小心翼翼升起的希望——迎接一个新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为了这个希望，几十万人都注视着走在送葬队伍最前列的伊姆雷·纳吉。

纳吉仪表庄重，中等身材，体型肥胖。一副学者式的夹鼻眼镜赋予他一个教授、一个可以信赖的长者形象。

他确实是长者，1956年他刚满60岁；也确实是学者，他是尼古拉·布哈林最勤奋的学生，曾被共产国际委任为“布哈林国际农学院”的研究员。他曾努力地将布哈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尤其是农业经济理论运用到匈牙利的社会实践中去。为此，他在1949年被指责犯有“布哈林倾向的错误”而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职务。

在纳吉身上，很难找到红色官僚常有的咄咄逼人的气势，尽管他的党龄与匈牙利共产党的历史一样长久，他1918年加入共产党，1944年从苏回国后任农业部长、内务部长、国民议会议长，1948年任匈共政治局委员，1953年任共和国总理。然而此时——1956年10月6日，在匈牙利人心目中，象征着新的希望的纳吉，却是一个没有任何头衔的平民百姓。他在一年前被开除出党。

纳吉政治生涯中的戏剧性变化，几乎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领导人身上都出现过：监禁，平反，再下台，再平反；而且非常相似的是，政治家在权力斗争中失落一次，在人民中的威望使增高几分。

人民总是盼着下了台的领导人重新执政，以中断现行政策。

不同的是纳吉的沉浮最多——三起三落。因此，他的威信最高。人民对他的期望最多。这种期望使他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使他走得比他所愿走的、所能走的都远；最后，如果不是绞刑架的阻挡，他到底会将匈牙利人引向何处，确实难以预料。

我们不能说人民对纳吉的期待是盲目的。

纳吉第一次下台是1949年；他批评了农业集体化的速度和强迫措施。他指出

：“强制实行集体化，必然要以灾难而告终。”这无疑是正确的、大快人心的批评。

在共产世界，犯强迫集体化错误和对这个错误的批评，匈牙利并不是第一次——20年前斯大林犯过这个错误，布哈林批评过这个错误；纳吉的批评也不是最后一次批评，以后在波兰、在捷克、在中国都出现过这样的错误和批评。

这是共产党国家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使最伟大的政治家也难免犯错误，但为什么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要在农业集体化问题上，重复这个明显的、被历史和无数灾难证明了的错误？而且所有的结局都一样：失败的永远不是这些理应失败的错误政策，而是中肯的批评和正直的政治家。

这真是社会主义国家难逃的劫难，它造成冤狱，造成恐怖，造成民主空气的窒息。

1953年，斯大林去世，斯大林主义对东欧的控制略有松动。为了对斯大林时期的政策进行检讨，赫鲁晓夫对东欧国家的政策进行了检查、批评，纳吉得到了复出的机会。

1953年6月，莫斯科召见了拉科西和纳吉。

会见时，马林科夫冷淡地问拉科西，“您在贵国担任什么职务？”仿佛他竟然不认识这位有着一个光秃秃的圆脑袋这样明显特征的匈牙利统治者似的。赫鲁晓夫的批评更加尖锐，直截了当：他指责拉科西强迫命令组织合作社造成农业生产停滞不前，指责他违反法制、判刑太重，在党内搞个人崇拜和个人专制。

赫鲁晓夫甚至指着这位匈牙利国家元首的鼻子骂道：“你极大地损害了你的人民！你罪行累累！常此以往，人们将用武力把您赶出这个国家！”

这次召见的结果是拉科西留任总书记，改称第一书记，让出总理职务由纳吉

担任。

1953 年，纳吉一出任总理，便开始实行改革，他表示要结束警察恐怖，为受害者平反；制定合理的投资政策；少建一些地铁、高炉，多给人民一些食品；更重要的是，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农业经济，纳吉宣布“农民可以自由地在私人耕种和集体耕种之间进行选择，可以退出集体农庄”。

在今天看来，这些改革措施或许并无多少惊人之处，但如果想到在 50 年代初期，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用宣传、统计数字和政府文件证明农业集体化的优越性时，一位共产党领袖敢于在黑暗和孤独中一语道破这项政策的荒谬以及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这不仅需要魄力和远见，更需能体察人民疾苦的政治责任。一个统治者的过失并不在于他有别墅、汽车，而老百姓都几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也不在于他享用美味佳肴，而老百姓连猪肉都吃不上。人民并不要求统治者与他们同甘共苦。尽管有许多美丽的政治童话总是把一些政治家描绘成这样，其实只是一种虚构，一种宣传。人民并不如此苛求。

一个统治者的罪恶在于他无视国家的利益，无视人民的苦难，甚至强迫舆论也象他那样装出似乎一切都平安无事，一切都美好幸福的样子。于是，假话成了司空见惯，真话要以自由为代价。

这是纳吉不同于拉科西之流的主要之处。

1953 年，纳吉的改革思想还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他明确提出民主和法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他尖锐地批评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到目前为止的发展是专制独裁性质的。

纳吉说：“政权内部所贯彻的不是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精神，而是少数人独裁的波拿巴主义精神。确立政权目标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而是根据千方百计巩固独裁统治的种种观点。”

纳吉走的太远了，他超越了拉科西，超越了提携他上台的赫鲁晓夫；更主要的是他超越了历史。

超越历史！单就这一条，他的失败也在所难免。

1955年初，拉科西重新大权在握，他解除了纳吉的总理职务。纳吉表示抗议，要求莫斯科裁决。

这一次，纳吉被苏共抛弃了。

到底是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主义者的拉锯般的斗争此时正处于劣势，而无暇顾及纳吉，还是因为赫鲁晓夫担心纳吉的改革步子太快会造成混乱，甚至，这仅仅是赫鲁晓夫反复无常的性格使然？这些都是1955年留给我们一个谜，一个遗憾。

如果没有这次撤换，如果纳吉的改革能稳步持续下去，或许1956年的匈牙利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纳吉的改革很可能会引起某些混乱，甚至造成一些损失，但这只是一个民族复兴所必须经历痛苦。如果不愿意为民主和改革付出代价，就必然为专制和腐败付出更大的代价，以至矛盾更加尖锐，灾难更加深重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这就是1955年匈牙利给我们的启示。

1955年的反复是一个隐蔽的灾难，受害者是匈牙利民族，而不是纳吉本人。

当人民知道了纳吉的改革纲领，当人民已经比1949年更加了解这位政治家并把他当成救星的时候，纳吉第二次下台了，这更加深了人民对他的敬意和期望。

官方越是指责纳吉和他的改革，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越发加深，纳吉在人民中的威信越是提高——

我们赞赏纳吉的改革精神和措施，并不能说明纳吉在1955年的改革措施是无

懈可击的、是肯定会在实践中获得人民的支持和成功。

如果他真能有较长的时间执政，他的改革思想未必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但纳

吉的下台却使人民对此深信无疑了。

这些，使纳吉在 1955 年第二次下台后，从人民那里得到了或许超过了 he 应该

得到的支持和信任；何况，纳吉在被免除总理职务和撤销他的学术头衔后，苏联

和拉科西都要他作自我批评，纳吉拒绝了许多政治家在逆境中常采用的妥协态度。

纳吉重申：把无辜者从监狱里放出来；把土地归还给农民；增加消费品生产

的改革措施没有错。为此，他在 1955 年底被开除出党。这就在政治和人格两个方面

都使纳吉在人民心中挺立起来，成为匈牙利民族的英雄和救星。

到这里，一出悲剧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潜伏着深刻危机的历史情势；一位

崇高的、能体察人民痛苦而又多次为之献身的殉难者；还有，一个被愤怒和希望

鼓动着的民族……

没有哪一个领袖可以引导这种状态下的人民。

这就是匈牙利，这就是 1956 年 10 月。

## 五

人民已进入与历史决战的亢奋状态，他们的第一个战役便是攻打斯大林塑像

；然而，格罗却把这次行动的几十万人民称为暴徒。

10 月 6 日拉伊克的葬礼就是那样有力地冲击着格罗政权。以至他不得不在 10

月 13 日下令逮捕判处了拉伊克死刑的前国防部长、武装警察部队司令法尔卡什。

米哈依和他的儿子。

这个作恶多端、身材矮胖、说话结巴的法尔卡什是匈牙利的贝利亚。他在四

个月以前的中央全会上已被解除职务。当时，他发言为自己辩护，把执行恐怖政

策的罪责推到时代身上。最后，他竟放声痛哭起来。但没有人怜悯他。他被开除党籍，并当场就弯曲着身子离开了会议厅。

10月14日，中央政治局宣布撤销1955年上1月开除纳吉出党的决议。

这些大快人心的决定已经不能安抚民众，反而激起了人民更强烈的希望和参政意识。

拉伊克平反了，直接责任者已逮捕入狱，纳吉恢复了党籍。缺乏政治敏感的格罗便以为该做的都做了，人心已经安定，于是便放心地访问南斯拉夫去了。格罗太不了解他的人民。政府的让步既为时过晚，又没对匈牙利社会问题有实质性解决。事态急剧发展着。

10月17日匈牙利作家协会通过决议，要求召开党的特别大会以讨论人民的政治要求。

10月22日，裴多菲俱乐部执行局向党中央提出“十点要求”，要求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党的新领导；要求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要求吸收纳吉参加最高领导。

同一天，布达佩斯大学生联席会议提出“16点要求”，要求政治生活民主化，要求撤走驻扎在匈牙利境内的外国军队。

这些团体实际上都把纳吉作为政治领袖了。

10月23日，数千名大学生上街游行，声援波兰的哥穆尔卡。

哥穆尔卡是波兰前领导人，既是主张改革的政治家，又是斯大林路线的受害者，他因不同意农业集体化和亲苏政策而蹲了好几年监狱。几天前，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哥穆尔卡被选举上台执政。

波兰的胜利使匈牙利人受到鼓舞。



游行队伍穿过整个首都街道，他们一边挥动旗帜，一边呼住口号——

“工人学生团结紧，匈牙利人一条心！”

“不再容忍欺骗！公审法尔卡什！”

“错误我们已经厌倦，新政策赶快执行！”

“党要民主化，纳吉要执政！”

中午，布达佩斯广播电台播出了内务部的一条公告，宣布在目前这一时期禁止任何公众集会与示威游行。

这个禁令反而激怒了民众，起先只是站在人行道上向学生游行队伍致敬的工人也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来。游行队伍很快增加到十万人。

下午两点，政府又只好宣布取消游行禁令。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使事态更加严重，布达佩斯人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了。

傍晚，游行队伍兵分三路——

到国家电台，要求播出他们的政治主张；到国会大厦，要求与上层对话；到英雄广场去攻打斯大林塑像。

在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耸立着 25 米高的斯大林巨型铜像。这座铜像是斯大林的影子，就象格罗是拉科西的影子——斯大林死了，这座铜像还耸立着；拉科西下台了，他的亲密战友还在执政。

格罗是旧时代的证明，这座铜像是专制的象征。

铜像下聚集了一二十万人。人们仰着头，个个磨掌擦拳，几乎进入了与历史决战的亢奋状态。人们拥挤着，亢奋而又茫然，还有几分胆怯。无论怎么讲，人们面对的是一位历史巨人，是一个不久前还让他们诚惶诚恐、心惊胆战的时代。人们在等待勇气。

终于开来了几辆卡车，那上面有切割机，有粗大的钢丝绳。有人爬上塑像，把钢丝绳套在斯大林的脖子上，有人点燃切割枪在斯大林的靴子旁大干起来。这是一些工人；只有工人才有这些工具，只有工人才有这种胆量。没有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座极权政治的象征是无法推翻的。

晚上 9 时半，这座高 25 米，有好几吨重的庞然大物轰然倒下了。

望着这个倒下的巨人，人群出现了紧张而又不安的沉寂；随后，人们松了口气，欢呼起来，并且立即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

在电台大厦，由游行群众派出的 20 名代表走进电台，要求停止正常节目，广播学生的“16 点要求”。

电台未能通过有关撤走苏军和民主选举的条款，谈判破裂，事态更加严重。

晚上 8 时，电台播放了第一书记格罗的讲话。这个讲话不仅没能制止事态扩大，反而使激愤的群众骚动起来。

格罗是 23 凌晨才从南斯拉夫访问归来的；当来到车站迎接他的领导人要求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时，格罗目瞪口呆，根本不知道国内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从车站直接驱车到党中央。

会议上，格罗依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啰嗦地介绍访南情况。会场上，总有人进进出出，这些人并不是政治局成员。

格罗的介绍被打断了。开始讨论游行问题。起先通过不准游行，但也不准向游行群众开枪的决议；后来，又因为内务部长宣称，不准开枪便不可能制止游行，于是，又作出准许游行的决定。中间只有两三个小时的间隔。

格罗就是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出来向人民讲话的。然而他却采用了惯常的口吻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格罗说：“我们希望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资本主义民主。”

这等于把呼喊民主口号的群众划入资产阶级范围，他说：“人民公敌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要埋葬工人阶级的政权，松懈我党和光荣的苏联党之间的关系。我们谴责那些滥用国家给予工人阶级民主自由权利来制造民族主义示威的人们！”

这完全是一副救世主的腔调！到此时，格罗还以民主自由的恩赐者自居。

还象以往一样，格罗要人民只能把他所恩准的民主用在他允许干的事情上。

格罗的讲话无疑是火上加油。

南共领袖铁托在评论格罗这次讲话时曾说：“他把当时只不过是在举行示威游行的几十万示威者称为‘暴徒’，这样就几乎侮辱了全国人民。想一想他是怎样的一个领导者！”

格罗比不上斯大林的权威和魄力，但他比斯大林的铜像却顽固得多：布达佩斯人在10月23日推倒了那座巨像，格罗却正在这个时候还能用他那粗暴的方式训斥人民。

人民骚动起来，在电台大厦的广场上响起了匈牙利事件的第一枪……

谁也说不清这第一枪是谁先打的——是守卫电台的警卫部队，还是示威群众？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和关于冲突流血的描写往后放一放。

我们得停一停，先思考一下。在这儿，情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匈牙利流血了；重要的是这许多鲜血将会淹没人民对民主和改革的希望，还是会淹没那个斯大林牌的社会主义？

这才是举世关注，而且至今仍需重新探究的一个难题。

## 六

几十万民众呼喊纳吉，是在呼喊一个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当人们攻打斯大林塑像、并与格罗的专横对峙的同时，数十万人却聚集在议会广场呼喊他们的政治家——

“我们要纳吉！”

“我们相信纳吉！”

“格罗下台！”

人民在求纳吉出来讲话，纳吉没有出来。因为他没有任何职务。群众等了很长时间，并派出一个又一个代表团请纳吉出来与代表们见面。此时，斯大林塑像已被推倒，那里的群众也来到议会广场。

据当时的官方估计，广场上集聚了 30 多万人，这将近布达佩斯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几十万民众齐声呼喊一位政治家，那场面真是既壮观又可怕。

一位前农民党的领导人登上阳台，要跟民众讲话。这个党曾是战后匈牙利联合政府中的主要代表。它的纲领是“上帝、祖国、私有财产”。

1947 年，这个党被共产党压垮。现在，他们或许以为是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一个争取民众的时机。

但广场上嘘声大作，不让这位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讲话。

可见，即使在 10 月 23 日，在极度无组织的自发状态下，匈牙利人还是承认并接受社会主义这个现实。人民呼喊纳吉，是在呼喊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

纳吉终于被他的朋友拉到议会广场。广场上原来呼声震天，纳吉一出现在阳台上，几十万人顿时鸦雀无声。

纳吉神情焦虑，在没有麦克风的情况下作了即席讲话。

他刚喊了一声“同志们！”就被人群打断了。人群里传来有节奏的呼声：

“我们不是同志，我们不是同志！”

或许有人会以此作为匈牙利人已经抛弃社会主义的证据，因为这是一个革命的称号。

但如果想一想这个用得最滥的政治称呼早就被歪曲和糟蹋了——就象“社会主义”和“革命”被糟蹋而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了它们的神圣性一样——我们就应该理解人民一时的感情用事；其次，这也是民众的一种反叛姿态，他们希望纳吉能彻底地与他过去的“同志们”决裂。

纳吉咬着胡子，等待着喊声停下来。即使他能理解，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他毕竟有 40 年运用这个称呼的习惯了。

纳吉要求人民要有耐心，要相信党能把一切安排就绪……

显然，在此时纳吉只能这样讲。他并没有为了增添自己的政治资本，为了给政敌增加压力而去煽动盲目的热情；显然，这样的讲话不能满足焦灼地等待着重大变革的人民。

人民总是性急的，总希望在一夜之间得到一个新的世界。

这次会见就这样结束了，双方都没有给历史留下惊人之笔。

有人泱泱地离开了广场，但更多的人不甘心就此罢休。他们仍然期待着，仍然在广场上游逛，希望还能发生些什么事。

事情发生了。晚上，有人来到议会广场，说是国家保安局的武装人员在电台大厦前枪杀群众。这些人还出示了手中的废子弹壳作为证据。

这个消息将布达佩斯人点燃了，人们迅速涌向电台大厦。

匈牙利事件就在这个时刻，这个地方正式拉开了帷幕。

当人民表达自己意志的一切渠道都被堵塞，他们有无权力用暴力去表达自己的意志？这是一个难题。匈牙利人民这么做了，并且受到了本国军队的支持。

1956年10月23日晚上，在布达佩斯电台大厦前响起了枪声，流出了鲜血。

全世界都在追究：谁开了第一枪？电台警卫、保安部队、还是人民？仿佛这是问题的实质似的。

这不是问题的实质。当国家电台受到袭击的时候，权力机关用武力保卫电台，有什么错？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会这么做的；另一方面，当人民表达自己意志的一切渠道和可能都受到堵塞时，他们为什么不可以用暴力去表现自己的意志？人民又有什么错？何况，倒下去的人民毕竟比保安战士多；何况这些年轻的保安战士也属于人民。

总之，倒下去的是人民，流血的是匈牙利。

当我们从许多回忆和当时的资料中搜寻并描写开始武装冲突的细节时，并不是为了以此来判断是非，而仅仅是叙述事件的经过。

当电台拒绝了播出群众的政治要求，当格罗那种愚蠢的讲话激怒了群众后，人们推倒并焚烧了包括一辆电台录音车在内的几辆汽车，并要冲进电台直接向全国播出人民的政治呼声。

守卫电台的警卫战士端着上了刺刀的枪，阻挡人群。但战士们不得不后退，因为人们用胸膛逼近他们的刺刀。

公平地说，守卫人员并未接到开枪的命令。没有人敢于在数十万人民面前开枪。

群众进逼着，战士步步后退。他们互相大声喊叫，但都听不清对方的声音。

一些年轻的战士因为恐惧、紧张而在发抖。这时，从附近的楼顶上射来了子弹，

那上面有装备着重机枪的保安部队。

这也不是奉命开枪——没有人有勇气在这个时刻下开枪的命令。这很可能是因为慌乱而失去了控制，很可能是哪位在惊吓中失去理智的保安战士先打了一枪。混乱发生了，悲剧发生了。

人群在街上奔跑，也有人夺枪还击。正式冲突开始了。

没多久，街上出现了一支陆军摩托车队。这是国防部派来制止骚乱的。

士兵们看到群众被枪杀的场面后，不知如何是好。他们马上被绝望的人群包围了，人民要求士兵把枪给他们，以便对保安部队的残杀进行自卫。

这些士兵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子弟，他们没多加考虑就交出了自己的枪，因为他们了解保安部队的残暴，眼前的事实又给他们提供了新证据——火药的烟雾还笼罩在广场的上空。

一位士兵交出了自己的枪，其它人也学着他的样子交出了自己的枪。

陆军部又派出了部队去制止流血事件，结果是士兵们到了现场，不仅没有驱赶群众，反而向保安部队开火，并同群众一起向电台守卫部队发起进攻。

陆军总部束手无策，一位陆军将领竟断言：“派去的部队越多，投向进攻者一边的人也就越多。”

匈牙利濒临内战的深渊。

匈牙利事件是从电台大厦前武装冲突开始的，暴力和流血一开始就是这个事件的主要特征——没有冷静的思考，没有严密的计划。当几十万人拥挤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能指望理智。然而，这股非理性的力量，却比任何理智、谋略更具有威力，它迅速地改变了政治家的命运，改变了匈牙利的命运；也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八

请外国军队来镇压自己的人民是一个错误。一涉及到民族尊严和独立，匈牙利事件变得复杂了。

10月24日凌晨，匈共中央采取了两项非常重大的步骤：解除安德拉什·赫格居什的总理职务，由纳吉接替。格罗留任党第一书记。

另一项重大决定的结果是，一百多辆炮筒很长、车体很大的坦克在24日凌晨开赴布达佩斯的街头。这是约瑟夫·斯大林到的巨型坦克，它们属于苏联坦克后备队，驻扎在布达佩斯西南的巴拉顿湖边，距首都只有一小时的路程。

一小时后，这些坦克在布达佩斯主要建筑物旁、在匈共政治局驻地、在国防部、内务部摆开了阵势。

早上，国家电台公布了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同时宣布两项命令：

一、禁止集会；二、请苏联出兵恢复秩序。

这个政府公报是从国会大厦播出的，那里的一间传达室被当着播音间。广播大楼已被放弃了，人们可以自由出入。昨晚死于动乱的一具具尸体仍然扔在院子里。

这次公报的播出没能制止事态，反而使动乱向全国蔓延。

不错，人民的政治理想实现了一部分——纳吉又一次上台执政，然而这个胜利是被苏联坦克送来的。请苏联出兵，显然是针对着正与政府处于对抗位置的人民的。这无形中使他们为民族命运的奋斗受到玷污而沦为需要镇压的暴徒；更重要的是使他们的民族感情受到伤害。

这个民族几个世纪以来，为了自己的独立，一直在为推翻土耳其人和奥地利人的统治而浴血奋战。他们的民族自尊心是那样的敏感。



现在——1956年10月24日，面对着街头的苏联坦克，愤怒的人民更加愤怒了，盲目的力量更加盲目了，被动乱模糊的目标更加模糊了。匈牙利事件将脱离任何政治家和任何阶级的控制而向前发展。

中午，双方的火力减弱了，布达佩斯一度趋于平静。新任命的政府首脑纳吉要发表首次广播讲话。

人民紧张地等待着。这是匈牙利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刻。纳吉面临着一个政治家所能经历的最严重的考验。

纳吉开始讲话了：“布达佩斯市民们！我现在宣布，所有今天14点以前放下武器和停止战斗的人将不以军法论处；”

仅仅是这个开场白，就使人民过于急切的希望受到了伤害。几乎同时，布达佩斯又响起了激战的枪声。

纳吉以后的讲话是在枪声的伴随下传来的。纳吉答应他将尽一切力量实行三年前的政治纲领——尽快使匈牙利人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民主化；同时，他呼吁停止战斗，停止流血。

纳吉的呼吁已经不能平息被死亡、流血和外国坦克所煽起的愤怒和复仇情绪了——人民要求对拉科西—格罗时代的罪恶进行彻底清算；要求对保安部队的屠杀进行审判并动用军队进行剿灭；人们要知道此时在布达佩斯街头巡逻的苏联坦克到底是谁请来的；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形势下，人民不需要保证、许诺，而需要一位政治家和一个政府采取切切实实的行动。

外国军队到底是谁请来的？这个问题与电台大厦前的第一枪到底是谁放的同样难回答。只是它比前一个问题重要，它使匈牙利事件更加严重，更加复杂了。

许多材料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一致的，有的说是格罗，有的说是赫格居什，

还有的说是纳吉。但我们宁愿相信 10 月 24 日出现在布达佩斯的苏联军队是格罗请来的，因为他当时担任着第一书记这个最高职务。

铁托曾经为此对格罗进行了直接了当的批评。

铁托说：“军队是格罗请来的，当示威还在进行的时候把苏军请来，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请别国的军队来教训自己国家的人民，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举动结果更进一步激怒了人民，因此发生了自发的暴动。”

人民暴动了，开始是为了民主自由，后来又为了民族独立。与任何民族一样，只要问题一涉及到民族尊严和独立，这个民族的阶级关系便会立即发生急剧的变化。到此时，更难以给匈牙利事件定性了。

各个阶层的人都在行动；因此，各种立场的人都不难为自己对匈牙利事件的定性找到根据。

## 九

共产党员被杀是事实，杀共产党员的人中有共产党人这也是事实。这两类共产党中，哪一类的政治主张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原则和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呢？匈牙利没有爆发全面内战，这或许与 10 月 24 日的苏军出动有关。然而混乱的政治局面却加剧了：民众与政府的对话基本中断，上层和下层各行其是，双方的相互影响都减弱了……

这几天，我们看到过爬上政府机关大楼摘下红五星——那是革命的象征——的人，这些人，是仇恨革命的反动分子，还是对革命失去了信心的人民？说不清楚。

我们还看到过巨大的、被挖掉了国徽——政权的象征——的国旗。挖掉这个由拉科西亲自设计的国徽后，那面红白绿的三色旗便可以充当匈牙利任何时代的

国旗了。国旗上的这个大窟窿，是妄图复辟的反动派挖的，还是对现政权不满的人民干的？也说不清楚。

在一些地方，保安人员和一些党的干部遭到杀戮，这到底是敌人的阶级报复，还仅仅是人民对一些平时作恶多端的人的惩罚？或许，两种答案都是正确的。

最令人震惊的是暴动者对布达佩斯市委大楼的进攻。

大楼的数十名保安人员和警卫战士在被围困的情况下，与群众发生枪战。后来，由于寡不敌众，无法坚持，于 30 日下午由市委书记——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麦泽和他的战友打着白旗率领下，战战兢兢地走出了大楼。

走在最前面的麦泽立即被一梭冲锋枪子弹撂倒。其余人几乎刚走出大楼便被击毙，尸体遭到了残忍的蹂躏。

这个事件是所有给匈牙利事件定反革命性质的人必定引用的证据。他们说，匈牙利在杀害共产党人。

这是匈牙利悲剧的一次高潮。因此，我们有必要来看看市委大楼是由什么人，用什么方式攻下来的。

10 月 30 日上午，群众包围了市委大楼。出于对一个暴戾政权的内幕的好奇，许多人要冲进楼里去看看。警卫从楼上向接近大楼的人开枪射击，于是发生了枪战。

被围困在市委大楼的守卫和市委领导在绝望中向国防部求援，但由于驻扎在首都的坦克部队拒绝与人民作战，国防部只好从外省派去三辆坦克。

坦克刚到现场，群众便说服了坦克手，说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是“保安部的人”。坦克兵没有多加考虑便掉转炮塔向大楼轰击，第三炮就打开了缺口。

于是出了我们前面描写过的悲惨结局。

这是共产党的军队，我们不能说里面没有共产党员；在以后的战斗中，我们还能从武装组织的组织者和成员中找到共产党员。因此，共产党员被杀是事实，杀共产党员的人中间有共产党员也是事实；就象人民要推翻的拉科西、格罗是共产党人，而他们需要拥戴上台的纳吉也是共产党人一样。我们要探讨的是这两类共产党员中，哪一类的政治主张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原则和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当然，如果象西方那样，说匈牙利事件是一场革命，是一次纯粹的人民起义，那是不严谨的。

各阶级的人都在行动，都妄图插手这场开始时纯粹是自发的群众运动。连拉科西这具政治僵尸也不例外。

在莫斯科的拉科西知道了动乱的消息后，以为是他的一个机会，他报告莫斯科说，他要回到匈牙利去帮忙。

赫鲁晓夫的回答是：“您可以回匈牙利去，但那里的老百姓将把您吊死！”

然而，拉科西怀着被希望鼓起的政治热情要求与国内通电话。苏联电话员拒绝给他接通。

马林科夫事后挖苦这位前国家元首的政治冲动说，这表明电话员在政治上比拉科西成熟。

拉科西没能得到行动的机会，但其他的反动阶级确实行动了。

由于动乱期间边境的开放——尤其是西部边境，许多流亡国外的霍尔蒂政权时期的军人、政客潜回匈牙利，企图利用动乱复辟旧的统治。然而，这些右翼法西斯分子只是隐藏在人民之中，不敢公开暴露自己的身份，更不敢喊出他们的政治口号。说这些人能在事态的发展中占据优势，并操纵了几十万参加暴动的人民，是令人怀疑的。

在匈牙利事件中，具有一定权威又公开过反社会主义纲领的，是匈牙利红衣主教明曾蒂。他是 10 月 30 日政治犯大赦时被释放的。

这个在解放前被称为“国家第一旗手”的红衣主教，显然怀念着几个世纪以来红衣主教所拥有的不低于国王的政治权力；他显然妄图利用这次机会要把废除了君主制的共和国废除掉。

明曾蒂确实采取了行动。在最混乱的 11 月 3 日——也就是苏联第二次出兵的前一天，他曾发表广播讲话：呼吁恢复资本主义，恢复教会的经济、政治权力，号召赶走纳吉政府……

这也证明纳吉没有使他的复辟愿望得到满足。

不过明曾蒂主教的行动也不过是呼喊而已，第二天，他就由他的随从护送到美国大使馆避难。并且很快就明白了一个主教对国家事务指手划脚的时代是永久地结束了。

所有这些都被作为“反革命在匈牙利行动”的证据。

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行动对匈牙利事件产生了直接的、举足轻重影响的证据。

另一个反面的证据，是鼎鼎大名的“裴多菲俱乐部”。

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裴多菲俱乐部在匈牙利事件中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拉科西曾经在下台前夕，称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是“反党反人民的”，说它的成员是“集合在纳吉周围的右派分子”。

在匈牙利事件后，几乎所有将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的人都说，裴多菲俱乐部是资产阶级的文人组织，是反革命的舆论工具，是反革命事件的发起者和组

织者之一。

实际上，裴多菲俱乐部的领导机构——执行局的 20 名成员中，有 13 人是共产党员。其中有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青年联盟的中央书记、宣传部长和布达佩斯青年联盟书记；还有一些科学家、新闻记者、作家和大学生。这个旨在争取民主自由的团体，从 1956 年 3 月成立以来，多次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就拉科西的政治路线进行讨论和批判。拉科西的下台，拉伊克的平反，纳吉的上台；尤其是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思考和批判，对社会主义民主、改革的争取等，裴多菲俱乐部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裴多菲俱乐部，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叫佐尔坦·多哈尼的保安部中校，工人出身，行为粗野。保安部军官身上所有的专横、优越感他身上都有。他说过，一个保安部的下级军官胜过一个警察局长，甚至一个部长。

1956 年春天，多哈尼中校和另外几位保安部军官被派到裴多菲俱乐部参加各种集会，并要求他们将那些演讲者的思想言论记录下来以向保安部汇报。

后来，他们参加各种讨论的次数越多，受到他们从未听到的改革思想的影响越大。结果，他和另外被派往裴多菲俱乐部的保安部军官共同写了一份备忘录，表示赞同裴多菲俱乐部的观点，赞同党内改革派的主张。

拉科西为这件事大发雷霆。在拉科西的责令下，保安部要这些人选择：要么撤回签名，要么受到审判。

许多人屈服了，只有佐尔坦·多哈尼拒绝改变自己的立场。他被撤销职务并开除军籍……

这位中校的下落没有人交待过，他会不会在 10 月事件中成为一位有军事经验的战斗者呢？

这就是裴多菲俱乐部，这就是裴多菲俱乐部的影响。但必须说明的是，即使裴多菲俱乐部确实对匈牙利事件有过我们说的这些重大影响，也仅仅限于运动的初期。

那么，在 10 月 23 日事态扩大之后，除了苏联的坦克之外，到底哪一个人和哪一个组织能具有权威和力量，能在匈牙利历史上写下生死攸关的一页？

这是纳吉和他的新政府——尽管这个答案仅仅是相对而言。

十

该做的，纳吉都做了——十分艰难地做了。他在一周内所做的事甚至比一个幸运的政治家一生所做过的还要多。

历史上很少有哪一位领袖会比纳吉在 1956 年 10 月 24 日后短短几天里所面临的危机更深重，更多——

被仇恨、被希望、被流血、被外国坦克、被无政府状态刺激得狂暴而又茫然的人民；已经下台而怀着敌意的政敌；准备上台而偷偷窥视的反对派；想以武力维持秩序却引起了民族冲突的苏联军队；妄图复辟旧制度的法西斯右翼分子；趁机混水摸鱼的流氓、犯罪分子……

这些就是纳吉政府——仓惶中刚刚成立一天的新政权在 10 月 24 日所面临的局势。

处理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需要政治家有冷静思索、稳妥处理的时间和机会。政治常常需要耐心、需要退却、需要等待，然后才可能决断、进攻。这些纳吉都没有，他必须迎上去，没有丝毫思考、迂回的余地——

10 月 25 日，纳古宣布免除格罗的职务；10 月 26 日，讨论改组政府；10 月 27 日，宣布新政府成员名单，非共产党人进入新政府；10 月 28 日，匈共领导由一个 6 人

主席团接管；同日，纳吉要求与苏军指挥员进行撤军谈判。

10月29日，为恢复布达佩斯的秩序，成立了由军队、警察和暴动者组成的国民警备队；同日，宣布废除一党制，建立多党制政府。

10月30日，宣布多党制政府内阁成员名单，其中共产党（劳动人民党）3人，小农党2人，民族独立党1人，社会民主党1人；同一天，纳吉代表政府促请苏联军队立即开始从布达佩斯撤退；也是这一天，纳吉任命了国防部长、布达佩斯驻军司令。

10月31日，宣布解散匈牙利共产党（劳动人民党）重建新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当然还是共产党）；这一天，纳吉宣布苏军将撤离布达佩斯；宣布取消国家安全局；宣布起事者将编入国家的武装力量组织；宣布提高工资和退休金，调整工资……还是这一天，以纳吉为首的匈牙利政府代表团与以米高扬为首的苏联代表团举行会谈。纳吉提出4项原则：

一、立即撤回苏军；二、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三、匈牙利重新确立多党制政权；四、准备自由选举……

……

从10月25日到10月31日，一周时间，哪一个政治家，哪一届政府处理过如此众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中，哪一条不是涉及到一个民族的命运？不是涉及到半个世界的命运？

我们可以说纳吉的这些措施不全是正确的——哪一个政治家敢说他面对如此纷乱严重的政治局势，可以不犯错误？但如果说纳吉在1956年10月的最后几天是软弱无力、束手无策则不公平！

纳吉都做了——十分艰难地做了。他在这一周内所做的事，甚至比一个幸运



的政治家一生所做过的都多。

可是采取了这些重大步骤，取得了这些明显进展后，纳吉就可以松一口气、

读者也可以松一口气了吗？

本来是这样的，连苏联都在 10 月 30 日发表政府公报说：“纳吉政府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从匈牙利全国各地源源而来的报道表明，工人支持新政府，并赞同它的纲领。”

然而——这是一个该诅咒的然而——历史上常常有许多说不清楚的谜，有许多无法预料的偶然。既然历史一开始就给纳吉和匈牙利安排了一场悲剧，匈牙利人便只好用鲜血来浇灌民主和独立之花；纳吉也只好为他的思想而牺牲他的生命。谁能逃得过历史的劫难呢？

十一

苏联大军压境，纳吉采取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袖所敢于采取的最重大行动——废除华沙条约，宣布匈牙利中立；同时，纳吉的好几位部长失踪了……

10 月的最后几天，尽管动乱尚未平息，尽管还发生了攻占市委大楼的惨案，但有两件事表明，匈牙利局势的好转已经指日可持：

一是民间分散的武装力量正在组织起来，并逐渐控制到以工人阶级为主的人民手中。许多军工厂——尤其是全国最大的“兰帕尔特”军工厂——的工人都武装起来，并用他们自己生产的武器把其他工厂和当地居民也装备起来。

民间武装力量中两支最大的队伍都是由工人组成：一支是由切佩尔岛的青年工人山多尔·安乔尔指挥。他 18 岁参加匈牙利共产党；另一支由布达佩斯附近的工人蓬格拉兹兄弟领导。他们拥有反坦克武器和十几辆破旧的苏式坦克。

在 1956 年 10 月，他们的名字是尽人皆知的。苏联第二次出兵后，山多尔·安

乔尔被俘并被判死刑，他临刑前的遗言是：“宁愿死去，也不在耻辱中活着！”

蓬格拉兹兄弟则在失败后率领他们的队伍撤到西部边境并超过边界。

军官学校的学生也投入到人民之中。一些陆军兵营打开了武器库向群众分发

枪支。由于苏联坦克的出现，人民获得了更多的武器并与警察和部队并肩作战。

当然，与苏军的武装冲突也干扰了人民尽快地控制局面、平息动乱。

另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所有的这些民间武装力量都被编入国家的武

装力量组织——国民警卫队。

10月29日，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联合司令

部。国防部高级军官基拉伊。贝拉少将被选为总司令，布达佩斯警察局长山多尔。

科帕奇上校被选为第二司令。他们都是匈共的老党员。

大会确立了武装力量的任务——尽快恢复公共秩序！

仅一周时间，匈牙利形势基本明朗，尽管各阶层的人都在行动，“但行动的

主力是工人阶级”；尽管有反动分子干扰、有流氓地痞混水摸鱼，但在10月的最

后日子里也有过这样的奇迹：在橱窗玻璃被粉碎了的珠宝商店边，有暴动者站岗，

谁也不许染指这些贵重物品。

这是1956年10月一个非常辉煌的成绩。在动乱初期的小混乱和苏联第一次出

兵引起的大混乱之后，有了这些重大步骤，我们可以指望工人阶级和新政府完全

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匈牙利问题。

纳吉政府加紧了与苏联关于撤军的谈判；苏联政府也于10月30日发表声明：

“鉴于苏联军队继续留驻匈牙利可能导致局势更加紧张，苏联政府已经指示自己

的军事司令部，一俟匈牙利政府认为必要，即将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

这个声明是值得称道的，是鼓舞人心的。

匈牙利事件时期一直在两国政府之间进行斡旋的米高扬在这个时候，曾对匈牙利新成立的武装力量的负责人说：“我们现在必须离开贵国了，请你们尽力协助纳吉同志。”

同时，米高扬又握着纳吉的手说：“纳吉同志，凡是该拯救的都要拯救！”

然后两人拥抱，热泪盈眶。

米高扬把匈牙利的命运交给了匈牙利人，把半个世界的命运交给了这位政治家的这次伟大实验。

这是一个让人落泪的场面。

大家都知道匈牙利人接过的这种嘱托有多么沉重。

纳吉知道自己肩上的历史重负，但他是满怀信心的。

纳吉在此历史关头宣布：“两国的军队领导人将举行会晤，坦克将撤离首都；3个月之内苏军全部撤离匈牙利。我们将举行普选；各民主党派可以提自己的候选人……社会主义成果当然不能倒退；土地、银行、工厂将继续掌握在国家手中。”

与苏军的谈判开始了。匈牙利方面由国防部长马勒特尔为首席代表。谈判先在匈牙利议会大厦，后在苏军总部。马勒特尔每隔半小时向政府汇报一次谈判的细节。

会谈的气氛是令人愉快的。重要问题已经解决，他们进一步协商的只是关于撤军的技术性问题：苏军的告别讲话，向撤退部队献花，战争物资的运输问题…

...

然而，就在这种喜庆的气氛下，却有消息传来：更多的苏联军队正在向匈牙利挺进。

纳吉召见了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请他就此作出解释。

安德罗波夫说：苏联政府将遵循有关撤军的声明，至于匈牙利政府所观察到的部队动向只是一种撤离的方式。

10月31日，纳吉再次召见安德罗波夫。他说，“军事专家已无可辩驳地证实，新的部队已越过边境，因此，匈牙利直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并立即生效。”

当天下午，安德罗波夫又被请到议会，正式将中立宣布书交给他。

11月1日，纳吉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郑重宣布：阁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以它指的外交部长身份荣幸地通知如下：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获得可靠消息：更多的苏联部队正在开进匈牙利来。部长会议主席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召见了苏联驻匈牙利特命全权大使尤·安德罗波夫，并且对更多的苏联部队开进匈牙利提出了他的最强硬的抗议。他要求这些苏联部队立即马上撤退。他通知苏联大使说，匈牙利政府立即废除华沙条约，同时，宣布匈牙利中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56年11月1日宣布中立。因此，我请求阁下立刻把匈牙利的中立和4大国保卫这种中立问题，列入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的议程。

历史向纳吉政府和匈牙利民族显露出狰狞的面目。

随着这一令人心惊胆战的凶兆出现的，是一个来自内部的更加凶险和不祥的消息——新政府的部长失踪了。

11月2日，纳吉召见了他的武装力量负责人。纳吉摘下夹鼻眼镜，用深深忧伤的目光注视着他的部下说：“提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知道内务部长现在何处？”没有人知道。

纳吉和他的办公室主任交换了一下眼色后继续说，“第一书记卡达尔也同样

无从寻找。”

所有的人都被这耸人听闻的消息惊呆了……

十二

1956年11月4日是广播史上的耻辱——政府在电台广播里寻找国防部长以及去苏军总部谈判而失踪了的军事代表团；总理在电台用四种语言向全世界通报外国军队攻进了匈牙利首都；作家在广播中向全世界呼救：“救救我们……”

苏匈两军领导人的谈判还在继续。到11月3日下午，国防部长马勒特尔还电告政府，说谈判仍在进行。而此时，苏联军队有20万人，12个师——其中8个坦克师，正向通往布达佩斯的主要公路上的两个作战地集结。

将近午夜，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伊万·亚历山大·谢洛夫将军带领着几名全副武装的军人，突然出现在特克尔的苏军总指挥部，他们冲进正在进行苏匈会谈的谈判厅。

谢洛夫手握大毛瑟枪，他的随从立即包围了谈判桌。

“你被捕了！”这位苏联将军向东道国的国防部长宣布。

马勒特尔从座位上跳起来，迅速地摸到腰间的手枪。但他马上改变了主意，

只是仰天大笑一声：“哈哈！原来如此……”

匈军代表团成员全被解除了武装。苏联人把他们单独囚禁起来，然后用一架小飞机把他们送到一个兵营关押起来。

政府与谈判代表的联系中断了。纳吉政府派出一辆匈牙利军队的坦克，炮塔上挂着一面大白旗，开往苏军司令部，去寻找参加谈判的匈方代表团。

这辆坦克一路上不断地用无线电发回消息：“我们已经到了特克尔……我们停车……有士兵向我们跑来……我们要下车向他们的指挥官报告了……”

守在无线电接收器前的纳吉听到了俄国人的说话声，以后，便什么也听不见了……

人们面面相觑，然后把视线移到他们的总理身上。

纳吉沉默着，没有流露出丝毫惊慌的神情，有的只是疲惫和深深的绝望。

到此时，这位在苏联生活过 15 年的匈共领导人已经放弃了任何幻想。

苏联军队第二次开进了布达佩斯。这一天是 1956 年 11 月 4 日。

匈牙利人不会忘记 11 月 4 日。

11 月 4 日曾经有过美好的希望。这一天是星期日，纳吉政府曾经制定了“星期日行动计划”——要在这一天彻底清查首都，要在这一天实现除士兵和国民警卫队外，将不再有任何武装分子。

为了这个计划，国民警卫队和 80 多个大工厂的工人委员会、十多所大学将采取联合行动。

有了这样的行动，匈牙利在分娩的阵痛之后，将开始新的生活；有了这样的行动，布达佩斯街头将不再有动乱，工厂将复工，机关将办公，商店将营业，孩子们将背起书包上学——匈牙利人已经流过血、已经付出过代价了，他们应该得到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

然而，这仅仅是匈牙利人的计划，仅仅是 11 月 4 日的理想；现实的 11 月 4 日是沉重的。

11 月 4 日凌晨 4 时，轰鸣的坦克声粉碎了这些理想和计划。

头天晚上，纳吉没有回家，他留在国会大厦，沉着地等待着最后的灾难。这是具有深刻绝望的人所有的那种沉着。

纳吉以极大的权威拒绝下达武装抵抗的命令，他不愿意让匈牙利人无谓的流

血。他对要向他汇报工作的战友说，“已经毫无益处，我的朋友，谢谢，谢谢各位。”

他的政府历经了 13 天艰难困苦的生存后，结束了自己的使命。纳吉能做的只是向全世界宣布死亡前的最后存在。

纳吉尽到了一个国家元首的最后职责。

清晨，纳吉在国会大厦用 4 种语言向全国、全世界，向人类的未来广播：

“我是匈牙利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伊姆雷·纳吉。苏联军队已于今天早晨开始进攻首都，公然企图推翻匈牙利合法民主政府，我们的军队正在战斗。政府依然存在。我向匈牙利人民和全世界通报这一情况。”

但愿世界上任何一个电台将永不再播放这样的广播，但愿所有国家的人民都不会听到他们的领袖作这样的讲话。

这真是广播史上的耻记和不幸。在纳吉的讲话播出之前，电台一直反复播出一个军人的声音：“国民政府主席纳吉在呼唤国防部长帕尔·马勒特尔、总参谋长伊斯特万·科瓦奇将军以及其他昨天 22 点去苏军总司令部、但现在还没有回来的代表团成员。他命令他们返回，立即行使他们的责任！”

纳吉的讲话之后，广播里传出来的是匈牙利著名作家哈伊震招人心的呼吁：

“我向全世界，向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呼救！请帮助我们吧！”

十三

纳吉的改革——从取消国家保安局到废除一党制，即使是社会主义的，也是 1956 年的历史所难以接受的社会主义。

苏联的第二次出兵也是应匈牙利政府邀请的。这个政府就是 11 月 4 日宣告成立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它的主要成员正是 3 天前失踪的纳吉政府的部长们。

我们不应该对一个国家的政权更替说三道四，何况这个政权的首脑卡达尔也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一个在拉科西时代蹲过监狱、服过苦役的政治家。为此，我们必须将 1956 年留给我们的另一个难题——如何评价匈牙利在半年之内成立的第三届政府——暂时放一放。而回到我们先前的思路：纳吉的改革和失败的经过。

纳吉于 11 月 4 日和他的追随者 42 人躲进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并获得了政治避难权。

纳吉彻底失败了，他的一切都失去了，只剩下失败者自身的检讨和胜利者对他的命运的宣判。

纳吉的改革方式与赫鲁晓夫完全相反。赫鲁晓夫主要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几乎无建树可言；更重要的区别是赫鲁晓夫的改革是用官僚反对官僚——即用技术官僚取代政治官僚，他没有试图以民主政治（这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去取代官僚政治（这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的异化状态）。这两条是赫鲁晓夫失败的主要原因。

纳吉是在匈牙利面临着深刻政治危机时主持政府工作的，他当然只能从政治体制的改革着手而无暇顾及经济体制改革；第二，纳吉的改革一开始就由人民参与，可以说是政治家与人民携手并进，甚至还可以说是被动于人民的政治热情和政治愿望。

在这主要两点上，纳吉与赫鲁晓夫完全不同，然而他们的结局却是相同的——赫鲁晓夫失败了，纳吉也失败了。

我们绝无责备人民的意思，我们绝不认为政治——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治，只是政治家的事；我们绝不相信没有全社会的关切、参与，社会主义的改革就可以



成功。

我们要说的是：在 1956 年，匈牙利人民所爆发出来的更多的是狂热，却很少理智；更多是对过去的仇恨与报复，却很少对未来的思考。它不象 10 年以后，由捷克斯伐克全民族发起的那场伟大的改革运动。那一次，捷克斯洛伐克人不仅满怀热情，而且还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智慧和意志，表现出经过几十年痛苦思索的成熟。这些，在 1956 年的匈牙利人身上是不够的。

这是历史的局限，也是纳吉的不幸，他被人民的狂热推去攻打历史，却没有坚固的后方阵地，没有精心策划的作战部署。他只能前进，只能冲上去……他取消了国家保安局，他改组了武装力量。这些都没有关系，尽管会发生一些混乱，但人民最终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护社会的安定。

他彻底改组了政府。这是应该的，让那些与人民对立、被人民憎恨的人退下去，让一些人民信任的人站出来。

他直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中立。问题出现了：在那个夸大阶级斗争的年代，在那个不是朋友便是敌人的口号下，这一举动无疑使纳吉成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成了匈牙利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证据，成了邀请苏联出兵干预的堂而皇之的理由。然而，在今天看来，不入伙、不结盟照样可以干社会主义。道理就这么简单。

纳吉直布了取消一党制。问题严重了，这无疑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取消了社会主义。当时，即使在同情匈牙利事件、赞同纳吉的许多的共产党人中，都认为这是纳吉对反动派的让步，认为纳吉走得太远了。

这个问题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复杂的。今天，只有欧洲共产主义者才承认纳吉在 1956 年实行的、在多党合作的基础上成立社会主义政府的可能性。我们暂时

还说不清楚这个问题。现在能说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从来没有说过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是一党制；我们还能说的是，接任纳吉的匈共领导人卡达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过“如果当时保留了多党制那就好了”。

为什么好？因为取消多党制不仅对反对意见，连不同意见都不能容忍了。党内生活只剩下千篇一律的赞同，这对社会主义政治的毒害可以说是致命的。

纳吉在人民政治热情的驱使下所采取的这些改革措施，到底应该如何评价，也是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我们只能说，即使这些措施是社会主义的，也是 1956 年的历史所难以接受的社会主义。

我们说这些并不是要证明人民是盲目的，纳吉是清醒的，也并不证明纳吉超越了历史，超越了他的人民。纳吉最后几天所采取的重大行动不能不归之于人民的愿望和敦促。这就是匈牙利人民在短暂的狂热和混乱之后，所作的对未来的思考和选择。

这也是 1956 年的另一个事实。在这里，我们特别是提一下匈牙利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工人委员会在匈牙利事件中的作用。

#### 十四

几十万人的自发行动难免有狂热、有盲目、有混乱。但人民终于找到了表达自己力量和意志的形式——工人委员会。

我们已经说过，在匈牙利事件中，行动的主力是工人阶级。这种状况即使在 11 月 4 日以后的好几个星期中也是这样。

纳吉政府被推翻了，新政权的领导并没有立即回到布达佩斯。这时，在匈牙利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各革命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实际上领导着人民——组织反抗运动，与苏军进行谈判。11 月上旬，中央工人委员会成立，同时宣布，在全国范

围内实行总罢工，直到苏联军队完全撤离为止。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央工人委员会进行了公开的、有效的活动。它直接参与政府的政治事务，并以主人身份跟苏军接触。一些重大会议也通知政府和苏军总司令部的人列席，以向他们宣布表达了工人阶级意志的重大决议。

新成立的工农革命政府曾同意工人委员会和各革命委员会作为政治协商组织，帮助政府工作。

11月23日，不少苏军高级军官被请到中央工人委员会参加会议。这天是匈牙利事件一个月纪念日。

下午4时，中央工人委员会主席山多尔·拉茨突然站起身来向全场宣布：

“从现在开始，一小时内，人们在首都大街上将看不到任何活的灵魂。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纪念我们那些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阵亡的殉难者。我们在座的所有人要静默一分钟。”

这是匈牙利工人阶级的觉悟、尊严和力量的体现，它迫使苏联军官承认了匈牙利工人阶级的权威。

苏联军官也和工人一样站起，唱匈牙利国歌，并同样脱帽向一个月前死于暴乱的牺牲者致哀。

苏联军队承认了工人委员会是真正的工人组织。苏军总指挥部甚至还给工人委员发放了允许携带武器的通行证。

12月初，当在南斯拉夫使馆避难的纳吉走出使馆并被苏军劫持后，中央工人委员会曾指示所有的工厂，在纳吉返回之前实行总罢工。当时，所有的工业部门都停止了生产。连机关、学校、服务行业也关闭了。

要说明的是，这些工人委员会的组成完全是自发的，它的领导成员是通过民

主选举产生的。在 1956 年底，工人委员会确实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难道不是 10 月的成果？不是用鲜血换得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遗憾的是，这一民主形式只存在了一个多月。

1956 年 12 月 6 日，中央工人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被请到苏军总部。还是那位逮捕了国防部长的苏联将军谢洛夫宣布了他的命令：“该结束了。你们不要再向我们提出任何过份的要求，也不要无限期地延长罢工。你们应该为我允许你们重新离开这间房子而感到高兴。”

12 月 8 日，政府明令取缔各类工人委员会、革命委员会。

12 月 9 日，中央工人委员会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它的一些由匈牙利所有工厂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领导人也在家中被捕。

工人没有屈服，作为回答，已被取缔的中央工人委员会于 12 月 11 日宣布举行全国新的总罢工。

12 月中旬，工人、群众在与政府的对抗中发生了武装冲突。这结果是更多的工人领袖遭到逮捕；同时对纳吉的个人命运产生了悲剧性影响。

作为一个新政权，为了尽快恢复秩序，尽快恢复濒临崩溃的经济生活，而对动乱诉诸武力，或许可以理解。但我们不同意说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除此别无选择；而如果要给这种镇压打出捍卫社会主义的幌子，要给工人委员会安上被反革命分子利用、按反革命的指示行动的罪名——这几乎成一切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国家压制民主的通用理由——则让人更难接受了。

南共领导人卡德尔在 1956 年底就为匈牙利事件中的工人阶级作过辩护。

卡德尔说：“硬说工人阶级在获得自己胜利的 11 年后，跟着反革命跑了，这难道会使社会主义的良心感到安慰吗？即使我们假定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毕竟

还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应该对工人阶级使用大棒呢，还是应该对把工人阶级弄到使它不得不起来反对自己的历史利益这种荒谬地步的政治制度使用大棒。”

为了恢复秩序，为了拯救社会主义而必须诉诸武力——甚至是外国武力。这是匈牙利事件自始至终所遵循的逻辑。可是人们忽视了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恢复的是旧秩序呢？如果挽救的是他们正在批判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呢？那么匈牙利付出的代价就不仅仅是镇压中的流血和死亡了。

这一点不幸被事实证明了。

历史刚跨入 1957 年，新的政治恐怖又笼罩着布达佩斯。

1957 年元月 19 日，“一夜之间在布达佩斯逮捕了 2000 多人，其中有著名作家、工人领袖和党内受尊敬的异议人士。”

当天夜里，在福乌察监狱的大院内进行了屠杀。

这次镇压的结果是 20 万匈牙利人——绝大多数是青年离开了匈牙利，这在人民中造成了“一种恐怖心理，好象虽然没有了拉科西，但新的拉科西时代重新在匈牙利出现”。

这就是匈牙利付出的代价。

假设匈牙利人在 1956 年作另一种选择；让工人阶级和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政治、运用民主权力呢？很可能他们会犯一些错误——政治家不犯错误吗？——会在初期出现一些混乱，造成一些损失，但我们能不能指望他们迅速成熟并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呢？

谁也不应该作否定的回答——如果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如果他愿意相信一个阶级的力量、一个民族的智慧的话。

如果可以肯定这种回答，那么我们要再一次说：不愿为民主付出代价，便会为专制付出更大的代价。数千人被捕被杀，数十万人逃离祖国，证明了这个真理；纳吉的悲剧结局也证明了这个真理。

## 十五

纳吉被判处绞刑。当这次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的处决执行时，这位中欧的伟大政治家为所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人留下了一声既痛心又费解的呼声：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11月4日，纳吉和他的41名政府要员及家属，刚躲进南斯拉夫大使馆。苏联的坦克装甲车便包围了使馆大楼。

避难者和大使馆都经历着难以形容的困难。苏联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要他们交出纳吉；大使馆受到机枪射击，有外交官被打死：“难民”的治病、吃饭成了问题。

匈牙利新政府对纳吉的态度比较宽厚和矛盾；有人建议同纳吉谈判，有人则认为不妨让纳吉去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党。

纳吉等人在大使馆内渡过了17天后，由于南斯拉夫的多方调解、谈判，匈牙利政府终于在11月21日致函南斯拉夫政府，表示匈牙利新政权“不想就纳吉和他的集团的成员过去所做的事实行惩处，”“他们将自行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并自由地返回自己的家……”

南斯拉夫和纳吉都接受了这一条件。

11月22日，也就是在匈牙利政府发出保证的第二天，匈牙利政府派出一辆公共汽车接这些难民回家。车刚开出了大使馆，就被苏联装甲车包围。

苏联军官闯入车内，将两名监督执行这一协议的南斯拉夫外交官拉出车外。

在苏联坦克的监护下，这辆公共汽车开到了苏军总司令部。纳吉和他的朋友拒绝下车，但被强行拉出来。难民中的妇女孩子也遭到同样对待，吓得直叫。

第二天，新闻界发表一条消息说，纳吉和他的朋友“根据自己的要求”去了罗马尼亚共和国。

纳吉被劫持的消息使全国为之震惊，中央工人委员会向全国所有工厂发出号召，实行总罢工，直至纳吉回来；同时，中央工人委员会就纳吉的安全向新政府提出质询。

11月26日，政府通过电台答复：“我们说过，对纳吉和他的朋友们的言行不予法律追究……我们将遵守这一诺言，我们不认为他们的外出是永久性的。”

然而，人民的支持和政府的保证都未能挽救纳吉的命运。

在罗马尼亚，纳吉和他的同志们受到了审讯。他们被要求承认13天的政权是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这是他们返回匈牙利的条件。

纳吉拒绝了这场交易，并断然否认了指责他的任何罪名。

于是一天早晨，这位政府首脑被拷上手铐，带进一架苏联军用飞机。机舱内，他的部长们已经坐在那儿，也戴着手铐。

纳吉的政府就是这样返回了他们的祖国。

对这位有40年党龄的共产党人、这位社会主义政权的最高领导人、这位对现代社会主义进行改革的政治家的审判开始了。

这是一次历史对人的审判。

审判的另一方也是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法庭；审判是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的。

审判一开始，这两个不同的社会主义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

检察长以庄严、冷峻的声音问了第一句话：“职业？”

纳吉站立起来，扶正他的夹鼻眼镜，平静地说：“匈牙利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检察长愣了一下，大厅里一片沉寂。

此时，历史胆怯了，法律也胆怯了。

庭长拉多轻轻地对不知所措的书记员说：“前部长会议主席。”

纳吉立即给予反驳，但声音依然是平静的。

“不，据我所知，我被任命此职是在 1956 年 10 月 24 日。迄今为止，任何合法机构都没有对此任命提出过异议。”

庭长又问：“被告是否认罪？”

纳吉严厉地问答：“不！我无罪！”

审判台上的人又一次陷入短暂的沉默并且低下了头。

纳吉不象失败者，纳吉不是失败者。

为恢复被玷污的社会主义，他走完了艰难的第一步。

纳吉不仅是改革家、是领袖，也是人们的楷模。无论在政治斗争中，还是此

刻在胜利者的法庭上，他都能以政治家的魄力和人格力量为他的部下作出榜样。

紧接着是对国防部长帕尔·马勒特尔的审判。

“职业？”

“国民军总监，匈牙利共和国国防部长。”

“前国防部长。”

“不，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从未撤过我的职。”

纳吉证实了这一点。这位年轻的战士与他的年老的总理相视微笑了。

他们相互从对方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气节，还有深深的理解——他们在此刻



依然为之奋斗的，当然已不是职权和地位。

这是最后的斗争，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斗争。革命死了，信念长存！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审判的时间并不长，这场喜剧的导演在这位伟大的政治家面前是那样的难以确立自信，以至不得不草草收场。

纳吉被判处绞刑。

纳吉用沉默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当庭长问：“被告伊姆雷。纳吉，您想提出赦免申请吗？”

纳吉只说了一个字：“不！”

他年轻的国防部长帕尔。马勒特尔也作了同样的回答。

生命已经显示过自己的价值，已经辉煌地完成了它的人生旅程。失去它已经没有任何遗憾。

使纳吉遗憾和牵挂的只是社会主义的命运。

1958年6月14日，纳吉在最后一次审判时，留下了他最后的政治遗言。

纳吉说：“我曾两次努力在我国维持社会主义这个词的荣誉，那是1953年和1956年。第一次时，拉科西出来反对我；第二次时，反对我的则是苏联的整个武装力量。在这个由热情和仇恨构成的诉讼中，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意奉献它……我相信，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只有一点是违背我的意愿的——将来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

两天以后——1958年6月16日，星期一早晨，太阳还没有出来——这一天太阳还会出来吗？！在布达佩斯中央监狱的小拘留所院内，伊姆雷。纳吉总理、他的国防部长帕尔。马勒特尔和记者米克洛什。基迈什被送上了统架。

当这次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的绞刑执行时，当绞索还未最后绞断这被称为社会主义敌人的声音时，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为所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人留下了一声既痛心又费解的呼喊：

“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 毁于领袖权力的波兰改革——哥穆尔卡的悲剧

赵启强

本文系作者大著《光荣的荆棘路——改革家们》第三篇

一

这是一幕悲剧——主人公在前半场是英雄，后半场却成为历史的罪人……

在政治舞台上，我们常常看到许多政治家，出场时是英才，闭幕时是昏庸；

前半场是伟人，后半场是罪人；序幕中是高尚，落幕时是腐败……

权力是政治家面前的一个巨大的陷阱，是所有政治伟人都无法逃避的劫难。

铁托说过，对于政治家来说，政治死亡甚至比肉体死亡更可怕。

是的，在政治舞台上，没有比在权力腐蚀下僵化、直至政治生命死亡更深刻的悲剧了……

我们将展现一幕这样的悲剧。

这出悲剧发生在波兰；剧中的主人公是哥穆尔卡——

二

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给波兰带来了骚动和混乱；于是，波兰政府便

用坦克和子弹来平息动乱；于是，就有了一个政治伟人的出场……

如果界定一个政治伟人的标准不仅仅是他所代表的国家的大小，而应该是指

恢宏的天才、渊博的知识、钢铁般的意志、崇高的信仰以及对民族苦难的深深忧虑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话，那么在 1956 年，哥穆尔卡是有资格被确认为政治伟人的。

1956 年 10 月，波共八届二中全会，决定选举波共前领导人哥穆尔卡为党的第一书记。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因为哥穆尔卡，于 1949 年因“右倾民族主义”的罪名而被开除出党，1951 年与妻子一起被捕入狱。

此时——1956 年 10 月，他刚刚走出监狱一年多的时间。

波共为什么会作出如此令人惊讶的决定？只要看看 1956 年的波兰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能理解，哥穆尔卡是被推举出来干什么的？

1956 年是共产世界的第一个大灾年——在赫鲁晓夫于 2 月份抛出了那个著名的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这个世界在震惊的眩晕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骚动和混乱：

——在匈牙利，惩罚旧的罪恶、争取民主开放的运动，已经发展到不仅当局无法控制、而且历史也无法接受的地步。到十月，苏联出兵的威胁已迫在眉睫……

——在波兰，也有同样的危机——来自民众方面的改革要求有力地冲击着旧的政治秩序，其激烈程度已经使旧的统治方式到了无法持续的地步；到了 1956 年夏天，这场危机终于演变成一场流血的动乱……

1956 年 6 月，波兰西部工业城市波兹南的斯大林机车厂的工人，在要求增加工资、减少税收的经济要求被厂方和地方当局拒绝后，便委派了 30 名代表前往华沙，直接向机械工业部部长呼吁。

在华沙，工人的要求同样没有得到重视。于是代表们强硬的表示，如果工人提出的这些问题不能在月底前得到解决，工人将举行罢工！

部长的回答更加强硬：“如果你们上街的话，你们将遇到坦克！”

消息传回波兹南，还没有等 30 名乘火车返回的代表回到波兹南，愤怒的一万六千名工人便放下工作向市中心出发，举行和平示威。

在向市中心的途中，不少群众加入游行队伍，示威者增加到十万人。

开始，示威是有秩序进行的。来到市政府广场，示威群众派出一个代表团要求市政当局接见。

当局拒绝会见。此时，在本来已经愤怒的群众中有了这样的传闻：30 名去华沙的代表已被公安部门逮捕了！

示威群众的情绪开始骚动，一些出过激的口号出现在人群中：

“打倒秘密警察！”

“我们要面包和自由！”

“俄国佬滚回去！”

“释放政治犯！”

纪律失去了，理智失去了。请愿变成了骚乱——一些人袭击了市政府，一些人攻打了监狱……

警察开了枪，工人从民兵武器库夺得武器，将汽车推翻作为街垒与公安人员展开了枪战。

华沙政府派来了坦克和保安部队……

人民波兰第一个流血的悲剧发生了——1956 年 6 月 28 日，仅仅一天的冲突骚乱，就有 54 人死亡，2000 多人受伤，另有 300 多人被捕。

波兰工人阶级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领教了来自自己政权的教训…

…

悲剧发生的当天，政府发表公报说：“敌人的特务分子今天做到了挑起街头的骚动……这次动乱是一次广泛的、精心准备的挑衅和颠覆活动，它的肇事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

第二天，政府总理发表了强硬的广播讲话：“我们可以明白的告诉每一个胆敢举手反对人民政权的挑拨分子或神经失常的人，他们的手将被砍断。”

尽管有如此残酷的镇压和如此强硬的警告，波兰政府并没有消除社会危机，反而使自己陷入了更深刻的政权危机——对发生这个悲剧的责任追究，使波共上层领导产生了分歧，并迫使它进行检讨、承担责任。

波兰工人阶级是以流血、死亡为代价才迫使波共作出了对领导人的重新选择的。

这次选择的结果是，哥穆尔卡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

三

在两个重量级的政治强人的对抗中，赫鲁晓夫妥协了——弱小的波兰依靠哥穆尔卡的巨大政治魄力，战胜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

哥穆尔卡在 1956 年重返政坛，很具有这类国家那种普遍的、很富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当这类国家遇到危机时，党和人民没有去呼唤正在掌权的、因而也肯定是伟大、正确的现领导人，而常常是寄希望于那些因犯了严重错误甚至罪行而被开除或被监禁的前领导人；还有，在这类国家，真正能在政治上建立丰功伟绩的，不是那些长时间控制着政权，因而也肯定是最有权势领导人，而是那些经历过重大挫折、在荣辱、功罪中有过多次沉浮的共产党人。

哥穆尔卡接受了党和人民的重托，决定担负起这付连那些终生以追逐权力为己任的人都不敢承担的历史重负……

对个人的冤屈，他没有过多的计较，只是平静而严肃的问了一句：“你们保证今后不会再把共产党人投入监狱吗？”

哥穆尔卡没有辜负历史的厚望。他的第一个回合，就击败了那个强大邻国的政治强人赫鲁晓夫——

1956年10月19日，波共中央二届八中全会召开，全会提名哥穆尔卡为波共第一书记候选人，同时接受了政治局12名委员、3名候补委员向全会提出的集体辞职。

就在全会准备产生新的政治局时，会议主持人突然宣布了苏联共产党代表团飞抵华沙的消息，建议全会暂时休会，立即组成波共代表团去机场迎接苏共代表团并进行谈判。

苏共代表团是由赫鲁晓夫率领的。这是一个阵容庞大的代表团，它包括了苏联党、政、军各界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华沙条约司令科涅夫元帅、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还有10位陆军上将。

这是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传统——以高层领导的集体力量来形成威慑力。

赫鲁晓夫同时还带来了强烈的愤怒，因为波共竟然没有得到苏联的批准就要对党的最高领导作如此重大的改变；还有，他曾给波共发过一封电报，说他愿意作为一个客人参加波共八中全会，但被波共拒绝了。

这个庞大的代表团不是波共邀请的，他们只是在启程之后，才致电波兰，说苏共代表团正在飞赴华沙途中。

这些不速之客飞抵华沙时，机场指挥塔还没有接到让这架图-104飞机降落的

命令。飞机在华沙上空盘旋了将近一个小时，一直到飞行员声称“油已耗尽”，才被波兰方面允许着陆。

十分暴躁的赫鲁晓夫，本来就窝着一肚子怒火，现在就更加愤怒了。

一走下舷梯，赫鲁晓夫就对前来迎接的波共领导人咆哮起来：

“我们为这个国家流过我们的血，而现在，他们却试图把它出卖给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这办不到，绝对办不到！”

迎接他的波兰人中，有一位对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我提醒你，你是在波兰领土上说话；而且我们比你们流了更多的血！”

赫鲁晓夫直瞪瞪地盯着这个敢于冒犯他的男人，问道：

“他是谁？”

“我是哥穆尔卡，我曾经被你们在监狱里关了三年。”

赫鲁晓夫仍然不愿意和哥穆尔卡说话。又问别人：

“他在这里干什么？”

赫鲁晓夫得到的回答是：“他来这里，是因为我们决定选他为波共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要求将他的代表团直接送到正在召开的波共二届八中全会会场。哥穆尔卡坚决拒绝赫鲁晓夫参加他们的全会。

赫鲁晓夫遇到了一个强硬的对手。

为了使这个波共新领导人就范，赫鲁晓夫一面与波共领导人会谈，企图影响波共全会的组织和政治路线，同时调动了三个纵队的坦克部队向华沙挺进。

哥穆尔卡没有在武力讹诈下退让。他镇定而严厉地告诉赫鲁晓夫：“除非军队马上撤离，否则我们要马上离开这里。我要通过电台向人民讲话，通知他们所面临的局势！”

大学生和工人知道了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预，他们自动地聚集在双方领导人会谈的贝尔凡尔宫外，声援哥穆尔卡及波兰代表团；华沙地区 16 个大型企业的工人还自动组成民兵队伍，严密监视苏军进入华沙的动向，准备在发生武装干涉时进行抵抗。

赫鲁晓夫妥协了。他看出哥穆尔卡和他身后的波兰民族是有勇气对抗到底的。

哥穆尔卡用不眨眼睛的斗争，赢得了与共产世界最高首脑的对抗。

弱小的波兰依靠哥穆尔卡的巨大政治魄力战胜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

#### 四

与赫鲁晓夫的较量充分显示了哥穆尔卡的意志力量，而为“波兹南事件”平反则表明：哥穆尔卡确实具有一位政治伟人所应有的社会良心和政治魄力。

自 1795 年俄国兼并了波兰以后，没有一个俄国皇帝不为波兰问题头疼；而所有俄罗斯帝王又都是用武力来医治这种头疼的。因此，几百年来，俄罗斯帝国一直是压在波兰身上的巨石，而波兰也是俄罗斯帝国的附属国中，最桀骜不驯的一个——每次都得通过武力才能把它拉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

然而这一次，历代沙皇非常成功运用过的手段，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了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说，哥穆尔卡击败的不仅仅是赫鲁晓夫的武力恫吓，而是俄罗斯帝国几百年来霸权威胁。

苏、波两党的会谈几乎持续了一整夜，第二天，当赫鲁晓夫带着他的代表团离开波兰时，他已经学会非常友好的与哥穆尔卡交谈了。

哥穆尔卡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和毫不动摇的政治信念赢得了赫鲁晓夫的承认和尊重。

哥穆尔卡就是带着这样的胜利和人民对他的支持，回过头来处理棘手的国内



问题的。

哥穆尔卡在国内事务中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给 1956 年 6 月 28 日的“波兹南事件”平反。

如果说与赫鲁晓夫的较量充分显示了哥穆尔卡的意志力量的话，为波兹南事件平反则表明，哥穆尔卡确实具有一位政治伟人所应有的社会良心和政治魄力。

在正式当选为第一书记的当天晚上，哥穆尔卡就发表了为波兹南事件平反的著名讲话，他说：

“当波兹南工人走向街头的时候，他们不是反对人民波兰，不是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反对的是那些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广泛滋生并深深触动了他们的邪恶、腐败。他们反对的是对他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原则的歪曲……”

在这次全会上，哥穆尔卡还把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官僚主义作为一个政权好坏的标志。

他说：

“……失去了工人阶级的信任就是丧失执行权力的理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治理国家，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坏政府，因为它必然要依靠官僚主义，必然要依靠破坏法制和暴力……要是行使权力的特权和这种受崇拜的权力落到一个心胸狭窄的人手里，落到只会机械地执行命令的人手里，或者落到腐败的野心家的手里，那就更糟了。这些人将会轻率地、然而有效地为埋葬社会主义挖掘坟墓。”

在 50 年代对斯大林模式的政治批判中，有哪一位政治家能具有哥穆尔卡的气和深度？甚至在以后的年代、乃至今天，哥穆尔卡对官僚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工人阶级政治权力的呼唤，仍然十分遗憾地具有现实意义。

哥穆尔卡以无与伦比的政治家的魅力，仅仅用两天的时间就征服了整个波兰。

他获得了党内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支持……

## 五

哥穆尔卡在 50 年代所进行的政治改革，会让期盼着社会主义改革的当代人，感到羡慕吗？

苏共代表团离开波兰后，八中全会继续召开。哥穆尔卡发表了一个长达六个半小时的讲话，对原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进行了尖锐地批评。他说：我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官僚主义之上的，建筑在违反法制的做法之上，建筑在暴力之上的”；哥穆尔卡指出“民主化道路是建设最好形式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

在这次向全国广播直播的讲话中，哥穆尔卡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改革思想；并在全会以后的政治实践中推行了自己的政治改革——批判个人崇拜，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核实政治恐怖时代的政治罪恶并给受害者平反昭雪。哥穆尔卡要求“这个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应当最后结束波兰版贝利亚主义在党内、国内的活动……”；

加强了同农民党和民主党的合作，成立了三党中央委员会。哥穆尔卡强调“波兰的政治领导权不是由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共）单独来执行的……”；哥穆尔卡将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视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证，他对党严重的脱离劳动人民行了尖锐地批评。他说：

“没有工人阶级的支持，我们每个人事实上除了自己外谁也代表不了。”

因此，哥穆尔卡在此次全会上提出建立“工人委员会”，实行工人自治，以制止企业的官僚主义。哥穆尔卡说：“工人委员会是这样一种机构：工人阶级通过它直接地参加国民经济的管理。”

为“工人委员会”的权限立法：“工人委员会以集体的名义管理属于全

民所有制的企业”。

这些权限包括——

制订企业计划，确定企业发展方向；监督企业行政领导，对企业活动作出评价；参与企业分配计划的制定；规定劳动定额，确定工资等级和企业的奖罚制度；工人委员会由企业职工直接选举产生……

……

即使在今天，扩大工人阶级在政治、经济事物中的权限，也不失为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问题。

削弱中央集权，扩大国企的自主权是这类改革都走过的路，很少有人非议；但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关问题却被人忽视了：扩大了国企自主权是交给职工，还是仅仅由厂长经理把持？

作为社会主义改革，这本来不是问题，然而遗憾的是，许多改革设计，恰恰忽视了改革的社会主义前提，而将国有企业交给一些官僚——以前是靠作政治思想工作起家的政治官僚；后来是具有理工科学历的技术官僚……其后果在开始的中国和以后的俄国都非常相似的凸现出来——那就是无法无天的腐败和无法无天地对公共财产的掠夺……

哥穆尔卡在 50 年代的尝试无疑是超前的。

哥穆尔卡的政治体制改革，比较重要的另一笔，是将权力中心从庞大的官僚行政机构，转移到以往被称为“橡皮图章”的议会，使议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政治上真正得到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地位。

为此哥穆尔卡对国会议员的选举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全国普选，候选人可以超过当选议员的 50% ，实行差额选举。哥穆尔卡说：“选举应该使人民作出选

择而不仅仅是投票。”

1957年初，举行了以各党派为竞选单位的国家第二届议会选举。在这次有一千六百多万选民参加的大选中，投票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农民党、民主党和无党派人士在458名国会议员中，获得220个席位，几乎接近半数；统一农民党领袖还被选为议会议长。

将权力重心向议会转移，而议员又通过全民普选产生，这是国家政治权力社会化的重要步骤，因此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说，这种扩大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前提。

## 六

哥穆尔卡不仅有进行政治改革魄力，还具有深受人民爱戴的人格魅力，波兰人民对领袖的选择是无可挑剔的……

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哥穆尔卡具有特别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同时，他还具有托洛茨基那样的演说天才。波共前领导人、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杨·普塔辛斯基曾经这样描写过哥穆尔卡在政治活动中的魅力：

哥穆尔卡具有清晰地表述思想的天赋，善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打动人们的心弦，唤起人们的理智。我们屏息着呼吸，聚精会神地倾听他的讲话，赞同他的讲话。这时会场出现了一个没有导演的场面，人们自发的欢呼着他的名字：维—斯—瓦—夫！维—斯—瓦—夫！这里没有任何一点制造个人迷信气氛的意图，这是党对自己的领袖尊敬和信任的表现，是党同自己的领袖团结一致的表现……

我们不能把这种描写看作是对领袖人物的溢美之词，因为在作者写下这段文字时，哥穆尔卡早已失去了政治权力，并且已经告别了人世。

当然这只是一个政治家对另一个政治家的评价，是政治家的标准；那么民众的标准呢？

哥穆尔卡对民众也同样具有魅力——他谦虚，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即使已经当上了最高领导人，他还是不愿意要一大堆侍从和仆人。在旅途中，他会在火车上、飞机上突然打开公文包，拿出他的夫人索菲亚给他准备的夹肉面包，把它吃掉……

很少有哪位政治家得到过哥穆尔卡从人民中得到得到的那种真实的衷心爱戴——

1956 年底，在华沙的一个最大的广场上，哥穆尔卡以党的领袖身份与首都人民见面，并作了讲话。

讲话结束后，群众不是象以往那样爆出掌声和呼喊口号。几万人的会场一片沉静。

突然间，群众中有一个人放声唱出《祝他长命百岁》……

这是一首波兰民歌，它是在家庭的节日里用来祝福亲人的。

会议组织者紧张起来——为刚才的沉静和现在这首不应该在这种场合唱的歌——组织者是准备以掌声和事先规定好的口号来欢迎新领袖的……

一瞬间，许多声音加入进来，歌声越来越大，几万个声音汇成一片……

人民在告诉哥穆尔卡，他们不单把他看作一个政治家，一个国家领导人，而且还将他看作自己的兄弟、朋友，看作是他们的亲人……

哥穆尔卡先是对这种祝福方式感到意外，紧接着，他深深感动了，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眶……

那一刻，哥穆尔卡能不发出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决心吗？一个政治家难道能忘

记这样的时刻吗？

在哥穆尔卡执政的头两年里，他的政绩是令人振奋的——限制了安全警察的权力；放宽了书、报检查；停止了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对天主教采取了温和态度；对国家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讨论；要求在党内建立民主机构；要求把中央控制的经济体制改变为企业自治；要求发展一种开放的马克思主义……

哥穆尔卡在 1956 年所实行的这些社会主义改革，即时在今天看来，也是大胆的、令人羡慕的。

哥穆尔卡所掀起的强劲的改革浪潮，给波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波兰人民把这次改革称为“十月里的春天”。

七

当社会的发展完全依赖于领袖的明智，当制度的运转依赖于领袖的个人权力时，领袖和社会两方面的悲剧就要拉开序幕了……

这是靠领袖的明智和个人力量而取得了巨大社会进步的典范。

然而，这又是一种很难巩固的社会进步；历史最终所记录下来的 50 年代的波兰改革，是一个悲剧性结局——从某种意义上讲，哥穆尔卡的改革生涯比匈牙利的纳吉更具有悲剧色彩。

哥穆尔卡的改革只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当被他本人释放出来的民主力量，最终危及到波共的领导地位时，哥穆尔卡动摇了，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待工人委员会的态度——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工人委员会开始与工厂的行政领导、继而与波共和中央行政机关的矛盾便尖锐起来。于是要求限制工人委员会权限的呼声也随之而起。

哥穆尔卡在内外压力下妥协了，对保护工人委员会权益的法律作出重大修改

---

将工人委员会改为“工人自治代表会议”，并且由“工人委员会”“工会委员会”和“党组织”的三方代表组成；同时将其的权力局限在“协调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关系”上。

仅仅两年时间，哥穆尔卡曾经积极抵制的官僚主义便在各级政权机构中复活了，国家的政治民主生活又重新趋于凋零。改革停顿下来了，因为哥穆尔卡“害怕党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1958年，官僚主义又重新得到了巩固，一切民主化措施停止了，精神生活重新受到禁锢”（《欧洲共产主义》）。

哥穆尔卡的堕落是全面的——

这位曾经让莫斯科敬畏的波兰领袖说过，为了“维护波兰的民族利益，必要时要不顾苏联的反对”；可后来却把自己的国家用链条牢靠地与他的老大哥拴在一起，而支持来自莫斯科的任何倡议：

——1958年，当匈牙利的改革家纳吉被处以绞刑时，哥穆尔卡按着苏联定下的调子谴责了纳吉的修正主义反革命罪行；

——1968年，哥穆尔卡的政治生命已经衰老，他完全陶醉在自己的权力之中，对此时发生在邻国的“布拉格之春”不仅不能理解，而且不断地在公开的演说中对“布拉格之春”进行恶毒攻击；当然，他反对“布拉格之春”，还因为他个人的专制统治也面临着与捷克斯洛伐克旧政权相同、甚至更深的危机，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改革浪潮正迅速地向他的王国蔓延过来。

在1968年，哥穆尔卡的对民主的仇恨已经到了如此程度，他不断地给勃列日涅夫施加压力，要求对“布拉格之春”进行军事干预。勃列日涅夫敢于冒天下之大不违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和这位老资格的东欧政治家的支持、纵容分不开的。

.....

对哥穆尔卡改革生涯的悲剧性结局，普遍的解释是，在国内受到“左派”，即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在国际上，则是匈牙利事件后，由于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加强，而使整个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全面倒退所至……

但我们却宁愿相信，这个悲剧的是产生，在波兰人民方面，是历史局限：在 50 年代，人民的政治参与，更多的还只是争取领导者的政治许诺，以及寄希望于领导者的善意和明智；波兰人是等了 20 年后，才认识到，将政治家的承诺和改革中取得的民主权力迅速的法律化，并拼死捍卫这些法律的权威性和一贯性是多么重要！

在哥穆尔卡方面，这个错误却是这类制度的最高领导人必然要走的路——当整个政权的各级官员都对领袖的权力表示出绝对的屈从和绝对的赞美时，他不再可能对自己运用权力的正确性和合法性保持谨慎态度和检讨精神了……

在 50 年代，哥穆尔卡和波兰人民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一切的进步都是依靠领袖的个人权力取得的。他们没有认识到，政治权力社会化虽然走出第一步，但距能得到宪法的保证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他们没有注意到，在削弱警察力量和官僚主义机构的同时，领袖的个人权力却加强了……

正因为出现了哥穆尔卡这样杰出的政治家，社会在得到了国家的一些政治让步之后，便放弃了对权力的警惕和监督，而把一切都交给了他们所能信任的领袖。

人性中的最大弱点，便是相信别人对自己的肯定评价。登上了权力之巅的哥穆尔卡只可能听到一种声音——颂扬。

哥穆尔卡很快就相信了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因此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坚持用手中的权力为波兰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作出决定……



哥穆尔卡的政治权力的绝对化，必然使他依赖于照章办事、唯命是从的官僚政治。

绝对的权力对哥穆尔卡的腐蚀是那样的有力、迅速。

八

为了证明权力能使政治家成为伟人，也能使其成为罪人，历史把一个完全相同的“波兹兰事件”，放到哥穆尔卡面前——从而给这个已经彻底堕落了的政治伟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哥穆尔卡在“布拉格之春”中所扮演的那个不光彩的角色，还不是这出悲剧的高潮——权力对哥穆尔卡的彻底毁灭是在 14 年后的 1970 年。

历史恶作剧似的让已经僵化了的哥穆尔卡重新回到使他成为伟人的那个起点上，而把又一个“波兹南事件”原封不动地放在面前。

历史要用同一件事来证明这两个不同的哥穆尔卡有多么大的差别。

或许，历史已经无需对此时的哥穆尔卡进行考验了，她几乎只是为了证明权力能使政治家成为伟人，也能使其成为罪人；或者，她只是恶作剧式地为哥穆尔卡唱了一首政治死亡的挽歌——

1970 年 12 月 13 日，波共机关报刊登了部长会议关于改变一系列商品价格的决议。这个决议宣布，将肉和肉制品提高 17%，面粉 10%，食油 33%。

决议还对价格调整作了详细的、理由充分的说明，并宣布对电视机、电冰箱、人造纺织品、食品罐头等商品降价 8-40%。

政府是谨慎的。

为了配合这种谨慎，这一天的波共机关报《人民论坛报》报道了拉多姆地区

举行“铸造工人节”的庆祝活动，刊登了大会写给哥穆尔卡的效忠信：“书记同

志，我们向您作出保证，久经考验的铸造工人将全力以赴地贯彻党和政府提出的纲领。”

非常遗憾的是，政府没能准确的感受的在这种表面的、由大会组织者和新闻部门编撰的豪言壮语背后，所隐藏着的不满和危机。

波兰工人对政府鼓励他们把更多的钱化在降了价的冰箱、电视机上表示不满。

他们有一笔帐：他们无需经常买电视机，却要每天买食品。一般工人用在食品上的开支本来就占 45% 以上；眼前又恰恰是圣诞节前夕——就凭选这么一个时刻调价，就能证明政府对劳动人民的关心是多么虚伪；当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替工人算了另一笔帐：这次涨价，政府将从人民的钱包里拿走二亿多美元……

尽管工人被说服过，说这些钱是用来减轻政府不堪负担的食品津贴的，说这些食品按西方的标准是非常低廉的。

但工人们却认为，这类津贴早就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了，所以他们的劳动收入才比西方工人低得多——政府哪来的补贴钱？再说，既然国家遇到了危机，为什么从来没有向工人阶级报告过？（恰恰相反，他们以往听到的全是辉煌成就）这次要工人作出牺牲，也没有事先跟他们商量一下——工人阶级不是国家的主人吗？

1970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一，这是宣布决议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在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的一群工人，上午离开了工作单位，来到厂部办公楼前，对商品涨价表示了抗议。

厂方当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满不在乎，因为他们对食品涨价是不负任何责任的。

工人决定向格坦斯克省委进军，他们越出了厂门。罢工者变成了示威者。

示威工人唱起了国际歌和波兰国歌。

唱这样的歌不犯法，他们有权唱。

当示威队伍走到省委大楼时，已经扩大到一万多人。他们高呼口号——“我们要面包，不要电视机！”

“我们要求增加工资和发表意见的权力！”

.....

在这许多痛快的、多少有点儿感情用事的口号中，却有一条表明了工人的谨慎和不祥的预感。这条口号是：

“我们是工人——不是流氓！”

工人们希望得到这个称号应有的地位和尊重。

然而，工人没有得到他们所要求的；甚至没有得到一次那怕是不成功的对话。

他们被警告说：立即离开现场！紧接着，他们面对的是一道由武装警察组成的警戒线。

最初的枪声响起来了.....

九

仅仅因为对政府的某项政策表示了不满，就有 45 名波兰工被坦克和子弹夺去了生命，一千多工人流了鲜血.....

仅仅为了要求一次直接的对话，六名工人付出了生命，数十名工人流淌了鲜血.....

然而，这仅仅是人民波兰“悲剧的一周”的开端.....

这是 1956 年“波兹南事件”的重复。

把两次重复的历史进行一次比较是有益的。这是另一种意义的纪念碑。

为了让政治家能经常到这样的纪念碑前，读一读历史的训戒，我们仍然把这个重演的悲剧详细地描绘出来——

……工人们唱着国际歌，迎着高压水龙的冲击前进着。格坦斯克的12月是滴水成冰的季节。第二道防线是鸣叫着的警车和数百名头戴钢盔、手提警棍的警察。他们是敢下手的，他们见人就打。工人们冲过去，用赤手空拳和地上捡来的石头进行搏斗。

最后，他们终于遇到了整齐地排列在大街上的坦克车队。

工人仍有勇气迎上去，有勇气向坦克车伸出拳头，高呼道：“我们是工人，不是流氓！”

然而勇气并不是万能的，他们无法将坦克推回去。坦克开过来，他们一边撤退，一边用身体组成一道防线。

这是不堪一击的防线。

坦克不费力地前进，防线溃散了，游行的队伍也将溃散……此时，绝望的工人决定用肉体进行最后的斗争，许多工人横躺在大街上阻挡坦克。

一位工人被坦克压死了。

人群和坦克都愣了一下，都停了下来。忿怒的工人猛砸着那辆坦克，坦克兵几乎被砸碎了。六名工人抬着用波兰国旗盖着的死难者，高唱着国际歌，继续游行。

人们忿怒地高呼：“看看你们干的勾当！！”

愤怒使已经很少的理智和秩序消失得无影无踪，怒火点燃了建筑物，点燃了警车。

有坦克支援的警察和陆军部队与工人发生了激战。开枪的命令下达了。

只有少数士兵使用了武器，他们朝空中开枪……但警察却毫不留情，对准示威者开枪。而示威者中还有许多妇女和儿童。

也有警察被打死，或被砸昏过去，工人用石头和从警察手中夺得的武器进行绝望地反抗。

人疯狂了，坦克也疯狂了，一切都失去了控制……

那六个抬着死难者的工人也遭到了枪击，他们是在《国际歌》歌声中倒下去的……

一辆坦克从一名妇女和她的女儿身上压过去，目睹着这一惨象，一名年轻的陆军士兵哭了……

……

开枪的命令是哥穆尔卡下达的。

人民曾经为得到了这样的领袖而激动得流过眼泪；14年后，他却让人民流出了鲜血——

1970年12月，在与军警对抗的工潮中，有45名工人被坦克和子弹夺去了生命，一千多工人流了鲜血……

十

工人以为哥穆尔卡会象14年前那样听听他们的意见，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哥穆尔卡以为有权用坦克来教训自己的人民，也犯了一个错误——他为此错误而永远地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与一个政权的稳定和权威相比，45个工人的死亡是微不足道的；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民族死于法西斯暴行的人是这个数字的数万倍。

但这是无法类比的——那是战争时代，这是和平时期；那是被异族的征服者

所杀，这是人民的国家流了人民的血……

想到这些被称作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是被他们的代理人、公仆杀死的，想到这些赤手空拳的死难者是被刺刀、步枪和坦克戕害的，想到下令开枪的人是被他们当成亲人、父亲般爱戴的领袖——那么，即便是 45 这么个小数字，也足以使人颤栗……

哥穆尔卡没有颤栗。他在悲剧发生后，竟然理直气壮地训斥工人阶级。

他说：

“波兰工人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生活得更好，因此他们没有理由不满意……”

正如泰戈尔所说，“权力认为，牺牲者的痛苦是忘恩负义……”

哥穆尔卡的这番话表明，1970 年的哥穆尔卡已经不是一个政治家，甚至不是一个血肉之躯，而仅仅是一个权力标志、或者说仅仅是一个权力符号。

哥穆尔卡接着说：

“工人没有经过多少犹豫就罢工上街了，因为这是他们的国家，不言而喻，国家会对他们采取宽容态度……”

显然，工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国家”是个错误；以为哥穆尔卡会对他们采取宽容的态度更是一个错误。

哥穆尔卡在用军队教训了犯错误的工人后，还要用法律来惩办工人……

“12 月悲剧”之后，哥穆尔卡采取了进一步的镇压措施——“逮捕了罢工委员会全体成员”：“开除造船厂全体工人，并对职工进行甄别”。

这场悲剧该到尾声了——权力对哥穆尔卡的毁灭最后完成了。

这个结局也同 1956 年完全一样：不到一周的时间，哥穆尔卡就因对“12 月悲

剧”承担责任而退出了政治舞台。此时，他年仅 68 岁。

与哥穆尔卡在 1956 年一上台就谴责他的前任、并为“波兹南事件”平反一样，接替他的盖莱克，在就任第一书记的当天晚上，就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说最近一周发生的悲剧深深地震惊了整个波兰，说这次事件“沉痛地提醒我们一个真理，党必须始终保持同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密切联系，而不能失掉同劳动人民的共同语言……”

这一次，哥穆尔卡的政治生命再没能复活——尽管他还默默无闻地隐居了 12 年，于 1982 年去世——没有人再提起过他，只有历史默默地记住了他在 1968 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丑剧中，所扮演的那个不光彩的配角；以及他在 1970 年波兰的“12 月悲剧”中所扮演过的那个罪恶的主角……

## 被霸权扼杀的春天——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

赵启强

本文系作者大著《光荣的荆棘路——改革家们》第四篇第一部分

—

捷克斯洛伐克因为她的“布拉格之春”而被五个国家的军队占领了。于是全世界的人都问：什么是“布拉格之春”？捷克人在 1968 年春天到底得罪谁？1968 年是现代史上的“捷克斯洛伐克年”，这个中欧小国以“布拉格之春”而闻名于世，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明星。

然而“布拉格之春”的开端是默默无声的，它没有震惊世界。当时，阿拉伯

与以色列的中东冲突刚刚开始，美国人在越南的危机还没有结束；还有，想成为世界革命和造反中心的中国正闹得轰轰烈烈。人们无暇顾及这个仅有 1500 万人口的内陆小国。

在充满危机和火药味的 20 世纪 60 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可以算是最安定的国家：没有战争，没有饥荒，没有革命。

熟悉世界史的人也知道，这个小国曾出过一位不安份守己的、敢于造反的宗教改革家胡斯。只是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毕竟不多；再说胡斯早在 500 年前就被他所要改革的基督教宗教法庭活活烧死了。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几次伟大的、以悲壮结局的著名改革之一。

这个国家真正有名的倒是那位始终笑眯眯的好兵帅克，他幽默、和善又极能忍耐。人们提起捷克斯洛伐克，便会想到这位帅克，想到帅克，便会有一阵善意的嘲笑。

这是一个乐天安命的民族，一个让人放心的民族，因此，当这个民族产生了对 20 世纪的历史具有深刻影响的“布拉格之春”时，居然没有引起外界的关注。

“布拉格之春”所以闻名世界，不在它的开端，而是它的结尾——悲壮的、震惊世界的结尾。等到全世界开始瞩目这个震惊世界的事件时，她已经终止了，春天早已逝去——那一刻的时针已经指向 1968 年 8 月 20 日的晚上 11 点……

这是一个黑暗而不祥的夜晚。

1968 年 8 月 20 日晚 11 时，距布拉格市中心仅 6 公里的鲁津机场，值班人员突然接收到一架刚刚飞临的苏联民航客机发出的信号：由于机器故障，要求允许紧急降落。机场人员准许了这一要求。

客机安全降落后，直接开到机场指挥塔附近。值班人员惊讶地发现，从飞机



上下来下的不是被事故吓坏了的旅客，而是几十名挥动着手枪的突击队员。

机场指挥塔被占领了。仅过了几分钟，装载着坦克的苏联安东诺夫式巨型运输机群的第一架，在突击队员的指挥下降落了。

巨型运输机以一分钟一架的速度降落，并吐出坦克、大炮、卡车和军需品。

这支空降坦克部队，在苏联驻捷大使馆小车的引导下，以 35 哩的最高时速冲进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包围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驻地党中央大厦。

此时，已临近午夜，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开会。

占领军冲进捷共党中央大厦，扣押了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捷共第一书记亚。杜布切克，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政府总理切尔尼克也在政府所在地被捕。

一个政权被逮捕了。

72 岁的总统斯沃博达得以幸免，因为他不是主席团成员，未来开会；而且他的职务在捷克斯洛伐克是礼仪性的。

8 月 21 日早晨，当布拉格人走向街头时，这个城市已经掌握在外国军队手里。

这种情况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也同样发生，捷克斯洛伐克在没有任何反抗的情况下被全面占领了。

占领军是由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陆军司令巴甫洛夫斯基将军指挥的华约部队的 24 个师。

它由 5 个国家的部队组成——16 个苏联师，3 个波兰师，两个东德师，两个匈牙利师，一个保加利亚师。

捷克在一夜之间出名了。

捷克人以这种悲惨的方式闻名于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620 年，她曾以白山战役闻名于欧洲。那次，捷克被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打败，丧失了主权，沦为奥匈帝国的一个省。从那时起，捷克斯洛伐克沉默了 300 年，一直到 1918 年才获得独立；

1938 年 9 月，慕尼黑会议，捷克又一次闻名于世。这一次，她成为欧洲大国妥协的牺牲品，被迫屈从于纳粹德国的占领。

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现在，这个饱受欺凌的民族又一次以她的悲惨境遇而引起世界的注目。人们从报纸上、广播里寻找关于捷克的消息，全世界都在问：勃列日涅夫为什么要攻打这个从不攻打别人、从不招惹别人的弱小民族？

这个问题不复杂，人们马上就找到了答案——勃列日涅夫的枪炮是针对着“布拉格之春”的。

于是全世界又开始探问下一个问题：什么是“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人在 1968 年春天到底干了什么？

## 二

一个幽灵在共产世界游荡，这个幽灵就是改革。有了改革，捷克斯洛伐克便有了“布拉格之春”。“布拉格之春”是改革的同义词、“布拉格之春”就是改革！

马克思在 1848 年发表宣言，说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这篇宣言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个幽灵就是共产主义。

有了这个幽灵就有了共产党，有了共产党就有了一个由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共产世界。

共产世界是人类理想的结晶，是人间的天堂。当然，也不是没有相反的评价，

但那只是敌人的反对；或许颠倒过来说：反对的是敌人。这就够了，仅此一条，便可以使这个世界高枕无忧地存在下去。

然而突然间，一个批评的声音从这个世界的中心克里姆林宫升起，向全世界揭露这个世界曾经有过的令人发指的罪恶。

这真是让这个世界震惊而又茫然失措的事——因为无论怎么论证，也无法象以往多次成功地证明过的那样，证明这一次的致命打击来自敌人，因为此人是这个世界的最高首领。

“敌人才反对，反对的是敌人”这个逻辑杠杆断折了，这个世界失去了支撑点，顷刻之间失去了平衡，倾斜了。

这个人就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这次打击就是 1956 年 2 月 25 日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第二十次苏共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实行独裁专制和血腥暴行的控诉。

不再有人相信这个世界是完美无缺的神话了。人们开始追究它的罪恶，思考它的缺陷。

有了这样的思考，人民便不愿意照常生活下去，而统治者也不能照常统治下去。仅仅能让这个世界产生这样的思考和愿望，1956 年 2 月 25 日便成了一个辉煌的日子。

从那以后，也有一个幽灵在共产世界游荡，这个幽灵就是改革。

有了改革，共产世界便不再安定，人们为思考、寻求一个新的秩序而变得不安份了……

在苏联，赫鲁晓夫为了能实践一下新的统治方式而批判了斯大林，枪毙了贝利亚，清洗了斯大林分子，把共产世界的中心搅得天翻地覆；

在匈牙利，纳吉试图建立一个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权而震惊了全世界，并因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波兰，人们为了结束斯大林时代而将一位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哥穆尔卡拥戴上台。为了这个政治目的，波兰人显示了民众的力量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举足轻重的影响……

共产世界在折腾、在动荡、在流血；然而，这一系列的折腾、动荡、流血并没给这个世界建立起一个新秩序；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因为他的折腾而被赶下台去，纳吉因为他的政治理想而被绞死，而以流血示威才将哥穆尔卡拥戴上台的波兰人民发现：这个人在 14 年后竟然下令向同样的示威人民开枪射击……

当然，这些代价并非一无所获，它至少使后来的人认识到，这就是改革——即使是不成熟、不成功的改革。

人们从这些不成功的改革中认识到，要改变这个世界不能靠撤换某一个当权者或改换某一届政府；人们还从这些不成熟的改革中懂得了搞清楚改什么和怎么改？对改革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两个问题。

“布拉格之春”就是在这种思考之后出现的改革，“布拉格之春”就是改革。

“布拉格之春”比上述一系列改革要晚整整 10 年，捷克人确实是一个能忍耐，能沉得住气的民族，她们的春天来得太晚。然而，正因为如此，她才是幸运的，才能有以前几次改革所没有过的冷静、思考和成熟。

三诺沃提尼轻松而得意地统治着捷克斯洛伐克——政权是稳固的，社会是安定的。然而，在这种稳定背后，官僚的特权和腐败却无声无息地干着埋葬社会主义的勾当。

在东欧，几乎每一次动乱和造反都是在斯大林式的统治松动时发生的：1953

年斯大林去世，有了东德的造反；1956年，斯大林被赫鲁晓夫批判，则有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这很说明问题：动乱和造反所针对的是什么？

捷克斯洛伐克是平静的，它没有过松动。在那里，一个斯大林式的统治，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还能相安无事地存在10多年；在布拉格有世界上最大的斯大林塑像，在赫拉德强尼城堡（总统府，历代波希米亚国王的王宫）里仍然居住着捷克的斯大林——诺沃提尼。

这位兼任着总统的捷共第一书记，是斯大林的真正崇拜者。他处处模仿斯大林：给自己设计了一套和斯大林一样的元帅服；还有，同样尊严地紧闭着嘴，同样拿着一个斯大林式的大烟斗。

然而，他是位轻量级的政治家。

这位锁匠出身的总统、第一书记，文化素养很低，完全不具备一位政治家应具备的理论修养和政治洞察力，他能占据这样的高位，仅仅因为他是1921年刚刚建党时就参加了捷共的老党员和在长期的行政工作中所练就的政客手腕；更主要的，是靠他在50年代初的大清洗中的积极和狂热。

政治恐怖是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和支柱。就象斯大林以枪毙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开始，然后将恐怖遍及全国一样，东欧各国也是从党内最高层的清洗开始，以全国性的政治恐怖为最终目的。

没有一个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国家能逃过这种劫难——

匈牙利的拉伊克（匈共书记、内务评长、外交助长。1949年被绞死）；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保共书记、代总理。1949年被处决）；阿尔巴尼亚的佐治（阿共领导人、副总理。1949年被处决）；波兰的哥穆尔卡（波共第一书记、副总理。1951年被捕，判终身监禁。他是被清洗而唯一幸免一死的东欧领导人，并于1956

年重新掌权，是一位非常值得研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人物）……

捷克斯洛伐克有过同样的政治恐怖。

它从 1950 年开始政治清洗，到 1952 年 12 月 3 日以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外交部长克列门蒂斯以及其他 9 名政府部长被绞死而达到高潮。

诺沃提尼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在这个时间迈出的：他得到了被绞死的斯兰斯基留下的空缺——捷共总书记。

诺沃提尼才疏学浅，但他统治这个国家并不困难，在政治恐怖之后，他可以任意推行各种政策——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而不用担心有人反对；再说，一个庞大而健全的官僚机构已经建立起来，要操纵这个机器只需要权力而不需要能力；还有一点，诺沃提尼对莫斯科唯命是从，真正重大的内外方针当然要由苏联老大哥决定。上至党的主要领导人，下至州的第一书记的任命都得莫斯科批准。尽管这有损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却可以少担责任，少费精力。

诺沃提尼轻松而得意地统治者捷克斯洛伐克，尤其当看到比他更有声望的纳吉因为改革而被绞死，哥穆尔卡为改革穷折腾了一阵又回到老路以后，他更为自个儿的政策稳定性而骄傲了。

诺沃提尼有骄傲的本钱——他的政权是稳固的，他的国家是安定的。

然而，这仅仅是他的个人感觉——一个迟钝的政治家的错误的自我感觉。一个 10 多年没有被人批评和反对过的官僚统治的后果可想而知。

这个表面上安定的国家，没有游行示威，没有大规模的罢工，没有颠覆政权的反革命活动；所有的舆论工具都宣传着令人放心的内容——党和领袖的英明和取得的伟大成就。

可是在这种稳定和粉饰太平的宣传声中，没有受到反对和威胁的官僚政权的

腐败和特权，对公众的掠夺和和损害所造成的灾难却是巨大的。

#### 四

政权蜕化、经济衰退使诺沃提尼面临这样一个两难处境——不改革会失去权

力，改革要放开权力。诺沃提尼愿意松开他的手吗？

极端的官僚政治和集权式经济管理，已经使诺沃提尼政权脱离了社会主义目

标。20 年的极权统治之后，官僚的腐败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围绕在诺沃提尼这

位总书记周围的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信徒，而是权力的信徒。在这个权力结构中

心，起作用的已经不是能力和党性原则，而是取决于当权者在下面有多少亲信，

在上层有多大的靠山。

一位捷共中央书记曾经说：“在 60 年代诺沃提尼统治时期，真正起作用的重

要标准是你是否属于同诺沃提尼打扑克的帮派。州委书记或部长如果同诺沃提尼

玩过扑克牌，往往比没有同他玩过牌的捷共中央书记更有权势。”

这些人过着贵族式的腐化豪华生活，他们的月工资可以高到 2.5 万克朗，相

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 20 倍。而工资还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他们的几乎所有开销——

香烟、食品、饮料、汽车、别墅、出国旅游都是由国家开销的。

诺沃提尼把他的别墅建在树木葱绿的小山间，里面装着蒸气浴及从西欧进口

的高级设备，外面警卫戒备森严，不许老百姓靠近。其他高级官员也有同样的享

受，“他们可以免费出国疗养，可以以国家的名誉将贵重的礼品送给外国同事，

又以国家的名誉为个人收得同样贵重的礼品。”

这个国家是他们的。路易十四说过的话“朕即国家”，对这些 20 世纪的无产

阶级政治家仍然适用——尽管宪法上明明写着，这个国家是人民的。

我们怎么能相信这个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怎么能指望这些人代表人民！

腐败和特权所造成的政权危机已经十分深刻，但对于政治感觉迟钝的诺沃提尼来说，算不了什么问题。

诺沃提尼错误地把政策上的让步当作政治胜利。他以为，大清洗中被捕的 7 万人和被开除出党的 15 万人已经恢复名誉，他的国家将不再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他的人民应该知足，应该对生活在没有政治恐怖的德政中而对他感恩。

经济衰退才是诺沃提尼感觉到了的致命伤痛。

官僚主义国有化，使捷克这个在战前就是工业发达的国家每况愈下：效率低下，技术落后。1963 年工业生产总值下降到—3 %，农业生产总值下降到—7.5 %，生产性国民收入下降到—2 %，整个国民总产值的增长率只有 0.5 %，几乎等于零。同时，由于忽视农业、轻工业，造成消费品供应不足，并导致通货膨胀。它的灾难性后果是农业生产水平低于战前，工人实际收入下降，人民普遍不满，工厂出现骚动。

在这种形势下，连最不愿意承认问题、最害怕破坏了政策稳定性的诺沃提尼也感到了头疼。他已隐隐约约感到，不实行改革，会失去权力。

然而改革必须放弃一部分权力，这是诺沃提尼最难接受的，于是他采取了这

样的策略：抓紧权力，放开经济。  
诺沃提尼要实行经济改革了。

## 五

诺沃提尼将关闭森严的大门启开了一条小缝，他要改革了——他要在不触动官僚政治的前题下解决经济难题。于是，科学家们便避开政治，去进行经济改革设计。

把诺沃提尼在下台前为使他的运转不灵的官僚机器重新运转起来而采取的小修小补也称之为改革，的确不够准确。但考虑到改革这个在当今共产世界运用得



最多的词，已经变得如此丰富，就象社会主义这个词在几十年的运用中已经变得那么丰富、多义一样，我们很难对它的概念进行界定。

因此，我们不必如此苛求，我们应该将一切愿意动一动的意图都称为改革：

赫鲁晓夫式的、纳吉式的、铁托式的、邓小平式的、戈尔巴乔夫式的——甚至还有我们现在要介绍的诺沃提尼式的改革……

诺沃提尼要实行改革，是因为他是一个实用主义政客，他的考虑简单却实用

：把生产力促上去，把经济搞好一点，使人民的不满情绪减少一些，当然，也为了使他的人民过得好一些。

单凭最后一条，我们就不能说诺沃提尼没有一点儿人民性，只是他的人民性既不具有民主主义、更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他的人民性是原始的、粗俗的，并且带着他一贯的家长意味。他为人民界定的美好生活是，不被皮鞭抽打和生存需要的满足。

60年代，诺沃提尼的副手、捷共三套马车之一的科尔特曾以代表团长的身份去过巴黎。那里的百货公司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仔细地下面看到上面。晚上，在大使馆，科尔特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闷酒。突然，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的人民错过了多少好东西呵，真可怕！难道他们不配享受这些东西吗？”

这也是一种诺沃提尼式的人民性：简单却真诚，原始却有意义。我们应该感谢这种粗俗的人民性，它使共产世界有了许许多多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经济改革。

诺沃提尼要实行经济改革还有另一原因：他是崇拜赫鲁晓夫的——就象他曾经崇拜过斯大林一样。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无论有怎样的想象力，也难以在这两位伟人身上找到共同之处！

诺沃提尼找到了：他们都是共产世界的最高主宰，都是他的直接上司。他必须崇拜，必须照办——

斯大林搞政治恐怖，他也搞政治恐怖；赫鲁晓夫搞平反，他也搞平反；赫鲁晓夫搞经济改革，他也不妨一试……

然而，诺沃提尼是一位慢一拍的政治家，他的照办总是慢一步。这倒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仿效有所犹豫和思考，而是出于对前一任主子的忠实和崇拜。所以，苏联已经枪毙了贝利亚，诺沃提尼还在继续他的斯大林式的政治恐怖，赫鲁晓夫在 1956 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平反运动，诺沃提尼却拖到 1962 年。赫鲁晓夫 1962 年下台，他却不会立即转弯，竟给勃列日涅夫拍了一封对赫鲁晓夫下台表示难过和遗憾的电报。这是他一生中许多政治错误中最严重的一次；或许，他 1968 年 3 月的下台与此不无关系。

这种慢一拍的官僚惰性，使诺沃提尼在赫鲁晓夫之后还采用了赫鲁晓夫式的改革方式。

诺沃提尼的改革严格地限制在经济领域。

1964 年，45 岁的希克教授是被选中来拯救濒临崩溃的经济的主要人物。这位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会主席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家。在“布拉格之春”期间，他是改革的主要设计人之一，曾任改革派政府的副总理。苏联出兵后，他流亡国外。

这个人选是无可挑剔的，但他在诺沃提尼的改革中却没有成功，他的作用是在“布拉格之春”期间发挥出来的。这也可以证明，改革的理论并不比改革的勇气和诚意更重要。

希克教授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允许他实行某种程度的改革以改善严重衰退

的经济状况，又要求他必须“利用现行制度的优点”，必须强调“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

在这种即要进行经济改革，又不能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有任何触动的两难处境中，经历了两年的犹豫、拖延，希克教授才能于 1967 年 1 月将自己起草并由主席团通过的“新经济模式纲领”正式实施。

在诺沃提尼时代，希克教授可以做到的，仅仅是扩大企业权限，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纲领的重点是，“建立市场经济，自发调节供求关系而不是人为地去规定；对工业实行分散管理；对企业实行物质刺激”。

这些措施即便在当时来说，也无多少新意，赫鲁晓夫这么尝试过，而南斯拉夫一直就遵循着这样的经济方针；然而，这些措施在当今的许多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纲领性方针，因此，我们很难说这样的改革是不需要的。问题只在于它的局限性和难实现性。

这次改革失败了。

除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层层阻挠，改革措施大多没能实施外，即使得以实行的部分也适得其反——扩大了权限的企业片面追求利润，盲目生产，使一些获利多的产品大量积压，而某些人民需要的产品却因获利少而减少了；有的企业利用价格下放，趁机哄抬物价，牟取暴利。

劳动群众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得到好处的只是利用权力下放和价格开放的特权者和各类投机者。

新经济措施没能解决因工人劳动积极性不高而造成生产效率低下的这个经济衰退的根本问题。希克教授要求扩大企业领导权力的同时，相应扩大工会权力，实行工人自治的主张不可能在那些由大小官僚占据着舒服位子的企业里实行。

既得利益阶层当然不会被一个小小的教授的改革主张赶下台去——尽管希克还是一位中央委员，官僚们却没有把他当成自己圈子里的人。这个政治头衔是业余兼职，他只是知识分子，只是一个教授，比起搞政治出身的职业官僚来说，他仍然是异类、是微不足道的。

工厂仍然是老样子：“冷漠的工人不听领班工长，领班工长不理厂长，而厂长则用谎言来欺骗布拉格的部长们。”

这次改革招致了更多的经济困难：物价上涨、食品短缺、工人缺勤严重、生产停滞、政府财政赤字在 1967 年达到 50 多亿克朗（约合 6 亿美元）。

几年的折腾和失败使捷克人明白了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社会主义改革设计不能交给官僚去执行，因为这些人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们的权力和利益。

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管理中渗透了官僚政治，官僚们决不可能根据经济规律和社会利益作出决定，人事关系和政治权力的考虑是压倒一切的。这些政治弊端，当然不是经济改革可以革除的。

希克教授等人终于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经济改革没有政治上的改革配合，就不能发挥作用！”

于是，希克教授等科学家开始将注意力转到政治解决上，呼吁政治改革的迫切性。这种智囊式的呼吁和进谏当然不可能动摇一个经营了数十年的官僚结构。

诺沃提尼既然没有能力迫使他的庞大的官僚机构接受经济改革，又怎么可能迫使他们接受对官僚来说更加致命的政治改革？

在这儿我们又看到了赫鲁晓夫式的悲剧；再说，诺沃提尼本人也绝不会同意政治改革。他之所以让经济学家们试一试，而把关闭森严的大门启开一条小缝，

是因为他相信可以不触犯官僚政治而单独解决经济问题。也就是说，经济上某种程度的自由化可以考虑，但政治上的民主化却绝对不行。

经济解决失败了，政治解决的课题肯定会提到日程上来；官方自上而下的改革失败了，自发的、自下而来的改革浪潮必然涌来。

这一切都发生在“布拉格之春”之前，可以说，“布拉格之春”的产生不是因为保守和拒绝改革所致，而是一场不彻底的、失败的改革所引发出来的更深刻的革命。

现在，1967年的春天已经逝去，下一春天还得等待半年，然而这一次，这个善于忍耐的民族，这些等待了几百年的人民不再等待了。

## 六

人民愤怒了——对那个糟蹋了社会主义，又未糟蹋改革的官僚政治愤怒了。

然而捷克人没有感情用事，他们思考着，对改革投入了更多的热情和理智。

从1964年改革开始，捷克斯洛伐克人就焦急而又理智地关注着改革形势。他们愿意将信任交给科学家，让他们有时间精心设计，他们愿意将耐心给予官方，让政府有时间稳步实施。

这绝不是对改革冷淡、超然、漠不关心，而正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成熟——

1956年的匈牙利悲剧记忆犹新，他们不希望狂热、暴力、流血来干扰他们的目标。

捷克人已经没了“一觉醒来，天下大变”的幼稚。那几年，人民关注着、倾听着、思考着……

他们认真地了解希克教授的改革思想，也仔细地阅读科学院28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历史学家和物理学家联合发表的关于改革的意见书《处在十字路口的文明》。

这份报告是在科学院哲学所拉多万。利赫塔博士领导下，对捷克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进行综合调查研究的结果。

这是对捷克病的一次全面会诊。

科学家带着严肃的思考和权威登上了社会舞台。他们宣称“迄今为止，政治家利用了科学家，而从现在起，科学家将决定政治的步调。党的主要任务之一，将是为科学发展开辟和扫清道路”。

这些，捷克人民都看到了。对人民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人能思考和参与改革，捷克人感到无比振奋。这是他们的幸运和骄傲——10年前的匈牙利不正是缺少这样的文化精英，缺少这样的深思熟虑和精心设计才造成了开始的混乱吗？

然而，要把改革的思考 and 设计变为实践，把科学家的理想变为政治现实，还得依靠另一部分社会精英——行使政治权力的政治家们。

于是焦灼而又耐心等待的人民又将信任交给了政府。

这一次——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人民失望了。

现在，1967年夏天，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的危机已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人民在焦急地等待之后，会如何对待政府所给予他们的失望？他们对埋葬了社会主义、又同样埋葬了改革的官僚阶层的愤怒，会将他们引向何处？

尽管没有枪声，没有动乱，也没有上街游行，但在1967年夏天，捷克斯洛伐克的危机是深重的。

对此，诺沃提尼惊慌了，克里姆林宫也惊慌了。他们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中感到了一股潜在的、1956年匈牙利式的危机。

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面临着一次重大的历史选择。

在这次历史关头，捷克人民又一次表现出令人尊敬的克制：他们没有因为失

望、不满而铤而走险，没有不负责任、不看目标、不顾后果地凭感情用事——这又是一个与匈牙利事件不一样的地方。

捷克人选择了、行动了。他们的策略是：运用民主力量，对保守的、阻挠改革的官僚施加压力，而把他们的热情、信任和希望交给共产党内进步的一翼、支持他们站出来，将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帜举起来。

此时，后来与“布拉格之春”联系在一起的几位著名改革家还没有为人民所认识和理解。因此，可以说，不是这些政治家造就了“布拉格之春”，而是捷克人民推出了这些改革家，并使他们与“布拉格之春”一起成长、前进，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

人民中蕴藏的，绝不只是狂热和破坏的力量。这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身上得到证明——在理智的驱使下，这个民族爆发出巨大的、但又是冷静而有秩序的力量。

1967年，捷克人民所有的这种力量，连同他们的情绪、意志，就要在作家们的活动中体现出来了——作家将以猛烈的火力展开对旧体制的政治批判……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不愧为人民的良心，民族的灵魂。

七

作家们带着人民的焦虑和不满去攻打旧的政治体制。他们完成了经济学家未完成的对旧体制的批判，完成了政治理想的设计。

科学家从经济和科技着手去振兴民族，作家们却从政治和社会着眼去思考民族的命运；科学家为确立新的目标而忙于改革设计；作家们则带着人民的不满和焦虑去批判旧的政治体制。

捷克作家是“布拉格之春”中的一支劲旅。他们凭借的与其说是艺术家的才

华和文学手段不如说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在捷克斯洛伐克，很少有专门为消遣、为纯艺术、为自我而写作的作家。

“在他们的传统里，政治与文学始终携手并进，所以，捷克的主要文学家大多能跨越写作与政治这条界线。”

尤·伏契克，一位作家会被送上绞架；而即使要上绞架还能写出象《级刑架下的报告》这样的作品，这就证明这个民族的作具有怎样的政治意识和使命感。

如果以纯文学的观点看，这当然是文学的不幸。但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藐视那些精神贵族的藐视，而肯定地说，这是捷克作家的光荣，是捷克人民的幸运。

捷克作家没有游行示威，没有拿起武器，也没有在地下策划反政府的政变，

所以没给我们留下可歌可泣的壮举。然而，他们的斗争是很有效的。

作家们在向诺沃提尼的官僚政治发起全面进攻之前，曾有过一次动员和演习。

1963年4月，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的斯洛伐克作协代表大会上，作家们检讨了他们曾经接受和宣传过斯大林主义的道德问题。他们承认，“我们中每个人的良好声誉都有一个永恒的污点，因为我们都谴责过斯兰斯基、克列门蒂斯”这些专制制度的受害者。

作家诺沃麦斯基在愤怒地对专制表示抗议和控诉的同时，沉痛地检讨了作家被迫充当专制工具的耻辱。

他在发言中说：“我们曾努力说服我们的读者，要他们相信谎言是正确的，我们曾使一代人误入歧途和产生混乱。他们现在正站在这个会议厅的外面，无依无靠，迷糊不解，不知所措，他们站不稳脚跟。对于这一代，我们必须还给他们自信、信任和真理；但首先我们必须在自己心中找到这些东西。”

作家们找到了。



他们宣布——

作家有权利和义务宣传“正确的观点：即马列主义观点”而不是官方的主观意见；作家应该“只尊重那些与社会主义道德原则不相冲突的指示”；他们还宣称，共产党员的觉悟“决不应理解为驯服地服从领导机关的庸俗态度，而应该是从不掺假的马列主义原则出发，对一切事实作出客观的判断”。

作家们找到了“不掺假的马列主义原则”这个思想武器，使诺沃提尼政权特别恼火。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些要用马列主义原则改造共产党的共产党员，而不是要否定共产党的反共人士。这给直接地、公开地镇压带来困难。

诺沃提尼能做的只是指名批评了某些作家，说他们“间接地攻击党的政策”，并警告说，作家们“正在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

这次交锋到此为止。对作家来说，这是一次思想更新，一次行动操练，它使作家们可以在更接近真理和人民的前提下越来越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生活中的一股真正起作用的力量。

决战是在 1967 年 6 月 27 日捷克斯洛伐克第 4 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开始的。

这次在布拉格举行的会议，有 400 多名作家出席。党的代表团也相当庞大，它由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负责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亨德利赫带领。代表团成员包括了教育部长、文化部长和新闻部长。

这个代表团加重了这次会议的政治色彩，再加上强烈的政治情绪和政治性极强的会议议程。这次大会简直不象文学界的一次盛会，倒象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事实上，这次大会的政治影响也不低于一次党代会。

率先打响战斗的是党员作家昆德拉。他选择了自由与专制、人道与非人道的

题目。

昆德拉明确地针对群坐在主席台上的文化官员说：

“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感到不舒服，他们会说：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当然，任何自由都要受到种种限制。但是没有哪一个进步的时代曾经为自己的发展规定过限度……只有在我们这里则不同，把维护禁区看作是比冲破禁区更大的美德。”

昆德拉还对斯大林主义的虚伪性和它的反人道实质作了深刻的思考。他说，他不把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前者并不存在道德问题，它没有人道主义的面具，我们很容易对它加以识别和反对。但斯大林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继承者，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运动的继承者，它保留了这个运动的许多理论、观点和口号。而实际上，“这样一个人道主义运动正在走向相反的歧途，正在摒弃人类的种种美德，正在把爱护人类改变成残害人民，把爱好真理改变为指责真理……”

昆德拉对斯大林主义的虚伪性及反动本质的揭露真是一针见血，其深刻性远远超过了赫鲁晓夫那篇著名的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正因为作家们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人道主义原则给予肯定和呼唤，在后来的“布拉格之春”中，政治家才能勇敢地把人道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目标。

有了昆德拉的发言，所有的与会者都感到一场真正的战斗开始了。他们群情激奋。

接着，一位作家在大会上宣读了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上个月写给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信。

因为作者所具有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这封信未能在莫斯科宣读。捷克作家能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公开这封信，既表明他们的勇气，也表明这场斗争已经深入到什么地带。

索尔仁尼琴的信主要是控诉审查制度的。他说：“审查制度象石头一样压在我国头上，迫使我们的作家服从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吏的胡作非为……”

他也指责苏联作家协会，说“它自己就是最大的毁损者之一，它怯懦地将 600 名无辜的作家置之不顾，这些作家遭到迫害，结果被放逐、监禁、关进集中营，甚至死亡”。

冲破的禁区越来越多了。反专制，要民主；反斯大林主义，要人道精神；反审查制度，要文化、新闻自由的呼声成了这次大会的主旋律。

官方代表团长曾经几次上台，耐心地劝解作家们，别脱离马列主义世界观，别偏离党的路线。

这种陈词滥调当然不可能改变会议的进程。

于是，捷共代表团团长亨德利赫脱掉外衣，穿着衬衫和背带裤到台上发表了一篇尖锐谴责的讲话，训斥这些越轨、造反的作家。

这种激动的表演同样未能奏效，反而用他自己的形象将诺沃提尼政权的统治人格化、具象化了——那是一个倒运的、被击败的政客，一个既要反扑，又无力自卫的形象。

最后，亨德利赫只能愤怒地拂袖而去。

大会继续进行，并达到高潮——尤其是国家文学奖金获得者、41 岁的党员作家卢·瓦丘利克的大会发言。

瓦丘利克以政治权力为题，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弊端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

控诉。

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发言。瓦丘利克以一个作家的敏感，将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政治气氛、人际关系、人民的处境、心态都准确地感受到了。他的充满激情的发言既深刻又富有文彩。

瓦丘利克一开始就把政治恐怖和专制统治所造成的社会现实描绘出来，并痛心疾首地宣称在这个社会里已经没有什么公民了。

他说：“政府倒下去，公民就重新站起来。反之，在政府长期站立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公民是倒在什么地方呢？我不准备讨好敌人，说他们是倒在级刑架上的。只有几十个或几百个公民会有这样的遭遇。但这已经够了，因为这接着就会使全国陷入恐怖之中，使人们回避政治，要求很低，只关心一些细小的日常琐事，使人们越来越依附那些基层的统治者，形成一种新的和不寻常的农奴制。”

瓦丘利克认为，一些平庸无能的人能行使权力，并构成这个社会的权力中心，是因为“当权者喜欢那些内心世界和他们相似的人们”。他说，“得到信任的人是那些俯首贴耳的人，那些不会制造麻烦的人，只要当局不提问题，他们也不会提任何问题的那号人。在选拔各级人才时，被选中的总是些庸才。那些头脑复杂的人，特别是那些品德高尚，成绩卓著，因而成了衡量公共道德的标准的人则从舞台上消失了。”

瓦丘利克尖锐地批判了现存制度对人和人的价值的冷漠：

“20 年来。任何一个关心人的问题在我国都没有得到解决：从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起，如住房、学校、生活福利，一直到那些在当今世界不民主的制度下不可能得到满意的更高级的要求为止。例如：人在社会中的充分价值感；政治决定要服从道德伦理准则；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等。”

瓦丘利克强烈地为自由呼吁：“为什么我们不能生活在我们想去的地方？为什么一个裁缝不能到维也纳去住 3 年？为什么一个画家不能到巴黎去住 30 年？然后再……作为一个自由的公民，而不是一名囚徒回来呢？”

瓦丘利克批评当局对自由的压制：

“只有在不需要谈论自由的地方，自由才真正存在。人们谈论他们看到的现实，这使当局生气。可是它不去改变客观现实，却想改变人的眼睛。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失去唯一有价值的理想——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公民的理想。”

瓦丘利克认为失去自由的社会，将是失去创造力的社会：

“我站在这儿说话时，并没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感，而这个自由感是每个公民都应该有的。我倒是感到我正在胆怯地利用公民和当权者之间的某种休战状态，我感到我正在犯罪……统治集团本身、政府和政府成员，他们自己有公民权力的保证吗？没有这种保障，就不能有任何创举，甚至连一个政策也创造不出来。”

瓦丘利克没有选择恶毒咒骂的字眼，但这篇演说的份量却是显而易见的——深刻，而且有着非常准确的现实针对性。它甚至超过了以往所有的反共人士对这个制度的批判份量。

然而瓦丘利克不是反共人士，他是一位作家，一位人民的代言人。他的力量在于他的背后有整个民族正在悄悄地诉说着同样的话题；他同时也是一位共产党员，他的讲话只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一个伪社会主义的批判。瓦丘利克的深刻在于他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绝不矛盾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这次发言的最后，瓦丘利克严肃地声明了这一立场：

“当我批评当局的时候，我并不是批评社会主义，因为我相信，在我国发生

的事情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并不认为，当前的统治制度就等于社会主义（可是统治当局却总是这么说）。前者的命运并不等于后者的命运。”

要说明的是，瓦丘利克的这篇演说未能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出来。它是在 1968 年“布拉格之春”期间才与读者见面，并成为这个春天的基本纲领之一。它是“民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宣言书，是“人道的社会主义”的雏型。

瓦丘利克因为这次大会发言而被开除出党。这个决定是在 3 个月后召开的捷共中央九月全会上作出的。

在这次全会上，气急败坏的诺沃提尼，对“传播对社会主义有害的、与共产党格格不入的意见和思想”实行全面反击。

这次全会取消了作家杨·普洛哈磁卡党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因为他在作协代表会议上发出警言：“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作家，还有一个统治者，还有一个读者”就要为民主自由斗争到底。

和瓦丘利克同时被开除出党的还有作家克利马、利姆、姆尼亚奇科；作家昆德拉受到严重警告。

全会还决定将作协的《文学报》划归文化部和新闻部直接领导，该报的 19 名编辑被开除，成立新时编辑部。减少分配给作协印刷厂的纸张。

这次反动是全面的，连经济改革也要停下来——限制在报上讨论改革，不准希克教授再召集改革委员会会议、不准他公开讲话。

专制又一次占了上风。然而没关系，这些作为日后运动的指导思想已经写在作家大会的决议中了——“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在于，它的纲领能自觉地抵制文明进步的非人道方面，抵制它的非人道主义倾向”。

这是人民的愿望。既然人民的意志已经明确地表达出来，那么顺应这股强大

意志力的阶层和个人迟早会汇集起巨大的政治力量。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次小小反复，这点儿黎明前的黑暗是短暂的。对捷克

人民来说，重要的是作家们完成了经济学家未完成的对旧体制的批判，完成了政治改革的设计。

现在——1967年冬天就要降临的捷克斯洛伐克，痛苦有了，成熟的改革思

想有了，不成功的改革实践有了，摧毁旧体制的壮举有了，表达整个民族意志的勇气也有了；现在，改革派共产党人应该登上舞台了。

被霸权扼杀的春天——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二）

赵启强

本文系作者大著《光荣的荆棘路——改革家们》第四篇（二）

八

首先站出来的政治家是杜布切克。他准确无误地感觉到了人民的信仰——同人道准则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杜布切克勇敢地把这一信仰写在改革的旗帜上。

捷共党内，进步的一翼就要以改革家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了。

科学家、作家以及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为呼唤春天已经有了那么多的思考、

设计和艰难的斗争之后，政治家才出场，这似乎晚了一点，可见“布拉格之春”

不是他们组织发动的。

不过这并不重要，当人民的意志已经明确表达出来，当人民的力量已经被某

一具体的目标团结和调动起来的时候，能代表这种意志的政治家是杰出的政治家，

能顺应这股力量的政治势力会陡然壮大起来；同时，有了优秀政治家的加入，人

民的力量会更加凝聚，目标会更加清晰，接近目标的希望会更加增大。这种政治

现象在1967年的捷克表现得十分明显。

首先站出来支持改革的政治家是杜布切克。

杜布切克从倾向于进步事业，到完全站到人民行列之中并被改革浪潮推上他事业的巅峰，成为 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明星和最高领导人。

“布拉格之春”是和杜布切克的名字分不开的。

1967 年，这位年仅 46 岁的斯洛伐克人，担任者斯洛伐克党的第一书记和捷共主席团成员。他毕业于莫斯科党校，是一位职业政治家。

对一个极权专制制度下的职业政治家，人们很容易将他与关起门来争夺权力的密室政治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对杜布切克是不公平的。

从个人气质上讲，他文静，从不专横地显示自己。他在公众面前讲话时，常常用微笑来掩饰他的紧张和慌乱。这与那类喜欢板着面孔显示自己无所不知的官僚有很大区别，公众当然会对他产生亲切感。

在个人品质上，杜布切克“不是权迷心窍的人，也不是想利用权力来谋求个人私利的人”。对这一点，公众当然知之甚少，但人们都知道，杜布切克夫妇和 3 个孩子一直住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过着很简朴的生活：他自己开车，并且常常到公共游泳池游泳、跳水，到体育馆和老百姓一起看冰球赛……

这些当然不是衡量一个政治家的主要标准，但与诺沃提尼和其他党的高级领导人纸醉金迷的生活却形成鲜明对比。人民是很看重这些品质的。

然而杜布切克远远不是靠这些性格、品质上的小特征就获得全民族的支持而成为一次伟大运动的领袖的。

首先杜布切克是一个有信仰的当权者。他的信仰不是那类外在的、僵硬的一——象许多政客常常玩弄的——政治口号，而是一种对人的真诚和人道的信仰。这种信仰与人民内心深处所保留的道德准则是相符的。



人民是敏感的，他们当然会准确无误地觉察到杜布切克的这种信仰，并因此对杜布切克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和信任。

另一方面，“他也相信人民——他是深切地，真诚地相信——而人民也相信他”。

杜布切克对人民既具有信任、真诚，也具有一个政治家的敏感，他准确无误地感觉到人民要求同人道主义相联系的社会主义，而反对同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

人民的这种愿望和杜布切克的道德、政治信念是不矛盾的，所以，1967年杜布切克作出了与他那文静、温和的性格极不相称的选择——加入民主社会主义行列，与诺沃提尼极权统治进行公开的、面对面的斗争。

杜布切克不具有顽强的性格，也没有控制着党、政、军的最高权力，但因为他是带着对人民的真诚、信任和理解进行战斗的，他很快就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和政治权威。

对抗是在我们前面提到的九月中央全会上开始的，杜布切克对新的文化专制和镇压浪潮表示反对，他不同意开除作家们。

杜布切克的反对没能改变主席团的决议，但他以一个公开的、积极的反对者出现在党的最高层，其意义是很重大的。

诺沃提尼是害怕政治上的动乱才把改革严格地限制在经济领域，现在，政治危机以无法回避的势头找上门来，扑向诺沃提尼。

九月全会后，杜布切克与诺沃提尼的关系严重恶化，诺沃提尼下令掐断他在布拉格办公处通往党中央的专线电话，甚至还派秘密警察对他进行盯梢。

这位温和的人被激怒了。

10月底，党中央再次举行全会，杜布切克激烈地发言重申他在九月全会上的立场，同时指责诺沃提尼蓄意破坏改革，指责他的独裁专制、压制民主权力；尤其在民族问题上，杜布切克尖锐地批评诺沃提尼干预斯洛伐克事务，损害斯洛伐克的经济。

由于历史原因，由于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地理、经济、文化和人种上的原因，这两个民族的差异是很大的。民族问题——或者说较为落后的斯洛伐克的问题，一直是捷克斯伐克的一个大问题。

诺沃提尼进行了反击，他指名道姓地说杜布切克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说如果杜布切克对中央的民族政策提出异议，那么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经济可以分开，斯洛伐克别再指望得到中央的帮助。这是以民族分裂的罪名威胁杜布切克。

杜布切克没有退让。他说要讨论经济分立，就必须先讨论整个政治制度，必须先讨论政治分权。要分先从上面分起，从党政分起！

问题涉及到了整个政治体制，涉及到诺沃提尼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的这个最引人怨的敏感问题。会议失去了控制，这个经营了几十年的政治结构松动了一下。权力核心的每一个人都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

开始，斯洛伐克的官员站在杜布切克一边，但当矛盾进一步激化，问题进一步扩大到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以及政府机构的权力职能、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等一些更重大的问题时，一些捷克领导人也支持了杜布切克的立场：要求党政分开，要求诺沃提尼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

民主与专制，改革与反改革，真改革和假改革，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场使捷共分裂了，而且优势在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一边。

在这场斗争中，权力第一次失去了它一贯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其说是改

革派政治家的胜利，不如说是显示了自己的意志和力量的人民的胜利。

处于波动局面的诺沃提尼采取了拖延战术，他宣布因意见分歧太大，一时无  
法统一，全会暂时休会到 12 月继续召开。

诺沃提尼准备丢掉中央委员会这个已经变得不驯服的工具。他还有两张王牌  
可打——莫斯科的干预，以及用军队来保卫他的权力。

诺沃提尼向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提出要求，请勃列日涅夫尽快到布拉格  
来进行对他有利的干预；同时，他准备利用军队和保安力量，逮捕改革派领袖。

1967 年的严冬降临了。

九

勃列日涅夫干了一件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最失策、最令他后悔的事——他把诺  
沃提尼抛弃了。

改革派共产党人在等待 12 月的中央全会，诺沃提尼则寄希望于他的苏联老大  
哥。全会休会后，诺沃提尼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 50 周年的庆祝活动，更主要的  
目的当然是去谋求莫斯科的支持。

诺沃提尼 11 月 2 日返回布拉格，同一天，勃列日涅夫也秘密到达布拉格。改  
革派领袖们对苏共总书记的突然来访——而且是同诺沃提尼同时到达感到吃惊。

勃列日涅夫用两天时间同许多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政界领导人谈话，提出许多  
问题。勃列日涅夫要了解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要知道现在和  
诺沃提尼对抗的领导人是哪一类人。

勃列日涅夫未能见到杜布切克，因为后者在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勃列  
日涅夫显然对这位政坛新星很感兴趣，多次问起他。

11 月 9 日晚上，捷共中央主席团设宴招待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默不作声地吃着，宴席进行到中途，他突然站起来宣布：“这是你们的事情，同志们，苏共和苏联不干涉你们的内政。”

勃列日涅夫说完这句话便马上要求派车送他到机场。在返回莫斯科途中，勃列日涅夫还顺便在布拉迪斯拉发停了一下，连夜看望了杜布切克。

勃列日涅夫用不加干预的方式完成了对捷克内政的干预。

勃列日涅夫决定抛弃诺沃提尼，因为诺沃提尼把捷克斯洛伐克搞得一团糟，他看出来诺沃提尼的统治已经不能有效地控制这个国家了；而这个国家的安定对勃列日涅夫的整个东欧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勃列日涅夫非常了解诺沃提尼的无能，并且不喜欢他；还有，他不能忘记 3 年前，诺沃提尼那封为赫鲁晓夫下台表示遗憾的电报。

然而这位总书记却不了解杜布切克是怎样一位政治家，不了解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已经兴起的改革浪潮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勃列日涅夫干了一件地整个政治生涯中最失策、最让他后悔的事——几个月后，他就为这次错误付出了代价：他不得不率领整个苏共政治局到捷苏边境的小镇切尔纳和强硬的杜布切克谈判。那次，无论他怎样暴跳如雷，也无法让这个年轻人就范；之后，他又不得不采取军事干涉的下策。这次军事行动把他的道义和政治资本都输得精光。

诺沃提尼的一张王牌打出去了，而且又输了。现在，他的得力盟友已经寥寥无几，剩下的只有阴谋和暴力了。即使到了这种时候，诺沃提尼也不准备退出政坛——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必须革命到底，至死不渝。

1967 年 12 月中旬，重要的捷克斯洛伐克部队举行大规模的冬季演习。这是诺沃提尼在演习对布拉格的军事包围，同时使部队处于戒备状态以保卫他。

诺沃提尼制定计划，如果 12 月 16 日中央全会可能撤销他的职务，就把军队开进布拉格，逮捕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

参与这个阴谋的有负责捷克斯洛伐克党、政、军保卫工作的党中央第八部部长马穆拉，国防部副部长杨科上将，国防部党组书记谢伊拉少将。

为了这个计划，驻扎在首都附近的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处于戒备状态，准备随时开进首都；同时，对改革派领袖和进步人士的逮捕证已经准备好，只等马穆拉签字了——其中有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这样的政治家，也有瓦丘利克那样的作家、知识分子。

这些军事行动被军队的总政治部主任普尔赫利克中将察觉了，而这位将军又是倾向于改革的将领。这个阴谋尚未实行便流产了。

形势变得对诺沃提尼更加不利，但他仍然凭借着几个亲信的支持，在全会上继续斗争。至少在主席团，诺沃提尼的支持者还能占有微弱的多数。

全会继续了 3 天，均势不能打破，只好又一次休会，准备过完圣诞节再开。

1968 年元月 2 日，捷共具有历史意义的全会继续召开。此时，中央的派别斗争的消息已经传到社会上，公众和新闻舆论开始对政治家施加压力——要求诺沃提尼下台。

被逼急了的诺沃提尼突然把自己装扮成改革和民主的捍卫者，同时准备牺牲他的亲信亨德利赫，让此人为他的错误政策承担责任。

诺沃提尼的挑选非常高明，亨德利赫是 60 年代诺沃提尼政策的主要制定人，也是这两年为诺沃提尼应付困难局面的关键人物。亨德利赫长期主管着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对新闻、作家和整个文化界作过许多公开的、不得人心的干预，他几乎一直为诺沃提尼充当恶人。

另一方面，诺沃提尼的这种挑选也是要冒风险的——如果他不能把亨德利赫变成一头替罪羊，那他等于砍掉了自己的一只胳膊。

这一次，诺沃提尼又输了，他早已失去了任意主宰他的臣民的龙威。

亨德利赫愤怒地反抗了。

那是在全会期间的一次主席团会议上，诺沃提尼突然将矛头倒向他自己一方，

他向亨德利赫发问：“亨德利赫，你知道你女儿在干什么吗？她向《证据》提供了材料！”

《证据》是捷克斯洛伐克流亡分子在巴黎办的杂志。几个月前，31岁的作家贝奈斯因为为《证据》提供材料而被判处7年徒刑。在对贝奈斯的审讯中，发现了亨德利赫的女儿兹杰娜参与了此事。兹杰娜确实将国内的材料秘密地送给了流亡分子办的这份杂志。

在6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许多党的高级领导的儿女都公开或秘密地从事着反专制的民主活动。比如教育部长齐萨博就是因为其女儿参加了1965年的大学生“反党示威”游行，而丢掉了部长职务的。

然而现在毕竟不是1965年。

亨德利赫愤怒地顶了回去：“安托宁，你休想把我变成另一个巴拉克，那是决不会得逞的！”

巴拉克是原政治局委员、内务部长，因向诺沃提尼个人权威挑战，1962年竟被安上贪污罪、判处15年徒刑。西方称这次判决“结束了捷共最高层中进步分子的第一次造反”。

亨德利赫的反戈打破了平衡，诺沃提尼的总理列纳尔特也跟着风向的转变而把票投到了杜布切克一边。

1月4日，主席团进行表决，诺沃提尼以4比7的劣势，被迫交出了第一书记的职务。

1月5日，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诺沃提尼辞去第一书记、并由杜布切克继任的消息。

诺沃提尼尽管还保留着总统的职务，但诺沃提尼政权毕竟已经死亡，只等举行一次葬礼了。

此时正值残冬，春天已隐约可见，它一步步逼近残冬，向大地走来了……

十

面对着完全不受官方控制的民主浪潮，杜布切克显示出一个当权者的最大气魄，他说：“让我们不要害怕这个浪潮，让我们从中学习吧！”

捷克人没有因为1月的胜利就狂热地涌上街头，去要求一个全新的天地；也没有把诺沃提尼的下台当作最终的胜利。

捷克斯洛伐克人已经能认识到，灾难并不在于诺沃提尼或少数几个人的阴谋和罪恶，而是一个制度问题。这是捷克人比赫鲁晓夫的高明之处。

捷克人民用审视的目光注视着杜布切克，要他证明他的上台并不是密室政治的一次秘密交易，要他证明这一次的领导人替换，与20年来所有的任何一次领导人的替换的性质是不相同的——那几次，领导人换了，整个官僚机构还继续存在，保安机关和声名狼藉的司法机关依然充当着压制民主的工具。

在杜布切克周围，一些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的改革派政治家和作家们把人民这种无声的审视变成强大的改革压力，敦促杜布切克拿出更大的勇气。

杜布切克没有让人民失望。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杜布切克的政绩是值得称道的——

为防止改革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干扰——以后的事实证明，杜布切克的顾虑不是多余的——他对邻国进行了访问：1 月 29 日访问苏联；2 月 4 日与匈牙利的卡达尔会晤；2 月 7 日与波兰的哥穆尔卡会谈。

撤消了九月全会对作家们的惩治：给瓦丘利克等入恢复党籍，给昆德拉恢复名誉；《文学报》复刊，改名为《文学通讯》。这个刊物在整个“布拉格之春”期间成了运动的一面旗帜；

让作家们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召开了代表大会并民主选举了新的作协领导。

为 50 年代大清洗中的政治冤案作出更彻底的平反……

杜布切克上任后，曾阅读了党的档案材料，当他详细地了解了 20 年来的迫害、暴行和血淋淋的冤案情况后，这位共产党的领袖失声痛哭了，他发誓决不让这样的悲剧在他的国家重演。

对日益活跃的民主气氛，杜布切克不但没有摆出最高统治者的架子给人民规定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相反，他大胆地将民主与人民行使权力等同起来。他说：

“民主不仅是一个人有权利、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人民“对国家大事负有共同的责任并能共同作出决定”。

在 1 月以后的几次公开场合，杜布切克还谈到“人的自我发挥”，谈到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主张，谈到阶级斗争只是初期的手段，而绝非社会主义的目的。

杜布切克不仅谈论民主、人道，同时还在公众集会上对一些反民主、反人道的机构和个人进行了公开的、指名道姓的批评。紧接着，这些被杜布切克批评过



的捷共中央书记、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内务部长和总检察长被撤了职。

杜布切克确实利用他所得到的权力作了一些激动人心的事。然而这毕竟是任何一个新上台统治者都愿意做、也可能做到的。

杜布切克面临的重大考验和选择是——对权力本身将如何处置，尤其是他将如何对待处于统治权力另一端的人民的民主权力？

考验首先来自已经不被政府控制的新闻部门以及被它们所激发出来的民主意识。

1968年初，获得了某种程度自由的报刊电台空前活跃起来。人民从报刊、广播里听到、看到了大胆得难以置信的文章、广播后，政治热情和民主意识空前高涨。编辑部和播音室成了人民心目中的圣殿。人民倾听着、阅读者、思考着，对民主改革表示了令人激动的热情和关注。

对过去的谴责和对新的政治体制的讨论越来越大胆、深入了。这些并没有受到官方的干预；相反，党和国家的一些新领导人也公开地参加这样的讨论——如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姆林纳日。其中，斯姆尔科夫斯基是1968年最受群众爱戴的演说家和改革派首领。

斯姆尔科夫斯基57岁，斑白的头发使他象一位充满智慧的长者，修长的身躯蕴藏着巨大的激情。他是50年代政治恐怖的受害者，坐过8年监狱，不久前平反出任农业部长，“布拉格之春”期间被任命为国民议会主席。他是最坚定的改革家，是杜布切克最亲密的合作者，他把自己的改革思想坚持到苏联出兵之后。斯姆尔科夫斯基最早是在报纸上撰写文章，呼吁要“坚决纠正和克服对社会主义的歪曲”。他坚持要废除高级干部的终身制“使人们能够光荣地离开和回到高级职务、甚至最高职务”。

在政治生活中，他强调“必须恢复民主精神，必须创造一种自由交换意见和互相争鸣的气氛，让最有价值的先进思想战胜保守落后的思想”。

在以后几个月里，斯姆尔科夫斯基激进的政治主张和改革活动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在许多公众集会上被越来越多的群众所了解和崇拜。

在 1968 年的头几个月里，官僚机构实际上已停止运转，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崇拜的，已不再是那些占据着高位、操纵着官僚机器的人，而是那些与人民贴得最近、又能抓住听众注意力的人。

3 月下旬，面带笑容、满怀激情的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布拉格市中心的“卢米埃尔纳大厅”向青年党员演讲时，只能容纳 3000 人的大厅，挤进了 6000 多人。斯姆尔科夫斯基的演讲给青年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将他们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对改革进程的思考。

这次进行了 6 个小时的会议，通过了一项提交国民议会的决议：

一、要求诺沃提尼离开总统府；二、正式取消新闻检查制度；三、实行旅行自由；四、实行有效的政治、经济改革；五、对一切事情都应向人民说真话；六、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七、与苏联建立平等的关系。

这 7 条很能说明人民的政治觉悟以及人民希望即将来临的春天给他们带来什么。

报纸、刊物、电台空前活跃；人民对改革前景空前关心；人民的意志迅速反映出来，并对政治家的活动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这种政治现象是害怕而加以制止排斥，还是大胆顺应并组织引导这股力量去实现人民的目标？这是区别一个政治家是官僚政客，还是人民领袖的重要标志。

刚上任的杜布切克就面临着这样的考验。

在 1968 年的头几个月，如果杜布切克停留在对诺沃提尼的胜利上，如果他仍用旧的、已经落在他手里的权力机关实行统治，那么，权力垄断的大门是向他敞开的，这结果是他必然会拒绝将来自人民的政治力量引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而最终与这股力量处于敌对的位置。

这种假设不是没有根据的危言耸听。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次被人民拥戴上台的政治家，尽管在初期也能惩罚旧的罪恶，也能运用从旧统治者手中接过的权力做一些与人民的愿望相符的事，但由于他没有将民主力量直接引入政治事务，而只是为民作主，结果都没有逃掉被旧的、与人民分离的权力所异化，而最终堕落成一个反人民的统治者。

然而在 1968 年的布拉格，我们这种不祥的假设没有成为事实。

面对这股强大的、完全不为官方控制的民主浪潮，杜布切克——这位沉默、文静的政治家，证明他确实具有一位领袖的气魄，他说：“让我们不要害怕这个浪潮，让我们从中学习吧！党应该分析和领导这个浪潮。”

杜布切克对民主力量的爱惜和重视，竟被当时和后来的一些人说成是优柔寡断、不能控制局面。实际上，一个政治家不依靠专制权力实行领导则需要更大的魄力和引导民主力量的政治天才。

杜布切克是“布拉格之春”得以顺利诞生的助产士。这是捷克人民的幸运，也是杜布切党的幸运。在此之前，杜布切克并没有表现出他具有一个杰出领袖的品质——马克思的渊博深刻，列宁抓住历史时机的敏锐和勇气，拿破仑的意志——但因为他作出了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位政治家在人民爆发出智慧和力量的时刻才敢于作出的选择：大胆地投入人民的行列，而不怕被人民的力量所淹没。他才成了 20 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联系这一点，我们便不能接受个人在历史上无所作为的观点——有了杜布切克在 1968 年头几个月的勇气，姗姗来迟的春天终于降临到布拉格……

十一

权力的交接并不就是时代的交替，如果为诺沃提尼政权举行的葬礼不能同时将旧的统治方式一起埋葬，那么旧的专制迟早会悄悄从后门回来。

诺沃提尼政权的葬礼是 1968 年 3 月 22 日举行的。在此之前，诺沃提尼曾经作过一些精疲力竭、毫无希望的反抗，他甚至到工厂基层去作演说。他以为，靠他的工人出身和“要警惕知识分子专政”的挑拨，就能争得工人阶级的支持。他要是能早一点明白工人阶级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就好了。

这位早就失尽人心的政治家，这个工人出身而根本没有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总统到这种时候才去接近人民，人们当然会把他跟想吃葡萄的狐狸联系在一起。幸亏国防部发生了一件事，才使诺沃提尼停止了这场令表演者和观众双方都很难堪的表演。

2 月底，在国防部的报纸上，发表了佩比赫少将的文章，第一次公开了去年 12 月末遂军事政变的丑闻。

文章发表后，政变的两个主谋，国防部党组书记谢伊纳携儿子叛逃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杨科上将自杀身亡。

这样一来，就把诺沃提尼一个人暴露在这件丑闻的中心。

尽管诺沃提尼又采取了牺牲别人、推卸责任的老一套方法——取消了谢伊纳的军衔。

尽管诺沃提尼确实具有一位政治家忍受众人嘲笑和责骂的勇气，尽管要这位职业领袖退出政治舞台确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但在这次突如其来的打击下，

他终于顶不住了，于3月22日向国民议会正式提出了辞去总统职务的辞呈。

诺沃提尼搬出了他呆了12年之久的总统府。

新就任的总统是72岁的斯沃博达。这个名字在捷克语中是“自由”的意思，

然而在50年代的大清洗中，他并未保住个人的自由，反而被监禁。

现在，这位面容慈祥的白发老将军真能以他的名字作为一个新时代的象征吗？

人们非常习惯于将一个统治者的下台或一个政权的覆灭说成了是一个时代的

结束：沙皇被推翻时，人们庆贺过新时代的到来；1956年，当斯大林被赫鲁晓夫

彻底否定后，人们又欢庆过斯大林时代的终结。然而历史曾经多么刻薄地嘲笑这

样的欢庆啊。

旧的统治者和旧的政府消失了，可旧的机构、旧的统治方式、旧的思想、旧

的秩序，一句话，旧的政治经济体制仍然保留着，它们必然造就出它们以前曾经

造就过的那类领袖和政权。这绝不是人的意志力量可以抗拒的。

权力的交接并不能保证时代的交替。捷克斯洛伐克人会不会把他们的政治理

想降落在权力交接点上？这是1968年的历史不动声色地注视着。

现在，一些意想不到的政治内幕真相已经透露，诺沃提尼及一些高级官员已

经辞职，不寻常的大胆语言已经习以为常，经历了这种激动人心和痛快淋漓的阶

段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无所事事而又若有所失的倦怠，这会不会就是政治狂

热换来的结果？捷克斯洛伐克会不会一切又重新开始——老百姓照常上班，照常

过日子；官员们照常到各部、各局、各机关办公，行使权力？

如果是这样，捷克斯洛伐克人在1967、1968年的奋斗便与以前许多次失败的

改革、革命毫无两样了。

捷克人民没有失败，他们已经接受了哥穆尔卡波兰的教训；在那里，在享受

了巨大的热情和民主快慰之后，旧的极权制又悄悄从后门回来。因此，捷克民族必须保持住政治热情和从下面施加压力的民主力量，并使这种力量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制度化、法律化才能最终摧毁旧的制度。

这就是捷克人民在 1968 年春天对政治改革所寄托的希望。

全民族对当前时刻所寄托的希望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不顾改革派导演的计划自己登上“布拉格之春”的舞台，并且权威地支配着改革的进程。

特别幸运的是，改革派领袖没有萌发过将这股力量赶下台去的念头，而是在这股力量的驱使和支持下，拿出了一個全新的政治改革设计——四月《行动纲领》。

“布拉格之春”，在《行动纲领》的带领下，降临捷克斯洛伐克大地了。

十二

捷共将民主政治作为改革的行动纲领，是因为他们终于懂得：社会主义如果牺牲民主，倒霉的还是社会主义自己。

从题目上看，《行动纲领》就区别于以往那些与政治实践脱节的官样文章。

这份长达 60 多页的《行动纲领》是杜布切克在 2 月初提议，由专家们起草完成的。希克教授主要负责经济部分，曾经组织过《十字路口的文明》调查报告的里赫塔博士和后来成为捷共中央书记的姆林纳日着重起草改革的政治部分。

这个纲领在 2 月底就制定出来，3 月上旬，主席团成员分别赴各州县，与地方党组织举行了 60 多次关于纲领草案的讨论会议。

现在，改革派在中央委员会尚未占据绝对多数，新领导必须从党的中下层领导那里获得支持，以争取在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过。

社会舆论对纲领草案的修改有了很积极的介入，使纲领能更大程度地表达人

民的意志。尽管如此，当主席团于4月2日通过并宣布这个非常激进的改革纲领时，还表示“这个纲领并不是改革的定论”，应该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在经济体制改革部分，除了以前有过的扩大企业权限，加强市场机制之外，最值得一提的是“成立工人委员会，实行工人自治和民主管理”。“企业职工选举产生的职工委员会有权任免企业经理、决定企业方针和计划”。

纲领将扩大的企业自主权直接交给了生产者。

企业自治和工人自治并不是同一概念，只有后者才能真正体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原则。

《行动纲领》的最大成就在于对政治体制作根本性改变。这是与反对党和国家的集权专制和实行政治民主化同时并举的。

纲领首先承认，捷共已从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政治组织蜕变成凌驾于社会之上、对人民实行统治的特殊利益集团。

为改变这一状况，纲领指出：

“共产党依靠的是人民的自愿支持，它不是靠统治社会来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而是靠忠诚地服务于社会的自由、进步的社会主义发展而赢得它。党的威信不是逼出来的，而必须依靠自己的行动不断赢得。它的路线不能靠命令来贯彻。”

纲领表示，“党的目标不是当社会的‘总管家’，用自己的指令捆住社会的手脚，对生活的每一步都加以限制。”

对于实行镇压职能的保安部门进行整顿和彻底改革，把它们的权力局限在保护国家安全，对付外国敌对活动的范围里。纲领强调，要坚决制止公安机关对公民政治信仰和观点的干预、限制。

纲领指出：

“没有犯罪的每一个公民可以放心地看到，他的政治信念和观点，他的个人信仰和活动不会成为国家安全机关注意的对象。党明确宣布，不允许这个机器用来解决内部政治问题和社会主义矛盾。”

以往的专制极权都是以警察统治为手段的。保安部门作为扼杀政治民主的直接工具，对社会的政治恐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纲领的这一条款无疑是一个对民主化进程的保证。

纲领没有仅仅满足于对政治生活中的集权专制进行批评，它同时把民主政治作为行动纲领的最终目标。它确认了国民议会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唯一的立法机构，而国民议会通过直接普选产生。

纲领将确保公民的权力、自由以及人民能监督政府、参与管理国家，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它指责过去的体制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弄颠倒了，所以不仅妨碍了个人的发展，也阻挠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纲领提出社会主义为人民提供的自由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多，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的公民自由是形式上的就否定自由本身，而应该赋予它实际内容。

对此，纲领对民主、自由作了十分具体的规定：

1，要由法律保证公民有建立自愿组织，兴趣组织和社团的可能性，不要以官僚主义加以限制；

2，公民有讨论和影响国家决策的自由，“不能通过任意解释、依靠权力规定允许他们知道什么和不允许他们知道什么，他们哪些意见可以公开讲，哪些意见不可以公开讲……必须系统地研究舆论，研究的主要结果应公布于众。”

3，实行新闻报道自由，取消新闻检查，“排除实际上存在的事先进行新闻



检查的可能性……在报刊中要把国家的官方立场、党的机关报和新闻评论加以区别”。

4.迁徙自由，“法律要准确地规定行动自由，特别是公民到国外旅游的自由；主要的是公民有权在国外长期或持久居住，不许把人们无根据地置于流亡者的地位。”

《行动纲领》将民主和自由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因为历史早已证明，没有民主自由就无法清除官僚政治，而不清除官僚政治，改革就必定失败。

保守势力习惯将民主、自由划入资产阶级范畴，仿佛民主化、自由化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社会主义是非民主、不自由的。长期以来，这种观点竟常被用来作为捍卫社会主义的武器，真是天大的讽刺。

1968年的捷克改革派共产党人，将政治体制的改革放在改革的首位，又将政治生活民主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决条件，是他们为20年的专制统治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终于找到了这样一条真理——社会主义如果牺牲民主，倒霉的还是社会主义自己。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前提，社会主义是民主的一种形式。改革派共产党人呼唤民主政治正是为了重建社会主义。所以，纲领称这次伟大的运动为“社会主义事业复兴”运动。

在纲领中到处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奋斗目标：“新的、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

；“具有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拥有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

“具有发达文化的社会主义”；还有更准确的提法：“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

1968年4月1日，杜布切克在中央全会上发言，论述《行动纲领》的思想。

他宣称，人是社会主义思想中占中心地位的因素。

杜布切克所说的中心地位，不仅仅指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不仅仅指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爆发出非常大的劳动力、创造力，可以吃很大的苦，耐很大的劳，可以移山，可以填海；而是指社会主义应该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放在中心地位，而民主则是实现这个伟大思想、走向人的解放的第一步。

在这次全会上，捷共的某些领导成员曾担心《行动纲领》的实施会使共产党在民主力量的压力下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担心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会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对这种担忧，杜布切克镇定地表示：“公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关心国家大事”是好事，党必须采取灵活的适应性以便能接近人民。他认为，共产党应该在人民的支持下实行自己的职责，而不是用暴力进行统治。

杜布切克建议：“今后，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组织——不管是军队还是体育组织——都不要再做为共产党服务的顺从的传送带。”

1968年4月5日，经过几天的大会讨论和排除了保守势力千方百计的阻挠之后，捷共中央委员会批准通过了《行动纲领》。

“布拉格之春”全面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它宣告了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20年的斯大林主义统治结束了；同时，新的组织在这个经过了重大手术的国家肌体上生长起来——

4月6日，即中央全会通过《行动纲领》的第二天，列纳尔特总理代表政府向总统斯沃博达提出辞职；4月8日，改革的倡导者切尔尼克被任命为总理，并着手组建新内阁；4月18日，改革派政治家、“人民代言人”式的人物斯姆尔科夫斯基被任命为国民议会主席；4月下旬，切尔尼克在国民议会提出施政纲领：保证贯彻四月《行动纲领》，沿着人道的社会主义路线前进。在新施政纲领中，

切尔尼克提出一条原则：“今后政府将主要向国民议会负责，而不是向党负责”

；

5 月 13 日，国民议会通过一个法律草案，为所有 1948 年到 1956 年非法审讯的牺牲者平反；5 月 27 日，政府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安全、司法部门侵犯公民权力的“非法行为”，为投诉秘密警察的罪行打开了道路……

5 月底，民主化进程达到高潮，从人民中写来的信件和电报雪片般地飞向捷共中央，对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等改革派领袖表示支持，同时要求在即将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上，把阻挠改革的保守派撵走。

当时，党内的改革派与受到苏联支持的保守派已经阵线分明，后者在 110 人的中央委员会中占有 40 个名额。

5 月 29 日召开的中央全会，没能实现民众的愿望——彻底清除保守派。因为改革派没能在中央委员会里控制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

当然小小的胜利还是有的，那就是将声名狼藉的诺沃提尼——保守派到此时也愿意牺牲他了——及 6 名对过去大清洗负有直接责任的官员开除中央委员会，并暂停他们的党籍。

经历了许多苦难和失望之后，捷克斯洛伐克人终于有了成熟的政治设计和成功的行动了。

这一切都是在春天发生的。这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季节。捷克斯洛伐克人在这个辉煌的日子里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他们当然有权利怀着喜悦的心情等待着丰收。

然而，当捷克人民播种希望的时候，有没有人偷偷地埋下了灾难的种子？这是需要等待才能证明的。

捷克人必须等待，就如他们的作家瓦丘利克所说：“刚刚结束的春天是一去不复返了，要到冬天，我们才能明白一切。”

美妙的5月就要逝去了，尽管她不一定能将丰收给予这个辛勤耕耘的民族，她——1968年春天依然是辉煌的、美丽动人的……

被霸权扼杀的春天——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三）

。赵启强。

本文系作者大著《光荣的荆棘路——改革家们》第四篇（三）

十三

捷克斯洛伐克人是伟大的，他们最早赢得了春天；捷克斯洛伐克人是不幸的，她身后站着一个凶眉怒眼的巨人……

人道、民主意识在摆脱了专制恐怖之后，登上了1968年的政治舞台，并且在整个春天威风凛凛地控制着局势。

可是保守分子和极权专制的拥护者还在整个权力结构中占有许多职位，并得到克里姆林宫的支持。过了5月，这个强有力的对手显示出来的危险越来越明显了。

在5月全会上，尽管改革派得到的胜利是微小的，共产世界的教皇也迅速作出了反应。5月29日，也就是捷共中央全会将诺沃提尼等6名中央委员开除的当天，华约部队总参谋长、苏联将军卡扎科夫率代表团抵达布拉格，宣布华约部队将在捷、波境内进行军事演习；5月31日，布拉格电视台播放了苏军演习部队从乌克兰调往捷克的新闻……

捷克人的政治视线被这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吸引过去。被改革、民主鼓舞起来的喜庆气氛顿时被不祥和压抑的情绪所取代；另一方面，这次军事行动却鼓

舞了中央委员会里以比拉克、英德拉为首的“斯大林主义派”，使他们更为团结和充满信心。

保守派反守为攻，在以后几天的全会上，对杜布切克进行猛烈的攻击。党内的派别斗争明朗化了，反改革的阴谋也公开了。

改革派领袖希望在9月所召开的“十四大”，能够选出一个进步的中央委员会的计划受到挫折。

改革派不能坐等“十四大”的召开，于是也激烈地投入了战斗。

全会闭幕的第二天，杜布切克便到改革的根据地布尔诺。

在有6000人参加的党员干部大会上，杜布切克对保守派进行了回击。他称保守派是民主化进程的“最大危险”，并且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把这些人都称为“反动派”。

杜布切克的战斗姿态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

改革派的其他领袖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等人也分赴全国各地，到工厂、到基层党组织去宣传改革。

这是一场比推翻诺沃提尼政权更加艰难的战斗。

保守派的首领、斯洛伐克的第一书记比拉克和中央书记英德拉也同样周游各地，发表演说，找支持他们的各级官僚召开秘密会议。保守派还散发数万张不署名的传单，指责改革派“背叛社会主义”，说改革派设计的新社会主义模式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这些传单没有敢直接攻击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改革派最高领导人，而仅仅点到了新任副总理的希克教授和作家协会新任主席戈尔德斯图克，但它的矛头所指是十分明确的。

按说，改革派占据着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又有全民族的拥护，保守派的这种手段应该说是软弱的反抗、愚蠢的暴露。然而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此时，克里姆林宫已经明白，牺牲诺沃提尼，给最初的改革开放绿灯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它不准备再错下去。

由克里姆林宫指挥的华约国家合唱队首先喊出了对捷克改革的干预。仍在掌权的邻国斯大林主义者东德的乌布利希、波兰的哥穆尔卡公开干预捷内政，对杜布切克施加压力。因为他们的专制统治正处于危机之处，他们唯恐捷克的民主化运动会蔓延到他们国家。

他们把“布拉格之春”描绘成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和帝国主义的阴谋，说改革派与美帝国主义以及西德复仇主义狼狈为奸。

东德和波兰都对布拉格电台进行干扰。东德政府禁止布拉格出版的德语报纸在东德发行。一家东德报纸为了证明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正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竟然报道了“美国兵伪装成拍摄电影《里马根桥》的临时演员，进入捷境”的消息。

波兰在春天发生了要求民主化的学生运动，被哥穆尔卡说成是受了邻国“敌对社会主义的势力”的欺骗和煽动。为此，哥穆尔卡指名批评了捷克的“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波兰还因为捷克报刊上报道了波兰国内动乱的消息，而向捷提出强烈抗议。捷克的外交官庄严地进行了反驳，他说：“捷克斯洛伐克的报刊是自由的，它应该发表什么，不应该发表什么是不能由政府规定的。”除了舆论和外交的压力，还有赤裸裸的军事威胁和暗示：苏军总政治部主任皮谢夫将军在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上说，“只要有一个捷克政府要求援助，苏联军队随时可以采取行动。”对这种粗暴的干涉，任何一个民族都可能上街游行，至少也会到这

个国家的大使馆门前去扔石头，砸碎几块玻璃。

捷克人却以他们的教养和幽默选择了另一种回答方式。

5月17日，当这位身材矮胖的将军随苏联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布拉格时，代表团刚走下飞机，布拉格电视台的女记者、非常美丽的哈弗利奇娃迎上前去。她绕过代表团团长、苏国防部长格烈奇科元帅径直走到皮谢夫面前，把话筒举到将军挂满勋章的胸前。

这位漂亮的女记者迷人的一笑，非常有礼貌地问道：“您是否确实曾提议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干涉？”于是所有的电视观众都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这位将军非常艰难地微笑了一下，用俄语说，“这是一件蠢事。”当然，他当时绝无笑的兴致，有的只是难堪和愤怒，但他不敢不笑，不敢不说这句他绝不愿说的话。

政府对这一系列粗暴干预的回击也是冷静的、富有理智的。

5月中旬，由切尔尼克总理和希克副总理主持了一个由东西方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切尔尼克重申了新政权的指导原则是“强调公民民主权利和自由”；并宣布正在准备通过一个保障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新法律；同时新的选举法也正在起草。

5月13日，国家电台就国外对捷克民主化运动的攻击进行反驳，它说：“这20年来的实践使我们相信，没有民主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性质越来越清楚了那是民主与专制的斗争。

5月13日，捷共中央机关据《红色权利报》就民主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意测验。这等于号召全国人民都投入这场斗争、都来回答民主的命运是否决定改革的命运？

以下是这次 20 个民意测验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当只有共产党一党起领导作用时，你能说这种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

共产党是应该通过努力促进自由的、进步的社会主义发展来实现其领导作用呢，还是应该对社会主义进行统治来实现领导作用？

新的政治制度在作出政治决定的时候，是否应该为社会主义的各集团和各阶层的人们的广泛要求提供自由、民主的讲坛？

捷克斯洛伐克的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不是我国的内政，是不是必须由我国人民的独立意志来决定？

.....

这些问题并不难，它们的答案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的。如果这只是一场关于真理的讨论、只是真理与谬论的较量，问题就简单多了，民主的胜利唾手可得。因为捷克人民已经在专制下付出过代价，已经为民主进行过冷静的思考，已经从改革中尝到失败的教训，他们已经懂得了什么是民主，懂得了民主对社会主义、对改革是生死攸关的。

然而在 1968 年 5 月，改革派共产党人和捷克人民面对的是站在真理对面的强权、挡在民主前面的专制。真理即使已被人民所认识所掌握，它能不能获得自己的生存尚是一个令人揪心的难题。

对民主化进程的险恶威胁象恶梦般压在刚刚呼吸过春天芬芳气息的捷克民族身上，刺激着他们刚刚苏醒了的主权意识；同时，改革派领袖在强权压力下所采取的不妥协态度，从另一方面鼓舞着捷克人民。

压抑和鼓舞，担忧和希望，对未来的信心和发生悲剧的预感都交织在一起，刺激着这个冷静而成熟的民族，要他们拿出更多的勇气和热情。



#### 十四

《2000 字宣言》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渴望民主、改革心态的写照，它激发出最动人的民主、人道意识，也招致了最险恶的粗暴干预。

不仅有春天的播种，还有夏日更加艰辛的耕种。捷克人拿出了比春天时更多的热情，将支持和信任交给改革派领导人，以敦促改革事业不致在內外的压力下停顿下来。

在这次行动中，率先冲锋的又是科学家和作家们。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不愧为民族的先导。

月初，作协主席戈尔德斯图克和副主席利姆率众前往北部煤炭钢铁中心俄罗斯特拉发市，作政治性游说访问。那里的一些工人因为前几年不成功的经济改革造成的物价上涨，使他们成为“改革”的受害者而对当前的改革存有疑虑。保守派曾利用了这一点。

作家们揭露了以往官僚利用手中的持权和改革提供的机会巧取豪夺的事实，讲述了民主政治对经济改革的必要保证；还讲到了平反昭雪，讲到了工人自治对民主进程举足轻重的影响。

作家们的论述引起了工人们的兴趣，他们频频提出问题和作家们讨论，并以热烈的掌声对新的改革思想表示欢迎。

除了演说，更有力的武器当然是作家手中的笔。

在“布拉格之春”期间，许多深刻的改革思想不是出自理论家，而是出于作家笔下。

作协的《文学通讯》上发表的许多文章，成了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布拉格之春”增添了许多绚丽的色彩。其中显著名的是由作家瓦丘利克执笔的《2000

字宣言》。

这份宣言发表在 1968 年 6 月 27 日的《文学通讯》上，距他在 1967 年 6 月 27 日的作协会议上发表那篇著名演说整整一年。

在“布拉格之春”期间，除了捷共的《行动纲领》，没有任何文件比瓦丘利克的《2000 字宣言》影响更大。

因为这篇宣言，瓦丘利克于 1969 年被又一次开除出党；因为这份直言，苏联找到了出兵的理由。当然，没有这份直言，苏联也会找到借口。这篇文章对捷克的政治改革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它向人民直告：在国家的政治事务中，群众是可以作为自由人行动的。

《2000 字宣言》作为要求民主、反抗暴政的记录，其形式和内容都给以后的人无论是理论家、政治家，还是以艺术为使命的作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要了解“布拉格之春”，必须了解《2000 字宣言》；就如《行动纲领》是改革派共产党人最权威的改革宣言一样，《2000 字宣言》是捷克人民渴望民主、改革的强烈呼声。

宣言对这场改革的命运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个文件。

宣言首先从历史检讨开始：

领导上的错误路线，使党从一个政党和思想上的联盟，变成了一个权力组织，使得它对那些权欲熏心的自私自利者、可耻的胆小鬼和心怀鬼胎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渗入党内，影响了党的性质和作风。

统治者的主要罪恶和最大骗局是，他们把自己的专横说成是工人阶级的意志。

然而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工人有这种罪过。工人实际上什么事都没有决定过……实际上是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阶层以工人的名义进行统治。这

些人实际上占据了被推翻了的阶级的地位，自己成了新的贵族。

宣言指出，改革是共产党拯救自己的最后机会：

我们正处在民族文化的复兴之中。它是在共产党内开始的。当然，需要补充的是，这一过程也是不可能在别的地方开始的。因为整整 20 年来，只有共产党人能过某种政治生活，只有共产党内的反对派才具有同对手接触的优越性。因此，民主共产党人的首创精神和努力，是偿还整个党由于把非党人士置于不平等地位而对他们欠下的债的唯一办法。因而对共产党无任何感激可言。

削弱了共产党的权威的，并不是人民的批评和反对意见，而是这个制度本身

:

经过了 20 年没有受到任何人反对的统治之后，这个领导显然必定疲沓不堪了。

那个制度的基础和意识形态中所包含的全部缺点，显然已经完全熟透了。因此让我们不要过高地估计作家们和学生们所提出的批评的意义。经济是变革的根源。我国的情况是普遍的贫困和政治制度的彻底崩溃，我们听任某一类政客轻易地牺牲我们的利益，作出不讲原则的事情，因此，不是真理压倒一切，而是别的东西都耗尽，剩下的就只有真理了。没有举国欢庆的理由，只能说有了一线希望。

《2000 字宣言》阐明了这样的立场——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性质；改革应争得党内改革派的支持：

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观点：说可以在没有共产党人，甚至在反对他们的情况下进行某种民主复兴。如果这样，既不公平，也不合情理。共产党有很好的组织，必须支持他们中进步的一翼。他们有经验丰富干部；归根结底，他们手中握有决定性的杠杆和按钮。公众面前摆着他们的《行动纲领》，这也是第一次解决最大的不平等现象的纲领，任何其他人都没有提出任何同样具体的纲领，应该要求他

们在每一个县、每一个村镇向公众提出自己的行动纲领。

捷共正在召开他们的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将会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让我们要求它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更好一些。如果共产党现在说它希望依赖于公众对它的信心而不是使用暴力，那就让我们尽可能信任它。

宣言强调，民主不仅是在法律条文上写出权利属于人民，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属于谁？社会的经济命脉是否掌握劳动者手中：

今后民主制度的实际质量，取决于工厂的命运和工厂内部会发生些什么。尽管我们讨论了这么多，经理们还是可以要挟我们。因此必须找到一些好的经理，并且支持他们……

工人们作为生产者可通过把什么人选入企业管理机构和企业管理委员会来对这场斗争施加影响。他们能为自己作出的最好选择，就是把天然的工人领袖，有才能和廉洁的人作为自己的代表选入工会机构，而不管这些人是否党员。

《2000 字宣言》号召人民运用冷静而合法的民主力量，迫使阻挠改革的官僚辞职，但绝不采用暴力，以免造成混乱：

如果目前对中央的政治机器不能有更多的愿望，那就必须在各县、镇取得更大的成就，让我们要求那些滥用权力、掠夺公共财产、行为不正或残暴的人辞职。必须找到迫使他们离职的方法，比如：公开批评，作出决议，游行示威，组织示威性工作队，为他们退休征集筹募捐款，罢工，抵制他们上办公室等等。但我们必须拒绝采用不合法的、无礼的、粗暴的方法，因为有人会利用这些去影响杜布切克……

宣言请政府放心，当它面对强权的威胁时，它身后有整个民族作为后盾：

最近时期，外国势力干预我们国内的发展的可能性引起了很大的不安。面对

着优势力量，我们只能有礼貌地保持坚定态度，而且不去触犯别人。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政府知道，只要它遵照我们的委托办事，我们就支持它，甚至可以拿起武器来。

《2000 字宣言》在《文学通讯》上发表后，工会的《劳动报》，青年联盟的《青年战线》以及《农业报》立即转载了。

在瓦丘利克这份宣言上签名的有 70 人，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社会阶层：艺术家、科学家、体育工作者、教授、工人、工程师、教师、律师、经济学家，甚至还有农庄饲养员和个体农民。

这些签名者中不仅有共产党员，还有几位捷共中央委员。

《2000 字宣言》在 4 家报纸发表以后，在布拉格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大街上都摆上了桌子，征集签名。数以万计的捷克公民在声明上签字，支持这份宣言，支持改革。

宣言打破了僵持，给静静等待的捷克人带来了新的希望和狂热。“布拉格之春”达到了高潮。

同时，宣言的发表也给改革的敌人造就了施展阴谋的机会和借口。蕴酿已久的决战开始了。

十五

为了改革而拒绝人民对改革的支持，政府谴责了《2000 字宣言》；然而，改革派已无退路只能将改革进行到底！

《2000 字宣言》发表后几小时，莫斯科就得到了宣言全文。

克里姆林宫的反应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事实上，真正使莫斯科惊慌失措的，是民主所爆发的力量，而不是“甚至可

以拿起武器来”的誓言；因为克里姆林宫有更多的武器和更强大的武力。

当即，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给杜布切克，抗议这一“反革命”宣言，并要求捷共当局公开谴责这个声明。

也是这一天，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到党中央大厦去，在大门口的台阶上碰见了苏联驻捷大使。

这位以殖民地总督自居的大使板着面孔，一句问好的话也没有就直截了当地问他，准备如何对待《文学通讯》上的这篇文章？

斯姆尔科夫斯基当时还不知道报上发表《2000字宣言》的事，但他不喜欢这种不加掩饰的干预，就冷冰冰地说：“那是作家们的事，他们有权力说受他们的良心所驱使的话。”于是真是少有的事，一个大使居然向驻在国的首脑发起脾气来大使指责他说：你们的报纸无权发表反革命号召书！

这位大使同时要斯姆尔科夫斯基解释“甚至可以拿起武器”是什么意思？

斯姆尔科夫斯基从大使的质问中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抑制住个人的忿怒，尽快地了解宣言的内容，并召集议会讨论这件事。

当天下午，捷共主席团召开会议。保守派首先发言，他们说《2000字宣言》是反苏挑衅，说国内正面临着反革命内战的危险，说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就要在捷克重演。

保守派还强烈地谴责杜布切克，指责他听任局势发展到能让这样一个宣言出笼的地步。

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压力下，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派为了改革事业，为了不使局势发展到必须用坦克来解决的地步，竟然“悲哀地同意应该谴责《2000字宣言》”。

几小时后，捷共中央主席团发表特别声明，谴责《2000 字宣言》是“对当前整个民主化进程的明显威胁”。

中间派从中立到动摇，保守派从顽抗到全面反攻。英德拉发电报给各州党组织，要他们注意制止“反革命的煽动”；比拉克控制的斯洛伐克中央主席团则发表了一个更加尖锐的谴责声明。

形势变得严峻起来。

为了避免 1956 年的匈牙利悲剧重演，改革派领袖采取了最大的克制态度，以平息苏联的怒火。

在中央主席团表态之后，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要求切尔尼克总理，让政府出面反对《2000 字宣言》的结论。

一直拖到深夜一点，切尔尼克打电话告诉斯姆尔科夫斯基，他“说服不了政府，政府不想表态”。斯姆尔科夫斯基连夜赶到政府驻地。以国民议会主席的身份出席政府会议。他讲述了局势的严峻性，并警告说：“议会明早 9 点钟或 10 点等着你们总理的报告，如果你们不表明明确立场，那就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政府将在一个星期以后表态，但这将是另一届政府，而不是你们了。”28 日早晨，总理在国民议会讲话。公布了政府对《200 字宣言》的谴责声明。

要改革派领袖、尤其是要斯姆尔科夫斯基这样激进的改革家作出这样痛苦的决定真是令人悲哀。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种战略性撤退：为了改革而暂时拒绝对改革的支持；为了民主而暂时压制民主的呼声。

然而这种妥协真能为改革争得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吗？

这值得怀疑。

1968 年夏天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它和 12 年前匈牙利人所面临过的形势完全

一样要么完全、彻底地停止民主化进程，要么承受外来武力的干涉。

问题在于，在“布拉格之春”以后，即使是改革派领袖也无法改变运动的势头，更不用说使它完全停下来。改革派别无选择，他们只有让民主化运动发展下去，直到苏联出兵为止……

被霸权扼杀的春天——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四）

。赵启强。

本文系作者大著《光荣的荆棘路——改革家们》第四篇（四）

十六

即使军事干预的危险迫在眉睫，捷共仍然拒绝用旧的官僚主义警察统治来实现政治领导……

当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的攻击跨过国界、扩大到整个东欧和苏联，对改革的围剿才真正开始了。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展开了宣传攻势，说类似 1956 年匈牙利事件的“反革命势力”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蔓延；勃列日涅夫和几个东欧国家的领导人，频频展开外交活动，大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强调“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重要性；华约部队 7 月初，在捷境内和邻国的军事演习搞得热火朝天……

1968 年 7 月 8 日，勃列日涅夫及东欧 4 国的首领东德的乌布利希、匈牙利的卡达尔、波兰的哥穆尔卡和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分别电告杜布切克，要他 7 月 1 日去华沙参加华约国家最高领导人会议，讨论《2000 字宣言》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

7 月 9 日，捷共中央主席团讨论 5 国首脑的邀请信。

总理切尔尼克提议，在目前的局势下，党的中央主席团不应该参加共和国领



土以外的任何会议。

除了保守派比拉克和科尔德，主席团一致决定，拒绝这一命令式的会议邀请。

7月14日，华约条约最高级会谈，在捷克斯洛伐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

7月16日，华约会议通过了与会5国给捷克斯洛伐克的联名信。

这封最后通牒式的联名信，公开表示对捷克内政的干预。

联名信说：

我们不能坐视敌对势力把你们的国家推离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引起捷克斯洛伐

克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危险。这已经不仅仅是你们一国的事情了……

反动势力利用了捷共领导的软弱，滥用了“民主化”的口号蛊惑人心，发动

一场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及其忠诚可靠的干部的运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取消

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反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势力把黑手伸向报刊、广播和电视中去，把它们变成

攻击共产党的讲坛……这正是反动派能够利用《2000字直言》的形式向全国发出

号召，公开自己的政治纲领的原因。这个声明直言不讳地号召反对共产党和合法

政府，煽动罢工和骚乱。

因此我们相信，坚决击退反共势力的进攻，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

不仅是你们的任务。也是我们的任务。

到此刻，矛盾的焦点已经很清楚：当成千上万的捷克人民参与国家大事、

参与改革而打破了封闭式的官僚政治的秩序时，应该如何评价这种不安定的政治

局势是将其当成民主力量、民主政治的体现而加以珍惜、引导，还是当成反革命

动乱而加以讨伐？

这个矛盾当然不是出自认识上的差距，它深刻地体现了两个彼此对立的社会

集团在争取各自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斗争中所具有的完全相反的原则。

捷共中央立即召开了中央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拒绝五国联名信，并拟定了反驳这封指责信的复信。

会议坚定地表示，捷共将继续贯彻自己的方针路线，并表示捷共并不认为国内存在着来信中所说的“反革命危险”。

7月18日，杜布切克向全国人民发表电视讲话，反驳了华沙条约五国来信。

他以沉着和自信的语气向人民宣告了中央主席团的复信内容，并告诉人民，复信将提交中央委员会通过。

如果没有整个民族的充分信赖和支持，杜布切克在强大的压力面前是很难有如此的沉着和决断的。

7月19日，捷共召开中央全会，107名中央委员中的87名出席了全会。全体与会者一致通过了中央主席团的复信，并对杜布切克和中央主席团的不妥协立场表示了支持。

在这次全会上，甚至连反对改革的亲莫斯科分子比拉克、英德拉也与其他委员一样投了支持票；或许，反对派只是慑服于此时在全国爆发出来的民主和民族的威力，而不敢将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

这封语气温和而态度却十分坚定的复信断然拒绝了关于“社会主义受到威胁”和“捷共的政治作用在反动的、反革命势力的压力下趋于衰退”的指责。

捷共中央在复信中自豪地宣称：

我们党新的、民主化的政策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日益提高，绝大多数人民关心国家大事。我们认为，这是当前局势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我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中的绝大多数赞成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赞成言论自由。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正在努力证明，它是能够用一种不同于（过去的）声名

狼藉的官僚主义警察统治的方法来实现政治领导和管理。

当捷共和捷克人民用克制和妥协并没有换得对方对捷克内部的改革事业的谅

解和尊重后，捷克人民恢复了他们的热情和决心；捷共拿出了更多的勇气和力量。

从复信中摘出的短短几行就可以看出，捷共对于民主政治有了更加直截了当

地呼唤，对改革有了比4月《行动纲领》更高的目标；它甚至比某些来自下层

要求民主权力的宣言、声明具有更多的民主意识。

失去了民主自由的人民要求民主权力是正常的，一个在野的政治家或政党高

举民主的大旗也不足为奇；而一个仍然执掌着政权的政党，一个正行使着统治权

力的官方，能在它的官方文件中如此热诚地呼唤民主，的确是令人激动和尊敬的。

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权力，必须将自己的统治权力置于民主力量的监督、制约之

下。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她的“布拉格之春”给社会主义事业留下了一个伟大

的文件，给社会主义改革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以后几个月的深重危机中，捷共能得到整个民族的巨大支持，其答案就在

这里了。

然而另一方面，改革的目标越明确，民主政治显示出来的力量越强大，克里

姆林宫的态度便更加强硬。

对于以官僚、警察、军队统治着本国、也控制着东欧的霸权来说，这同样是

生死攸关的大事。它必须扼杀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事业。这是决心已定的事。它

的时机已不多了，它的手段除了赤裸裸的暴力，也只剩下谈判桌上的威胁了。

苏联向捷共提出邀请，请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去莫斯科、基辅或其他城

市与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谈。

捷共非常理智而正确地拒绝了这次邀请。

他们熟悉东欧的历史，他们记得 1948 年铁托正确地拒绝了斯大林的会谈邀请

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同时也记得纳吉的几次失败的、悲剧性的谈判。

谁也不相信参加了这样谈判判后，还能带着个人和民族的尊严返回祖国。

最后，谈判地点选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小镇切尔纳。它距苏联只有 3 公里，

是一个很难在地图上找到的小镇。

1968 年 7 月 29 日，一辆专列从苏联开到切尔纳，载来了苏共 11 名政治局委员中的 9 位。克里姆林宫的三驾马车：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总理柯西金、国家元首波相戈尔内都在其中；同时，另一辆专列从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开来，送来了斯沃傅达总统和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全部 11 名成员。

这时，这个只有一个火车小站和 2000 人口的小镇突然成了世界瞩目的中心。

数百名新闻记者跟踪而来，他们预感到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较量就要开始了。

然而，这是一次失败的会议，它留下的只是一些戏剧性场面。

十七

一次就象老百姓在生活中吵架一样的会议，就能将专制和民主调和起来吗？

会谈是由勃列日涅夫怒气冲冲地将一捆剪报扔在谈判桌上开始的。

这捆剪报不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摘录，也不是苏共或捷共的重要文件。剪

报是从最近几个月来捷克的报刊上剪下来的，其中当然有刊登了《2000 字直言》的报纸。

勃列日涅夫逐一引用这些剪报作为捷共已失去控制、反革命在捷克泛滥的证据。

苏联代表逐个发言，指责捷共领导容忍“背叛社会主义事业”、“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势力泛滥。

杜布切克承担着大部分发言。他温和而耐心地解释，同时也坚定地宣称，捷共在这场改革中的唯一目标是建立真正的、最好的社会主义。

勃列日涅夫却采用了另一种发言方式，他显然是真正动了感情。他以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原则，忿怒地向杜布切克咆哮：“你们的政策居然让所谓‘自由作家’们来发号施令，这简直是发疯！他们是帝国主义爪牙，至少也是在干着帝国主义所希望的事！”勃列日涅夫的粗暴激怒了坐在杜布切克身边的斯沃博达总统。这位 72 岁的老人气得满脸通红。他说，如果苏联以这种方式谈判，他宁愿辞职！他说，他本来就是一介农夫，他任何时候都可以挂冠归田。

会谈室的温度稍稍降了一点。苏联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那是一份要求捷共“非撤换不可”的人员名单。

名单上有捷克党政负责干部，甚至还有报刊电台的工作人员。这个名单上有 250 人。

即使要捷共自己开出这种包括基层人员的详细名单也是有困难的，可见苏联对捷克内政的关切和熟悉程度；也可见苏联的情报部门的工作效率。

当然，捷方拒绝接受如此具体的国际援助。

第一次会谈进行到晚上 10 点也没谈出结果。

第二天的会谈又是以勃列日涅夫拿出一张报纸指责捷共领导开始的。

这是一份刚刚出版的捷共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

昨天的会议，苏方批评过这个报纸的编辑部，在 250 名非撤换不可的名单中，就有这个编辑部里的编辑。

捷方的代表紧张起来，以为这家报纸的社论或重要文章出了问题，说不定又发表了类似《2000字宣言》的文章。

这几天，国内舆论的焦点都在切尔纳会谈上，人民在报刊上以各种方式表示对改革和改革派领导人的支持，以加强捷共的谈判地位。对此，政治家们深受感动；但是在这种关键时刻应该谨慎，别让对方抓住把柄才是。

然而事情完全不是捷方所担心的那样。勃列日涅夫愤怒的不是社论、不是重要文章、甚至不是它的报道，而是最末一版下角的一则小小的广告。

那是某个基层单位的捷共党支部征聘党支部书记的广告。它要求的条件只是大学毕业的文化程度。

勃列日涅夫大义愤填膺地斥责：“这就是证明捷克整个局势危险的典型事物。

从没有被共产党的适当方法进行训练过的普普通通的人中间选用干部，要是搞这种事情，请问，共产主义会搞成啥样子？”勃列日涅夫是正确的，支部书记尽管比总书记小得多，但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权力的象征。怎么能将共产党掌握的权力随便交给一个仅仅是有学历的人呢？

捷方不同意勃列日涅夫的指责，他们用了整整两个小时进行争辩。

捷克共产党人也是对的，如果共产党内是民主的，那么书记仅仅是按党的章程和党员意志工作的办事员而不是掌权者；如果权力在全体党员手里，当然可以象征聘一名会计、一位律师那样去聘用一名能干的党务工作者。

会谈中所争论的问题就是这么琐碎和微小，但其反映出来的矛盾却是那么巨大、深刻和难以调和。

捷克人一点儿也不退让，这使苏方的谈判人员既愤怒又诧异，在他们与东欧的外交往来中，还从来没有过如此针锋相对的先例。

他们开始对捷克展开了非常激烈的攻击。乌克兰党中央书记谢列斯特肝火最旺，他攻击捷共搞反革命修正主义，甚至指责捷克人把传单散发到苏联境内，对苏联搞民族分裂。

他的态度完全不像一个大国的领袖人物，倒象一个发脾气的农庄主席在训斥工作中出了差错的农庄庄员。

谢列斯特一坐下，杜布切克马上站起来说：“假如您继续使用那种措词的话，即便继续进行这次会谈也不会有什么意义。”斯姆尔科夫斯基也站起来说：“如果再这样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导人举行会谈，我将不再参加这种有失尊严的侮辱性会谈。”于是捷方全体代表起来离开了会场。

后来，勃列日涅夫带着波德戈尔内、柯西金和谢列斯特登上了杜布切克的卧车。

表示了歉意之后，会谈才重新恢复。

然而矛盾无法调和，勃列日涅夫无法稍微长久一点压制他的怒火。他又发脾气了：他象老百姓骂架那样，骂捷克民族阵线主席克里格尔是“一个肮脏的犹太人！”；又象老百姓在生活中吵完架一样，骂完后，他气冲冲地离开了会谈室。

这一次是杜布切克去看望他。杜布切克离开了勃列日涅夫走后依然吵闹着的会谈室，徒步向苏联的专车走去，并在他的警卫人员惊慌失措地注视下，独自登上了勃列日涅夫的卧车。

这真是一次吵声不断、怒气不息的会谈。原订的宴会和记者招待会都取消了，这就更加深了会谈的神秘性。

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因为这次会谈而引起的紧张心理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

人民愿意用民族的脊梁去分担领袖们的重负；领袖们却宁愿自己默默地承受

到底。因为这是一副整个民族也难以承担的历史重担。

在切尔纳会谈之前，捷克人民就被危机感和责任感折磨得焦虑不安了。他们

深知捷克民族正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头。他们要求领导人拿出最大的勇气去

参加会谈；同时也准备用整个民族脊梁去承受历史的重负。

1968 年 7 月下旬，是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面临着最险恶的危机时刻，也是这个

民族显示她的智慧和成熟的伟大时刻。

7 月 26 日，在切尔纳会谈的前 3 天，《文学通讯》发表了由作家巴维尔·柯

霍特执笔的呼吁书。

呼吁书指名道性地写给以杜布切克为首的几位改革家，将人民的信任交给他们，

也委托他们在会谈中将捷克人民的意志宣告出来。

呼吁书写道：

同志们：在你们同苏共会谈的前夕，我写这封信给你们……正如历史上曾多

次发生过的那样，少数几个人将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情况是很困难的，因此我

们想以表示支持的方式对你们有所帮助……

同志们，你们的历史性使命就是要说服苏共领导人，要他们相信，根据我国

的利益和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利益，我国的复兴过程必须进行到底……

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可以用 4 个词来表示：社会主义、同盟、主权、自由。

请你们用无数的实例来说服对方，向他们表明，现在我们党的威信和社会主义

阵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稳固得多，请你们转告对方，我们需要自由、和平…

…

请你们代表我国人民来说话，在这些日子里人民已不再是一个抽象名词，他



们变成了创造历史的力量……

希望你们行动起来，进行解释，但一定要团结一致地捍卫我们已经选择、并且只要一息尚存就坚决走到底的这条道路。我们将每时每刻地关注着你们的工作。

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你们的报告。我们时刻想念着你们，希望你也时刻想着我们。

呼吁书发表仅仅几个小时，全国就掀起了一个支持呼吁书的签字运动。在布拉格和其它城市的街头都张贴着这份呼吁书，摆在街头的桌子随处可见，人们排着长队，等候着在呼吁书上签名。

历史上很少有人能用一篇短文将一个民族的意志、忧虑表达得如此准确；也很少有哪一篇短文能获得如此重多人民的响应。

呼吁书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请为我们写下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命运攸关的一页，请谨慎地写！但要鼓起勇气来写！失去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那是我们的不幸，你们的耻辱。我们信赖你们。

几百万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呼吁书上签了名，有的甚至写下了自己的地址。捷克共产党获得了它成立以来最令人激动的拥护。

人民与领袖如此紧密地拥抱在一起，历史上能有这样业绩的政治家并没有几位。

一个县的代表团曾经带着一本厚厚的签名簿专程赶到切尔纳小镇，要求会见杜布切克。他们带来了全县公民对作家柯霍特呼吁书的签名。

签名的有二万零几十人。他们说，这是全县的公民包括重病住院的病人都签了名，一个也不少。

斯姆尔科夫斯基代表杜布切克接见了这个县的代表团，也代表捷共接受了人

民在呼吁书中提出的 4 项原则：社会主义、同盟、主权和自由。

斯姆尔科夫斯基称这 4 项原则是“人民的纲领”。

领袖们没有无视人民的纲领和委托，他们带着整个民族的嘱托艰难地在切尔纳进行斗争。

然而历史却未能满足捷克人民的愿望。

经过了 4 天的艰苦会谈，当精疲力竭的领袖们返回布拉格时，已经是夜晚了。

领袖们没有给人民带回希望，却又不能把令人忧虑的前景披露给忐忑不安的人民。他们要求人民镇定，希望大家回家安心睡觉。

然而布拉格人不能入睡，领导人疲惫不堪的神情加深了他们不祥的预感。

人们聚集在国会广场，不愿散去，他们要知道会谈的真实结果。

群众要求杜布切克出来报告会谈情况。

斯姆尔科夫斯基来到现场，他登上一个阳台，对近万名群众说：“我请求你们让杜布切克同志休息一会儿……他一天只睡 3 个小时，他的脑子要考虑很多问题。他肩上挑多重的担子，这是别人无法想象的。”于是群众还有许多拥到他身过的记者，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

开头，他坦率地回答了：他理解人民的心情，也深知祖国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严峻的时刻。

到后来，当问题越来越临近那个险恶的事实时，他难于说下去了，只好停下来。

会场一片期待的沉寂、一片庄严的肃穆。许多人流下了眼泪，感到了自己的存在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斯姆尔科夫斯基懂得这种沉默后会爆发出什么样的力量。他必须抑制这股力

量，必须克制自己的热情，必须把苏联人在会谈中的压力隐藏起来。他懂得反苏情绪如果再有几分增长，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向群众保证，领导人绝不会背叛改革事业，改革必将进行下去。

群众固执地要知道会谈细节，甚至直截了当地问：是否存在军事干涉的危险？

斯姆尔科夫斯基断然否定了这个问题，并批评说这种假设是危险的、不负责任的！

这一次，他没有说服人。他的话缺少热情。一颗正直的灵魂是很难将热情给予谎言的，而没有热情便难以打动人心、取信于人。

有了更多的问题，有了更嘈杂的喊声。会见继续了两个多小时，人们仍然不愿意离去。

斯姆尔科夫斯基已经精疲力尽，他鼓起最后的力量喊道：“你们所有的问题我都回答了，你们还要求什么？”于是上万人的声音象一个人那样整齐地在广场上升起：“说实话！说实话！”人民要知道有没有武装干涉的危险？要知道捷克的改革是不是面临着匈牙利人 12 年前经历过的灾难？是呵，只有在这个问题上，他才没说真话，也不能说真话。

现时，斯姆尔科夫斯基一定懂得什么叫历史重担；此时，他被不堪承受的重负压迫着。他无法将这副担子交出来因为他很清楚，有时候甚至整个民族也难以承受一副历史重担。

捷克斯洛伐克的 1968 年就正是这样的时刻。

捷共的改革家必须将这一历史重负承担到底……

被霸权扼杀的春天——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五）

赵启强

本文系作者大著《光荣的荆棘路改革家们》第四篇第五部分。

十九

克里姆林宫有实力闯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境，却无法超越道义和国际准则的防线。因为它无法扼断这个民族的咽喉，窒息她的声音。

既然改革派领袖承受了这副历史重担，他们就得走向结局。

进入 8 月，结局已经明朗了：要么停下改革，恢复旧的统治，要么走向悲壮的失败。

既然两种结局都只能是以改革派的失败告终。他们当然宁愿选择后者，这样至少能将“布拉格之春”的精神完整和圆满地保存下来。

8 月初，刚刚结束了切尔纳会谈的捷共领导又赴布拉迪斯拉发参加华沙条约 6 国首脑会议。

此时，双方都对靠会谈解决问题不抱希望了。捷共只是为了把走向结局的过程尽量拉长，同时将他们所应该做的都尽力为之；另一方却是为不可避免的武力解决争取准备的时间。因此，会谈反而顺利了，只用了一天时间便签定一份冗长而空洞的协议。

在隆重的签字仪式上，6 国首脑勃列日涅夫、哥穆尔卡、乌布利希、卡达尔、日夫科夫和杜布切克都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同时还为 6 国的友谊互相拥抱、亲吻。

大家都是轻松的，因为谁也没有把对方的保证当真。

捷克人民也理解这个协议的意义。他们说：“在 1938 年，我们亲身体会过那种写在纸上、说在嘴上的‘友谊’究竟有多大价值。”几百万国民不安地注视着对方各种微小的动作。每天晚上都有大量的群众聚集在普日科德街一个小公园里，

那是布拉格人的政治讲坛，是人民的街头议会。群众在那里发表即兴演说，辩论问题。他们最关心和谈论最多的话题是那个强大的对手到底有没有勇气跨过道义和世界舆论的防线，来扼杀他们的春天。

历史磨炼了这个民族的预感能力。人民的预感是正确的。

莫斯科有力量跨过捷克的边境，它有不容怀疑的军事优势；但对跨过道义和国际准则的防线，它不是没有过犹豫。

勃列日涅夫之所以敢在最后时刻采取如此胆大妄为的行动，除了赫鲁晓夫 12 年前在匈牙利的成功引诱着他之外，尚有两个原因：首先他摸准了西方心理上的弱点。他们不相信苏联真会发动一场入侵，因而没有在外交和军事上对勃列日涅夫有过预防和警告。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苏联从捷克保守派那里得到了保证：他们可以在苏联出兵的同时成立一个新政府，并立即发出请求苏联出兵的邀请。

凭借这两个条件，苏联以为可以把 12 年前在匈牙利演过的戏搬到东欧的任何地区上演，而决不担心失败。

当几次谈判都未能扼杀“布拉格之春”的强大生命，当勃列日涅夫的耐心终于失去之后，苏联军队于 1968 年 8 月 20 日深夜，开始了本文开头已经描写过的那场入侵。

苏联对西方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尖端的雷达系统掩盖下，8 月 20 日深夜的军事行动居然瞒过了毫无精神准备的北约组织。

西方国家得到的第一批消息是入侵两小时候后从布拉格电台播出的报道中得到的。

军事行动成功了，然而在政治上，克里姆林宫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

勃列日涅夫有赫鲁晓夫用过的剧本和导演手法，却未能在布拉格找到赫鲁晓

夫在匈牙利找到过的那类优秀演员能向他发出出兵邀请的捷克政治家。

这出戏的第一幕就失败了。

发动军事入侵之前，莫斯科也曾对政治入侵做了周密的规划。然而，这些计划都失败了。

民主政治在与官僚政治的交锋中，显示了它无可比拟的优势。

在苏军入侵的 8 月 20 日晚上，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召开会议。中央书记卡什帕尔作了一个非常长的报告，主要是对两次会谈以后的国内形势进行批评，说捷共中央有人违背了会谈协议精神。

这是莫斯科导演计划中的一部分：在卡什帕尔的发言之后，将由比拉克和英德拉提出一个谴责国内反革命势力，要求杜布切克辞职的提议。

保守派知道入侵的具体时间，他们得将这场戏演到那一刻，然后，利用占领的消息通过这个决议，并立即成立新政府。

会议在争论中拖延下去。总理切尔尼克几次离开会场去接电话。23 时 40 分，总理最后一次回到会议室时，他面色惨白地向全体与会者宣告：“那 5 个国家的军队越过了我们的边境，他们要占领我们的国家。”除了保守派，其他人被这个消息吓得惊慌失措，说不出话来。

然而以后的事态发展却没有如保守派事先预料的那样，主席团会在惊慌和绝望中通过撤销杜布切克领导职务、成立新政府的提议；或是干脆在惊慌和军事威胁下到大使馆避难。因为这一个判断，保守派已派保安人员把守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南斯拉夫驻捷克大使馆。

事态一开始就违背了莫斯科的意愿。杜布切克在一阵忿怒之后，立即镇静下

来，并以他的惊人的沉着使整个会场安定下来。

中央主席团作出这样几项紧急决定：任何人不得辞职；所有领导人应坚守岗位；立即起草捷共中央主席团对入侵的抗议声明。

8月21日凌晨2时，捷共在得知入侵消息两个多小时后，中央主席团的告全国人民书在布拉格广播电台播出了。

告全国人民书宣告：5国军队越过了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主席，政府总理和党中央第一书记对此一无所知”。干涉军“应邀”而来的政治欺骗破产了。

另一方面，军事和暴力的征服仍然成功地按计划进行。凌晨3时，一排伞兵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步枪冲进了政府所在地。那里，从党中央大厦赶来的切尔尼克总理正在他的办公室召开政府部长会议，他要表明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政府仍在行使权力。

政府官员全部被捕，被迫脸朝墙壁站成一排，切尔尼克总理却被押上一辆装甲车带走了。

凌晨4时半，一队装甲车，一队坦克车和几卡车伞兵在苏联大使馆的小轿车带领下，包围了捷共中央大厦，士兵封锁了这座建筑。一些军官和便衣人员冲进去扣押了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民族阵线主席克里格尔。

军事征服完成了，政治较量开始了。

在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的是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苏联和它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代理人；在这场斗争中，经过了民主洗礼的弱小民族在强权面前所显示的气节和精神力量，足以与数十万军队抗衡。

21日凌晨，入侵士兵在布拉格和其它城市都遇到了群众自发的抵抗。

这使入侵士兵们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因为他们曾被告之，到捷克斯洛伐克

去，是要将捷克人民“从反革命手中拯救出来”，他们会受到人民的欢呼。

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人爬上坦克，把汽油倒在破布上点燃后，塞过坦克的排气管。几十辆 T-55、T-56 在大街上熊熊燃烧，发生爆炸。有的坦克被画上希特勒的符号。

21 日清晨，有几十人在这种自发的抵抗中被击毙，几百人负伤。

天亮后，人民含着眼泪服从了政府关于不进行毫无希望的武装抵抗的命令。

但捷克人采取了另外的反抗方式，青年人高举捷克斯洛伐克国旗，挥着死难者的血衣上街游行。他们高呼“杜布切克！杜布切克！”以及“俄国人滚回去！”布拉格人用国旗国徽的图象装饰街道和橱窗，还利用街头宣传手段把布拉格变成了反苏漫画和标语的大海洋。以至占领军竟下了一道不准在墙上张贴标语漫画和不准举行公共会议的禁令。

布拉格人还发动了一场“街道无名化”的运动，他们将所有的街道牌和门牌号都拆掉或涂上油漆，把路标去掉或掉转方向，许多地方被改成了“杜布切克大街”、“杜布切克广场”。布拉格成了地理上的无名区，占领军的后勤计划搞得一团糟。

尽管这些有限的反抗并不能遏制最后的悲剧结局，却使这个弱小的民族给历史留下了巨大的尊严。

自发反抗的形式是多样的，更有效的攻势是布拉格电台发起的。它表明新闻工具若能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将会释放出多么巨大的、令人战栗的威力。

我们从美国《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在 1968 年 8 月 21 日所作的广播记录中看到了这种威力。从凌晨 2 时起，电台反复播出中央主席团告全国人民书；6 时，



广播了杜布切克的个人声明。杜布切克从凌晨 4 时半被扣押到 11 时被正式宣布被捕，14 时押解出党中央大厦，其间还坚持用电话和便条与外界保持联系；6 时 30 分，电台要求人民“保持平静，实行消极抵抗”；7 时，苏军进攻布拉格电台，几千名群众奋起保卫电台，用电车、汽车筑成街垒；7 时 15 分，女播音员呼吁：“希望大家保持平静和克制……武装抵抗是行不通的……我们的播音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我们的时间很紧迫……广场前面的群众正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占领军的车辆……”；7 时 18 分，电台又播出了杜布切克的一封信：“我要求大家保持平静。在当前的局势下要保持尊严。”播音员又补充说，“我们也将这样做。”播音员的语词是平静的；7 时 25 分，播音员反复说：“几百名群众正以自己的身体阻止坦克前进。”这时，收音机里能听到枪声和飞机在电台上空低飞过的轰鸣声。播音员一会儿是向保卫电台的群众讲话，一会儿又是向全世界宣告捷克民族正经历着的灾难；7 时 30 分，在缓慢而悲哀的乐曲声中，女播音员说：“当你们听到捷克斯洛伐克国歌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电台的播音就结束了，这就是说，电台被占领了。以后如果电台节目里出现了你们不熟悉的声音，不要相信他们的活！”听到这里，做记录的美国记者和他的捷克女助手热泪漱漱而下……之后，收音机沉默了，接着响起了捷克斯洛伐克国歌。

布拉格电台被占领了。

但仅仅隔了 10 多分钟，电台又通过郊区的发射台继续播音。8 时 15 分，布拉格电台播出了斯沃博达总统的告全国同胞书；8 时 20 分，播出了科学院对入侵的抗议声明。

之后，布拉格电台又一次沉默，但库拉维尼亚、俄斯特拉发电台接过了这个任务。

然后是几十个地方电台继续了这场战斗，这样布拉格电台的技术人员就有时  
间建立地下播出网。仅布拉格，就有十几处秘密播点。

两天以后，电视台也从秘密地点播出了。他们将几乎所有阶层都有的抗议声  
明陆续广播出去。

许多转入地下的报纸，如《红色权利报》、《自由言论报》都在工作人员的  
自发组织下出版了。发送工作由自愿前来的士兵、学生担任。

占领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土，却未能割断这个民族的咽喉，窒息她的  
声音。这样，当 8 月 21 日凌晨，设在东德的华约司令部电台向“捷克斯洛伐克兄  
弟们”播出，说“你们的阶级兄弟来支持你们了！”说“我们不是来干预你们的  
内部事务，而是来帮助你们打倒反革命、保卫社会主义事业”时，就显得既滑稽  
可笑又厚颜无耻了。

捷克斯洛伐克的新闻工作者不愧是人民的喉舌，不论在“布拉格之春”期间，  
还是被占领的现在都是如此。他们喊出了人民绝不屈服的意志；又有效地组织号  
召了对占领军的抵抗，长达两个星期之久。

这是一个难以征用的民族。面对着强大的暴力，她的人民敢于抗议，敢于反  
抗；而她的政治家们却在更加艰难的条件下，组织了更加有效的抵抗。仅用一天  
时间，就秘密地召开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是政治史上的一次奇迹。

二十

军事上的胜利带给勃列日涅夫的是惨重的政治失败。捷共十四大的召开向他  
表明，他可以用刺刀干任何事，就是不能坐在刺刀尖上。

8 月 21 日，也就是在完成了全面占领的当天下午，被克里姆林宫选中的 50 人

在布拉格饭店开会。这里面大多是捷共中央委员，然而，就是将不是中央委员的其他人都算上，这 50 人也只能占捷共中央委员会的三分之一，不够法定数字。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也没有实现会议目标：产生一个新领导班子领导的工农革命政府，告诉心怀怀疑的全国人民，外国军队是哪位领导人请来的。

没有一个人敢承担邀请外国军队的责任，也没有谁敢站出来充当一个傀儡政府的首脑。最后，只好组成了一个由比拉克、英德拉和科尔德 3 人组成的临时领导小组。

会后，发表了一个含糊其辞的声明：既要以《行动纲领》为今后的政策基础，又要求人民保持秩序、与占领军合作。

可是当把 3 人领导小组的决议送到斯沃博达总统那里去批准时，这位身着军装的老将军坚决拒绝参与任何组织新领导班子的事，他向苏联大使宣布：切尔尼克仍然是捷克斯洛伐克合法政府的总理，要实行局势“正常化”，必须首先释放被囚禁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

胜利者陷入了困境，那是被邱吉尔形象化了的困境：“你可以用刺刀干任何事，就是你不能坐在刺刀上面。”

在捷克斯洛伐克，并不是没有占领者 12 年前在匈牙利找到过的那种人，只是在“布拉格之春”唤醒的民主力量面前，这种人胆怯了，失去了行动的勇气。

与此同时，在政坛的另一侧，一些优秀的政治家在人民的支持下，迅速地恢复了实际上已经瘫痪了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一支以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名义入侵的军队，将一个共产党的首脑逮捕了，并实际上摧垮了这个党；而一些被安上“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罪名的政治家，却冒着生命危险，去恢

复这个共产党的组织，使它能在非常时期恢复自己的威信和对全国人民的领导。

1968年8月22日11时18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在布拉格切卡德工厂礼堂召开。

开始有900多位代表到会，到晚上休会时，夏天选出的“十四大”1543名代表中，已有1192名出席了大会。代表资格是合法的；到会人数也够作出决议所需要的法定人数。

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是由秘密电台在头一天的广播中通知的。大会能在占领军的鼻子下召开，是因为对方不相信“十四大”会在电台公布的时间地点召开，以为这仅仅是声东击西的计谋。

21日晚至22日凌晨，全国各地的数百名“十四大”代表乔装打扮，带着以惊人速度制造的假证件来到布拉格。

早晨，上早班的时候，切卡德工厂门口，几辆救护车送进送出，把化装成病人、医生、护士、司机的党的领导人拉进厂，另一些代表则化装成赶早班的工人。

会议期间，切卡德厂的工人民兵带着子弹上了膛的冲锋枪、步枪和一门反坦克炮守卫着工厂大门，保卫着党代会。

这次秘密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114人的中央委员会和一个27人的中央主席团。

大会重申了对杜布切克的信任和支持，并将他和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龙、克里格尔再次选入中央主席团。

新当选的中央主席团委员有奥·希克教授，作协主席爱·戈尔德斯图克以及地下电台负责人赫兹拉尔。

在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中，没有一个知名的保守派。

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份告全国同胞书，抗议了 5 国军队对捷克主权的侵犯，并庄严宣告：“没有任何一个有资格的党或法定的当局曾要求过这种干涉……在此之前，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发生反革命事件，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没有受到威胁。”告同胞书还向占领军发出严重警告：“立即释放被扣押的领导人。”“外国军队撤离我国。”

“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决不会接受一个军事占领当局，也不能容忍一个靠占领军势力扶植起来的伪政权。”告同胞书还向占领军发出了非常强硬的最后通牒：“如果在 24 小时以内不与我国自由的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开始谈判撤退外国军队的问题，如果不让杜布切克同志及时就此问题向全国讲话，代表大会要求全体劳动人民在 8 月 23 日中午 12 时举行一小时抗议罢工。”捷共“十四大”给人类文明、进步留下了一份意义重大的文件。这份告全国同胞书多少恢复了我们对于历史进步的信心，暴力并没有让苏联得到它在 1956 年所征服到的东西！

8 月 21 日是克里姆林宫取得一次不小的军事胜利的日子，但正是从那一刻起，勃列日涅夫一定痛苦地发现，这胜利给他带来的灾难并不比给捷克民族带来的少；他一定悲哀地感到自己是历史上最不走运的政治家。在政治史上，难道有过如此惨重的失败吗？没有！

如果要追究政治责任，没有一个政治家在有了这样的失误之后，还可以从事政治！幸亏，勃列日涅夫是在一个无需承担责任的政权里行使权力的。

捷共十四大是共产党组织效率、政治斗争的典范。

代表大会还通过了给杜布切克的致敬信：

杜布切克同志：今天在这里开会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向你致以热烈的、同志般的问候。我们对你为我们党和我们祖国所做的一切工作表示感谢。我们的

青年人手执鲜血染红的国旗在布拉格游行，反复高呼“杜布切克、杜布切克”，这充分证明你的名字已经变成了我国主权的象征。我们对非法囚禁你和其他几位同志表示抗议。

代表大会再次将你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我们继续把你当作我们的领导人。

我们坚信，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一定会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你也将和我们重新欢聚一堂。

一个党代会向它的领导人致敬并不少见，几乎每一次党代会都会以口头或文字向新领导人表示热爱、忠诚和感谢。然而我们难以判断，在这类致敬中，多少是对领袖的诚挚的爱，多少是对权倾一时的主宰的畏惧和奉承？但我们可以断定，上面这份致敬信中，有的只是对领袖本身的热爱、信任和尊敬。因为此时，这位47岁的领袖已经完全失去权力，而成为克里姆林宫的一名阶下囚。

二十一

“布拉格之春”逝去了，但她没有死亡，那隐隐闪烁的一点星光里，还珍藏着她美丽的理想和半个世界的希望……

杜布切克的囚徒生活很短暂。21日，他和斯姆尔克夫斯基、切尔尼克、什帕切克被搜过身后，在自动步枪的押送下，坐装甲车到机场，再乘运坦克的运输机和没有座位的军用飞机到了莫斯科。他成了十足的囚犯。

到莫斯科后，他们被允许洗澡、刮脸，还给他们送来了干净的衬衣；更进一步，莫斯科要把他当成一个国家的首脑坐下来谈判。

这种变化的原因是莫斯科没能在布拉格拼凑出一个取而代之的政权；而十四大的召开又重申了全党对杜布切克领导地位的确认。

勃列日涅夫还得用那种恼人的、屡遭失败的谈判来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

在这次所谓的谈判中，杜布切克面对的是一份早已拟好了的，请求苏联出兵

的邀请书，而勃列日涅夫面对的是他刚刚从囚室放出来的代表。

这一次，勃列日涅夫绝对主动，他可以随时将谈判代表变成囚徒。杜布切克

和他的朋友的处境比当囚徒的前几天更险恶了：历史的重担，民族的重担都压着

他们身上。

他们拒绝签字，他们表示：“一千几百万捷克斯洛伐克人与其投降，宁可选

择死亡。”然而克里姆林宫并不害怕别人的死亡，他们说：“这对我们算不了什

么！在战争期间，我们有比你们全部人口还要多的人死在德国人手里！”克里姆

林宫不需要谈判，只要签字。他们说：“你们现在不签，过一个星期再签，一个

星期不签，过 14 天再签。如果过 14 天还不签，那就过一个月再签。”他们有的是

用武力抢占的时间，他们能等待。

历史也等待着。这个民族的凶吉祸福难以预料。

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反抗过：他们不签字，他们可以选择自杀。然而他们无

权为整个民族选择死亡。后来，从国内来的代表提醒他们，说国内尸体堆积如山，

说他们有责任不惜一切代价结束这种状态，应该让这个弱小的民族生存下去，应

该把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流血、死亡减少到最低限度。

他们犹豫了：签，还是不签？

这是比哈姆雷特个人的生死存亡重大得多的选择，这是关于和平与流血、个

人与民族、屈辱与尊严的选择。他们问自己，他们相互询问：应该签，还是不应

该签？

要是可以选择个人的死亡就好了，要是可以回避这样的选择就好了。然而他

们必须选择，必须为整个民族作生死攸关的选择。

人的意志力可以让强权束手无策，但面对历史的劫难，人的意志却常常是那样的软弱无力。与强大的霸权相比，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太弱小了。

他们犹豫了很久很久，还是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他们思考了很久很久，还是无法肯定该不该这样做？

一直到 1974 年，当斯姆尔科夫斯基临近生命终点之际，还在深深的痛苦中继续着这种痛苦的思考：“我做对了，还是出卖了祖国？我不知道……”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被责任心和良心压迫着。

1968 年 8 月 27 日的黎明尚未到来之际，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带着民族的巨大创伤，回到了黑沉沉的布拉格。

从照片上，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春天的明星们低垂着头。他们是在向父老兄妹深深地低头请罪，他们没有完成民族的嘱托。

19 世纪的捷克诗人杨·聂鲁达说过：“只有在人民面前，我们才能低下头来！”向人民低头，不是羞耻和痛苦的事，那么向历史屈服，向历史低头呢？

8 月 27 日下午 5 时，布拉格电台播放了全部的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命运》之后，杜布切克发表了 8 月 21 日悲剧以后的第一次广播电视讲话。

他的整个神情是疲惫不堪的，他的讲话断断续续，并且常常停顿下来有时是在痛苦的追忆，有时是极力地克制。

他向人民报告已经有了一个让 5 国军队分期撤出的协议。他说，为了这个协议，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们不得不采取若干临时性的特殊措施来限制我们所取得的民主和自由……”杜布切克努力振作起来，他想告诉人民，希望还是有的，春天还会再来。他说：“我们将坚决地和始终如一地捍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政策……”他突然停顿下来，他无法欺骗人民。他被沉重的现实压垮



了。

收音机里的声音沉寂下来……而电视机前的人们看到他们的领袖为强忍眼泪而无法讲话……

1 分钟，2 分钟，3 分钟沉寂之后，杜布切克继续演说，“亲爱的听众们，在这临时决定的讲话中，如果时而出现停顿，我请求你们原谅我……”在大街上听广播的人失声痛哭起来……这一刻，领袖和人民的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了……

这次广播电视讲话还没结束，许多电报和信件就寄到电台、电视台。很快就有一句口号在当天和以后的日子里流行开来，那是人民对杜布切克的谅解、安慰和支持：“我们跟你在一起，请跟我们站在一起吧！”“布拉格之春”给政治家留下这个礼物之后，便匆匆从布拉格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当历史艰难地、还没从辉煌而又多灾多难的 60 年代走出去，终于上了台的保守派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政治清洗。

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等最激进的改革家被开除出党，许多编辑、作家和电视台评论员被放逐到工厂、农场劳动，有的进步人士甚至被逮捕关押。

对杜布切克的迫害要晚一步，他在“布拉格之春”期间迸发出来的伟大力量尚有余威，新的当权者只敢偷偷摸摸地、一点一点地对他进行剥夺：1969 年 4 月，他被撤销第一书记职务；9 月，被解除中央主席团职务；年底，被任命为驻土耳其大使，实际上是被放逐到异邦；1970 年元月，被停止党籍；5 月，被召回国；6 月 26 被开除出党。

这位 18 岁就加入共产党的政治家，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 30 年的党。此时，他年仅 48 岁，棕色头发过早地变得灰白。他带着顽强的沉默离开了布拉格，到斯洛伐克的一家工厂办公室去工作了……

寒冬降临了，到处都是冷嗖嗖的寒风，仿佛要将漫长的冬日冻结住，要将铺天盖地的绝望冻结住，仿佛寒冬将不再离开布拉格。

然而，只要寒冬不能将一个民族的生命冻结，她们就会迎得另一个春天。对此，历史将作出证明；或许，历史老人的动作过于迟缓，捷克人不愿意等待，他们已经等了 300 年了，他们要自己作出证明。

回答是由捷克斯洛伐克最优秀的儿子作出的。1969 年元月 16 日，18 岁的布拉格学生杨·帕拉赫在瓦茨拉夫广场中心点火自焚，抗议外国军队入侵，呼唤逝去的春天。

帕拉赫点燃了自己，给冷冰冰的布拉格带来了一丝温暖、一线光明。

就象帕拉赫在遗书中称自己为“火炬一号”一样，在他的照耀下，我们看到了“布拉格之春”的光芒并没有死亡。尽管在历史的苍穹上，她仅仅是一点星光，但她活着，并且至今还闪烁着美丽的光芒。如果我们愿意走近一点，还能发现把她是个庞大的世界，她还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

附录：《与杜布切克对话》

作者：希望谈论“布拉格之春”不会触动您心灵上的创伤。

杜布切克：相反，我感谢人们还记着“布拉格之春”。

作者：“布拉格之春”是社会主义改革道路上一块夺目的里程碑。谁也无权忘记历史。

杜布切克：仅仅是历史！难道春天会永远逝去？

作者：辉煌的历史。

杜布切克：历史只记录死亡了的，可她还活着。

作者：请原谅……她来去匆匆，1968 年 8 月的军事入侵把她杀死了。

杜布切克：她的精神还在，她所产下的希望与民主和人道相结合的社会主义

至今还活着。作者：那只是理想，历史要沉重得多。赫鲁晓夫失败了，纳吉失败

了，您和您的“布拉格之春”也失败了。难怪有人在问：“有过成功的改革吗？”

杜布切克：也曾有人问过：“有过真正的社会主义吗？”正是为了回答这个

问题，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举起了“布拉格之春”这面旗帜。

作者：“布拉格之春”也没有给你们送来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

杜布切克：那是因为历史不能不给 1968 年的苏联一个勃列日涅夫式的政权。

作者：1956 年，匈牙利人的改革失败了，我们说这是历史的局限；过了 12 年，

你们还是败于历史的局限。历史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成熟，才能进步？

杜布切克：就在今天。我们不能假设 1968 年的苏联能有今天这样的政权，但

我们可以。假设有了 1989 年的大动荡，如果“布拉格之春”能重新降临，她肯定

可以让社会主义死而再生。

作者：让社会主义的再生，除了勃列日涅夫式的霸权干涉，就不再有别的障

碍？

杜布切克：有，那就是官僚政治。但我们在 1968 年已经证明，它是可以被打

败的，用民主政治。

作者：您只谈到了政治，而和改革联系在一起的还有生产力低下、劳动积极

性不高以及更让人头疼的国有经济的改造问题……

杜布切克：这些也是政治。

作者：……

## 瓦文萨与波兰团结工会

赵启强

本文系作者大著《光荣的荆棘路改革家们》第五篇第一部分。

作者：您是作为罢工领袖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因此，您创造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历史现象——历史第一次接受了一个使生产陷入停滞，而不是使其发展的人。

瓦文萨：历史与我何干？我斗争不是为了历史，而是为了人！

作者：无论为了历史还是为了人，都应该发展生产。我同意您说过的话：“用罢工手段是不可能改善经济状况的。”

瓦文萨：是的，罢工是一个最危险的手段，但罢工这个武器必须持有，因为这是工人阶级与政府对话谈判的唯一方式。

作者：对于本来就危机重重的经济，这无疑是不堪负担的。这种谈判方式的成本太昂贵了。

瓦文萨：如果工人阶级的意志得不到反映、利益得不到维护，社会将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

作者：难道双方就不能寻得一种廉价的谈判方式？

瓦文萨：能，那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自治工会。我们罢工是为了建立独立工会，建立独立工会是为了不再用罢工方式去捍卫工人阶级的权益。

作者：您给半个世界出了一大道难题——您的目标无疑会动摇党和国家的绝对领导。

瓦文萨：无须对此加以否认和掩饰。要使工人阶级从“无所能管”的雇佣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就必须有一个持久的、强有力的工会组织来制约国家“无所不管”的绝对权威。

作者：可是治理的权威从来就是需要的、并且总是由个别人来行使。一个工厂如此，一个党、一个国家亦如此……

瓦文萨：您大概还要说，关键在于要把这个权威交到正直而杰出的领袖手里？

作者：否则怎么办呢？能承认一个好的领袖多少是一个进步，便不该拒绝这样的努力。

瓦文萨：正是开始了对这种“进步”的怀疑，波兰工人阶级才有了对历史的一大步跨越。请看看人民波兰的历史吧——1956年，为了拥戴改革家哥穆尔卡上台，我们有五十三个阶

级兄弟付出了生命，三百多人流淌了鲜血；1970 年，为了驱赶堕落了哥穆尔卡、寻求一个能稍为民主一点的领袖，我们的兄弟中又有四十五人付出了生命、一千多人流淌了鲜血；因此这一次，我们争取的不再是一个好领袖，而是要使工人阶级在罢工中形成的力量保存下来，并在正常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

作者：工人参与对工厂和国家的管理，可比组织罢工、建立独立的工会更加艰难……

瓦文萨：正因为艰难才更应该让我们实践！

作者：要是社会要为这种实践付出过大的代价呢？

瓦文萨：那也必领付出！否则，半个人类为社会主义已经付出的巨大代价便付之东流。

—

社会主义历史上只有两件事——十月革命和铁托与斯大林决裂，可以与波兰成立团结工会的事相比。

有了列宁，社会主义国家才没有因为先天不足，而死于胚胎——1917 年 11 月 7 日，她诞生了。

然而，如果列宁能预见到这个历史的早产儿会经历那么多的生存痛苦，他还会用自己的巨大智慧去助产吗？

这些痛苦是惊天动地的：强迫农业集体化，制造仇恨的阶级斗争，血腥的政治恐怖；最后是社会发展的停滞和人的独立意识的泯灭。艰难而又多灾多难的半个世纪逝去了，她——这个人类美好理想的结晶已经遍体鳞伤、面貌全非了。

为了给这个未老先衰的生命医治创伤，注入新的生命和青春活力，在她的艰难的生命历程中，又发生了许多同样惊天动地的历史壮举——

1948 年，铁托与斯大林决裂，有了最初的尝试；

1956 年，赫鲁晓夫把斯大林送上审判台，而开始了全面宣战；

同一年，纳吉在“匈牙利事件”中，用自己的生命进行了殊死搏斗；

12 年后，杜布切克和他的“布拉格之春”，给半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然而，所有的这些奋斗都失败了，尤其在 1968 年 8 月 20 日，当苏式坦克碾碎了“布拉格之春”中所蕴含的希望之后，半个世界都陷入到铺天盖地的绝望之中——如果连这种和平的、秩序井然的、并且是由共产党人自己领导的改革都徒劳无益，那么还有什么可能使这个日趋衰败的生命获的新生呢？

于是，几乎所有的人都预言，在共产世界不再出现希望，不再会有巨变了。

然而仅仅 12 年后，这个预言就被历史否定了。

1980 年夏天，在波罗的海南岸，发生了社会主义历史上又一次惊天动地的巨变：波兰诞生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独立于共产党的权力中心——团结工会。

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巨变都与一些政治伟人联系着；它们的诞生地也十分高贵：冬宫、克里姆林宫、捷克的总统府、匈牙利的国会大厦。而这一次的巨变却产生于工厂的最基层，它的领导人是一个叫瓦文萨的无名之辈。

瓦文萨的知名度小到如此程度，以至当他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已经给执政的波兰共产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波共第一书记盖莱克居然在政治局用疑惑的口吻问：“瓦文萨？这个家伙是什么人？”

当时，即便是无所不知的秘密警察，也只能给他们的领袖提供这样简单的档案材料：瓦文萨，男，37 岁，六个孩子的父亲，天主教徒。父亲是木匠，本人小学毕业即当学徒。原为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电工，1976 年，因参加工潮，主张成立“自治工会”而被开除。

尽管这次事件的诞生地和领导人如此卑微、低贱，但它对世界的震动却那样巨大——

欧美一些大报一致将它列在 1980 年世界十大新闻之首；

美国国际变化研究所所长 S·比亚勒教授说这次事件比 1956 年的匈牙利事件和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的意义要大的多；（S·比亚勒《波兰与苏联的统治》）

匈牙利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赫洛杜什·安德拉什教授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历史上只有两件事——十月革命和苏联与南斯拉夫决裂——堪与波兰成立团结工会的事相比。”（意大利《共和国报》1980 年 11 月 13 日“安德拉什教授采访记”）

这些评价都是事件发展到无人能忽视它的存在时说的。而在开端，一切都是试探的、战战兢兢的。

波兰工人绝没有上述两次巨变所具有的条件——十月革命具有良好的共产党组织和许多杰出的领袖人物；1948 年，铁托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作为后盾。

波兰工人有的只是二十年内经历过的两次大规模逮捕、枪杀的恐怖记忆和一点儿渺茫的希望。

1980 年 8 月，波兰工人从几百人开始，到几千人，几万人，然后与一个具有三十万军队和庞大警察机构的政权对峙了 17 个日日夜夜，凶吉未卜，前途未卜，他们得有多么坚强的神经才能经住其中的胆怯、危机和悲观。

如果他们失败了，历史的许多悲壮的记录又多了相似的一笔，一切都是重复，一切都是

绝望，一切又得重新开始，再等待一次已经重复过多次的、艰难而又令人恐惧的开端。

1980 年夏天，波兰工人把这个开端完成了——靠着高度的自我约束能力和两次流血牺牲所换来的经验。

于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终于有了力透纸背的一页。这是全新的一页，她记录着新的经验、新的希望、新的斗争方式、新的目标。

这就够了，结局的成败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波兰工人阶级终于从诉诸统治者善意和明智的幼稚中成熟起来。

波兰工人阶级终于理解：问题不在于推翻或拥戴哪一个领袖人物，因为换上去的新人最终还是变得跟前任一样腐化；也不为了取得政府的重大让步，因为任何政治许诺和政治让步都可能在工潮平息之后被政治清算所替代。

1980 年，波兰工人阶级争取的是要使自己的力量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决定因素，为此，他们把建立一个独立的、能长期参与统治的权力机构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

有这个目标，政治家便不能毫无担忧地进行统治了；有了这种希望，半个世界便无权忘记波兰工人在 1980 年 8 月所作过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历史应该记下 1980 年 8 月。

## 二

事情是由几个青年工人开始的，但在他们身后，有数十万工人的不满和期待，有数十年的屈辱和流血的记忆，还有那位暂时还不出名的莱赫·瓦文萨。

1980 年 8 月 14 日清晨，波兰最大的海港城市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的三位年轻工人，带着几幅大标语和几百张传单，于上班前一个小时来到车间。

这些标语传单的内容很简单：要求实行物价上涨津贴和增加工资 1000 兹罗提。没有政治色彩，没有组织名义。但促使这几个年青人行动的背景却十分庞大：当时，全国的许多工厂都发生动乱，尽管许多罢工是零星的、犹豫的，却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星期。

骚乱是从 7 月 1 日开始的。那天，政府宣布提高不需要定量供应的“特种商店”的肉类售价 40-60%。于是华沙、波兹南、托伦、卢布林相继发生罢工，此伏彼起，时断时续。

在此期间，格坦斯克是平静的。这很奇怪。

格坦斯克是波兰著名的工业区，如果算上它身边的两座姊妹城——格丁尼亚和索波特，这个波罗的海边的三联城有七十万人口。波兰最大的海港和造船厂都在这儿；与这种平静更不相称的还有，格坦斯克是著名的工人运动中心。1970 年，正是格坦斯克好斗的造船工人和码头工人将东欧最强硬的政治家哥穆尔卡赶下了台。

但如果我们知道了下面这个事实后，便理解了格坦斯克的平静，并会产生深深的不安和不祥的预感。

1970年12月，在与军警对抗的工潮中，有45名格坦斯克工人被坦克和子弹夺去了生命，有一千多工人流出了鲜血。这些赤手空拳的工人是在和平时期，被他们法律上的代理人、公仆用刺刀、步枪和坦克残害的！这种屠宰式的杀害使人颤栗。它留下的恐怖记忆大约一百年也不会消失。

有了这样的记忆，格坦斯克工人自然会有更多的沉默；同时，既然在沉默中蕴含有这样的记忆，那么格坦斯克在1980年的沉寂中，肯定蕴藏着更深刻的危机。

现在，这三个行动者的年轻人，这三个在童年记忆中刻有十年前那件悲剧痕迹的造船工人，会不会触动那个巨大的伤口，使它重新流出血来？

三名青年工人把标语贴在车间门口和更衣室外，然后向更衣室的工人每人发放一张传单，并且说：“今天全厂罢工。”

传单上并没有写罢工的事，但每个工人都能从蔓延全国的骚乱不安中感到某种渺茫的希望。

已经换好工作服的工人没有立即到工作岗位上去，而是聚在更衣室外的大标语下。他们只有30多人。这些人对三个年轻人的举动是赞许的，只是还不敢用语言表示出来。

工长来了，要工人们去车间干活。有人胆怯了，向车间走去。

三个年青人着急了，高声劝阻，谎称其它几个车间已经停工了。其中一位青年工人还走进车间，为那些胆小的工人关掉机器。

工人犹豫着，工长催促着，三个进行鼓动的工人紧张了。

他们很清楚，如果不能有进一步的行动，如果再有几个人响应工长的号召，不一会儿，这儿就只剩下他们三个被孤立的人。

他们急忙打出一个横幅标语，呼吁大家到别的车间去。直觉告诉他们，必须使这几十名工人走出车间。

他们成功了，三十来名工人跟在他们后面向别的车间走去。

本来就处于期待和半停工状态的工人被这支打着横幅标语的小队伍引了出来。多数人观望着，但也有少数人大胆地加入到这支小队伍里。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那三个打头的年轻人在鼓动了，许多人都在呼喊：“关上机器，跟我们走！”



到哪儿去？去干什么？不知道。这是来不及思考和犹豫的。这一瞬间，队伍里的每个人都清楚，停顿和动摇的后果不堪设想。必须走下去。

这支已经增加到一百多人的队伍，终于与厂长迎面遭遇了。

厂长领着几个人堵在前面。他板着脸，劈头盖面地抛过一句严厉地质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队伍里有人回答：“我们停工了！”

厂长又问：“为了什么？”

这时，队伍里有人喊起来：“我们现在不跟他讲。我们走！”

这是高明的。否则厂长会说：“有问题解决问题，这是干什么！”于是工人们会提出一大难重大的和细小的、能解决的和不能解决的问题；而厂长会说服、解释、许诺，会象一位家长那样用严厉而又不乏爱护的口吻批评工人，于是工人不好意思了，或者害怕了……

他们不能停下来。队伍又向前走，把厂长留在那儿。

队伍已经扩大到一百多人。他们走出厂门，走到二号厂门前。这儿正是十年前那些流过鲜血、付出生命的同伴们出发的地方。

并没有人发令指挥，这几百个人突接沉寂下来，深深地低下头去，向 1970 年 12 月的牺牲者默哀一分钟。

在这短暂的一分钟里，那 45 个牺牲工人的魂灵一定呼天抢地地呼喊他们的忿怒和鼓动。

没有比这更有力的鼓动了。

一分钟后，当这几个百个沉重的头颅扬起来时，他们已不再惊慌和茫然。

他们唱起了波兰国歌：“波兰没有灭亡……”

是的，只要工人阶级还在，波兰就不会灭亡；只要希望还在，波兰就不会灭亡……

几百个大嗓门发出的声音是粗糙的、嘶哑的、不协调的，但歌声所体现的力量和意志却是那样的清晰，这歌声惊动了列宁造船厂，惊动了整个格但斯克；同时，还引来了另一个人——几年前被开除出厂的列宁造船厂电工瓦文萨。

有了瓦文萨的出现，这支刚刚开始的歌终于震撼了全世界。

当这几百人从大门口回来时，他们的决心已定。队伍在停在厂内的一台挖掘机旁停下来。有几个人爬到上面发表演讲，他们呼吁罢工，要求大家团结起来，把信得过的人选出来，成立罢工委员会。

就在这时，总经理格涅赫带着一批人匆匆赶到。工人们让开了一条路，并且伸出手来帮助他登上挖掘机。总经理毕竟是有权威的，人们无法在一个早上就丢掉多年来形成的等级意识。

总经理讲话了：“有什么要求我们可以谈判，但用不着停止工作。大家都回车间去。”

大多数的工人用沉默来回答他的命令，但也有几个工人高喊：“不解决问题就不干活！”

双方都避免用罢工这个词。

总经理的态度缓和下来，耐心地劝说：“干吗要停工？如果谈不成，再停工也行嘛。”

爱喊叫的工人仍然要求先解决了问题，再回车间干活，而真正让总经理吃不住劲的是那片顽强的沉默。他难以捉摸这沉默中有多少是强硬和对抗，有多少是犹豫和动摇。

就在这时，一个人从总经理身后登上挖掘机，挤到他面前。

“您认识我吗？”挤过来的人问。

总经理看了看对方：一个中年工人，个子很矮。他不认识这个人。他不可能认识几万工人中的每一个，他是通过劳动人事部门管理着工人的。但总经理能从来人身上感到一股力量和威胁。于是他客气而又带着明显暗示的口吻说：“从现在起，我将记住您，请问……？”

“瓦文萨。”

这个名字他是知道的。总经理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遇上了亡命徒。这是短兵相接的搏斗中最令人生怕的事。

总经理闪出的第一个念头是，不能让这个人 and 眼前的事搅在一起。

“您的情况我知道一些，”总经理说，“我愿意帮助您。您可以在任何时候去找我。”

瓦文萨坚决地拒绝了总经理的好意。他说：“不，我不用求任何人。我是一名造船工人，我在造船厂干了十多年，现在我回来了。我只是为我不能从大门回来感到遗憾，”瓦文萨是从四米高的厂区围墙翻进来的，“这回，我将留下不走了，因为我有职工们的信任！”

工人们用欢呼声证实了瓦文萨的判断。人们心里踏实了，马上安静下来，等待着瓦文萨的演讲。

瓦文萨转向几百名群众，注视着、思考着，最后他只是大声地喊出一句话：

“我宣布实行占领性罢工！”

### 三

因调整物价而引起罢工不是第一次；工人开出清单要与政府谈判也不是第一次；区别只在于政府第一次发现无法对反叛的工人诉诸武力……

因商品涨价而引起大规模的罢工，在波兰不是第一次。前面提到过的 1970 年 12 月悲剧也是由完全一样的原因引起的。这不是光辉历史的再现，而是悲剧的重演。这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恐怖回忆，并对这种失败过的斗争手段表示怀疑。

这里的序幕刚刚拉开，我们就立即发现它与 1970 年工潮的开端如此惊人的相似——

地点：仍然在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

冲突双方依然是政府和工人；

构成冲突的事件也一样：物价上涨；

大背景也相同：普遍的不满和骚乱；

甚至某些剧中人也一样，比如说瓦文萨……

在政治生活中，人们会指责某些重复的错误，重演的悲剧。但这类指责又常常是无可奈何的，政治家有足够的理由采取他认为有益的任何政策，也有足够的力量把历史学家的声带割断——如果历史学家试图证明某项政治错误或罪恶在历史上曾经造成过灾难的话。

然而我们不能不为另一方的重复所担忧——波兰工人准备用罢工来对抗一个强大的政权。

政府可以忘记，因为他们是最终的胜利者。胜利者当然可以用成功运用过的手段；可是已经失败过的造船工人还会用已经失败过的手段吗？他们也会向市区进军，也会去进行一场用歌声与枪声的对话吗？

这场序幕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悬念。

### 四

罢工委员会的成立使波兰工人找回了自己的优秀品质——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这一次，造船工人没有走出工厂。除了一些身体不好和神经脆弱的人回家了，罢工工人将列宁造船厂的大门关闭起来，近万名参加罢工的工人留在里面。

开始，罢工工人被兴奋而又茫然的情绪支配着，许多人跑来跑去，吵吵嚷嚷，却不知道应该干什么。

大家最关心的当然是谈判清单：各种各样的要求都提出来了，还不断有人补充新的要求。

到处都在进行各种级别的“谈判”，找厂长谈，找书记谈，甚至揪住班组长不放。只要围住一个多少掌了一点权的人，就有人提意见、提要求，而更多的人却在旁边吹口哨、起哄。

工人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过正常的政治生活了，他们的政治能力已经严重退化。

不过，这种混乱的局面很快就渡过去了，造船厂成立了罢工委员会，瓦文萨当选为主席。

谈判的清单也拟出来了：

一、恢复瓦文萨的公职。

二、每名工人提高工资 2000 兹罗提，按民警的同等条件提供家庭补贴。

三、保证罢工组织者、领导者的安全。

四、工人有选举自由工会的权利。

五、为 1970 年 12 月事件的死难者修建纪念碑。

罢工委员会还担负起全厂的责任：建立了罢工纠察队，以保护工厂的财产，防止发生不负责任的挑衅事件。

罢工委员会宣布：在罢工期间禁止喝酒。

这可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酗酒，即便是对政府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酒，使工人缺勤旷工，造成事故。据说：在波兰医院里，有 20% 的床位由酗酒者占用着；当然，这并不是民族病，而是时代病——除了干活，生活不再有任何指望，他们为什么不喝呢？

造船厂大门外整天都有一大堆人围着，大多是妇女、孩子。她们送来一包包吃的和换洗衣服，也带来焦急不安的紧张情绪。

带着红袖章的罢工纠察队员很有礼貌地检查送来的食品，防止里面有出于好心送来的白酒。围墙上，每隔几步就坐着二、三名带红袖标的工人。大门口，有工人在打扫废纸和烟头。门前，红白相间的波兰国旗，和白-兰-白的造船厂工人旗在一起飘扬。墙上刷写着大幅标语：

“人民和造船工人在一起，造船工人和人民在一起！”

“给政治犯以自由！”

“请站到我们中间来!”

“你若同我们站在一起，就停止工作吧!”

这一切都是工人自己干出来的，这些罢工的工人并没有停止工作，他们是在干另一种更重要的工作。在这种工作中，充分显示了工人的力量——那是由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凝聚成的；更重要的，还有团结。不仅有全厂的团结，还有整个阶级的团结——8月15日，三联城的另外几家造船厂也加入到罢工工人的行列。

格坦斯克工人没有匆匆忙忙地走上街头，没有象以前几次那样去呼喊口号，去冲击党或政府的机关，去焚烧警车、与警察冲突。他们只是有序地占据着工厂。政府如果试图把工人驱逐出厂，那么它就无法象以前那样，将发动暴力的责任推到工人头上而加以镇压了。

这是工人方面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意义重大的胜利——政府除了坐下来与工人进行认真谈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 五

这一次，波兰工人没有流血就开始了与政府的对话，并获得了政府的让步。如果不是他们以前也得到过类似的许诺，或许这一次也到此为止了……

波兰工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并非出于政治野心。他们没有去颠覆政权，没有去攻打政府。他们仅仅——说起来真可怜，仅仅想让他们自己的代理人听听他们的意见，仅仅要求政府帮助他们自己无法解决的切身问题。

为了这么点儿可怜的要求，波兰工人用罢工的方式战战兢兢地敲响了社会的警钟。当局终于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了，愿意来听听他们的声音了。

社会得为这种对话付出上亿兹罗提的代价——这真是成本昂贵的谈判方式。

然而比起1970年，这代价就算不了什么了。至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生流血和死亡。这或许算得上历史的进步吧？

1970年12月，波兰工人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获得对话的权力的。

那一次，工人也仅仅是要求他们的代理人听听他们的要求，这些要求就更可怜了。下面是列宁造船厂罢工工人在1970年罢工期间写下来的十点要求中的主要几条：

一、取消加班工资所得税。

三、提高工资20%。以适应物价上涨。

五、取消表扬性奖金，将此款用于提高工资。

六、公布总经理的收入。

七、精简行政机构。

八、星期天上班，除工资外，免费提供伙食。

全部是经济方面的，没有一点儿政治色彩——工人要求的只不过是略微改善一些、略微公正一些而已。这些绝不过份的要求所得到的回答是无情的镇压。

现在——1980年8月，波兰工人总算用罢工而不是流血，取得了对话权。

谈判是8月16日在列宁造船厂举行的。

谈判大厅里挤满了旁听的工人，厂广播站广播了谈判实况，所有的扩音喇叭下都聚集着一群人，谈判大楼前的工人就更多了。

工人们知道广播喇叭里是谁在讲话，经理、书记、瓦文萨，还有其他代表的声音他们都听得出来。对每一次发言，工人都要表态，好象他们都是谈判代表——或是鼓掌，或是打口哨、起哄。

经理的讲话被哄的次数最多，工人代表也有被哄的。

恢复瓦文萨工作的协议很快就达成了，关于罢工组织者的安全问题也得到了保证。政府方面发给每个代表和罢工委员会委员一份保证书，保证他们不为8月14日至16日的罢工而受到惩罚。但保证书的下面注了这样一笔，“不受惩罚的保证不包括违反波兰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行为。”

当谈判进行到为1970年12月事件死难者修造纪念碑时，谈判厅内外的人全都激动起来。

世界上很少有那个民族有波兰人经历的苦难深重——她惨遭过十字军的铁蹄蹂躏，经受过瑞典侵略军的暴戾，还有普鲁士的统治，沙俄的践踏；最近的则有斯大林在二次大战初期与希特勒进行的瓜分波兰的肮脏交易，以及纳粹德国对波兰人的血腥屠杀。仅华沙市，就有80万人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波兰为此建造了许多作为民族苦难见证的纪念碑——著名的、纪念死于二战的人的西盘英雄纪念碑就建造在离列宁造船厂不远的西盘半岛上，还有建造在华沙的无名烈士纪念碑，犹太英雄纪念碑，它铭记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手段最残忍的屠杀……

只有记住这些外族人给波兰造成的苦难，波兰人才能保持住自尊自立的民族意识。这一点，无论对人民还是对政府都是必要的，有益的。

然而现在，工人所要求的，却是要政府为自己所镇压过的人修建纪念碑，这等于要统治者为自己的耻辱和罪行修造一永久的标志。

这是波兰工人阶级的远见。尽管死难者不能再生，尽管 1970 年悲剧的制造者哥穆尔卡早已因为这次罪行而离开了政治舞台，但必须让他的继任者记住这黑暗的一页。

一个历史罪恶的记录，就是一个沉重的现实警告。对一个行使权力的统治者来说，最沉重、最无情的莫过于历史罪恶的记录。

1970 年 12 月 7 日，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当天，在代表团全体团员情同下，向犹太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面对着他的国家曾经犯下过的罪行的明证，勃兰特总理默默地肃立着。突然间，成群的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场面——这位著名的政治家、这位跟希特勒第三帝国毫无关系的德国现任总理、这位对眼前的历史罪恶并不承担责任的社

会民主党领袖沉重的跪了下去。

在场的人被深深地感动了……

没有人将勃兰特总理的跪拜看成是政治家的某种“姿态”。在场的人都感到了一种道义上难以承受的重负和人类良知的冲击力。

有了这座纪念碑，人类便多了一些良知，少了一些黑暗。

波兰工人正是为了这样的目的而要求修建纪念碑的——他们要统治者承认并永远记住前任的罪恶。

工人自己当然不会忘记。他们修建纪念碑的要求已经提过许多年了，却没有人理睬，反而在他们计划建造纪念碑的地方——就在二号门前面的广场上，12 月事件的最初死难者是在那里倒下去的——挖沟、打地基，准备盖一座贸易大楼。工人不答应，填了这些沟。后来市政府又把这个地方周围墙围起来。总之，当局想弄得工人的纪念碑无地方可建，想让他们忘记。

但波兰工人不会忘记。每一个周年纪念日，工人都要举行祭奠活动，并爬到造船厂最高的烟囱上挂起致哀的旗帜。

修建纪念碑的谈判终于成功了。当局答应在今年 12 月 16 日十周年纪念日前建好。当局不能不答应，这不仅是谈判诚意的表示，更是不再对罢工工人采取镇压的表态。

增加工资的谈判艰难一些，但气氛不那么沉重了。经理说，每人增加 2000 兹罗提会涉及到全国的工资制度，他负不起这个责任。他说可以用涨级的方式作些技术上的处理。

工人拒绝其他方式，要求每个人都一样涨，但同意减到 1500 兹罗提。

经理又问：“物价补贴也在内？”

“不，每人 1500，外加每月的物价补贴。”

经理为难了：“物价上涨引起的补贴问题我决定不了，这不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

“那就让上面派人来，来个能解决问题的人！”瓦文萨不动声色地将了一军。

这一军将得很有力，大厅里和各个喇叭下都响起了掌声。

经理沉默了，最后同意了大家的意见，并当场向工人作了保证。

一位工人代表问坐在经理身旁的党委书记：“书记同志能不能对经理的话作担保？”

书记：“可以，我担保。”

又有代表要求经理将他的保证写到纸面上。这个要求也立即被经理接受了。

每一条谈判都成功了，每一项要求都实现了，挺容易的。这时的时钟指在 13 点 30 分上。

工人们一时沉默下来，品咂着这个胜利，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们几乎是怀着赴汤蹈火的决心采取行动的，一切怎么会如此顺利和简单！

可是顺利不值得庆贺吗？不用赴汤蹈火达到目的不是更应该欢呼吗？

工人们想到的都提了出来，提出来的也都被当局接受了……那么，大家这种若有所失的心理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工人们说不清楚，瓦文萨也说不清楚……

那支书写历史的巨笔在这儿停了下来。

有工人在议论了：

“1970 年 12 月事件之后，他们也作过保证的。”

“经理的保证有什么用？在波兰可没有罢工权！”

“他们可以将经理撤职，那所有的许诺都白搭了。”

……

瓦文萨敏感地抓住了这种情绪——对当局实现诺言的怀疑。难道这就是不能就此罢休的原因？但瓦文萨立即就否定了这个答案。产生那种说不清楚的情绪不在于此；再说，当局的诚意也需要时间证明，谁也不应该要求马上拿到 1500 兹罗提、要求一夜之间在二号门前矗立起一座纪念碑。

围绕着该不该相信厂方许下的谎言，代表们开始了一场尖锐的讨论。有的表示应该相信，先复工；另一些人表示不相信，却又提不出具体的办法和更多的要求来。



到最后，罢工委员会只好作出暂时结束罢工的决议。

这时是 16 日 14 日 20 分，瓦文萨走到麦克风前，向谈判厅内外的全体罢工工人问道：

“如果我宣布罢工结束，有没有人反对我的意见？听见了吗？结束不结束？”

瓦文萨停下来，等待着大家的决定；大家也沉默下来，等待着瓦文萨的决定。

瓦文萨看没有人反对，又说：“工人代表和罢工委员会认为，我们的要求已经达到。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已经说过，我将最后一个离开造船厂。我宣布，基本问题已经解决。结束我们斗争的时刻已经来到了。现在，我允许大家在下午 6 点以前离开工厂！”

总经理格涅赫也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这位在谈判桌上作出巨大让步的领导人，没有一点儿失败者的沮丧，他宽容而又不失尊严地对全体经工工人说：“我感谢大家保持了平静，守护了厂里的财产，维护了秩序。我们大家将要精神饱满的在星期一再见。我们将努力把耽误了的生产补回来。”

工人们有礼貌地鼓了掌。他们赢了这一个回合，他们应该有胜利者的大度。

已经有人走出厂门，急于去见已经三天没有见面的亲人。许多不甘心就此罢休的工人却在大厅门口挤成一团。

就在这个时刻，格但斯克其他几个罢工单位的罢工委员会代表来到列宁造船厂——他们有北方造船厂、汽车运输公司、铁路设备修理厂和海洋电机厂……

这些外单位的罢工工人代表听说这边已经达成协议，就冲着瓦文萨喊叫起来：“要是你们把我们扔下，那所有的小厂都会被压垮的！”

瓦文萨明白了：当局之所以让总经理接受所有的条件，正是因为有这许多工厂声援性罢工的支持。如果扔下他们不管，这些弱小者什么也得不到，而且肯定会在事后受到报复。

还有的代表指责列宁造船厂罢工委员会搞的是“为力量最强者争几个钱的罢工”。

瓦文萨犹豫了。但如果撕毁刚才达成的协议，则意味着列宁造船厂已经取得的东西可能丧失。

北方造船厂的工人希望列宁造船厂继续罢工。他们说：“只要召开一次特别的省委会议，把省委第一书记一撤，你们所得到的成果就会告吹！”

“根本用不着撤换任何人，他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施舍者的权力！”

施舍？瓦文萨恍然大悟，突然解开了半小时前的疑惑——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兑现，即使兑现了，工人所得到的也只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点儿施舍。工人并没有得到持久的保证——

——那是必须由工人自己的权力才能保持的。

瓦文萨惭愧了。

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他都不愿担起他在 1980 年 8 月 16 日事实上已经作出的妥协。

当然，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甚至也不是慢慢思考的时候。首先要尽一切力量挽回，使这个险些地停顿了的开端继续下去。

这时是 15 时，更多的人在向厂外走去，罢工纠出队也不知道该不该阻挡，而厂广播站已经关掉了……

瓦文萨还来得及将这支书写历史的巨笔重新挥舞起来吗？

瓦文萨与波兰团结工会（七）

赵启强

改革浪潮来自底层瓦文萨与波兰团结工会（七·完）

本文系作者大著《光荣的荆棘路——改革家们》第五篇（七）（连载完）

二十八

当局实行了军管所有想改变现存秩序的行动都受到绝对禁止，一切动乱的因素都被排除。波兰一夜之间便实现了军营式的安定和秩序。

1981 年 12 月 12 日是波兰又一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仍在格坦斯克开会的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发出了就“是否信任共产党政府”进行公民投票的公告，从而打破了一年多来，给波兰造成混乱却也带来“政态平衡”的对峙局面。

这一天，苏联塔斯社向全世界发出了关于“团结工会正在策划直接夺权”的电讯，从而使人们担忧地感到，即使雅鲁泽尔斯基不动手，那位共产世界的教皇也会动手；这一天，伦敦、巴黎的邮电官员突然发现，从下午 6 时起，通往华沙的电话电报中断了，从而使西方的外交界、新闻界人士感到波兰将要发生极不寻常的事；这一天，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在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开会，为这场不可避免的决战制定战略方针。这次会议开到深夜。当工会领导人离开造船厂退回旅馆时，他们每个人的心脏都被沉甸甸的历史压迫着，既感到决战前的亢奋，又感到因过于重大的历史责任而产生的恐惧……

1981 年 12 月 12 日的波兰充满了恐惧、不安和许多不祥的预兆。历史要把波兰的希望和不祥之谜扔在这一天。

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的领导人离开造船厂回旅馆时，一大批埋伏在隐蔽处的军警突然扑出来，逮捕了几乎所有的领导人。几乎同时，军警包围了座落在莫科夫斯卡大街的团结工会

华沙分会总部，逮捕了这个最大分会的领导人。

在这场内电式的突击中，政府充分显示了它的实力和效率。一切解决用迅速、彻底，没有反抗，没有混乱，甚至没有战斗的痕迹。华沙的变化只在于深夜行走的人发现许多军车在街头巡逻，许多身穿战斗服、手持警棍、戴着装有塑料面甲和护板头盔的警察戒严了通往团结工会华沙分会总部的所有街道。

华沙是有秩序的用暴力和恐怖建立的秩序。

也有混乱的地方，那是在华沙分会总部：情景是令人痛心的：水管丢在地上，许多东西泡在水里。一楼，反映波兰工人阶级各次事件的图片展览被捣毁了。二楼档案室一片狼籍，就像刚刚刮过一场龙卷风，地上到处是纸，窗帘被撕扯下来扔在地上……

华沙是沉默的，它被突如其来的行动吓呆了；历史也愣住了，一时不能明白随着这闪电般的袭击而来的，会是什么？

这种沉默和疑问是六小时后被打破的。

12月13日凌晨六时，波兰国家电台打乱了正常的节目安排，播放了波兰国歌。之后，响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镇静而又沉重的声音：男女公民们！

在波兰历史上这一悲剧性时刻，落在我身上的责任是重大的。我的责任是承担起这一重任，它关系到我们这一代人在战争的所有战线上为之奋斗并献出了自己生命中最美好年华的波兰的未来。

我宣布，在今天已经成立了救国军事委员会。

国务委员会根据宪法规定，已经从今天午夜起在全国实行战时状态。

这个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救国军事委员会由15名将军，5名上校组成，它成了波兰唯一的执政机构。

但雅鲁泽尔斯基声明，这次军管"不是要搞军事政变，不是想搞军事独裁，"而只是为了恢复波兰的秩序和纪律。一旦达到目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将解散，将权力交给政府。

雅鲁泽尔斯基宣布，救国军事委员会将"向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和某些经济单位派出军事委员全权代表。

军事委员全权代表受权监督从政府各部到乡一级国家政府机关的活动。"雅鲁泽尔斯基在这次讲话中，特别强调实行军营只是为了"取得一样东西安定。"为了安定，波兰实行了军营；为了安定，救国军事委员会公布法令，详细规定了战时状态期间的公共秩序准则。

波兰在一夜之间消除了动乱华沙同外界的一切电讯联系被切断；边界、领空、领海和机场被封锁；禁止一切罢工、游行和集会，实行新闻检查；在全国所有的大城市实行宵禁；对

200家大企业实行军事管制；禁止团结工会活动……一切想改变现存秩序的行动都受到绝对禁止，一切动乱的因素都被排除，尽管波兰付出了代价，但总算实现了军营式的安定和秩序。

应该肯定雅鲁泽尔斯基的动机，安定是美好生活的基本条件，也应该肯定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行动，彻底地取缔政敌的活动是实现安定的最佳手段。强有力的军事管制无疑能建立起稳固的秩序。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担忧地指出，如果某种政治秩序特别有利于滋生特权、腐败，那么破坏这种秩序的稳定，就不一定是坏事。

不管那一类社会，都不可能使全体社会成员从其稳定的秩序中受益。因此，任何社会，总有一部分利益集团希望安定，以保持既得利益；另一部分人却希望打破稳定，重新建立一个能使自己受益的新秩序。

肯定有了同样的认识，雅鲁泽尔斯基才对军管是否能得到各阶级的拥护缺乏信心。因此，在宣布了军管之后，他又以恳切的态度向波兰各阶层发出了接受并支持军管的请求：我向你们，波兰的工人们呼吁：在这样一个为战胜最艰巨的困难的时刻，为了祖国，放弃你们不可剥夺的罢工权利吧！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使你们艰苦劳动的成果永远再不要付诸东流。

我向你们，农民兄弟们呼吁：不要允许你们的同胞挨饿致死。你们要爱护大地，使它养活我们所有的人。

我向你们，老一代公民呼吁：你们千万不要忘记战争年代的真实情况，不要忘记重建波兰的日子。你们要把这些告诉你们的子孙，将你们炽热的爱国主义、为祖国利益准备牺牲的精神传给他们。

我向你们，波兰的母亲、妻子和姐妹们呼吁：尽你们一切努力，使波兰的家庭不要流更多的眼泪。

我向你们，波兰青年男女公民们呼吁：你们要表现出公民的成熟性和对自己的未来及祖国的未来的深刻思考……

我向你们，民警人员和保安人员呼吁：你们要在敌人面前保卫国家，在非法行为和暴力面前保卫劳动人民。

这是充满有深深忧虑的呼吁，是充满着人性温暖和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的呼吁。仅仅从这份呼吁，我们就可以说雅鲁泽尔斯基不仅是一位富有魄力的军人，还是一位优秀的、富有人情味的政治家。他在这次讲话中呼吁人民“在需要搭桥的地方，我们不要筑起街垒。”这无疑是一句关于民族团结的名言。

从这句话中，我们还感到了一位政治家对民族矛盾的深深忧虑、以及对政府不得不用武力去建立秩序而表示出沉重的负罪感。

然而雅鲁泽尔斯基不能不实行强权政治既然制度已选定了他作为坚定的维护者……

雅鲁泽尔斯基也是一位悲剧人物。他在讲话中很坦然地等待着历史将对他采取的行动作出评价。

其实，这次军管的意义只在于眼前的安定，雅鲁泽尔斯基把波兰现在要做的事推到以后了。这是迟早要作的事。

把这次重大的社会变革放到十年后去做，或许波兰能多一些成熟，少一些动乱，波共能少一些危机，少一些损失。但这是以放慢历史进程为代价的，而且会使他所维护的制度在日后付出更大的代价。

以上是历史的评价，那么现实的评价和反应如何呢？

雅鲁泽尔斯基所采取的这次难以受到历史青睐的重大行动，能被现实的波兰所接受吗？

## 二十九

全世界的谴责、抗议、制裁都是无力和无可奈何的。这个制度既有对舆论压力的坚强承受力，又有一块坚硬的盾牌“不许干涉内政！”

1981年12月13日的波兰是平静的。这是隐藏着不安与惊愕的平静。

早晨，在轻型坦克来来往往的华沙大街上，所有人的表情都是不安与惊愕的。与此同时，全副武装的军队把守着各个地方，市中区的行政区已关闭。

由于电话电报线路被切断、工会领导人被捕，中断了联系各自互不了解情况的工人的第一个反应是停止公共交通，电车被工人丢在马路上。

上午八时，飘扬着红旗的波共中央委员会大厦并未受到特别警戒，但几小时后，在离大楼最近的十字路口部署了军人巡逻队把守住这个大楼的各个出口，禁止入内。

各个教堂周围冷冷清清的，而这天是星期天，正是教徒做弥撒的时候。

从早晨六时起，电台一遍又一遍地插送古典音乐节目以及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的讲话。讲话之前播送国歌。其他节目全部停止播送。

在城市的墙上，团结工会的布告和各种标语，在这天都被其他布告覆盖了。

由于电话被切断，无法知道外省的情况。火车晚点，车站的扩音器里播着一项通知：已经关闭了边界，禁止波兰人出境。

一些过路人，尤其是一堆堆的妇女在议论着，到处是忿怒情绪。

一些逃避了夜间大逮捕的年轻人袖子上佩带着团结工会的红白色袖标，试图组织起来，到各工厂去组织“工人卫队”，但他们没有汽车，没有统一行动计划。

最让人担心的是在格坦斯克被捕的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成员的命运……

在这一天里，局势是稳定的，到处是救国军事委员会张贴的布告：禁止一切集会；电话联系必须经过检查，禁止拍电影与拍照……

雅鲁泽尔斯基的军管只换得了平静和沉默，却未能得到衷心的拥护。

真正表示满意和支持的是苏联。

莫斯科的反应是迅速的。当天，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都受命发表了克里姆林宫的声明，对雅鲁泽夫斯基的军管表示满意，认为军管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克里姆林宫认为华沙当局早该及时采取强硬行动，因为“社会主义的敌人，旨在推翻现有的制度，加深波兰的危机……”然而，类似莫斯科这样的理解和支持毕竟太少了。

几乎在同一天，北约组织召开了15国代表特别会议，对波兰军管作出强烈反应。

西方国家首脑对波兰军管表示了严重关注。美国国务卿黑格呼吁波兰当局，不要停止在团结工会压力下所采取的重大改革，并对波兰“实行军事管制感到严重不安”；法国总理莫鲁瓦呼吁波兰当局“恢复公民自由和工会自由”，他告诉记者说，波兰“逮捕工会活动分子和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引起了法国政府最深切的关注；意大利总理在得知波兰军管的消息后，立即从外地返回首都，“不安地注视着”波兰事件的发展；西班牙外交部发表声明，对波兰军管表示“吃惊和关注”，并呼吁波兰当局“不得采取有损波兰人民最近获得的成就的任何行动”；比利时首相斯更斯对“波兰政府对团结工会采取的军事行动”表示了震惊和遗憾；日本外务省在波兰宣布军事管制的当天，就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波兰形势，确认了要重视波兰事态发展的方针；会议还表示，如果波兰因采取这次行动使其国内发生混乱而引起苏联介入，日本将采取比苏联介入阿富汗还要严厉的措施”……

所有这些反应都是迅速的、强烈的，有的还很严厉。但如此而已，这些道义上的谴责、政治上的抗议，甚至还有经济上的制裁是不能迫使波兰当局在强硬立场上后退一步的，因为当局绝不担心西方会采取军事行动；至于舆论压力，这个制度的承受力是极强的。

当局的判断是正确的。12月13日，在波兰军事管制的当天，美国前国务卿、著名政治家基辛格，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记者采访，就波兰局势发表讲话。

基辛格说：“这是一次摊牌，在这次摊牌中，苏联共产党和政府正在设法镇压团结工会，”或“设法以某种方式结束团结工会的独立地位，把它变成共产党的一个附属机构。”基辛格认为，“我们的盟国将会认为波兰局势是十分严重的。”然而，在被问及美国政府能够为波兰人民做些什么时，基辛格的回答是无可奈何的。

他说：“在军事方面，我们无能为力，我们不应假装要有所作为。但是我们可以通知苏联，谈判的概念，和平攻势以及贸易是无法在这种环境下继续下去的。”这真是无力而又无

可奈何的抗议。

在人道精神已经深深渗透到政治领域的现代社会，国家间、种族间的暴力侵犯肯定会受到国际大家庭的全力抗争，但在各个民族内部，同样、甚至更加残暴的镇压行为，却因为是内政而无人进行干预。

"不干涉内政"，真像各国统治者之间达成的一项可以对自己的臣民进行任何强权统治的协议。看来，任何暴力事件，只要被贴上内政的标签，就别再指望国际援助，而只能靠人民自己了即便是对抗双方的力量十分悬殊。

难怪许多民族的内部镇压住在更残酷、更缺少明辨是非的公正。

手无寸铁的波兰工人阶级，将要投入的就是这样一场力量悬殊的孤军奋战……

三十

里根总统顶着"干预他国内政"的舆论压力，强烈地抗议波兰当局"对手无寸铁的人民越来越多的使用武力和对波兰人民基本人权的侵犯！"

雅鲁泽尔斯基用武力建立的秩序是短暂的。波兰在24小时的愣怔之后，终于打破了沉默。

12月14日，波兰军事管制当局面临了第一个严峻的考验。这天，由瓦文萨的副手克鲁平斯基和逃脱了大逮捕的另外三名主席团成员签署声明，宣布成立全国罢工委员会，"在所有被拘留工人获释和紧急状态撤消之前，举行全国总罢工"以回答政府当局的镇压。

失去领导人的波兰工人阶级终于有了新的组织者。团结工会还成立了一个基干指挥部，在工会主要领导人不在的情况下负责指挥团结工会的行动。指挥部设在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内。指挥部号召，仍然在厂内进行占领性罢工，工人将在工厂内实行自卫，即使部队空投进来也要坚持下去。

波兹南和弗罗茨瓦夫这两个工业大城市的所有大工厂都停工了。华沙的索非亚汽车制造厂，斯韦尔切夫斯基精密仪器厂全体罢工，首都最大的两家工厂，华沙钢厂和大乌尔苏斯拖拉机厂都有近万名工人加入罢工行列。华沙钢厂是在全体职工中进行投票表决后举行占领性罢工的。这次投票有百分之八十的工人支持罢工。

沿海地区的什切青和格坦斯克工人占领了工厂，并贴出标语要求解除紧急状态和释放12月13日宣布军管以来被捕的人。

军管当局以沉着的武力镇压，经住了来自工人方面的考验。当局派军队包围了罢工工厂并对罢工组织者采取了镇压措施。

在华沙，军队开进了国立图书馆，接替了图书馆罢工工作人员；在卡托维兹，军队冲进了钢铁厂，逮捕了50名工会会员，罪名是煽动罢工。

对抗更加激烈，暴力流血事件发生了：12月15日，华沙大学生和教授们为抗议军队对团结工会的镇压而上街游行，在文化宫和华沙中央火车站之间的地区与军队发生冲突。军方开枪驱散了游行队伍；在乌尔苏斯拖拉机厂，工人与为挫败罢工而冲进工厂的军队发生了暴力对抗，有数人死亡，七十多人受伤；在华沙钢厂，七千工人不顾可能判处死刑的危险接连二天占领了钢厂，警察和士兵冲进去把他们一批一批押送出来；在西里西亚矿区，军队向挥舞斧子、棍棒的煤矿工人开枪，有六名矿工当场被击毙；在格坦斯克，伞兵冲进了设在列宁造船厂的团结工会总部，镇压为抗议军管而举行的最有象征意义的罢工。这次冲突有一百六十名军人和一百六十四名工人受伤。

在这几天的冲突中，成千上万的工人被捕，被投进设在格坦斯克和华沙的两个临时拘留营里。在这些被捕的人中，有两位是今年七月增选的波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克拉科夫大学教授库比西亚和列宁造船厂工人瓦贝茨基。

流血、死亡和大规模的逮捕浪潮使波兰的局势更加恶化。当六名矿工被枪杀的消息传出后，整个波兰为之震动，成千上万的波兰人自发地聚集在华沙的胜利广场。那里有今年五月份为红衣主教维辛斯基举行葬礼后留下的十字架。人们排成队，围着象征性的坟墓走过，并献上花圈。一些人跪下了，为死难矿工祈祷。

治安部队迅速赶到广场，驱赶他们认为呆得时间太长的人。到傍晚，数百名青年人仍不离去，他们悲愤地高唱着波兰国歌。军管当局封锁了广场并用棍棒和催泪瓦斯驱散广场上的人。

工人的反抗也同样升级在矿区，矿工在一些地方布了地雷以阻止军方的行动。什切青的工人占领了一个民防武器库。他们宣布，如果军方要用武力对付工人，他们将炸毁瓦林斯基造船厂；在南部，搞到了武器和炸药的煤矿工人也发出了相同的誓言他们将与矿井并存亡。

与此同时，团结工会采取了强大的宣传攻势，一些工会会员冒着生命危险向群众散发传单，呼吁举行全民的总罢工和消极抵抗。

这些传单说："不要逆来顺受，如果我们今天俯首听命，那么就会埋葬我们今后许多争取自由的希望。我们必须为关在狱中的人获释而斗争，几千人是摧毁不了一千万人的。""联合起来，抵制政府的任何公告，只要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能做到的话。不要忘记，统治集团的主要任务是使我们变成担惊受怕的奴隶。""让我们都成为战士吧。让我们帮助被捕的人、罢工的人以及遭受迫害的人吧！"已经是军管即波兰人所谓的"黑暗的星期日以来的第七天了，军管当局却未在控制局面方面有所进展；相反，波兰人抵抗军人统治的气氛越来越浓西里西亚矿工对军队的抵抗一直没有停息，又发生了几次流血冲突，死亡人数已增加到66人，罢工工厂已经增加到二百多家；天主教会谴责政府方面的镇压措施并公开同团结工会结成联盟；在波兰南部，与矿工冲突的军队发生兵变，他们"不愿意用武力镇压罢工者，而且丢弃了他们的坦克"；在华沙附近的一个小城市里，"士兵和警察之间发生了冲突"。雅鲁泽尔斯基面临着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要险恶的局势；而且，他是没有退路的没有人可能承担在内政中错误地动用武力的责任他必须坚持军管的必要性、正确性，必须把军管这颗螺丝拧得更紧；再说，雅鲁泽尔斯基是在莫斯科的要求下进行这场只能赢不能输的赌博的。



里根总统讲过的一句话证实了这一点，他说："美国不至于天真到会相信波兰是在没有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实行军管的。"所以，雅鲁泽尔斯基最多只有两、三周时间向莫斯科出示他的赌博胜局。

克里姆林宫已经等不及了。

从军管开始，华约总司令、苏联元帅库利科夫就一直呆在波兰，他事先就知道宣布紧急状态的计划并想亲眼看到波兰军队的执行情况。

这位元帅显然是位急性子，而且坦率得可爱。在军管前两天，他曾在华沙会见雅鲁泽尔斯基，并给后者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你们不干，我们就干！"现在，这位密切注视着波兰局势的苏联元帅迫不及待地通过他的部下声明："在几天之内，在一周之内，如果雅鲁泽尔斯基要求我们提供军事援助，我们是会提供的，我们将向波兰当局提供它认为恢复国内秩序所需要的一切援助。"和这种公开声明相应的是苏军的频繁而秘密的活动已禁止所有西方国家的飞机穿越波兰上空，并对西方关闭了的华沙机场，常常有苏联飞机在夜间降落；西方外交人士不安地得知两个师的苏联空降部队和在波兰边界的五十个师的军队有干涉波兰的运动迹象；还有苏联后备军人进入戒备状态，苏波边境的苏联捷克军队也奉命保持"紧急状态"。全世界对波兰事态的关注变成了严重的不安。

奥地利总理克赖斯基于12月18日，就波兰的流血事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说，波兰目前的局势"非常、非常危险！"说"我毫不怀疑，这是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对世界和平最严重的威胁。"克赖斯基认为，"只要波兰不出现流血和牺牲，就有解决问题的希望。但是现在，在报道了首批伤亡事件后，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十分困难了。"1981年的西方是高度警惕的。他们记住了1968年勃列日涅夫镇压"布拉格之春"的惨痛教训。那一次，勃列日涅夫正是作出了西方不会采取相应的军事对抗的判断后，才敢于采取军事行动的。

在克赖斯总理发出警告的同一天，美国政府也对波兰危机表示了严重关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波兰当局宣布只拘留了四千人，而美国得到的其他消息提供的数字远比这个数字高。同时，发言人还对这些犯人没有受到人道的待遇表示了不安。也是这一天，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鲜明地表明了美国军方的立场。

他说："我们强烈希望不要再弄出一个匈牙利事件来。"美国总统里根顶着"干预他国内政"的舆论压力，发表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外国总统对他国内政的干预，而是一次旗帜鲜明地以人道力量去讨伐对人权的侵犯。

里根的这一强有力的声明是一次向全国广播的记者招待会上发出的。他一开始就声明，他反对波兰当局所采取的镇压做法。

里根说："大规模采取强制和侵犯人权的行动取代了谈判和妥协"就构成了对赫尔辛基协定的"严重违反"。里根强烈地谴责波兰当局"对手无寸铁的人民越来越多的使用武力和对波兰人民基本人权的侵犯。"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美国是否不允许苏联把它的意志强加给波兰时，里根立刻回答："不允许。我们没有向苏联表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即使里根总统给予波兰工人协级的仅仅是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声援，其所显示的力量却是巨大的。

强暴所要达到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致对手于死地，主要还在于致舆论和更多的被统治者于颤颤惊惊的沉默之中。在这种时候，旁观的人高喊一声“住手！”其意义不低於被打倒在地  
的对手挺身再战的勇气。在强权面前，妥协可悲，沉默可耻。我们应该记住里根以及和他一样能为民主、人权、人道呼吁的政治家。

有了这一系列的强硬表态，波兰当局就很难指望借用苏联的军事力量来平息军管后的危机了。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必须证明，他有足够的政治才能来消除无法用军事力量消除的危机。

12月13日的军管使雅鲁泽尔斯基走上了一条凌空而架的钢丝绳一边是苏联的霸权控制，另一边是波兰的独立；一边是强权，另一边是民主；一边是靠暴力恢复的旧秩序，另一边是暴力激起的暴乱……无论哪一边对雅鲁泽尔斯基都是万劫不复的深渊，他都会遭到另一方的殊死反击。

雅鲁泽尔斯基将如何保持住这危险的平衡？

三十一

为了证明军管不仅能给波兰带来安定，还能给人民一个好政府，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制度身上的腐烂处狠狠地割了一刀。

雅鲁泽尔斯基作出的第一个政治姿态是向波兰人民表示，军管决不是要恢复1980年8月以前的统治方式。

这个姿态是救国军事委员会于12月16日发表的一项广播声明作出来的。

声明说：救国军事委员会“决不会背离去年开始的民主化进程的基本前提。”“为了表示与以前的统治方式决裂，声明宣布，”已加速把那些作风不正，工作无能或者承担不了当前任务的人从权力机关中清洗出去。”雅鲁泽尔斯基也承认军管给波兰带来“痛苦的震动”，所以他对军管后流血冲突深表悲痛，并要求军警竭尽全力避免冲突。但他又强调说，“波兰没有别的路可走……人们必须经受一阵痛苦的震动是免不了的。”应该相信雅鲁泽尔斯基是真诚的，他所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确实是为了波兰的利益，为了波兰的安定和民主化进程。

只是这里有一个十分尖锐的矛盾横挡在他的良好愿望与实际后果之间一次以武力扼杀一个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自治组织的行动，怎么可能促进社会的民主化运动？民主政治结构可以用暴力建立起来吗？民主政治可以在政治反对力量被摧毁以后生存下来吗？

雅鲁泽尔斯基显然犯了一个古老的政治错误，即建立一个不受干扰和反对的好政府，就能给社会带来富裕和民主。

雅鲁泽尔斯基的愿望是良好的。只是他所许诺的民主最多只是一种恩赐，一种放松控制。

如果说民主是人民行使权力的话。那就必须要有由人民组织起来的自治组织，而不是相反的去禁止这些自治组织。

我们说雅鲁泽尔斯基是真诚的，还在于他确实为实现给人民一个好政府的诺言而采取了行动。

雅鲁泽尔斯基在政治上采取的另一大措施就是惩治腐败，以表示与旧的政府和旧的统治方式决裂。

惩办是从前党政领导人开始的。

12月5日，波兰政府新闻局公布了被捕的前波兰领导人名单：盖莱克前波共第一书记；巴比乌赫前总理；卡伊姆前副总理；乌卡谢维奇前波共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佩卡前副总理；什德拉克前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这次公布的被捕前领导人共33人，还包括各省委书记、省长、市长及中央各部部长。

对前领导人的逮捕之后，救国军事委员会还对在职的波共下层官员进行了清洗：军管以来一周时间，至少有十个省长被撤销职务；同时军方还通过国家电台，对“包括商店经理、医院院长、厂长和教区负责人在内的一些人被解除了职务”。这些被清洗的人的罪名是“贪污腐败”和“利用职权谋私”，当然也有的是政治原因，即反对军管以及和团结工会有联系的人。

雅鲁泽尔斯基是由制度挑选出来承担重任的英勇斗士，但他并不作一个消极的工具，他首先在制度身上的腐烂处狠狠地割了一刀。这是雅鲁泽尔斯基的远见和魄力。

完成了对内部的治理后，雅鲁泽尔斯基便把视线转向那个虽被打倒、却远未死亡的强大对手波兰工人阶级。

应当承认，雅鲁泽尔斯基对目前已处于劣势的强大对手的进攻是犹豫的、克制的。比起对前党政领导人的大逮捕，他对团结工会领导人是温和而谨慎的。至少在军管后的一周，我们并没有听到军管当局对工会领导人发出过逮捕和严惩之类的声明，仿佛军管仅仅是针对动乱和腐败，而不是团结工会。

然而，这种被武力维护着的审慎能维持多久？这是一个谜。这个谜刺激着波兰人的不安和不详的预感。人们无不为被捕的工会领导人的命运担忧，为瓦文萨的命运担忧。

全波兰都在问：瓦文萨，您在哪儿？

三十二

为了不让国民的道义精神被压垮，瓦文萨拒绝与军方举行高级会议，并以绝食行动来号召全体工人消极罢工藐视军事管制。

12月13日上午，在宣布军管之后仅几个小时，军管当局发言人耶·乌尔班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说：“瓦文萨没有被捕，也没被扣留，对他还是给予了适当礼遇的。他被认为是团结工会的领袖，因此受到了团结工会主席所应受到的尊重和对待。对于团结工会，并未取

缔，只是暂时停止了它的活动。"乌尔班同时还宣布，今天军政府与瓦文萨举行了高级会谈。

这个发言使公众感到诧异：不在家里，不在工作岗位，连新闻界都无从寻找的瓦文萨既没有被捕，也没有被拘留，那么，他在哪儿？他和政府的谈判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

政府和团结工会都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说明。

12月14日，法新社从华沙发出了题为《瓦文萨在哪儿？》的电讯，更加深了波兰人的不安和疑惑。这篇文章对政府发言人乌尔班关于瓦文萨没有被捕的说法表示怀疑，并公布了瓦文萨失踪前的时间表：13日零点过后不久，瓦文萨在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其他委员的陪同下离开了列宁造船厂，回团结工会主席团成员下榻的索波特大饭店。现在的一个谜是，在警察部队开始行动时，瓦文萨是仍在饭店还是已经离开？按惯例，他在乘专机去华沙之前总要回家一次。

还有消息说，军管当局曾要瓦文萨作出选择：要么与其他领导人一起被拘留，要么立即与政府进行谈判。既然说谈判已经进行，就是说，瓦文萨选择了后者；如果是这样，瓦文萨就有时间把他的全家托付给造船厂的教堂。该教堂的神父是他的心腹挚友，然后，在大约五点钟他到了毕沙，与波共负责工会事务的领导人会谈，还可能直接与军管当局会谈。

美国新闻界的消息要具体一些。美国《新闻周刊》12月20日撰文描绘了出事前后瓦文萨的行踪。

这家报纸说，瓦文萨在政府采取行动前几小时曾得到警告说，政府将立即镇压工会。但瓦文萨没有采取行动。凌晨一时半，瓦文萨在格坦斯克的住宅外面响起了一阵急迫的喊声："快躲起来，他们要包围我们了！但瓦文萨没有逃跑。几小时后，他被政府的保安人员带上了一辆轿车。临出门前，瓦文萨带上了领带，不声不响地跟他们走了。

第二天，格莱姆普大主教设法打电话同华沙附近的一所政府"宾馆"里的瓦文萨取得了联系。

大主教问："您被捕了吗？"瓦文萨回答："我不能肯定你该管这叫什么。但我往窗外一看，看到的就是雪和树以及武装士兵。"但所有这些消息都只是传闻、推测。没有人知道瓦文萨的确切消息，没有人知道会谈的确切地点、内容和结果。

还有消息传出，说会谈的目的主要是说服瓦文萨，实行紧急状态是必要的，当局希望瓦文萨能发表一次电视讲话，赞成实行紧急状态。

所有这些推测和未被证实的消息中，最后一条的可能性最大。它使我们想起了1956年和1968年，当苏军进驻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后，也曾用武力将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请"去会谈，要他们在事先拟好的会谈协议上签字，表示同意邀请苏联出兵，接受并拥护新成立的军政当局。

瓦文萨现在的处境肯定与当年的纳吉和杜布切克相似。不同的是，瓦文萨没有被自己的同志背叛而像那两位政治家那样，受到从自己营垒里分化出去的政治家的审判。

可见工人阶级的政治品质反倒比政治家的高。

波兰工人阶级没有背叛自己的领袖而屈膝妥协。瓦文萨也没有背叛工人阶级而出卖整个阶级的利益。于是，军管当局所作出的两个美好的政治姿态中的一个便变得荒唐可笑了。

12月15日，有消息传出，瓦文萨与救国军事委员会之间的谈判已经中断。

这个消息表明，瓦文萨的处境已经发生变化，已不再拥有谈判的自由。人们为瓦文萨不再拥有这种危险的自由而松了口气；同时为他感到高兴。

12月16日，瓦文萨让去看望他的大主教布罗尼斯瓦夫带话，希望工人阶级在厂内举行罢工，实行非暴力抗议。

瓦文萨对大主教说："不能让国民的道义精神被冲垮"；同时，瓦文萨拒绝了军方关于举行以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波兰大主教格莱姆普和他的三方高级会谈的建议。因为瓦文萨要求会谈应在非官方所在地、并要有顾问参加的建议没有被军方接受。

瓦文萨的处境变得更加微妙，官方人士也称他"正在听候政府处置，但不是被捕。"12月17日，被拘留在华沙以南二十四公里处一个村庄里的瓦文萨，在听到当局宣布在卡托维兹的冲突中有六名矿工死亡的消息后，悲痛欲绝，心脏病发作。

12月18日，由瓦文萨书写并签名的文件被带出拘留地。

瓦文萨在信中呼吁团结工会会员，以"消极罢工藐视波兰军事管制。"瓦文萨要求工人将罢工局限在"你们能够自卫的工厂"内，要求工人"不要携带武器，应该避免流血。"他在信的结尾呼吁："要用事实证明团结工会是存在的并且正在开展活动。"12月19日，瓦文萨开始绝食。消息传出来后，当局感到紧张而不断地改变瓦文萨的拘留地点，并不得不在华沙电台上宣布："瓦文萨受到了良好的待遇，在扣留期间他的妻子、孩子和一名罗马主教神父曾去看望了他。"瓦文萨的绝食是得知19日发生在弗罗茨瓦夫的惨案后开始的。这一天，以坦克打头阵的保安部队冲进弗罗茨瓦夫的铁路机车厂并以暴力驱赶罢工工人。这次冲突有五十名罢工者被打死。

当局克制的政治姿态最终还是换成了凶猛的捕杀更大的逮捕浪潮终于向团结工会扑来。到下旬，团结工会会员及他们的支持者的被捕人数已经增加到四万九千多人。监狱人满为患。许多体育馆也改成了临时拘留营。

这数万人没有经过法律的正常程序正式逮捕，却完全被当作囚犯，有的甚至受到虐待，象"健身跑步"即受夹道鞭打。

对团结工会领导人及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逮捕也是大规模的：一千多被当局认为更重要的犯人被用飞机送到苏联或捷克斯洛伐克。

在这些被捕的著名知识分子中，有波兰最著名的电影导演、五十五岁的瓦伊达，他导演

的描写团结工会诞生的影片《铁人》，在今年五月的法国嘎纳电影节上获了奖。他因这部片子而成名，又因这部影片而被捕；被捕的还有团结工会专家顾问组组长马佐维耶斯基。

镇压使对抗再一次升级在西里西亚，三十个煤矿举行了罢工，并成立了"矿际"罢工委员会；在波兹南，十三个大企业的罢工工人成立了联合行动的协调委员会；在卡托维兹省，矿工筑起街垒游行自卫。激进的矿工炸毁了一个矿井，并宣布如果当局派军警冲入矿区，他们将炸毁另一个矿井；这个省的铸造厂有八千名罢工工人在工厂周围设置了路障。他们表示，要响应瓦文萨的号召，军管不撤退，决不进行谈判，同时还宣称，如果保安部队要强行进厂，他们将炸毁工厂。

工人们还在宣传上顽强地坚持开争。许多年轻工人走上街头，散发传单，他们中许多人被捕。但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华沙市中心巡逻的军人巡逻队，看到散发传单的青年工人后，赶紧走到大街的另一侧，而不是逮捕这些青年。

这些传单和公报要求建立秘密领导小组，以使在领导人被捕的情况下能组织工人的反抗；还要求在工厂中建立独立情报网，建立电台和广播宣传系统，以宣传鼓动军人站在人民一边。

这些传单更多是谴责军管当局的"法西斯主义"镇压手段，揭露出许多儿童、包括还在喂奶的婴儿在他们的母亲被捕之后被送到孤儿院。

这些署名团结工会的传单称这次军管"使人想起了集中营时代"，表示"我们将斗争，就象我们曾经对占领者作斗争一样。"团结工会一些幸免被捕的领导人转入地下或在国外继续组织抵抗运动，他们在国外组织抗议集会，并在巴黎、瑞典、奥地利成立了分会。

尽管有这许多接连不断的反抗，军管当局仍然是强大的一个完备而庞大的国家机器在此时充分显示了它的无比威力。

另一方面，尽管军事当局有如此不可抗拒的军事武力，它依然是难堪的、困难重重的。除了武力对抗中的胜利，他在其它方面几乎全输光了，雅鲁泽尔斯基没有退路、没有选择，他必须靠武力赢得这场赌博。

可以肯定，如果现在让雅鲁泽尔斯基重新作是否采取军事解决的选择，雅鲁泽尔斯基会有更多的犹豫。工人阶级不可能在这次对抗中战胜一个具有三十万军队和十万警察的国家机器，但仅能使雅鲁泽尔斯基有这样犹豫，那么，波兰工人阶级这次付出的代价便不会是毫无意义的了。因此，我们不要说这种反抗是没有用的、无意义和毫无结果的。

### 三十三

瓦文萨使1980年的波兰得到了举世的赞誉；雅鲁泽尔斯基却让1981年的波兰黯然失色。然而雅鲁泽尔斯基毕竟获得了胜利，并以军人警察统治给半个世界增添了一种成功的选择。

即使雅各泽尔斯基的军管遭到了举国上下的殊死反抗，但没有人将他的军管说成失败，

"一时胜败在于力"的条律依然如此有力地决定着1981年的波兰历史进程。但我们却可以说，雅鲁泽尔斯基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失败是惨重的。

和工人阶级同时采取行动的是罗马天主教会。一度在政府和工人之间保持着审慎中立的教会，在强暴面前反而站到工人方面去了。接替了已故大主教维辛斯基的波兰大主教格莱姆普，从19日开始便拒绝了同官方的一切会晤，他的会谈条件是"除非瓦文萨能够参加"。19日，这位总主教就波兰局势发表了明显同情工人的声明。

他说：弟兄们：我知道在我国存在多日的那种仇恨情绪现在已激化了。

令人痛心的是，这种现象偏偏发生在圣诞节前夕。照说，这正是家人团聚的时刻。我谨代表主教团全体向那些受到颁布军管法影响的、以及亲人离散影响的家庭，表示深切悲痛和同情。

我们跪在主的面前，恳求不要发生流血，因为我们从来不曾经历过兄弟相互残杀的内战。

我以上帝的名义求你们不要互相举起仇恨的胳膊。

大主教对军管以来的波兰深感悲切，却又无可奈何，他说："我们在苦难和邪恶面前可谓束手无策。"更大的冲击来自当局内部，为抗议军管以及对平民使用武力，波兰有些军人绝食；一些将领因抵制军令而被捕。在弗罗茨瓦夫市，一些波共党员在市政大厅前扔下他们的党证，抗议实行军政管制。

当然，这些反叛的规模不大，并且由于新闻封锁而未能对当局造成较大的震动。

大震荡是12月20日从华盛顿传过来的。这无疑是爆炸在军管当局头顶上的一颗大当量政治原子弹。12月20日，波兰驻美国大使斯帕索夫斯基在华盛顿宣布脱离波兰政府，要求政治避难。

这一天是星期日，在电视节目的黄金时刻，这位波兰大使向全美人民发表了谴责波兰军管当局的电视讲话。他的声明如下：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是波兰驻华盛顿大使。我是波兰资格最深的外交官，驻美大使是我担任过的第五个大使职务。

一月以前，一种战争状态已强加于波兰。这是对波兰人民宣战的战争状态。在受过特别训练的部队和警察的保护下，一场空前的恐怖统治已经开始。我们的国家已黑夜沉沉，一片沉默。

我不能再沉默了。我不能再同应该对这种野蛮和无人道行为负责的当局保持任何关系，更不要说代表它了。在我得悉团结工会最受爱戴的领导人瓦文萨已遭武力逮捕和拘留的那一刻，我作出了这个决定。

这个行动，也就是我现在所作的，是我对瓦文萨的团结的表示。我已要求美国政府给予我和我的家属以庇护和政治避难。这两项要求都已得到同意……

我要向现在正在听我和看我讲话的美国人民讲话。

此时此刻，当你们坐在电视机前的时候，罪恶的势力正在践踏波兰，践踏有着强烈爱国心和笃信宗教的波兰人民。请你们想着这些波兰人，请你们每天听新闻的时候设想一下他们的遭遇。请记住，他们，这些工人、学生、知识分子是我们祖国最优秀的儿女。

现在，让我对波兰人民说几句话。所有在国外的波兰人都向你们致敬。在波兰成为波兰和你们享有人人都应享有的尊严之前，我们绝不停止斗争……

我现在还想对波兰驻外使团的外交官说几句话：要做波兰人，要忠于自己的信念。要本着自己的良心行事来帮助我们波兰国内的兄弟姐妹。

这真是共产世界政坛上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它的连锁反应是12月21日，波兰驻纽约副领事为抗议军管而要求在美国政治避难；12月23日，波兰驻日本大使鲁拉尔兹在东京宣布辞去波兰驻日大使职务，并打算到美国政治避难。

鲁拉尔兹在飞往美国途中，发表了简短的声明：我决定辞去大使的职务，辞职的理由是波兰被引进了战争状态。这种战争状态是违反波兰人民利益的……因此，我不能代表否定波兰人民基本人权的波兰现政府。我将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从日本到美国去要求政治避难。我担心。我的避难会使我在波兰的母亲、弟弟、妹妹遭到当局的迫害。

政治避难的浪潮迅速高涨，数以万计的海员、渔民、旅游者、运动员、企业家在奥地利、英国、西德、瑞士、意大利、荷兰、法国、加拿大、南非要求政治避难。

1980年是瓦文萨年，他因波兰团结工会的成立而闻名于世，登上了1980年国际十大新闻之首；1981年是雅鲁泽尔斯基年，他以军事管制而使波兰在国际十大新闻中夺魁。

1981年12月24日，日本时事社列出1981年国际十大新闻，第一条就是“波兰宣布紧急状态，过渡到军事管制”；而最后一条是“中国经过对‘四人帮’的严厉审判，胡耀邦体制诞生。”令人痛心的枪杀工人的悲剧发生后，日本三家最大的报纸《经产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同时于12月19日发表社论，对波兰的危机和悲剧表示了极大的忧虑。

《朝日新闻》的社论是《波兰以流血而失去的东西》：“把枪口对准同胞，即使暂时维持了秩序，以此而失去的同人民的信任恐怕是不可挽回的。为了防止更大的流血，我们再次要求雅鲁泽尔斯基早日结束军管……”

“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对于波兰可以说是最后一张王牌，如果用尽这张王牌，而事态越演越烈，那么这个国家的前途将日趋暗淡。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苏联将不得不被拖进波兰问题……”《每日新闻》的社论题为《在刺刀下得不到再生》：“军队掌握政权是不是根据救国之念来进行的，要讨论这个问题，材料还很不足。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以武力为基础是无法拯救这个国家的……”



"雅鲁泽尔斯基政权想要恢复秩序反而正在破坏理应成为国家原动力的各种势力，时光流逝，解除非常状态就越困难。

"应该早日结束军营，释放被捕者，恢复党、政府、团结工会、教会之间的对话，再生的道路只有确立在坚韧不拔的谈判基础上的国民一致....."很少有哪位政治家面临过如此严重的政治困境，很少有哪一位统治者经受过如此众多的、来自国外的舆论谴责。

我们很难判断这些政治上的压力和道义上的谴责，可能对波兰历史具有什么样的深远意义，但就眼前论，它丝毫不能阻止已无退路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用武力解决的道路上走下去。

军管后第十二天，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终于粉碎了形式的大规模反抗。他结束了一个时代至少是暂时停止了一个新时代。1981年12月24日晚上，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发表电视广播讲话。

他宣布："国家分崩离析的过程已被制止，结束了无政府状态。"是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以武力击溃了对政府权力的各种挑战，重新树立了政府的绝对权威。雅鲁泽尔斯基拯救了这个政权。在政权等于国家的等式中，当然还可以带出结论，说雅鲁泽尔斯基拯救了国家。

雅鲁泽尔斯基获得了胜利，也使这半个世界获得了胜利他证明军队和警察力量完全可以与民主力量相抗衡。

1981年12月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波兰。

是的，雅鲁泽尔斯基成功了。在他宣告动乱已被制止四天之后，冲突最为激烈的波兰南部矿区的煤矿工人结束了罢工罢工委员会被解放，在井下坚持罢工斗争的煤矿工人也分批返回地面。

许多团结工会会员告别了自己的组织，告别了政治，去履行和行使他们唯一的责任和权力干活，做劳动的主人；而数千名拒绝与团结工会公开脱离关系的工人被解雇了。

这盏使波兰变得光彩夺目的明灯，这盏使半个世界翘首仰望的明灯暗淡下去了，它的最后一线光亮的熄灭是在12月23日。这一天，一直坚持绝食斗争的瓦文萨停止了绝食。有人劝说他，不应该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因为他仍可能在这场并未结束的危机中起重要作用。

这个大战役失败了，但工人阶级还在，瓦文萨还将战斗下去。

瓦文萨开始吃东西了，他不会忘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更不会忘记那句不朽的名言只要我们还活着，波兰就不会灭亡。

三十四

当这幕悲壮的史剧在刺刀的威迫下沉重地降下大幕时，整个世界都为波兰工人阶级的历

史性尝试所震撼；但人们相信，这仅仅是序幕，而在下一幕，工人阶级将是不可战胜的。

1981年只剩下几天生命了。当他带着遍体创伤，带着最珍贵的人生经历告别波兰时，一定对自己这次匆匆往来怀着深深地怀念和悔痛；只有经历过刻骨铭心人生体验的人，才能领会这种既有赞叹、又有恐惧，既振奋、又有疑虑的矛盾心理。

1981年的最后三天，坚持到最后的西里西亚煤矿工人解散了“罢工委员会”，12月29日，他们将复工。

这个世界的秩序恢复了。至此，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历史决战结束了。

波兰工人阶级失败了在强权的暴力打击下失败了。

当这幕悲壮的史剧在刺刀的威逼下沉重地降下大幕时，所有观看过这幕伟大的史剧、并为之震撼过的人，都会带着忘我的冲动为之鼓掌。这幕剧的主角是波兰工人阶级。

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无愧于这掌声该做的他们都做了，能做的他们都做了；即使结局的失败是清清楚楚的，他们也勇敢地走向结局直至最后一刻。

他们失败了，但留下了希望，留下了新的目标，还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教训。

这教训是珍贵的。

我们常常赞扬科学家在成百次、上千次的试验中去总结教训、寻求经验，并因此赞扬他们的坚韧和艰难；然而，我们却忽视了科学家能有成百上千次实践的机会是多么的幸运，他们正是有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权利，他们的事业便容易多了。

工人阶级要以鲜血和生命才能获得尝试、实验的权力。对他们来说，实验本身就是如此珍贵、难得，没有那个阶级的有挥霍鲜血的奢侈，他们必须在一次实践中获得尽量多的成果、尽量多的教训，所有这些珍贵的。

波兰工人阶级的成功无须赘述，历史会书写的，历史会铭记的；历史会从中吮吸到大量的养料而有了更健康的成长；至于教训，则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铭记，他们已经流过太多的血，他们无权忘记。

1981年的教训是无须掩饰的。

波兰工人阶级是懂得伟大的历史性妥协的，正如瓦文萨所说，“团结工会不是政党，也不想成为政党。”波兰工人阶级懂得他们的斗争比传统的、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斗争更加艰难。他们应该始终在进攻与退法、情感与理智、对抗与妥协、争权与合作之间保持住平衡。

这是更加深奥的斗争艺术。

工人阶级既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又要避免使对方在斗争中彻底倒塌，甚至要避免使对手

过于难堪，避免使对手最后摊牌……要作到这些，工人阶级既要有纪律、团结、顽强、勇敢，还得有理智和克制。

波兰工人阶级在争取自治组织合法化的斗争中，既能顽强地坚持罢工，又能克制而秩序井然地进行有组织、有步骤的政治斗争，因此他们胜了第一个回合；然而在第二阶段，在争取参与权时，他们显然过于急躁了。

这本是比第一回合的斗争更艰难、更陌生的争斗，这要求波兰工人阶级有更多的理智和耐心，既然参与权的制度化、法律化将使当局付出更大的代价，那么，这代价就不应该一次索取太多，而应该是渐进的、以让双方都能逐渐适应和习惯。

这是深刻的教训，但又是无可指责的因为这是工人阶级的第一次实验，因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们这个星球的任何地方还没有作过这样的实验。

在我们为工人阶级总结教训的时候，另一方，当然会总结经验成功的经验。

强权确实是解决危机的最佳手段。看来军事比政治更有力量，看来雅鲁泽尔斯基比盖莱克、比卡尼亚都更有魄力；看来，只要牢牢地控制着军队和警察，只要有魄力在国内事务中动用武力，一切动乱都可以消除。

这是雅鲁泽尔斯基创造的成功经验。

雅鲁泽尔斯基胜利了，波兰共产党和波兰政府、或许还有半个世界的政治家们都将为他的胜利高兴：党和政府的权力收回来了，党和政府又可以不受干扰、不必担忧地行使权力了。

这是重大的胜利。

没有得到关于波兰工人阶级对这次胜利的态度。工人阶级沉默了、舆论也沉默了。能看到的最后一则消息是国际合众社于1981年12月26日发出的电讯，说“军管把已实现的改革全部取消了。”这则电讯说：“有权成立工会，有权罢工以及给予波兰工人的其它自由全部废除了，像每周工作五天这样的福利，也由于军管而取消了。”波兰也沉默了，对雅鲁泽尔斯基的胜利保持着顽强的沉默。她默默地接受了军管期间对她的严厉整顿1982年10月8日，军管当局宣布：“正式取缔还在制造不安定的团结工会；同时颁布了新的劳动法。恢复每天八小时，每周六日工作制，监督被军管的企业执行政府法令，对完不成生产任务和违反劳动纪律者，一律按现役军人惩处条例惩处。”<sup>①</sup>历史也沉默了，将近两年时间，历史象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默默地回忆和思考着；或许，这个比喻不恰当历史会衰老吗？或许历史只是被疾风暴雨般的十六个月搞疲倦了，他得歇息一下，喘一口气。

是的，历史也是需要休息的。1983年10月，缓过劲来的历史突然宣布，波兰工人阶级的象征瓦文萨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尽管波兰政府为此提出抗议，瓦文萨的妻子达努塔·瓦文萨还是于12月9日去挪威领取了她丈夫的诺贝尔和平奖金。

这时，离1981年12月13日波兰军管刚刚两年。

历史确实是不着急的因为他永不衰老，又等了五年，在1989年4月，历史又以他那沉着的声音宣布：波兰政府与瓦文萨会谈，讨论关于恢复团结工会合法地位的问题。

慢性子的历史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把最后的结论说出来，但全世界的人们终于在电视上见到了瓦文萨还是炯炯有神的目光，还是浓浓的八字胡，只是他的鬓角已经有了白发。

呵，历史，您可看到了，瓦文萨老了！

呵，历史，您看到了吗，这一代人又老了！

瓦文萨与波兰团结工会（二）

赵启强

本文系作者大著《光荣的荆棘路改革家们》第五篇第二部分。

六

历史的巨变常常是存在于稍纵即逝的瞬间。瓦文萨果断地抓住了这一瞬间，于是历史感到了一阵阵分娩的疼痛。

瓦文萨在8月16日下午那一瞬间的醒悟，是波兰工人阶级具有历史意义的觉醒。为此，他们付出了近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和两次大规模的流血。

人民波兰新的一页应该是从1980年8月16日开始的。

从这一天起，向当局要求善意和施舍的请愿，将让位于建立自己的权力中心。有了这个新的目标，波兰工人将会经历更加险恶的历史进程。这一点很快就会得到证实。

然而这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有了8月16日，波兰将有一个新的工人阶级；有了8月16日，波兰将不再回到1980年8月以前的那种状态。

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几次重大转折都是在一瞬间完成的：1917年11月8日，列宁在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布：“现在，我们就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于是，一个人类的新纪元开始了；1948年9月，铁托承受着巨大的历史压力，对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的指责和胁迫，坚定地回答说“不！”，于是，铁板一块的斯大林帝国有了第一条裂缝。

现在，1980年8月16日下午3时，如果瓦文萨再有几分钟的犹豫，如果他再一次召集起全体罢工委员，讨论要不要结束罢工，那么，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三个重大的转折或许又要等一个或好几个十年。

瓦文萨以他的敏捷、果敢，要抓住正在消失的历史时机。

瓦文萨没有跟罢工委员和工人代表商量，便突然对他身边的工人宣布：“我们继续占领性罢工！我们必须一块儿坚持到底，必须团结一致，否则我们会失掉一切！”

就是这个突然的决定，就是这几句简单的话，使社会主义历史翻到新的一页。

拥护这决定的工人欢呼起来。但欢呼声远没有前几天和刚才谈判的时候热烈。一些人在犹豫，一些人胆怯了……

瓦文萨和几位坚定的组织者分别领人向一号门和三号门走去，许多工人正从这两个门往外走。

工纠队要将大门关上，被瓦文萨制止了。

瓦文萨说：“我们不能把人硬扣下来，谁身体不好，感到吃不消就让他们回家，到明天或星期一再来。我留在这儿。我已经说过，我最后一个离厂。谁愿意罢工，谁愿意干到底，谁就留下！”

许多人响应了瓦文萨，另一些人还是要出去。把这些人放走后，大门重新关上了。

罢工有希望继续进行了。但心神不定和担惊受怕的情绪随处可见，三天三夜的神经紧张开始显露出来。同时，列宁造船厂越来越成为格但斯克各界人士注目的中心。各阶层和各种政治观点的人开始涌向列宁造船厂，使形势变得复杂、气氛更加紧张了……

基层教区的神父来了。

神父向罢工工人祝福之后，宣布：星期日的弥撒将于明天上午9时在二号门前举行；神父还说，大家呆在这儿并没有罪，他明天来工厂做弥撒也没有罪。

在波兰，百分之六十的人信奉天主教，教会一直充当着精神领袖的角色。教会的间接支持显然是一剂镇定剂。

一些传单和地下出版物也在这个下午出现在列宁造船厂。出版物不够分，便有人出来高声朗读。传单中有去年成立的地下组织“青年波兰运动”散发出来的。

广播站，有青年工人在宣读这个地下组织的传单：“我们的目的是在我国保卫人权，保卫民族大家庭的利益，保卫波兰文化免遭控制、没落和苏化……我国人民没有真正独立，他们处在一个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的无能的统治之下。”

工人们感到惊愕！即使最激烈的工人语言也无法与其相比——这个宣言不仅针对当局，而且是针对着整个制度的。

有的青年工人在为这个大胆得叫人心跳的宣言喝彩，而一位老工人却流下泪来。打动他的不一定是这个宣言的具体内容，他准是感到自己正在过着一个重大的节日——已经久违了

的政治生活终于恢复了；或许，他还害怕：结果会怎么样呢？

当然，这些——教会也好，少数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活动也好，都不是眼前发生的事的最本质的东西，否则，我们便无理由将 8 月事件当作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

教会及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在波兰一直是与执政当局抗衡的力量。然而，教会无论如何不能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斗争的主力；而少数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是很容易用威胁、镇压、收买等手段控制住的。

对工人的挑战却难以应付——在一个所谓的工人国家中，用大规模的镇压对付大规模的工人运动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现在，事态就正是朝着当局难以对付的方向发展着——越来越多的罢工工厂代表，乘坐着汽车，艰难地穿过列宁造船厂门外的人群开进厂门。

这是一个新的开端。开端总是艰难而又让人茫然。列宁造船厂似乎又回到了 14 日刚刚开始罢工时的那种局面——

各式各样的要求中，谁也说不清什么是最重要的，各种观点的人都有，但谁也不能得到绝对多数的赞同。

到 17 时，这种既振奋又茫然，既欢欣又胆怯的气氛被一个清晰的声音打破了。这个声音来自工人内部，来自反对瓦文萨的一方。

厂广播站传出了一位列宁造船厂罢工委员的讲话：

“……我们的要求已被接受了。这当然不是经理一个人接受的，这是上头同意的。上头同意了我们的要求，难道这一切我们都要失掉吗？如果我们撕毁了刚刚达成的协议，到下午 6 时，瓦文萨就不再是造船厂的工人了。你们知道警察和保安机关会对他采取什么行动。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因为我们撕毁了协议。

“在下午 6 时以前，我们必须离厂。难道你们愿意流血吗？难道你们愿意 10 年前的 12 月悲剧重演吗？我们并没有承担联合罢工的义务，我们必须出去。到下午 6 时，警察和保安人员就要进厂了。你们知道这里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我不是吓唬你们，我和你们在一起，但是我们必须离开！”

混乱出现了，下午 6 时军警要进厂的消息使惊恐不安的情绪弥漫开来。大门外，许多带着孩子的妇女呼喊着她们的亲人，许多动摇了的人要求开门放他们出去。

瓦文萨和几个外厂罢工代表匆匆赶到广播站。

瓦文萨讲话了：

“我是罢工委员会主席，是我说了算！我已经宣布了罢工，现在罢工继续进行！”

广播里又传来了外厂代表的讲话：

“我是炼油厂罢工委员会的代表。从早上起，炼油厂就罢工了。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你们也应该和我们站在一起。”

“我是‘巴黎公社’造船厂的代表。我们从昨天起罢工了。现在仍在进行占领性罢工。我们没有谈判。我们支持你们的罢工，但我们大家必须站在一起！”

瓦文萨又一次呼吁：“你们愿意保卫我们的事业吗？”

“愿意！”一些听广播的工人发出了响应。

“你们愿意干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吗？”

“愿意！”回答的人更多了。

情绪暂时稳定一些了。但随着下午 6 时的临近，不安的情绪不断增长。

对工人阶级来说，胆怯是可耻的，但他们无法不恐惧。那位呼吁大家离厂的罢工委员说得对，那些人什么都做得出来的。这些精疲力尽的罢工工人中，许多是 1970 年 12 月事件的参加者、目击者，他们不会忘记，无法忘记——

波兰工人是有过勇气的，1970 年 12 月，他们唱着国际歌，迎着高压水龙、迎着头戴钢盔、手提警棍的警察走了过去：他们曾经有勇气向坦克车伸出拳头，高呼道：“我们是工人，不是流氓！”他们曾经有勇气用肉体组成防线，向前进的坦克进行绝望的斗争；他们曾经有勇气抬着被坦克压死的同伴在刺刀和坦克前面缓缓步行，高唱着国际歌、高声地呼喊：“看看你们干的勾当！”

但那一次——1970 年 12 月，波兰工人的勇气只是加速了悲剧的结局——镇压者疯狂了，坦克也疯狂了，一切都失去了控制……连抬着死难者的工人也遭到了枪击，他们在《国际歌》歌声中倒了下去；坦克甚至从一个妇女和她的女儿身上碾压了过去，面对这一惨象，连奉命镇压的陆军士兵都哭了……

……

波兰能忘记吗？波兰工人能忘记吗？忘记这一切将是可耻的！

然而，不抹去这样的记忆，人怎么能有勇气作人？！

正是看到了，记住了，工人们才胆怯，才恐惧地躲避下午 6 时的期限。

6 点就要来临。大门外的人匆匆散去，准备逃离的人越来越多了。

暴力是最有效的统治手段，它给与人的记忆要比法律条文深刻得多。许多统治者喜欢用暴力而不愿用法律进行统治的道理也在于此；统治者不惜让他的臣民流血，要的正是这样的记忆——记住，我们不害怕流血！

幸亏，人民对这种记忆还有另一种解释——记住，决不让它重演！这也是瓦文萨的解释。正是因为铭记着那样的场面，他才选择了现在的人生道路。

现在，这位为人的权利和自由进行过殊死斗争的人，当然不会在这个沉重的记忆面前退却。

瓦文萨赶到大门口。有人往大门上放了一架梯子，瓦文萨爬上去，站在上面，用嘶哑的声音说：“我们必须战斗到底，必须用坚定和顽强坚持下去！”

他没有更多的道理可说，也没有更多的精力能说，他已经整整三天没有休息过了。他用仅有的力量带领大家唱起了《国际歌》，他要说的都在这首歌里了：他们创造了世界，他们是世界的主人。宽松和镇压，榨取和施舍，这种没完没了的循环必须打断，他们要行使自己的权利！！

工人们理解了瓦文萨这些朦朦胧胧的思想。激动人心的歌声使工人们团结起来，坚定起来。他们又唱波兰国歌，然后是响彻全厂的口号声：

“上帝保佑波兰！”

“波兰万岁！”

“造船工人万岁！”

几个大门口终于安定下来，大家秩序井然地等待着 6 点钟的到来。

历史终于艰难地渡过了 16 日的下午 6 点。没有军警开进来。

或许这仅仅是一个恐吓；或许，在这场勇气对勇气的较量中，波兰工人战胜了。

6 时刚过，广播里播出了罢工委员会的一个公报：当局改变了决定，或者是推迟了时间。过一会又有另一个公报：总经理格涅赫乘摩托艇逃跑了。

工人松了口气。7 时正，电视新闻播出了“格但斯克造船厂已经达成协议，星期一将开始正常工作”的新闻报道。

这是很滑稽的。于是扩音器与工人有了这样的对话：

“这是真的吗？”



“不是。”

“电视播音员是不是在说谎？”

“是！”

“大家同不同意让西方的记者以我们的名义发出真实的消息？”

“同意！”

工人们开心地笑了。

现在就笑，还早了一点，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开端不会如此轻松的。

夜降临了，这儿是平静的，外界仿佛成了另一个世界。当局将会用什么样的对策？明天将会怎样？

这是难以想象的。工人们各想各的办法找地方睡觉——更衣室、车间的角落、木板上……

夜深了，许多人却无法入睡，他们想到了家，想到了亲人。

“又不是战争年代，却有家不能回！这是什么世道？”他们想，感到挺心酸的。

然而此时，工人中的另一些人却根本没有睡觉，他们在开会。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一次会议——它有 21 个罢工单位的代表参加。它所讨论的已不是一个工厂的问题，而是几十个工厂，甚至是整个波兰工人阶级的问题。没有人知道这次会议会提出什么样的共同要求，也没有人能预测这些即将产生的决议会对波兰造成什么样的震荡！

历史感到了一阵阵分娩的疼痛。

七

充分显示波兰工人阶级成熟和社会责任感的 21 项要求诞生了。不记住这 21 项要求，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无权说他理解了这半个世界；忽视这 21 项要求，共产世界的任何一位领袖都无权说他是无产阶级政治家。

1980 年 8 月和 1970 年 12 月的另一个较大的区别是平静。在平静中隐藏的结局比明晃晃的警棍、枪支更让人揪心。

8 月 17 日早晨，大街上冷清清的，只有两人一组的警察在巡逻。他们没带武器，没带警棍。他们礼貌而安详地走过，不阻拦任何车辆，也不查问任何人的证件。

上午 9 时，列宁造船厂的二号门前的广场上，逐渐聚集了许多工人家属。这些人也是安

祥的。她们中有不少是穿着丧服的妇女。

二号大门上耸立着一个巨大的樟木十字架，上面挂着红白两色的花圈。十字架旁边挂着现任罗马教皇——波兰籍的约翰·保罗的巨幅画像。

许多罢工工人从厂里走来，但仅仅到大门前为止，那儿有一个临时搭成的祭坛。工人和他们的亲属分别站在祭坛两侧。

弥撒开始了。神父在布道词中谈到人和劳动，谈到人的尊严和劳动的尊严。

神父深深地打动了工人的心，引起强烈的共鸣。教会确实选了一个好时机。

波兰教全多年来，成功地利用了波兰人民对共产党的威信及统治权利失去信心的危机，迅速在波兰社会建立起精神权威。去年夏天，罗马教皇保罗二世访问他的祖国时，引起的崇拜，将人民与政府间的鸿沟掘得更深了。

这一次，教会又赶在政府前边，占了上风。

神父那安详、缓慢的声音使疲惫而衰弱的心灵得到了滋补。他的题目选得真好！他讲劳动的尊严，使罢工工人对自己实际上所处的卑下、屈辱的社会地位有了更加强烈的感触。

连宗教思想都能肯定劳动的价值和尊严，为什么一个以劳动人民代理人自居的政权，一个名义上属于工人的政党却可以那么粗暴地忽视这个阶级的利益和意志？

神父讲到人的尊严，那是包含在人生来是自由的、人生来是平等的这些古老而浅显的道理中。罢工工人要求的最终就是这些！

这种领悟非常重要，它减轻了工人的犯罪感，而增添了一些崇高感和力量感——尽管二十世纪的工人阶级居然要由宗教思想来证明他们的存在和价值，确实令人可悲。

弥撒是在“上帝保佑波兰”和“耶稣呵，人民向您恳求”的呼吁中结束的。可见目的是波兰和人民，而不是上帝。

弥撒结束后，十几名穿着蓝色工作服的造船工人，抬起了巨大的十字架，缓缓地走向广场。人群有序地让出一条道来。

十字架在广场旁的一块草地上立了起来，1970年12月，三名造船工人最先在这儿倒下去的。

一位工人庄严地说：“它将立在这儿。让我们记住十二月的牺牲者。”

一片肃穆——神父默默地向十字架洒了圣水；孩子们默默地将鲜花高高地堆在十字架前；青年们默默地举起了点燃的蜡烛和火炬；老人们默默地流淌着眼泪……

沉默中响起了几声轻微的呜咽和抽泣，那是从穿丧职的妇女发出来的，很轻微，她们抑制着，努力将自己的悲哀和生命融化到这片巨大的沉默之中……

沉默是被一声雷鸣般的吼声打破的。它不是来自悲剧的记忆，也不是来自教会和上帝。它来自工人阶级。这个阶级在近半个世纪的沉默和呻吟之后，终于响起了一声震馆世界的吼声！

当教会显示了它的力量之后，罢工工人终于听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感到了另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这是他们自己的力量——是从他们灵魂深处爆发出来的力量。

中午，从列宁造船厂向罢工工人，向格但斯克，向波兰，向全世界发布了第一号公报。公报是以“沿海地区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

公报说：“根据沿海地区各罢工工厂企业达成的协议，厂际罢工委员会已于8月16日深夜成立，会址设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列宁造船厂罢工委员会主席瓦文萨当选为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

这次从白天深夜开始的会议，还没有来得及将工人阶级的全面要求及行动步骤规划出来。但看看这个公报的主要几条就知道，波兰工人阶级在几十年的渺茫、徘徊之后，终于找到了能撬动这半个世界的历史杠杆。

公报宣布：“现决定继续罢工直到职工的要求得到实现为止。厂际罢工委员会授权同中央进行谈判。只有厂际罢工委员会才能宣布结束罢工。罢工结束后，委员会亦不解散，它将监督要求的执行情况并筹组自由工会。”

波兰工人阶级有了这个威严的宣告之后，既没有忙于进一步宣传、解释，也不急于了解当局的反应。他们是沉着的，因为他们已经找回了自己的力量和尊严，他们不再根据别人的脸色来确定自己乞求的数量。他们要告诉世界：“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能转动一切齿轮！”

厂际罢工委员会从容不迫、却又不失时机的在几小时后，接着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

一旦工人阶级从颤颤惊惊的乞讨者的屈辱中解脱出来，他们就不再只看到一点儿可怜的、眼前的物质利益。在这次继续到深夜的会议上，波兰工人第一次显示了他们作为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他们将波兰存在的问题都考虑到了——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他们讨论的是整个国家的危机，讨论了社会各阶层参加社会改革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临近午夜，代表们终于拿出了共产世界里最能体现工人阶级政治觉悟和阶级远见的纲领。

这就是著名的21项要求。

不记住这21项要求，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无权说他理解了这半个世界；忽视这21项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一位领袖都无权说他是无产阶级政治家。

以下是 21 项要求全文：

1，根据波兰人民共和国批准的国际劳工组织和有关自由工会的第 87 号公约，同意建立独立于党和雇主的自由工会。

2，保证罢工权利和罢工者及罢工支持者的安全。

3，遵守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所保证的言论自由，对独立的出版社不采取镇压措施，允许各种信仰的代表使用群众性传播工具。

4，恢复下列人员原有权利：

1970 年和 1976 年罢工后被解雇的人员；

因政见问题而被开除学籍的大学生；

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对埃德蒙德·扎德罗任斯基、杨·科兹沃夫斯基和马雷·科兹沃夫斯基的迫害；

停止因政见问题而实行的迫害。

5，通过群众性传播工具发表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公布其要求。

6，采取以下实际行动以引导国家摆脱危机状态：

向公众发表关于社会经济形势的充分消息；

让社会各界、各阶层参加改革方案的讨论。

7，全体罢工参加者在罢工期间的工资按休假办法发给并从工会中央理事会基金中支付。

8，提高每个职工的基本工资每月 2000 兹罗提，作为对迄今为止物价上涨的补贴。

9，保证工资随物价上涨、币值下跌而自动相应增加。

10，实现国内市场食品的充分供应，出口仅限于多余部分。

11，取消议价和所谓内部出口商店中的外汇销售。

12，实行按业务能力而不以党派隶属选拔领导干部的原则。采取如下措施取消民警、保安机关和党的机关的特权：

统一家庭补贴标准；

取消特殊销售。

13, 实行肉类和肉制品票证即食品券制（直到市场形势得以控制时为止）。

14, 将妇女退休年龄降至 50 岁, 男子降到 55 岁或者不论年龄而以妇女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工作满 30 年, 男子满 35 年为标准。

15, 将按旧工资标准计算的抚恤金和退休金统一到目前支付的水平。

16, 改善卫生保健工作条件以保证劳动者有充分的医疗护理。

17, 保证劳动妇女的孩子在托儿所和幼儿园有相应的名额。

18, 实行三年制带薪产假。

19, 缩短等待住房时间。

20, 出差补贴由 40 兹罗提增至 100 兹罗提并增加夫妻两地分居补贴。

21, 实行所有星期六为公休日制。对于不能间断工作的职工和四班制职工所缺的星期六公休日应以增加休假天数或用其他代薪休息日予以补偿。

厂际罢工委员会 1980 年 8 月 18 日

“21 项要求”定稿并经全体委员通过, 已经是 18 日凌晨了。罢工进入第五天。

与三天前罢工工人在谈判清单上列出的五项要求相比, 我们很难相信这 21 项要求是同一个阶级在几乎同一时刻提出来的!

但这是事实。

从 21 项要求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工人阶级。其实, 这才是真正的他们。团结和觉醒使波兰工人阶级在一两天内解脱了在几十年的屈辱中形成的那具异化了的躯壳。

巨人苏醒了……

八

政府可以不怕动乱, 不怕流血, 却不能不怕以异乎寻常的理智呼吁着秩序和社会责任感的工人阶级……

波兰是一个出巨人的民族。五百年前, 波兰的一位巨人曾经动摇了长达千年的宗教统治, 给黑暗的中世纪带来一丝光明, 因为他定住了太阳, 转动了地球! 他就是哥白尼。

今天，这位刚刚醒来的巨人也将象哥白尼一样，要把颠倒了的主从关系颠倒过来，使自己成为世界的中心。

遗憾的是，行使权力的最高当局并没有很快地察觉这次在瞬间完成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蜕变。一个长期不被反对和警告的政权，已经迟钝到近乎于麻木。

回答这位刚刚苏醒的巨人的吼声的，是飞机的轰鸣声。

从清晨开始，造船厂上空就一直有飞机盘旋，撒下了要求工人复工的传单：

“工人们！你们不要卷入旷日持久的罢工。你们要考虑考虑，这种罢工是在为什么人效劳？”

传单中还有总经理格涅赫的呼吁书，重申原来的所有提案都得到了解决，每个职工都得到了增加工资 1500 兹罗提的成果。

工人领袖们是沉着的，根本不理睬这老一套的威胁和安抚手段。他们从容不迫地采取行动：早晨，向全体罢工工人宣告 21 项要求，并派人向格但斯克省省长呈交 21 项要求的清单。

要求加入罢工行列的单位更多了，为此，制定了参加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登记原则：

- 1，只有参加罢工的工厂才能登记；
- 2，申请登记的工厂必须派出两名代表；
- 3，对 21 项共同要求表示赞同；
- 4，厂际罢工委员会所属各厂罢工委员会可以随时就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报酬同各厂领导进行谈判。但这类谈判的结果对决定何时结束罢工没有影响；
- 5，只有厂际罢工委员会才有权同中央进行谈判并决定罢工或复工。

上午，登记单位达到 60 多家。三联城的私营出租小汽车司机联合会也来登记参加罢工，尽管罢工会给他们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他们还每天派出 4—5 辆小汽车供厂际罢工委员会使用，并捐出二万兹罗提作为罢工经费。

为罢工和为修建 1970 年 12 月事件纪念碑的社会捐款越来越多了，广播里不断在报告捐款单位和数目。

到傍晚，罢工登记号已增加到 156 家。比这种数量增加令人振奋的是，罢工工人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支持——

作家莱赫·邦德科夫斯基和化学家伊切赫·格鲁谢茨基博士分别带着格但斯克地区文学艺术界和科技界的声援信件走进造船厂，并出人意料地留了下来，加入了厂际罢工委员会主

席团；

他们之后，是三十名格但斯克工学院的教授报名参加了联合罢工委员会……

社会各阶层都把视线集中到工人阶级身上，并逐步承认工人阶级是代表社会的主要力量。

罢工工人很快就证实了社会各界的信赖并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和社会责任感。

厂际罢工委员会作出决定——为了保障人民的生活，医疗部门、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以及生产食品的企业部门要保持正常生产；

对社会财产，罢工委员会也表现出主人翁的对任感——罢工纠查队负责公共财产的保护，钢厂的罢工工人必须保证炼钢炉不灭，以避免造成损失……

一切都是全新的：组织、宣传，他们必须使目标明确，秩序井然，必须使整个工人阶级在整体目标下团结一致并获得更多的社会阶层的支持和参与。

这些工人阶级能做到——

他们印刷传单。条件很差，纸张欠缺，他们用广播车向社会呼吁，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宣传手段。除了传单，还能印制篇幅较大的情况通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尽管这种宣传手段是粗陋的，与政府所具有的 80 年代水准的宣传工具相比太原始、太可怜，但至少世界不再只听到那种千篇一律的声音了；至少这儿发生的事不会任凭一些人解释成“少数流氓煽动闹事”或“反社会主义势力在制造动乱和反对国家利益”了。

现在，工人阶级要说出他们罢工的真正动机。1980 年 8 月 19 日，波兰工人镇定地向最高当局发出了呼吁：

“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我们是我国劳动群众第一个真正的、自由的代表。我们肩负着整个社会的重大责任，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成立独立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和雇主之外的自由工会。

“因为只有那时才能保护职工的权利和利益。在我们赢得自由工会会之前，保卫我们利益的唯一方式只有罢工，然而这对社会来说，是一种代价最高的谈判方式。

“成立自由工会的第一步是通过当局派遣代表到格但斯克造船厂来，并与之进行谈判。从而取得中央当局对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正式承认。

“我们期待中央当局的代表的到来。拖延一天，将是当局不愿意承认波兰劳动人民有权选派自己真正代表的证据。我们谨以我们所代表的职工的名义声明：我们将渴望尽快复工——然而作为有充分权利的公民、作为工厂的真正的共同主人而复工。每拖延一天，对于我们由于领导的过错而危机重重的经济来说，就是上亿兹罗提的损失。我们的人数正在与日俱增。拖延所付出的社会代价的大小将完全取决于当局。我们再一次向当局呼吁：要审慎，要有负责精神！”（[波]沃·盖乌任斯基《波兰团结工会成立记》）

尽管纸张很差，印刷质量也不好，但全世界都听到了波兰工人富有责任感的呼吁——因为几乎所有的外国驻波兰新闻机构，此时都赶到了格但斯克：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法新社、还有新华社……他们用各种文字将波兰工人阶级的呼吁传到世界各地。

以往，这样的呼吁是由政府发出来的。

以往，工人只要离开劳动岗位便会受到警告：不准制造混乱，不准破坏纪律和秩序；甚至不惜以武力使工人恢复秩序。

现在，当波兰工人阶级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理智和秩序时，当局才感到这种高度的纪律性和社会责任感，远远比示威口号和因愤怒而挥动的拳头可怕！

波兰政府陷入到更加痛苦的困境之中。

## 九

在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援助声中，政府只好打破痛苦的沉默。极不情愿地采用了政治解决……

波兰工人阶级的宣言震撼了全世界。各国大小报纸都以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了这次来势凶猛的事件。

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却保持着沉默——这在西方是审慎的沉默；在苏联、东欧却是一种痛苦的沉默。

罗马教会也开始采取严格的克制态度——从开始的支持变得审慎的观望了。教会担心事态进一步扩大会引起更大的社会对抗；或许，教会是不愿意波兰在共产党和教会两大势力之外又产生第三个权力中心。

世界上最大的军事集团“华沙条约”，紧张地注视着波兰局势的发展；另一方的“北约”又十分严厉地注视着“华约”。

与这种沉默和紧张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世界各国的工会组织，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毫无保留地支持波兰工人阶级。

在九十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代表着大约七千万名工人的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于8月18日发表声明，敦促波兰政府不要忽视罢工工人的要求。

由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西班牙全国工人委员会也于同日发表声明，“无条件地支持波兰工人的斗争”。

西德最大的冶金工会，8月19日发表公报：“波兰罢工工人可以指望得到它的声援和支持——包括提供物质上的支持。”



8月20日，美国最大的劳工组织“劳联——产联”，发表了一项由34名执行委员签署的声明：“强烈支持波兰工人正义和英勇的斗争。我们要求美国政府要让波兰当局知道，它对国家事态发展表示关切，以及坚决反对对波兰工人实行任何压迫手段的态度。”

现在该轮到波兰政府表态了。

波兰政府不能不表态，它的内政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它自己怎么能回避？但问题是，从这个党三十多年的执政历史中，根本找不出解决眼前危机的经验。

波兰有过的几次危机都是由人民的忿怒和动乱造成的。尽管政府对这类动乱表现出极大的警惕性，甚至夸大地宣称已经危及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而事实上，一个控制着庞大国家机器的政党并不害怕这样的动乱，因为它可以用武力轻而易举地镇压而不必担心失败。

当然，武力会造成流血和死亡，但统治者不害怕流血——严格地说的不害怕流人民的血。这类动乱无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让他们流血的。

政府无法回避，又不能对秩序井然的、呼吁着理智和责任感的工人诉诸武力，剩下的只有政治解决了。

当局也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政治解决。

以往的政治解决都是镇压之后的安抚，动荡之后的改组，是内部的调整，是权力的重新分配。

这一类的政治解决得有一个前提——首先需要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向某个不得人心的最高领导发动进攻，需要人民不惜以流血为代价去声援另一位政治家；还有，更重要的还得有一个领袖人物出来承担责任，充当替罪羊。

这些条件在现时的波兰都不具备——

波兰工人阶级这一次并不反对谁或支持谁，或者说他们不愿意再为政治家的权力斗争付出代价了。他们在1956年曾经为把哥穆尔卡拥戴上台而流过鲜血；1970年正是这位哥穆尔卡下令开枪镇压他们。那一次，他们又以流血为代价把哥穆尔卡赶下台去而换取了与新领导的坦诚对话；然而，那一次人民与新领袖的蜜月仍然是短暂的。

因此这一次，他们不再为此付出代价了。

在政府方面，也缺少一个政治解决的条件——此时还没有一个可以承担责任的领导人。

按这类国家的惯例，一个领袖必须下了台，才能由他承担责任，而不是因承担责任而下台。

这是一次不准备承担责任，追究责任的政治解决。无论由什么样的政治家来完成这个任

务，都只能是虚伪的、做作的。

第一个被挑选出来承担这个倒霉差事的人选是副总理塔德乌什·佩卡。

1980年8月19日，佩卡副总理终于以政府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公开了自己的活动。其实，这位副总理五天前就飞抵沿海地区了，他公开出场是因为罢工工人定出原则：跟他们谈判的至少得是一位副总理。

中央对佩卡副总理的沿海之行也定了一个十分坚定的原则——只同各厂的罢工委员会谈判，而决不跟厂际罢工委员会接触。

政府拒绝承认厂际罢工委员会，说明他们对工人联合起来的意义确实有一种非常清醒的认识。然而它对此时已经有250家工厂参加的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存在置若罔闻，则表明了它无视现实的鸵鸟精神。

现在，厂际罢工委员会不仅领导着这场罢工，并且实际上在管理着城市、领导着城市的公共经济、交通、供应工作——格但斯克的电力、自来水、煤气、卫生部门都是在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组织下继续工作的；甚至按瓦文萨的提议，还组织了罢工工人去帮助郊区农民的秋收。

佩卡副总理选择了格但斯克港务局和船舶修配厂。

谈判是在格但斯克省政府纹章大厅举行的。

船舶修配厂的工人代表、厂长、厂党委书记参加了谈判。

会谈一开始，便由佩卡副总理带头作自我介绍：他是副总理，跟第一书记盖莱克共事二十多年，他俩是最亲密的私人朋友，他是第一书记家的常客；他还是一位教授，曾经写过一本经济改革方面的书。他说，“就象匈牙利那样的经济改革，只不过还要好得多。你们看到这本书吗？呵，没有，你们不可能看到，因为只发行了1200册。”

于是副总理埋怨道，波兰就是这样，那些乱七八糟、不三不四的书可以大量发行，而好书却发行不上去。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重要的是他这次来格但斯克，是因为他喜欢格但斯克。他为这里发生了罢工感到痛心。他希望能迅速解决问题，在问题解决之前，需要他呆多久就呆多久，那怕呆到年底，呆到明年。

副总理特别强调，他这次来，有政府、政治局和盖莱克同志本人授予的解决问题的全权。因此，他“有充分的资格进行谈判并作出决定”。

工人代表也都作了自我介绍。这些年轻人并不轻信，他们都说得简单、迟疑。他们表示不打算谈政治而只需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副总理报有气派地说：“那就把你们的要求都提出来吧。”

代表们却沉默了。过了好一会，一位工人代表递给佩卡一份厂际罢工委员会起草的 21 项要求全文。

副总理看了看，简单地谈了自己对这 21 项要求的看法，表示所有各项都是可解决的。

对第一项成立独立工会，他这样表态：工会工作做的不好，大家有意见，是应该改造。他说，“罢工委员会在罢工结束后，将继续活动，也可以选进现有的工会里去。”

这真是叫人哭笑不得的建议。

接下去，副总理又提出一些具体的问题跟代表们商量：是实行三年制产假好呢，还是多建些托儿所好？他谈这个问题时，一点儿也没有副总理的架子，到真象一位写过书的经济学教授。

他说：“我们要算一算那种做法经济一些，我们就决定采用那种。”

佩卡的谈话是坦率的、干脆的、毫无官腔的。和女工代表谈到女工工作条件时，他甚至幽默地把女工代表称为“大婶们”。

副总理谦和、随便和幽默风趣的个人魅力将许多人迷住了。到晚上九时，又有好几家小厂的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参加进来。佩卡仍无倦意，精神抖擞地回答问题、解决问题——

住房紧张吗？他知道的，格但斯克有 12 万人在等待住房。

“没问题”，他说，“我们给你们建两个房屋工厂。一个是普通的，生产水泥预制板，第二个是法国进口的，生产独户房子，非常漂亮的小房子。这对你们够可以的了是吧？”

肉食供应紧张吗？这他也知道。

“没什么”，副总理说，“已经决定进口六万吨肉。问题解决了。”

“这肉什么时候来，副总理先生？”一位女工代表问。

“什么时候？等一等，我们问问部长。呵，不错，从欧州经济共同体进口，两个星期之后就到货，如果从阿根廷进口，要用三个星期。”

有代表对书报检查制度提出批评。

这个问题难一点，副总理的回答略长一些。他说书报检查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这方面的放任。他又忍不住对他那本非常好的书只印了 1200 本表示了忿忿不平。

他认为问题在于记者们不好，“是他们掩饰缺点，是他们在报刊上把一切都写得那么圆

满。他们经常在报纸上把盖莱克同志和膘肥肉壮的奶牛照在一起，他们对什么都一律赞扬。可是黄油没有还是没有，尽管记者们说，‘我们这儿牛奶满成河，’但我们仍然不得不进口黄油……”

“我抗议，副总理同志！”

佩卡非常遗憾地中断了他与人民共义愤的珍贵时刻，不无不平地问：

“您是什么人？”

“我姓加卢斯，是《沿海之声报》记者。副总理同志，我们只能发表你们允许发表的东西。”

副总理确实是一位好好先生，他马上附和道：“您说得对，这是我们共同的过错。不过加卢斯同志，您好像很疲倦。您的脸色很难看，您应该去睡一觉。”

“谢谢，我能坚持。”

副总理又称赞了记者同志的工作热情，并且向工人推荐：

“怎么样，卢斯加同志可以参加罢工委员会吧？”

佩卡又继续讲下去，粮神饱满、情绪良好，一直讲到 20 日的清晨 5 时。他对什么都一口应承。

工人所提出的，副总理所应承的大多是眼前的、物质的要求。

只要工人阶级不作为一个社会整体出现，只要参加谈判的工厂个体只着眼于本单位的具体问题，他们也只能提出这一类的要求。这确实证明了当局不跟厂际罢工委员会谈判的决策之英明。

工人代表将这一大堆具体的、已经被副总理承诺了的要求归纳成 12 条，并决定形成谈判协议。

如果佩卡副总理的这次谈判成功了，紧接着便会有一系列的跟各个工厂的个别谈判，那么，所谓的政治解决便会成为各个击破的政治瓦解。

庆幸的是佩卡没有成功。

上午九时，当 12 点内容的协议文本写好，需要双方签字时，佩卡突然要求在后面再加上一条：“本协议将呈部长会议批准。”

工人代表大吃一惊，质问副总理：不是说过他自己有充分的权力签字吗？

佩卡诚恳地要求大家能理解，他上面还有政府。还有政治局，他不能绕过这些权力机构。但他保证说，二个小时之后，华沙便会作出肯定的答复。

谈判协议立即送到了首都。

华沙的答复很快就下来了，尽管不是副总理所说的二个小时，而是五个小时，但就这类国家来说，已经是了不起的行政效率了。

然而遗憾的是，政府只同意了 12 点协议中不太重要的三点：

关于建造房屋工厂；

关于进口肉食以及罢工委员会；

罢工结束后仍能参与工厂工会委员会的活动。

对一些关键性的要求，回答是模棱两可的。

下午五时，工人代表又回到谈判大厅，副总理显然受到了很大的精神挫折。虽然他又打起精神，重新许诺说，一切都会顺利解决，但工人代表却以抗议、挖苦和不友好的喊叫一次又一次地打断他的讲话。

会谈最终是在愤怒的气氛中收场的。

第二天，佩卡被召回毕沙。接替他的是另一位副总理雅盖尔斯基。

临上飞机前，佩卡副总理含着眼泪，痛心地说，他是怀着最良好的意图和工人谈判的，他希望多许一些愿，先结束罢工，然后再慢慢地实现这些诺言。难呵，他没有成功。

佩卡失败了，也宣告了那种家长式的统治方式的失败；佩卡哭了，这让人感到是一个衰败的政权在哭泣。

这次谈判的失败对工人阶级来说，却是一件幸事，使他们不再想去尝试已经被多次证明过的、失败的手段。

副总理佩卡被召回华沙的当天，三个满脸通红，惶惑不安的小伙子来到列宁造船厂，找到了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瓦文萨。

“我们受我们厂的职工委托，叫我们先到这儿来，”他们小心谨慎地试探道，“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之后，可能我们的整个代表团都要来。”

他们被重新接纳了，尽管有讥讽，却是欢乐的、善意的。当这两个厂的代表团进来时，列宁造船厂响起了前所未有的欢呼声。之后，扩音器里传出了主席团的一个简短公报：船舶修配厂和北方修造厂跟我们在一起，分裂消除了。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增补了两名新成员

——船舶修造厂和北方修造厂的代表。

此时，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已经增加 304 个厂家。

一场势均力敌的决战，已经不可避免……

瓦文萨与波兰团结工会（三）

赵启强

本文系作者大著《光荣的荆棘路改革家们》第五篇第三部分。

十

工人出身的盖莱克曾经给波兰带来过巨大的希望他曾经勇敢的为 12 月悲剧承担责任，并且有过与工人的真诚对话。

波兰的危机明明已经到了政府诺不付出代价就难以解决的地步，当局居然还用佩卡式的解决方式去胡弄工人阶级，这不能不说是盖莱克政权的可悲之处。

但如果我们因此就下结论，说盖莱克是完全站在工人对立面的领导，说他从来就是一个不愿体察民情的官僚，则有失公允。

要是有可能将波兰统治者当局的个别人作一次近距离的观察，就会发现，这些造成过许多社会灾难的波共领导人，并不象历史上许多专制暴君那样专权：暴戾、残酷；恰恰相反，波兰近几十年出过好几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们身上有许多专制国家的统治者所没有过的民主倾向。

从贝鲁特、奥哈布、哥穆尔卡到盖莱克，全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出身。

57 岁的现任第一书记盖莱克，出身于一个矿工家庭。童年时，父亲因事故死于矿井。他与母亲流落法国，13 岁开始下井挖煤。这个流落异邦的小矿工，下井干活时因个子矮小，手提的矿灯拖在地上，他只好把矿灯提手弄得短些。

盖莱克了解工人的悲惨处境，而且确实是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投身革命的。

盖莱克还是共产世界唯一一个在西欧侨居了二十二年之久的国家领导人。那就是说，他是在比东方民主得多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这很重要，人们评价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民族的行为时，常常夸大文化心理的因素，盖莱克的全部经历证明，政治或制度对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1970 年底，黑暗的 12 月大屠杀刚刚过去，巨大的社会动乱所造成的政治危机，使盖莱克取代了哥穆尔卡，成为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盖莱克的上台执政，曾经使波兰人感到巨大希望就如他的前任哥穆尔卡在 1956 年被人民拥戴上台时，曾给人民带来过振奋一样。

我们不能说盖莱克只是扮演了哥穆尔卡在 1956 年扮演过的角色，不能说他只是把哥穆尔卡演过的戏又演了一遍；更不能说他一开始就在演戏、欺骗人民。

不，无论 1956 年的哥穆尔卡，还是 1970 年的盖莱克都曾经是真诚的。

1970 年 12 月 20 日，盖莱克接任波共第一书记的当天晚上就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广播电视讲话，说最近一周发生的悲剧深深地震惊了整个社会，说这次事件“沉痛地提醒我们一个真理，党必须始终保持同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密切联系，而不能失去同劳动人民的共同语言。”为了找回已经失去的同人民的联系和共同语言，盖莱克作出了七十年代共产世界的一个重大决定。

1971 年 1 月 24 日，也就是盖莱克接任第一书记仅仅一个月，一架专机从华沙飞往沿海工业城什切青市。飞机上有盖莱克，有总理、副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

飞机起飞时，这些几乎包括了全部政府班子的乘客们并没有任何既定的方针政策，他们到工厂去，是为了解实际情况，为了听听刚刚在动乱中流过血的工人阶级的声音；他们诚心诚意地希望找到导致这场流血悲剧的根源之所在。

在什切青市，他们同造船工人会见，讨论持续了九个钟头。

领袖和工人诚恳地交谈，倾诉自己的疑问和希望，相互寻找支持和信任。厂里的广播站转播了会见的全部过程，成万名造船工人和城市居民拥在扩音喇叭前，倾听他们的代表和领袖的对话。

这是一次心对心的对话没有演说，没有官腔，没有决议，没有秘密，没有躲躲闪闪、虚虚实实的政客辞令。

盖莱克一行又从什切青直接到了格坦斯克。这次会谈继续了 8 个小时。

瓦文萨也参加了这次会见。

二十多位工人在对话中讲了话。这些发言对盖莱克的震动很大。

瓦文萨也讲了话。

盖莱克不认识瓦文萨，也没有通过这次对话与瓦文萨相识，但这位工人的讲话内容曾经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瓦文萨说：“二十五年来，我们原本指望干得越快，我们获得劳动果实的日子就越早，结果我们失望了。如果有必要的活，即使每天只有一碗菜汤喝，我们也准备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进行劳动；但我们希望得到保证，那就是这碗菜汤的分配将是公平合理的。”盖莱克

的讲话很简单，一点没有领袖人物所有的威严和无所不知的自信。他请求大家原谅，他来这里只是要告诉大家，他的处境有多困难。他说：“你们把我也当作人吧也要象帮助人那样来帮助我吧！……怎么样你们肯帮助吗？”盖莱克发的话音刚落，他面前就响起了一片整齐的回答“我们帮忙！”这个回答很快就成为 1971 年波兰最流行的口号。

在会谈中，工人们曾当着政府领导的面，用一分钟默哀悼念一个月前死于政府镇压的死亡工人，盖莱克和他的同志们以沉默向工人阶级的悲痛表示了深深的理解、羞耻和自责；或许，双方在这一分钟沉默里所有的沟通，超过了八、九个小时的语言交流。

当盖莱克离开造船厂时，工人用掌声欢送他。当时，工人充满了新的希望；盖莱克也怀着巨大的决心决不再无视工人阶级的存在和意志，一定要象对待成熟的、有充分权利的公民那样对待工人阶级！

这次沿海之行，对盖莱克来说，是一次痛苦而苦涩的公民教育课。

正是这次坦诚的对话，缓和了波兰的紧张局势，并开始了人民和领袖之间的蜜月。

十一

制度比领袖更有力量，那些妄图靠个人权力进行改革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倒是他们自己先被制度所改革。

从沿海地区返回几天之后，波关召开了八中全会，对十二月事件进行评价并追究责任。

在这次全会上，盖莱克发表了纲领性讲话，他认为十二月事件的起因是党的领导没有与工人进行诚挚的对话，悲剧首先在于没有采取有效的政治措施来消除紧张。

盖莱克首先谴责了在 12 月悲剧中使用暴力镇压人民。

他说：“用武力来解决与工人阶级的冲突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这只能造成流血、造成人民政权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全会公布了前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于 12 月 15 日指示格坦斯克实行紧急状态、并命令民警有权在自卫和反击进攻者的情况下使用武器的经过。

这次全会作出决定：哥穆尔卡“在领导党的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削弱了党和社会的联系，使经济发展中的差错增加，最终引起公开的政治危机，而在危机的过程中又采用了不正确的方法……中央委员会决定暂停哥穆尔卡同志的中央委员权利。”同时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中央书记雅什楚克、克利什科等人。他们是领导国民经济、内务、组织工作的政治局委员。

盖莱克对这些经常受到人民信任和尊敬的政治家不得不带着个人悲剧离开政治舞台，表示了深深的同情。但他认为必须这样做，这不仅仅是为了对过去的清算，而是对未来的考虑，以“保证领导方法不出偏差，保证不出现独断专横的倾向。”盖莱克的愿望是符合人民心愿的，而他采取的行动也是积极的、及时的、有魄力的。



然而，盖莱克与人民的蜜月是短暂的。我们从十年后的波兰社会现实已经看到了，那种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曾经给波兰带来过巨大痛苦的政治、经济危机又在盖莱克时代明显地显露出来。

盖莱克和他的前任一样失败了。因为他在经济上仅仅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而且把生产力低下仅仅当成纯经济问题。

盖莱克提出高速度、高消费、高积累的三高政策，而没有全面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将中央控制的经济权归还给社会，使劳动者能因经济上的自立而成为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人。

盖莱克的盲目的高速度经济政策引起了投资过热、外债骤增、比例失调、物价上涨等一系列危机。

政治上的改革更被忽视，盖莱克仍然采用了那种苍白无力的惩罚人、撤换人的老一套方式。这种短期有效的头疼治头、脚疼治脚的政治手段，丝毫没有触及造成波兰危机的根源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

盖莱克不可能靠个人权力、靠制度自我更新的幻想去改变这个制度的内部结构；相反，倒是这位优秀的政治家很快就被这个制度所改造了。

这位工人出身的领袖，这位很具民主作风的工人运动活动家仅仅三、四年之后，就变得“拒谏饰非、个人专断，听不进批评意见”了。（[波]米。弗。拉科夫斯基《十二月转折》。）

制度比领袖更有力量，那些妄图靠个人权力进行改革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倒是他们自己先被制度所改造。算上盖荣克，这个斯大林模式的政权已经糟蹋了四位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了而且越往后来，完成这种改变的时间越短。仅凭能把好人变坏这一点，我们就有理由说，这种政权形式是要不得的，必须彻底改革。

现在，尽管盖莱克还没有把哥穆尔卡曾经走过的道路重复完，但我们已经看到他正面临着哥穆尔卡执政的最后时刻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对危机完全相同的评价。

我们难以判断的只是，盖莱克会不会无视历史的进步，而在最后时刻采取哥穆尔的方式，用暴力去对付工人阶级？

1976年，盖莱克曾经在这个历史进步的分界线上犹豫过……

1976年6月24日，盖莱政权的总理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肉食、黄油、食糖涨价；同时还宣布，给予劳动人民以全部等价的现金补偿。

总理的电视讲话之后，首先在拉多姆地区，工人离开工厂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动乱发生了。

这是盖莱克执政以来遇到的第一次危机，但与1970年事件的起因却完全一样。一个政治家应该有这样的记忆！

抗议和罢工在十多个省蔓延、局部地区还发生了街头冲突。

这次，盖莱克发表了强硬的、哥穆尔卡式的讲话。

他宣布：“我们不允许国内落后人物、冒险分子和教唆分子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大多数人……”盖莱克将华沙和什切青的警察部队紧急调到出事地点。

波兰面临着继 1956 年，1970 年的大规模流血之后的又一次严峻时刻。

这次事件最终没有能避免流血。但要说明的是，只有两位工人死亡；而且是由于某些部门的粗暴行为造成的。这一点必须强调，正是盖莱克的努力，才避免了 1970 年悲剧的重演。

他用警察驱逐游行队伍，却决不允许开枪，并且很快就撤销了涨价的决定。这可以算成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吧。

在宣布涨价 24 小时之后，总理又重新出现在电视荧屏上，他灰溜溜地、垂头丧气地向整个波兰宣布“撤回关于改变价格的政府草案。”盖莱克成功地将问题压了下去，而不是成功地解决了问题。他甚至已经没有五年前那种解决危机的耐心和诚意了。他完全忘记了他五年前所有过的誓言，用诚挚的对话解决与工人的矛盾和冲突。

政治家对什么事能保持记忆？

看来，对领袖人物的选择，应该把记忆力放在第一位。

那一次，盖莱克采取了对专制者说，最省力、最有效的解决方式严厉的制裁。

拉多姆事件之后，六百六十名工人遭到拘捕和审判，九百三十名工人被解雇。

仅用了五年时间，制度就完成了对一个领袖人物的塑造。

现在，1980 年 8 月，人民波兰出现的危机是它历史上几次危机的重复，而处理危机的政治家又是由制度从同一个模子里组造出来的，那么，盖莱克会不会又一次采用他在 1976 年所成功地运用过的手段；甚至更退一步，去采用哥穆尔卡在 1970 年所用过的极端手段？

我们有理由这样担心，因为 1980 年的盖莱克与 1970 年的盖莱克已判若两人；我们倒是从他的前任哥穆尔卡身上找到了眼前的盖莱克……

## 十二

工人等待着政府承认厂际罢工委员会；政府等待着工人放弃联合行动；知识分子说，谁试图采用暴力，历史是不会原谅他的……

三百多家工厂的工人联合成一个整体，有组织的、秩序井然地占领着工厂，政府没有理

由、也没有能力对十多万工人实行有效的镇压。

罢工工人不上街游行，不感情用事，甚至也不急于实现他们提出的政治、经济要求。他们只要求政府首先承认他们。

工人已经等待了八天八夜，这是一种意志力的较量。

处理格但斯克工潮危机的政府委员会新主席雅盖尔斯基副总理已经接替了佩卡副总理，但他仍不跟厂际罢工委员会接触。

新任政府委员会仍然无视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存在”，不承认它是全权的谈判对手。政府委员会只是试图让一些小厂厂长、书记和厂工会代表组成“三人小组”直接与政府谈判。

如果当局连事实上已经存在、并且仅仅是一个临时的罢工领导机构厂际罢工委员会都不愿承认，那么更不可能接受建立独立工会的要求，而这是工人 21 项要求的第一条。

随着事态的发展，工人们越来越理解这一条要求的重要意义。他们决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犹豫让步。

为了重申这一点，304 名厂际罢工委员会成员发表了联合声明：“没有独立工会，其它各条将来都会成为泡影。在波兰人民共和国短暂的历史上，这种事发生过不止一次。官方工会过去和现在不仅没有保卫我们的权力和利益，而且在对待罢工的正义行动上，他们表现出来的敌对态度比党政机关有过之而无不及。”罢工工人对官方工会的评价并不过份。波兰工人的问题已经严重到如此地步，官方的工会对此毫无承担责任的检讨精神；相反，它的中央理事会主席什德拉克，居然跑到格但斯克召集工会委员会代表会议，宣布工会中央理事会“不交出权力”，也不跟厂际罢工委员会“分享权力”。

在官僚看来，工会的职位只是权力和权力所带来的利益！

当然，什德拉克的幼稚做法失败了，因为厂际罢工委员会对他进行了轻而易举地反击数百名厂际罢工委员会成员在主席团仅有的两部电话机前排队，轮流使用电话向本厂职工吩咐：“不跟什德拉克进行任何谈判。这是破坏罢工的行为。”结果，这位官方工会的最高领导人只召集到 14 名工厂工会代表，来参加他的格但斯克省工会积极分子会议。

这位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又赶到什切青，尽管他把目标盯在一些小厂的工会理事会，他的分裂企图也未能得逞。

罢工工人等待着，他们必须保持团结有共同的更求并以一个整体进行谈判。这一点总算作到了；另一方面，罢工工人要坚持下去，还得保持秩序，避免因急躁和愤怒而感情用事。

现在，害怕产生社会动乱的反而是工人方面。

罢工工人保持了秩序和平静。在这方面，瓦文萨坚定、果断和自信的个性起了作用，罢工纠察队的严明纪律也起了作用。

三联城是平静的，没有破坏，没有动乱，甚至没有醉鬼；连以往滋事很多的咖啡馆、舞厅、剧场也平安无事，因为去的人寥寥无几。民警只记录了偶尔出现的流氓行为和偷窃。但连民警都承认，这类事件比平时少多了。

罢工工人面临的更大难题是组织城市生活。在全面罢工的状态下，这是很困难的。这他们也作到了。可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可以使工人阶级学会一切。

这些工作是由瓦文萨直接负责的。他既要使罢工坚持下去，又要让三联城人民的生活不受到影响。他必须决定哪些行业应该罢工，哪些部门却必须承受更多的工作任务。

瓦文萨的工作方式是极其干脆的，有的问题他当即作出决定；有的当场由主席团集体决定商业运输罢工了，但食品送货照常：面包运；糕点不运。

火柴厂请示该不该罢工？

“不，这是人民需要的，应该生产火柴！”“谢谢，我们将生产火柴。”农业合作社代表团来了。

“现在是秋收，我们该不该工作？”“当然应该！！”瓦文萨还组织罢工工人去帮助秋收。

警察阻拦了给居民分送食品和煤的汽车，怎么办？

“让司机在汽车前窗玻璃上写上”居民生活必需品：肉、粮食、煤！“”要是警察还是不让怎么办？”“”避免冲突。警察要取下罢工标志，就让他们取下来，往前开一百米再挂上！“”没有汽油了！“”用广播向社会呼吁捐献汽油！向省长告急，告诉他，居民总得吃饭！给我们燃料！”水果加工厂代表团来问：“我们要不要继续工作？如果不工作水果要烂了，如果工作，我们需要煤、糖、酒精。”“你们工作吧，不能造成损失。问题我们马上解决。”“托伦发生了火车事故，急需血液！”

厂际罢工委员会发表公报呼吁献血。炼油厂，造船厂有一百名工人去了献血站……

工人以难以置信的效率解决着一个又一个难题。看来对社会的管理并不是政治家的专利。

谁说工人阶级不会运用民主权利、不能充当社会的主人？

当然，工人阶级能在这种非常时期使三联城的人民过上正常生活，是因为罢工工人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精神和物质支持。

1980年夏天，格坦斯克的工人阶级并不是孤独无助的。

这么大规模的运动不能没有经费。这很快就解决了。仅列宁造船厂三号大门一处，五天里就从本市居民处得到16万兹罗提捐款。一个退伍军人组织，还派了代表团来到格坦斯克，

要把给罢工工人的捐款亲手交给瓦文萨。

除了钱，还有许多饱含情感色彩的礼品：一位农民送来 40 公斤西红柿和 10 公斤苹果；一位年轻的姑娘送来了一束鲜花。姑娘直接走进主席团会议宣讲台，说：“这是教师们送给造船工人的花，祝大家坚持下去。”三联城联合医院的护士小姐们送来一封信，说她们全体护士和卫生员的心是同罢工工人在一起的。但她们不能参加罢工，因为病人的利益是最高目标，她们这样宣过誓。但她们在信里鼓励说：“祝你们坚持下去！”两位非常害羞的女士走进造船厂，站到麦克风前说，她们是从西里西亚来的。西里西亚可是出好样儿的矿工的地方，那里的工人最富有斗争精神。造船工人欢呼起来。

两位女士羞得满脸通红，很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她俩是来格坦斯克度假的，她们只能代表自己。但她们一定要把格坦斯克造船工人英勇斗争的真实情况带回西里西亚去！

“工人的西里西亚万岁！”大厅里响起了口号声。

“西里西亚人同你们在一起，”两位西里西亚女士流下泪来，“全世界都在谈论你们，你们不要屈服！”除了物质的、情感的、更有力的支持还来自知识阶层的精神支持许多知识分子团体公开发表声明，支持罢工工人。

波兰作家协会格坦斯克分会发表声明，呼吁“平静、秩序、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武力、不以武力相威胁。”作家们在支持成立独立工会的同时，呼吁当局尽快同厂际罢工委员会进行谈判，说这是“尊重罢工工人团结的道义价值”的表现。

8 月 21 日，由 64 名知名知识分子签名的呼吁书传到格坦斯克，这些知识分子敦促政府尽快承认厂际罢工委员会。

他们旗帜鲜明地宣称：“……今天，波兰工人以其政治上的成熟和果敢为争取自己的权利，也为我们大家争取更美好、更相称的生活在进行斗争。全体进步知识分子是站在工人一边的。”这些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精英一开始就点明了当前这场危机的性质。这等于警告当局别以流氓滋事或反革命动乱为借口镇压工人。

呼吁书写道：“……我们呼吁政府和罢工工人能选择一条谈判的道路，妥协的道路。任何人都不能采取任何不法行为或暴力，也不能尝试动用武力。十年前的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我们民族的最高利益要求新建立的政府委员会立即同厂际罢工委员会举行谈判……”知识分子诚恳而公正地对双方进行了审慎地劝告：“要摆脱今天的危机，就要求抛弃动辄把一切要求政治改革的行动看成是违背国家利益、威胁国家制度的那一套呆板公式；同样也要求公众在争取自己权利和更好的生活条件的正义斗争持温和态度。”最后，这 64 名知名人士以历史的名义，严厉地警告那些胆敢在波兰民族生死悠关的严峻时刻采用非理智、非民主手段的人。

呼吁书警告道：“如果有人试图不通过协商的道路而采用什么别的解决方法，历史是不会原谅他们。我们呼吁审慎和多思……”这份呼吁书的内容立即就被政府方面知道了，并且很快就传遍了全国。

为了表明对罢工工人的支持，呼吁书的 64 名签名人委派《联系》月刊主编，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和盖雷梅克教授亲临列宁造船厂，向厂际罢工委员会递交这份呼吁书。

瓦文萨接见了两位知识分子。

瓦文萨问：“你们还能给我们什么具体帮助呢？我们在许多问题上需要帮助。”是的，从战斗的罢工阶段到谈判的准备、再到即将来临的谈判阶段，工人会面临一个新的战场，这将需要更多的智慧和知识。这些仅仅靠勇气和纪律是无法完成的。

理解了瓦文萨的困难，盖雷梅克教授提出了成立专家委员会的建议。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瓦文萨采纳了，并委托马佐维耶茨基主编组建专家委员会的班子。在以后的斗争中，这个由 18 名专家学者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使波兰工人有了更加深思熟虑的斗争策略。

现在，艰难的占领性罢工已经进行到第九天，罢工工人已经不再为能否坚持下去表示怀疑了。他们保持了团结、纪律；他们不仅有了政治上的成熟，还丰富了政治上的智慧。

在前两天，当瓦文萨被记者问到“如果你这次输了呢？”时，他还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他说：“那也会留下觉悟和组织。”而现在，瓦文萨已经有了必胜的信心。

他说：“1970 年我输了；1976 年，我输了百分之五十，当时，倘若拉多姆再坚持一天，我们就赢了；现在，我有百分之百赢的希望！”带着这样的信心，厂际罢工委员会从容不迫地向政府当局提出了最后一份敦促谈判的通报“.....厂际罢工委员会代表所有的罢工工厂再一次呼吁当局举行谈判只有诚心诚意的、民主的对话才能结束罢工.....罢工是不会破坏波兰民族的团结，不会有损于波兰国家。如果当局希望证实这一点，那就请他们到罢工人员这里来。”在这里，工人阶级反而比政治家显得成熟、大度。

这真是一个怪现象：一个掀起了动乱的、还未被官方承认的工人组织，居然比一个肩负着社会秩序的政权更迫切地呼吁社会生活的正常化，表现出更多的理智和责任感。

政治上的较量还没有开始，波兰工人阶级已经在道义上获得了胜利，世界上有哪一个政权有眼前的盖莱克政府的处境窘迫？

盖莱克是一个不走运的政治家他遇上了不呼喊口号，不挥动拳头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盖莱克政权终于度过了难以选择的困境它的前景再明确不过了那就是与工人举行谈判，并且承担责任。

无论这场即将开始的历史谈判判结局如何，波兰工人阶级已经赢得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十三

谁也不指望靠几个小时的会谈去消除半个世纪形成的隔阂和怨恨，意义只在于政府终于和工人坐到一起了。

罢工斗争的僵持阶段在 8 月 22 日结束的。

白天，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瓦文萨用电话跟政府委员会主席雅盖尔斯基取得联系。政府方面提出先派三名代表进行一次非正式的秘密接触。工人一方接受了这个建议。

副总理接见了三位代表，接受了他们递交的厂际罢工委员会要求进行谈判的呼吁书。

双方商定：于 8 月 23 日下午 2 时，由格坦斯克省省长来造船厂跟厂际罢工委员会举行初步谈判，制定谈判方案。正式谈判于 23 日晚八时举行。

尽管工人领袖们已经断定，政府除了妥协、谈判已别无选择，但听到这个消息后仍然禁不住欢呼雀跃、热泪盈眶。

为期待这一天，他们绷紧神经度过了九天九夜；而这是波兰工人阶级整整 30 年的期盼！

工人并不是为可以松弛一下而欢呼，相反，他们都感到就要来临的这个时刻的严肃性和神圣性，从这一刻起，他们将负起更重大的社会责任。

这种责任感在第二天出版的第一期《团结报》上充分表达出来了这份报纸刊登了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全体成员的姓名和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结社和罢工权利的公约。

23 日下午二点的预备会议按时举行了。

格坦斯克省长耶日·科沃杰伊斯基教授是第一个走进列宁造船厂跟厂际罢工委员会接触的官方人士。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尽管这一进步是被迫的、晚了许久的，但在整个东欧，仍是率先走出的一步政府对一个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表示了无可奈何的承认，并被迫与他们进行一次平等伙伴式的对话。

罢工工人兴高采烈地在谈判大厅为晚上的谈判作准备：摆桌子、放椅子。这是他们的节日。为了铭记住这一历史时刻，工人们在谈判桌上放满了各种廉价的磁带录音机。

人们早早地就等待着，对此，他们的首领既高兴又担心。于是，瓦文萨象宣布纪律似地作出警告：“谁的神经不健全，就别参加。我们必须表示出我们的坚决态度，但得有礼貌！”其实瓦文萨自己就不是一位绅士。前天，他跟记者谈到斗争性时，他说自己喜欢激烈的斗争，而且如果需要，他会“变成一个缺乏教养的、蛮横无礼的人。”工人没有为瓦文萨的训诫生气。对的，他们要当主人，首先就应该学会一个主人所有的自尊自重。

大伙用欢快的掌声表示了他们的理解。

“鼓掌为时尚早！”瓦文萨继续说，“只有主席团成员参加谈判。谈判内容由广播站转播。过后，你们再告诉我们，我们什么作得不好，什么做得好。你们将做出决定，我们只是谈判。”

掌声更热烈了。

政府委员会于八点整乘坐一辆大轿车到达列宁造船厂。

进了厂门，他们受到了礼貌却又十分冷淡的迎接。

沉静是由随后跟来的喧闹的、抢镜头的摄影记者和电视摄像师打破的。

谈判一开始，雅盖尔斯基副总理便表示了对谈判对手的充分尊重和自己的谈判诚意。

应该说，这位副总理是诚恳的。他的个性和谈判方式都与前任政府委员会主席佩卡副总理形成强烈反差。

然而雅盖尔斯基的诚恳并未表现在他能诚恳地解决问题，而是诚恳地表示他无力解决许多关键问题。

谈到 21 点要求的第一条工人成立独立工会的要求时，他承认“这对于劳动人民，对于国家的今天、明天和将来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他又说，“我作为政府的代表触及到了一个不在政府管辖范围之内的问题，”因为政府“不能给工会规定章程，也不能规定它的活动方式……”关于 21 条要求的第二条中的罢工权利，副总理表示，这很难在当前的条件下作出决定。他说这个问题不仅对波兰，而且对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很重大的难题。因此现在不宜就这个问题公开讨论并征求公众意见……

副总理的谈话立刻被厂际经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维希涅克斯基打断了。

维希涅克斯基说：“用不着去寻求什么‘公众意见’，我们这儿代表着 382 家工厂的职工。我们就是公众意见！”雅盖尔斯基无法再谈下去，否则，他要么激怒舆论，要么就得牺牲他的诚意。

不过他表示：“罢工者和罢工支持者的安全是可以保证的，只要他们不触犯波兰法律诸如盗窃、破坏财产，使用暴力……”副总理的话立刻在整个造船厂引起了一片口哨声和不满的喧嚷声。

尽管如此，谈判还是有礼貌和有秩序地继续下去。这次谈判原本就没有要达成全面协议的目标。要先确定的只是双方各自介绍一下对 21 项要求的观点，所以会谈时间只限定为两个小时。

谁能指望用二个小时去解决半个世纪的问题？

谈判继续进行，当双方谈到第五条，“通过群众性传播工具发表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公布其要求”时，会谈陷入僵局。原因是到目前为止，格坦斯克同全国的电话联系仍被封锁，罢工工人的真实情况无法向全社会报告；相反，官方的宣传工具一直没有停止对罢工进行歪曲报道。



瓦文萨问到：“副总理是否看过《人民论坛报》对我们都写了些什么？”雅盖尔斯基：“我没来得及看。”瓦文萨：“可我来得及看。他们污蔑我们！”工人要求，在提供群众性的传播工具之前，首先修复格但斯克与全国各地的电话联系。

省长科沃杰伊斯基回答说：“同什切青可以恢复通话，但跟华沙的联系得由中央决定。”“如果在这里不能谈论中央决定的事，”瓦文萨质问道，“那我想问一句，我们是在同政府委员会谈判，还是在同地方委员会谈判？”副总理只得承认，这个问担应该由他来解决。

瓦文萨继续说：“我们必须把消息告诉全社会，让整个波兰都知道我们这儿发生的事。”这是让工人方面产生怨恨的话题。

主席团激进的成员格维亚兹达说：“我们把取消电话封锁看成是诚意的表现。我感到震惊的是，当局至今没有解决这个并不难解决的问题。在这种形式下，我们不能进行谈判！”雅盖尔斯基：“我们得中断谈判吗？我想，我们是带着诚意来的。我请你们给我一点时间，一个机会……”瓦文萨：“什么期限？”“明天。”“好，一整天。”第一次谈判就这样结束了。双方都不愿作过多地接触而使矛盾深化。经过了几十年的隔阂和怨恨，要坐到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双方一致同意暂时取消原订于第二天进行的第二次谈判；正好，副总理已接到紧急通知，要他赶回华沙参加波共的四中全会。

格但斯克工人阶级以非常稳妥而成功的一次行动，给波兰带来巨大的希望。当天夜里，什切青市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团赶到格但斯克，它带来什切青地区 82 家工厂职工的委托。两个厂际罢工委员会将采取联合行动。

这次会晤的第一条决议是：只有实现独立自治工会的要求，才能在整个沿海地区终止罢工。

从格但斯克到什切青，只有六、六百公里的距离，但对波兰这个仅有 31 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来说，这七百公里构成了她的生命线。这是她的全部海岸线，最发达的工业区都集中在沿海地区。

波兰工人的阵地扩大了。

当双方进行试探性地交锋之后，工人没有为初战告捷而盲目欢呼，他们得利用休战的时机，坚固前沿阵地。

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邀请专家组的成员来列宁造船厂会晤，就许多重大问题请专家们进行历史的比较和理论的验证。这些专家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论家、报刊主编；甚至还有天主教知识分子俱乐部主任。

这些硕士、博士、科学院院士风尘仆仆地从华沙赶来。

工人阶级将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托付给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专家们也毫无保留地、负责任

的谈出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供主席团作重大决定时参考；当工人作出决定后，专家们又帮助使这些决议的思路更清楚，最后还要对某些条文格式和谈判词令进行语言加工。

主席团要作出的决定很多有的并不紧迫却具有深远意义：为 1970 年牺牲的造船工人修建纪念碑。主席团批准了造船厂设计师皮涅特鲁什卡工程师的纪念碑设计方案，并决定纪念碑在三个月内建造好，以在今年 12 月 16 日的周年纪念时揭幕；他们得保持着与副总理雅盖尔斯基的联系，他仍在华沙。这也是很艰难的事，因为通讯联系的封锁还没有解除；每个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成员都得时时与各自的工厂保持联系，随时将主席团的决定告诉那些因谈判停顿而焦急、困惑的罢工工人；主席团还决定主席团成员包括主席瓦文萨必须睡觉，至少连续睡够五小时……

#### 十四

全世界的媒体都走进造船厂后，终于促成了波兰的新闻工作者不愿继续当喉舌的反叛波兰终于知道了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和 21 条要求的存在……

最让主席团忙于应付的是记者们。

在列宁造船厂的波兰记者有五十多位，而外国记者超过这个数字的两倍。

美国三家最大的电视公司 ABC，CBC 和 NBC

都派来了记者；还有合众社，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德新社。新华社的记者也到了格坦斯克，但只在造船厂大门外呆了几天。他们谢绝了进入造船厂的邀请，说：“谢谢，就这样也已经一切知道了，我不想干预波兰的内部事务。”全世界的大报，《纽约时报》、《明星周刊》、《世界周报》、《新闻周刊》、《人道报》、《费加罗报》、《巴西日报》等也都有采访记者进入造船厂。

可以想象，这一百多名记者多日聚在一起会有怎样一番热闹景象！现在，双方的休战、沉默又加倍地刺激了记者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每个记者都力图从寂静中挖出些能震撼世界的消息，他们在全体会议大厅和主席团会议室之间来回游逛，有机会就拉住主席团成员发问：“还恢复谈判吗？”、“什么时候恢复？”瓦文萨更是记者们紧追不舍的对象；当然，他总是撵走他们。他最忙，确实抽不出时间。有时候记者们也能在瓦文萨走路或吃饭的时候有所收获。尽管瓦文萨以他特有的干脆，回答得非常简短，甚至对问题本身进行了否定，但瓦文萨的活仍然被电波传送到全世界。

通过这些答记者问，这位十天前还没有工作的失业工人终于被世界所了解了问：“成立独立工会将会有什么样的历史后果？”瓦文萨：“历史与我有何相干！我感兴趣的是我的 21 项要求。现在要实现的只是第一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项要求建立我们的工会。我斗争不是为了历史，而是为了人！”问：“有人在谈到目前的事件时，想用欧洲共产主义去解释……”瓦文萨：“胡说八道。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问：“您认为独立工会是什么？”瓦文萨：“是一种反抗的武器，我们希望劳动者能干预那些同他们有关的决定。

问：“您知道西方国家的工会是怎样进行斗争的？”瓦文萨：“我们的条件与他们完全不

同，无论是西方的工会，还是波兰以前的工会对我们都不合适。”问：“你们如此为之奋斗的是不是活生生的政治？”瓦文萨：“不，不是政治，这是 21 项要求。”问：“您从哪儿学来的这种工作经验？”瓦文萨：“1970 年流的鲜血教会了我。”问：“您读过工会方面的书吗？”瓦文萨：“读过一些意大利和法国的有关著作，但最好的老师是生活。”问：“您对波兰的前途有何理想？”瓦文萨：“日本的经济，瑞典的政治。”问：“您是天主教徒，信教对您意味着什么？”瓦文萨：“作天主教徒就是作人。”问：“假如您有机会同西方劳动者交谈，您首先向他们谈些什么？”瓦文萨：“我说，应该真心实意、坚定不移地相信人是有尊严的。必须捍卫自己的尊严。工人团结起来要达到的目的也不过就是这个。”问：“您觉得从 8 月份以来，您有变化吗？”瓦文萨：“我从前是人，现在仍然是人。我还是我，我没有变，我很容易冲动，这使人嫌恶，但我充满继续斗争，永不退让的决心。”……………

瓦文萨走了，去处理那许多未来的和眼前的问题；还得执行主席团的规定，睡够五个小时。于是记者们游逛起来，争吵起来，并且互相交换一些“绝对可靠”的消息：“政府方面并没有排除在最后时刻采取武力解决的可能性”；“苏联方面已经向第一书记盖莱克发出了警告”；“盖莱克将提出辞职”……………

或许，这些新闻的布散布是一种烟幕，是同行间进行新闻争夺时发出的干挠波。记者们真正关心的是事件的内幕和事态发展的预测。

除了瓦文萨这个目标，让记者们感兴趣的，还有造船厂一间陈设船只模型的房间，主席团在那儿设了一个新闻处。越来越多的记者集中到那里，将主席团成员邦德科夫斯基团团围住。

邦德科夫斯基是主席团的新闻发言人。

这位新闻发言人的新闻公报非常简单：与政府委员会的谈判日期仍未确定，因为格坦斯克与全国的电讯联系仍然不通。

记者们的怨恨具体化了，尤其是波兰记者，他们不象外国记者，即使在通讯封锁的情况下也总能千方百计地把搞到的新闻传递出去。

波兰记者对官方封锁通讯使他们的消息不能及时发出表示焦虑，而对许多虚假的、歪曲的报道却大量充斥报刊表示愤慨。于是，波兰记者聚在新闻处，召开国内记者会议，对上述两个问题表示抗议。

这次会议有点儿象乱糟糟的群众大会，任何一个问题都有太多的方案；连这份抗议交给谁，都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是交给波兰记者协会，还是党中央新闻部，还是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

在签名问题上的犹豫就更多了，该不该签？敢不敢签？一位记者签上了名又划掉了，然后又签上，并表示了歉意。

这场良心与忠诚的喜剧演了很久，直到他们被工人撵出新闻处，因为那里要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波兰记者们只好搬到室外一棵大树下继续签名。

这份抗议声明终于有了 36 名记者的签名。声明被送到波共中央新闻部、波兰记协、政府委员会和厂际罢工委员会，并在当天晚上就被“自由欧洲”电台报道了。

抗议声明的全文是：“我们，此时正在格坦斯克地区的波兰新闻记者，我们声明，迄今为止发表的许多消息，不符合这里发生的事件的实际。

目前的电讯封锁以及缺乏公布介绍真实情况的材料，使我们感到痛心，并使我们不能忠实地履行新闻工作者的职责。

我们认为，充分地向社会报道有关国内发生的一切，只能有助于冲突性局势的解决，并在将来促进社会的发展。”

尽管记者们的行动是迟迟疑疑的，但意义重大。。继学者、教授们的积极介入之后，新闻工作者的反叛使格坦斯克的政治氛围更加炽热了。

这些记者大多来自首都新闻部门，人们一直怀着敬畏心理把他们称为官方的喉舌。

这次小小的、异乎寻常的造反给了当地新闻极大的勇气：当地电台一次又一次地播送着厂际罢工委员会和政府委员会第一次谈判的实况；格坦斯克《海岸晚报》第一个发表了格坦斯克存在着一个厂际罢工委员会以及它所提出的 21 项要求的消息。

面对这样的政治气氛，最高决策机构和最高领导人难道还可以不把格坦斯克危机作为共和国的第一件大事，而不作最高层的表态吗？

全波兰、乃至全世界都注视着、等待着波兰共产党的进一步表态……

瓦文萨与波兰团结工会（四）

赵启强

本文系作者大著《光荣的荆棘路改革家们》第五篇第四部分。

十五

工人阶级的成熟阻止了盖莱克来一次彻底的、哥穆尔卡式的堕落，这段重复的历史才避免了那个悲剧性的结尾。

政府在十天的痛苦的沉默之后，终于有了最高层次的表态。

8 月 24 日晚上，波兰国家电视台播出专题新闻：党内第二号人物、现任总理 52 岁的爱德华·巴比乌赫辞职；同时宣布，将巴比乌赫和另外三名负责宣传和经济的政府领导人开除出政治局。

1970 年，在把哥穆尔卡搞下台的斗争中，巴比乌赫是盖莱克的坚定盟友，可见，盖莱克为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在电视台公布了中央全会的决定后，盖莱克向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

这次讲话是十分温和的，盖莱克首先承认，人民不满是因为党的“工作方法存在着毛病和缺点，”他保证政府将“对经济实行重大改革”，并“削减巨大的投资计划”，以缓和因野心勃勃的高速度计划带来的物价上涨。

对于当前的罢工浪潮，盖莱克承认工人的反对意见是合理的，答应“要仔细地倾听公众的呼声。”并保证即使“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也要尽力通过讨论和对话，通过妥协和协商来寻求问题的解决。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应该承认，这次讲话是温和而诚恳的。然而比起我们所了解的盖莱克，比起我们在前面所听到过的他在 1970 年底的讲话，这次讲话温和却过于空洞，有一点自责，却又不痒不疼。

盖莱克的倒退是历史的重复，但他毕竟没有堕落到哥穆尔卡的地步用暴力对待示威群众。这算是历史的进步吧。

然而，如果历史的进步仅仅表现在统治者的一点无可奈何的自责上，那这个进步是可怜的。下面的比较使我们看到，历史的进步远非这一点儿。

这个进步来自波兰人民的政治觉悟：1956 年，波兰人民对哥穆尔卡的许诺抱着绝对的信任，把他当成救世主和万能主宰，而将一切都交给了他。

1970 年底，尽管盖莱克做得不比 1956 年的哥穆尔卡少，但他只得到了人民的一半信任。波兰工人带着一半希望，一半怀疑质问他：“有什么把握十年后不再谈论改革的需要呢？”在 1970 年的格坦斯克对话时，一位钢铁工人的精彩发言，表明了波兰工人在这 14 年中的进步。

这是那位工人的讲话：“信任中断了，今后任何一位波兰领导人也不会有哥穆尔卡 1956 年享有的那种信任了。新领导目前只在一点上得了分，即它拯救人民免于内战，免于兄弟间的相互屠杀。但在其他问题上，人们还在等待。改善物质条件虽然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但终究不是最迫切的。主要的问题是，要重视社会，倾听群众的呼声，遵守民主的基本原则，以及无情地根除那些身居委职而好耍手腕的人，不学无术的人和暴虐无羁的人。”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波兰工人阶级跨越了对政治家的盲目信任，不再将一切都交给政治家去办，而是开始了对政治弊端的思考尽管这种思考的结论还只是要求政治家能永远倾听人民的呼声。

现在，1980 年 8 月，尽管盖莱克这位仍然控制着政权的最高领导人，这位仍然控制着军队和警察的政治家面对着反叛的工人，准备用妥协的方法来解决危机，这在整个人民东欧的历史上，已经是了不起的让步了，但波兰工人却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妥协和信任。

波兰工人终于从诉诸统治者善意的幻想和寄希望于好政治家的希望中醒悟过来。

在这种不妥协、不信任中，工人的民主意识觉醒了，他们终于找到了用自己的阶级意志

和力量去取代对政治家的依赖。

波兰工人阶级建立了一个新的希望。

在盖莱克对十多万罢工工人作出广泛让步的当天晚上，美联社记者找到了瓦文萨，向他提出问题：既然政府已经作了重大改组、并同意工人以民主投票方式选举工会领导人，主席团是否将接受政府的妥协？

尽管联合罢工委员会主席团的许多成员表示，应该研究一下盖莱克的讲话，然后再表态，心直口快的瓦文萨还是对美联社记者的问题做出回答：“不，只有建立自由工会，我们才能得到幸福，我们才能取得胜利。政府欺骗不了我们，我们决不给它欺骗我们的机会。”这种脱口而出的、似乎很不成熟的表态，表明了波兰工人阶级的成熟这是用近三十年的苦难和两次大规模流血换来的。

瓦文萨说：“工人要求成为工厂和国家的真正主人，我们决定用罢工来争取这一点。所以，就是解决了其他二十项而第一项不解决，那也解决不了问题！”自从 1944 年波兰工人阶级将他们的权力交给波共之后，他们使死守住一个信条好的当权者是保证工人阶级利益的根本；几十年来，他们始终在反对坏的当权人和寻求好的政治家的斗争中付出惨重的代价。只有到了 1980 年，波兰工人第一次理解建立和保持自己力量的重要性。

因此，即使盖莱克政权被迫牺牲了它的总理，波兰工人也拒绝接受这种老一套的、替罪羊式的解决方式。他们冷静而顽强地坚持他们已经寻得的目标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独立于政府的权力中心。

## 十六

罢工工人拒绝以改进了的旧工会来取代建立工会，让副总理无可奈何；而工人对国家危机根源的深刻认识，则让这位政治家深感震动！

政府与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第二次谈判于 8 月 26 日举行。

政府方面仍由第一副总理雅盖尔斯基负责，谈判地点仍在列宁造船厂。

有了政府的改组，有了盖莱克的妥协性讲话，政府委员会希望它与工人的谈判要容易一些也就是说，政府希望它的让步能换得工人的让步。

瓦文萨的首次发言就使政府的希望破灭了。因为在最重要、最难达成协议的自治工会问题上，工人方面没有丝毫的退让。

瓦文萨说：“从第一次谈判以来，已经过去了很重要的三天。我们希望在这期间发生的新情况，能使我们的讨论变得容易些。罢工要求中提出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会问题。我们要一个自由、独立、真正自治的工会。”瓦文萨还非常有礼貌的重申了工人方面的谈判诚意。

瓦文萨说：“副总理先生应该相信，我们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想破坏生产资料公有制原则，我们把工厂看作是波兰人民的财产，但我们要求成为工厂和国家的真正主人，现在我们决定用罢工来要求这一点。我们的谈判将很困难，我们大家都必须有极大的耐心和良好的愿望。”只有坚定的内心信念和必胜的信心，才能使工人方面具有如此的沉着、理智和礼貌。

就个人素质论，对方的首席代表雅盖尔斯基有瓦文萨无法比拟的优势：雅盖尔斯基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在知识、教养、思想水平方面，他都是出类拔萃的；他的外交、谈判才能则更是瓦文萨这样一个工人出身的人所无法相比。雅盖尔斯基在世界上各式各样的谈判厅进行过许多次极其困难的经济、政治谈判；而他的谈判对手也是一些世界级的政治家总理、部长、党的领导人。

但此刻，这位政治家却没有瓦文萨所有的自信。

谈判一开始，雅盖尔斯基就向瓦文萨提出一个个人要求：“主席先生，我提一个建议，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整个时间被电视摄像机拍摄的经历，我们是不是将它关了，它是不需要的。”副总理的请求得到了一半满足，决定对谈判的开头 20 分钟作电视报道，然后就请电视记者退场。

副总理要求回避电视记者，倒不是他要躲避新闻监督而在谈判桌上耍弄手腕。

这一次，雅盖尔斯基是拿出了比跟外国政治家谈判时更多的诚意和严肃态度的。但他毕竟是一位东欧政治家，他的国内政治生活从来就是跟密室政治联系在一起的。

他首先声明，最近几天曾经流传的一些指责罢工工人的传单，但他对这些传单一无所知。

接着，副总理对双方能又一次严肃地讨论波兰的重大问题表示满意，他重申了他的谈判诚意。

雅盖尔斯基说：“三天前，我们开始谈判，现在我又来到这里，就象我三天前说的那样，为的是和你们一起解决令人焦急的问题。”副总理本着先解决能够解决的问题的精神，宣布了政府为改善市场供应，进口肉食的決定，并对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提高抚恤金数目，增加托儿所，幼儿园以及缩短等待住房时间等问题作了详细解释，表示接受工人要求。

瓦文萨却要求从第一项要求开始讨论。

瓦文萨说：“我们不能放弃第一项要求。所以如果解决其它二十项，而第一项不解决，那就解决不了问题！”雅盖尔斯基回答：“提出这些能够解决的问题，并规定解决的日期和办法，是为了表明政府对工人关心问题的态度。这是我的责任。”

假如我不表态，你们会问我，您来干什么？现在请允许我谈谈第一项，也就是您当作最基本的那一项。“”不仅是我，是全体工人阶级。”瓦文萨强调说。

雅盖尔斯基就罢工工人成立独立工会的要求，向对方传达了刚刚开过的四中全会的精

神。他说，中央认为，“工会活动的革新是很重要、很迫切的任务。”中央已批准“在凡是职工们要求改造工会领导机构的工厂里，立即进行新的选举。”谈到格坦斯克，副总理的个人意见是，“在最近几天或最近几周里，在三联城地区进行选举。选举应该是民主的、秘密进行的。如果最近工厂中自发产生的代表的威信是持久的，那么他们一定会被选进工会的领导机构。”发言中，副总理多次提到：为了让工会起到它本来就应该起到的作用，必须革新工会。

瓦文萨对雅盖尔斯基的讲话，进行了根本性的否定：“副总理先生还是在谈健全或是改进工会，而我们指的不是改进，而是要成立新的工会。看来我们之间的分歧很大。”雅盖尔斯基：“主席先生，这是符合谈判情况的。我们介绍自己的观点，你们也介绍自己的观点。”瓦文萨：“副总理先生，我们仍然要求明确回答，到底是自由工会还是改进旧工会。我们必须得到明确的答复：自由的，还是旧的？”雅盖尔斯基终于明白他的困难出自什么地方了工人对自己的目的明确而果断，他们面对面地跟你交锋，不让步，没有政治家的外交辞令，没有知识分子的权衡、妥协和患得患失的犹豫。

雅盖尔斯基只好后退一步：“主席先生，我不事先决定任何问题。但我希望先生们能在较小的范围内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这样有利于双方更详细地听取对方的意见，因此我建议双方各推出三个人，去详细研究这个问题。”副总理的建议立即被工人方面否决了。那是主席团成员莱赫·索别谢克不留情面的驳斥索别谢克：“我不想使任何人生气，可我认为这是一个误会。我们要求自由工会，而副总理先生却要求革新旧工会。这是在耍花枪！我很抱歉用了这么一个字眼。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三人小组，对这些要求我们不会让步！”雅盖尔斯基再一次退让：“先生，我想告诉您，我根本没有坚持什么旧工会，我只说，一定要革新工会活动。”一位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说，如果把革新旧工会和建立新工会分别作为两件事来讨论，那么工人方面会“高兴地欢迎在旧工会中进行变革的设想。当我们建立起我们的工会时，我们还得和原来的工会系密合作。我们不能想象，有两个或更多工会并存而可以不彼此合作，因为这是违背劳动人民利益的。如果我们成立的工会得到社会的信任，那我们就相信旧工会将不得不进行改革。那时候任何工会都不能脱离劳动人民，因为那时会员可以自由流动。”这位工人的发言与官方工会主席什德拉克“决不放弃权力”、“不与任何人分享权力”的表态形成鲜明对比。可见，工会组织对那些工会官员只意味着权力、利益，而不是履行保障工人利益的责任。

在成立新工会还是革新旧工会的辩论之后，瓦文萨提出，为了彼此的了解，工人方面将推出三位代表重点发言，详细地谈出工人的观点和要求。他建议政府方面耐心地听一听。

三位代表的发言对波兰的危机和国家的命运作了总体的透视。

第一位讲话的是安杰伊·格维亚兹达。

他说：“我们是处在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会见的。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场危机呢？多少年来，评价地方当局和各个部门是看他们生产了多少吨钢，多少吨煤，多少米电线。从来没有人从工人生活怎样，教师生活怎样这方面来评价他们的工作。工会的基本目的是保护劳动人民，但工会根本不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相反，他们帮厂领导的忙，他们吃惊地听着各个车间的悄悄话，随时准备和行政领导一起来反对劳动人民的利益……”



“从 1956 年的重大危机之后，波兰又发生了 1970 年，1976 年和现在 1980 年的三次危机，而每次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些危机的发生都是因为劳动人民对事态的发展不能施加影响。现在，我们在解决危机，希望能从根本上讨论问题，希望我们不致于过两个礼拜又被迫罢工；”沿海地区的人民已经证明自己是明智、平静和成熟的，所以单单用经济让步，提高工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副总理先生，不久以前 50 格罗兹一个的小面包比拳头还大，现在 90 格罗兹一个的面包可以捏在手心……

“应该建立新工会，但我个人反对解散旧工会，因为这不符合宪法；”新工会要活动，要接近自己的会员就得有自己的出版社，就得出自己的刊物，就得让这些刊物写真话，不管这些真话让领导听起来是否舒服。利用报纸耍手腕当然也能成功，但只能成功一时，然后就是愤慨、骚动不断增涨起来，又爆发另一次事件。我们想在这些错误还没有酿成几乎要搞国内革命的时候就指出来。只有让人讲话，而且不去事先肯定它是否正确的时候，才有讨论可言。我们期等着政府的宣言和诺言，保证新成立的工会在登记方面将不会遇到什么麻烦。

“主席团成员、建筑工人代表维希涅夫斯基，对波兰经济危机的根源作了一针见血的揭露：”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是在作经济问题的决定，特别是在作分配问题的决定时，没有考虑到劳动人民的利益。目前波兰生产的财富中，只有 76% 是供人民消费用的产品，其它的财富几乎全被工业吞吃了。工业在没有社会监督的情况下在那里自己为自己进行生产。不切实际的、由上面抛出来的计划指标订得太高太大，然后在每个五年计划的中期就往下调整。已经开工的基建项目还没有完成就停在工地上。最近 6 个月中因为能源缺乏而造成的停工，据统计局的报告增长了 56%……

“天天在干活的人的意见必须确实受到认真对待……经营管理不善比罢工的损失多得多。”维希涅夫还谈到了新旧工会问题。他说：“我们单位的四百名工人在得知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什德拉克的讲话内容之后，作出了慎重的、深思熟虑的决定：退出了现在的工会。我们不想破坏法制，我们没有权力解散它，所以我们退出。

我们要建立自由工会是为了挽救我们的祖国，这是我们的义务，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我们都是波兰人，劳动人民有这个权力。“最后发言的正是刚才毫不客气地驳斥过副总理、说他在耍花枪的那位索别谢克。

索别谢克是一位钳工。他针对着副总理在发言中宣称他仅仅是作为沿海地区问题委员会到这里来的，因此他不能对全国的问题表态的说法，表示了抗议。

索别谢克说：“我对副总理先生的讲话表示不安，似乎工会问题只涉及到三联城。

你发表这样的意见可能导致全波兰的罢工。必须向全社会解释我们的要求，说明这里发生的事，要让全波兰都对这些要求诚实地发表意见……我还想解释一下，每一个波兰人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位或那位先生在工会里担任什么职务。我们并不想争权夺利，只是希望很好地履行职责，成为一个健康的机体。要允许批评，尽管批评有时正确，有时也许不正确……

“三位工人代表的发言对副总理的震动很大，使他从被迫让步到自愿地接受这些全新的生活感受。

事后，雅盖尔斯基在一次电视讲话中承认，工人给他“上了一堂关于波兰，关于社会主

义的大课，一堂真理之课，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痛苦的一课。”这种痛苦是由铭心的自责和被剥光了的羞耻组成的。

重要的第二轮谈判结束了，工人以坚定和果敢赢得了第二个回合；同时，副总理雅盖尔斯基也因为丢弃了第一次谈判时所采用的僵硬的、不让步态度而赢得了工人方面的赞赏。

然而正因为如此，他的处境变得更加难堪。

雅盖尔斯基匆匆接替了前政府委员会主席佩卡的工作赶到沿海地区来时，对沿海形势的评价与中央是一致的。他当时认为，建立自由工会的要求并不是工人阶级真实愿望的反映，而是企图动摇波兰国家制度的反社会主义力量强加给工人阶级的；行前，他还得到情报说，一些持不同政见组织社会自卫委员会，保卫工人委员会近来一直在对罢工事件施加影响。

近几天事态的发展，尤其是第二轮谈判，使副总理对自己的、同时也是中央的认识的正确性动摇了。他的工人对手在谈判中所流露出来的强烈信念不建立工人的真正的代表机构独立工会，政治、经济改革就不可能成功！有力地冲击着他的信念，使他隐隐感到工人阶级要求新工会，可能对国家、对党都有好处。

然而问题是，雅盖尔斯基毕竟是政府的代言人，他只能说中央许可他说的话。

他的手脚是被捆住的，王牌在华沙。

这就是他的痛苦、矛盾之所在。他是党的干部，党的原则是他视为生命一样重要的东西迄今为止，中央对成立自治工会的态度是：革新工会行；在官方工会之外建立新工会不行！

雅盖尔斯基凭着一位老练的政治家的直觉就可以断定：如果说行这个共产党国家从未经历过的全新事物，很可能会导致一场天翻地覆的政治震荡；如果说不行那就有面临一场全民性灾难的危险。而且，更让雅盖尔斯基心惊胆战的是，他已经从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意志中感觉到了，他和他的政府最终必须对波兰工人阶级说行或者不行，除此，别无选择……

雅盖尔斯基在第二次谈判之后，将连夜飞回华沙，在政治局，他必须心平气和地说出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愿意说出的这种个人感受。

十七

格坦斯克被焦急的等等熬煎村，华沙被痛苦的选择煎熬着。波兰在等特作出决定的一刻……

如果说历史正经历着分娩的阵痛，那么政府却被哈姆雷特式的难题折磨着行，还是不行？这是与“生存，还是死亡？”同样艰难的选择。

8月最后几天的波兰是在异乎痛苦和焦虑中度过的。这种情绪从华沙传到格坦斯克，使政府委员会陷入十分难堪和茫然失措之中。

雅盖尔斯基 26 日会谈后的当晚便飞回华沙，但他未能将王牌带回来。

28 日，双方又进行了第三轮会谈，终因未能在建立独立工会问题上达成协议。

于是瓦文萨宣布：“既然政府委员会不能讨论第一项要求，谈判不用举行了。”29 日，因为同样的原因，政府委员会发表了一个简单的公报，说因“还没有准备好对第一项的讨论，取消原定在今天的会谈。”华沙被选择的痛苦熬煎着，格但斯克被焦急的等待熬煎着。

政府委员会的专家组被工人的谈判搞得精疲力竭，不知所措，他们甚至不能理解这儿发生的事到底是什么意义，而他们扮演的到底是什么角色？一些颇有成就的政治家、社会学家突然感到必须重新学习。

重新学习并不太难，难于适应的是来自上面的痉挛式的摇摆。

一位专家说：“我都要发疯了，每隔半个小时换一个决定。”雅盖尔斯基和格但斯克省的领导人，已经开始理解局势，理解了解决这种局势的条件。但他们无法让华沙理解，于是他们频频地往返于华沙和格但斯克之间。

这不是美差。他们在华沙有过许多很不愉快的谈话和政治局，尤其是和盖莱克。

混乱还来自工人和政府之外的第三者、第四者波兰大主教，维辛斯基红衣主教发表电视讲话，呼吁工人要理智、克制和勤勉的劳动。他说：“旷日持久的罢工以及可能引起的动乱或自相残杀都是违背社会利益的。”他强调，“工厂必须开工。”

这位波兰教会中德高望重的老人、人民精神上的父亲顷刻之间便在人民中失去了威信，电视讲话还没有完，工人便对他发出刻薄的挖苦；罢工工人甚至在造船厂大门上的圣母像下贴上标语：“圣母玛丽亚罢工了！”一位神父故意用崇敬的口吻说：“主教是一位伟大的人，他当然不会反对人民的利益。主要是盖莱克向大主教下跪，要他发表他现在发表这种讲话。”神父巧妙地暗示主教的讲话是出自政府授意。

也有从下层发出来的干扰那是一些与外国人做生意的自由职业者，其中最多是外汇套购者。他们经曾联合敦促港口工人停止罢工，“因为没有船来就没有买卖。”

当然，这些混乱并没有影响到工人阶级对整个局势的控制。

1980 年 8 月的波兰动乱能保持这样的局面，除了工人自身的成熟，还有另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因素此时，大学生正在放暑假。

尽管我们可以肯定，如果大学生加入到这事件中来，会毫无保留地支持工人阶级；尽管我们也承认，在以前、甚至以后的任何动乱中，大学生总能站在进步力量一方，总能在正义与邪恶的挑战中走在战斗队伍的最前列。但这一次，在工人与政府坚定而又艰难的漫长对峙中，大学生没有介入，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件幸运的事。

大学生也是知识分子，但他们又明显地与许多此刻正在格但斯克与工人并肩战斗的知识

分子不一样。这些年老的或年轻的知识分子自愿来支持工人阶级，或许他们的长远目标与工人阶级不尽相同，但眼前的目标是一致的以理智和秩序，使罢工取得胜利。

开始，许多知识分子是带着智慧上的优越感到工人中来的。他们带来各式各样的政治理论社会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也带来各式各样的政治模式美国式的，日本式的，瑞典式的。他们对自己的理论充满自信，自以他们的理论是工人阶级所必需而又欠缺的。

然而当他们在罢工者中间呆了一段时间后，便惊讶地发现，仅仅几天的政治生活，就使工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变化，工人不仅有令人敬佩的勇气他们为全民的利益冒着很大的危险，一步不小心、一次不理智的决定都会使这种冒险变成毁灭性的灾难还有为实现自己目标的冷静和决心，以及拯救民族的使命感、责任感。

从来以民族灵魂自居的知识分子，第一次理解了那句陈旧的、但已被糟蹋了的口号工人阶级是社会的先进力量。

一位从华沙来的学者谈到到造船厂后的感觉时说：“好象被猛击了一掌。”一些善于演说的思想家，野心勃勃地赶到造船厂，想以自己的深刻见解去宣传、鼓动工人，但他们很快就沉默下来，更多地只是倾听和思考。

著名的讽刺作家杨·格沃瓦茨基，到造船厂后，突然一改他那诙谐和尖刻的语气，而开始用严肃、认真的口吻说话，甚至还有点儿慷慨激昂。

波兰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合作，谱写出一曲动人的乐章。

有一次，在工人们以暴风雨般的热烈欢呼庆贺他们的胜时，已经退出了会议大厅的瓦文萨又返回来。他重新站到扩音器前，对向他欢呼的工人说：“我失礼了，我还没有感谢我们的专家。他们为我们出的主意很好，请他们继续帮助我们。”说完，他念了专家组的名单。然后，又请专家组组长马佐维耶茨基主编讲话。

在热烈的掌声、欢呼声中，马佐维耶茨基只说了一句话：“我感谢你们，我们学到了很多。”瓦文萨和马佐维耶茨基对对方的感谢是由衷之言。知识分子感谢工人阶级是因为他们确实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懂得了尊严、真理、公正、自由对工人阶级和对于知识分子同样重要；懂得了“如果不同代表真正社会力量的工人团结起来，要解决知识分子生活中和国家的重大问题是不可可能的。”工人阶级向知识分子致谢，是因为专家们帮助他们对社会有了更全面的理解，比起过去仅仅从一个工厂的观察范围中所能看到的要更全面；在行使管理职能时，工人阶级已能考虑到整个波兰。

现在，厂际罢工委员会要处理的事越来越多，因此成立了许多下设机构：外语翻译、新闻发布、内部治安，还有运输、联络、财务、供应、宣传印刷等部门。

厂际罢工委员会必须安排城市人民的生活，必须同各地的工人阶级取得联系，必须给好几百名记者提供新闻，让全世界都铭记住 1980 年 8 月的波兰工人阶级；同时，也得让罢工工人知道，全世界的进步力量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

宣传部门在造船厂二号大门不远处的玻璃橱窗里张贴着几十张世界各国的报刊剪报，并用波兰文注明标题和出处。格坦斯克工人在全世界各种报纸上，都被登在第一版。

这种支持还来自国外的各种代表团。他们带来物资，带来捐款，还带来亲吻、拥抱和火辣辣的演说。

在全体会议大厅，每天都有许多演说、宣言一类的活动挪威的青年工会代表团来了，这些波罗的海彼岸的年轻人无比激动，说在这儿、在格坦斯克学到了许多东西，说回去以后一定要说服老工人领袖支持波兰工人阶级；法国劳工大会中央的代表带来了 11000 法朗的捐款。并用火热的语传达了塞纳河畔工人的支持。

瓦文萨表示了感谢之后，在热情的冲动之下，邀请这位法国工人代表为主席团荣誉成员。全体工人都为无产阶级的世界性联合发出了热烈的掌声。这是激动人心的场面。

瓦文萨本来就是满怀激情的人，而且毕竟才三十多岁。此刻他激动地说：“不久之后，格坦斯克将成为战斗的工会运动的世界中心。”这句话显然是过头了，于是大厅里响起了开心的、善意的嘲笑。有人喊着瓦文萨的爱称说，“莱谢克，盐搁多了！”这就是格坦斯克工人阶级的普遍情绪。

现在，担惊受怕的情绪没有了，不能坚持下去而妥协的可能也没有了；相反，过于激进和好斗的情绪在厂际罢委员会代表和全体罢工工人中是比较强烈的。

已经有 800 多名代表的全体会议，不断地向 18 人的主席团施加压力，不让他们向政府作那怕是最小的让步。

这种激进情绪的蔓延有可能使波兰泛滥许多由不切实际的、或完全是地方性的要求引起的罢工。这类罢工可能有背于工人阶级提出的 21 项要求，有背于波兰的整体利益。

有人在利用这种情绪，企图掀起更大的动乱以破坏工人与政府的谈判有人在散发旅美波兰侨民联合会的传单，说谈判是骗局、是叛卖，并呼吁全体会议抵制协商；还有人溜进造船厂，偷偷组织小型的抗议集会，说瓦文萨作风不民主，说主席团向政府妥协、让步……当然，这些煽风点火的人被纠察队的小伙子们撵走了。

瓦文萨确实有把盐搁多了的时候，但他毕竟是经过血的洗礼的工人斗士，毕竟是一位能考虑到工人阶级和波兰的整体利益的工人领袖。他懂得，在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必须使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必须使罢工有秩序、有目标地进行。

8 月 28 日，当第三次谈判中断之后，瓦文萨站在二号大门顶上，向急于要对政府采取更激烈对抗的工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使波兰陷入恐怖是不应该的，因为最终是人民流血；使波兰陷入瘫痪也不好，人民必须有食品吃。如果三、四天之后还没有结果，我们那时再让罢工扩大！”这位 37 岁的工人受到了“斯托拉特，斯托拉特！”的欢呼声。这是《祝您长命百岁》中的歌词，是向亲人和长者祝福时唱的。1956 年，人民对哥穆尔卡唱过这首歌，现在他们终于将这种祝福用在他们自己人身上了。

瓦文萨就是工人阶级。他此刻的演说观点正是由主席团决定的。主席团还决定内瓦文萨作一次类似的电视讲话，重申 21 项要求，同时呼吁工人不要随意停工，扩大罢工浪潮，以免国家陷入混乱。

工人方面的建议被政府拒绝了。政府不希望罢工工人在电视上宣传 21 项要求；再说，政府也不愿意让人民产生这样的印象，仿佛瓦文萨和厂际罢工委员会决定着全国的罢工进程。于是厂际罢工委员会只好以呼吁书的形式，向全国人民表达了他们的立场。

工人阶级事实上正在干着本该由政府干的事情。那么现在，8 月的最后两天，政府在于什么？

不安和困惑的人民把视线转向政府的喉舌电台、电视台。希望能得到答案。

然而，喉舌已经没有以往的响亮和自信，倒象一个病人的呓语：虚弱的、前言不搭后语的。

先是波兰广播电台发表新闻公报，说政府与工人的协议已经签定，罢工已告结束，后来又作了间接的更正；更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电视新闻里。

29 日 19 时 30 分，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里出现了一群哭哭啼啼的妇女，向节目主持人诉说罢工给她们的生活带来的许多苦恼。此刻，一位群众递给主持人一张纸条。主持人一愣，犹豫了几秒钟后，还是读了。于是全波兰都听到了与上述控诉罢工的调子截然相反的宣告：“莱盖尔斯基五金工厂宣布进行 24 小时警告性罢工，呼吁双方迅速在格坦斯克达成协议，如果造船工人的正当要求不能得到满足，莱盖尔斯基工厂准备再次罢工！”人们的疑惑更深了：电视台出了什么事？政治局出了什么事？只有一点是清楚的作出决定的一刻就要来临了。

果然，在这个奇怪的新闻之后仅一个小时 29 日 20 时 30 分，厂际罢工委员会得到了来自华沙的可靠消息：“明天一切都将圆满解决！”

十八

近代史上，战果最辉煌的这次罢工就要结束了，罢工工人会想些什么呢？

瓦文萨说：我们想的是家庭的共同事业，这个家庭叫波兰。

政府终于作出了痛苦的决定。

这种即使是一个正常头脑的老百姓也不难作出的明智选择把自治权归还给工人，为什么竟让这些出类拔萃的政治决策人如此犹豫？

障碍不在于判断的失误。在一个一切都靠权力维持的制度里，政治家和他们整个阶层的持权和优惠漂亮的住房、小汽车、女秘书都得靠权力维持。所以，放权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们决不出此下策。

格坦斯克工人阶级迫使政府当局为人民和波兰的利益，忍痛交出了他们手中相当一部分权力。

8月30日上午，在造船厂，雅盖尔斯基副总理终于代表政府对罢工工人21项要求的第一项“建立独立于党和雇主的自由工会”进行了签字

在签定协议时，雅盖尔斯基发表演说：“我们象波兰人同波兰人谈话那样进行了对话，没有输家、没有赢家，没有战败者，也没有战胜者……”然而胜负却十分分明：波兰工人取得了一个历史性胜利，而政府损失惨重。

在1980年8月30日之前，这个政府、甚至这一类政府虽然也有过失败和让步，但只是经济上、人事上，最多也只是政治上的，但它从未在制度上作过那怕最微小的让步，从来没有在它对社会的全面主宰方面有丝毫退让和松动。

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一条是“无所不管的国家与无所不管的党结合在一起，而无所不管的党又同无所不管的领袖结合在一起。”（托洛茨基语）它产生了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具有无限权力的专政。现在，波兰政府承认了工人成立独立工会的要求，就等于从无所不管的权限内放弃了对工人阶级的绝对主宰。

在现代社会，失去对工人阶级的绝对主宰，无疑便失去了对大半个社会的控制。

可以说，仅是对第一项要求的承认，波兰政府在这次让步中就输掉了它的一大半家当。

21项要求中的第一项“成立独立工会”和第二项“保证罢工者及罢工支持者的罢工权力和安全”是8月30日草签的。

31日，谈判双方就其余19项要求继续协商。

谈判是顺利的，只是第四项，关于“释放所有政治犯，停止因政见问题进行的迫害”，受到了一些阻力。

问题是由瓦文萨提出来的：“我们要求停止逮捕‘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帮助过我们，属于罢工支持者。”“保卫工人委员会”是华沙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于1976年成立的，它的纲领是加强社会的防卫能力，“发展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共同行动”。它的领导人岸龙是原华沙大学经济学讲师。他因在一封长达九十页的《致党的公开信》中抨击“中央政治官僚集团日益腐败、官僚化和庸碌无能”而被开除出党，成为波兰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

“保卫工人委员会”在前几年，曾经帮助过因组织罢工而被解雇的瓦文萨。现在，库龙仍在监狱里。

瓦文萨强调说，“这并不是一个‘保卫工人委员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的问题，我们保护的是人，而不是这样或那样的组织。”主席团成员安·格维雅兹达对这个问题表示了道义上的责任：“如果我们看着他们坐牢而不予过问，那永远是我们的一个耻辱。副总理先生，

如果政府有诚意的话，为什么现在还在继续抓人，我这儿有一份名单。这些人好心好意地帮助过工人，原先把他们释放了，现在他们又被逮捕了。请谈谈这个问题。”雅盖尔斯基作了诚恳的保证：“我发表下列简短的声名：第一，我想重申在我们协议中所表明的，参加罢工或支持罢工将不会受到惩罚，除非触犯了刑法；第二，我想声明，检察机关将作出决定，在明天即9月1日12时以前，释放由它所扣押的人员并释放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提交的名单中的人员。”就要成立的独立工会已经在发挥它的威力了。这是政治史上从无有过的奇迹，工人仅仅用谈判，就迫使政府释放了它的政敌第二天，库龙和另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有了这样的理智和诚意，21项要求的其余部分很快就达成协议。双方商定，协议将于16时签字，并在电视新闻中宣布罢工结束。

签字仪式是在会议大厅的主席台上进行的。

主席台安放着列宁纪念像、波兰国徽、国旗；还有基督殉难的十字架和1970年殉难工人纪念碑模型。

政府委员会的4名成员和厂际罢工委员会18名主席团成员，依次在协议书上签字。

这是令人激动和庄严的时刻，为了寻得这一刻，波兰工人阶级经历了几十年的屈辱和愚弄，经历了可怕的和平时期的流血和死亡；为了迎得这一刻，20万罢工大军，纪律严明地抵制了威胁和利诱，坚持了整整17个昼夜这是浓缩了工人阶级几十年所有希望和绝望、狂热和沮丧、焦虑和快慰的17个日日夜夜。

这是神圣得令人压抑的一刻，是屏住呼吸唯恐失去的一刻。

会场内外一片沉寂，只有在双方交换文件后，当瓦文萨用抖抖索索的手将这份著名的格但斯克协议小心地放入他那破旧的文件夹时，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才迸发出来……

这时的时钟指在16时56分1980年8月31日16时56分……

现代史上，战果最辉煌的一次罢工就要结束了，人们除了欢呼之外，有没有充满困惑和思考？这是难以判断的。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会引起许多充满敬意的铭记它是值得铭记的。

最后一刻是由瓦文萨宣布的。

瓦文萨首先表示了一个胜利者对对手的敬意和期望。他对雅盖尔斯基和他所代表的政府说：“我想再一次感谢副总理先生和一切不允许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力量。

我们没有使用武力，而是通过会谈和说服的途径，结束了我们的争论。我们的行动表明，波兰人只要他们愿意，总是能够互相谅解的。我们将记住这一点。我希望，那些签定的东西，将能得到准确、完全的遵守。我相信，这对大家有好处。“接着，瓦文萨将视线转向摄像机、转向全波兰，他说：”亲爱的人们！9月1日，我们将恢复工作。我们大家知道，这一天对



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在这一天会想些什么想的是祖国，想的是民族事业，想的是家庭的共同利益，这个家庭叫做波兰……

“我们的新工会从明天开始生存。让我们关心她，使她永远是独立的，永远是自治的。我们以波兰人对待波兰人的方式通过会谈和谈判这个唯一的途径达成协议，期间作过一些小小的让步，这从来都是应该的。我们现在明白，我们必须一起把颠倒了的一切颠倒过来。首先我们必须感觉到我们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我们将怀着这样的感情来进行工作为我们大家，为国家利益，为波兰进行工作。

现在，我宣布，罢工结束！“会场里、会场外全体起立，工人们满怀激情地高唱国歌；或许，此刻全波兰都在高唱国歌。

瓦文萨流泪了，工人流泪了，几个主席团成员跑出摄像机的镜头之外，跑到小房间里把自己关起来，哭了……

波兰工人阶级终于登上了波兰的政治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们将担负更加沉重的历史重担，面临比争取独立工会更加艰巨的历史使命与执政党合作共同承担起波兰的命运。

问题是，执政党不可能心甘情愿与瓦文萨和他的团结工会在国家事物中平分秋色，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波兰工人阶级与波共必将在一个全新的战场上，用双方都陌生的方式进行较量！

或许，这才是这部壮丽的史诗更精彩的部分……

瓦文萨与波兰团结工会（五）

赵启强

本文系作者大著光荣的荆棘路——改革家们第五篇（五）

十九

盖莱克因妥协而受到制度的惩罚，成为人民波兰第三个为制度承担责任的领袖；然而，新上台的卡尼亚就能赢得这场从未见识过的战争吗？

波兰工人阶级是以三十多年的苦难和两次大规模的流血为代价，才丢掉了由上面来倡导社会主义民主的幻想而认识到改革的决定性动力必须来自社会全体。

1980年8月，经历了十七个绷紧神经的昼夜，挺过了充满恐怖、焦虑和随时都可能失败的十七个日日夜夜，进行了无数次既尊严又理智的谈判之后，波兰工人阶级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新的时代1980年8月31日，波兰政府终于对工人阶级作出让步，在格坦斯克签署了同意工人“建立独立于党和雇主的自治工会”的协议。

波兰工人取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胜利；更重要的是现在工人手中握有保持住这个

胜利的武器一个持久存在的威慑力量，而不会象1956年和1971年那两次，用流血赢得的让步很快就化为乌有。

在波兰共产党一方，格坦斯克协议的签定，意味着它作出了一个无可奈何但又是伟大的历史性妥协她率先在整个共产世界作出榜样：从法律上允许一个强大的党外反对派存在。

然而问题是，如果波兰共产党能长久地容忍在它身边有一个人数更多的、真正独立的工会存在，那就意味着放弃了在波兰的绝对统治。这是这个制度所不能容忍的至少它不能长久地接受这次妥协。

有了这一点，我们就敢断定：格坦斯克协议的签订绝非工人阶级与国家对抗的结束，恰恰相反，这两种力量将在一个全新的战场上用双方都陌生的方式进行较量。

东欧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战争。

历史刚刚将炎热而又多事的八月送走，充满着迷一样的九月就降临了。于是全世界的政治视线仍然不能离开波兰这个舞台，这幕伟大而悲壮的历史剧还要演下去。

第二幕是由制度对领袖人物的惩罚开始的。

即使盖莱克是奋斗到最后一刻才被迫对格坦斯克工人作出让步，他也立即受到了制度的惩罚。

作为这个制度的最高维护者，盖莱克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渎职罪。在他以前，领袖的渎职行为只限于政治、经济策略上的失误所造成的政治动乱或经济危机，这些危机最多使这个制度不能十分正常地运行而已。可这一次的伤害是致命的，它危及到这个制度的存在。

格坦斯克协议签定后的第五天，盖莱克就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

80年9月5日，在突然召开的波共六中全会上，盖莱克被解除了第一书记的职务。

制度将这位在西方的文化、政治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很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政治家，改造成一个专制制度的代理人，然后又毫不留情地将他的政治生命扼杀。

盖莱克是人民波兰历史上第三个落到这种下场的领袖。

在波共的四任领导人中，除了贝鲁特是死在领导岗位上外，其余的都没能体面地离开政治舞台。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制度要它的代理人作出这么多牺牲、需要这么多的殉难者！

这是这个制度给另一方造成的劫难。

1971年初，在刚刚上台的盖莱克与人民的岁月中，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愿望：他要尽力解决波兰的危机，等把国家搞好了，他就引退。他要开这个自动退职的先河。然而十年后的今天，他被新闻界描写成一个"自始至终抓住权力不放"的专权者而被可耻地赶下台去。

从1970年8月到1980年9月，盖莱克把哥穆尔卡式的悲剧从头演到尾，连结局都是雷同的他们俩都是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政治局解除职务的，理由都同样是“出于健康原因”；他俩也都是在医院里得知对他们政治生命的死刑判决的……

然而这些相似仅仅到此为止。当这位白头发的前矿工被赶下台之后，我们在波兰看到了与以往领袖更替完全不同的反应。

这不是偶然的，它或许能证明那个“领袖便是祖国”的时代终于不可挽回的结束了1956年的哥穆尔卡和1970年的盖莱克取代了他们的前任，登上了权力阶梯的最高一级时，整个新闻界都在“向新领袖表示敬意”而呐喊。下了台的统治者还来不及摘下王冠，整个波兰便已经呼喊起来“老国王死了，新国王万岁！”尽管老国王还可能活十年或者更久。

然而这一次，波兰人民对这种在以往看来几乎是改朝换代的领袖下台，表示出惊人的淡漠。

在53岁的卡尼亚接替盖莱克的当天，一位美联社记者在华沙街头问一位卖报的妇女，对党中央的改组有什么想法时，这位显然不会有很高文化素养的波兰妇女回答：“人事变动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卡尼亚只不过是另一个官僚而已。”这位平民妇女一语道出了波兰人民的成熟推翻领袖，改换政府是无法打碎官僚政治的，之后肯定又会产生一个新的官僚政体，而且它一定比原来的更糟。

在上层，我们也同样看到了时代的变化。新上台的领导人已无力扮演那种万能的救世主了。以往，新领袖会向人民强调危机当然是前任造成的危机但总能对克服危机表现出政治家的自信，同时会用雄心勃勃的计划去鼓舞人民。

这一次，人民听到新领导的第一次讲话，却是对领袖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否定。

9月5日，突然被任命为第一书记的卡尼亚在没有来得及准备讲话稿的情况下，发表了他当选后的第一次讲话。

卡尼亚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人民波兰、党会面临象今天这样如此错综复杂的问题；更没有想到你们所赋予的、责任如此重大的职务会落对我的肩上。

中央委员会一致选举我为第一书记使我为之震动。有一些发言里说我应该成为党的领袖。不，同志们职务不能把人造成领袖，再说，我也不敢肯定，我们党是否就需要领袖……”并不是个人品质的谦和，或者是资历浅薄才使这位新领袖的第一次演讲如此欠缺力度。53岁的卡尼亚曾经领导过很有权力的党中央行政部，并且从1971年起，他就担任着负责警察、军队和公安的中央书记。

真正的原因在于，卡尼亚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他能清醒地认识到：只要工人的强大组织存在着，领袖和他所代表的政权，便无法扮演那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伟人形象。

新任第一书记卡尼亚并没有至高无上、君临一切的感觉；相反，他一登上历史舞台，便

看到一个高大的对手虎视眈眈地站在他的对面那正是早他 5 天登上台来的波兰工人阶级。

卡尼亚产生了任何一个领袖在此刻都不会有的那种苦涩感，于是他说了上面那一段话；同时，卡尼亚还感到，必须对这位强大的对手表示善意。于是他又说："我主张真正更新工会，以使它成为工人利益和完全自治的有效捍卫者，成为行政的伙伴。"卡尼亚慷慨地把自己的权力交出一部分，愿意与这个对手共同统治波兰。

然而，即使在此刻，卡尼亚也十分明白，双方不会成为真正的伙伴。自己被送上台来。正是要与这个强大的对手进行角斗；同样明白的是，他和这个对手根本不是同一个量级。

卡尼亚必须进行角斗即使必败无疑，也得向前出击，他得为这个制度赢用重新培养一个重量级斗士的时间……

二十

面对着突然变得和善世界美国总统里根接见了瓦文萨的父亲；政府给了他一套住房从来没有害怕过失败的瓦文萨反倒表现出对胜利的畏惧……

强大的波兰工人阶级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但远没有在这个舞台上站稳。对面，是一个五天前还握有对她实行生杀予夺大权的对手。尽管对方被迫同意她站到台上来，但远非心甘情愿。对方肯定随时都想将它排挤下去。

这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整个东欧都不能给波兰工人阶级提供这方面的蓝图。波兰工人阶级必须与这个随时都想把她赶下台去的对手合作，而不是把对手彻底打垮尽管要把这个目前颇为虚弱的对手赶下台去并不困难。

从这个意义讲，波兰工人阶级同样面临着一个全新的、伟大的历史性妥协：她必须放弃政治斗争的传统目标夺取政权，甚至放弃使现政权陷入崩溃的任何过激行为；同时，它还得放弃建立自己的政党的长远目标，而只以能够对各级政权进行监督，对政策的制定进行干预、参与为满足。

这就是即将成立的独立工会和瓦文萨所面临的艰难的历史使命。这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

现在，瓦文萨已经堂而皇之地坐在格隆德瓦尔大街 1 0 3 号的一间房子办公了，即将诞生的独立工会总部将设在这里。

瓦文萨仍然穿着那件皱巴巴的褐色外套，8 月的胜利似乎并没有把他变得尊贵，用他的话说"我还是我。"但实际上，这位一个月前的失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和人生道路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9 月 1 日，美国总统竞选人里根在美国会见了瓦文萨的父亲。瓦文萨双亲是 1 9 7 3 年

到美国去探亲的，他母亲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后，他的当木匠的老父亲便留在美国的瓦文萨家族那里。

里根对老瓦文萨的会见，标志着瓦文萨已成为世界级的工人运动活动家。这无疑是瓦文萨个人生活的新起点。

在此之前，瓦文萨已经四年没有固定工作，只是靠做临时工和朋友接济维持家庭生活。四年来，他四处奔走寻找工作都是徒劳。

瓦文萨说："不管在那个工厂，只要人事科长看了我的劳动手册，刚才还空着的位置马上就没有了。"现在这个使他饱受凌辱的世界突然在他面前变得和善、谦卑了。

最早的青睐是从政府方面传过来的。

瓦文萨被告之，由于他将是全国最大的工会领导人，他有权获用按这个国家等级折算标准，相当于一个部长的优厚待遇也就是说，他有权拥有汽车、别墅和高薪。

瓦文萨非常坦率地拒绝了政府的厚意。他说他的新工会将是非官方、非政治性的"纯社会组织"。还有，红衣主教维辛斯基则干脆建议他"接受官方工会的领导职务。"他当然也拒绝了。

瓦文萨个人生活的变化是他的八口之家得到了一套客 1 1 4 平方米楼房套间。对一个波兰工人来说，这算得上豪华的住宅了。但这并不是一场交易，连外国记者都对此评论说，瓦文萨毫无羞愧地接受了这个明显带有政治含义的礼物，说明他心中没有鬼。

瓦文萨首先要适应的是自己心理上的变化这位靠着果敢和自信，靠着工人对他的神秘莫测的信任使波兰、东欧以及那类有着与波兰相同危机的国家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的工人斗士，居然在初次胜利后表示出胆怯。

9 月 1 日，也就是罢工斗争胜利后的第二天，一位美国电视台记者向瓦文萨："在反对波兰执政党的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您从来没有害怕过遭受失败吗？"瓦文萨回答："不，没害怕过失败。"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了一句："但是，我倒害怕过我们会胜利。"这句话显示出瓦文萨具有惊人的现实感。8 月的胜利带给瓦文萨的将是全新的、更加重要、更加艰难的工作。他肯定已经意识到，靠盲目的自信和蛮勇是无法承担这副更加沉重的历史重负的。

9 月对瓦文萨来说，是一个更加伟大而陌生的开端，他得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是什么样的新工会工作。他如何才能使工人在 8 月的斗争中所获得的权力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这当然是一道极大的难题。因为从来没有独立工会在一个一党制的共产党国家活动的经验。

为了解开这道难题，瓦文萨辞掉了他在列宁造船厂刚刚恢复不久的公职。面对着这项陌生而艰巨的工作，这位以自信和勇气著称的工人领袖，对自己的能力有了较为保守的重新估计：瓦文萨首先宣布，他的新工会应该局限在格坦斯克，最多也只局限在沿海地区。

他说："我在这里有很多工作要做，我顾不上波兰其它地方了。"然而，就如任何一位被人民选中的政治家一样，一旦登上历史舞台，便会被历史的潮流所左右尽管这些政治家常常因为能驱使和决定多数人的行动、命运，而误以为自己在决定着历史的进程无论他是不是真正具备和他的位置相称的能力，他都必须干下去；无论结局是成功还是失败，他必须走下去！

1980年的波兰既然选中了瓦文萨，他就不得不干历史注定了要由他来干的事情。

就在瓦文萨表示自己的自信和能力只能承担格坦斯克地区的新工会工作几天之后，华沙以及西里西亚等地新成立的独立工会，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派代表去格坦斯克向瓦文萨取经。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工会代表聚集在格坦斯克，并且否定了瓦文萨的意见而提出筹建波兰统一的独立自治工会。

9月17日。来自波兰各地的独立工会代表在格坦斯克会晤。会议产生了成立一个全国性独立工会的提案，总部将设在格坦斯克。

这次会议有250名代表参加，他们代表着31个城市的数十万工人。在闭幕会上，瓦文萨向全波兰宣告："我们建立了一个象中央权力机关的组织，我们现在已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每一届政府都必须认真对待。谁都不该对我们的组织制造困难。"显示了力量之后，工人阶级又表示了对波兰命运的责任。

会议的最后决议说："自由工会感到，它们应该为目前的经济形势分担责任，我们希望对战胜当前的危机有所帮助。但是这一切只有当局不设置障碍才可能实现。"五天后，全国36个独立工会再一次在格坦斯克聚会，通过了独立自治工会的章程，并且用瓦文萨的一句口头禅"注意团结"，作为新工会的名称。

团结工会诞生了。独立自治工会获得这个名称之后，她的形式和宗旨也就变得明晰了她应该是波兰工人力量和团结的象征。

这时，报名参加的所属工会已拥有300多万会员。

团结工会的全国性机构是全国协商委员会，下面设有主席团、以及社会工会事务中心、出版宣传等办事机构。

全国协商委员会是决策机构，瓦文萨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

这一切都是在不声不响的平静中完成的。

波兰很少有过如此的平静，历史很少有过能在如此平静中获得巨大进步的时机。

为了抓住这个时机，波兰各阶层都在行动：先是教师们成立了独立工会，接着是波兰人民军的文职人员于9月17日也决定成立独立工会，以代表军中文职人员的利益。

为了不放过这个历史时机，连最喜欢大喊大叫、惊天动地的大学生都开始默默地、迅速地干起扎扎实实的实事来自波兰各地的大学生代表，9月27日在格坦斯克聚会，决定按照瓦文萨的独立工会的方式，成立独立学联，以与官方的"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分庭抗礼。

"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是波兰唯一的、官办的学生组织，波兰48万大学生中，70%以上属于它。

8月是激烈的，9月是平静的；8月是艰难的，9月是辉煌的。到9月底，当团结工会全国协商委员会向华沙地方法院呈递批准章程的注册申请时，它已经拥有500万会员了。

9月在政府方面也是平静的。它并没有表现过反悔的举动，也没有对迅猛蔓延全国的独立自治运动进行干扰或发出威胁的警告。

如果政府方面的平静是由深刻的反省、检讨以及伟大的历史性妥协构成的，那么，我们将为波兰感到高兴；但我们又会对历史的进程如此顺利而表示怀疑那么，这平静到底是惊魂未定的养息，还是一时无法找到对策的惆怅？

9月就要默默地逝去，政府克制地行使着它那已被大大削弱了的权力，而工人在迅速建立全国性统一行动指挥机构的同时，仍在默默地尽自己的职责劳动。

打破平衡的，是在9月29日，团结工会的发言人宣布：将于10月3日在波兰全国举行一小时警告性罢工，以抗议政府没有实现增加工资和让团结工会使用宣传工具的诺言。

发言人说，警告性罢工将在10月3日到底下午2时至3时举行，罢工只限于1500工人以上的工厂。小企业是否要以罢工进行声援由他们自己决定。

这次罢工的宣布是克制的、有理智的，同时也给了政府留有挽回的余地：工会表示，如果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能在全电视上露面，表示将履行上月为结束罢工答应的一切条件，并让新工会使用宣传机器，工会将取消罢工。

团结工会第一次显示了她的力量。这是充满理智和节制的力量，它不是咄咄逼人的一个小时的罢工毕竟算不了什么；何况还给政府留有4天处理危机的时间……

9月终于平安地过去了。一进入10月，我们就发现，9月的平静原来蕴藏着更大的风暴。

对抗开始了：10月3日，一小时警告性罢工按计划、有序地举行了。

独立工会重申要求办一份与官方工会报纸《劳动之声报》具有同样规格的全国性日报，要求使用官方出版社、以及要求地区和全电视台、广播电台为独立工会提供广播电视时段。

罢工是在"波兰的未来掌握在工人手中"的口号声中结束的。

瓦文萨对这次罢工表示满意，他说："我们表现出我们懂得如何发动罢工，如何结束罢工.....这就是我们所需要达到的目标。"10月4日，新任波共第一书记卡尼亚在中央全会上严厉地谴责了这次罢工。

10月6日，团结工会却以更加严厉的口气反驳了卡尼亚的谴责。工人方面说："如果卡尼亚不理解这次罢工的理由，那么他必须做的事，就是到我们这里来看看。我们要求他本周就来。"同时，团结工会还要求卡尼亚在电视上公开解释对一小时警告性罢工的批评态度。

团结工会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和尊严，她能以数百万工人的名义向最高领导人发出命令，而不再害怕某一个领袖或某一个政党对她的行为进行指手划脚地干预了.....

然而，这支实际上存在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却不能顺利地得到法律的承认。

10月5日，华沙地方法院审查了团结工会申报注册的文件后，提出了三点意见，拒绝给团结工会登记。

这三条意见是：1、在团结工会的章程中没有提到党的领导。

2、章程规定工会可以到波兰各地广泛展开活动，而8月的格坦斯克协议则明确规定只在所属地区展开活动。

3、章程规定，不准许政治组织的负责人在团结工会中担任较高级别的职务。法院认为，这项规定违反人权。

政府想通过法律手段，使新工会在通过章程时被束缚住。

团结工会于10月7日驳斥了华沙法院对工会章程提出的反对意见，同时致信政府当局，对法院的反对意见表示惊讶，对可能由此引起新的对抗表示了担忧。

面对着数百万工人的强硬立场，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克制态度。10月14日，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布翁斯基打电话给未得到法律承认的团结工会，约见主席团全体成员。

团结工会则表示，无论主席团是否去参加这次会晤，都不会向政府当局让步，不会改写工会章程。

瓦文萨说："团结工会已有600万会员，不管有没有法律承认，都会进行活动。"10月24日，华沙法院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决定给团结工会登记注册，但却擅自给团结工会提交的章程增添了一条关于承认共产党领导作用的条款。

华沙法院对工会章程的改动，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团结工会愤怒地拒绝接受法院对工会章程的批准。瓦文萨在当天晚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瓦文萨谴责道，法院在最后一分钟对章程作单方面的修改"是违反我们意志的，是没有得到我们同意的。我们认为，这个事实是令人厌恶的。"瓦文萨向新闻界宣布：团结工会将



就华沙法院科希切尼亚克法官的裁决，向波兰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这次围绕着是否承认共产党领导的争执经历了半个月。此期间，还未从8月失败中缓过劲来的政府当局，采取了痛苦的退却，希望双方能寻得妥协的解决方法。

在此同时，以政府总理平科夫斯基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和以瓦文萨为首的40人工会代表团于10月31日举行会谈，作出实际上承认团结工会的姿态。

政府对工会提出的许多要求作了肯定的答复基本上同意团结工会出版一份周报；准备向团结工会提供电视播出时段，下令发还几周前被华沙机场海关警察扣留的西方工会送给团结工会的印刷设备；甚至还同意了工人有权决定提薪如何分配的要求……

独立工会存在的意义已经显露出来了它使政府有了一种新的行政方式：政府在作任何决定时，不得不考虑到身边这位并不温顺的伙伴会有什么反应……

团结工会的确不是温顺的，即使政府有了这样的耐心，有了这许多让步，她还是不愿意接受一种隶属关系而要求平等伙伴式的地位……

## 二十一

波兰政府和最高法院选择了妥协。历史应该记住这些作出过伟大历史性妥协的政治家。如果没有妥协，世界便只会有战争而不会有政治。

11月初，政府当局无法回避的对团结工会能否真正独立，作出法律上的最终判决时，全波兰都屏住呼吸、注视着团结工会的诞生，将是历史的顺产，还是一次更大规模的社会对抗？

人们的紧张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团结工会中的激进分子早在10月24日华沙法院裁决下来的当天，就要求总罢工；瓦文萨虽然坚持要慎重考虑，但也明确表示过，如果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那么团结工会将于11月12日，也就是国庆日的第二天举行全国性的总罢工。

这又是一次只要具有常人头脑就不难作出的选择除了妥协，政府别无选择，最高法院别无选择但问题是，在人类政治史上，不是有过许多连常人头脑也不会作出的愚蠢的政治判断和政治决策吗？因此，波兰仍然紧张地等待着11月10日最高法院的开庭，紧张地等待着可能使双方难以避免的摊牌。

这次开庭进行了三个半小时，最高法院终于作出了被西方记者称之为“出人意料之外”的裁决支持了团结工会对华沙法院强行修改工会章程提出的上诉。

波兰政府又一次以它无可奈何的历史性妥协，为共产世界的独立工会运动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最高法院休庭后，瓦文萨和团结工会其他领导人从法院走出来时，耐心而平静地在法庭外面等了三个多小时的大批群众，对他们长时间地欢呼。

瓦文萨用扩音喇叭对群众说："最高法院今天干了一件漂亮事。我们没有改变章程中的一个标点符号，更没有删去其中的一个字。"瓦文萨同时对大批守候在这里的记者宣布，团结工会取消了举行全国性罢工的计划。

瓦文萨强调了团结工会这次重大胜利的意义，但他又说："谁也没有失败。"是的，政府作出了妥协，支持了工人的上诉；而工会也作出了妥协，同意将华沙法院增加的那一条款放到工会章程的附件中。

波兰当局和瓦文萨都无需对这样的妥协惭愧妥协是政治艺术中最必要、最伟大的技巧……没有这个技巧，世界便只会有战争而不会有政治。

因此，历史不仅应该记住英勇卓绝的斗争，也应该记住作出过伟大历史性妥协的政治家这在8月是盖莱克，在11月则是卡尼亚和瓦文萨……

尽管双方的强硬派都认为自己一方向对方屈膝让步，但波兰毕竟获得了一个不小的历史进步。这在人与历史的搏斗中无疑是一个巨大胜利。

政府方面没有庆祝这个胜利，可见政府中强硬派具有的实力；工人方面的强硬派从这个妥协中感到了投降的耻辱，他们扬言要于11月12日举行罢工。

然而就工会一方论，瓦文萨毕竟比卡尼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所以冒冒失失的工人激进分子没能将他们的过激行为付诸实践。

当天晚上，在华沙的一家最大的剧院里，团结工会以一场座无虚席的义演音乐会来庆祝自己的胜利。

当瓦文萨以快捷的步伐走进拥挤的剧场时，受到了狂热的欢呼。这位一米六零的小个子男人，以他那简洁、快速的语言和富有煽动性的激情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人们想到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和希望的列宁时代，想到了同样是矮个子、同样具有奔放热情的列宁……或许，有人会对这样的联想表示抗议。

是的，瓦文萨不能与列宁相提并论。列宁是革命的化身，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受敬仰的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人物；还有他那渊博的学识和巨大的思想力量……这些都不是瓦文萨可以比拟的。

然而此刻，人们明明感到了一股巨大历史冲击力，明明感到了一位史诗中的民族英雄凸现在眼前。

是的，是的，这感觉是正确的，这是可以比拟的两个历史瞬间那一次，列宁作为人民的代理人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刻，登上舞台的是人民自己；那一次，列宁被认为是民族的英雄、人类的英雄；这一刻，波兰也寻得了自己的民族英雄这位民族英雄就是工人阶级。

庆祝仪式的高潮是舞台上的一位演员演唱一首振奋人心的爱国歌曲《让波兰重新成为波兰》。

女演员动情了，毫无掩饰的流着眼泪。突然，她哽噎住，唱不下去了。她害羞了，用她双手掩住满是泪水的面孔……一个观众站了起来，接着唱下去……

观众一个接一个地站立起来，加入到这个没有任何人号召、指挥的合唱中来……

人们歌唱着，泪流满面，他们终于找回了失落许久的波兰，终于找回了失落许久的自己。从此，波兰将重新成为波兰，人民将重新成为人民……

## 二十二

团结工会认为"彻底的职工自治"才是社会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认为工人阶级只有首先控制了生产，才能最终成为社会的主人。

团结工会提出了六十年前就有过的旧话题……

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决战，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妥协，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进步都十分成功的完成了。波兰该松一口气，波兰人该去恢复最终能使他们进步的社会生产了。这不仅是党和政府的意见，也是团结工会领导人和人民的意见。

瓦文萨在最高法院判决下来的当天，就向全体波兰工人阶级呼吁："我们的要求已经全邻得到了满足，波兰工人现在必须回去工作。"社会最终得靠生产维持，工人最终得干活。工人在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获得了应有的政治权力之后，他们最终还是得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劳动，这与几个月前是没有差异的。

难怪一些看透了政治的虚无主义者会说，"闹腾什么？工人到什么时候还不是干活！"然而，1980年11月，当波兰工人阶级经历了这次历史性震荡重新回到生产岗位后，他们有了一种全新的体验原来使他们对工作产生厌恶和负担的并不是劳动本身，而是无权的卑微和令人忿慨的不公正。他们并不嫌弃劳动，并不想让厂长来替代他们工作，他们厌弃的只是那种与己无关的强制性劳动。现在，不公正和邪恶并没有因独立工会的成立而立即消失，但工人们惊讶地发现，以前那些令他们忿怒的不公正开始变得躲躲闪闪，而不象以往那样肆无忌惮了。

工人们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和尊严，感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人的存在他们可以思考怎样使不公和腐败少一点，可以对其进行抗议和纠正了。波兰工人阶级有了干预的欲望，也有了干预的可能他们现在有一个强大的，随时可以动用的常规力量团结工会；他们不再为临时集合这种力量而遭受另一种常规力量的镇压了。

波兰工人阶级能有这种新的感受，我们才可以说，团结工会的意义不仅仅是她取代了官方工会，不仅仅是瓦文萨取代了官方工会主席克鲁契克，不仅仅是一批不再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取代另一些寄生在工人阶级身上的工会官员。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前几天，政府和团结工会就共产党在工会中的作用的较量会那样顽强？这种语意上的争议，在局外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却将决定团结工会会不会变成另一个官方工会。

团结工会仅仅是工人阶级参与国家治理的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参与。团结工会对国家事务的干预可能获得什么样的成就？政府当局对它勉强承认的行政伙伴的干预，到底能容忍到什么程度？

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全新的历史课题。

双方都带着各自的全新战略目标开始了第二个回合的战斗。

对共产党国家的人民来说，参与政治并不是陌生的概念。几十年来，党和政府经常发出号召，要人民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然而以往所谓参与政治，只意味着参加到政府一边模范地执行政府的各项政策法规；意味着站在党的一边参加共产党，成为党的一名战士！

现在，波兰工人必须将无条件拥护，变成共同承担国家命运的政治参与。

另外，就要行使政治权利的波兰工人还面临着另一难题：几十年来，工人阶级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他们的政治能力已经萎缩，他们能担起这副新的历史重担吗？

波兰工人阶级必须学会承担国家责任，必须为自己的历史利益创造时机。

工人阶级在六十年前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而半个世界至今还在吞食的苦果，正是六十年前的那次巨大时机的流失所至那就是俄国工人阶级在生产上和政治上当家作主的的机会……

二十年代初，以全俄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亚·施略普尼柯夫和苏共杰出的女革命家亚·米·柯伦泰为首的“工人反对派”，在联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重申了联共党纲中关于“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集中到自己手中。”的工人自治原则。

为此，“工人反对派”提出“把国家工会化”；“工人阶级的最高形式不是党，而是工会”；“我们要消灭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国家经济部门中的官僚主义”；他们反对“一长制”和“党在政治上的最高权力”，认为这是苏埃维政权开始蜕化变质的主要原因。

工人反对派的立场遭到了列宁的坚决抵制。

列宁正是“一长制”的提倡者，他的观点是，“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怎样才能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的统一呢？这就只有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盟友托洛茨基则更加激进。

托洛茨基提出“劳动军事化”的口号，说劳动“对全国来说是义务性的，对每个工人来说

是强制性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工人反对派"却坚持工会对工厂和国家的管理权力，他们认为集体管理是"无产阶级的、有别于所有其他社会阶级的、特殊的、独树一帜的标志。它是最民主的组织原则。"柯伦泰对"一长制"的反驳更为尖锐。

她说："如果不相信工人集体的创造能力"，那就必然"鼓吹这样一种幼稚可笑的信念，即可以通过官僚主义方法实现共产主义。"奥新斯基则在报上撰文，发出了在今天看来绝非危言耸听的预言性警告："我们赞成凭工人自己的阶级创造力来建设无产阶级社会，而不是凭借'工业巨头'的旨意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以信赖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和积极性的阶级能动性为出发点。假如无产阶级本身都不知道怎样为社会主义劳动创造必要的先决条件，那末，就没有任何人能为无产阶级作到这点。任何人不能强迫无产阶级这样作。如果对工人举起大棒，那么，这根大棒不去提在另一个社会势力手中.....就是握在苏维埃政权的手中.....到那时，苏维埃政权就将把自己毁掉，而不成其为无产阶级专政了。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必须由无产阶级自己去创建，否则，就根本创建不起来；某种别的东西合被创建起来，那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在这场关于集体管理还是"一长制"，工会管理还是国家管理的争论中，几乎"所有的工会代表都倾向于集体管理，而所有我党领袖都反对这一点，因为他们都喜欢从国家体制的角度来评价一切事务。"1920年月，列宁与托洛茨基联合起来，极力要求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党员接受"一长制"和"劳动军事化"的建议，但在60多名党员代表中，只两人支持他们。

"列宁在过去从来没有遭到过这样断然的拒绝。"在这场党的领袖与工会的领袖的分歧中，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与它自己的政党之间的第一次对抗。

党战胜了工人阶级。联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工人反对派"被宣布为非法组。

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绝没有任何谴责的意味。即使在60年前那场争论的结论已经十分明显的今天在国家资本主义不能带来社会主义，而只会使社会主义政权蜕化、被冷酷的官僚主义权力取代的警告已越来越被历史证明的今天，我们也无权说谁比列宁更聪明更伟大。任何这样的比较都是愚蠢的、狂妄的。历史比任何优秀的历史学家所能理解的都更复杂，也比任何杰出的领袖更有力量。

我们展现出无产阶级在60年前往有过的这次机会，是要为历史不允许这个时机成熟而表示遗憾，同时也为人与历史的必然失败的对抗表示敬意。

六十年过去了，但它在历史巨册上却只是薄薄的一页，所以，我们至今仍难判断，工人阶级掌握自己命运的历史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然而，这无关要紧，我们至少可以做做六十年前人们做过的事，至少应该比六十年前有更多的勇气和更深的认识。即使我们又失败了，也会留下更多的经验和更壮观的创举，但如果我们错过了历史时机，却只会留下耻辱。

因此，无论历史的时机是否成熟，波兰工人阶级都必须做下去象他们的前辈所做过的那样。

新成立的团结工会一开始就表明她的存在是任何政治反对派所无法取代的，他所显示的

威力是任何空洞的思想力量所无法替代的。

有了自己常设组织的波兰工人阶级，可以迅速对违背他们意志和利益的事作出反应，即使这些事件是微小的、还没有造成灾难性后果。

11月14日，在波兰南部的琴斯托霍瓦省，省长给工厂经理下令阻挠新工会的活动撕掉工人张贴的布告，不准新工会使用厂里的广播和印刷设备立即受到团结工会的强烈抗议。

团结工会琴斯托霍瓦省的负责人与省委书记谈判，对省长使用紧急状态这个词表示抗议，并要求撤换省长。

省当局不得不重视来自工人方面的抗议。

在格坦斯克，卫生、文教系统的团结工会会员进行了静坐罢工罢教，要求提高工资和从国家预算中拨更多的钱用于文教事业。

这个地区的团结工会敦促省政府尽快就教师和医务人员提出的要求举行谈判，否则，工会将号召学生举行同情罢课。

团结工会的警告是很具有权威的。11月14日，波共第一书记要求会见瓦文萨，讨论格坦斯克的知识分子问题以及波兰的社会、经济形势等问题。

或许，在这次会谈中，瓦文萨并不能拿出比政府智囊人物更深刻的见解和更有效的对策。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在于，政府终于懂得在处理任何社会问题时，应该先征求一下人民的意见；这次会晤还表明，团结工会已被承认为共产世界中唯一一个国家里的一支强大的独立力量。

我们强调这次会晤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并不是以往没有过最高领导人和基层人士的接触；相反，这类国家比西方有更多的领导人接见某位工人或某位农民的新闻报导。但这类接见多是一种姿态。我们常常从空洞而虚伪的关切中感到了居高临下的气势和巨大的等级差别。

以往的这类会见，在劳动者方面是由于他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领袖的颂扬、敬意和忠诚；在领袖方面，则是出于对政治忠诚者的嘉奖。

11月14日卡尼亚对瓦文萨的会见则是平等的。事后，瓦文萨称这次会谈是“坦率的、无话不说的。”他说：“我觉得，我们已经互相谅解了。”谅解是一回事，消除社会危机又是另一回事。如果国家与社会的对话不是中断了几十年后才开始，那么这次领袖与人民所达成的谅解或许能为波兰带来安定的政治局面和经济发展的时机。

几十年遗留下来的问题太多了，既然人民参与政治无法避免，那么暴露这些问题同样无法避免。无论卡尼亚和瓦文萨能有多么真诚的和解愿望，工人参与的结果不可能是和解和安定，而是迅速使被掩盖、被粉饰着的矛盾、危机暴露了出来。

暴露出来的危机必然加深双方的对抗……

光荣的荆棘路 上一页 下一页 原著选读

瓦文萨与波兰团结工会（六）

赵启强

本文系作者大著《光荣的荆棘路改革家们》第五篇之六

二十三

工人阶级与政府的对抗开始涉及到这个制度最本质的方面团结工会要求就警察对社会权利的肆意侵犯进行调查，并从根本上予以铲除。

在降低物价、改善生活、工人自治、退出华沙条约以及新工会直接使用宣传工具等重大决策上，团结工会的观点与政府当局的观点相去甚远。政府的让步很有限，只同意团结工会每星期六利用国家电台作一个小时的播出，介绍一周中工会活动情况。

为了迫使政府接受来自工人方面的要求，团结工会采取了强硬态度。局势再度紧张。

11月22日，团结工会华沙分会宣布，准备在华沙举行总罢工，以抗议警察当局在头一天对团结工会华沙总部的搜捕。

21日的被捕是由十几名秘密警察采取的突然行动。

警察搜走了政府在10月底发出的一份关于如何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绝密文件，并抓走了与此文件泄密有关的工会工作人员和一名政府印刷厂工人。

11月27日，政府作出让步，释放了21日逮捕的两名工人。团结工会作出相应回答推迟了在华沙举行总罢工的计划。但华沙钢厂的一万多工人的罢工却未复工。

团结工会没有因警方放人而罢休。为了彻底制止警察力量对社会权利的肆意侵犯，团结工会就这次搜捕事件向当局提出立即进行谈判的要求，并拟定出谈判的内容：1、释放所谓的反社会主义分子；2、成立一个议会委员会，研究警察局、保安机关和检察当局的法制观念以及它们滥用权力的行为，以保卫社会的权利；3、审查负责镇压1970年和1976年工人示威的那些人，并公布党中央有关1970年波罗的海地区骚乱的文件；4、为了同国家严峻的经济形势相适应，应该限制内务部的预算。

团结工会华沙分会就这些要求到政府所在地与雅盖尔斯基副总理谈判。

工会发言人说："一旦双方就这些问题的举行谈判达成协议，团结工会将下令华沙钢厂的一万多名工人复工，并撤销在华沙全市现在仍然有效的总罢工戒严令。"工人与政府的对抗越来越涉及到这个制度最本质的方面，并且也越来越多地得到其他阶层的理解和支持。

工会提出要求的当天，华沙大学的学生便挂着国旗和横幅在校园里开始了静坐示威，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并支持团结工会的要求。

团结工会的要求的确是触及到了这个政权的基础。这个名义上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民主国家早已堕落为以警察力量为主要统治手段的警察国家。没有警察的暴力，它肯定无法度过任何一次社会危机。

警察是解决危机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但是，当人民面对着拿着警棍枪支的警察力量时，当那些“公仆”躲在警察的保护力量后面安逸地享受着他们的特权利益时，人民与当局之间的鸿沟被警棍掘得更深了。不再有人相信这是“人民的警察”、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国家”了！

如果没有这种信任，用警棍压制着的危机便永远不会根除。

政府当然不会以它生死悠关的存亡作让步，而工人又不再接受以往那类欺骗式的、或是不痒不疼的让步。双方的分歧很难弥合。

八十年代的第一个冬天就要过去，波兰仍看不到和平昌盛的希望罢工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社会动荡频繁，经济陷入严重混乱。

如果为了眼前的安定，团结工会应尽力采取克制和温和的态度，如果为了长远的繁荣，工会则应该对危机的本质方面进行揭露、并迫使政府作出重大让步以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

团结工会选择了后者。

具有远见的波兰工人阶级没有为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为此，团结工会承受了“罢工和对抗将使波兰问题复杂化”，以及把“波兰推向经济灾难的边缘”的罪名和指责，无私地在敦促政府进行根本性政治改革的斗争中，放弃了一些切身的眼前利益。

11月27日，瓦文萨向华沙钢厂的罢工工人发表讲话，呼吁工人不要过高地提一些物质方面的新要求，不要仅仅盯住眼前的物资利益。

团结工会沉着地在政治上、在似乎与工人阶级无关、却具有长远意义的问题上采取了坚定的措施。

12月10日，团结工会宣布，成立一个以瓦文萨为首的“保卫政治犯特别委员会”，以制止当局继续对那些表示不同政见的人采取镇压行动。这次声明还提到目前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四名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字，表示支持他们的事业，要求政府释放他们。声明驳斥了政府方面关于罢工引起经济危机和持不同政见的活动造成了政治动乱的指责声明说：“正是国家的政策才造成了目前的政治经济局面。”团结工会的这一系列政治措施，无疑使政治上的反对派向合法存在走出关键一步，这无疑是对绝对政治权力的一个有力挑战。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



团结工会以更加成熟的姿态，加紧了政治攻势。

12月16日，50万格坦斯克居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各阶层人士在格坦斯克集会，举行1970年事件被害工人纪念碑揭幕仪式。

仪式开始之前，各工厂的汽笛响彻了整个格坦斯克，停在港口的各国船只鸣笛响应，教堂敲响了钟声。到处都是佩戴着团结工会徽章的工人。拥有900万会员的团结工会组织了这次空前盛大的集会。这个占全国职工总数55%的自治组织，以无人可以抗拒的权威向历史罪恶进行清算，并表明她对国家事务已有着绝对权威的发言权。

对历史罪恶的清算是对现实统治的严厉警告，使之不敢再继续以往的镇压政策。

国务委员会主席雅布翁茨基代表波共和波兰政府，红衣主教马哈尔斯基和主教团秘书达布罗斯基主教代表天主教会，参加了这次夜晚举行的灯火通明的仪式。

波兰三支最强大的力量相聚在同一个讲坛上，在波兰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标志着当局与人民之间合作的时代开始了。比起朝野之间势不两立的对抗，这种和平共处更具有进步意义。

瓦文萨发表了呼吁实现社会安宁和全国和睦的演说。

瓦文萨说：“我呼吁你们保持和平、秩序和尽自己的责任……波兰尤其需要国内和平、需要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信任。”瓦文萨的这次被官方称之为最温和、最和解的讲话，获得了数十万群众的雷鸣般掌声，因为没有人认为瓦文萨的温和是一次妥协；相反，人们都感觉到，波兰人民已经可以在国家的重大事务中和平而有秩序地表态、进行举足轻重的干预，而不会因此付出惨重代价了。

当然，这次纪念活动的和平结束，并不意味着波兰危机的了结。但至少显示了波兰人民的力量、成熟，以及当局的妥协。这一点立即就为全世界所关注。

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就12月16日格坦斯克的这次集会发表了新闻公报。

国务院发言人特拉特纳说：“波兰工人庄严而有秩序地进行纪念活动证明，波兰人只要得到机会，就能够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和平地解决国内问题。”工人阶级敢于对决策当局的失误进行公开抨击和对抗是一个进步，而一个反对派可以合法存在、和平地进行干预则显示了更大的历史进步。如果波兰当局能够接受来自人民的监督，能够使这个强大的反对派合法化，使它的政治干预法律化、秩序化，那么，波兰将在东欧为社会主义民主创立一个最佳形式。

这种自下而上的人民监督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原则，它显然比那种两党或多党制的监督更加有效。

多党制下，政治监督是由一小批职业政客组成的政党去实现的。这种形式下，很难避免社会利益不会在政治收买或政治交易中被出卖。但人民是无法收买的，或者说，能收买

全体人民的政权，意味着它已成为人民的代理人。

遗憾的是，1980年的波共政权，并无接受这个历史进步的真诚，它无意让这种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合法化、永久化，有的只是被迫的妥协和权宜之计的退让……

## 二十四

制度从六神无主的眩晕中清醒过来后，立即停止了痛苦的退却并挑选了一位大将衔的职业军人作为代理人。现在，它强硬起来：团结工会可以合法存在，却不可以合法地行使权力。

团结工会成立后的短短的几个月中，政府的让步是可观的释放了政治犯，默认了工人阶级对国家事务的干预，以表示对工会权威的敬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降低物价、提高工资，以表示愿意为人民的利益而放弃部分特权利益；签定了关于每周五日工作制及工会可以利用舆论工具的协议，以表示承认工会是它的平等的行政伙伴……

但所有这些仅仅是一种表示诚意的姿态，当局没有在制度上作任何实质性让步；相反，随着妥协而来的是咄咄逼人的警告和伺机反击的准备。

11月15日，波兰军报《自由战士报》发表了题为“教唆者”的评论，说“反共犯们将千方百计地向工会运动渗透……波兰所有敌视社会主义的集团都对新工会的出现寄予很大希望，想利用它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11月29日，波兰军报发表评论：“那些力量，不管它们以何种名义，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它们不仅向法律和正义感挑战，而且向波兰的社会主义秩序挑战。”这篇评论还直接了当地警告团结工会“不要在独立道路上走得太远”……

11月25日，波共机关报《人民论坛报》发表社论强调，改革的速度和范围必须由共产党来决定，说“改革必须带有共产党的性质，否则一概不行。”《人民论坛报》的社论写道：“党不仅有责任，而且在道义上、政治上有权利在今天大声疾呼：混乱得够了，不安定得够了。”12月8日，《自由战士报》的调子更加强硬，它强调军队是“人民进行统治的最重要的一环，因此军队将以充分的责任感来看待我们国家的命运。”这家军报还说，“波兰军队是国家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决不会对涉及到我国人民的生活，对国家操心的事和问题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1980年终于艰难地度过去了。双方都没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熟悉历史所赋与自己的新角色既没能熟悉共同行使权力所需要的忍让和默契，也没能掌握在这个新战场上操戈对抗所需要的新战术。

历史一进入1981年，双方就很快熟悉并进入自己的角色首先是团结工会终于明白，即使有了合法存在的权力，她也别指望当局会自愿将属于工人阶级的权力归还给自己。温和、和解，只能换得徒具虚名的存在。当局只允许自己“合法”存在，却不允许她“合法”地行使权力；在政府方面，束手无策地放弃一个又一个阵地的痛苦阶段总算度过去了，它终于从六神无主的眩晕中苏醒过来。这几个月对它是痛苦的，却也是必要的。它喘过气来了。

1981年2月2日，卡尼亚在波共“九大”筹委会上说，“团结工会顾问及其部分领导人，正试图把团结工会变成政治反对派，企图在波兰建立双政权。这是不允许的。”卡尼亚一语道破了当局同意工人阶级参与国家事务的虚伪本质。它给团结工会分派的角色依然是非

政治性的。政治依然是波共的专利，权力依然是统治当局的专利。

卡尼亚的这次突然强硬起来的讲话还表明，这位妥协时期的过渡人物的使命已快完成，他希望丢掉那个软弱而可怜的角色，使自己更象一位共产党的领袖。

只要一登上权力阶梯的最顶端，只要尝受了最高权力的滋味，谁也不愿意作一个过渡人物，不愿意仅仅是一名在强大的领袖人物出现之前的王位看守者。

卡尼亚的愿望并非不现实。在共产党的执政史上，确实有过许多次这样的实例：由于权力斗争的双方难以妥协，而常常扶上去一个平庸而无实力的折衷人物，可是集权的制度却常常把这位过渡人物从平庸变得专横，从无实力变得强大，最终他反而能将扶他上台的实力派逐个驱出政治舞台。当然，要完成这个过程怎么也需要三、五年时间的苦心经营。

然而问题是，现在的波兰决没有这三、五年的空闲坐等一个羽翼未丰的雏鸟慢慢长大，险恶的形势迫使它立即进行新的挑选。

在卡尼亚讲话之后一周，波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解除了平科夫斯基的总理职务，由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接任。

单就选择一位大将军衔的职业军人担任政府总理，我们便能预料卡尼亚会有什么样的命运，波兰的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 二十五

新政府强硬起来，非政治解决的阴影笼罩着波兰。然而瓦文萨没有退让，他说，如果真是那样，我将奔赴第一线去打坦克……

雅鲁泽尔斯基于1981年2月11日被任命为政府总理，12日就在组成的新政府发表了果断、强硬的施政纲领。这位57岁的军人总理一上台就被当作党的救星而被接受了。

雅鲁泽尔斯基没有辜负制度的青睐。他一上任就把视线从政治转向军事，从国内转向国际。

3月22日，雅各泽尔斯基专程赶到西里西亚观看华约组织的军事演习，并会见了华约总司令库利科夫元帅和捷克、民主德国的国防部长；5月30日，雅鲁泽尔斯基再次会见了华约总司令库利科夫

在国内政治危机极为严重的时刻，一位政治领导人频繁地进行军事和外交上的活动，不能不让人们对非政治解决的可能性产生担忧，尤其在此之前，外来的和军事的干预已经明显地让人感到过忧虑。

既然1980年的“波兰之夏”是制度的危机，那么，作出反应的就不仅仅是波兰，整个制度都会对这次从未有过的失败采取积极的统一行动。

从去年年底开始，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就对波兰团结工会的活动表示了严重的关注和焦虑，并出现了与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相同的征兆：苏联军队大量集结在与波兰毗邻的捷克北部边境；苏联要求波兰允许四个师的华约军队通过波兰调往东德；苏联、东德、捷克的后备役军人被重召服役；捷克警方在年底把包括前党的首脑杜布切克在内的六名持不同政见者拘留了两个小时，警告他们在今后几周内不得公开发表讲话。

12月中旬，苏共国际部副部长扎格拉金在罗马会见梵蒂冈官员时说，如果罗马天主教能设法缓和波兰的罢工运动，苏联将不会采取类似1968年对“布拉格之春”所采取过的行动。

苏联的这些行动和暗示引起西方的不安。西方新闻界甚至认为：解决波兰的劳工危机，“除了把坦克发动起来外，别无其他选择”。北约军事委员会也证实，“苏联人只要几个小时，而不是几天，当然更不是几个星期，就能攻进波兰。苏联人已处于待命状态，他们的的确确能够采取行动。”当然，在1980年前后，波兰所面临的外来干涉的危险与1956年的匈牙利和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相比，毕竟要小得多。在这方面，一个强大的、沉着的工人组织起了很大作用。

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瓦文萨不排除这种可能。

他说：“谁想试，就让他试试吧！我们没有妨碍任何人。因为我们主张社会主义。”他不愿多谈，认为“老谈这个问题不好。”但瓦文萨坚定地表示：“如果出现外国干预的话，我将奔赴第一线去打坦克。”至少在1980年初，波兰政府能指望的还只能是兄弟党的政治援助。在政治方面，勃列日涅夫的援助同样是慷慨和毫无顾忌的。他公开对波兰内政进行旗帜鲜明的表态。1981年5月22日，塔斯社发表社论，说团结工会的活动表明，“波兰修正主义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势力想使波共具有社会民主党的倾向。他们正向波共进攻。”在苏联强大政治攻势的支援下，雅鲁泽尔斯基靠着强大的国内外军事力量作为后盾，与他的对手先作政治上的较量。

新政府与团结工会的第一次对抗发生了。

3月下旬，在彼得哥什省，团结工会成员与地方政府发生冲突并遭到了警方殴打。事后，省政府和司法部门明显袒护警方，因而激怒了工人。团结工会下令全国，于3月27日凌晨举行一次全国性的四小时警告性罢工。

双方在这次对抗中所采取的强硬态度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

经过艰难的五轮谈判，政府被迫作出较大让步：撤换了事件的当事人彼得哥什省省长、副省长和检察长的职务。团结工会也作了相应的让步：撤换了彼得哥什省分会的两名激进分子。

公平地说，新政府的严厉也表现在对自己内部的处置上。新政府在对团结工会采取反参与的对抗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使波兰走出危机的积极措施。

党风不正，政府腐败是造成人民强烈不满的主要原因。新政府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对

上层领导人利用职权谋私，贪污腐化进行了严厉制裁。

至1981年6月止，波兰政府确认了对近5000人的指控："中央监委处理了25名中央领导人，其中15人被开除出党，包括前总理雅罗谢维奇、前计委主席弗热什奇克等。

在被确认的受指控者中，有3名中央书记，包括原第一书记益莱克；7名省委书记，7名副总理，74名部长、副部长或相当于部级的干部，51名省长和副省长。另外，在100多起重大的贪污案中，涉及领导干部达800多人。"这真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想一想，产生如此大规模腐败的，是一个仅有三千余万人口的国家政府。

要走出危机，必须揭露造成危机的特权与腐败；然而，有了这样的暴露，当局怎么可能恢复社会的信任？怎么可能找回它曾有过的黄金时代绝对的信任，绝对的权威和绝对的控制。

要恢复权威必须惩治腐败，而暴露腐败却又无可挽回地使那个永远正确、伟大的神话破灭而加深其危机。

这就是新政府所面临的两难处境。

危机从社会蔓延到党内。对旧的思想路线和统治方式提出根本怀疑的呼声在党内变得强烈起来。

波共党内出现了规模庞大的"横向结构"运动，以打破以往那种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纵向结构。各单位党组织彼此进行思想交流、讨论，并成立了许多政治色彩极浓的派别团体，如"论坛"、"讨论俱乐部"、"协调委员会"、"党代表筹备小组".....

到1981年3月，横向运动发展到高潮，波共在全国有了1500多个这类自发组织。

1981年4月，全国19个省和地区的600多名党员云集托伦，举行协商论坛会议。

这就是著名的"托伦论坛"。这次自发的政治盛会上，发出了要求党内民主和实行更大改革的强烈呼声，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波共确实陷入了内外交困的重重危机之中。

然而，换一个角度，我们却可以说，波共有了近二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希望腐败的暴露使其不再能危害社会，并有了彻底医治的可能；全党对党的命运的关切和干预，带来了上下齐心协力重塑党的形象、重建党的权威的可能。

波共面临着一次空前的危机，也存在着一次空前的希望、一次重大的选择。如果波共有勇气首先在党内实行民主，那么社会主义民主必将在下一步提上日程。

然而遗憾的是，波共没有抓住这个时机。它把对前领导人的惩罚依然当作替罪羊式的解决手段，它最多只作到头疼治头，脚疼抬脚的治疗，而没有从铲除腐败的根源着手对制度作

出重大改革它既不愿将权力归还给社会，也不愿让全体党员来参与执政。所谓共产党执政其实只是政治局专政。那种党代表工人阶级，中央委员会代表全党，政治局代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制，仍然被政治局那十几个人当作社会主义民主的唯一形式而不愿放弃。

波共拒绝了这次危机中所蕴含的希望，因此，它从这场危机中得到的便只是灾难了。波共因缺少选择的勇气和诚意，而让一次巨大的历史时机流失了。

波共经历着战后从未有过的生存危机"1980年7月1日至1981年6月15日，入党三万八千六百人，退党三十万八千六百人.....在交出党证的人中，工人占百分之七十二左右。"波兰当局且战且退，但决不作实质性让步。

波共在四月底又作了一次重大的政治改组：解除了前总理平科夫斯基及其它几位对危机承担责任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几乎同时，政府又发出杀气腾腾的威胁说："团结工会威胁着波兰"，"波兰政府已经仁至义尽，我们的盟国已经忍无可忍了。"到了7月，动乱又有所增涨，抗议食品缺乏和物价上涨的集会游行、罢工陆续发生。在华沙等城市还出现了大规模的车队游行示威和"妇女进军"运动。

8月4日，政府成立了"反危机行动指挥部"和"反投机倒把特别委员会".前一个机构显然是针对来自人民的抗议和动乱的；后者却是表示对内部整顿的决心。前者是进攻，后者是让步。

团结工会则表示坚决支持群众的集会游行，并宣布8月5日在华沙举行两小时的警告性罢工，以示声援。

这是雅鲁泽尔斯基的新政府与团结工会的第二次全国性的重大对抗。

罢工之后，双方于8月6日举行会谈。由于工会方面不再满足于就事论事的谈判方式，他们提出了涉及到制度方面的、因而也是当局不可能接受的要求工会与政府分享舆论工具；彻底的工人自治；由全民参加政治经济改革.....

谈判破裂。

双方越来越成为势不两立的对抗力量。合作的可能更加渺茫.....

## 二十六

在有26个外国工会代表团列席参加的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诞生了共产世界第一个由社会而不是由政府，由人民而不是由执政党所制定的改革计划。

团结工会已经在庆祝自己的一周岁生日，却还没有在波兰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比如象一个公开的、合法的反对党。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比喻。团结工会的作用应远远大于一个反对党，她能以一千万人的智慧和意志去帮助当局制定政策，并以全体人民的直接感受而不是通过一小批政客代他们去

判断去验证政策的正确性或纠正其偏差。

团结工会至今没能成为政府的行政伙伴，她仅仅为了自己的合法存在就得竭尽全力进行抗争。但波兰工人阶级不能妥协，否则波兰所获得的历史进步便徒具虚名。

在政府方面却相反，如果它不妥协，便只能将带来重重危机的统治方式保持下去。

在1981年，历史需要工人阶级具有坚定的抗争精神，这团结工会具备了；同时，历史也要求另一方的政府拿出伟大的妥协精神，才能完满的完成这次历史进步。

非常遗憾，很少有人愿意当妥协的伟人。在两军对垒的严峻时刻，哪一方不为自己挑选一位强硬、果断、具有攻击性的将领呢？

雅鲁泽尔斯基无疑是具有魄力为首领。波共能选择这位充满意志力量的人物无疑表明了它的远见。这也无可指责。

该指责的只是历史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时机，却未能造就一位能以伟大的妥协精神去把握这个时机的政治家。

我们为历史遗憾，为最后决战的序幕将要拉开遗憾……

团结工会已经明确意识到，要改变波兰的传统政治结构，必须首先实现这样两个目标：第一、要干预政府的决策、行政，就必须打破官方对新闻宣传机构的垄断。只有掌握了非官方的舆论手段，才能帮助人民了解和判断国家政策的正误、利害，并迅速将人民的反应传递出去；第二、实行名符其实的“工人自治”。这是团结工会在争取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斗争中采取的非常重大的步骤。

在反对将国家下放的企业主权交给工人的论点中，认为工人素质太差、以及高度现代化的生产无法由集体意志进行管理的论点颇有市场。这些论点有意无意地混淆了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两种管理职能，工人阶级可能不懂经济，不懂技术、管理，但他们懂得生产是否发展了，他们懂得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是否得到了维护。他们可以以此为依据去挑选有能力的技术、管理人才，去行使自然属性的管理职能，而将诸如投资、分配、制定制度、任免厂长经理等社会属性的管理职能牢牢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

工人阶级如果不能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如果不能将工厂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便不可能成为国家的主人，而只能是一种新的雇佣奴隶。

到8月份，有了自己强大组织的波兰工人阶级，在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方面，有了十分成熟的战略思想。团结工会旗帜鲜明地向当局提出了两项要求：1、要有由工会直接控制的宣传工具，而不是使用官方的宣传工具；2、工会有任免企业领导人的权力。

波兰工人阶级发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强攻。

这次进攻立即遭到了波共的坚决抵抗。

9月初，波共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拒绝了团结工会关于“工人拥有对工厂的全部控制权，包括对任命企业经理的控制权”。波共表示，不反对工人参与工厂管理，但希望通过上级对企业领导人的任命来保持中央对企业的控制。

波共同时作出了不同意团结工会控制宣传机构的决议，而只在“原则上不反对团结工会使用（官方）新闻工具。”在这次全会上，卡尼亚承认波兰面临着严峻的历史关头，但又表示波共有力量担负起“历史性的责任”，为此，卡尼亚发表了迄今为止最强硬的讲话。

他说：波共“不会放弃保卫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任何手段。”卡尼亚的危机感是准确的。

如果团结工会的上述两点要求成为波兰政治生活中的现实，那么肯定会危及波兰现存的社会主义的存在。这无须怀疑。有疑义的是，这个被危及的社会主义与团结工会所要争取的社会主义，哪一个更具有社会主义实质？

几乎在卡尼亚的宣言同时，瓦文萨也作了同样强硬的表态。他宣布，团结工会将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争取有权利用国家控制的宣传工具，以及坚持实现自治的目标。

紧接着9月3日结束的波共九届三中全会，团结工会于9月5日在格但斯克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本身，就能证明团结工会确实已成为波兰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但不是最大的军事力量。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次在格但斯克郊区庞大的奥利维亚体育中心召开的大会，对波兰的政治意义明显超过了波共的党代会。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有八百九十二名工人代表，有二十六个东方和西方的外国工会代表团，有罗马天主教牧师，有库龙等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有数十个国家的新闻记者，还有自愿来列席旁听的成千上万人民群众。

大会是以瓦文萨充满自信的开幕词开始的。

瓦文萨说：“团结工会今天存在，今后仍将存在，不管什么人喜欢它与不喜欢它。我们将一道创建我们所理想的波兰。”然后，瓦文萨拍着手与全体代表一起高唱波兰国歌。

大会开始后，出现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插曲：瓦文萨宣布，不准波兰国家电台和电视台在会场转播实况。因为在事先的谈判中，团结工会提出，电台、电视台对团结工会代表大会的报道，工会应有编辑权，而官方拒绝了工会的要求。

当瓦文萨说了“我们决定，不让电台、电视台报道这次代表大会”后，全体代表站起身来，用鼓掌和挥手来欢呼这个胜利。

这个决定维护了工人的尊严，同时将最令人痛恨的电台、电视台送上了耻辱的审判台而让人感到痛快。



在官方的各种宣传手段中，被官方控制最严的是广播电视，因此它们几乎只报道粉饰官方的消息，并且绝对的只按官方口径而无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

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由工会委员会书记采林斯基作团结工会一年来的总结报告。

报告首先分析了波兰形势，认为"一场革命正在波兰展开，团结工会是它的推动力"；报告公开赞扬了波兰天主教会和持不同政见运动，说他们"多年来一直是工人利益的公开维护者"；谈到政府当局，工人方面仍希望能与之"达成协议和进行对话"并认为"政府当局同社会之间达成谅解是完全可能的。"；报告肯定地说，事实已证明政府没有能力领导波兰摆脱危机，说政府之所以寻求团结工会的合作，"只是为了让工会对自己不能发挥任何影响的各种决定负责。"采林斯基在报告中严厉地谴责了政府中的某些保守势力，说他们企图恢复1980年8月之前的制度。他说"这些集团企图消灭团结工会，甚至不惜走上背叛民族的道路。"这是明确地指出波共可能谋求苏联帮助他们巩固政权。

采林斯基还驳斥了政府方面关于团结工会的行动损害民族利益的指责。

他说："团结工会的爱国精神不需要别人来教。"这句话引起了与会者雷鸣般的掌声。

这掌声表明波兰工人阶级已经能毫不费力地将爱国与爱某一个政权区分开了。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全国委员会，瓦文萨依然任委员会主席。

代表大会通过了长达40余页的《纲领决议》纲领主张实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明确提出要改变现行体制。纲领重新阐述了独立工会的性质、宗旨、策略，规定团结工会将拥有自己的大学、出版社、报刊、通讯社、电台等宣传机构。

纲领提出通过"职工自治"，实现工人对工厂的占有，通过"区域自治"加强社会对中央集权的抗衡。

纲领还呼吁在全国实行"自由选举"，并估计已有950万会员的团结工会能在选举中取得议会的多数。

《纲领决议》是一份非常完整、详细的改革蓝图。评价这份完全由工人阶级设计的改革蓝图是困难的，预计它在改革实践中的结果则更不容易。我们只能说，这是共产世界第一份由社会、而不是由国家，由人民、而不是由执政党所制定的改革计划。它不仅与刚结束的波共"九大"提出的改革纲领针锋相对，甚至与五十年代以来的铁托式的，赫鲁晓夫式的，纳吉式的，杜布切克式的，邓小平式的改革纲领相佐。

上述任何一次改革都是由执政的共产党制定，并自上而下地由共产党组织逐级下达、实施。它的实质是由共产党来限制和改造共产党。所以，它在削弱党的某些机构和权力的同时，却又必然加强党的某些机构和权限。因此，每次这一类的改革，都要喊出诸如"加强党的领导"的口号。这样一来，虽然能增强党的改革力量，却也使应在改革中削弱的党对社会的无所不在的主宰保存下来。

团结工会的《纲领决议》本身就来自社会基层，它的目标是以社会力量来限制和改造党和国家政权，它的实施必然是削弱而不是增强党的力量。

共产世界还没有过这样的改革实践，很难说它就能获得以往那些改革所没能获得的成功。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改革设计一拿出来，就会遭到执政党的全力反击。

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政府与社会的最后决战拉开了序幕。波兰的局势急转直下。双方都紧张地等待着最后摊牌……

## 二十七

波共亮出了底牌罢免了不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卡尼亚；提出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的议案；发出了严厉警告：政府将不惜运用一切手段来镇压政治疯子……

最先亮出底牌的是波共。

9月16日，波共政治局针对着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声明，指责团结工会从事与工会事务毫无关系的活动。

波共这个15人的最高权力机构说："建立一个新型的自治工会的做法没有成功，而建立一个公开改变政治体制为目标的反对派政治组织的做法倒取得胜利了。"妄图"改变政治体制"，是这类政权下最严重的罪名。成立了这一条罪名就足以将任何政敌置于死地。否认掉这个罪名便可以使自己的政治行为争得相当的合法性。因此，我们常常能听到对这种罪名的极力解辩和否认，却很少听到"为什么不能改变体制？"的思考和质问！

没有体制的改变，谈何改革？

波共为团结工会罗织了这一条罪状后，便发出了咄咄逼人的质问："我党一再警告团结工会要提防存在于其队伍中的那些破坏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为什么代表大会还要这样做？

"波共指的是团结工会发表了持不同政见组织"社会自卫委员会"领导人库龙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库龙要求成立一个救国委员会。他认为共产党已经瘫痪，不起作用了。他主张由共产党、天主教会和团结工会组成一个全国联合战线，在全国大选之前临时掌权。

波共对团结工会接受并发表这样的讲话十分恼火。它宣称，将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来阻止任何夺取或分享波共领导权的尝试。

波共政治局的声明说："国家将根据局势采取必要的手段来保卫自己。局势越来越危险，

反革命的威胁也越来越大。"声明最后说："对政治疯子实行镇压是符合国家的利益，符合一个独立波兰的利益。"两天之后，波兰部长会议召开紧急会议并发表了《致城乡劳动者的呼吁》。呼吁书指责了团结工会接管国家政权的政治野心。

呼吁书说："团结工会领导人逐渐接管政权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这已不是什么设想，不是一种遮遮掩掩的意图，而是行动了。"呼吁书向 950 万团结工会会员呼吁："现在是与这条路线彻底脱离关系的最后时刻了。"9 月 18 日发表的这份政府声明还宣称，政府同意波共政治局对波兰局势的估计，因此，"必要时，政府将不惜运用国家权力范围内的一切手段。"一个强有力的首领不仅有强硬的姿态，还有果敢的行动。当局的行动是积极的，强硬的。

在政府发出严厉警告的同时，兼任着国防部长的政府总理雅鲁泽尔斯基颁布命令军队中，即将完成两年任期的军人的服役期延长两个月；同时，向包括华沙在内的全国两千多个乡村和城镇派驻了军人行动小组。

10 月 16 日，波共九届四中全会召开。一系列强硬措施得到了这次全会的认可。强硬派在全会上表扬了军队在保卫波兰社会主义制度的战斗中所起的伟大作用，而对"中央领导不力"以及对团结工会表示"退让和软弱"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在这次全会上，强硬派的中央委员格杜瓦发言，提出了在全国宣布紧急状态的提案："反社会主义势力正在进行公开的夺权斗争，如果我们要对反社会主义势力作斗争，党就立即发动攻势。党不要再忍耐下去了，不要再谦卑了。"在是否实行紧急状态的表决中，反对这项提案的人以微弱的多数否决了这项提案，但拒绝支持这个提案的第一书记卡尼亚，却因此受到更多的指责而不得不在这次全会上递交了辞去第一书记职务的辞呈。

强硬派最终占了上风。全会通过了禁止罢工的决议，任命了雅鲁泽尔斯基为党的第一书记。这位军队和政府的最高首脑，终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卡尼亚为制度造就一个重量级的斗士赢得了一年时间。他完成了历史的使命，他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

不愿意用武力解决工人问题的卡尼亚下台，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世界舆论普遍对主要代表波兰军队，而不代表波兰共产党的雅鲁泽尔斯基接替卡尼亚表示不安。

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说："卡尼亚曾以和平方式使波兰的紧张局势得以缓和。新领导只要继续实行这种政策，只要谈判还在进行，就有希望实现公平合理的解决。"西方外交家对雅鲁泽尔斯基是否能继续用谈判而不是用武力解决波兰面临的危机则表示出审慎的观望态度。

他们等待着雅鲁泽尔斯基说明他的政策。

西方新闻界的预测要悲观一些。

《华尔街日报》10 月 19 日分析说，"挑选雅鲁泽尔斯基作为卡尼亚的继任人表明，

波兰共产党不愿意彻底进行波兰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西方分析家还认为，强硬派在党和政府的改组中占据优势"可能会大大毒化工会和政府之间会谈的气氛。"对波共改组表示更大关注的当然是波兰工人阶级。应法国五个工会邀请，正在巴黎访问的瓦文萨得知卡尼亚下台的消息后，立即与格坦斯克通了长途电话，同团结工会总部进行了紧急磋商。

瓦文萨拒绝了新闻界的采访，他的发言人说，"在得知更多的情况之前"将不可能对党的改组发表任何意见。

但瓦文萨表示："我们在新政府和团结工会的关系上很镇静。"波共终于从痛苦的退让中停顿下来，并怒气十足的准备反击。

反击是从内部的清洗开始的开除了在团结工会中担任最高职务的波共党员博·利斯的党籍；解除波共记者协会主席拉特科夫斯基的中央委员，并开除党籍"因为他贬低了反社会主义威胁的严重性以及没有尽到一个共产党记者应尽的义务"；中央全会还作出决议："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团结工会会员的情况再也不可能存在了".在九百五十万团结工会会员中，有大约一百万波共党员。政治局要求这一百万党员以退出团结工会来宣布他们对党的忠诚。

这项号召发出的当天，政治局委员中唯一的一位团结工会会员格日布宣布退出团结工会，并说她"发现过去参加了一个反对派组织。"在由二百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有四十人参加了团结工会。他们大多数是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当天，有十多人宣布退出团结工会。其余二十多人也面临着非此即被的选择。

或许他们面临的选择还要严峻。因为已经有消息传出来，正在考虑对大约三百名波共党员的逮捕，这些党员是团结工会中的激进会员或激进的支持者……

10月充满着火药味，还能隐隐闻得血腥气。

团结工会作出的最初反应是镇静而克制的。

当记者问瓦文萨对当局宣布禁止罢工有何反应时，他说："我们可以寻求其它的抗议方式。我们希望在制造乱子的情况下给予政府帮助。"瓦文萨同时表示，工会愿意坐下来同政府讨论问题，"愿意做到通情达理，我们不要求不可能做到的事情。"10月下旬，团结工会作出暂时推迟使用罢工手段的决定，但采取了更具有深远意义的行动：向政府发出呼吁，要求立即成立团结工会和政府联合委员会，来处理波兰当前的危机。

团结工会缓和了形式上的对抗，却加强了政治上的攻势。当局不可能作出更具实质性的让步。于是，工人阶级只好又一次被迫操起同时也损害自己利益的斗争武器罢工。

10月下旬，一万二千多名纺织工人宣布罢工，他们占领了华沙地区纺织厂以抗议官方的经济政策。

10月27日，瓦文萨来到华沙南的纺织城齐尔拉多夫，同罢工工人在一起。他宣布，团结工会将于28日举行一次全国性的一小时罢工来支持纺织工人的这次罢工。

在这次集会上，瓦文萨谴责了政府当局再三拒绝工人阶级的参政要求。他说："如果政府不愿意同团结工会合作，那么，团结工会已经再三讲过，它愿意自己来管事。"10月28日，波兰各城市都贴满了罢工标语，上面画着有冠的鹰。波兰国徽上面的鹰是无冠的。波兰工人给这个政权标志上增添一项王冠无疑是要将人民的权威强加给当局。

中午，拥有近千万会员的团结工会的一小时罢工鸣笛开始。

当天，波共机关报《人民论坛报》，发出了带有悲怆意味的呼吁："愿我们的祖国不再发生罢工了，罢工并不反映工人的利益。"这确实是一个悲剧：工人阶级在有了自己的政权三十多年之后，居然以反对自己历史利益的方式向自己的政权作斗争。

一小时罢工结束不久，雅鲁泽尔斯基便立即在刚刚开始的五届五中全会的开幕式上作出反应。

雅鲁泽尔斯基说，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政府不容忍进一步的罢工行动。他称这次罢工为"社会主义波兰的敌人已经公开摊牌了。"最后决战不可避免。

11月，波兰召开六中全会，重申党和政府将采取一切拥有的手段来维护现行制度。

全会作出决议："有必要授予政府一切必要的权力，以便有效地制止破坏国家及其经济，威胁国家和社会治安的破坏行动。"进入12月，波兰局势急转直下。双方都放弃了妥协的希望。

月初，政府出动军警强行解散了正在罢课的消防军官学校，并要求国务委员会授予采取非常措施的权力。

团结工会终于对政府越来越强硬的方针采取了全面对抗的策略。

12月3日，团结工会主席团在拉多姆举行会议，谴责政府当局"选择了暴力的道路。"

"瓦文萨在会上表示，既然对抗不可避免，团结工会将不会在这场对抗中退缩。会议决定12月17日举行全国总罢工和总示威。"

在这次会议上，针对着政府最终采取武力解决的可能性，一些领导人提出建立工人武装的提案，同时提出了接管地方政府和建立临时政府的主张。

拉多姆会议的录音为警方所获，并通过电台公布于众。

官方的报纸强烈地抨击这次会议。

"团结工会要全面夺取政权"成了波兰舆论的焦点。

团结工会中的激进派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即使对人民来说，这个新课题也令人感到意外而陷入艰难的思考之中。

这是非常严肃、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感情用事，那我们必须对现代工人运动中出现的这个课题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我们决不能因为团结工会是工人的真正代表，而为其能最终掌握政权欢呼。我们不应该忘记，1944年，波共确实是以人民的真正代表而夺取政权的。我们得承认，那时，它有为人民的纲领，也确实有为人民的真挚愿望；而且它的领导人大多都是从人民中来的。

波共的悲剧不在它没有好的愿望，没有优秀的领袖，而在于那日益壮大的不受任何反对和制约的统治权力。如果团结工会以推翻政府、夺取政权为目标，它同样不能保证不会变成另一个唯一的执政党，瓦文萨不会变成另一个哥穆尔卡或盖莱克。

这是一个危险的目标。它会使波兰失去刚刚找到的平衡权力的杠杆。如果团结工会真有力量来实现这个目标，波兰的这场工人运动便失去了任何进步意义，而只是近几十年来那种毫无意义的撤换人、改换政府班子的重演。

波兰工人阶级应该认识到，历史也同样要求它作出伟大的妥协那就是放弃传统的、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斗争方式而只以能够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限制为满足。

这种目标似乎低了一点，但它却能净化权力，能变权力为责任，能使一个坏政治家不敢干坏事、不能干坏事，能改变那种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和堕落……

在团结工会内部，这个激进的提案受到了抵制。因为一些温和而具有远见的工人领袖反对这个提案，主席团不得不进行投票表决。

遗憾的是这次详细的夺权方案被通过了。

瓦文萨持中立态度。

当这项由持不同政见者岸龙制定并得到许多激进的工会领导人支持的方案进行表决时，瓦文萨既不赞同也没反对。投票时，他只是默默地、一股劲地往烟斗里装烟。在他的沉静中隐藏着巨大的内心激动和紧张的思考。

幸亏团结工会没能实现激进派的危险目标既然政府不同意团结工会与它分享权力，当然更不会同意让其取而代之。

政府的态度越来越强硬，波兰各地都有军警活动。政府对团结工会要于12月7日举行全国总罢工发出警告：如果团结工会不顾官方严禁罢工的禁令，将受到“十分严厉”的惩处。

团结工会没有退让，积极地实行拉多姆会议决议，并于12月12日在格但斯克召开主席团会议，正式向波兰政府提出，要求就“是否信任共产党政府”、“是否希望成立一个临时政府”进行公民投票。

团结工会宣布，如果政府不答应这项要求，团结工会将于1982年1月15日单方面

组织公民投票。

团结工会触到政府的致命弱点，双方进入到你死和活的肉搏阶段。团结工会发出的这个公告，无疑是一份现政权的死刑判决书。当局会束手待毙吗？

12月12日显然是一个最后时刻……

瓦文萨与波兰团结工会（七）

赵启强

改革浪潮来自底层瓦文萨与波兰团结工会（七·完）

本文系作者大著《光荣的荆棘路——改革家们》第五篇（七）（连载完）

二十八

当局实行了军管所有想改变现存秩序的行动都受到绝对禁止，一切动乱的因素都被排除。波兰一夜之间便实现了军营式的安定和秩序。

1981年12月12日是波兰又一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仍在格坦斯克开会的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发出了就“是否信任共产党政府”进行公民投票的公告，从而打破了一年多来，给波兰造成混乱却也带来“政态平衡”的对峙局面。

这一天，苏联塔斯社向全世界发出了关于“团结工会正在策划直接夺权”的电讯，从而使人们担忧地感到，即使雅鲁泽尔斯基不动手，那位共产世界的教皇也会动手；这一天，伦敦、巴黎的邮电官员突然发现，从下午6时起，通往华沙的电话电报中断了，从而使西方的外交界、新闻界人士感到波兰将要发生极不寻常的事；这一天，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在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开会，为这场不可避免的决战制定战略方针。这次会议开到深夜。当工会领导人离开造船厂退回旅馆时，他们每个人的心脏部被沉甸甸的历史压迫着，既感到决战前的亢奋，又感到因过于重大的历史责任而产生的恐惧……

1981年12月12日的波兰充满了恐惧、不安和许多不祥的预兆。历史要把波兰的希望和不祥之谜扔在这一天。

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的领导人离开造船厂回旅馆时，一大批埋伏在隐蔽处的军警突然扑出来，逮捕了几乎所有的领导人。几乎同时，军警包围了座落在莫科夫斯卡大街的团结工会华沙分会总部，逮捕了这个最大分会的领导人。

在这场内电式的突击中，政府充分显示了它的实力和效率。一切解决用迅速、彻底，没有反抗，没有混乱，甚至没有战斗的痕迹。华沙的变化只在于深夜行走的人发现许多军车在街头巡逻，许多身穿战斗服、手持警棍、戴着装有塑料面甲和护板头盔的警察戒严了通往团结工会华沙分会总部的所有街道。

华沙是有秩序的，用暴力和恐怖建立的秩序。

也有混乱的地方，那是在华沙分会总部：情景是令人痛心的：水管丢在地上，许多东西泡在水里。一楼，反映波兰工人阶级各次事件的图片展览被捣毁了。二楼档案室一片狼籍，就像刚刚刮过一场龙卷风，地上到处是纸，窗帘被撕扯下来扔在地上……

华沙是沉默的，它被突如其来的行动吓呆了；历史也愣住了，一时不能明白随着这闪电般的袭击而来的，会是什么？

这种沉默和疑问是六小时后被打破的。

12月13日凌晨六时，波兰国家电台打乱了正常的节目安排，播放了波兰国歌。之后，响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镇静而又沉重的声音：男女公民们！

在波兰历史上这一悲剧性时刻，落在我身上的责任是重大的。我的责任是承担起这一重任，它关系到我们这一代人在战争的所有战线上为之奋斗并献出了自己生命中最美好年华的波兰的未来。

我宣布，在今天已经成立了救国军事委员会。

国务委员会根据宪法规定，已经从今天午夜起在全国实行战时状态。

这个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救国军事委员会由15名将军，5名上校组成，它成了波兰唯一的执政机构。

但雅鲁泽尔斯基声明，这次军管“不是要搞军事政变，不是想搞军事独裁，”而只是为了恢复波兰的秩序和纪律。一旦达到目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将解散，将权力交给政府。

雅鲁泽尔斯基宣布，救国军事委员会将“向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和某些经济单位派出军事委员全权代表。

军事委员全权代表受权监督从政府各部到乡一级国家政府机关的活动。”雅鲁泽尔斯基在这次讲话中，特别强调实行军营只是为了“取得一样东西安定。”为了安定，波兰实行了军营；为了安定，救国军事委员会公布法令，详细规定了战时状态期间的公共秩序准则。

波兰在一夜之间消除了动乱，华沙同外界的一切电讯联系被切断；边界、领空、领海和机场被封锁；禁止一切罢工、游行和集会，实行新闻检查；在全国所有的大城市实行宵禁；对200家大企业实行军事管制；禁止团结工会活动……一切想改变现存秩序的行动都受到绝对禁止，一切动乱的因素都被排除，尽管波兰付出了代价，但总算实现了军营式的安定和秩序。

应该肯定雅鲁泽尔斯基的动机，安定是美好生活的基本条件，也应该肯定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行动，彻底地取缔政敌的活动是实现安定的最佳手段。强有力的军事管制无疑能建立起稳固的秩序。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担忧地指出，如果某种政治秩序特别有利于滋生特权、腐败，那么破坏这种秩序的稳定，就不一定是坏事。

不管那一类社会，都不可能使全体社会成员从其稳定的秩序中受益。因此，任何社会，总有一部分利益集团希望安定，以保持既得利益；另一部分人却希望打破稳定，重新建立一个能使自己受益的新秩序。

肯定有了同样的认识，雅鲁泽尔斯基才对军管是否能得到各阶级的拥护缺乏信心。因此，在宣布了军管之后，他又以恳切的态度向波兰各阶层发出了接受并支持军管的请求：我向你们，波兰的工人们呼吁：在这样一个为战胜最艰巨的困难的时刻，为了祖国，放弃你们不可剥夺的罢工权利吧！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使你们艰苦劳动的成果永远再不要付诸东流。

我向你们，农民兄弟们呼吁：不要允许你们的同胞挨饿致死。你们要爱护大地，使它养活我们所有的人。

我向你们，老一代公民呼吁：你们千万不要忘记战争年代的真实情况，不要忘记重建波兰的日子。你们要把这些告诉你们的子孙，将你们炽热的爱国主义、为祖国利益准备牺牲的精神传给他们。

我向你们，波兰的母亲、妻子和姐妹们呼吁：尽你们一切努力，使波兰的家庭不要流更多的眼泪。

我向你们，波兰青年男女公民们呼吁：你们要表现出公民的成熟性和对自己的未来及祖国的未来的深刻思考……

我向你们，民警人员和保安人员呼吁：你们要在敌人面前保卫国家，在非法行为和暴力面前保卫劳动人民。

这是充满有深深忧虑的呼吁，是充满着人性温暖和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的呼吁。仅仅从这份呼吁，我们就可以说雅鲁泽尔斯基不仅是一位富有魄力的军人，还是一位优秀的、富有人情味的政治家。他在这次讲话中呼吁人民“在需要搭桥的地方，我们不要筑起街垒。”这无疑是一句关于民族团结的名言。

从这句话中，我们还感到了一位政治家对民族矛盾的深深忧虑、以及对政府不得不用武力去建立秩序而表示出沉重的负罪感。

然而雅鲁泽尔斯基不能不实行强权政治既然制度已选定了他作为坚定的维护者……

雅鲁泽尔斯基也是一位悲剧人物。他在讲话中很坦然地等待着历史将对他采取的行动作出评价。

其实，这次军管的意义只在于眼前的安定，雅鲁泽尔斯基把波兰现在要做的事推到以后了。这是迟早要作的事。

把这次重大的社会变革放到十年后去做，或许波兰能多一些成熟，少一些动乱，波共能少一些危机，少一些损失。但这是以放慢历史进程为代价的，而且会使他所维护的制度在日后付出更大的代价。

以上是历史的评价，那么现实的评价和反应如何呢？

雅鲁泽尔斯基所采取的这次难以受到历史青睐的重大行动，能被现实的波兰所接受吗？

## 二十九

全世界的谴责、抗议、制裁都是无力和无可奈何的。这个制度既有对舆论压力的坚强承受力，又有一块坚硬的盾牌“不许干涉内政！”

1981年12月13日的波兰是平静的。这是隐藏着不安与惊愕的平静。

早晨，在轻型坦克来来往往的华沙大街上，所有人的表情都是不安与惊愕的。与此同时，全副武装的军队把守着各个地方，市中区的行政区已关闭。

由于电话电报线路被切断、工会领导人被捕，中断了联系各自互不了解情况的工人的第一个反应是停止公共交通，电车被工人丢在马路上。

上午八时，飘扬着红旗的波共中央委员会大厦并未受到特别警戒，但几小时后，在离大楼最近的十字路口部署了军人巡逻队把守住这个大楼的各个出口，禁止入内。

各个教堂周围冷冷清清的，而这天是星期天，正是教徒做弥撒的时候。

从早晨六时起，电台一遍又一遍地插送古典音乐节目以及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的讲话。讲话之前播送国歌。其他节目全部停止播送。

在城市的墙上，团结工会的布告和各种标语，在这天都被其他布告覆盖了。

由于电话被切断，无法知道外省的情况。火车晚点，车站的扩音器里播着一项通知：已经关闭了边界，禁止波兰人出境。

一些过路人，尤其是一堆堆的妇女在议论着，到处是忿怒情绪。

一些逃避了夜间大逮捕的年轻人袖子上佩带着团结工会的红白色袖标，试图组织起来，到各工厂去组织“工人卫队”，但他们没有汽车，没有统一行动计划。

最让人担心的是在格坦斯克被捕的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成员的命运……

在这一天里，局势是稳定的，到处是救国军事委员会张贴的布告：禁止一切集会；电话联系必须经过检查，禁止拍电影与拍照……

雅鲁泽尔斯基的军管只换得了平静和沉默，却未能得到衷心的拥护。

真正表示满意和支持的是苏联。

莫斯科的反应是迅速的。当天，莫斯科电台和塔斯社都受命发表了克里姆林宫的声明，对雅鲁泽尔斯基的军管表示满意，认为军管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克里姆林宫认为华沙当局早该及时采取强硬行动，因为"社会主义的敌人，旨在推翻现有的制度，加深波兰的危机....."然而，类似莫斯科这样的理解和支持毕竟太少了。

几乎在同一天，北约组织召开了15国代表特别会议，对波兰军管作出强烈反应。

西方国家首脑对波兰军管表示了严重关注。美国国务卿黑格呼吁波兰当局，不要停止在团结工会压力下所采取的重大改革，并对波兰"实行军事管制感到严重不安"；法国总理莫鲁瓦呼吁波兰当局"恢复公民自由和工会自由"，他告诉记者说，波兰"逮捕工会活动分子和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引起了法国政府最深切的关注；意大利总理在得知波兰军管的消息后，立即从外地返回首都，"不安地注视着"波兰事件的发展；西班牙外交部发表声明，对波兰军管表示"吃惊和关注"，并呼吁波兰当局"不得采取有损波兰人民最近获得的成就的任何行动"；比利时首相斯更斯对"波兰政府对团结工会采取的军事行动"表示了震惊和遗憾；日本外务省在波兰宣布军事管制的当天，就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波兰形势，确认了要重视波兰事态发展的方针；会议还表示，如果波兰因采取这次行动使其国内发生混乱而引起苏联介入，日本"将采取比苏联介入阿富汗还要严厉的措施".....

所有这些反应都是迅速的、强烈的，有的还很严厉。但如此而已，这些道义上的谴责、政治上的抗议，甚至还有经济上的制裁是不能迫使波兰当局在强硬立场上后退一步的，因为当局绝不担心西方会采取军事行动；至于舆论压力，这个制度的承受力是极强的。

当局的判断是正确的。12月13日，在波兰军事管制的当天，美国前国务卿、著名政治家基辛格，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记者采访，就波兰局势发表讲话。

基辛格说："这是一次摊牌，在这次摊牌中，苏联共产党和政府正在设法镇压团结工会，"或"设法以某种方式结束团结工会的独立地位，把它变成共产党的一个附属机构。"基辛格认为，"我们的盟国将会认为波兰局势是十分严重的。"然而，在被问及美国政府能够为波兰人民做些什么时，基辛格的回答是无可奈何的。

他说："在军事方面，我们无能为力，我们不应假装要有所作为。但是我们可以通知苏联，谈判的概念，和平攻势以及贸易是无法在这种环境下继续下去的。"这真是无力而又无可奈何的抗议。

在人道精神已经深深渗透到政治领域的现代社会，国家间、种族间的暴力侵犯肯定会受到国际大家庭的全力抗争，但在各个民族内部，同样、甚至更加残暴的镇压行为，却因为是内政而无人进行干预。

"不干涉内政"，真像各国统治者之间达成的一项可以对自己的臣民进行任何强权统治的

协议。看来，任何暴力事件，只要被贴上内政的标签，就别再指望国际援助，而只能靠人民自己了即便是对抗双方的力量十分悬殊。

难怪许多民族的内部镇压住在更残酷、更缺少明辨是非的公正。

手无寸铁的波兰工人阶级，将要投入的就是这样一场力量悬殊的孤军奋战……

三十

里根总统顶着“干预他国内政”的舆论压力，强烈地抗议波兰当局“对手无寸铁的人民越来越多的使用武力和对波兰人民基本人权的侵犯！”

雅鲁泽尔斯基用武力建立的秩序是短暂的。波兰在 24 小时的愣怔之后，终于打破了沉默。

12月14日，波兰军事管制当局面临了第一个严峻的考验。这天，由瓦文萨的副手克鲁平斯基和逃脱了大逮捕的另外三名主席团成员签署声明，宣布成立全国罢工委员会，“在所有被拘留工人获释和紧急状态撤消之前，举行全国总罢工”以回答政府当局的镇压。

失去领导人的波兰工人阶级终于有了新的组织者。团结工会还成立了一个基干指挥部，在工会主要领导人不在的情况下负责指挥团结工会的行动。指挥部设在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内。指挥部号召，仍然在厂内进行占领性罢工。工人将在工厂内实行自卫，即使部队空投进来也要坚持下去。

波兹南和弗罗茨瓦夫这两个工业大城市的所有大工厂都停工了。华沙的索非亚汽车制造厂，斯韦尔切夫斯基精密仪器厂全体罢工，首都最大的两家工厂，华沙钢厂和大乌尔苏斯拖拉机厂都有近万名工人加入罢工行列。华沙钢厂是在全体职工中进行投票表决后举行占领性罢工的。这次投票有百分之八十的工人支持罢工。

沿海地区的什切青和格坦斯克工人占领了工厂，并贴出标语要求解除紧急状态和释放 12月13日宣布军管以来被捕的人。

军管当局以沉着的武力镇压，经住了来自工人方面的考验。当局派军队包围了罢工工厂并对罢工组织者采取了镇压措施。

在华沙，军队开进了国立图书馆，接替了图书馆罢工工作人员；在卡托维兹，军队冲进了钢铁厂，逮捕了 50 名工会会员，罪名是煽动罢工。

对抗更加激烈，暴力流血事件发生了：12月15日，华沙大学生和教授们为抗议军队对团结工会的镇压而上街游行，在文化宫和华沙中央火车站之间的地区与军队发生冲突。军方开枪驱散了游行队伍；在乌尔苏斯拖拉机厂，工人与为挫败罢工而冲进工厂的军队发生了暴力对抗，有数人死亡，七十多人受伤；在华沙钢厂，七千工人不顾可能判处死刑的危险接连两天占领了钢厂，警察和士兵冲进去把他们一批一批押送出来；在西里西亚矿区，军队向挥舞斧子、棍棒的煤矿工人开枪，有六名矿工当场被击毙；在格坦斯克，伞兵冲进了设在列

宁造船厂的团结工会总部，镇压为抗议军管而举行的最有象征意义的罢工。这次冲突有一百六十名军人和一百六十四名工人受伤。

在这几天的冲突中，成千上万的工人被捕，被投进设在格坦斯克和华沙的两个临时拘留营里。在这些被捕的人中，有两位是今年七月增选的波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克拉科夫大学教授库比西亚和列宁造船厂工人瓦贝茨基。

流血、死亡和大规模的逮捕浪潮使波兰的局势更加恶化。当六名矿工被枪杀的消息传出来后，整个波兰为之震动，成千上万的波兰人自发地聚集在华沙的胜利广场。那里有今年五月份为红衣主教维辛斯基举行葬礼后留下的十字架。人们排成队，围着象征性的坟墓走过，并献上花圈。一些人跪下了，为死难矿工祈祷。

治安部队迅速赶到广场，驱赶他们认为呆得时间太长的人。到傍晚，数百名青年人仍不离去，他们悲愤地高唱着波兰国歌。军管当局封锁了广场并用棍棒和催泪瓦斯驱散广场上的人。

工人的反抗也同样升级在矿区，矿工在一些地方布了地雷以阻止军方的行动。什切青的工人占领了一个民防武器库。他们宣布，如果军方要用武力对付工人，他们将炸毁瓦林斯基造船厂；在南部，搞到了武器和炸药的煤矿工人也发出了相同的誓言他们将与矿井并存亡。

与此同时，团结工会采取了强大的宣传攻势，一些工会会员冒着生命危险向群众散发传单，呼吁举行全民的总罢工和消极抵抗。

这些传单说："不要逆来顺受，如果我们今天俯首听命，那么就会埋葬我们今后许多争取自由的希望。我们必须为关在狱中的人获释而斗争，几千人是摧毁不了一千万人的。""联合起来，抵制政府的任何公告，只要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能做到的话。不要忘记，统治集团的主要任务是使我们变成担惊受怕的奴隶。""让我们都成为战士吧。让我们帮助被捕的人、罢工的人以及遭受迫害的人吧！"已经是军管即波兰人所谓的"黑暗的星期日"以来的第七天了，军管当局却未在控制局面方面有所进展；相反，波兰人抵抗军人统治的气氛越来越浓西里西亚矿工对军队的抵抗一直没有停息，又发生了几次流血冲突，死亡人数已增加到66人，罢工工厂已经增加到二百多家；天主教会谴责政府方面的镇压措施并公开同团结工会结成联盟；在波兰南部，与矿工冲突的军队发生兵变，他们"不愿意用武力镇压罢工者，而且丢弃了他们的坦克"；在华沙附近的一个小城市里，"士兵和警察之间发生了冲突"。雅鲁泽尔斯基面临着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要险恶的局势；而且，他是没有退路的没有人可能承担在内政中错误地动用武力的责任他必须坚持军管的必要性、正确性，必须把军管这颗螺丝拧得更紧；再说，雅鲁泽尔斯基是在莫斯科的要求下进行这场只能赢不能输的赌博的。

里根总统讲过的一句话证实了这一点，他说："美国不至于天真到会相信波兰是在没有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实行军管的。"所以，雅鲁泽尔斯基最多只有两、三周时间向莫斯科出示他的赌博胜局。

克里姆林宫已经等不及了。

从军管开始，华约总司令、苏联元帅库利科夫就一直呆在波兰，他事先就知道宣布紧急

状态的计划并想亲眼看到波兰军队的执行情况。

这位元帅显然是位急性子，而且坦率得可爱。在军管前两天，他曾在华沙会见雅鲁泽尔斯基，并给后者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你们不干，我们就干！"现在，这位密切注视着波兰局势的苏联元帅迫不及待地通过他的部下声明："在几天之内，在一周之内，如果雅鲁泽尔斯基要求我们提供军事援助，我们是会提供的，我们将向波兰当局提供它认为恢复国内秩序所需要的一切援助。"和这种公开声明相应的是苏军的频繁而秘密的活动已禁止所有西方国家的飞机穿越波兰上空，并对西方关闭了的华沙机场，常常有苏联飞机在夜间降落；西方外交人士不安地得知两个师的苏联空降部队和在波兰边界的五十个师的军队有干涉波兰的运动迹象；还有苏联后备军人进入戒备状态，苏波边境的苏联捷克军队也奉命保持"紧急状态"。全世界对波兰事态的关注变成了严重的不安。

奥地利总理克赖斯基于12月18日，就波兰的流血事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说，波兰目前的局势"非常、非常危险！"说"我毫不怀疑，这是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对世界和平最严重的威胁。"克赖斯基认为，"只要波兰不出现流血和牺牲，就有解决问题的希望。但是现在，在报道了首批伤亡事件后，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十分困难了。"1981年的西方是高度警惕的。他们记住了1968年勃列日涅夫镇压"布拉格之春"的惨痛教训。那一次，勃列日涅夫正是作出了西方不会采取相应的军事对抗的判断后，才敢于采取军事行动的。

在克赖斯总理发出警告的同一天，美国政府也对波兰危机表示了严重关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波兰当局宣布只拘留了四千人，而美国得到的其他消息提供的数字远比这个数字高。同时，发言人还对这些犯人没有受到人道的待遇表示了不安。也是这一天，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鲜明地表明了美国军方的立场。

他说："我们强烈希望不要再弄出一个匈牙利事件来。"美国总统里根顶着"干预他国内政"的舆论压力，发表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外国总统对他国内政的干预，而是一次旗帜鲜明地以人道力量去讨伐对人权的侵犯。

里根的这一强有力的声明是一次向全国广播的记者招待会上发出的。他一开始就声明，他反对波兰当局所采取的镇压做法。

里根说："大规模采取强制和侵犯人权的行动取代了谈判和妥协"就构成了对赫尔辛基协定的"严重违反"。里根强烈地谴责波兰当局"对手无寸铁的人民越来越多的使用武力和对波兰人民基本人权的侵犯。"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美国是否不允许苏联把它的意志强加给波兰时，里根立刻回答："不允许。我们没有向苏联表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即使里根总统给予波兰工人协级的仅仅是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声援，其所显示的力量却是巨大的。

强暴所要达到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致对手于死地，主要还在于致舆论和更多的被统治者于颤颤惊惊的沉默之中。在这种时候，旁观的人高喊一声"住手！"其意义不低于被打倒在地上的敌手挺身再战的勇气。在强权面前，妥协可悲，沉默可耻。我们应该记住里根以及和他一样能为民主、人权、人道呼吁的政治家。

有了这一系列的强硬表态，波兰当局就很难指望借用苏联的军事力量来平息军管后的危

机了。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必须证明，他有足够的政治才能来消除无法用军事力量消除的危机。

12月13日的军管使雅鲁泽尔斯基走上了一条凌空而架的钢丝绳一边是苏联的霸权控制，另一边是波兰的独立；一边是强权，另一边是民主；一边是靠暴力恢复的旧秩序，另一边是暴力激起的暴乱……无论哪一边对雅鲁泽尔斯基都是万劫不复的深渊，他都会遭到另一方的殊死反击。

雅鲁泽尔斯基将如何保持住这危险的平衡？

三十一

为了证明军管不仅能给波兰带来安定，还能给人民一个好政府，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制度身上的腐烂处狠狠地割了一刀。

雅鲁泽尔斯基作出的第一个政治姿态是向波兰人民表示，军管决不是要恢复1980年8月以前的统治方式。

这个姿态是救国军事委员会于12月16日发表的一项广播声明作出来的。

声明说：救国军事委员会"决不会背离去年开始的民主化进程的基本前提。"为了表示与以前的统治方式决裂，声明宣布，"已加速把那些作风不正，工作无能或者承担不了当前任务的人从权力机关中清洗出去。"雅鲁泽尔斯基也承认军管给波兰带来"痛苦的震动"，所以他对军管后流血冲突深表悲痛，并要求军警竭尽全力避免冲突。但他又强调说，"波兰没有别的路可走……人们必须经受一阵痛苦的震动是免不了的。"应该相信雅鲁泽尔斯基是真诚的，他所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确实是为了波兰的利益，为了波兰的安定和民主化进程。

只是这里有一个十分尖锐的矛盾横挡在他的良好愿望与实际后果之间一次以武力扼杀一个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自治组织的行动，怎么可能促进社会的民主化运动？民主政治结构可以用暴力建立起来吗？民主政治可以在政治反对力量被摧毁以后生存下来吗？

雅鲁泽尔斯基显然犯了一个古老的政治错误，即建立一个不受干扰和反对的好政府，就能给社会带来富裕和民主。

雅鲁泽尔斯基的愿望是良好的。只是他所许诺的民主最多只是一种恩赐，一种放松控制。

如果说民主是人民行使权力的话。那就必须要有由人民组织起来的自治组织，而不是相反的去禁止这些自治组织。

我们说雅鲁泽尔斯基是真诚的，还在于他确实确实为实现给人民一个好政府的诺言而采取了行动。

雅鲁泽尔斯基在政治上采取的另一大措施就是惩治腐败，以表示与旧的政府和旧的统治方式决裂。

惩办是从前党政领导人开始的。

12月5日,波兰政府新闻局公布了被捕的前波兰领导人名单:盖莱克前波共第一书记;巴比乌赫前总理;卡伊姆前副总理;乌卡谢维奇前波共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佩卡前副总理;什德拉克前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这次公布的被捕前领导人共33人,还包括各省委书记、省长、市长及中央各部部长。

对前领导人的逮捕之后,救国军事委员会还对在职的波共下层官员进行了清洗:军管以来一周时间,至少有十个省长被撤销职务;同时军方还通过国家电台,对"包括商店经理、医院院长、厂长和教区负责人在内的一些人被解除了职务".这些被清洗的人的罪名是"贪污腐化"和"利用职权谋私",当然也有的是政治原因,即反对军管以及和团结工会有联系的人。

雅鲁泽尔斯基是由制度挑选出来承担重任的英勇斗士,但他并不作一个消极的工具,他首先在制度身上的腐烂处狠狠地割了一刀。这是雅鲁泽尔斯基的远见和魄力。

完成了对内部的治理后,雅鲁泽尔斯基便把视线转向那个虽被打倒、却远未死亡的强大对手波兰工人阶级。

应当承认,雅鲁泽尔斯基对目前已处于劣势的强大对手的进攻是犹豫的、克制的。比起对前党政领导人的大逮捕,他对团结工会领导人是温和而谨慎的。至少在军管后的一周,我们并没有听到军管当局对工会领导人发出过逮捕和严惩之类的声明,仿佛军管仅仅是针对动乱和腐败,而不是团结工会。

然而,这种被武力维护着的审慎能维持多久?这是一个谜。这个谜刺激着波兰人的不安和不详的预感。人们无不为其被捕的工会领导人的命运担忧,为瓦文萨的命运担忧。

全波兰都在问:瓦文萨,您在哪儿?

三十二

为了不让国民的道义精神被压垮,瓦文萨拒绝与军方举行高级会议,并以绝食行动来号召全体工人消极罢工藐视军事管制。

12月13日上午,在宣布军管之后仅几个小时,军管当局发言人耶·乌尔班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说:"瓦文萨没有被捕,也没被扣留,对他还是给予了适当礼遇的。他被认为是团结工会的领袖,因此受到了团结工会主席所应受到的尊重和对待。对于团结工会,并未取缔,只是暂时停止了它的活动。"乌尔班同时还宣布,今天军政府与瓦文萨举行了高级会谈。

这个发言使公众感到诧异:不在家里,不在工作岗位,连新闻界都无从寻找的瓦文萨既没有被捕,也没有被拘留,那么,他在哪儿?他和政府的谈判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

政府和团结工会都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说明。



12月14日，法新社从华沙发出了题为《瓦文萨在哪儿？》的电讯，更加深了波兰人的不安和疑惑。这篇文章对政府发言人乌尔班关于瓦文萨没有被捕的说法表示怀疑，并公布了瓦文萨失踪前的时间表：13日零点过后不久，瓦文萨在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其他委员的陪同下离开了列宁造船厂，回团结工会主席团成员下榻的索波特大饭店。现在的一个谜是，在警察部队开始行动时，瓦文萨是仍在饭店还是已经离开？按惯例，他在乘专机去华沙之前总要回家一次。

还有消息说，军管当局曾要瓦文萨作出选择：要么与其他领导人一起被拘留，要么立即与政府进行谈判。既然说谈判已经进行，就是说，瓦文萨选择了后者；如果是这样，瓦文萨就有时间把他的全家托付给造船厂的教堂。该教堂的神父是他的心腹挚友，然后，在大约五点钟他到了毕沙，与波共负责工会事务的领导人会谈，还可能直接与军管当局会谈。

美国新闻界的消息要具体一些。美国《新闻周刊》12月20日撰文描绘了出事前后瓦文萨的行踪。

这家报纸说，瓦文萨在政府采取行动前几小时曾得到警告说，政府将立即镇压工会。但瓦文萨没有采取行动。凌晨一时半，瓦文萨在格坦斯克的住宅外面响起了一阵急迫的喊声：“快躲起来，他们要包围我们了！”但瓦文萨没有逃跑。几小时后，他被政府的保安人员带上了一辆轿车。临出门前，瓦文萨带上了领带，不声不响地跟他们走了。

第二天，格莱姆普大主教设法打电话同华沙附近的一所政府“宾馆”里的瓦文萨取得了联系。

大主教问：“您被捕了吗？”瓦文萨回答：“我不能肯定你该管这叫什么。但我往窗外一看，看到的就是雪和树以及武装士兵。”但所有这些消息都只是传闻、推测。没有人知道瓦文萨的确切消息，没有人知道会谈的确切地点、内容和结果。

还有消息传出，说会谈的目的主要是说服瓦文萨，实行紧急状态是必要的，当局希望瓦文萨能发表一次电视讲话，赞成实行紧急状态。

所有这些推测和未被证实的消息中，最后一条的可能性最大。它使我们想起了1956年和1968年，当苏军进驻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后，也曾用武力将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请”去会谈，要他们在事先拟好的会谈协议上签字，表示同意邀请苏联出兵，接受并拥护新成立的军政当局。

瓦文萨现在的处境肯定与当年的纳吉和杜布切克相似。不同的是，瓦文萨没有被自己的同志背叛而像那两位政治家那样，受到从自己营垒里分化出去的政治家的审判。

可见工人阶级的政治品质反倒比政治家的高。

波兰工人阶级没有背叛自己的领袖而屈膝妥协。瓦文萨也没有背叛工人阶级而出卖整个阶级的利益。于是，军管当局所作出的两个美好的政治姿态中的一个便变得荒唐可笑了。

12月15日，有消息传出，瓦文萨与救国军事委员会之间的谈判已经中断。

这个消息表明，瓦文萨的处境已经发生变化，已不再拥有谈判的自由。人们为瓦文萨不再拥有这种危险的自由而松了口气；同时为他感到高兴。

12月16日，瓦文萨让去看望他的大主教布罗尼斯瓦夫带话，希望工人阶级在厂内举行罢工，实行非暴力抗议。

瓦文萨对大主教说："不能让国民的道义精神被冲垮"；同时，瓦文萨拒绝了军方关于举行以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波兰大主教格莱姆普和他的三方高级会谈的建议。因为瓦文萨要求会谈应在非官方所在地、并要有顾问参加的建议没有被军方接受。

瓦文萨的处境变得更加微妙，官方人士也称他"正在听候政府处置，但不是被捕。"12月17日，被拘留在华沙以南二十四公里处一个村庄里的瓦文萨，在听到当局宣布在卡托维兹的冲突中有六名矿工死亡的消息后，悲痛欲绝，心脏病发作。

12月18日，由瓦文萨书写并签名的文件被带出拘留地。

瓦文萨在信中呼吁团结工会会员，以"消极罢工藐视波兰军事管制。"瓦文萨要求工人将罢工局限在"你们能够自卫的工厂"内，要求工人"不要携带武器，应该避免流血。"他在信的结尾呼吁："要用事实证明团结工会是存在的并且正在开展活动。"12月19日，瓦文萨开始绝食。消息传出来后，当局感到紧张而不断地改变瓦文萨的拘留地点，并不得不在华沙电台上宣布："瓦文萨受到了良好的待遇，在拘留期间他的妻子、孩子和一名罗马主教神父曾去看望了他。"瓦文萨的绝食是得知19日发生在弗罗茨瓦夫的惨案后开始的。这一天，以坦克打头阵的保安部队冲进弗罗茨瓦夫的铁路机车厂并以暴力驱赶罢工工人。这次冲突有五十名罢工者被打死。

当局克制的政治姿态最终还是换成了凶猛的捕杀更大的逮捕浪潮终于向团结工会扑来。到下旬，团结工会会员及他们的支持者的被捕人数已经增加到四万九千多人。监狱人满为患。许多体育馆也改成了临时拘留营。

这数万人没有经过法律的正常程序正式逮捕，却完全被当作囚犯，有的甚至受到虐待，象"健身跑步"即受夹道鞭打。

对团结工会领导人及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逮捕也是大规模的：一千多被当局认为更重要的犯人被用飞机送到苏联或捷克斯洛伐克。

在这些被捕的著名知识分子中，有波兰最著名的电影导演、五十五岁的瓦伊达，他导演的描写团结工会诞生的影片《铁人》，在今年五月的法国嘎纳电影节上获了奖。他因这部片子而成名，又因这部影片而被捕；被捕的还有团结工会专家顾问组组长马佐维耶斯基。

镇压使对抗再一次升级在西里西亚，三十个煤矿举行了罢工，并成立了"矿际"罢工委员会；在波兹南，十三个大企业的罢工工人成立了联合行动的协调委员会；在卡托维兹省，矿工筑起街垒游行自卫。激进的矿工炸毁了一个矿井，并宣布如果当局派军警冲入矿区，他们将炸毁另一个矿井；这个省的铸造厂有八千名罢工工人在工厂周围设置了路障。他们表示，

要响应瓦文萨的号召，军管不撤退，决不进行谈判，同时还宣称，如果保安部队要强行进厂，他们将炸毁工厂。

工人们还在宣传上顽强地坚持开争。许多年轻工人走上街头，散发传单，他们中许多人被捕。但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华沙市中心巡逻的军人巡逻队，看到散发传单的青年工人后，赶紧走到大街的另一侧，而不是逮捕这些青年。

这些传单和公报要求建立秘密领导小组，以使在领导人被捕的情况下能组织工人的反抗；还要求在工厂中建立独立情报网，建立电台和广播宣传系统，以宣传鼓动军人站在人民一边。

这些传单更多是谴责军管当局的"法西斯主义"镇压手段，揭露出许多儿童、包括还在喂奶的婴儿在他们的母亲被捕之后被送到孤儿院。

这些署名团结工会的传单称这次军管"使人想起了集中营时代"，表示"我们将斗争，就象我们曾经对占领者作斗争一样。"团结工会一些幸免被捕的领导人转入地下或在国外继续组织抵抗运动，他们在国外组织抗议集会，并在巴黎、瑞典、奥地利成立了分会。

尽管有这许多接连不断的反抗，军管当局仍然是强大的一个完备而庞大的国家机器在此时充分显示了它的无比威力。

另一方面，尽管军事当局有如此不可抗拒的军事武力，它依然是难堪的、困难重重的。除了武力对抗中的胜利，他在其它方面几乎全输光了，雅鲁泽尔斯基没有退路、没有选择，他必须靠武力赢得这场赌博。

可以肯定，如果现在让雅鲁泽尔斯基重新作是否采取军事解决的选择，雅鲁泽尔斯基会有更多的犹豫。工人阶级不可能在这次对抗中战胜一个具有三十万军队和十万警察的国家机器，但仅能使雅鲁泽尔斯基有这样犹豫，那么，波兰工人阶级这次付出的代价便不会是毫无意义的了。因此，我们不要说这种反抗是没有用的、无意义和毫无结果的。

### 三十三

瓦文萨使1980年的波兰得到了举世的赞誉；雅鲁泽尔斯基却让1981年的波兰黯然失色。然而雅鲁泽尔斯基毕竟获得了胜利，并以军人警察统治给半个世界增添了一种成功的选择。

即使雅各泽尔斯基的军管遭到了举国上下的殊死反抗，但没有人将他的军管说成失败，"一时胜败在于力"的条律依然如此有力地决定着1981年的波兰历史进程。但我们却可以说，雅鲁泽尔斯基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失败是惨重的。

和工人阶级同时采取行动的是罗马天主教会。一度在政府和工人之间保持着审慎中立的教会，在强暴面前反而站到工人方面去了。接替了已故大主教维辛斯基的波兰大主教格莱姆普，从19日开始便拒绝了同官方的一切会晤，他的会谈条件是"除非瓦文萨能够参加"。19日，这位总主教就波兰局势发表了明显同情工人的声明。

他说：弟兄们：我知道在我国存在多日的那种仇恨情绪现在已激化了。

今人痛心的是，这种现象偏偏发生在圣诞节前夕。照说，这正是家人团聚的时刻。我谨代表主教团全体向那些受到颁布军管法影响的、以及亲人离散影响的家庭，表示深切悲痛和同情。

我们跪在主的面前，恳求不要发生流血，因为我们从来不曾经历过兄弟相互残杀的内战。

我以上帝的名义求你们不要互相举起仇恨的胳膊。

大主教对军管以来的波兰深感悲切，却又无可奈何，他说："我们在苦难和邪恶面前可谓束手无策。"更大的冲击来自当局内部，为抗议军管以及对平民使用武力，波兰有些军人绝食；一些将领因抵制军令而被捕。在弗罗茨瓦夫市，一些波共党员在市政大厅前扔下他们的党证，抗议实行军政管制。

当然，这些反叛的规模不大，并且由于新闻封锁而未能对当局造成较大的震动。

大震荡是12月20日从华盛顿传过来的。这无疑是爆炸在军管当局头顶上的一颗大量政治原子弹。12月20日，波兰驻美国大使斯帕索夫斯基在华盛顿宣布脱离波兰政府，要求政治避难。

这一天是星期日，在电视节目的黄金时刻，这位波兰大使向全美人民发表了谴责波兰军管当局的电视讲话。他的声明如下：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是波兰驻华盛顿大使。我是波兰资格最深的外交官，驻美大使是我担任过的第五个大使职务。

一月以前，一种战争状态已强加于波兰。这是对波兰人民宣战的战争状态。在受过特别训练的部队和警察的保护下，一场空前的恐怖统治已经开始。我们的国家已黑夜沉沉，一片沉默。

我不能再沉默了。我不能再同应该对这种野蛮和无人道行为负责的当局保持任何关系，更不要说代表它了。在我得悉团结工会最受爱戴的领导人瓦文萨已遭武力逮捕和拘留的那一刻，我作出了这个决定。

这个行动，也就是我现在所作的，是我对瓦文萨的团结的表示。我已要求美国政府给予我和我的家属以庇护和政治避难。这两项要求都已得到同意……

我要向现在正在听我和看我讲话的美国人民讲话。

此时此刻，当你们坐在电视机前的时候，罪恶的势力正在践踏波兰，践踏有着强烈爱国心和笃信宗教的波兰人民。请你们想着这些波兰人，请你们每天听新闻的时候设想一下他们的遭遇。请记住，他们，这些工人、学生、知识分子是我们祖国最优秀的儿女。

现在，让我对波兰人民说几句话。所有在国外的波兰人都向你们致敬。在波兰成为波兰

和你们享有大家都应享有的尊严之前，我们绝不停止斗争……

我现在还想对波兰驻外使团的外交官说几句话：要做波兰人，要忠于自己的信念。要本着自己的良心行事来帮助我们波兰国内的兄弟姐妹。

这真是共产世界政坛上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它的连锁反应是12月21日，波兰驻纽约副领事为抗议军管而要求在美国政治避难；12月23日，波兰驻日本大使鲁拉尔兹在东京宣布辞去波兰驻日大使职务，并打算到美国政治避难。

鲁拉尔兹在飞往美国途中，发表了简短的声明：我决定辞去大使的职务，辞职的理由是波兰被引进了战争状态。这种战争状态是违反波兰人民利益的……因此，我不能代表否定波兰人民基本人权的波兰现政府。我将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从日本到美国去要求政治避难。我担心。我的避难会使我在波兰的母亲、弟弟、妹妹遭到当局的迫害。

政治避难的浪潮迅速增涨，数以万计的海员、渔民、旅游者、运动员、企业家在奥地利、英国、西德、瑞士、意大利、荷兰、法国、加拿大、南非要求政治避难。

1980年是瓦文萨年，他因波兰团结工会的成立而闻名于世，登上了1980年国际十大新闻之首；1981年是雅鲁泽尔斯基年，他以军事管制而使波兰在国际十大新闻中夺魁。

1981年12月24日，日本时事社列出1981年国际十大新闻，第一条就是“波兰宣布紧急状态，过渡到军事管制”；而最后一条是“中国经过对‘四人帮’的严厉审判，胡耀邦体制诞生。”令人痛心的枪杀工人的悲剧发生后，日本三家最大的报纸《经产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同时于12月19日发表社论，对波兰的危机和悲剧表示了极大的忧虑。

《朝日新闻》的社论是《波兰以流血而失去的东西》：“把枪口对准同胞，即使暂时维持了秩序，以此而失去的同胞的信任恐怕是不可挽回的。为了防止更大的流血，我们再次要求雅鲁泽尔斯基早日结束军管……”

“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对于波兰可以说是最后一张王牌，如果用尽这张王牌，而事态越演越烈，那么这个国家的前途将日趋暗淡。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苏联将不得不被拖进波兰问题……”《每日新闻》的社论题为《在刺刀下得不到再生》：“军队掌握政权是不是根据救国之念来进行的，要讨论这个问题，材料还很不足。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以武力为基础是无法拯救这个国家的……”

“雅鲁泽尔斯基政权想要恢复秩序反而正在破坏理应成为国家原动力的各种势力，时光流逝，解除非常状态就越困难。”

“应该早日结束军营，释放被捕者，恢复党、政府、团结工会、教会之间的对话，再生的道路只有确立在坚韧不拔的谈判基础上的国民一致……”很少有哪位政治家面临过如此严重的政治困境，很少有哪一位统治者经受过如此众多的、来自国外的舆论谴责。

我们很难判断这些政治上的压力和道义上的谴责，可能对波兰历史具有什么样的深远意义，但就眼前论，它丝毫不能阻止已无退路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用武力解决的道路上走下去。

军管后第十二天，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终于粉碎了形式的大规模反抗。他结束了一个时代至少是暂时停止了一个新时代。1981年12月24日晚上，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发表电视广播讲话。

他宣布："国家分崩离析的过程已被制止，结束了无政府状态。"是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以武力击溃了对政府权力的各种挑战，重新树立了政府的绝对权威。雅鲁泽尔斯基拯救了这个政权。在政权等于国家的等式中，当然还可以带出结论，说雅鲁泽尔斯基拯救了国家。

雅鲁泽尔斯基获得了胜利，也使这半个世界获得了胜利他证明军队和警察力量完全可以与民主力量相抗衡。

1981年12月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波兰。

是的，雅鲁泽尔斯基成功了。在他宣告动乱已被制止四天之后，冲突最为激烈的波兰南部矿区的煤矿工人结束了罢工罢工委员会被解放，在井下坚持罢工斗争的煤矿工人也分批返回地面。

许多团结工会会员告别了自己的组织，告别了政治，去履行和行使他们唯一的责任和权力干活，做劳动的主人；而数千名拒绝与团结工会公开脱离关系的工人被解雇了。

这盏使波兰变得光彩夺目的明灯，这盏使半个世界翘首仰望的明灯暗淡下去了，它的最后一线光亮的熄灭是在12月23日。这一天，一直坚持绝食斗争的瓦文萨停止了绝食。有人劝说他，不应该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因为他仍可能在这场并未结束的危机中起重要作用。

这个大战役失败了，但工人阶级还在，瓦文萨还将战斗下去。

瓦文萨开始吃东西了，他不会忘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更不会忘记那句不朽的名言只要我们还活着，波兰就不会灭亡。

#### 三十四

当这幕悲壮的史剧在刺刀的威迫下沉重地降下大幕时，整个世界都为波兰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尝试所震撼；但人们相信，这仅仅是序幕，而在下一幕，工人阶级将是不可战胜的。

1981年只剩下几天生命了。当他带着遍体创伤，带着最珍贵的人生经历告别波兰时，一定对自己这次匆匆往来怀着深深地怀念和悔痛；只有经历过刻骨铭心人生体验的人，才能领会这种既有赞叹、又有恐惧，既振奋、又有疑虑的矛盾心理。

1981年的最后三天，坚持到最后的西里西亚煤矿工人解散了"罢工委员会"，12月

29日，他们将复工。

这个世界的秩序恢复了。至此，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历史决战结束了。

波兰工人阶级失败了在强权的暴力打击下失败了。

当这幕悲壮的史剧在刺刀的威逼下沉重地降下大幕时，所有观看过这幕伟大的史剧、并为之震撼过的人，都会带着忘我的冲动为之鼓掌。这幕剧的主角是波兰工人阶级。

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无愧于这掌声该做的他们都做了，能做的他们都做了；即使结局的失败是清清楚楚的，他们也勇敢地走向结局直至最后一刻。

他们失败了，但留下了希望，留下了新的目标，还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教训。

这教训是珍贵的。

我们常常赞扬科学家在成百次、上千次的试验中去总结教训、寻求经验，并因此赞扬他们的坚韧和艰难；然而，我们却忽视了科学家能有成百上千次实践的机会是多么的幸运，他们正是有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权利，他们的事业便容易多了。

工人阶级要以鲜血和生命才能获得尝试、实验的权力。对他们来说，实验本身就是如此珍贵、难得，没有那个阶级的有挥霍鲜血的奢侈，他们必须在一次实践中获得尽量多的成果、尽量多的教训，所有这些珍贵的。

波兰工人阶级的成功无须赘述，历史会书写的，历史会铭记的；历史会从中吮吸到大量的养料而有了更健康的成长；至于教训，则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铭记，他们已经流过太多的血，他们无权忘记。

1981年的教训是无须掩饰的。

波兰工人阶级是懂得伟大的历史性妥协的，正如瓦文萨所说，"团结工会不是政党，也不想成为政党。"波兰工人阶级懂得他们的斗争比传统的、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斗争更加艰难。他们应该始终在进攻与退法、情感与理智、对抗与妥协、争权与合作之间保持住平衡。

这是更加深奥的斗争艺术。

工人阶级既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又要避免使对方在斗争中彻底倒塌，甚至要避免使对手过于难堪，避免使对手最后摊牌……要作到这些，工人阶级既要有纪律、团结、顽强、勇敢，还得有理智和克制。

波兰工人阶级在争取自治组织合法化的斗争中，既能顽强地坚持罢工，又能克制而秩序井然地进行有组织、有步骤的政治斗争，因此他们胜了第一个回合；然而在第二阶段，在争取参与权时，他们显然过于急躁了。

这本是比第一回合的斗争更艰难、更陌生的争斗，这要求波兰工人阶级有更多的理智和耐心，既然参与权的制度化、法律化将使当局付出更大的代价，那么，这代价就不应该一次索取太多，而应该是渐进的、以让双方都能逐渐适应和习惯。

这是深刻的教训，但又是无可指责的因为这是工人阶级的第一次实验，因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们这个星球的任何地方还没有作过这样的实验。

在我们为工人阶级总结教训的时候，另一方，当然会总结经验成功的经验。

强权确实是解决危机的最佳手段。看来军事比政治更有力量，看来雅鲁泽尔斯基比盖莱克、比卡尼亚都更有魄力；看来，只要牢牢地控制着军队和警察，只要有魄力在国内事务中动用武力，一切动乱都可以消除。

这是雅鲁泽尔斯基创造的成功经验。

雅鲁泽尔斯基胜利了，波兰共产党和波兰政府、或许还有半个世界的政治家们都将为他的胜利高兴：党和政府的权力收回来了，党和政府又可以不受干扰、不必担忧地行使权力了。

这是重大的胜利。

没有得到关于波兰工人阶级对这次胜利的态度。工人阶级沉默了、舆论也沉默了。能看到的最后一则消息是国际合众社于1981年12月26日发出的电讯，说“军管把已实现的改革全部取消了。”这则电讯说：“有权成立工会，有权罢工以及给予波兰工人的其它自由全部废除了，像每周工作五天这样的福利，也由于军管而取消了。”波兰也沉默了，对雅鲁泽尔斯基的胜利保持着顽强的沉默。她默默地接受了军管期间对她的严厉整顿1982年10月8日，军管当局宣布：“正式取缔还在制造不安定的团结工会；同时颁布了新的劳动法。恢复每天八小时，每周六日工作制，监督被军管的企业执行政府法令，对完不成生产任务和违反劳动纪律者，一律按现役军人惩处条例惩处。”①历史也沉默了，将近两年时间，历史象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默默地回忆和思考着；或许，这个比喻不恰当历史会衰老吗？或许历史只是被疾风暴雨般的十六个月搞疲倦了，他得歇息一下，喘一口气。

是的，历史也是需要休息的。1983年10月，缓过劲来的历史突然宣布，波兰工人阶级的象征瓦文萨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尽管波兰政府为此提出抗议，瓦文萨的妻子达努塔·瓦文萨还是于12月9日去挪威领取了她丈夫的诺贝尔和平奖金。

这时，离1981年12月13日波兰军管刚刚两年。

历史确实是不着急的因为他永不衰老，又等了五年，在1989年4月，历史又以他那沉着的声音宣布：波兰政府与瓦文萨会谈，讨论关于恢复团结工会合法地位的问题。

慢性子的历史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把最后的结论说出来，但全世界的人们终于在电视上见到了瓦文萨还是炯炯有神的目光，还是浓浓的八字胡，只是他的鬓角已经有了白发。



呵，历史，您可看到了，瓦文萨老了！

呵，历史，您看到了吗，这一代人又老了！

## 1956 年匈牙利事件真相

50 年前的 10 月 23 日，布达佩斯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

行，随后演变为流血冲突。10 月 24 日和 11 月 4 日，苏联两次派兵镇压，史称“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事件在世人心是一个无法抹去的记忆。今年在它发生 50 周年之际，匈牙利、波兰、法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都举行了专题研讨会，力求根据匈牙利、俄罗斯、中国等国解密的相关档案文献，超越过去简单地讲它的是非曲直的做法，理性地分析前因后果，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

关于匈牙利事件的起因，冷战时期有两种基本的看法。西方认为这是一场革命，是匈牙利人民对苏联的控制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抗，是为了实现从“集权制度”向“民主制度”的回归；社会主义国家则认为，事件是匈牙利国内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势力与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里应外合的结果，目的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在匈牙利本土，这一事件在上世纪 70 年代之前被定性为“反革命案件”，但在剧变后又被称为“人民起义”，“与 1848 年~1849 年的革命和自由斗争具有同等的意义”。

匈牙利事件真相到底如何？

山雨欲来

匈牙利事件是在匈社会各种矛盾不断累积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爆发的。1947 年以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即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后的名称，事件后改称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主要领导人拉科西不顾本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一味照搬苏联模式。匈党和国家领导人听命于苏联的做法，损害了国家利益，伤害了人民的民族情感。

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新领导人的推动下，苏联和东欧国家对以往内政外交做出了一系列调整。在匈牙利，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纳吉·伊姆雷实施了“新方针”，比其他东欧国家更早地开启了“非苏联模式化”进程。

但由于苏联的干预，“新方针”实施了 22 个月就被迫中断。此后，纳吉以著述方式进一步提出以匈牙利社会主义道路取代苏联模式、以主权独立与民族平等反对苏联控制，这些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共鸣。“新方针”中断后，匈牙利向旧政策复归，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随之恶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但拉科西等人不仅对过去的种种错误一味加以

掩饰，甚至打算用暴力手段镇压党内外要求改革的声音。

最初两天

就在匈牙利政治风暴欲来之际，10月20日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顶住了苏联的压力，选举了主张走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这极大地鼓舞了匈牙利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在22日的集

会上，他们提出了以反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为主要内容的“十六点要求”，同时决定第二天(23日)举行静默游行声援波兰人民。

10月23日，布达佩斯的大学生拉开了匈牙利事件的序幕。下午3点，10000多名学生从艺术学院和技术大学出发，向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的雕像和波兰将军约瑟夫·贝姆的纪念碑行进。沿途不断有人加入，到目的地时人数已高达几十万。游

行人群高呼“是匈牙利人就站到我们这边来”、“俄国佬滚出去”、“把拉科西投入多瑙河”、“我们要纳吉”等口号。游

行队伍到国会大厦后，人们要求纳吉出来讲话。经反复劝说纳吉勉强来到了游行人群前面，劝说人们保持冷静。

但接替拉科西任匈党第一书记的格罗在电台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他把几十万示威群众称为“匈牙利人民的敌人”，将人们对匈苏不平等关系的指责斥为“卑鄙的谎言，怀有敌意的杜撰”。这番火上浇油的讲话令示威人群由不满转为愤怒，示威者冲进电台，要求向全国广播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他们开始向电台大楼发起攻击。流血冲突开始了……

为了缓和矛盾和稳定局势，匈党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的人事做出了调整：党的第一书记仍由格罗担任，纳吉取代赫格居斯重新出任部长会议主席。

纳吉本人对这一切并不知晓。赫格居斯回忆说，纳吉被紧急叫到国会后，“坐在那里喘气，有点心神不定”，“很疲惫”。但是，他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就接受了要他在紧要关头出任部长会议主席的建议。24日中午，在通过电台发表的“告匈牙利人民书”中，纳吉向人民承诺：政府将在“1953年6月决议”的原则基础上，全力实现国家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彻底民主化，“走符合我们民族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匈牙利道路”。

苏联第一次干预

23日事件发生不久，格罗就向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请求苏联派军队对付游

行示威。苏联领导人对匈牙利领导人没有命令军警向示威人群开枪表示不满，认为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错误”。23日晚10~11点，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多数成员同意立即出兵。24日下午，在没有获得匈牙利政府正式邀请的情况下，苏联发动了代号为“行动波”的第一次干预行动。档案记载，根据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的决定，由第128步兵师和第

39 机械化师编成的苏军部队于 2 时 15 分越过国境线进入匈境内。

与此同时，由苏共领导成员米高扬、苏斯洛夫、谢洛夫组成的三人代表团赶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他们到后发现，局势并不像格罗所描述的那样到了“灾难性”的地步。但此时苏军已经进入匈牙利，事件变得更为复杂。一些工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许多工人参加到抵抗苏军干预的行列，匈牙利军队纷纷倒戈，大批武器流向社会。“一场匈牙利和苏联之间的冲突开始了”。25 日，布达佩斯发生两起流血事件：其一，当大批群众在议会大楼前集

会时，有人从附近的屋顶向苏联士兵射击，苏军的一辆坦克被烧毁。苏军随即开枪还击，打死了 60 名匈牙利人。其二，在匈党中央大厦前，苏军坦克兵把走近的匈警卫部队当成叛乱者开枪射击，又有 10 人被打死。此后，布达佩斯市内枪声不断，其他城市的形势也紧张起来。全国各地掀起了总罢工，要求苏联军队撤出的呼声越来越高，游

行示威演变成了骚乱。

当日，纳吉在电台再一次发表广播讲话。他说，匈牙利政府将与苏联就两国关系，特别是苏联军队撤出问题进行谈判，匈牙利局势一旦恢复正常，苏军就应被立即召回。苏联代表团却发表声明说，苏军撤出匈牙利是不现实的，“但可以宣布在布达佩斯恢复秩序以后，苏军回到自己的驻地”。

无力回天

25 日流血事件发生后，经苏共同意，匈党中央罢免了格罗的职，由卡达尔继任第一书记，当天局势也趋于平静。纳吉期待着匈牙利事件能有一个“波兰式”的解决结果。然而此时，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带来的痛苦和怨恨刺激着匈牙利人，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吸引着他们，波兰的成功鼓舞着他们，西方的宣传煽动着他们，苏军的坦克威逼着他们，多年来压抑在心头的民族屈辱感在激励着他们。因此，人们越来越激进。纳吉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就试图以谈判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他开始不停地接待一波又一波的代表团。

此时，匈党党员纷纷退党，人数由 87.1 万骤降至不到 3.8 万，匈牙利社会主义的名誉也受到很大破坏，民众提出了各种各样混乱而激进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10 月 26 日，纳吉向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表示，鉴于前来与政府谈判的各类代表团越来越强烈地提出更换政府的要求，匈牙利党和政府目前最可行的是改组政府，具体来讲，就是从过去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以及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工人中，吸收五至六名拥护人民民主的著名民主人士参加政府。这一选择经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全体通过，也得到了米高扬等人的认同。27 日，纳吉宣布了新政府的组成名单。

新政府成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定性这场骚乱。鉴于参与者中虽有一些旧军官、刑事罪犯，但绝大多数是学生、倒戈军人以及工人和市民。所以，在当晚召开的内阁会议上，纳吉要求改正对该事件性质的提法，承认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具有人民和民主根源的运动”，建议与骚乱者进行协商以稳定国内局势。

28 日下午 17 点 25 分，纳吉公布新政府宣言，认为这是一场民族民主运动，是“不久以

前的严重罪行引发了这次声势浩大的运动”；他还公布了新政府的施政纲要；做出了两个有关时局的决定，一是制止流血事件，立即实行全面停火，二是匈苏两国政府将就苏军尽早撤离达成协议。

29日，停火令正式生效，苏军开始撤离。然而，这一切来得太晚，近8000名刑事罪犯卷入到混乱之中，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了武器，四处打砸抢劫。

与此同时，民众对纳吉新组成的政府也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一个吸收了几个非党派人士的政府仍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他们要求必须在自由选举的基础上由多党联合组成新政府。

### 苏联第二次出兵

最初，苏联领导人在如何处理匈事件问题上意见并不统一。莫洛托夫等强硬派主张立即派兵镇压；米高扬等温和派则主张依靠纳吉来控制局势；赫鲁晓夫则取调和立场，一方面迅速派出武装力量，同时对纳吉政府采取了密切关注但暂不干预的政策。但28日以后苏联领导人的态度明显转变，赫鲁晓夫在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宣布，苏联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在匈牙利整顿秩序”。

根据历史档案等史料，导致苏联态度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是西方的关注以及各媒体报道产生的负面影响；二是中共和意共的支持；三是匈牙利局势的恶化。30日清晨，布达佩斯共和国广场发生了一周以来最为严重的惨案，国家保安局新兵被活活打死，国防部两名上校被残酷杀害，布达佩斯市委书记也不幸遇难；四是苏共中央领导层对事件和纳吉的看法渐趋一致，认为这是一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暴乱，纳吉已背弃了社会主义。苏联领导人决定再次对匈牙利进行干预。

31日晚些时候，纳吉获悉苏军正大规模地越过边境，向布达佩斯方向行进，就向苏联驻匈使馆提出抗议。11月1日19点40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代表政府正式宣告匈牙利中立，同时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通报匈牙利政府立即废除华沙条约，要求四大国给予援助来保卫这个国家的中立。

匈牙利政府宣布国家中立后，接到了苏方同意立即就撤军进行谈判的口头照会，纳吉随即派代表团与苏方开始谈判。苏军入境的消息使匈各政党和社会各阶层与政府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一致。与此同时，纳吉开始着手改组政府。11月3日早，新的多党联合政府在团结一致的气氛下组成。共产党、小农党和社会民主党分得三个部长席位，裴多菲党占两个部长席位。但名单中的共产党员部长之一、匈党第一书记卡达尔已于11月1日晚“失踪”。

3日晚10点，帕尔将军率领的匈牙利代表团与苏方开始谈判。史料表明，谈判进行一半即被苏联克格勃主席萨罗夫率人打断，匈代表团成员被抓。4日凌晨，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一刻钟后，纳吉向全国人民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今天黎明时分，苏联军队开始进攻我们的首都，其明显的用意是推翻匈牙利合法的民主政府”。匈牙利军队没有进行抵抗。15分钟后，苏军17个师的兵力向布达佩斯发动代号“强风”的军事行动。

## 结果与余音

历时 13 天的事件给匈牙利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据不完全统计，经济损失相当于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3/4$ 。1991 年匈牙利当局公布了一份当年的绝密报告：事故中死亡人数共计 2700 人，其中体力劳动者 1330 人，大专院校学生 44 名，中学生 196 人。另有约 20 余万匈牙利人逃往西方。

纳吉个人的命运也很耐人寻味。纳吉及其政府成员携家人共 47 人前往南斯拉夫驻匈使馆寻求政治避难。11 月 22 日，在得到匈牙利方面将纳吉等人送回各自家中并保障其安全的承诺后，南斯拉夫同意纳吉等人离开使馆。可是，纳吉等人坐的车刚驶离使馆就遭到苏军的劫持，第二天被送至罗马尼亚，软禁在靠近布加勒斯特的斯那科夫政府别墅。1958 年 1 月 28 日，“纳吉案件”的审理在布达佩斯正式拉开帷幕。纳吉被指控犯有“发动并领导阴谋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罪行和叛国罪”。1958 年 6 月 16 日，媒体公布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关于判处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谋者死刑和徒刑的公告》。

“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匈牙利事件 50 周年祭

●匈牙利悲剧的 13 天震撼了历史，分裂了共产世界。流血的双方都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战斗；胜利者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审判，失败者在临刑前呼喊，社会主义万岁。

1956 年是共产世界的灾年，重灾区在匈牙利。

1956 年 10 月 23 日到 11 月 4 日，13 天时间，匈牙利内政两次受到外国军队的干预；有上万公民死于动乱；两次撤换和推翻国家首脑。

这 13 天内，匈牙利宣布过解散共产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宣布过取消一党制，宣布过退出华约组织，宣布过中立；

这 13 天内，它的一届政府向联合国呼吁，要求给予援助以保卫它的中立，而另一届政府却致电联合国，坚决反对把匈牙利问题提交安理会或联合国大会讨论；

这 13 天震撼了全世界……联合国成立了匈牙利问题特别委员会；

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都发表声明，对这 13 天进行表态……

一位西方的政治家甚至说，“只要你告诉我对匈牙利事件的态度如何，我就可以判断你是什么样的人。”

这 13 天震撼了历史，使它无法再以半个世纪形成的惯性力量来主宰这半个世界了。

这 13 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很简单，学生和工人上街游行，要求一位政治家执政，要求另一位领袖下台；他们要这样的改革，反对那样的体制。这种介入和干预造成了骚动和流血、死亡……

如此而已，尽管严重，但自从有了政治，这种动乱就在所有的国家发生过。

然而，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骚乱？历史会给这 13 天一个什么样的定性呢？

美国共产党说，匈牙利事件使他们党“碰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问题”。

面对这个难题，有着共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各国共产党，却有完全相反的立场和态度——

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说：匈牙利事件“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民族革命’，而是反革命”；

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铁托说：匈牙利事件是“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进步的愿望和国家与政治领导机构的活动之间产生了矛盾，最后导致武装斗争的爆发”。

荷兰共产党中央说：“这次事件是一场暴动，一场企图以武力来摧毁和玷污匈牙利人民民主新政权的事件。”

美国共产党说这是“一种争取民主化、争取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和争取在他们同苏联的关系中取得完全的国家主权和平等地位的人民起义”。

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说：“帝国主义者和他们指使下的匈牙利国内外反革命分子……利用人民正当的不满情绪，发动了武装暴乱，企图摧毁匈牙利人民社会主义制度，企图恢复资本主义和法西斯的恐怖统治。”

如果再加上西方国家的宣言和声明，这个复杂的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只能从许多声明中寻找这样的相同点——这是一场灾难，一个悲剧。

这悲剧的 13 天，这难以评说的 13 天是伊姆雷 DangerCode;纳吉执政的。

纳吉于 1956 年 10 月 23 日由人民拥戴上台，成为半年来匈牙利第三位国家领导人。13 天后，纳吉和他的政府被推翻；一年后，为了追究他当权 13 天的责任，他被处以死刑。

看到这儿，或许读者会认为这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复辟事件——社会主义的匈牙利被武装暴动颠覆，后来复辟被粉碎，反革命头子纳吉被处以死刑。

然而，这样理解过于简单——因为纳吉在绞刑架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 “匈牙利事件”中的中国武官

在众人眼中，驻外武官风光无限，新中国第一批武官被誉为开国武官，都是从军队中精挑细选出的人才。昔日这些冲锋陷阵的将领走上折冲樽俎的外交战线又是怎样的潇洒倜傥呢？我们从航天干部杨震亚对父亲杨亚中传奇经历的追忆中，可以见一叶而知秋了。

### 四野勇将当上开国武官,江西音俄语赢来大拇指

能称得上新中国开国武官的只有 13 位(基本上都是驻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和朝鲜、越南)，杨亚中是其中之一，曾驻捷克、匈牙利等国家。上世纪 50 年代，匈牙利爆发了举世震惊的“十月事件”，身处风口浪尖的外交官们遭遇了生与死、荣与辱的考验。如今，杨老先生已经故去，很多历史疑团无法揭开，但从他生前只言片语的披露中仍可以感受到我武官临危不惧，捍卫国家尊严的风采。

杨亚中是 1949 年 11 月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后，从四野 133 师的领导岗位径直走上外交战线的。出国前，外交官们先在北京进行了短期培训，学习内容新颖而繁杂，从业务、政策、外语到外交礼仪，甚至吃西餐用刀叉、穿西装打领带、穿旗袍和化妆也列入课程。都是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老战士，哪习惯拘泥这么多繁缛小节？那些陪丈夫出国的妻子，一听说要被称“夫人”打心里反感。穿惯了宽松质朴的军装，忽然改成紧身的旗袍，既不好意思又浑身不自在。学跳舞时，夫人们抵触情绪更大，搂搂抱抱不是资产阶级太太小姐那一套吗？面对抵触，上级不得不挤出时间组织大家学习讨论，统一思想。培训期间朱德、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及军委情报部长李克农都来问候，看到首长们如此支持，外交官和夫人们才放弃了“抵制”。

杨亚中是首任驻捷克斯洛伐克武官，1950 年底到任时才 33 岁，正是再创业的好年华。驻外的几年中，他并不忌讳自己在文化知识上的不足。其实，提高文化知识，学习外语是开国武官们普遍面临的难题。杨亚中的历练过程很有代表性，他拿出了战争时期冲锋陷阵、舍生忘死的劲头，连死都不怕，还怕别的困难吗？

当时中国驻捷大使馆请了 1 个捷克女教师教俄语，高大威猛，严肃认真。杨亚中卷舌音发不好，于是整天“嘟……嘟”地练，同事们离挺远就知道是杨武官来了。打扫卫生的捷克女服务员听到这奇怪的发音，开始忍不住笑，后来也被他坚持不懈的精神所打动，频伸大拇指表示佩服。好不容易卷舌音过关了，可那 1 口江西乡音念出的单词常引得大伙哄堂大笑，连那位严肃的女教师也破颜而笑。但杨亚中硬是凭借 1 口“江西音”结交了大量外国朋友，赢得各方称赞。

杨亚中卸任时，捷方为表彰他在中捷两国关系上作出的贡献，特意赠送 1 支捷制的双筒猎枪。捷克造枪业十分闻名。据说这次送枪也是一曲绝唱，以后历届驻捷武官再无人享此殊荣。遗憾的是，这支来历不凡的枪在“文革”中被有关部门强行收走，至今杳如黄鹤。

## 身处险境密见首领纳吉 五星红旗被扯痛斥暴行

匈牙利是1个美丽富饶的国家，闻名遐迩的多瑙河涓涓不息地穿过布达佩斯。1955年，杨亚中陆军大校调任驻匈武官，一到任就被这里秀美的景色所吸引，然而正当他满怀信心开展工作的时候，第2年秋，震惊世界的“十月事件”在匈牙利爆发，这场风波造成了匈国内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中国驻匈使馆也在动荡的局势中一度危机四伏。作为武官正是独当一面的时候，既要完成国内交给的搜集情况任务，又要不时出面与匈的各政治力量斡旋。

那个时候，正在国内上小学6年级的杨震亚被父亲托付给老战友，远方的动乱让小小年纪的儿子每天为父母的安危害怕，直到从收音机里传出父亲“遥远”的乡音才有了靠山的感觉。那天，广播里滚动播出杨亚中代表中国政府慰问难民的讲话。杨震亚霸占了收音机，听了1遍又1遍。看到许多小朋友投递过来的羡慕眼神，少年的杨震亚又美美地自豪了1回。

杨震亚后来听父亲讲，“十月事件”让匈牙利的局势动荡不安，完全处于失控状态。街头乱枪时常响起，电线杆上吊着的公安军尸体随风摆动，没有经过战争的人看了真会心生恐怖。杨亚中身经百战，血雨腥风并不在意，可对于事件的走向也是心里没底。中国驻匈大使馆还常常遭到流弹袭击，处境很危险。使馆的食品供应早已无人顾及，幸亏之前保存了1批准备开宴会的肉鸡。敢情鸡肉味道再美，也架不住天天吃，虽说靠鸡肉勉强度过“饥荒”，可是以后见到鸡肉就反胃，杨亚中算是与美味彻底绝了缘。

由于工作上的需求，处境再险恶也不能临阵撤离，并且还要身先士卒。身为武官，收集情报向国内通报更是杨亚中义不容辞的任务，那段光阴是杨亚中外交生涯中最危险最忙碌的日子，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驾车往返于大街小巷收集信息，哪里枪声密集就到哪里去。他的汽车曾遭到武装人员的围困，他们用木棍枪托敲打着汽车，狂呼口号，面目凶狠，有人竟还将车上的五星红旗扯下，被激怒的杨亚中大义凛然，挺身上前，大声痛斥这种恶劣的无理行为，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动乱期间，杨亚中还接触了匈牙利大名鼎鼎的反对派领袖纳吉，他坚持原则，不辱使命，鲜明地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十月事件”后期，苏军坦克开进匈牙利，纳吉遭到逮捕，并被处以绞刑。动乱平息之后，周总理和贺龙秘密访问匈牙利，杨亚中随2位领导人参加了很多不公开的活动。杨亚中回国后，因其在“十月事件”中表现出色，很多单位请他作报告，着实风光了一番。

## 乐善好施招来新婚夫妇 仗义执言拍裂茶几玻璃

1960年杨亚中领命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任政治部主任。一分院就是今天享誉中外的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从外交战线走上科技战线的杨亚中再次实现了完美的转换，留下了1段新的佳话。创业伊始，条件艰苦，冬天，大学生宿舍气温低，杨亚中就带头腾出1间房请了3名学生来住。有1一技术人员新婚无房，或许是久闻杨亚中扶危济困的人品，特找上门来要求暂住。杨亚中二话没说开门揖客，帮了小两口的大忙。如今，这名技术员已成为研究院领导和型号总指挥。艰苦岁月，工资不高，杨亚中1个月也就200元左右。但他仗义疏财，无私帮助了很多有困难的职工，经常工资还没到家已被借走大半。然而令他伤心的是，在政治运动中，一些蒙恩受助的人，竟污蔑他利用金钱腐蚀干部，好在杨亚中心胸豁达，没放在心上。而更多的干部职工对他感情深厚，交口称赞，都亲热地直呼“杨老头”。



10年浩劫，航天系统也成了重灾区。杨亚中受到严重冲击，是第1个被罢官的院领导，还为1起惊天大案背了“10年黑锅”。众所周知，姚桐斌是航天材料工艺的奠基人，为我国航天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是周总理费尽心机从国外请回的专家。1999年，他去世30年后，仍享受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至高荣誉。可谁又曾想到这样1个“国宝”级人物竟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中央为之震怒，而有人竟嫁祸于杨亚中。当时，姚家和杨家是邻居，1968年6月8日姚桐斌被造反派从家中拖出去野蛮殴打，气息奄奄，杨亚中的妻子发现躺在地上的姚桐斌后，要送其去医院，可遭到造反派的拒绝。在杨家的帮助下，身受重伤的姚桐斌被抬上楼，杨亚中的妻子为其消毒包扎，可最终还是没能挽留住专家的生命。造反派捅了大娄子后，推脱责任，诬蔑杨亚中参与“幕后预谋”，这个罪名整整背了10年。1个被打倒的人还能“幕后指使”成了当时的笑谈，况且姚桐斌遗孀写的《航天情》一书中对杨家的无私帮助曾给予了赞扬。然而，直到1978年杨亚中背负了十年的罪名才被洗刷。

“文革”中杨亚中的许多战友也受到迫害，杨家净来些外调的人，每次杨亚中都实话实说，不曲意迎合。1次，2个调查人员不满意调查结果，想方设法诱导杨亚中说违心的话，杨亚中忍耐不住，怒发冲冠，一掌拍在茶几上，玻璃板都被震裂。

杨亚中在航天一院资历最老，可他不图名利，直到离休还是院副书记，他从未怨言，甘之如饴，从不摆老资格。然而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的历史功绩，1983年，杨亚中享受到副部长待遇。1984年11月4日，杨亚中积劳成疾，不幸在北京去世，享年只有68岁。如今我们的外交、航天事业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年又适逢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建院50周年，作为外交和航天战线上的老同志，杨亚中若是九泉有知，想必也含笑称许了。

### 《燃烧的多瑙河》：拨开匈牙利事件的迷雾-华网在线

6月27日，欧洲各国代表聚首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整整20年前，匈牙利和

奥地利两国外长剪破两国边境上的铁丝网，使得“铁幕”出现第一道裂痕，此后

上万东德国民由此绕道抵达西德，成为柏林墙倒塌的先声。关于20年前的匈牙利，

我所知甚少，它不像捷克斯洛伐克拥有哈维尔，也不像波兰拥有“团结工会”，

甚至不像罗马尼亚拥有一个“伟大的小丑”齐奥塞斯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公众对匈牙利的了解，似乎只是裴多菲，对裴多菲的了

解，只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对于这首诗

的了解，也仅限于把它当作名人名言。对于裴多菲投身的1848年革命，对于诗中

的“自由”，对于匈牙利的历史尤其是“裴多菲俱乐部”，我们只是浅尝辄止、

悬崖勒马。

《燃烧的多瑙河：匈牙利 1956 年事件真相》把目光聚焦在 1956 年的匈牙利，即“裴多菲俱乐部”前后的匈牙利，主要是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4 日的 12 天。虽然时间跨度有限，但是一叶知秋。作者侯凤菁曾任新华社布达佩斯分社首席记者、东欧室主任，这让我想起《波兰独立之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年 6 月）的作者、曾经担任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一等秘书的郭增麟先生。这些著作都是他们自留地里的成果，因此写作风格与他们的工作文体迥然不同，更具个人特色。侯凤菁还是《炎黄春秋》的作者，先后发表《还纳吉以清白》（2008 年第 2 期）和《裴多菲俱乐部真相》（2008 年第 5 期）。

侯凤菁讲述的这段历史，沉郁顿挫：

“二战”时期的匈牙利属于法西斯阵营，战后一度是多党联合执政，随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通过“切香肠”的分割战术成为唯一的执政党。斯大林“最好的学生”拉科西确立了一党制之后，开始党内清洗，席卷了三名党的总书记、一名国家主席、若干名副总理、几十名部长、约百位将军，一个 900 万人的国家有 150 万人被起诉。一些久经考验经受过盖世太保严刑拷打的高级官员，对自己勾结海外反动势力试图颠覆政权的罪行供认不讳。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有很多种解释。一名内务部长出狱后对朋友说：“霍尔蒂和盖世太保统治时期的监狱是够坏的了，但是与拉科西统治时期的监狱中受的折磨相比，根本就算不了什么。”还有一种解释是“苦肉说”，即告诉这些同志，党知道他们是无辜的，但为了唤起人民的革命警惕性，他们需要忍辱负重，在法庭上扮演特务，于是这些同志信以为真。与此同时，国内建设贯彻斯大林“没有重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精神，一方面工人和农民享受不到“按劳分配”的生

活用品，另一方面高级官员却感觉已经提前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

这种“外嫩里焦”的局面难以为继，1953年斯大林死后，苏联老大哥决定拉科西下、纳吉上。纳吉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同志，曾经担任过高级职务，由于不同意农业迅速地、全部地合作化，一度被发配到首都以外的地方。他上任后，开始了“新阶段”改革，取得成效，以至于没有全退的拉科西认为“人民生活水平太高了”、“应该加以严格紧缩”。1955年，随着苏联内部的人事更迭，纳吉下、拉科西上。59名知识分子联署一份“备忘录”，反对在文艺领域推行强制的行政手段，此举被视为“反党反人民”，签名者受到惩罚，纳吉也被株连。但此时，纳吉正在将注意力放在撰写政治论文上，他表示“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标准，而不应该使生活服从糟糕的理论”。

1956年苏联“二十大”使得东欧也感受到解冻的暗流，裴多菲俱乐部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万众瞩目”并非夸张，一场讨论会从下午6时半持续到次日凌晨4时，听众多达6000人，甚至秘密警察都向上级表示无法继续执行任务，因为他们开始赞同发言者的观点。于是，拉科西下、纳吉上。此次拉科西是全下，直接到苏联定居，直到去世也没有还乡。纳吉开始为冤假错案平反，学生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进行经济改革、实现民族独立。

10月23日，布达佩斯各界群众进行集会，重申学生的要求。根据华沙条约，苏联驻军只有应所在国政府要求才能出兵，但是10月24日，苏军不约而来，坦克驶上布达佩斯的街头。不明真相的苏联士兵被告知匈牙利首都发生了暴乱，但是当时他们遭到市民的顽强抵抗，开始怀疑甚至倒戈。市民也极尽所能，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双方成功地进行了军民联欢。在场的美国记者，目睹了“军民鱼水情”的景象，感慨“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人民与外国军队之间的最欢愉的交往”。

布达佩斯警察局长努力与市民和解，他事后因为立场不够坚定被判处无期徒刑。

但是，当时皆大欢喜。尽管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插曲，比如国家保安局的同志常常被市民搜出处以私刑，但这仅仅是插曲。10月30日，纳吉表示匈牙利结束一党制、恢复多党制。同时，苏联也表示愿意撤出苏军，与匈牙利就撤军问题进行谈判。

一切都朝着大团圆的方向走去。然而，接下来的历史如同过山车，进行着极限运动。10月31日，已经撤退的苏军重新返回，有过之而无不及，匈牙利人目瞪口呆。11月2日，苏联大使照会匈牙利政府，第二天将派代表团就撤军问题进行谈判，后者喜出望外。11月3日，谈判顺利得难以置信，历史再次朝着大团圆的方向走去。11月4日凌晨，10万苏军挺进布达佩斯，镇压“反革命暴乱”，纳吉短暂地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离开大使馆后被捕，经过“三起三落”，最后放弃“请求赦免”的权利，选择了绞刑架，30多年后，获得平反。

侯凤菁参考大量中文、匈牙利文著作，讲述了激情燃烧的12天。书中还附有很多插图，其中两幅最让我动容。一幅是裴多菲俱乐部举行讨论会时的照片，由于人数太多，很多听众或坐或站在窗台上、街道上，侧耳倾听，他们非常安静，唯恐错过房间里面传来的任何声音，很多听众陷入沉思。我相信，1956年之后，匈牙利一定会出现犬儒主义和公共事务冷漠症；但我同样相信，那并非“国民性”所致，这张照片已经说明布达佩斯市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如果说他们后来表现出漠不关心，那并非他们的自由选择，而是“被选择”的结果。

还有一幅照片是白天里空空荡荡的街道，那是布达佩斯工人委员会发起的消极抵抗，为了表达对苏军的异议，同时为了避免苏军找到再次镇压的借口，市民进行了空巷运动，整座城市在11月23日下午2时到3时空无一人，只有苏军和他

们的坦克形影相吊。沉默，是对“暴乱”的最好诠释。

《燃烧的多瑙河：匈牙利 1956 年事件真相》也有一些细节，值得商榷。比如书中提到纳吉撰写的《国际关系的五项基本原则与我们的外交政策问题》，五项原则就是万隆会议所采纳的民族独立、国家主权、民族平等、领土不受侵犯和不干涉别国内政，一年以后，苏联肯定了这个主张。可是从时间上来说，1955 年 4 月的万隆会议在前，1955 年 5 月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共同宣言也承认了五项基本原则，随后才是纳吉的文章。

阅读这本书时，最常出现的疑问不是细节出入，而是：如果匈牙利不是苏联的卫星国，如果“国内派”而非“莫斯科派”成为党内主流，历史会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历史无法假设，这个问题也没有标准答案，正因为没有答案，让人时时思考。

## 1956 年匈牙利事件与东欧剧变

侯凤菁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 年第 5 期

「内容提要」

50 年前发生的匈牙利事件与 20 世纪后期发生的东欧剧变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以 1956 年匈牙利事件为背景审视东欧剧变可以使人感悟更深。作者认为这两件事发生的原因是同一个，那就是东欧各国对战后强加给它们的“斯大林主义”一直无法接受，因而这些国家不时发生政治风波，直到 1990 年前后它们彻底改变了社会制度。因此，可以说，早在 1956 年，匈牙利事件就已拉开东欧剧变的序幕。作者还认为，东欧剧变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应该从文化、历史的层面去寻找。东欧

国家处于基督教文化圈，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生活习惯都更接近西方，对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的意识形态更加认同，因而在战后几十年不顾苏联的压制，不断要求改革社会制度和争取“回归欧洲”。

「关键词」 1956 年匈牙利事件东欧剧变纳吉拉科西「作者简介」侯凤菁，1942 年生，新华社高级编辑。（北京 100031）

今年 10 月 23 日是 1956 年匈牙利事件发生 50 周年。匈牙利人民群众当年从进行和平示威到发动武装起义，以纳吉·伊姆雷为首的政府改行多党制和宣布退出华沙条约、保持国家中立，最后遭到苏联的武装镇压。经过半个世纪的历史沉淀，这个事件的形成原因以及它对国际政治产生的影响更加清晰。事实表明，它的发生主要是苏联当时的东欧政策造成的，从此也拉开了日后东欧剧变的序幕。

震惊世界的 12 天 1956 年 10 月 23 日，在被苏联红军解放 10 多年之后，长期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及其主要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不满的匈牙利居民走上首都布达佩斯的街头。这时波兰刚刚发生波兹南事件，他们以声援波兰人民的名义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高呼口号穿过城市主要街道，然后分别在贝姆广场和国会大厦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人数最多时达二三十万之众。这一行动的参加者主要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等。他们要求苏联从匈牙利撤除驻军、党内以直选的方式选举各级领导干部、由受排挤的前总理纳吉·伊姆雷主持改组政府和解除在斯大林—拉科西时期犯有罪行的领导人的职务、审判拉科西、选举有多党参加的新国会、调整与苏联及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改革经济体制、公布向苏联提供铀的情况、调整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工资、取消农产品义务征收制、释放被判刑的无辜者、实行言论和新闻自由、拆除各地作为“斯大林主义”象征的斯大林塑像以及更换苏联式的国徽等。这些要求主要集中在实行民主政治、进行经济体制改

革和实现民族独立上。

群众在游行的过程中挖掉了国旗上的苏式国徽，高喊“自由”、“拥护纳吉。

伊姆雷“和”苏联军队滚出去“等口号。

在一部分人游行到国会大厦门前秉烛举行集会时，另一部分人自发地来到城市公园，推倒了矗立在那里的巨大的斯大林铜像。晚上9点左右，广播电台门前响起枪声，聚集在那里的群众与守卫部队发生了冲突，愤怒的群众用夺得的枪支向电台开火。于是，群众的和平示威游行演化成一场武装起义。

官方宣传曾长期把1956年10月23日夜晚所发生的一切解释为是经过事先精心策划的行动，然而一直难以服众。连曾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书记卡达尔。亚诺什撰写传记的作家久尔科。拉斯洛都在他的书中写道：“事件爆发得如此突然，以至事前根本无法周密准备……我不相信，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全面、精确和有领导、有周密准备的计划安排下发生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本领高强的秘密组织能够制订和执行这种计划”[1]。卡达尔。亚诺什本人也认为，当时“大部分（游行）参加者怀有崇高的目的”[2]。群众拿起武器起义之举立即得到布达佩斯警察和人民军部队的同情和支持，大量武器、弹药流入他们手中。党中央在这紧急关头为了平息民众的愤怒，决定让因在1953~1955年进行深受群众欢迎的改革而被贬黜的纳吉。伊姆雷重新出山，组织政府。刚刚恢复党籍的纳吉临危受命，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一任命。然而，这个在几天前可能会很起作用的举措这时对缓和紧张局势已无济于事。于是，时任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的格罗。埃尔诺等人便招来苏联军队帮助恢复秩序。

当苏军坦克隆隆地驶上布达佩斯街头，又有更多的人拿起武器。他们把外国军队的干涉视作民族耻辱，各处的武装小分队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这些年轻

人筑起街垒，用轻武器和自制的称作“莫洛托夫鸡尾酒”的汽油燃烧瓶与苏军坦克搏斗，在短短的几天内炸毁苏联坦克 200 多辆。这些武装小分队是自发建立起来的，其成员大部分为工人和青年学生，也有脱掉军装出兵营的人民军官兵。他们虽然受过长期的匈苏友谊教育，但在苏军坦克出现后，这种教育的成果立刻土崩瓦解。他们所想到的只是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自己的民族尊严。有人估计，武装起义者的人数最初只有数百人，后来很快增加到一万人以上。为了抗议苏联的军事干涉和支援首都的武装起义者，全国工人举行了大罢工。

1956 年 10 月 25 日，在抗击苏军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之时，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作为苏联特使来到布达佩斯。这时，苏联领导人认为匈牙利发生的是“反革命暴动”的定见已经形成，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才能先把局势稳定下来。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会议上，这两位苏联特使听取了党中央第一书记格罗·埃尔诺和政府新总理纳吉·伊姆雷的意见。格罗坚决主张使用暴力迫使“反革命势力”就范。纳吉则反对流血，主张通过政治让步平息群众的不满。两位特使最后接受了纳吉的立场，同时建议格罗辞去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卡达尔·亚诺什接替他的工作。匈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接受了苏共的这一建议。

到 1956 年 10 月 28 日两位苏联特使离开布达佩斯时，纳吉已得到苏联领导的信任和支持。在他们走后的当天，匈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改变了对 10 月 23 日以来发生的事情的看法，指出虽然确有反革命分子混在这次起义中，但在本质上它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具有广泛人民性的民主运动。

不久，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再次来到布达佩斯，同时带来一件出人意料的“礼物”，即所署日期为 10 月 30 日的《苏联政府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问题的宣言



》。这个正式文件承认，“由于产生了反常状态的错误，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平等的原则受到损害”。这无异于苏联领导人承担了自己犯下大国沙文主义错误的责任。文件同时保证，“今后应该坚决地贯彻各国人民平等的列宁主义原则”和“必须充分注意走上建设新生活道路的每个国家的历史情况和特点”。它还令人欣喜地承诺，“一旦匈牙利政府认为时机成熟，立即将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并表示，苏联准备同匈政府“就苏军驻留匈牙利领土问题进行谈判”。

事情已经再清楚不过，那就是苏联人正在反思和后退，同时表现出愿意同纳吉合作。不过，这种友善也有最低条件作代价，那就是必须“保卫人民民主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成果”，即制止旧制度复辟和保住土地改革、工业化及其他的进步成果。苏联政府的这份文件以及不久前格罗等一些人被撤换使纳吉被束缚的手脚得以放松。他意识到为了迅速稳定局势和尽早恢复一年多前中断的改革，必须满足群众的普遍要求。通过与群众频繁接触和经周围朋友的劝导，纳吉这位在莫斯科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时光的老共产党员几天内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保守和对事件抵触逐渐转为对群众意愿有了深刻的理解，摆脱了诸多心理上的束缚后踏上原本应该走的道路。

使纳吉感到最苦恼的是几天内收缴起义者武器、恢复正常秩序的工作进展不大。各处的武装小分队在苏军坦克仍留在布达佩斯的情况下，不愿轻易放下武器。与此同时，街上出现施私刑的现象。过去残害百姓的一些国家保安局人员一旦被认出，便会被吊死在街上。首都的这股私刑风也刮到外地，极端分子们的恐怖行动引起社会不安。10月30日发生在布达佩斯共和国广场的杀害市委工作人员的事件使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恐怖行为达到顶点。警察和军队这时已经瘫痪，政府开始组建一支既有权威又有能力制止社会犯罪的国民警备队，用以维持社会治安。

1956 年 10 月 30 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又同匈牙利领导人举行了长时间会谈，气氛极为融洽。双方讨论了匈牙利恢复多党制和苏联撤军等问题。他们对纳吉提出的所有主张都表示赞同，而坚持的唯一条件是不得使旧制度复辟和匈牙利不得成为反苏基地。

当天，苏军开始撤出布达佩斯，全市居民以喜悦的心情关注苏联的这一举动。

与此同时，人们从电台广播中获悉政府决定废除一党制，恢复 1945 年那种多党联合执政的政体。卡达尔作为党中央第一书记也发表了讲话，表示支持恢复多党制，并呼吁全体党员与党的领导过去犯下的错误决裂。

1956 年 10 月 30 日下午，纳吉宣布由多党组成的新政府名单，卡达尔也是这个内阁的成员。接着，匈牙利许多早先被取缔的政党又开始恢复活动。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这时除了中央领导机构依然存在外，实际上已经瘫痪。党在各地的一些办公机关被砸毁，90% 的党员退党，有人甚至把党证烧掉、撕毁。这样一个党已无法维持下去，唯一的出路是建立一个新政党。

11 月 1 日晚，卡达尔宣布解散老党，新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并站在纳吉政府一边。只是这个党还未来得及开展活动，局势便发生了突变。

在此前的几天里，局势已开始缓和。然而，就在这社会秩序的恢复出现希望之时，苏联军队又反扑过来。从边境传来的消息说，大量苏军从 10 月 31 日起潮水般地涌进了匈牙利，早先撤出首都的苏联军队停留在郊区并在那里构筑工事和占据有利地形。11 月 1 日上午，纳吉紧急召见苏联大使安德罗波夫，要他解释苏军调动的原由，并要求苏联明确保证不再继续向匈派遣新的部队。安德罗波夫只是一味地敷衍，显然正在当面撒谎。纳吉这时意识到，莫斯科的立场发生了变化。

当天下午，苏联军队开始包围各地民用机场和占领多瑙河以西地区。纳吉及

时向新建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七人执委会说明了真实情况。这个党的领导机构作出决议：为了防止苏联再次进行军事干涉，建议匈牙利立即退出华沙条约和宣布国家保持中立。这个建议经政府讨论一致通过，并得到国家元首道比。伊什特万的批准。

当晚，内阁集体召见苏联大使安德罗波夫。纳吉把政府的决定通知了他，并宣布苏联如不停止向匈牙利派兵，匈政府将提请联合国讨论“匈牙利问题”。接着，政府主要成员都先后发言，表示支持纳吉的立场。兼任政府国务部长的卡达尔发言时抑制不住地对苏联大使高声喊道：“如果你们的坦克进入布达佩斯，我将走上街头，赤手空拳地和你们搏斗！”[3] 匈牙利外交部立即把政府的决定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正式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和保持中立，并呼吁国际社会阻止苏联入侵匈牙利这个主权国家。

政府的中立宣言在国内很快产生了效果，社会秩序开始走向正常。然而这时，苏联进行第二次军事干涉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1956年11月3日晚，苏联人先是诱捕了与他们进行谈判的匈牙利军事代表团，然后在11月4日凌晨以5个师的兵力对匈牙利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很快控制了局面。纳吉下令匈军放弃抵抗，自己带领一部分党政要员及其家属进入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

随着苏军的到来，前几天与苏联大使当面抗争后突然失踪的卡达尔出现了。

他宣布组织“工农革命政府”取代纳吉政府，苏联就是以接受这个政府的

“请求”

为名向匈牙利出兵的。

苏军以泰山压顶之势很快控制了全国。纳吉一行避难18天以后被骗出南斯拉

夫大使馆并遭到苏联人劫持。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苏联支持的卡达尔政府遭

到全国工人、知识分子的各种抵制，新政权的巩固相当艰难。纳吉拒绝与新政府合作，经过一年多的监禁后与同案的其他 3 人一起于 1958 年 6 月 22 日被处死。1956 年匈牙利事件就这样被苏联镇压下去。

危机之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引发 1956 年匈牙利事件的社会矛盾是长期积累下来的。

苏联军队在 1945 年 4 月解放了匈牙利全境，战时长期在苏联流亡的拉科西。

马加什等人回国领导匈牙利共产党。在此后几年由各政党联合执政的人民民主时期，共产党是整个国家生活民主化和恢复战争创伤的主导力量。它使人民相信“匈牙利将获得新生”。苏联也大力帮助匈牙利进行重建工作。例如，1945 年，在苏联本身物资十分匮乏的情况下，还将 1.5 万吨粮食、3 000 吨肉、2 000 吨糖、2 000 吨土豆及其他食品运送到陷于饥荒状态的匈牙利。1947 年，斯大林改变了政治主张，要求东欧各国共产党尽快将国内其他政党排挤出联合政府，加速共产党一党执政的进程。匈共于 1948 年取缔了其他政党，该党本身与社会民主党左翼合并建立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独掌政权。然而，在此后短短的几年当中，拉科西等人追随苏联政策，无视本国具体条件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严重失误。

（一）急于消灭个体经济从 1948 年起，匈牙利的经济政策出现了大的转折，其中包括对生产关系的改造急于求成。国家先对所有 100 人以上的工厂实行国有化，国营企业职工在工业部门所占的比重很快达到 83% 以上。1949 年 12 月，又颁布新的国有化法律，对 10 人以上的企业也实行了国有化。对小手工业进行的改造使小手工业工人的人数由 1948 年的 18.7 万人减少到 1950 年的 2.9 万人。在农业上则急于实现集体化，确定在 3~4 年内完成这一任务。由于缺乏物质、社会和思想

准备，只能依靠行政命令和使用暴力强迫农民放弃自己的土地而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使全国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到 1953 年，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全国 10% 的耕地已经荒芜。强制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使农民生活贫困，1952 年有 2/3 的农户没有足够的食粮和种籽粮。此时与战前相比，农业生产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 10% ，农产品的市场供应量减少了 20%[4]。（二）急于实行工业化按照斯大林“没有重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及即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想，匈牙利从 1948 年起加快了工业化的速度，提出在 5 年内将这个农业-工业国发展为工业-农业国，进而将匈变为“钢铁的国家”。于是，本来正在执行的三年恢复计划成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的开端。

1950 年开始执行的一五计划的指标在 1951 年 2 月平均提高了一倍。原定工业增长 86.4% ，改为增长 200%；重工业生产从原定增长 104%提高到增长 280%；采矿业由原定增长 55.2% 提高到增长 142%；冶金业从原定增长 15% 提高到增长 162%。为了实现这个计划，生产过程中不顾产品质量和经济规律，只追求在数量上达标。这种高速工业化项目往往匆忙上马，普遍缺少必要的准备。

以 1950 年上半年为例，75% 的工业建设项目是在没有计划和资料的情况下仓促启动的，其结果不难想象[5]。（三）投资过度原定的一五计划规定总投资为 280 亿福林，1949 年春天追加到 350 亿福林，同年年底追加到 510 亿福林，1950 年追加到 600 亿福林。在 1951 年 2 月的匈党二大上，这个投资计划又被追加到 850 亿福林。而领导人在报告中还说它“不仅现实，而且偏于谨慎”。在工业投资中，90% 的资金都用于发展重工业，用于发展采矿业和冶金业的资金占工业总投资的 2/3.用于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则少得可怜，影响了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的生产，只能以限制居民消费来平衡供求关系，市场供应非常紧张。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的发展更受到限制。与此同时，由于冷战加剧，军费开支大大膨胀，国防费用达到民用投资的一半以上[6]。（四）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1948 年秋到 1951 年年初，由于投资计划指标不断提高，使国民经济的资金积累比重达到 35% 这一世界上罕见的水平。在 1919~1939 年匈牙利平稳发展时期，最好年景的积累比重也只有 8%。这样，国民收入的大部分资金被国家积累所吸吮，人民生活状况不断恶化。一五计划规定居民生活水平提高 50% ，但到 1953 年工人和职员的人均实际工资反而下降 20% 以上，农民 1952 年的实际收入尚不足 1949 年的 2/3[7]。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恶劣。1941 年停止的民居建设在 1945 年以后一直没有起步，许多工人、职员家庭蜗居于斗室，甚至简易的棚户房内。在这福利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工厂、企业大力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任意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定额，鼓吹“定额永无止境”，劳动者的利益受到损害。

（五）拉科西等人大搞个人迷信，独断专行，破坏民主与法制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拉科西长期被奉为当然领袖、“斯大林最优秀的学生”、“匈牙利人民英明的父亲”等等。这个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曾在反革命的法庭及监狱里大义凛然、无比坚强的共产党人，在效法苏联的个人迷信的气氛中失去了理智，对人民开始采取命令主义和专横政策。他与格罗、法尔卡和雷瓦伊一起结为“四人团伙”，主宰着党内外一切事务的决定权。党的政治局、书记处形同虚设。拉科西本人还兼任总理，政府工作也在他的控制之下。

1945 年以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惩处措施，一些做法令人发指。且不说对旧政权官员和在战争中犯有罪行者的惩处是否过度，就连新政权的一些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普通老百姓都人人自危。

首先，为了削弱其他政党的社会影响，拉科西等人采取所谓“逐段切香肠”

的政策，为这些党的领导人制造冤案以便清洗。前小农党、社会民主党等政党的领导人都受到这样的迫害。明曾蒂案、内务部“同仁会案”等也牵连到一大批受害者。

其次，在领导层内部寻找“敌人”。拉科西等人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在社会上的“阶级敌人”被清除后转向在共产党内以及在高层领导中“挖掘”不可靠的人物。他们首先把矛头指向战时在国内坚持斗争的地下共产党领导人，捏造各种罪名把他们投入监狱。著名的“拉伊克案”便是这样的代表作。拉伊克曾是地下共产党的总书记，解放后任政府内务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在民众中颇有威望，对拉科西的地位构成威胁。拉科西从宗派主义出发，1949年选中拉伊克作为打击对象，用以提高全党的“警惕性”。这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的清党工作已经展开，匈牙利抓住了拉伊克这条“大鱼”，最后以“间谍”、“铁托代理人”和“托派”的罪名将他处死。斯大林的私人代表、苏联秘密警察东南欧头目费多尔。别尔金将军直接参与了此事。此后不久，卡达尔。亚诺什等一些“国内派”领导人也被捕入狱，军队中一批不驯服的将领和中级军官也未幸免于难。

第三，制造群众性恐怖。当时告密之风盛行，窃听成为掌握群众思想动向的重要手段。许多有不同见解而又无法给他们罗织罪名的人被送进“古拉格群岛”式的“拘留营”强制劳改。居住在毗邻南斯拉夫边境的“阶级异己分子”被强行搬迁到东北部荒凉的霍尔多巴吉草原居住。首都的“不可靠分子”纷纷被迁往外地，有时只是因为他们有国外社会关系，据说是担心他们成为西方国家的“第五纵队”。在农村里，富农是主要打击对象。共有7万户人家被列入“富农名单”，其中至少有2.2万户人早已没有土地。不少依靠勤劳致富的中农也被列

入这样的名单，处处受到歧视。警察和地方干部对富农和不肯入社的农民随意殴打[8].对群众进行的其他惩处更加花样繁多，其中以罚款最为常见。1950~1953年夏天，法院共审理了 65 万起案件，对其中的 38.7 万人课以罚款。在内务部门处理的 85 万起经济案件中，也有 83.1 万起课以罚款，另外的 1.9 万起被处以关禁闭。就当时法规而言，这些惩处大部分也不合法[9].此外，出于意识形态上的需要，特别是为了加强“匈苏友谊”，当局一方面对文化传播和文艺创作加以各种限制，另一方面进行不真实宣传。甚至在自然科学方面都有许多不实之词。例如，小学生们被告知从蒸汽机到灯泡、电话都是俄国人发明的。这样的思想禁锢和虚假现象使有着浓厚民族意识的匈牙利人难以忍受。

拉科西等人就是这样追随莫斯科，把一种陌生的“斯大林主义”制度强加在本民族头上。其结果是很快失去解放之初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搞得怨声载道，到 1953 年已形成全国性的“民族对抗”[10]局面。这种“对抗”的一方是匈牙利广大人民群众，另一方是以拉科西为代表的机械推行苏联政策的匈牙利领导集团。

莫斯科的指挥进一步加剧矛盾 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领导想改变对外政策，其中包括恢复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和解决战后遗留的德国问题、奥地利问题等。匈牙利与南、奥接壤，其地位相当重要。然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几年来把这个国家引上经济即将崩溃的道路，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这时已发生了柏林起义，苏联新领导担心民主德国发生的事情在匈牙利重演。这年 6 月，匈牙利的几个主要领导人被召到莫斯科，由贝利亚带头狠狠地批评了他们。苏联领导人指示他们要避免国家经济破产，并要求拉科西只保留党的总书记的职务，让他兼任的政府总理职务，由纳吉·伊姆雷担任。



匈牙利领导人从莫斯科回国后把苏联的决定向劳动人民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传达，然后按照苏联的指示作出决议批评以前的政策，指出党内以个人迷信取代集体领导，从而脱离人民群众。拉科西在会上作了检讨，但暗中一直想夺回失去的权力。

出于种种原因，党中央的决议没有公开发表，一般人并不了解党的政策的调整。然而，这个决议的部分内容包含在新总理纳吉 1953 年 7 月 4 日在国会发表的政府纲领中，不明真相的广大群众误认为这是纳吉个人的主张。纳吉宣读的政府纲领提出放慢工业化速度、促进轻工业发展、放慢农业集体化步伐、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取缔非法的惩处制度等。这些举措恰恰符合当时人民的心愿。从此，这一被称之为“新阶段”的改革深入人心。

只是“新阶段”刚刚起步便受到来自苏联的干扰。这时贝利亚垮台了，马林科夫的地位随之大大削弱。马林科夫在苏联是经济改革的主要代言人，纳吉被认为是他的门徒。苏共领导中的强硬派莫洛托夫在贝利亚倒台后马上打电话警告拉科西和纳吉，说匈党中央的决议对 1953 年以前的工作批评过火。这时，一直想收回权力的拉科西受到鼓舞，便开始对“新阶段”发起攻击。他在布达佩斯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煽动党员抵制“新阶段”政策，造成群众思想混乱。

然而“新阶段”难以阻挡。纳吉政府认真地调整了经济发展重点，采取了有效的农业发展措施，提高了居民的生活，限制了强力部门的权力和为无辜的受害者平反，并且着手改造政权结构。到 1954 年秋天，“新阶段”政策已取得显著成效：国家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均有明显的改善，民主、自由的气氛增强，人们心情好转。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也产生了某些难以避免的混乱，拉科西等人对此大加

渲染，社会上那些因改革使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加以配合，最后成功地使政治局确定将“右倾”当作主要危险。

1954年年底，纳吉、拉科西等人又被召到莫斯科，这次板子打在了纳吉的身上。苏联领导人指责纳吉政府没有取得1953年夏天他们所期待的那种成果。纳吉据理力争并拒绝作检讨，受到苏联领导人的批评，好在1953年的纲领还未遭到全面封杀。其实，令苏联领导人不满的主要是纳吉没有准确地扮演1953年莫斯科分配给他的角色：克里姆林宫只希望通过一定的纠正步骤使匈牙利形势稳定，而纳吉则致力于进行实质性的社会主义改革，其中包括改变政治机制和加强民主，这同莫斯科的意图不一致。

从莫斯科回国以后，纳吉还想挽救“新阶段”，拉科西等人则对不屈服的纳吉展开批判。1955年3月党中央作出决议谴责“新阶段”政策，接着撤销了纳吉的总理职务并将其开除出党。纳吉的支持者也大多被排挤出原来的工作岗位。这样，“新阶段”结束。在此后的日子里，1953年以前的许多做法又得以恢复。人民群众普遍怀念“新阶段”、怀念纳吉，“民族对抗”进一步升级。这时，劳动人民党内部从上到下已形成一个要求改革和支持纳吉的反对派。

苏共二十大标志着“新阶段”改革政策在匈牙利复苏。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在匈牙利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要求清算拉科西的罪行。主要由知识分子参加的“裴多菲俱乐部”成为“民族对抗”的论坛。它频繁组织学术讨论会，研讨民主、新闻自由、哲学现状以及工农业等重大问题。在这些会议上，与会者群情激昂。拉科西当时曾对人说，“我感到自己像是坐在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上”[11]。在这种形势之下，苏联领导人为平息匈国内的民愤，决定撤销拉科西党的总书记职务，选择格罗·埃尔诺接替他，改用党的第一书记之称。

这一指挥无疑又是一处败笔，因为格罗过去与拉科西的关系太密切了，连邻国的铁托都当即表态说格罗“同拉科西毫无区别”。苏联的这种不当选择非但没有为匈国内的不满降温，反而起到火上加油的作用，在 1956 年 10 月初为拉伊克平反的国葬仪式上就可预感到火山即将爆发。然而，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为配合苏联同南斯拉夫重修旧好的意图，格罗率领匈党政主要领导人赴贝尔格莱德进行了长达 10 天的访问，失去了控制国内局势的最后机会。

从这些事实中不难看出，1956 年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与苏联政策的变化和领导层的人事变动息息相关：1953 年之前因追随苏联政策在国内孕育了危机，之后，莫斯科的错误指导使危机不断加剧，最后以波兰事件为导火线爆发了群众游行示威和武装起义。

启动东欧剧变历程各国观察家普遍认为，在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苏联领导在某种程度的慌乱中基本上面临着三种选择。第一种是不干涉与避免卷入，让匈牙利人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前途。第二种是允许匈牙利进行改革和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化，但以不危及过去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和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底线。第三是进行军事干涉，以武装镇压解决问题。第一种方案显然行不通，只能在后两种方案中进行选择。看来第二种方案曾是他们的最初选择，米高扬、苏斯洛夫在布达佩斯的许诺和 1956 年 10 月 30 日的《苏联政府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问题的宣言》都是建立在这个选择的基础上。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始终也未放弃作为应急方案的第三种选择，军事打击的准备工作一直在进行。因此，从乌克兰中部地区调来的苏军早在 1956 年 10 月 30 日就向匈牙利边境移动了。

也是在 1956 年 10 月 30 日这一天，匈牙利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新情况，那就是纳吉宣布恢复多党制并组成了多党联合执政的政府。如此离经叛道的行为对苏联

人是很大的刺激。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中央主席团实行集体领导，在匈牙利问题上态度比较温和的赫鲁晓夫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是强硬派的领导人绝不会允许匈牙利回到议会民主的道路上去。况且恢复多党制的做法还有很大“传染性”，容易引起连锁反应，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东欧各国的民众都可能要求效法。忧心忡忡的乌布利希、诺沃提尼、乔治乌—德治和日夫科夫等东欧国家领导人急忙打来电话，要求苏联尽快平息匈牙利事件，以免大火殃及他们的国家。面对国内外压力，赫鲁晓夫这时不愿再冒政治风险。此外，如果苏联真的从匈牙利撤军，势必开罪苏军领导人，而这时地位未稳的赫鲁晓夫正需要军方的支持。于是，赫鲁晓夫后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在 1956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期间作出对匈出兵的决定。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对纳吉的承诺和刚刚出炉的苏联政府宣言都被抛到脑后。

有人说苏联出兵是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保持中立造成的。实际上，匈牙利政府 1956 年 11 月 3 日宣布这一决定时，苏联进行军事入侵的方案早已确定，而且苏军已经大兵压境，匈牙利的退约之举对苏联的出兵决策不可能起决定性作用，最多也只是更加坚定了苏联领导人的镇压决心。

长期以来，匈牙利这场“民族悲剧”一直发人深省，其深层次的原因有待进一步去认识。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无视具体国情地强制推行苏联式的社会制度是导致 1956 年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匈牙利事件发生时任政府总理的赫格居什。安德拉什当时是拉科西集团的重要人物，对那个事件的发生当然也负有责任。事件发生的当晚纳吉被任命为政府总理，赫格居什去职并被送到苏联躲避冲击，事件平定后回国一直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几十年之后，他痛定思痛地反思这个事件时说，“匈牙利社会历来是面向

西方的。这并不单纯因为我们向西方学习了技术，也不出于我们的感情因素，而是传统上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生活习惯的总体是属于西方的。然而，我们（指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拉科西等人——作者注）却想把整个民族的这些东西都扭向东方，因此它注定是徒劳的，早晚要失败。”[12]他认为，当年拉科西等人没有领导匈牙利人民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强加给他们”。他说，“人民反对这个逼迫他们的力量，反对者不是一个阶层，不是旧社会的领导人，而是人民，是整个逐渐觉悟过来的民族”。“面对整个民族的不满，领导人试图以更激烈和更不合情理的办法进行压制，但招来的却是更强烈的反抗”[13]。赫格居什这反戈一击的看法恰中问题的要害。因此，在1956年以后的几十年当中，尽管卡达尔政权向人民做出许多让步，还率先进行了世界闻名的经济体制改革，把匈牙利变成了“消费者的天堂”和“快乐的大兵营”，但是整个社会还是难以容纳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在1990年通过“和平演进”最终改变了社会制度。

匈牙利的这段社会变化史其实就是整个东欧的缩影。东欧其他国家在战后大体也都有类似匈牙利的经历，即传统的价值观与陌生的“斯大林主义”不断碰撞、博弈，政治危机不断发生。在20世纪50~90年代之间，整个东欧至少发生过10次政治风波，而且较大的政治风波都呈周期性，大约每隔12年发生一次：自1944年苏军进入东欧到1956年发生波匈事件相隔12年；此后到1968年发生“布拉格之春”相隔12年；此后到1980年发生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相隔12年；此后再到东欧剧变全部完成也大体相隔12年。与匈牙利一样，东欧其他国家在那个年代动乱不止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排异性”，即对以计划经济和一党专政为特征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难以接受。与此相反，它们对欧洲社会民主党（包

括社会党和工党)的意识形态,对“民主社会主义”却有很大向心力,这成为导致东欧剧变发生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对这种状况的形成除考虑其他因素外,更应该认识到这是由东欧国家的文化、历史背景所造成的。

在人类社会,从来都是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意识、意识决定行为的。

东欧国家与苏联不同,是处于基督教文化圈,在文化和历史上与欧洲社会民主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观念和意识上与其有不少相通之处,从而对其容易认同。

这主要缘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是以欧洲古典哲学、基督教伦理学和人道主义为基础,植根于欧洲的文化土壤,其价值观容易被大多为基督教徒的东欧民众所接受。第二,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就已先后诞生,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还有执政的经历与经验,其社会影响深远。第三,在与东欧相邻的西欧、北欧国家,战后大多由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它们取得的成就和这些国家居民比较富裕的生活与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短缺经济”形成鲜明对照,对长期经济落后和贫困的东欧国家具有很大吸引力。

正是出于上述原因,在东欧国家战后的历次政治风波中,民众的斗争目标无不集中在争取民族独立和改革现行社会制度上。只是由于苏联长期压制,才使他们的目标迟迟无法实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也大步地进行改革,放弃了严密控制东欧的政策。在这偶然出现的宽松历史条件下,东欧剧变才得以在短期内完成。东欧各国共产党在社会制度改变后大多改建为社会民主党式的政党,谋求在市场经济和多党制的框架内实现社会公正,从而结束了战后几十年东欧国家普遍经历过的先为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化、之后又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的轮回过程。

由此来看，匈牙利 50 年前的那场群众游行示威和武装起义绝非一个偶然发生的孤立事件，而是与整个东欧的政治气候息息相通的。它与几乎同时发生的波兰事件一起，在本地区的 8 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启动了一个历时 30 多年、最终以东欧剧变为结局的历史进程。

（责任编辑刘庚岑）

[1]〔匈牙利〕久尔科·拉斯洛：《1956 年》，匈牙利播种出版社 1987 年匈牙利文版，第 106 页。

[2]〔匈牙利〕欧莫尔纳尔·米克洛什：《1956 年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4 日的 12 天》，匈牙利自由广场出版社 1989 年匈牙利文版。

[3]〔匈牙利〕梅洛什·蒂博尔：《纳吉·伊姆雷的生与死》，匈牙利书库出版社 1989 年匈牙利文版，第 275 页。

[4] 这一段中的各数字引自时任匈牙利科学院院长的拜兰德·特—伊万 1990 年发表的题为《匈牙利 50 年代经济政策的走向与歧途》的报告。

[5] 同上。

[6] 同上。

[7] 这一段中的各数字引自时任匈牙利科学院院长的拜兰德·特—伊万 1990 年发表的题为《匈牙利 50 年代经济政策的走向与歧途》的报告。

[8] 参见《匈牙利民族报》1990 年 7 月 9 日。

[9] 参见〔匈牙利〕拜赖茨·亚诺什《反革命的笔杆子与枪杆子》，匈牙利科苏特出版社 1986 年匈牙利文版，第 26 页。

[10]〔匈牙利〕赫格居什·安德拉什：《赫格居什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中文版，第 267 页。

[11]前引书：《赫格居什回忆录》，第 268 页。

[12]前引书：《赫格居什回忆录》，第 166 页。

[13]同上，第 180 页。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 1956 年匈牙利事件真相

50 年前的 10 月 23 日，布达佩斯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随后演变为流血冲突。10 月 24 日和 11 月 4 日，苏联两次派兵镇压，史称“匈牙利事件”。匈牙利事件在世人们心中是一个无法抹去的记忆。今年在它发生 50 周年之际，匈牙利、波兰、法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都举行了专题研讨会，力求根据匈牙利、俄罗斯、中国等国解密的相关档案文献，超越过去简单地讲它的是非曲直的做法，理性地分析前因后果，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

关于匈牙利事件的起因，冷战时期有两种基本的看法。西方认为这是一场革命，是匈牙利人民对苏联的控制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抗，是为了实现从“集权制度”向“民主制度”的回归；社会主义国家则认为，事件是匈牙利国内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势力与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里应外合的结果，目的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在匈牙利本土，这一事件在上世纪 70 年代之前被定性为“反革命案件”，但在剧变后又被称为“人民起义”，“与 1848 年～1849 年的革命和自由斗争具有同等的意义”。

匈牙利事件真相到底如何？

山雨欲来匈牙利事件是在匈社会各种矛盾不断累积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情

况下爆发的。1947 年以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即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后的



名称，事件后改称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主要领导人拉科西不顾本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一味照搬苏联模式。匈党和国家领导人听命于苏联的做法，损害了国家利益，伤害了人民的民族情感。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新领导人的推动下，苏联和东欧国家对以往内政外交做出了一系列调整。在匈牙利，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纳吉·伊姆雷实施了“新方针”，比其他东欧国家更早地开启了“非苏联模式化”进程。

但由于苏联的干预，“新方针”实施了22个月就被迫中断。此后，纳吉以著述方式进一步提出以匈牙利社会主义道路取代苏联模式、以主权独立与民族平等反对苏联控制，这些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共鸣。“新方针”中断后，匈牙利向旧政策复归，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随之恶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但拉科西等人不仅对过去的种种错误一味加以掩饰，甚至打算用暴力手段镇压党内外要求改革的声音。

最初两天就在匈牙利政治风暴欲来之际，10月20日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顶住了苏联的压力，选举了主张走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这极大地鼓舞了匈牙利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在22日的集会上，他们提出了以反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为主要内容的“十六点要求”，同时决定第二天（23日）举行静默游行声援波兰人民。

10月23日，布达佩斯的大学生拉开了匈牙利事件的序幕。下午3点，10000多名学生从艺术学院和技术大学出发，向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的雕像和波兰将军约瑟夫·贝姆的纪念碑行进。沿途不断有人加入，到目的地时人数已高达几十万。游行人群高呼“是匈牙利人就站到我们这边来”、“俄国佬滚出去”、“把拉科西投入多瑙河”、“我们要纳吉”等口号。游行队伍到国会大厦后，人们要

求纳吉出来讲话。经反复劝说纳吉勉强来到了游行人群前面，劝说人们保持冷静。

但接替拉科西任匈党第一书记的格罗在电台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他把几

十万示威群众称为“匈牙利人民的敌人”，将人们对匈苏不平等关系的指责斥为

“卑鄙的谎言，怀有敌意的杜撰”。这番火上浇油的讲话令示威人群由不满转为

愤怒，示威者冲进电台，要求向全国广播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他们开始向

电台大楼发起攻击。流血冲突开始了……

为了缓和矛盾和稳定局势，匈党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对党和国家最高领

导机构的人事做出了调整：党的第一书记仍由格罗担任，纳吉取代赫格居斯重新

出任部长会议主席。

纳吉本人对这一切并不知晓。赫格居斯回忆说，纳吉被紧急叫到国会后，

“坐在那里喘气，有点心神不定”，“很疲惫”。但是，他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就

接受了要他在紧要关头出任部长会议主席的建议。24日中午，在通过电台发表的

“告匈牙利人民书”中，纳吉向人民承诺：政府将在“1953年6月决议”的原则

基础上，全力实现国家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

的彻底民主化，“走符合我们民族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匈牙利道路”。

苏联第一次干预23日事件发生不久，格罗就向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

请求苏联派军队对付游行示威。苏联领导人对匈牙利领导人没有命令军警向示威

人群开枪表示不满，认为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错误”。23日晚10~11点，苏共中

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多数成员同意立即出兵。24日下午，在没有获得匈牙利政府

正式邀请的情况下，苏联发动了代号为“行动波”的第一次干预行动。档案记载，

根据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的决定，由第128步兵师和第39机械化师编成的苏

军部队于2时15分越过国境线进入匈境内。

与此同时，由苏共领导成员米高扬、苏斯洛夫、谢洛夫组成的三人代表团赶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他们到后发现，局势并不像格罗所描述的那样到了“灾难性”的地步。但此时苏军已经进入匈牙利，事件变得更为复杂。一些工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许多工人参加到抵抗苏军干预的行列，匈牙利军队纷纷倒戈，大批武器流向社会。“一场匈牙利和苏联之间的冲突开始了”。25日，布达佩斯发生两起流血事件：其一，当大批群众在议会大楼前集会时，有人从附近的屋顶向苏联士兵射击，苏军的一辆坦克被烧毁。苏军随即开枪还击，打死了60名匈牙利人。其二，在匈党中央大厦前，苏军坦克兵把走近的匈警卫部队当成叛乱者开枪射击，又有10人被打死。此后，布达佩斯市内枪声不断。其他城市的形势也紧张起来。全国各地掀起了总罢工，要求苏联军队撤出的呼声越来越高，游行示威演变成了骚乱。

当日，纳吉在电台再一次发表广播讲话。他说，匈牙利政府将与苏联就两国关系，特别是苏联军队撤出问题进行谈判，匈牙利局势一旦恢复正常，苏军就应被立即召回。苏联代表团却发表声明说，苏军撤出匈牙利是不现实的，“但可以宣布在布达佩斯恢复秩序以后，苏军回到自己的驻地”。

无力回天 25日流血事件发生后，经苏共同意，匈党中央罢免了格罗的职，由卡达尔继任第一书记，当天局势也趋于平静。纳吉期待着匈牙利事件能有一个“波兰式”的解决结果。然而此时，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带来的痛苦和怨恨刺激着匈牙利人，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吸引着他们，波兰的成功鼓舞着他们，西方的宣传煽动着他们，苏军的坦克威逼着他们，多年来压抑在心头的民族屈辱感在激励着他们。因此，人们越来越激进。纳吉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就试图以谈判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他开始不停地接待一波又一波的代表团。

此时，匈党党员纷纷退党，人数由 87.1 万骤降至不到 3.8 万，匈牙利社会主义的名誉也受到很大破坏，民众提出了各种各样混乱而激进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10 月 26 日，纳吉向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表示，鉴于前来与政府谈判的各类代表团越来越强烈地提出更换政府的要求，匈牙利党和政府目前最可行的是改组政府，具体来讲，就是从过去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以及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工人中，吸收五至六名拥护人民民主的著名民主人士参加政府。这一选择经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全体通过，也得到了米高扬等人的认同。27 日，纳吉宣布了新政府的组成名单。

新政府成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定性这场骚乱。鉴于参与者中虽有一些旧军官、刑事罪犯，但绝大多数是学生、倒戈军人以及工人和市民。所以，在当晚召开的内阁会议上，纳吉要求改正对该事件性质的提法，承认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具有人民和民主根源的运动”，建议与骚乱者进行协商以稳定国内局势。

28 日下午 17 点 25 分，纳吉公布新政府宣言，认为这是一场民族民主运动，是“不久以前的严重罪行引发了这次声势浩大的运动”；他还公布了新政府的施政纲要；做出了两个有关时局的决定，一是制止流血事件，立即实行全面停火，二是匈苏两国政府将就苏军尽早撤离达成协议。

29 日，停火令正式生效，苏军开始撤离。然而，这一切来得太晚，近 8000 名刑事罪犯卷入到混乱之中，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了武器，四处打砸抢劫。

与此同时，民众对纳吉新组成的政府也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一个吸收了几个非党派人士的政府仍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他们要求必须在自由选举的基础上由多党联合组成新政府。

苏联第二次出兵最初，苏联领导人在如何处理匈事件问题上意见并不统一。

莫洛托夫等强硬派主张立即派兵镇压；米高扬等温和派则主张依靠纳吉来控制局势；赫鲁晓夫则取调和立场，一方面迅速派出武装力量，同时对纳吉政府采取了密切关注但暂不干预的政策。但 28 日以后苏联领导人的态度明显转变，赫鲁晓夫在 31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宣布，苏联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在匈牙利整顿秩序”。

根据历史档案等史料，导致苏联态度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是西方的关注以及各媒体报道产生的负面影响；二是中共和意共的支持；三是匈牙利局势的恶化。30 日清晨，布达佩斯共和国广场发生了一周以来最为严重的惨案，国家保安局新兵被活活打死，国防部两名上校被残酷杀害，布达佩斯市委书记也不幸遇难；四是苏共中央领导层对事件和纳吉的看法渐趋一致，认为这是一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暴乱，纳吉已背弃了社会主义。苏联领导人决定再次对匈牙利进行干预。

31 日晚些时候，纳吉获悉苏军正大规模地越过边境，向布达佩斯方向行进，就向苏联驻匈使馆提出抗议。11 月 1 日 19 点 40 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代表政府正式宣告匈牙利中立，同时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通报匈牙利政府立即废除华沙条约，要求四大国给予援助来保卫这个国家的中立。

匈牙利政府宣布国家中立后，接到了苏方同意立即就撤军进行谈判的口头照会，纳吉随即派代表团与苏方开始谈判。苏军入境的消息使匈各政党和社会各阶层与政府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一致。

与此同时，纳吉开始着手改组政府。11 月 3 日早，新的多党联合政府在团结一致的气氛下组成。共产党、小农党和社会民主党分得三个部长席位，裴多菲党占两个部长席位。但名单中的共产党员部长之一、匈党第一书记卡达尔已于 11 月 1 日晚“失踪”。

3 日晚 10 点，帕尔将军率领的匈牙利代表团与苏方开始谈判。史料表明，谈判进行一半即被苏联克格勃主席萨罗夫率人打断，匈代表团成员被抓。4 日凌晨，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

一刻钟后，纳吉向全国人民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今天黎明时分，苏联军队开始进攻我们的首都，其明显的用意是推翻匈牙利合法的民主政府”。匈牙利军队没有进行抵抗。15 分钟后，苏军 17 个师的兵力向布达佩斯发动代号“强风”的军事行动。

结果与余音历时 13 天的事件给匈牙利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据不完全统计，经济损失相当于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3 / 4。1991 年匈牙利当局公布了一份当年的绝密报告：事故中死亡人数共计 2700 人，其中体力劳动者 1330 人，大专院校学生 44 名，中学生 196 人。另有约 20 余万匈牙利人逃往西方。

纳吉个人的命运也很耐人寻味。纳吉及其政府成员携家人共 47 人前往南斯拉夫驻匈使馆寻求政治避难。11 月 22 日，在得到匈牙利方面将纳吉等人送回各自家中并保障其安全的承诺后，南斯拉夫同意纳吉等人离开使馆。

可是，纳吉等人坐的车刚驶离使馆就遭到苏军的劫持，第二天被送至罗马尼亚，软禁在靠近布加勒斯特的斯那科夫政府别墅。1958 年 1 月 28 日，“纳吉案件”的审理在布达佩斯正式拉开帷幕。纳吉被指控犯有“发动并领导阴谋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罪行和叛国罪”。1958 年 6 月 16 日，媒体公布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关于判处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谋者死刑和徒刑的公告》。

还历史以真相——也谈 1956 年匈牙利事件和纳吉问题

周新城

《中华魂》编辑部：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还纳吉以清白》（《炎黄春秋》2008 年第 3 期），说：“匈牙利 1965 年事件的核心人物纳吉”；伊姆雷在中国长

期以来没能得到人们充分的了解，一直作为‘反革命’存留在众人的心目中。…

…然而实际上，纳吉是匈牙利一位深受人民爱戴的共产党领袖、社会主义改革的

先驱”。这就奇了。我们原来知道，1956 年 10 月至 11 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是一

起严重的反共度社会主义事件。但该文却给予事件的核心人物纳吉以如此高的评

价，完全倒了个儿。这是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们颇感困惑。能否请有关专

家为我们介绍点情况，帮助释疑解惑？在此我们先表示感谢。

致以敬礼！

青年学生李唯真

复信

李唯真同学：你的来信已转交到我的手里。我乐于根据我了解的一些情况来回答你的问题。

半个多世纪以前的 1956 年，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在

苏共 20 大赫鲁晓夫所做的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影响下，全世界出现了

一股反

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从 10 月下旬起，匈牙利局势混乱，开始时是由于人民群众

对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的工作失误不满，引发了示威游行，反革命分子则乘机挑

拨，国外帝国主义势力也大肆鼓噪，情况越来越复杂而紧张。这时，国内外反革

命势力进一步策动匈牙利军队叛乱，到处发生反革命复辟。匈牙利政府出于无奈，

邀请驻匈境内的苏军帮助恢复秩序。在那震惊世界的 13 天中，900 多万人的小国，

就有上万人伤亡，经济损失达数百亿福林（匈牙利货币），给匈牙利人民造成了

一场历史性悲剧。

对匈牙利事件，历来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势力有着不同的分析和结论。

从事件发生的当时直到今天，这种分歧依然如故，在我国也是如此。对匈牙利事

件，大多数人反对，说是反革命事件；但也有人赞成，说这是“民主”的表现。

毛泽东在 1957 年就说过：“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

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政府。他们的这

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匈牙利的

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

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吃了亏。”（《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08 页）但是，



与此

同时，为匈牙利事件唱赞歌的声音却一直不绝于耳。特别是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

匈牙利政局剧变之际，以波日高依为代表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民主社会

主义分子，大肆制造为 1956 年事件翻案的舆论。这成为匈牙利改旗易帜的前奏，

紧接着党就改变性质和改换名称，社会制度就变成资本主义制度。与此遥相呼应

的是，我国在 1989 年动乱期间，有人在一家著名大报上以连载三天的方式发表文

章，呼吁重新评价匈牙利事件。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它恰好说明民主社会主义

是一股国际性的思潮。这篇文章说的是外国的事情，指的是中国的发展道路，其

政治意图不言自明。

应该说，匈牙利事件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它是由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造成的，既有人民内部矛盾，又有敌我矛盾，两者交织在一起。我们知道，战后在

共产党领导下，匈牙利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实行大工业国有化和农村的土地改

革。当时的工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共产党在民众中

赢得了威信。特别是 1948 年同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劳动人民党之后，党的力量明显

壮大，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一度出现可喜的局面。但是，这时党的某些领导人，

特别是当时任党的总书记的拉科西&#8226;马加什盲目骄傲自大，实行了一

系列

错误的方针、政策，越来越脱离广大的党员和群众。他在国内大搞个人崇拜，唯

我独尊，排斥异己，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在经济建设方面，他不顾本国国情，机械抄袭苏联的作法，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

不切实际地提出要把铁矿极其贫乏的匈牙利变成“钢铁国家”，使得对重工业的

大量投资远远超过国民经济的承受力。他错误地实行农产品超高收购，强迫推行

农业集体化，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造成大量耕地荒芜，畜牧业停滞不前，城市

食品供应匮乏。他忽视改善人民的生活，认为改善人民生活“就是消耗掉我们的

将来”。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取得重大成就以后，他不切实际地修改

了原定指标，例如把制造业生产由原计划增长 90% 提高为 200 %，将投资总额由

原计划的 509 亿福林增加到 850 亿福林。这种做法导致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

1951—1953 年职工实际工资与 1949 年相比分别下降了 11%、17.8% 和 13 %，从而

引起了人民群众极大的不满。这种情绪也反映到党内，一些党组织公开提出，拉

科西已丧失群众的信任，建议中央委员会撤销其职务。各种类型的讨论会在群众

团体中也明显增多，参加者常达数千人。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当时的国际形势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波兰的波兹南事件等）的影响，到 10 月中旬，匈牙利国内

的局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紧张程度。有组织的或群众自发的辩论会和集会到处出

现，许多新的组织相继成立，最终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示威游行。

应该指出，人民群众斗争的矛头是指向拉科西集团的错误政策的，目的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是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否定党的领导。这

种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理得好的话，完全可以避免恶性事件的爆发。

遗憾的是，匈牙利党没有正确地对待这种矛盾，及时地纠正错误，使得矛盾积累

起来，越来越尖锐化，以至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应该认

真加以总结。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也是

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训（包括匈牙利事件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对于引发匈牙利事件的这方面的因素，人们谈论得很多了，而且分歧也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匈牙利事件中，尤其是在 10 月 23 日以后爆发的暴力事件中，国

内外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此，我国有的人却往往避而不谈，

讳莫如深，而这恰恰是分析匈牙利事件原因的分歧焦点所在。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批人民民主国家的诞生，逐渐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面对世界格局的这种重大变化，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加紧了活动，它

们力图颠覆这些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权，削弱其经济，破坏社会主义思想在人民中

的威信。早在 1947 年，美国便相继抛出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它

宣称共产主义“危害着自由世界和美国的安全”，美国负有“援助”某些国家复

兴的“使命”。美国当时拨出巨款，借援助西欧各国复兴战后经济为名，扩大自

己的势力范围，并对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封锁，以达到分化东欧的目的。

1951 年，美国制订了所谓“向世界共产主义发动政治进攻的纲领”，加紧他

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破坏活动。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从国家预算中拨款一

亿美元用于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进行破坏活动。许多妄图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

度的反动侨民组织，如“匈牙利民族委员会”，“旅美匈牙利人同盟”等，在很

大程度上都是靠这些经费维持的。

在反对匈牙利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美国极其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

破坏活动，他们称之为“心理战”。资产阶级的宣传家通过电台、用气球散发传

单、由外交使节分发书刊及其他各种方法，宣扬西方文化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甚至对人民民主制度进行直截了当的诽谤。在这些活动中，“美国之音”和“自

由欧洲”两个电台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美国之音”每天都用匈牙利语播音 14

次，宣传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1951 年开始播音的“自由欧洲”电台，则更加赤

裸裸地公开号召采取恐怖行动，进行武装斗争，推翻人民民主制度。“自由欧洲”

电台专门辟有“自由匈牙利之音”的节目，该专题广播的编辑人员中有许多是逃

亡国外的法西斯分子。

在唆使匈牙利人民进行武装暴动的同时，“自由欧洲”电台还加紧进行间谍

破坏活动。它在奥匈边境建立起一个拥有强力无线电收发报机的指挥所，专门搜

集匈牙利奸细送来的情报。据统计，匈牙利有关部门在 1954 和 1955 年对 215 名谍

报分子进行了审查，在 1955 和 1956 年先后挖出 15 个较大的和 30 个较小的敌特组织，

仅 1956 年上半年便抓获 40 名搞联络的特务分子。

匈牙利国内的反动势力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也一直进行着地下活动。早

在 1946 年 12 月，匈牙利保安机关便破获了一起阴谋叛国案。这是一起由法西斯地

下组织首脑、宗教领袖和小农党头目同国外特务机关和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颠覆

匈牙利共和国的阴谋案，此案被揭露后，美英等国对匈牙利实行了经济制裁，并

企图阻止匈牙利加入联合国。

从 1949 年起，国内的敌对组织纷纷活动，他们的基本力量是霍尔蒂时期的旧

军官、旧宪兵、旧警察、旧官吏，箭十字法西斯分子以及地主富农。当时猖獗一

时的组织有：箭十字、白色卫队、博通德师、白色游击队员、血盟、匈牙利抵抗

运动、教官学员组织等。

一些旧的资产阶级党派和政治组织也在秘密进行反革命活动，如小业主党、农民党、斯巴达克自由社会民主联盟、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基督教党等。为了改变

社会制度，它们私下串联，炮制各种新的纲领。这些组织的特点之一是在青年

中进行秘密活动，其中基督教党是它们的指导核心。这个党从 1950 年开始活动，

其目的是利用宗教信仰向青年施加影响，引诱和煽动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该

党的两个秘密网点“玛利亚教派”和“玛利亚之国”在传单上赤裸裸地叫嚣：

“……你们从上帝那里得到旨意的时机已到：残杀！扫荡！摧毁！”这些组织的

大量物资是从西方特务机构那里得到的。不难看出，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猖狂活动，

直接起到了颠覆破坏的作用。如果没有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这种活动，是闹不出 10

月事件这样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的。

事件平息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曾经对引发事件的因素做过全面的分析。

1956 年 12 月党的决议在分析 10 月事件的起因时指出：“事件是由四个主要原因引

起的。这些原因还在事件爆发以前很久就同时地、平行地、互相联系、互相影响

地发生作用。这些原因相互作用着，造成了悲剧性的结局。”当时所指的四

个主

要原因是：“一、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有决

定性影响的拉科西—格罗集团，从 1948 年底起，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

础。”“二、过去年代中形成并且不断扩大势力的党内反对派，以纳吉&#8226;

伊姆雷和洛松齐&#8226;盖佐为首，对 10 月事件的发生和事件的悲剧性转变起了

重大的作用。”“三、在策划和发动 10 月事件中作为主要力量的是法西斯霍尔蒂

反革命势力和匈牙利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势力。”“四、最后，国际帝国主义在

匈牙利事件中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他们的目的还不仅限于匈牙利问

题。”此后，1957 年 6 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 1959 年 12 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都再次强调了上述分析。应该说，这一分析是全面的，而我国某些人只讲第一个

因素，只字不提其他因素，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匈牙利事件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引起的，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交织在一

起。但是这些矛盾在整个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如果不分主次，势必

如堕烟海，不能把握事情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应该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事

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性质决定的。在匈牙利事件中，哪种矛盾是主要的呢？

应该说，不同阶段主要矛盾是不一样的。在 10 月 23 日以前，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

的，但以后就逐步转成敌我矛盾为主了。

那些仇视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起初还在革命的口号下隐蔽着，但很快就暴

露出了真面目：他们肆无忌惮地攻击党和政府的领导机关，占领大量的重要设施

和要害部门；他们丧心病狂地打开监狱，释放了 9000 多名刑事犯和 3000 多名政治

犯，其中许多人都成为暴动的骨干；他们惨无人道地屠杀积极分子和共产党人，

布达佩斯市委书记等一大批革命志士惨遭杀害，大约有 3000 多共产党人被捕关押

；他们骇人听闻地实施野蛮兽行和血腥恐怖，许多共产党人甚至年轻士兵被他们

砍头，挖心，倒吊在树上。他们甚至拟定了 1 万多名干部的死亡名单，准备“胜

利”之后大开杀戒。如果说群众的示威游行是为了清算拉科西的错误，如果说同

苏军的冲突还可拿维护民族利益来辩解，那么，反革命分子的上述血腥暴行则铁

一般地证实了：匈牙利确实实地爆发了反革命暴乱。

这些武装暴动者的成分十分复杂，他们中有许多是前霍尔蒂军官、警官、箭

十字法西斯党徒以及形形色色的刑事案犯、流氓分子。参与事件的，也有些是青

年工人和学生，但随着事态的恶性演变，反革命分子和仇视社会主义的犯罪分子

越来越占多数。

武装暴乱得到国际帝国主义集团的公开支持。自由欧洲电台改为昼夜 24 小时



播音，他们不仅从政治上出谋划策，而且还直接给予具体的军事建议。就连西方

的报纸也说：“这个无线电台整天对匈牙利广播，目的在于鼓动听众反对共产主

义制度的情绪，这些广播的主题是吹嘘美国的威力和它援助受奴役人民的使命…

…在暴乱过程中，大概有很多人是响应了‘自由欧洲’电台的号召的。”（1956

年 11 月 22 日巴黎《世界报》与此同时，大批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被秘密运进匈

牙利，许多武装的匈牙利侨民被派遣到国内参加暴乱。就连西方的报纸也承认：

“在匈牙利的流血事件中，有受过训练的匈牙利流亡分子参加，这一点现在已经

成为确实无疑的事实。”（1956 年 11 月 20 日《柏林日报》）

上述无可辩驳的事实（这些材料在某些人眼里是视而不见的）证明，国际帝

国主义集团和国内反革命势力内外勾结，形成暴动的骨干力量。因此，把 10 月 23

日以后的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是完全正确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就是这样分析

的。1956 年 12 月匈党的决议对 10 月事件作了明确定性。决议指出：“匈牙利 10 月

23 日的武装暴动从根本来说带有什么样的性质，它是革命还是民族革命，对于

这个问题，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只有一个回答：这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

这是反革命。”

决议强调：“虽然我们知道，参加我们国家这次事件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

无论是在目的、意图和感情上，都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正直的劳动者，真正的

爱国者、忠实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儿女”，但是，“反对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国

家制度和机构的武装暴动即使是由没有怀抱反革命目的的人举行的，这种武装暴

动也是为反革命目的服务的。”这实际上是作出了三点论断：一、10月事件是

反革命；二、参加事件的大多数人不想搞反革命；三、但是他们的行动助长了反

革命。

根据现有材料所进行的分析表明，1956年12月匈党中央决议所作出的历史结

论基本上是客观的。它正确分析了事件的起因，并且强调只有这四个原因一起才

导致反革命。它也指出了事件开始时是合理的群众运动，但从事件的性质、演变

和后果来看，应该说是反革命的。

我们党对于匈牙利事件也曾做过分析。1956年12月依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指出：

“在过去时期的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而反革命

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致反革命分子在1956年10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

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这就说明了过去时期的匈牙利还没有认真地建

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时过半个多世纪，这些论断在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是经

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分析了匈牙利事件的原因和性质，我们就可以回答纳吉问题了。诚然，纳吉

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曾有自己的见解，在 10 月事件以前，他反对拉科西错误的

方针政策，也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是，在 10 月事件中，纳吉却转到了反

革命叛乱分子一边，成为国内外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帮凶。正当反革命暴乱分子叫

嚣推翻人民民主制度，并在行动上实行冲击党和政府领导机关、血腥地迫害共产

党人的白色恐怖的时候，掌握政权的纳吉却宣布要取消国家保安局，成立有暴动

者参加的新的公安军。纳吉的这些举措为反革命的全面复辟打通了道路。反革命

的暴行达到高潮，他们继续进攻各地党委会，逮捕共产党员和国家保安队员，并

且攻占了布达佩斯市党委大楼，屠杀了 25 名党的干部和保卫人员。他们还逐渐掌

握了国家治安机构的领导权。与此同时，各反对党派纷纷建立，一些早被取缔的

反动党派又死灰复燃，与政府分庭抗礼。在这种情况下，纳吉不同反革命分子进

行斗争，却在 11 月 1 日得知苏军开进匈牙利的消息后，立即作出匈牙利退出华约

组织并宣布中立的决定，同时还请求联合国的保护。显然，这时纳吉已经不再是

什么社会主义的战士了，而站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那一边去了。历史事实表明，

这时的纳吉是不“清白”的，岂能翻案？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纳吉千方百计地迎合反革命分子的要求，但是阴谋颠覆

人民民主政权的反动势力对纳吉等人却仍不信任。被放出狱的红衣主教明曾蒂公

开宣布他不拥护改组后的纳吉政府，自由欧洲电台则为明曾蒂上台大造舆论，一

些反动党派甚至举行了支持明曾蒂的集会和游行。这些也许是纳吉不想看到的，

但它确实也是这位共产党的政府首脑为反革命复辟推波助澜所造成的可悲局

面。可悲也夫！可叹也夫！

今天，正当我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要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时候，又有人站出来重翻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老账，要

肯定匈牙利事件是“民族民主革命”，要“还纳吉以清白”。显然，在重大的政

治性原则问题上，谈论历史，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借古讽今；谈论外国问

题，也不是简单的学术研究，而是间接地回答中国问题。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历来如此。亲爱的同志，你们说呢？

这些看法不一定都对，仅供参考。

顺致敬礼！

你未曾谋面的老年朋友周新城

## 从匈牙利事件到《辩证理性批判》

旅游是萨特与波伏娃从不倦怠的度假方式。迄今为止，他们已经游遍了大半  
个世界。在所有的国家中萨特和波伏娃最喜欢意大利，而在所有的城市中他俩最  
钟情罗马。这一年，他俩决定：以后每年夏季都要来这里的国家旅馆住上两个月。  
罗马真称得上是一座理想城市。这儿既没有丝毫外省气息，但你能感受到乡村的  
粗犷和静寂：这儿没有工厂、没有烟尘，因此你能呼吸到在一尘不染的天空下浮  
动着的清爽空气，看到在墙壁之间遗留着的土壤的色彩。每当傍晚来临，罗马就  
更美得让人心醉：黄昏的天空如一幅天鹅绒，屋顶上均匀地铺着一层已逝阳光的  
余辉，又依傍着犹如一坛坛鲜花的繁星，灯光将一束束喷泉化成枝状形的宝石在  
轻轻波动，倒影点点的水底中，石块也变成了微动涟漪的晶体。罗马就是这样的  
一个地方：在这里，世上最最平凡的一切都称得上美。

今年夏天的罗马格外让人心旷神怡，尤其是眼见意大利人成功地实现了萨特  
期望在法国实现的愿望：左派空前地团结在了一起，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支持  
共产党，而共产党也一直信守他们的人道主义立场。面对如此友好、自由的气氛，  
萨特的旅游心情格外好。

生活是一条链，而不幸和烦恼是这条链上的链节。10月24日，萨特、波伏娃  
正与意大利共产党员画家古图索一起愉快地共进晚餐，一张报纸上的大标题让他  
们惊呆了：匈牙利发生流血事件，苏联陆军和空军进攻叛乱者。仿佛被人打了一  
闷棍，他们三人弄不清所发生的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只能心神不宁地一遍

又一遍地仔细阅读报道。匈牙利所发生的事件是人民对于一个不得人心的政府和自身无比严酷的生活条件的反抗情绪的一个大爆发。可苏联为什么这样急于干涉呢？它这样做不是公然违背了二十大上所允诺的不干涉原则吗？它不是会在世人的眼中变成一个帝国主义列强，变成一个压迫者吗？想到几百万人正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萨特将杯中的威士忌一饮而尽，激动地说：“苏联是社会主义的最后机会，而它却背叛了社会主义。”“而我们既不能赞同这一干涉，也不能谴责苏联。”古图索接过话头，泪水从他眼中夺眶而出。为了抵制绝望情绪，萨特拼命说话，并大口大口地灌威士忌，酒把他呛得眼泪直流。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他感到自己的心开始滴血：难道过去将近4年时间里自己为设法与共产主义保持一致而作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吗？为了达到某种一致，为了使这种一致不受影响，萨特曾经用了那么久的时间，花费了那么多的心血！

尽管不愿整个地怀疑自己从1952年以来为接近共产党而与反共势力作斗争的种种努力，萨特仍然毫不犹豫地对外国的入侵进行了谴责，于是，还没从意大利回到巴黎，他已经受到了法共报纸的批评。法共对这次事件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对事件的真相老是闪烁其词。他们用“法西斯主义者的暴动”来称这次匈牙利发生的动乱，并称布达佩斯工人为

“堕落阶级的残渣”，“凡尔赛分子”。他们仍然无保留地与苏联保持一致。

11月4日，苏联第二次入侵匈牙利，萨特感到必须立刻向世人表明他愤怒的谴责，当《快报》记者就此对他进行采访时，他十分激动地说：

“我坚决地、毫无保留地谴责苏联的侵略行径，但我并不认为这一事件应由苏联人民负责。我非常遗憾地，但又是彻底地同那些没有揭露（或者不能揭露）匈牙利屠杀行径的苏联作家朋友们断绝关系。与苏联官僚领导集团保持友谊是不

可能的。统治就是恐怖。”

萨特还以同样坚决的口吻谴责了对苏联部队的血腥干预表示支持的法共领导，指出他们的反应是根本不负责的。这次谈话在法国引起了轰动，而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国外电台、报刊也纷纷进行引用。

不论他人作何理解，萨特继续做着他认为应该做的事。他会同其他几位作家，联名写了一份反对俄国干涉的抗议书，然后发表在具有广泛影响的《观察家》周刊上。他们还在全国作家委员会上集会，悼念被判死刑的匈牙利记者，萨特还辞去了法苏友协副主席的职务，并为了一本匈牙利流亡者所著的书作序。一时间，苏联作家纷纷写信给他，对他所采取的态度表示惋惜。

如何从这一沉痛的事变中吸取教训？1957年1月号的《现代》杂志是一份讨论匈牙利问题的专号，内容几乎包括了从苏联“二十大”到匈牙利事变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在长达20页的社论《斯大林的幽灵》中，萨特指出了这份杂志未来的新方向——“真正的政治行动必须包含对其本身的道德估价”。正是基于这一原则，萨特批判了苏联对待周边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态度。在文章的最后，他不无沉痛地谈到他与共产党的关系：

“我们与共产党人相互讨论已经几年了，最初双方唇枪舌剑，后来转而友好相处……今天，我们重又回到了对立的状态：原因仅仅是没有别的办法。与现在这样的，并试图这样继续下去的共产党联盟，其结果只会给实现惟一的阵线的最后一些希望带来危害。”

从匈牙利事件到《辩证理性批判》对萨特而言，与共产党的决裂是个几乎不堪承受的打击，这也使一直追随他的波伏娃和其他朋友陷入了迷惘。这意味着加缪和梅隆-庞蒂是真理的预见者，而萨特不久前才写出来的《共产党人与和平》

只是一种虚幻。毫无疑问，右派将更加理直气壮。萨特细细地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他发现自己并没有错：苏联领导人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并不代表社会主义本身行不通，它仍然是当今人类的惟一希望——虽然它在苏联所形成的现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歪曲了，已经不那么纯粹了。萨特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构建一种“活的马克思主义”呢？为此，他与反对他的共产党人进行频繁的讨论，与流亡到法国来的波兰知识分子一起探讨。如何从内涵上复活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从表面上加以修改，这成为以后几年中萨特思考的核心问题。

和往常一样，现实斗争的失败再次使萨特回到他的哲学思考上来。怎样才能从内部激活马克思主义，从而使这一时代的哲学更具启发性和可调节性，而不至于变成一种僵化的教条？这一问题事实上与萨特自从在政治上向共产党靠拢以来一直思考着的一个问题相重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关系问题。从 50 年代初起，萨特开始重读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并不断探索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试图在哲学上把自己那种从主观性出的方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综合起来。这种思考的结果便产生了萨特第二本最重要的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

萨特一直感到自己的思考还不成熟，因而不曾动笔，这时外部的助力恰到好处地出现了。这一年，萨特的戏在华沙上演，他与波伏娃应邀访问波兰，波兰杂志《克拉科夫》的负责人利索威斯基约请萨特写一篇有关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关系的文章。这篇文章使萨特一发而不可收，他感到只有写一本书，才可能较为清楚地阐述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从 1957 年底开始，萨特忘情地撰写《辩证理性批判》。这次，萨特的创作状态使波伏娃大吃一惊。平时写作时，萨特总是写写停停，写完一部分后总要回头



看看，思考后再作修改，有时会把不满意的那页纸撕碎，从头再写。这一次，他的写作速度快得吓人，他总是一连几小时不停地写，写完一页就翻过去，从来不回过回头来看看自己已完成的内容。然而即使他的笔迅捷无比，还是跟不上思考的进程。为了保持这种速度，萨特常常一边写作，一边嘎吱嘎吱地嚼兴奋剂胶丸。开始他只嚼少量几粒，接着用量逐渐增多，到最后每天的剂量竟达到 20 粒——整整一瓶！

“安非他明使我思维和写作十分快捷，至少达到我正常速度的 3 倍，而我正需要加快速度。” 20 年后他这样说道。

每到傍晚，已经连续伏案工作了 10 个小时的萨特实在是精疲力竭了，他不得不停下笔来。由于全部的注意力松弛了下来，萨特看上去有些迷迷糊糊，说起话来含混不清，颠三倒四。晚上，萨特无法继续工作，总是呆在波伏娃所住的公寓里消磨时光。当喝完第一杯威士忌时，他就开始语无伦次了。“就喝这么多吧。”波伏娃这时总会从他手中拿过酒瓶。“不行，再喝一杯，我得放松放松。”已经涨红了脸的萨特十分固执。波伏娃只得违心地替他倒上第二杯。接着，他要第三杯，第四杯……他已经失去了对自己言行的控制力。波伏娃试图与他争论，然而无济于事，而且吵架只会增加萨特的疲惫。可是，也不能眼看着他自我毁灭呀！波伏娃心如刀割，却又实在无计可施。有两三次，她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把酒杯在厨房里的瓷砖地板上摔得粉碎，泪如泉涌。好在《辩证理性批判》很快便完成了。

不同于一般哲学家的作品，引经据典，旁采博收，前有概要，后有结论，这部著作在体裁和文字上可谓随心所欲、不拘形式。它的段落都很长很长，句子多是长句，有时一个长句竟占去半页之多，另外，萨特还在其中插入了许多自己创

造的新术语、新概念，因此比起《存在与虚无》来，《辩证理性批判》更让普通读者难以卒读。

《辩证理性批判》是萨特通过“批判”，把存在主义思想“补充”到马克思主义里面去，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复活”的一种尝试。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是不可超越的。可是，由于受到“偶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已变成了教条主义。萨特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迟钝性”与“先验性”，提出惟有“人类的创造性”和“个人的主观性”才能作为客观性的两个因素的中介物，才能理解社会和历史。最后他建议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一方面接受美国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应用精神分析学分析作为整体的人，以便更深刻地研究人的创造性，为其辩证法提供坚实的依据。

《辩证理性批判》代表了萨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一个阶段。他自己在晚年对这部书作出评价说：“《辩证理性批判》是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但却是反对共产党人的，我那时候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被共产党人完全歪曲变质了。现在，我不完全这么

从匈牙利事件到《辩证理性批判》

想。“晚年的萨特已经在更大程度上赞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其中的主要方面，如阶级斗争论、剩余价值论等是站得住脚的。只是当时的苏联过多地吸收了其中的权力哲学，因此让他困惑不已。从青年时期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到中年的批判性地接近马克思主义，到晚年的在原则上完全同意它，萨特走过了一条日益向共产主义靠拢的道路，这同时也是萨特自己的哲学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存在与虚无》主要是借助于对行为的分析，从心理和道德两方面考察人类的异化；而《辩证理性批判》则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补充了这种异化的历

史和社会的原因，从而使存在主义理论更完整、更合理地说明了被异化了的自由的存在。

## 对两次苏东剧变的不同反应

1956年初召开的苏共"20大"及随后发生的波匈事件，合起来实为一次小规模苏东剧变（以下简称为小苏东剧变），它对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无独有偶，30多年后的大规模苏东剧变（以下简称为大苏东剧变）又以更强的力度冲击了此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两位最高领导人对他们碰到的苏东剧变均极重视，对有关问题都做了一系列分析预测并提出了各自的对策措施且加以坚决的贯彻落实。目前，新世纪刚刚开始，国际局势变幻莫测，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发展的重要关口，在这一特定时刻，对毛邓两位中国前最高领导人有关各自碰到的苏东剧变的决策行为进行比较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有鉴于此，笔者遂主要根据大陆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的《毛选》（第5卷）和《邓选》（第3卷）撰得此文以求教正。

一、毛邓对苏东剧变的认识比较：共同点是两人均极重视且做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与判断，但与此相比，两人的不同点更为突出，以至可以认为是一种全局性的质的差异，具体如下：

毛对小苏东剧变看得很重，如认为这一年是"多事之秋"，"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1] 匈牙利事件则是"全国性大乱子"，[2] 等等。很自然地，毛称其为"坏事"、"乱子"，[3] 并将匈牙利事件定性为

反革命闹事。[4] 而对之所以发生小苏东剧变（特别是“匈牙利事件”）的原因，则认为“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并认为，这说明“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5] 他还进一步认为，这是由于二战以后，苏共和东欧党都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6] 最后，毛把这一切都归结到苏共“20 大”反斯大林，认为俄国人已经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于是，“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7] 因此，毛对苏共“20 大”很不满，特别是对苏共“20 大”反斯大林不满，并多次表示要就此以及其他一些重大问题与苏联“扯皮”、“抬杠子”，“臭骂他（苏联）一顿”，“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等等等等，[8] 总之是要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

而邓对规模和影响都属极大的大苏东剧变的态度则与毛当年对小苏东剧变的看法截然不同。首先，邓对大苏东剧变并不看得很重，并明确指出，“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9] 其次，邓对大苏东剧变未简单定性“戴帽”，并一再指出，“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10] 并进一步要求“少管别人的事”，[11] “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12] 并特别明确指出，“不管苏联怎样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3] 对于大苏东剧变之所以发生，邓则认为“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14]

## 二、毛邓对国内相关事物的认识和举措

由外及内，毛对国内形势的看法也是越来越严重。初时还认为因城乡政策正确，所以，“象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象匈牙利那样“党政军都搞垮”的事，在中国“是不会发生的”。[15]但不久后就认为国内可能“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16]后又进一步认为，“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17]如果形势有变化，则“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要分化”，[18]另外，学者教授、大学生、党的部分领导干部中间，也有“动摇分子”，也有要出洞的“蚂蚁”和要出来的“乌龟王八”。[19]他对知识分子特别不放心，多次提到“学生娃娃”要闹事，“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不少”，[20]反右中和反右后又进一步认为党的力量在新闻、教育、文艺、科技等领域不如右翼知识分子，并正式提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导致了严重后果的敌性用词。[21]他还认为全国大概有“六千万人”，“是不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的”（当时全国只有六亿人口）。[22]

形势如此严重，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匈牙利事件”呢？毛认为，“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23]再有就是“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一套干部”。[24]

基于以上判断和分析，毛认为国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即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25]至于“左”，毛则认为他们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只是看问题的方法有片面性而已，首开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之恶例。[26]因此，要反修反右，要重视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

阶级斗争"，[27]"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28]"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尾巴不要翘得太高"，[29]要改造知识分子，要抓意识形态，要抓思想工作和理论工作，

对两次苏东剧变的不同反应每个省市自治区都要把理论工作搞起来，有计划

地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

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30]要发动群众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并认为用这个办法（指"四大"），就可以避免波匈事件了。

[31]而最严重的是，毛明确提出党的"八大"对我国主要矛盾（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概括：团卸鲜遣欢缘模（4）衔？quot；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32]因而主要任务自然就不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要进行阶级斗争了。显然，毛的这一错误看法，为今后的一系列错误乃至"文革"动乱的错误发动奠定了基础。

三十多年后，邓在大苏东剧变发生后对国内形势的看法与毛当年相较大不相同。首先，邓对国内形势的发展相当有信心，而其根源则是由于对改革开放政策及其成果有信心。在大苏东剧变初露端倪时，邓即认为"中国大有希望"，这是因为"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他还明确指出，"这十年的成绩"是从改革开放得来的".[33]在大苏东剧变高潮中和剧变结束后不久，邓反复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

闯不过".[34]相应地，邓对国内各个阶层也有信心，"工人阶级靠得住，农民靠得住，解放军靠得住"，特别与毛不同的是，邓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靠得住的".[35]基于以上认识，邓明确指出，"人民群众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并强调"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 "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 "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36]由这一根本出发，邓很自然地把那些阻碍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左"的东西视为中国的主要危险。他强调"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并明确指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37]由此出发，邓一再强调"关键是发展经济"，而不赞成过分注意理论问题，更不赞成只说不干，甚至说影响干的那种脱离实践的"讨论".[38]他明确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 "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39]与此相关，邓也不赞成那种过分夸大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的看法，他明确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还是经济搞上去，人民得实惠。[40]最重要的是，邓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并认为，十几年来来的改革开放成果"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已充分证明了

其"正确性"，以至"谁想变也变不了"。〔41〕三、原因分析与借鉴意义造成毛邓认识迥异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1、国力国势不同。五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国力相对较弱，故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亦相对较大，受苏联等大邻国的影响和制约亦相对较强；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之中国国力相对增强，受苏联等大邻国的影响亦大大下降，且抗御国际形势变化和影响的能力大为提高。这显然是当年毛视小苏东剧变重而后来邓视大苏东剧变轻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原因。

2、外部实际和自身实践不同。对五十年代中期的毛而言，"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虽已有暴露但远未充分，而国际上大部分发达国家尚处于二战后的恢复和初步发展期，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甚至只是刚刚起步，现代科技革命也还没有踪影；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更是刚刚开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极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毛看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过多地采用了长期的军事战争和政治斗争中的惯用方法和角度，即强调政治、阶级斗争、以及群众运动等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却极度轻视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和关键作用，进而轻视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和正面作用，并刻意加以贬低和打击。

对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邓来说，"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已暴露无遗，现代科技革命发展迅猛，发达国家国力上升，发展中国家中也出现了相当一批发展迅猛的成功典范；而国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亦步入了一个空前的良性发展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很充分了。在这种形势下，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自然凸显，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也已得到了全社会的公认。邓从经济角度出发去总结说明大苏东剧变发生的原因，并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着力强调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根本性，且肯定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自然



顺理成章。

这种客体实际和主体实践的重大区别，显然形成了导致毛邓认识差距的实际基础和实践基础。

3 、 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不同。五十年代中期的中国，不单是毛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实际上，由于绝大部分党员干部长期处于农村环境和革命战争之中，因而他们的认识大都与毛相同相近甚至更过于毛（如对知识分子的轻视与敌意等），加之毛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

很高的威望，且党和国家在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的民主化建设中又存在着重大的缺陷，致使全党轻易认可并接受了毛对"八大"所述主要矛盾的变更，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长期的一浪高过一浪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事实上形成了政治第一和阶级斗争为纲的工作重心，并最终导致了"文革"悲剧的出现。

而三十多年后当大苏东剧变爆发时，中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质变，而最主要的变化是：持续达二十多年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先后使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干部等各个社会阶层都受到了巨大的负面伤害，使他们从反面认识到中国不能再走这条老路；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十一、二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各个阶层都程度不等地得到了实惠，这就给他们以强烈的正面启示：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和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邓作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主要危险是"左"不是"右"等论断自然是水到渠成。

上述不同时期各个社会阶层（特别是党员干部这个阶层）认识水平的重大差异显然是导致毛邓决策行为差异的重要原因，他们实际上构成了决定（至少是影响）毛邓决策行为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至于对当今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四点值得注意：1 、对国际形

势的变化（特别是那些突然发生的剧变），应坚持主要从生产力的角度、经济的角度、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的角度出发去作分析判断。要清醒地看到：当今之世，一国之强，大都是由于其管理体制和社会机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具体则表现为有利于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健康发展，有利于人们创造力的发挥；一国之衰，则大抵是由于其管理体制和社会机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具体则表现为该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滞缓和畸形，以及该国人民创造力的被压抑。

而那种单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去看问题、找原因的作法，则显然既不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当前的国际现实。

2、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别国（特别是一些大国）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应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在国际法和外交惯例的框架内处理对外事务，不亢不卑，有理有节。

3、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都应坚持少管别人的事（最好是不管）。中国极大，国内需做之事极多，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国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拿出过多精力实力去关注干预外部事务，必然会影响（至少是干扰）国内的经济的发展；更糟的是，这种干预往往会引火烧身，甚至最终落个两头不得好的结局，故实非明智之举。因此，专注国内事务，少管外界闲事，实应铭记在心，永志不忘。

4、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除非发生大规模侵华战争），改革开放这个大方向不能变，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能动。正如邓公所说，"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42]"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为切实做到这一点，就要高度警惕"左"的东西借国际形势变化之机死灰复燃。要清醒地看到，五十年代中后期，"左"的势力正

是借小苏东剧变之机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三十多年后的大苏东剧变时，“左”的势力又一次沉渣泛起——‘以反和平演变为纲’的论调一度甚嚣尘上就是明证，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消极影响。为将反“左”真正落到实处，依笔者拙见需特别注意以下两个问题。首先，需正确把握“左”的实质。因“左”在不同时期其具体表现形式是不同的，但其总的实质性特征则是一致的：即都是采用泛政治化方法（具体口号和手段不同）去人为地不断加剧国内外矛盾，而其后果则必然是对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造成程度不等的干扰、冲击、甚至破坏。当前，要特别警惕某些“左”的势力打着“加强国防”（对外）和“保持稳定”（对内）的幌子，搞“左”变“右”、“左”奸。其次，在国际形势发生剧变时，国内形势往往亦会相应地发生动荡。如小苏东剧变后出现了“反右”运动；大苏东剧变中爆发了“六、四”风潮和“反和平演变”运动；结果是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影响。今后在国际形势发生剧烈动荡时（几乎无法避免），应注意着力防止国内再发生与前两次类似的、对经济建设产生重大消极影响的运动、风潮或动荡。而能否真正做到这一点，对全国上下无疑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最后必须指出，本人并无抑毛扬邓之意。实际上，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邓在五十年代面对突如其来的小苏东剧变时无论对外对内都表现得甚至比毛更“左”。但经过二十多年的折腾后，邓终于有了相当程度的觉悟（尽管仍有其局限性），且发动并推进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实践。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正是苏东剧变后长达三十多年的反正两方面实践和实际才使邓有可能在面对大苏东剧变时表现出了与毛大不相同的决策行为，而邓本人则在处理大苏东剧变的相关事务中确实表现出了善于从历史和实践总结学习且勇于实践的可贵品质，对此自然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参考文献与注释：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

第1版，

[1]339页，[2]337页，[3]397、318页，[4]318、323、367页，[5]323页，

[6]357页，[7]321、322页，[8]345页，[15]337、338页，[16]352页，[17]417

页，[18]390页，[19]333、334、335页，[20]351页，[21]425、428页，

[22]482页，[23]376页，[24]327页，[25]418、423、424页，[26]423、

424页，[27]417、418页，[28]461页，[29]452、454页，[30]357、350、

463页，[31]486页，[32]475页。

2、《邓小平文

## 对匈牙利事件的认识和思考

奚兆永

《炎黄春秋》第3期刊发了林蕴晖的文章《1956年匈牙利事件引发刘少奇的思考》，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有关匈牙利事件所做的科学论断提出了批评，把1956年10月25日-11月4日十三天中发生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复辟事件说成是“人民反对政府的事件”，否定“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作用”，并且通过宣扬所谓的“刘少奇的思考”否定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长时间集体讨论所得出的正确观点。这是《炎黄春秋》近来加强其反新中国、反毛泽东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关大是大非，不可不予置评。

一、是“人民反对政府的事件”，还是“反革命复辟”？

《人民日报》在 1956 年 12 月 29 日曾发表过一篇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题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其中对于匈牙利事件是这样论述的：“帝国主义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正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所说，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而在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复辟阴谋被击退以后以美国为首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操纵联合国通过反对苏联和干涉匈牙利内政决议，一方面在整个西方世界煽起疯狂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

“再论”是毛泽东亲自提出要写，亲自定题和提出要点，亲自组织讨论和修改，亲自定稿的一篇重要文章，发表以后曾在国内外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

“林文”出于反毛的目的，对“再论”的论断妄加评论。文章在引用了“再论”的话以后写道，“这段话说明的是，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起主要的决定性作用的是外因——国际帝国主义：其性质是‘反革命复辟’。”对“再论”的这一论断，

“林文”显然是不赞成的。“林文”自己的结论是这样说的：“关于事件的性质，卡达尔认为，10 月 23 日的运动是‘武装起事’；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是‘反革命事件’。匈牙利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基本上接受了卡达尔的观点和立场，但对事件的性质则做了‘这是反革命’的单一结论。”

在这里，“林文”不仅反对“再论”的论断，而且用卡达尔与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会谈时讲的话否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对这一事件性质所做的结论。这究竟有没有道理呢？我们知道，卡达尔与乔治乌·德治的会谈是在 1956 年 11 月 12 日进行的，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

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是 1956 年 12 月 2 日到 5 日举行的，卡达尔的讲话在前，而通过决议在后，而且，一个是个人的谈话，一个是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按照道理，当然应该以后来用中央全会名义发表的正式决议为准，而“林文”却反其道而行之，用先发表的卡达尔的谈话来纠正后发表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这样做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需要指出的是，“林文”还引用了 1989 年匈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和“匈牙利问题专家”阚思静的评论。“经过 33 年之后，1989 年 2 月 10 日-11 日，匈党中央全会再次就 1956 年事件做出决议，会议公报称：‘中央委员会在讨论中强调，1956 年，由于领导在革新方面无能为力导致了政治爆炸。爆发了真正的起义，人民起义。在这个起义中，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起了作用，但企图复辟的力量，社会渣滓和声名狼藉的分子从一开始就鱼目混珠地混杂进来。道 10 月底，反革命的行动增多了。’而阚思静则进一步评论说，‘这次的重新评价，肯定了前半期是’人民起义‘，后半期是’反革命行动增多’。与过去结论相比，突出了前半期的革命性质，淡化了后半期的反革命色彩。”（阚思静：《卡达尔与匈牙利》，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8-120 页；268-269 页）

对于匈牙利党中央 1989 年 2 月 10-11 日会议的决议，需要指出的是，其时正是东欧剧变的前夜，这次中央全会就是否实行多党制、重新评价 1956 年事件并为纳吉平反的问题，以格罗为代表的“稳健改革派”与波日高伊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展开了激烈斗争。最后达成妥协：肯定 1956 年事件的性质为人民起义，肯定纳吉是“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并通过了实行多党制的决议。在实行多党制的原则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作出让步，宪法草案中去掉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去掉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代之“资产阶级民主和

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都可以实现”等等。我们知道，正是在 1989 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改为社会党，由此导致党的分裂和力量迅速萎缩。可以说，这次中央全会正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剧变的一个转折点。1989 年 10 月 23 日，匈牙利宣布国名更改为匈牙利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不复存在。1990 年 3 月，在实行多党制后的首次大选中，社会主义工人党丧失了执政地位，沦为在野党。匈牙利国家政权更迭，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显然，以 1989 年 2 月中央全会决议的观点作为评判匈牙利事件性质的根据，是完全不正确的。

至于“匈牙利问题专家”阚思静以这次会议的决议为依据所做的进一步评价，就离事实更远了。在匈牙利党中央 1989 年 2 月全会的公报里还承认“企图复辟的力量，社会渣滓和声名狼藉的分子从一开始就鱼目混珠地混杂进来”，而在阚思静的评价里就连这个意思也没有了。他强调的所谓“突出了前半期的革命性质”，显然比匈牙利党的 2 月决议更加“突出了”；而所谓“淡化了后半期的反革命色彩”，显然也比 2 月决议更加“淡化了”。

我们今天评论“匈牙利事件”的性质，显然不应该以 33 年后在改变了的形势下匈牙利党中央所通过的 1989 年 2 月决议为依据，而应该以事件发生时的历史事实为依据。

年纪大一些的人，许多都看过有关匈牙利事件的纪录片，在纪录片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白色恐怖的情景。在街头，许多人被枪杀、被打死，尸体被挂在路灯柱上，双脚倒吊着，惨状让人目不忍睹。反革命分子甚至把在医院里治疗的边防军中尉斯特佛柯·约瑟夫从病床上拖到街上，猛击他的头部，将其活活打死，然后将双脚倒吊起来示众。（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新闻局编：《匈牙利十月事件中的反革命势力》，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5 页插图；《纳吉。

伊姆雷及其同谋者的反革命阴谋》，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附录之照片）据统计，在匈牙利事件中，匈牙利全国死亡人数达 2700 人。在首都布达佩斯死亡的有 1945 人，其中 85% 是该市的居民，其余来自其他各省。全国有近 20000 人受伤，其中 61% 住院治疗，而在住院患者中有 8% 死亡。（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新闻局编：《匈牙利十月事件中的反革命势力》，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68 页）

事实上，早在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前，反革命势力就已经开始活动了。首先自然是制造舆论。这个工作应该说在 1956 年春天就已经开始。在这方面，自由欧洲电台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其主要矛头是指向他们所说的“外来统治”，旨在破坏匈苏友谊和联盟关系，而具体要求就是要苏军撤出匈牙利；在国内方面，则是鼓吹言论和新闻自由，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包括战犯和法西斯分子），实现多党制等。实际上，后来爆发 10 月 23 日的事件，其口号多来源于此。（雷尼·彼得编：《1956 年匈牙利事件的经过和历史教训》，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8 页）

在这方面，裴多菲俱乐部也起了重要作用。如今 70 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当时这个裴多菲俱乐部是匈牙利右派知识分子的大本营，他们积极配合自由欧洲电台的宣传并把这种宣传变为行动。10 月 23 日的示威游行就是他们决定举行的，口号也是他们决定的。而根据对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案件的判决书，阴谋分子集团几乎每天举行秘密会议，有的甚至一天举行几次。1956 年 10 月 19 日、20 日和 22 日，按照纳吉·伊姆雷的倡议，洛松齐·格佐、多纳特·费伦茨、吉梅什·米克洛什在阴谋集团其他成员参与下着手起草他们所组成的政府纲领。在 10 月 23 日上午，在洛松齐·格佐的住宅中举行了秘密会议，会上拟定了未来政府的人员名单，纳吉·伊姆雷自己担任总理，阴谋集团成员瓜分了各部部长的职位。（《匈牙利人



民共和国部长会议新闻局编：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的反革命阴谋》，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2-13 页）与此同时，纳吉。伊姆雷集团的副手洛松齐。格佐还在 23 日之前四五天主持过一个知识分子大会，他们不允许市委副书记发言，攻击地方议会主席，甚至要将其绞死，会议的空气越来越倾向于反革命，而洛松齐。格佐根本没有想去遏止这种反革命气焰。（同上，第 36 页）纳吉。伊姆雷的党羽还从一个大学到另一个大学进行活动，为 10 月 23 日的示威游行进行鼓动。10 月 22 日，在工业大学举行的集会上，该校校长表示不赞成示威游行，而纳吉。伊姆雷的党羽西拉吉。约瑟夫两次发言，进行煽动性的反苏宣传，致使该校决定参加 23 日的示威游行。因此，尽管参加示威游行的几千名大学生和十多万市民并不就是反革命，但是，他们是在纳吉。伊姆雷的党羽们的鼓动下参加到示威游行的队伍中来的。

问题还在于，从示威游行一开始就有各种反革命分子混进了游行队伍，他们以群众作掩护，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这些反革命活动实际上在 23 日这天就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了。正是在这一天，他们首先干的事情之一，就是推倒布达佩斯道萨。捷耶尔吉大街上的斯大林铜像，然后再用锤子将其砸碎。这实际上是执行设在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早在 8 月 28 日的节目中就已提出过的一句话：“7 月 18 日（即匈牙利前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下台和接替他的格罗上台的日子——引者）以后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格罗政权采取了什么决定和措施呢？他们有没有把那个立在道萨。捷耶尔吉大街上丑陋的铜像拆下来熔毁掉呢？”（《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新闻局编：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的反革命阴谋》，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13-114 页）也是在这一天，他们的口号里有“打倒红星”、“不要使用同志这个词”，还有要求让纳吉。伊姆雷上台等内容。他们还挖去匈

牙利国旗上的国徽标志。他们围攻和袭击了《人民自由报》大楼、广播电台和电话局。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扔到大街上加以践踏和烧毁。他们还从一些工厂盗窃了许多卡车，从 10 月 23 日起他们就盗窃台孚汽车联合企业的卡车，而在 10 月 24 日晚盗窃的卡车更达 150 辆之多，这些卡车被用来运输反动武装、武器和弹药。在发生匈牙利事件期间，许多逃亡国外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还有什么旧时的官吏、军官、律师、宪兵之类的，纷纷从国外回到匈牙利，这些“还乡团”显然是想夺回已经失去的天堂的。这些人有不少还通过所谓的“选举”“选上”了所谓的“‘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其实是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下在呼喊声中哄出来的）。总之，事实很清楚，匈牙利事件从一开始就具有反革命的性质，怎么能说只是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才是“反革命事件”呢？而且，反革命事件是 11 月 4 日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才平息的，“林文”说成是 11 月 1 日就结束了，这些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应该指出的是，匈牙利事件的反革命性质，甚至从敌人的报刊也能够得到证明。《匈牙利使者》是用匈牙利文在慕尼黑出版的作为“匈牙利难民通讯”的反革命报纸之一，它在一篇社论里说，“我们焚烧了十一年来专门捏造谣言的《人民自由报》。我们捣毁了党委会。我们消灭了了臭名昭著的国家保安局（AVO）的一部分刽子手。我们到处拆毁红星。我们粉碎了足以使我们想起十一年来可诅咒的一切东西。这些都是我们的革命的可以看得见的标志，可是同时也是革命的象征。”（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新闻局编：《匈牙利十月事件中的反革命势力》，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 页）这些话可说是不打自招，活画出了他们的反革命嘴脸。他们所谓的“革命”，以及一些人所说的“人民起义”，实际上不过是被推翻的阶级进行的阶级报复，不过是要复辟已被推翻的反动政权罢

了。这哪里是什么“革命”或“人民起义”？这分明是地地道道的反人民的反革命复辟！

二、说帝国主义“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不全面”吗？

“再论”援引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说，“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而在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林文”说，

“需要指出的是，文中所说其依据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决议’，我们在与原决议相比较以后，可以发现上述对事件发生原因的表述，是不全面的。”

“再论”明明是说“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又怎么说是“不全面”的呢？至于“再论”说“在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这一说法来自《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这一点从“林文”的大段引证看也不存在任何引用不当的问题，又何错之有？在“林文”作者看来，这“国际帝国主义在匈牙利事件中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是放在决议“四个原因”中作为“最后”一个原因说的，应该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原因，不应该也不可能“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在我看来，“林文”作者这样看问题，未免太机械，太形而上学了。很多时候，放在最后讲，并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恰恰是因为它特别重要。其实，人们讲话或写文章的次序，可以按照时间的顺序（由前到后），也可以按照空间的顺序（由近到远），也可以按照事物的逻辑顺序（由表及里，或者是由抽象到具体），当然也可以按照重要程度顺序（由重到轻，或者由轻到重），但是，决不可机械地认为第一就一定是第一位的，就是最重要的，最后就

是最末位的，就是最不重要的。英语里由一个短语，也可以说是一句“名言”，

叫做 last but not least，意思就是“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

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党委会的工作方

法》，一共讲了十二点，其第十二点即最后一点是讲“划清两种界限”。他说，

“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有些人不懂得划清这种界限。例如，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就把延安说得好似‘一无是处’，而没有把延安的官僚主义和西安的官僚主义比较一下，区别一下。这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吗？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事情的性质弄混淆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4页）显然，毛泽东在十二点即最后一点讲的这格问题绝不是一个不重要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联系到匈牙利事件，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中最后讲的原因是不是一个不重要的原因呢？显然也不是。这一点，由决议所作的论断已经充分说明，它说“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既然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还能不重要吗？

当然，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还是要看当时的历史事实。

国际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亚出现一大批人民民主国家当然是心有不甘的。但是，他们对于这些国家又没有办法。二战以后美帝国主义的一个

重要的政治代表人物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经哀叹：“同苏联专制政权奴役下的人们取得联系，已经成为最困难任务之一。苏联共产党的铁幕非常严密，……。”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战争或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27-228 页）于是，他不得不去研究共产党的做法。他发现，共产党很善于宣传，而且在组织和技术上也很高明。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说，“应用苏联共产党所用的方法，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它是以夸大的宣传获得胜利的；因此当共产党开始掌握政权时，他们往往受到欢迎，被看成是解放者，为人们带来新的希望。”

（同上，第 226 页）因此，杜勒斯认为，“如果美国要把任何理想、消息和善良愿望的信息带给被奴役的人民，就必须发展特殊的技术。”他说，“我们知道，苏联共产党在组织和技术上都有了发展。它有训练煽动人员的学校，也有广播网；它在自由世界的报章、广播和电影上，都有公开和秘密低视力；它有经过训练的侦探和间谍。而在我们一方面前夜很少有门路把理想或消息送到铁幕后面去，或了解那里的情况。”他承认，“在过去五年间，我们耗费了许多亿美元准备一场可能发生的用炸弹、飞机和大炮的战争；但是我们在思想战争中所花费的钱却很少。我们正在界限一场思想战争，而且正遭受到用军事力量无法挽救的失败。”

（同上，第 228 页）这就是杜勒斯的“和平演变”策略或美国在“冷战”时期的思维方式。

美国帝国主义的政治代表人物不仅这样说，而且也正是这样做的。在这方面，首先出现的是“美国之音”。接着，在 1950 年 3 月，在希腊境内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播站。“还有一个叫做自由欧洲民族委员会的私人组织，这个组织成立于 1949 年 6 月，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衷心赞助，对于来自中欧的主要政治流亡分子，给予援助和庇护。为了使他们同国内朋友保持联系，和使他们的同胞内心所燃起的

自由火焰不知熄灭，这个组织正在建立自己的广播机构，称为‘自由欧洲’。”

（同上，第 289 页）很清楚，在匈牙利事件中起了很坏作用的自由欧洲电台是得到美国国务院的“衷心赞助”建立起来的一个宣传机构。

正是这个自由欧洲电台直接指导和参与了匈牙利事件。在 10 月 29 日的节目里，这个电台公开歇斯底里地吼叫：“自由战士们，不要放下武器，……不要给这个布达佩斯政府一块煤、一滴汽油。……要以宣布总罢工给予英勇的自由战士以必要的支持和援助。”而在同一天的特别消息中则说，“苏军立即全部撤出匈牙利领土；放弃华沙条约；立即完全解散国家保安局。应该把新的警察或治安力量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一个未在以前任何一届内阁或共产党中央机构任过职的部长。完全赦免所有参加起义的自由战士。应在派出代表基础上由各种爱国者集团组成政府的多数。召开通过自由秘密选举产生的立宪议会，以建立新政府，提出执政纲领。”当时，大部分反革命集团和政党都把这一方针看成是权威性的。有人很快就把自由欧洲电台的要求作为自己的意见在 10 月 30 日的《匈牙利独立报》公布了，所用的题目是《我们也不承认现政府》，而文中更明确地说，“我们连联合政府也不承认。”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里也有人认为进展太快了也不好。美国驻布达佩斯临时代办给前去拜访的纳吉。伊姆雷以指示，提出请他至少对西方表示出一点不信任。至少在苏军撤离国家之前。……在当时情况下，我们对纳吉。伊姆雷不要过快取消共产主义的要求是完全正确的。问题是我们给他出的这个主意过迟了。原来，纳吉。伊姆雷已经在 11 月 1 日向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宣布“匈牙利政府立即废弃华沙条约，同时声明匈牙利中立，向联合国求援，……”了。（雷尼。彼得：《1956 年协议了时间的经过和历史教训》，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4-65 页）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祝贺匈牙利宣布中立和纳

吉。伊姆雷声称匈牙利想要退出华约。同时他强调，应高度警惕地关注匈牙利事件。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则在其回忆录中说，“匈牙利目前的问题是，暴动者缺乏强有力的领袖人物；纳吉。伊姆雷将垮台，起义者将要求他引渡。假如匈牙利人民以天主教的热情给以支持的话，明曾蒂红衣主教可以当领袖。”（同上，第 65-66 页）果然，在匈牙利事件期间回到匈牙利的红衣大主教明曾蒂的住处一下子就热闹起来，找他的人很多。不过 11 月 4 日以卡达尔为首的工农政府的建立和苏军进入布达佩斯，粉碎了艾森豪威尔的美梦，也粉碎了那个红衣主教的美梦。匈牙利事件最终以革命人民的胜利和反动势力的失败而告结束。

此外，在匈牙利事件期间，国际帝国主义还对反革命势力提供了物质的支援。反革命分子的武器弹药除了一部分是从军火弹药库抢劫来的外，也有不少是由国际帝国主义提供的。凯奇凯什。费伦茨，一个布达佩斯居民，曾经在一所小学目击了一批外国武器送给反革命分子指挥部的情形。他说，“1956 年 11 月 4 日下午，武装反革命分子当着我们的面，在普拉特尔街小学的地下室里，打开许多木头箱子，上面写着德文，并有红十字标志。他们说，这是那天货车送来的。这些有红十字的木箱——大约是 50×50 公分——被金属板隔成几部分。一边装着柠檬、桔子、巧克力和其他食物，另一边是手榴弹。”而费洛。拉纳什，吉尔医院的看门人，在证词里说，“反革命叛乱期间，我一直在医院里。1956 年 10 月 27-28 日，一辆西德汽车开到医院的大门前。车子里有三个西德人，他们抬进来一个受了伤的匈牙利人。我好几次亲眼看见在这些运送伤兵都带有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牌照的汽车里，以及撤离的人的身上，携带各种不同的武器。我验明上述那辆西德汽车时，我发现在车子里前后放着六支枪。”（匈牙利人们共和国部长会议新闻局：

《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着的反革命阴谋》，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25

页)

这些事实都可以说明，匈牙利事件实际上是美帝国主义导演的，而自由欧洲电台则充当了前线总指挥，纳吉。伊姆雷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一个傀儡而已。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里说“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是完全正确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引用决议的说法也是完全正确的，而“林文”批评其“不全面”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 三、关于所谓“匈牙利事件引发的刘少奇的思考”

本来，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匈牙利事件的看法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里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但是，“林文”却从另外的角度来论述“匈牙利事件引发刘少奇的思考”。文章说，“刘少奇对匈牙利事件情况的了解，是10月23日到31日在莫斯科直接从苏共中央得知的。在当时，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匈牙利事件的性质，看成是反革命事件，在认识上是一致的。”还说，“中共中央对匈牙利事件的讨论，是1956年11月10-15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目前的时局问题的报告。它对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原因做了如下分析：（六点，略）然后写道：”三个远因，三个近因。“文章强调，”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在这个报告中没有提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原因。”

其实，八届二中全会并不是专们讨论匈牙利事件的一次会议，刘少奇的报告也不是专就匈牙利事件发表看法的。按照《刘少奇年谱》的说法，这次中央全会“着重讨论了国际局势和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问题。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报告了他不久前访问苏联，就波匈事件等问题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指出，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不能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



要重视农业和轻工业，要关心人民生活；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炸弹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79 页）显然，这里并不是全面总结匈牙利事件的方方面面，而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结合 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从中吸取教训。刘少奇没有提帝国主义这个因素，显然也不是否认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否认国际帝国主义在匈牙利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从 12 月 2 日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要讨论与波匈事件密切相关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刘少奇参加了每一次会议的讨论，但是他并没有反对文章关于“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的观点，相反，他还曾在会上发言说，“修正主义者现在大讲‘社会主义民主’，其实他们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也有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主义加以反对的。要把这个问题说透。”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 页）

需要指出的是，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里，对于敌对势力对匈牙利事件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且对此专门作了理论上的阐述。文章写道：“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复辟阴谋被击退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操纵联合国通过反对苏联和干涉匈牙利内政的决议，一方面在整个西方世界煽起疯狂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美帝国主义尽管利用英法侵埃战争的失败，竭力企图夺取英法在中东北非的利益，但是还是声明保证同英法消除‘误会’，取得‘更密切、更亲密的谅解’，以便重整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反对亚非人民和反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统一战线。为了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目的，帝国主义国家应该团结起来——这就是杜勒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上所说‘在世界历史的这一紧要关头，必须有一套生活和行动的哲学’的主要含义。杜勒斯多

少带着醉意地断言：“苏联共产党结构正处于恶化状态（？），而统治者的权力正在崩溃（？），面对着这种形势，自由国家必须保持道义的压力，这种压力有助于破坏苏联—中国共产主义体系，有助于保持军事实力和决心。‘他号召北大西洋公约国家’搞垮以军国主义（？）和无神论观念为基础的苏联强有力的专制政治（？）’，并且认为，’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在现在看来似乎是可能的事情’！

“我们从来认为敌人是我们最好的教师。现在杜勒斯又在给我们上课了。他尽可以污蔑我们一千次，诅咒我们一万次，这毫无什么新奇之处。但是他从‘哲学’上要求帝国主义世界把对于共产主义的矛盾放在其他一切矛盾之上，一切都为了‘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破坏’和‘搞垮’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这对于他们虽然肯定是徒劳的，对于我们却给了十分有益的教训。尽管我们一贯主张而且继续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和平共处，实行和平竞赛，帝国主义者还是时时刻刻都想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敌人同我们之间的严重斗争，这就是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

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互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在开始谈到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之前，我们认为必须首先解决这个根本立场问题。否则，我们就必然会迷失方向，就不可能对于国际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

尽管我们一贯主张而且继续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和平共处，实行和平竞赛，帝国主义者还是时时刻刻都想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敌人同我们之间的严重斗争，这就是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我们大段地引证“再论”的论述，是为了说明，从匈牙利事件中吸取历史教训，当然应该从不同方面去进行分析，但是却万万不可忘掉分清敌我这个根本立场问题。人们也许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匈牙利前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的错误，或许匈牙利事件就可以避免。在这方面，许多人喜欢把匈牙利事件归之于拉科西个人，把拉科西说成是“斯大林分子”，好像一切问题都是他造成的。其实，拉科西对于匈牙利的革命事业是一位有功之臣。拉科西是匈牙利老一辈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1910 年就参加了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18 年参与了匈牙利共产党的创建，并且参加了 1918 年 10 月 30 日的匈牙利革命和 1919 年 3 月 22 日建立的匈牙利苏维埃政府，他曾担任副商业人民委员和生产人民委员会委员（部长）。虽然这个革命政权只存在了 133 天，但是，列宁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在 1919 年 5 月 27 日写的《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说，“匈牙利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不过两个多月，但从组织程度方面说，匈牙利的无产阶级看来已经超过了我们。”（《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34 页）匈牙利苏维埃政权失败后，他流亡国外，后曾在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并于 1921 年任书记。1924 年回国参与匈牙利共产党的重建，1925 年被霍尔蒂政府逮捕，判无期徒刑。他在狱中度过了 15 年，后经苏联政府干预被释放，侨居苏联。1945 年回到匈牙利，担任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1948 年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匈牙利劳动党，他继续担任总书记和第一书记。苏共 20 大以后，在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的粗暴干预下，他于 1956 年 7 月辞去这一职务。拉科西的工作是有很成绩的，这一点，甚至连杜勒斯也不得不承认。杜勒斯在讲冷战“五年来的总结”时说，“共产党最惊人的成就是，它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取得了全部政权。1945 年 11 月 4 日的选举，表明共产党是一个极小的少数。‘小农党’在议会中取得了大多数。但共产党的少数却借惊人的共产党手段取得了统治权。”（杜勒斯：《战争或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29 页）虽然杜勒斯讲这样的话是不怀好意的，但是，匈牙利共产党从不利的情况下开始最后终于掌握了全部政权却是事实。实际上，在苏共 20 大之前，拉科西在人民群众中也是很有威信的。有一首歌叫《拉科西颂》，1955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赴匈牙利等国访问时曾作为节目之一在匈牙利演出过；如果拉科西名声很不好，是不可能选此节目的。总政歌舞团回国后到福建前线

进行慰问演出，在对厦门大学师生进行演出时也演出了这首很有气势的合唱曲；

如果这首歌在匈牙利演出时不受欢迎的话，估计他们也是不会在中国再演的。当然，拉科西也不是没有错误和缺点，但是苏共领导人对其进行粗暴的处置却是不应该的。至于把他称为“斯大林分子”而加以排斥，也是完全错误的。“再论”

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苏联共产党的这样一个纠正错误的斗争，当然不会从西方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方面得到支持。他们为了乘机抹煞斯大林的正确方面，抹煞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过去时期的巨大成就，为了乘机在共产主义队伍中制造混乱和分裂，硬把对于斯大林错误的纠正叫作所谓反对‘斯大林主义’，叫作所谓‘反斯大林分子’对于‘斯大林分子’的斗争。他们的恶意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不幸，在某些共产主义者中间，也在那里传播着类似的说法。我们以为，共产主义者采取这种说法是极端有害的。”（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某些人把拉科西作为“斯大林分子”来反，显然是极其错误的。

在这方面，还有人把匈牙利事件归之于拉科西的照搬苏联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应该说这个问题被人为地夸大了。苏联毕竟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人类共同的道路，它当然具有很大的示范作用。而且，当时的苏联对匈牙利等人民民主国家总的来说也是友好的，苏匈之间的关系本来并不紧张，只是由于苏共20大以后自由欧洲电台的反动宣传，使一些人对苏联抱有反感，要求苏联撤军。但是即使如此，根据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一书中的记述，

10月27日，当苏联军队基本上控制了布达佩斯，匈牙利的群众与苏军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他们互相开玩笑，小孩爬到苏军坦克上玩。人们在纪录片上也看过这样的镜头。这说明，匈牙利的劳动群众是拥护苏军平息叛乱的。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有些重要因素却不是匈牙利党自己可以决定的，国外

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革命势力是匈牙利党指挥不了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转引自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 页）

事实也正是这样。不管你工作做得好还是不好，帝国主义总是要要对社会主  
义国家搞颠覆活动的。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联系今天的情况，  
国际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发展强大总是看作是“威胁”，他们对各种分裂势力，  
包括“台独”、“藏独”和“疆独”都一概给以支持，难道是因为我们做错了吗？  
当然不是。我们要发展自己的经济有什么错？我们要实现国家的统一有什么错？  
我们解放西藏的农奴有什么错？但是，他们就是要反对，要捣乱，要破坏。这些  
事件其实也和匈牙利事件一样，如果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不首先分清敌我，  
不解决根本立场问题，那是很难说得清楚的。而恰恰是在这个根本立场问题上，  
“林文”借助于所谓的“刘少奇的思考”提出了极其错误的观点，完全背离了毛  
泽东主持下由包括刘少奇等政治局常委自始至终参加讨论和写作的《再论无产阶  
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林文”这样做，不仅是对过去历  
史的歪曲，也是对当前现实的误导，其危害极大；我们之所以要对该文进行批驳，  
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历史为“匈牙利事件”画上了句号

□李同成

1956 年 10 月 23 日发生的“匈牙利事件”震撼世界，当时认为这是一起反革命

事件，经苏联出兵镇压下去。新成立的工农革命政府将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伊姆雷以“叛国”和“推翻人民共和国制度”的罪名送上了断头台。1989年匈牙利发生剧变，国民议会以法律形式为“匈牙利事件”平反，并为纳吉重新举行安葬仪式，从而彻底推翻了关于匈牙利事件的历史结论。当时发生“匈牙利事件”的背景是什么？在1989年历史剧变中为何各党派紧紧围绕着“匈牙利”事件展开斗争？其内情令人深思。

拉科西照搬苏联模式 1948年3月，匈牙利社会党和共产党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原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为总书记。拉科西上任后，取消其他政党，确定一党制。1952年8月，拉科西又兼任总理，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党组织对行政事务干预过多，削弱了政府机关的作用。群众团体也形同虚设，成为党的传声筒。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指导下，不信任的气氛开始蔓延，前社会党人和一些老党员受到怀疑，他们被当作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特务被捕投入监狱。大批老党员遭受排挤，有的被撤职、有的被开除党籍。1951年46.4%的中央委员被撤换，1949年至1953年间共有470多人遭到清洗，20多万人受到株连，近百万人被当作怀疑对象，甚至出次品的工人也被指责为搞破坏，完不成征购任务的农民被戴上“富农”帽子。在经济建设上，拉科西奉行重工轻农、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突击式的工业化政策，尤其1952年农村强行合作化后，极大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1953年弃耕地面积竟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0%，农业生产陷于停滞，食品供应严重紧张，人民生活逐年下降，这引起群众对党的不信任，就连广大党员也对中央的政策表示怀疑。

1953年斯大林逝世，苏共中央开始反对个人崇拜，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对自己的政策进行检查。6月，苏、匈领导人举行会谈，苏共领导人批评了匈

牙利劳动人民党奉行的“左”的政策，并敦促予以改正。

纳吉开始第一次改革 1953 年 6 月匈牙利共产党举行中央全会，决定拉科西辞去总理职务，建议纳吉。伊姆雷任总理。从此，开始了被称之为新时期和第一次改革的尝试。纳吉任总理后在国民议会宣布施政纲领。广大群众从纳吉的施政纲领中了解到政策的变化，纳吉成为受群众欢迎的人。但匈党主要领导人对 6 月决议作出不同解释，党内逐渐形成以拉科西和纳吉为代表的两个对立集团，矛盾日渐尖锐，在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

1955 年 4 月，匈党中央的中央全会上，对纳吉的指责升级，他被免去党内职务。同月，又被免去总理职务。12 月，纳吉被开除出党，拉科西等人不给纳吉任何申辩的机会。这种专断行径加剧了宗派斗争。拥护纳吉的人，紧紧和纳吉站在一起，在匈牙利政坛，逐渐形成以纳吉为首的反对派。

1956 年 2 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批判个人崇拜，承认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多种渠道，在国际共运中引起巨大反响。匈党内广大党员要求解决领导危机和纠正党的错误，拉科西竭力反对，以“社会主义法制基本得到恢复”为由掩饰错误。于是，党内外反对派联合起来，要求清除拉科西集团，要求改组党，惩办拉科西和恢复纳吉的职务。在这种情况下，拉科西仍坚持错误不主动检讨。苏共领导人苏斯洛夫、米高扬先后抵匈，插手匈党内部事务，希望加强党内的团结，要拉科西辞职。

1956 年 7 月，匈党中央召开全会，决定解除拉科西的领导职务，选举格罗。

艾尔诺为第一书记，新的第一书记是以前错误的主要参与者，他没有勇气纠正过去的错误，不能形成党内团结的核心。在安葬拉伊克等人问题上，由于意见分歧而拖延造成政治混乱，一些反动派乘机煽动不满情绪。与此同时，前社会党、小



农党、民族农民党及一些秘密组织积极进行活动。西方国家加强宣传攻势并秘密给予各种地下组织以经济援助。匈牙利局势处于一触即发之势。

“匈牙利事件”爆发 1956 年 6 月，波兰的波兹南发生了流血冲突，成为“匈牙利事件”爆发的直接诱因，人们对全盘照搬苏联模式本来就不满，特别是军队连军服和国徽也模仿苏联，大大伤害了匈牙利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拉科西的错误政策及对新阶段的否定，更加剧了人们的不满情绪。人民从广播里听到哥穆尔卡复出并当选为第一书记后，各界群众立即行动起来。1956 年 10 月 22 日，布达佩斯高校学生纷纷集会，要求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要求纳吉回到党政领导岗位，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工业大学学生会号召在次日举行游行示威，得到其他大学的响应。

23 日，布达佩斯各大学学生约有 20 万人参加游行。民族主义情绪和反苏情绪交织在一起，有人焚烧红旗，撕下红星和国徽。格罗发表广播讲话，指责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受敌人利用，给愤怒的示威群众火上加油。一些人乘机挑起暴动，占领了电台、国际电信局、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印刷厂，抢劫和袭击兵工厂、军火库和警察哨所。

-

#### 克格勃档案----匈牙利事件与安德罗波夫

正当匈牙利代表团与苏军代表团为“顺利”达成苏军撤军协议而捧杯时，克格勃主席谢洛夫走进宴会厅，冷冷地宣布道：“你们被逮捕了。”这一突然变化，连在场的苏军指挥官都愣了，他站起来抗议。。。。。

然而，在匈牙利事件中真正崛起的是温文尔雅的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他成为

战后通知苏联克格勃时间最长的领导人。

上世纪 50 年代是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年代，不仅东西方阵营发生着巨大变化，而且冷战的开始给世界和平也带来了不稳定因素。横空出世的克格勃更为这个时代增添了不安。让我们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说起。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表的秘密报告，利用所谓的“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不分是非，把一切错误，甚至把任意编造的所谓“错误”，都强加在斯大林身上。

8 年之后他在二十二大再次攻击斯大林，甚至对斯大林进行焚尸扬灰。其目的仍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树立个人威信，打击莫洛托夫等。

在国际关系上，赫鲁晓夫也硬把他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在这些党的中间大搞颠覆活动。1955 年 7 月，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施加压力，迫使匈牙利总理拉克西辞职，理由是他是个“斯大林主义分子”。赫鲁晓夫捧出纳吉来当总理。到了 1956 年 2 月，赫鲁晓夫为使匈牙利前内务部长拉伊克恢复名誉，使匈牙利共产党的威信受到损害，分裂了匈牙利共产党的团结。虽然拉克西领到的匈牙利共产党也作了反抗，如在 4 月将纳吉赶下台，开除党籍，但是到了 7 月莫斯科增加压力，迫使拉克西“辞去”第一书记职务。9 月底赫鲁晓夫把接替拉克西的格罗尔召到雅尔塔同铁托会晤，迫使他与铁托修好，格罗尔不肯，不过由于和赫鲁晓夫的压力，匈牙利还是把“铁托分子”从监狱释放出来，让他们担任领导和负责的工作。拉克西对这种做法提出抗议，并抗拒赫鲁晓夫的命令，拒绝为“反革命分子”恢复名誉。同时匈牙利共产党作出了措辞强硬的决议，提出“纳吉是反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一个传播者”。这无疑是煽赫鲁晓夫一记耳光。

接着就出现了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了。赫鲁晓夫为了报复拉克西不妥协的态度，通过苏联驻匈大使安德罗波夫在匈牙利掀起一个反拉克西运动，把拉克西叫做“杀人犯”、“罪犯”，还命令拉克西检讨，1956 年 7 月 18 日拉克西被迫辞职。拉克西辞职前，米高扬曾到匈牙利作了一次匆忙的“访问”。

拉克西被迫辞职后，匈牙利政局发生急剧变化，朝着不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苏联决定：干涉匈牙利事件。

1956 年 11 月 1 日的早晨，阴霾笼罩着布达佩斯，匈牙利在过去的 9 天中，陷入极度混乱。一辆黑色的汽车，驶过气氛紧张的大街，一直开到座落在多瑙河畔的国会大厦。

从车上走出两个便衣保镖保护的苏联驻匈牙利大使，他们匆匆走上石阶，进入国会大厦里面。

这个苏联大使就是尤里·符拉基米尔洛维奇·安德罗波夫。

他是应匈牙利部长会议新任命的总理伊姆雷·纳吉德邀请前来的。当他站在纳吉面前，和纳吉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安德罗波夫此时虽然只有 42 岁，但是鬓角已经过早的优点斑白，他个子高大，超过 1，

8 米，体格魁梧。而纳吉身材矮小肥胖，长着两撇匈牙利农民的胡须。当纳吉愤怒地向这位苏联大使提出抗议时，对方始终保持着镇定，甚至在嘴角还透出一点嘲弄的微笑。

事情应该追溯到一个星期之前。

从 10 月 23 日开始的和平示威，演变成流血的暴动，这是使世界震惊的事件。匈牙利人民要求改正从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所犯的错误，要求扩大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以及调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调整同苏联之间的不平等的国家关系，已经形成广泛的群众运动。20 万学生和工人不顾内务部的禁令，举行了示威游行。

示威者在广场宣读了 16 点要求，其中有些合理的，有些则隐藏着很深的政治意图。亲西方分子也混在群众中，裴多菲俱乐部的成员、作家维雷什。彼得在广场上发表演讲，支持 16 点要求，并煽动学生到电台去广播。匈牙利的政治局势空前的混乱和复杂。示威者从国会大厦走到广播大厦，要求播出 16 点要求，但被拒绝。于是“打倒格罗”和“要求政府辞职”的口号喊响了，格罗是党的第一书记，他在广播电台发表了一篇毫不让步的演说。

当天晚上 9 点钟，纳吉上台了，他发表了一篇含糊其辞的演说。纳吉演说后，广场上突然出现了枪声，根本无法查明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冷枪，可能这是暴动的讯号吧，因为将格罗来下台还要采取进一步行动。

据说，第二天莫斯科就收到了纳吉的“呼吁”，要求苏联派兵协助镇压叛乱，在这一天的混乱战斗中，斯大林的铜像被肢解了，还有汽油进行焚烧。群众已经越过和平示威的界限，苏联的部队和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向群众投掷催泪弹和开枪，还动用了大炮。

燃烧的多瑙河：拨开匈牙利事件的？

1956 年苏联“二十大”使得东欧也感遭到解冻的暗潮，裴多菲俱乐部成为万

众注目核心。“万众注目”并非浮夸，一场主下战书 6 时半连续到越日凌晨 4

时，听众多达 6000 人，以至奥秘都向上级暗示有奈继续施止使命，由于他们起头

附战讲话者的概念。于是，拉科西下、纳吉上。这次拉科西是全下，间接到苏联

假寓，直到归天燃烧的多瑙河》：拨开匈牙利事件的？爱情名人名言也没有回籍。

纳吉起头为冤假错案，学生要求真止、进止经济、真隐仄易远族。

另有一幅照片是皂日里空空荡荡的街道，这是工人委员会倡议的消重抵应，

为了表达对苏军的，异时为了避免苏军找到再次的托言，市仄易远进止了空巷动，

整座都会正在 11 月 23 日下战书 2 时到 3 时空有一人，只要苏军战他们的坦克形单

影只。缄默，是对“”的最糟注释。

燃烧的多瑙河》：拨开匈牙利事件的？爱情名人名言，《燃烧的多瑙河：匈

牙利 1956 年事务》把眼光聚焦正在 1956 年的匈牙利，即“裴多菲俱乐部”前后的

匈牙利，次如因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4 日的 12 天。固然时间跨度有限，可是尝鼎一。

作者侯凤菁曾任总社首席记者、东欧室主任，这争我想起《波兰之》（藏书楼出

书社，1998 年 6 月）的作者、已经负责中国驻波兰大一等秘书的郭增麟先生。这

些着作都是他们自留地里的，因而写作气概与他们的事情体裁迥然总歧，更具小

我特色。侯凤菁仍是《炎黄年龄》的作者，先后颁发《还纳吉以洁皂》（2008 年

第 2 期）战《裴多菲俱乐部》（2008 年第 5 期）。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有良多种注释。一名内务部幼出狱后对友友说：“霍尔

蒂战期间的是够坏的了爱情名人名言揭秘中国人十大最奢侈的（组图，可是与拉

科西期间的中受的比拟，底子就算不了什么。”另有一种注释是“苦肉说”，即

告诉这些异志，党晓得他们是，但为了人仄易远的性，他们必要忍辱负重，正

在法庭上饰演，于是这些异志疑以。与此异时，国内扶植贯彻斯大林“没有重工

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一圆面工人战农仄易远享受不到“按逸总派”的糊口用

品，另一圆面高级官员却感受曾经提进步入“按需总派”的主义。

一切都朝着大团圆的标的目标走去。然而，接下来的汗青糟像过山车，进止

着极限动。10 月 31 日，曾经撤离的苏军重新前往，有过之而有不迭，匈牙利人呆

头呆脑。11 月 2 日，苏联大使照会匈牙利，名人名言大全第二天将派代表团就撤

军问题进止构战，后者喜出望中。11月3日，构战成罪得易以相疑，汗青再次朝着大团圆的标的目标走去。11月4日凌晨，10万苏军挺进，“”，纳吉短暂地正在南斯拉夫大出亡，总开大后，颠终“三起三涨”，最初置弃“请求赦宥”的，与舍了绞刑架，30多年后，得到。

侯凤菁参考大质中文、匈牙利文著作，讲述了燃烧的12天。书中还附有良多插图，此中两幅最争我动容。一幅是裴多菲俱乐部举止时的照片，因为人数太多，良多听众或站或站正在窗台上、街道上，侧耳聆听，他们很是恬静，唯恐错过房间内里传来的任何声音，良多听众陷入寻思。我置疑，1956年之后，匈牙利必然会呈隐犬儒主义战大众事件冷酷症；但我异样置疑，这并非“国仄易远性”所致，这张照片曾经申明市仄易远对大众事件的关心。若是说他们厥后表示出漠不关怀，这并非他们的与舍，而是“被与舍”的成因。

正在很幼一段时间里，对匈牙利的领会，仿佛只是裴多菲，对裴多菲的领会，只是“生命诚宝贵，恋憎价更高。若为故，两者皆可掷”；对付这首诗的领会，也仅限于把它应作名流名言。对付裴多菲投身的1848年，对付诗中的“”，对付匈牙利的汗青特别是“裴多菲俱乐部”，咱们只是浅尝辄止、。

《燃烧的多瑙河：匈牙利1956年事务》也有一些细节，值得商榷。糟比书中提到纳吉撰写的《国际关系的五项根基准绳与咱们的交际政策问题》，五项准绳就是万隆集会所采取的仄易远族、国度主权、仄易远族仄等、国土不受战不别国内政，一年应前，苏联必定了这个主意。但是主时间上来说，1955年4月的万隆集会正在前，1955年5月苏联与南斯拉夫的配折宣言也认可了五项根基准绳，随后才是纳吉的文章。

侯凤菁讲述的这段汗青关于读书的名人名言，重郁抑扬：恋憎名流名言“二

战”期间的匈牙利属于营垒，战后一度是结折执政，随后匈牙利逸动听仄易远党通过“切腊肠”的友总战术成为独一的执政党。斯大林“最糟的学生”拉科西确站了造之后，起头荡涤，席卷了三名党的总、一名国度、若干名副总理、几十名部幼、约百位将军，一个 900 万人的国度有 150 万人原告状。一些暂颠终的高级官员，对原人海中试图的招认不讳。

10 月 23 日，群众进止，重申学生的要求。按照华沙公约，苏联驻军只要应所正在国要求才能出卒，可是 10 月 24 日，苏军不约而来，坦克驶上的陌头。不明的苏联士卒被奉告匈牙利首都产生了，可是其时他们遭到市仄易远的坚强抵应，起头怀疑以至倒戈。市仄易远也极尽所能关于诚信的名人名言小谈服务战服务止业，进止教诲事情，两边顺利地进止了军欢。正在场的一个美国记者，眼见了“军仄易远鱼水情”的气象，感伤“这是我终身中看到的人仄易远与中队之间的最快乐的来往”。局幼勤奋与市仄易远息争，他过后由于站场不敷因断被判处有期徒刑。可是，其时皆大欢乐。虽然也呈隐了一些不协调的插直，糟比国度保安局的异志每每被市仄易远搜来由以，但这仅仅是插直。10 月 30 日，纳吉暗示匈牙利竣事造、规复造。异时，苏联也暗示情愿撤出苏军，与匈牙利就撤军问题进止构战。

这种“中嫩里焦”的场折场面易认为继，1953 年斯大林身后，苏联老迈哥决定拉科西下、纳吉上。纳吉是一位暂经的异志，已经负责过高级职务，因为总歧意农业敏捷地、全数地折作化，一度被发配到首都以中的处所。他上任后，起头了“新阶段”，与得成效，以致于没有全退的拉科西以为“人仄易远糊口程度太高了”、“该应加以严酷支胀”。1955 年，随着苏联内部的人事更迭，纳吉下、拉科西上。59 论理学问联署一份“备忘录”，否决正在文艺范畴奉止强造的，此举被视为“正人仄易远”，署名者遭到赏罚，纳吉也被。但此时，纳吉正正在将

留意力置正在撰写论文上，他暗示“真践是查验理论的尺度，而不应使糊口生命蹙足的理论”。

浅谈匈牙利事件 [作者：陈云蒋书怀]

### 一、匈牙利事件的回顾

匈牙利民族具有反抗外族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传统。17 世纪驱除土耳其占领者，1848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1919 年匈牙利曾建立过苏维埃共和国，都为匈牙利民族独立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1956 年事件的发生，也是基于这一民族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人民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有苏联在东欧建立社会主义阵营的考虑，也有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与苏共及苏联的复杂关系因素。然而，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实践，几乎完全复制斯大林模式：打击党内不同意见，限制公民权利，不顾人民意愿和国力，高速发展重工业、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垄断意识形态。1949 年斯大林亲自批准了对匈共中央书记拉伊克的审判后，在匈牙利进一步形成了拉科西个人崇拜和专制统治，同时也逐步引发了群众的不满，留下了积怨。1953 年在苏联干预下，纳吉担任政府总理，拉科西仍然担任书记。但因这两位领导人之间矛盾不断深化，1955 年 1 月，苏联通知纳吉，被开除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罢免总理职务，撤销一切学术头衔。1956 年 7 月，在匈共政治局紧急会议上，苏联“建议”拉科西因病离职休养并指定拉科西集团的格罗作为继承人。同时，匈共召开党代会，补选卡达尔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这一切都形成了匈牙

利事件的复杂背景。1956年10月，匈共为被拉科西集团迫害致死的拉斯洛等人举行隆重葬礼，并在群众呼吁下，恢复了纳吉的党籍。10月23日，首都布达佩斯大学生和群众近20万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民主，反对苏联干政。当天晚上，在布达佩斯电台大厦前响起了枪声，骚乱一发而不可收。10月24日凌晨，匈共中央解除赫格居什·安德拉什的总理职务，由纳吉接替，格罗留任党第一书记。当日早晨，苏联坦克出现在布达佩斯街头。1956年11月3日晚，苏联人先是诱捕了与他们进行谈判的匈牙利军事代表团，然后在11月4日凌晨以5个师的兵力对匈牙利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很快控制了局面。纳吉下令匈军放弃抵抗，自己带领一部分党政要员及其家属进入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苏军以泰山压顶之势很快控制了全国。纳吉一行避难18天以后被骗出南斯拉夫大使馆并遭到苏联人劫持。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苏联支持的卡达尔政府遭到全国工人、知识分子的各种抵制，新政权的巩固相当艰难。纳吉拒绝与新政府合作，经过一年多的监禁后与同案的其他3人一起于1958年6月22日被处死。1956年匈牙利事件就这样被苏联镇压下去。

## 二、匈牙利事件的原因分析

匈牙利事件的发生绝对不是偶然，有其深刻的外部因素和内部矛盾。其中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其国内复杂的矛盾是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 1.内部：无视本国具体国情，照搬苏联模式

拉科西-格罗领导集团所犯的错误是导致事件发生的第一位原因。这个集团从1948年逐步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在他们的领导下，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实践完全是斯大林体制的照搬，在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以及在管理经济中完全



采取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政策、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和一意孤行的行政手段。

他们的行为严重破坏和削弱了党的威信，极大地伤害了匈牙利人民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感情，使人民对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动摇了，这才使敌对力量越来越起支配作用。这正应了列宁曾经的警告：“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推翻我们，因为大多数无产者和贫农都拥护我们。如果我们本身不犯错误，谁也摧毁不了我们。” [1] 匈牙利事件发生时任政府总理的赫格居什。安德拉什当时是拉科西集团的重要人物，对事件的发生当然也负有责任。几十年之后，他痛定思痛地反思这个事件时说，“匈牙利社会历来是面向西方的。这并不单纯因为我们向西方学习了技术，也不出于我们的感情因素，而是传统上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生活习惯的总体是属于西方的。然而，我们（指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拉科西等人——作者注）却想把整个民族的这些东西都扭向东方，因此它注定是徒劳的，早晚要失败。” [2] 他认为，当年拉科西等人没有领导匈牙利人民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强加给他们”。他说，“人民反对这个逼迫他们的力量，反对者不是一个阶层，不是旧社会的领导人，而是人民，是整个逐渐觉悟过来的民族”。“面对整个民族的不满，领导人试图以更激烈和更不合情理的办法进行压制，但招来的却是更强烈的反抗”。 [3] 赫格居什这反戈一击的看法恰中问题的要害。因此，在 1956 年以后的几十年当中，尽管卡达尔政权向人民做出许多让步，还率先进行了世界闻名的经济体制改革，把匈牙利变成了“消费者的天堂”和“快乐的大兵营”，但是整个社会还是难以容纳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在 1990 年通过“和平演进”最终改变了社会制度。

浅谈匈牙利事件作者：陈云蒋书怀

## 2.外部：苏联的斯大林专制统治和赫鲁晓夫的政策调整

愈演愈烈的冷战不仅使苏联投入与美国的核竞争与军事竞赛，而且越来越偏离马列主义。斯大林在个人崇拜的专制下垄断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教条主义。列宁就曾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初期特别提醒他们要考虑由于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时所处的条件不同，这种过渡的具体条件和形式必然是而且应当是多种多样的。[4] “毫无疑问，在匈牙利革命的特殊条件下，生吞活剥地全盘仿效我们俄国的策略，会是一种错误”。[5] 但是多年以后，苏联逐步将东欧各国纳入苏联模式，强行改变东欧原有的既不同于西方议会民主、又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人民民主制度，政治上是一党高度集权，经济上是计划经济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排挤南斯拉夫和横扫东欧各国的政治大清洗事实上颠倒了是非，破坏了团结和稳定，形成了顺者昌逆者亡的风气，滋生和助长了执政党内部的个人专权和宗派主义，在东欧各国党内造成了权力至上的政治模式，极大地损伤了执政党的威信。苏共 20 大后，在赫鲁晓夫的外交新思想中有了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最终从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的合理成份，这让东欧各国有了解困松绑的感觉，但是他的《秘密报告》又给苏共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压力，给东欧各国带来思想混乱。另外，苏共党内强硬派的反对以及苏共在具体国际问题上的出尔反尔都招致东欧各国的不信任。苏联的斯大林专制统治和赫鲁晓夫的政策调整使本来就不那么巩固的社会主义阵营更加飘摇。

## 三、匈牙利事件给我们的启示

首先，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世界各国文明和社会制度具有多样性，各国发展程度和具体国情更

是千差万别，因此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可能完全一样。拉科西集团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最根本的错误就是脱离本国国情，照抄照搬苏联模式。他甚至认为，“苏联战胜之后，没有必要证明布尔什维主义原则不仅在以前的俄国的疆界内，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可以完全运用的。”[6] 这种盲目的，不实事求是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

其次，共产党要密切联系群众，做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7] 匈牙利事件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脱离了人民，没有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正确处理好党群关系，从而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首先是在经济政策方面。从本质上讲，拉科西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核心是“见物不见人”或“要物不要人”。它采取的是所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办法，靠牺牲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降低人民群众生活消费水平的手段，以保证重工业和整个经济指数迅速上升和绝对量的逐年增长的。其次，大搞政治斗争。在拉科西“谁不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的指示下，匈牙利效仿苏联，成为战后社会主义各国中第一个展开大规模逮捕、审讯、杀戮“铁托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实行恐怖政策的国家。大批与他意见相左的人，被打成“人民敌人”，受到最残酷的镇压，大批无辜的干部和群众被逮捕和处决，在匈牙利人民中享有盛望的拉伊克就以莫须有的“南斯拉夫间谍”的罪名被无辜处死。这不仅伤害了许多忠诚的革命者，削弱了革命的力量，而且严重破坏了匈牙利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从而也导致了人们的怨恨和不满，从而严重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

总之，匈牙利事件使匈牙利人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是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不满苏联大国强权政治、强权外交的血的抗争。它揭示了共产国际走进

低潮的根源，也标志着社会主义国家艰难改革之滥觞。它启示我们尊重五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尊重各国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而不是强制于某一固定的模式。人类的文明是各种各样的，正是由于各自的特殊性才使世界五彩缤纷。任何一大国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弱小国家，这也是世界文明进步的标志。因此，51年后，站在共同构建人类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望这一角度，匈牙利的1956年事件悲壮地昭示我们，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人类的相互尊重，是我们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社会繁荣的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1] 《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P249.

[2][3]《赫格居什回忆录》，P166，P180.[4][匈] 纳吉。伊姆雷。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M].人民出版社。

[5] 《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P197.[6] 王逸舟。匈牙利

利道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P74.[7]《列宁全集》，第42卷，第372

页，[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作者简介：陈云（1983—），女，山东德

州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200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政治经济与国

际关系。蒋书怀（1977—），男，湖南安化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2006级硕

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

## 史海回眸:1956年匈牙利事件真相 – 铁血网

50年前的10月23日，布达佩斯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随后演变为流血冲突。10月24日和11月4日，苏联两次派兵镇压，史称“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事件在世人心目中是一个无法抹去的记忆。今年在它发生50周年之际，匈牙利、波兰、法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都举行了专题研讨会，力求根据匈牙利、俄罗斯、中国等国解密的相关档案文献，超越过去简单地讲它的是非曲直的做法，理性地分析前因后果，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

关于匈牙利事件的起因，冷战时期有两种基本的看法。西方认为这是一场革命，是匈牙利人民对苏联的控制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抗，是为了实现从“集权制度”向“民主制度”的回归；社会主义国家则认为，事件是匈牙利国内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势力与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里应外合的结果，目的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在匈牙利本土，这一事件在上世纪 70 年代之前被定性为“反革命案件”，但在剧变后又被称为“人民起义”，“与 1848 年～1849 年的革命和自由斗争具有同等的意义”。

匈牙利事件真相到底如何？

山雨欲来

匈牙利事件是在匈社会各种矛盾不断累积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爆发的。1947 年以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即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后的名称，事件后改称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主要领导人拉科西不顾本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一味照搬苏联模式。匈党和国家领导人听命于苏联的做法，损害了国家利益，伤害了人民的民族情感。

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新领导人的推动下，苏联和东欧国家对以往内政外交做出了一系列调整。在匈牙利，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纳吉·伊姆雷实施了“新方针”，比其他东欧国家更早地开启了“非苏联模式化”进程。

但由于苏联的干预，“新方针”实施了 22 个月就被迫中断。此后，纳吉以著述方式进一步提出以匈牙利社会主义道路取代苏联模式、以主权独立与民族平等反对苏联控制，这些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共鸣。“新方针”中断后，匈牙利向旧政策复归，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随之恶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但拉科西等人不仅对过去的种种错误一味加以掩饰，甚至打算用暴力手段镇压党内外要求改革的声音。

最初两天

就在匈牙利政治风暴欲来之际，10 月 20 日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顶住了苏联的压力，选举了主张走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这极大地鼓舞了匈牙利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在 22 日的集会上，他们提出了以反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为主要内容的“十六点要求”，同时决定第二天(23 日)举行静默游行声援波兰人民。

10 月 23 日，布达佩斯的大学生拉开了匈牙利事件的序幕。下午 3 点，10000 多名学生从艺术学院和技术大学出发，向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的雕像和波兰将军约瑟夫·贝姆的纪念碑行进。沿途不断有人加入，到目的地时人数已高达几十万。游行人群高呼“是匈牙利人就站到我们这边来”、“俄国佬滚出去”、“把拉科西投入多瑙河”、“我们要纳吉”等口号。游行队伍到国会大厦后，人们要求纳吉出来讲话。经反复劝说纳吉勉强来到了游行人群前面，劝说人们保持冷静。

但接替拉科西任匈党第一书记的格罗在电台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他把几十万示威群众称为“匈牙利人民的敌人”，将人们对匈苏不平等关系的指责斥为“卑鄙的谎言，怀有敌意的杜撰”。这番火上浇油的讲话令示威人群由不满转为愤怒，示威者冲进电台，要求向全

国广播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他们开始向电台大楼发起攻击。流血冲突开始了……

为了缓和矛盾和稳定局势，匈党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的人事做出了调整：党的第一书记仍由格罗担任，纳吉取代赫格居斯重新出任部长会议主席。

纳吉本人对这一切并不知晓。赫格居斯回忆说，纳吉被紧急叫到国会后，“坐在那里喘气，有点心神不定”，“很疲惫”。但是，他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就接受了要他在紧要关头出任部长会议主席的建议。24日中午，在通过电台发表的“告匈牙利人民书”中，纳吉向人民承诺：政府将在“1953年6月决议”的原则基础上，全力实现国家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彻底民主化，“走符合我们民族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匈牙利道路”。

### 苏联第一次干预

23日事件发生不久，格罗就向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请求苏联派军队对付游行示威。苏联领导人对匈牙利领导人没有命令军警向示威人群开枪表示不满，认为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错误”。23日晚10~11点，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多数成员同意立即出兵。24日下午，在没有获得匈牙利政府正式邀请的情况下，苏联发动了代号为“行动波”的第一次干预行动。档案记载，根据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的决定，由第128步兵师和第39机械化师编成的苏军部队于2时15分越过国境线进入匈境内。

与此同时，由苏共领导成员米高扬、苏斯洛大、谢洛夫组成的三人代表团赶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他们到后发现，局势并不像格罗所描述的那样到了“灾难性”的地步。但此时苏军已经进入匈牙利，事件变得更为复杂。一些工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许多工人参加到抵抗苏军干预的行列，匈牙利军队纷纷倒戈，大批武器流向社会。“一场匈牙利和苏联之间的冲突开始了”。25日，布达佩斯发生两起流血事件：其一，当大批群众在议会大楼前集会时，有人从附近的屋顶向苏联士兵射击，苏军的一辆坦克被烧毁。苏军随即开枪还击，打死了60名匈牙利人。其二，在匈党中央大厦前，苏军坦克兵把走近的匈警卫部队当成叛乱者开枪射击，又有10人被打死。此后，布达佩斯市内枪声不断，其他城市的形势也紧张起来。全国各地掀起了总罢工，要求苏联军队撤出的呼声越来越高，游行示威演变成了骚乱。

当日，纳吉在电台再一次发表广播讲话。他说，匈牙利政府将与苏联就两国关系，特别是苏联军队撤出问题进行谈判，匈牙利局势一旦恢复正常，苏军就应被立即召回。苏联代表团却发表声明说，苏军撤出匈牙利是不现实的，“但可以宣布在布达佩斯恢复秩序以后，苏军回到自己的驻地”。

### 无力回天

25日流血事件发生后，经苏共同意，匈党中央罢免了格罗的职，由卡达尔继任第一书记，当天局势也趋于平静。纳吉期待着匈牙利事件能有一个“波兰式”的解决结果。然而此时，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带来的痛苦和怨恨刺激着匈牙利人，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吸引着他们，波兰的成功鼓舞着他们，西方的宣传煽动着他们，苏军的坦克威逼着他们，多年来压抑在心头的民族屈辱感在激励着他们。因此，人们越来越激进。纳吉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就试图以谈判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他开始不停地接待一波又一波的代表团。

此时，匈党党员纷纷退党，人数由 87.1 万骤降至不到 3.8 万，匈牙利社会主义的名誉也受到很大破坏，民众提出了各种各样混乱而激进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10 月 26 日，纳吉向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表示，鉴于前来与政府谈判的各类代表团越来越强烈地提出更换政府的要求，匈牙利党和政府目前最可行的是改组政府，具体来讲，就是从过去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以及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工人中，吸收五至六名拥护人民民主的著名民主人士参加政府。这一选择经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全体通过，也得到了米高扬等人的认同。27 日，纳吉宣布了新政府的组成名单。

新政府成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定性这场骚乱。鉴于参与者中虽有一些旧军官、刑事罪犯，但绝大多数是学生、倒戈军人以及工人和市民。所以，在当晚召开的内阁会议上，纳吉要求改正对该事件性质的提法，承认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具有人民和民主根源的运动”，建议与骚乱者进行协商以稳定国内局势。

28 日下午 17 点 25 分，纳吉公布新政府宣言，认为这是一场民族民主运动，是“不久以前的严重罪行引发了这次声势浩大的运动”；他还公布了新政府的施政纲要；做出了两个有关时局的决定，一是制止流血事件，立即实行全面停火，二是匈苏两国政府将就苏军尽早撤离达成协议。

29 日，停火令正式生效，苏军开始撤离。然而，这一切来得太晚，近 8000 名刑事罪犯卷入到混乱之中，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了武器，四处打砸抢劫。

与此同时，民众对纳吉新组成的政府也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一个吸收了几个非党派人士的政府仍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他们要求必须在自由选举的基础上由多党联合组成新政府。

#### 苏联第二次出兵

最初，苏联领导人在如何处理匈事件问题上意见并不统一。莫洛托夫等强硬派主张立即派兵镇压；米高扬等温和派则主张依靠纳吉来控制局势；赫鲁晓夫则取调和立场，一方面迅速派出武装力量，同时对纳吉政府采取了密切关注但暂不干预的政策。但 28 日以后苏联领导人的态度明显转变，赫鲁晓夫在 31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宣布，苏联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在匈牙利整顿秩序”。

根据历史档案等史料，导致苏联态度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是西方的关注以及各媒体报道产生的负面影响；二是中共和意共的支持；三是匈牙利局势的恶化。30 日清晨，布达佩斯共和国广场发生了一周以来最为严重的惨案，国家保安局新兵被活活打死，国防部两名上校被残酷杀害，布达佩斯市委书记也不幸遇难；四是苏共中央领导层对事件和纳吉的看法渐趋一致，认为这是一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暴乱，纳吉已背弃了社会主义。苏联领导人决定再次对匈牙利进行干预。

31 日晚些时候，纳吉获悉苏军正大规模地越过边境，向布达佩斯方向行进，就向苏联驻匈使馆提出抗议。11 月 1 日 19 点 40 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代表政府正式宣告匈牙利

中立，同时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通报匈牙利政府立即废除华沙条约，要求四大国给予援助来保卫这个国家的中立。

匈牙利政府宣布国家中立后，接到了苏方同意立即就撤军进行谈判的口头照会，纳吉随即派代表团与苏方开始谈判。苏军入境的消息使匈各政党和社会各阶层与政府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一致。与此同时，纳吉开始着手改组政府。11月3日早，新的多党联合政府在团结一致的气氛下组成。共产党、小农党和社会民主党分得三个部长席位，裴多菲党占两个部长席位。但名单中的共产党员部长之一、匈党第一书记卡达尔已于11月1日晚“失踪”。

3日晚10点，帕尔将军率领的匈牙利代表团与苏方开始谈判。史料表明，谈判进行一半即被苏联克格勃主席萨罗夫率人打断，匈代表团成员被抓。4日凌晨，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一刻钟后，纳吉向全国人民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今天黎明时分，苏联军队开始进攻我们的首都，其明显的用意是推翻匈牙利合法的民主政府”。匈牙利军队没有进行抵抗。15分钟后，苏军17个师的兵力向布达佩斯发动代号“强风”的军事行动。

>>>3000组精品美图供你观赏

结果与余音

历时13天的事件给匈牙利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据不完全统计，经济损失相当于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4。1991年匈牙利当局公布了一份当年的绝密报告：事故中死亡人数共计2700人，其中体力劳动者1330人，大专院校学生44名，中学生196人。另有约20余万匈牙利人逃往西方。

>>>推荐进入《军事战争》专栏

纳吉个人的命运也很耐人寻味。纳吉及其政府成员携家人共47人前往南斯拉夫驻匈使馆寻求政治避难。11月22日，在得到匈牙利方面将纳吉等人送回各自家中并保障其安全的承诺后，南斯拉夫同意纳吉等人离开使馆。可是，纳吉等人坐的车刚驶离使馆就遭到苏军的劫持，第二天被送至罗马尼亚，软禁在靠近布加勒斯特的斯那科夫政府别墅。1958年1月28日，“纳吉案件”的审理在布达佩斯正式拉开帷幕。纳吉被指控犯有“发动并领导阴谋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罪行和叛国罪”。1958年6月16日，媒体公布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关于判处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谋者死刑和徒刑的公告》。

史海回眸：1956年匈牙利事件真相 -中国国防资讯网

史海回眸：1956年匈牙利事件真相



2007-05-15 来源：环球时报 进入论坛

50年前的10月23日，布达佩斯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随后演变为流血冲突。10月24日和11月4日，苏联两次派兵镇压，史称“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事件在世人们心中是一个无法抹去的记忆。今年在它发生50周年之际，匈牙利、波兰、法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都举行了专题研讨会，力求根据匈牙利、俄罗斯、中国等国解密的相关档案文献，超越过去简单地讲它的是非曲直的做法，理性地分析前因后果，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

关于匈牙利事件的起因，冷战时期有两种基本的看法。西方认为这是一场革命，是匈牙利人民对苏联的控制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抗，是为了实现从“集权制度”向“民主制度”的回归；社会主义国家则认为，事件是匈牙利国内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势力与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里应外合的结果，目的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在匈牙利本土，这一事件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被定性为“反革命案件”，但在剧变后又被称为“人民起义”，“与1848年～1849年的革命和自由斗争具有同等的意义”。

匈牙利事件真相到底如何？

山雨欲来匈牙利事件是在匈社会各种矛盾不断累积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爆发的。1947年以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即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后的名称，事件后改称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主要领导人拉科西不顾本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一味照搬苏联模式。匈党和国家领导人听命于苏联的做法，损害了国家利益，伤害了人民的民族情感。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新领导人的推动下，苏联和东欧国家对以往内政外交做出了一系列调整。在匈牙利，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纳吉·伊姆雷实

施了“新方针”，比其他东欧国家更早地开启了“非苏联模式化”进程。

但由于苏联的干预，“新方针”实施了 22 个月就被迫中断。此后，纳吉以著述方式进一步提出以匈牙利社会主义道路取代苏联模式、以主权独立与民族平等反对苏联控制，这些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共鸣。“新方针”中断后，匈牙利向旧政策复归，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随之恶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但拉科西等人不仅对过去的种种错误一味加以掩饰，甚至打算用暴力手段镇压党内外要求改革的声音。

最初两天就在匈牙利政治风暴欲来之际，10 月 20 日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顶住了苏联的压力，选举了主张走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这极大地鼓舞了匈牙利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在 22 日的集会上，他们提出了以反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为主要内容的“十六点要求”，同时决定第二天（23 日）举行静默游行声援波兰人民。

10 月 23 日，布达佩斯的大学生拉开了匈牙利事件的序幕。下午 3 点，10000 多名学生从艺术学院和技术大学出发，向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的雕像和波兰将军约瑟夫·贝姆的纪念碑行进。沿途不断有人加入，到目的地时人数已高达几十万。游行人群高呼“是匈牙利人就站到我们这边来”、“俄国佬滚出去”、“把拉科西投入多瑙河”、“我们要纳吉”等口号。游行队伍到国会大厦后，人们要求纳吉出来讲话。经反复劝说纳吉勉强来到了游行人群前面，劝说人们保持冷静。但接替拉科西任匈党第一书记的格罗在电台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他把几十万示威群众称为“匈牙利人民的敌人”

，将人们对匈苏不平等关系的指责斥为“卑鄙的谎言，怀有敌意的杜撰”。

这番火上浇油的讲话令示威人群由不满转为愤怒，示威者冲进电台，要求向全国

广播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他们开始向电台大楼发起攻击。流血冲突开始了

.....

为了缓和矛盾和稳定局势，匈党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的人事做出了调整：党的第一书记仍由格罗担任，纳吉取代赫格居斯重新出任部长会议主席。

纳吉本人对这一切并不知晓。赫格居斯回忆说，纳吉被紧急叫到国会后，

“坐在那里喘气，有点心神不定”，“很疲惫”。但是，他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就接受了要他在紧要关头出任部长会议主席的建议。24日中午，在通过电台发表的“告匈牙利人民书”中，纳吉向人民承诺：政府将在“1953年6月决议”的原则基础上，全力实现国家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彻底民主化，“走符合我们民族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匈牙利道路”。

苏联第一次干预23日事件发生不久，格罗就向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请求苏联派军队对付游行示威。苏联领导人对匈牙利领导人没有命令军警向示威人群开枪表示不满，认为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错误”。23日晚10~11点，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多数成员同意立即出兵。24日下午，在没有获得匈牙利政府正式邀请的情况下，苏联发动了代号为“行动波”的第一次干预行动。档案记载，根据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的决定，由第128步兵师和第39机械化师编成的苏军部队于2时15分越过国境线进入匈境内。

与此同时，由苏共领导成员米高扬、苏斯洛夫、谢洛夫组成的三人代表团赶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他们到后发现，局势并不像格罗所描述的那样到了“灾难性”的地步。但此时苏军已经进入匈牙利，事件变得更为复杂。一些工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许多工人参加到抵抗苏军干预的行列，匈牙利军队纷纷倒戈，大

批武器流向社会。“一场匈牙利和苏联之间的冲突开始了”。25日，布达佩斯发生两起流血事件：其一，当大批群众在议会大楼前集会时，有人从附近的屋顶向苏联士兵射击，苏军的一辆坦克被烧毁。苏军随即开枪还击，打死了60名匈牙利人。其二，在匈党中央大厦前，苏军坦克兵把走近的匈警卫部队当成叛乱者开枪射击，又有10人被打死。此后，布达佩斯市内枪声不断，其他城市的形势也紧张起来。全国各地掀起了总罢工，要求苏联军队撤出的呼声越来越高，游行示威演变成了骚乱。

当日，纳吉在电台再一次发表广播讲话。他说，匈牙利政府将与苏联就两国关系，特别是苏联军队撤出问题进行谈判，匈牙利局势一旦恢复正常，苏军就应被立即召回。苏联代表团却发表声明说，苏军撤出匈牙利是不现实的，“但可以宣布在布达佩斯恢复秩序以后，苏军回到自己的驻地”。

无力回天 25日流血事件发生后，经苏共同意，匈党中央罢免了格罗的职，由卡达尔继任第一书记，当天局势也趋于平静。纳吉期待着匈牙利事件能有一个“波兰式”的解决结果。然而此时，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带来的痛苦和怨恨刺激着匈牙利人，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吸引着他们，波兰的成功鼓舞着他们，西方的宣传煽动着他们，苏军的坦克威逼着他们，多年来压抑在心头的民族屈辱感在激励着他们。因此，人们越来越激进。纳吉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就试图以谈判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他开始不停地接待一波又一波的代表团。

此时，匈党党员纷纷退党，人数由87.1万骤降至不到3.8万，匈牙利社会主义的名誉也受到很大破坏，民众提出了各种各样混乱而激进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10月26日，纳吉向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表示，鉴于前来与政府谈判的各类代表团越来越强烈地提出更换政府的要求，匈牙利党和政府目前最可

行的是改组政府，具体来讲，就是从过去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以及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工人中，吸收五至六名拥护人民民主的著名民主人士参加政府。这一选择经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全体通过，也得到了米高扬等人的认同。27日，纳吉宣布了新政府的组成名单。

新政府成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定性这场骚乱。鉴于参与者中虽有一些旧军官、刑事罪犯，但绝大多数是学生、倒戈军人以及工人和市民。所以，在当晚召开的内阁会议上，纳吉要求改正对该事件性质的提法，承认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具有人民和民主根源的运动”，建议与骚乱者进行协商以稳定国内局势。

28日下午17点25分，纳吉公布新政府宣言，认为这是一场民族民主运动，是“不久以前的严重罪行引发了这次声势浩大的运动”；他还公布了新政府的施政纲要；做出了两个有关时局的决定，一是制止流血事件，立即实行全面停火，二是匈苏两国政府将就苏军尽早撤离达成协议。

29日，停火令正式生效，苏军开始撤离。然而，这一切来得太晚，近8000名刑事罪犯卷入到混乱之中，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了武器，四处打砸抢劫。

与此同时，民众对纳吉新组成的政府也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一个吸收了几个非党派人士的政府仍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他们要求必须在自由选举的基础上由多党联合组成新政府。

苏联第二次出兵最初，苏联领导人在如何处理匈事件问题上意见并不统一。

莫洛托夫等强硬派主张立即派兵镇压；米高扬等温和派则主张依靠纳吉来控制局势；赫鲁晓夫则取调和立场，一方面迅速派出武装力量，同时对纳吉政府采取了密切关注但暂不干预的政策。但28日以后苏联领导人的态度明显转变，赫鲁晓夫

在 31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宣布，苏联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在匈牙利整顿秩序”。

根据历史档案等史料，导致苏联态度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是西方的关注

以及各媒体报道产生的负面影响；二是中共和意共的支持；三是匈牙利局势的恶

化。30 日清晨，布达佩斯共和国广场发生了一周以来最为严重的惨案，国家保安

局新兵被活活打死，国防部两名上校被残酷杀害，布达佩斯市委书记也不幸遇难

；四是苏共中央领导层对事件和纳吉的看法渐趋一致，认为这是一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暴乱，纳吉已背弃了社会主义。苏联领导人决定再次对匈牙利进行干预。

31 日晚些时候，纳吉获悉苏军正大规模地越过边境，向布达佩斯方向行进，

就向苏联驻匈使馆提出抗议。11 月 1 日 19 点 40 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代表政府

正式宣告匈牙利中立，同时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通报匈牙利政府立即

废除华沙条约，要求四大国给予援助来保卫这个国家的中立。

匈牙利政府宣布国家中立后，接到了苏方同意立即就撤军进行谈判的口头照

会，纳吉随即派代表团与苏方开始谈判。苏军入境的消息使匈各政党和社会各阶

层与政府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一致。与此同时，纳吉开始着手改组政府。11 月 3 日

早，新的多党联合政府在团结一致的气氛下组成。共产党、小农党和社会民主党

分得三个部长席位，裴多菲党占两个部长席位。但名单中的共产党员部长之一、

匈党第一书记卡达尔已于 11 月 1 日晚“失踪”。

3 日晚 10 点，帕尔将军率领的匈牙利代表团与苏方开始谈判。史料表明，谈

判进行一半即被苏联克格勃主席萨罗夫率人打断，匈代表团成员被抓。4 日凌晨，

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一刻钟后，纳吉向全国人民发表

了最后一次讲话，“今天黎明时分，苏联军队开始进攻我们的首都，其明显的用

意是推翻匈牙利合法的民主政府”。匈牙利军队没有进行抵抗。15 分钟后，苏军

17 个师的兵力向布达佩斯发动代号“强风”的军事行动。

结果与余音历时 13 天的事件给匈牙利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据不完全统计，经济损失相当于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frac{3}{4}$ 。1991 年匈牙利当局公布了一份当年的绝密报告：事故中死亡人数共计 2700 人，其中体力劳动者 1330 人，大专院校学生 44 名，中学生 196 人。另有约 20 余万匈牙利人逃往西方。纳吉个人的命运也很耐人寻味。纳吉及其政府成员携家人共 47 人前往南斯拉夫驻匈使馆寻求政治避难。11 月 22 日，在得到匈牙利方面将纳吉等人送回各自家中并保障其安全的承诺后，南斯拉夫同意纳吉等人离开使馆。可是，纳吉等人坐的车刚驶离使馆就遭到苏军的劫持，第二天被送至罗马尼亚，软禁在靠近布加勒斯特的斯那科夫政府别墅。1958 年 1 月 28 日，“纳吉案件”的审理在布达佩斯正式拉开帷幕。纳吉被指控犯有“发动并领导阴谋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罪行和叛国罪”。

1958 年 6 月 16 日，媒体公布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关于判处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谋者死刑和徒刑的公告》。

[「我要留言」](#)[「查看留言」](#)[「我要收藏」](#)

>> 精彩推荐

。伊朗国防部长：下周将展示多种武器包括导弹。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庆祝成立一周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反扩散中心。日本媒体称中国援建南亚港口不会改为海军基地。俄称成功试验机载激光武器以伊尔-76 为载机。美军表示不会与维基解密网站协商删除机密信息。菅直人与日本军方会谈朝核问题及东北亚局势。日美 12 月“夺岛”演习日官员称向中国展示能力。美国国防部否认愿与维基解密网合作审查机密文件。日美拟年底在中日有争议岛屿附近举行军演。

“天宫一号”完成总装 2020 年我国开建空间站

>> 图片

>>每日要闻

>>中国国防

。武警高温训练加执勤：除吃饭时间衣服未干过。军队弹药销毁应用新技术

水中销毁避免意外。评论称南海地区安全不可能靠制造麻烦来维护。中国维和部

队设多项特殊规定。俄专家评中国军力报告：现代化基础源自苏俄。武警兵团某

部挺进大漠戈壁进行野外驻训。北京军区某高炮团改善官兵野外驻训条件。我军

又一批舰载直升机履行重要使命

>>台海动态

。马英九见美议员再吁购 F16C/D 平衡两岸军力。新“日美宣言”提出联合在

台湾海峡应对中国潜艇。台借美对华军力报告呼吁美国向其出售 F16 。台湾军方

称未接获美停售 F16C/D 战机及潜艇通知。台媒称美将售台两艘派里级旧巡防舰。

美报关注“另一事实”：两岸军事冲突日益不可能。台军 80 年代密研远射程导弹

因连射多发未靶被叫停。台报告称大陆年底前对台部署导弹将达 2 千枚

>>国际军事

。萨博公司为泰国推出防空解决方案。俄罗斯海军要求重新启用被封存的鱼

雷。美国导弹防御局欲削减成本促进效率。美英军队再掀“瘦身风暴”。韩媒称

美将借韩美 9 月军演向朝表明保护韩国意志。美国称驻伊美军战斗任务将持续到

本月底。黎巴嫩组“娘子军”救援船计划启程前往加沙。武装分子枪杀伊拉克农

民警告民众勿与美军合作。美中央情报局建新防扩散中心旨在打击核武器

>>军事科技



。中国投资 4.3 亿建劳斯莱斯航空发动机生产线。中国 300 名研发人员集体宣誓全力打造国产发动机。中国新一代排爆机器人亮相。中国航天展示“低空慢速小目标探测拦截系统”。俄称中国航母龙骨年底前铺设配套装备日益完善。国产大飞机 C919 配套生产全面启动。中国核电自主化发展能力不断提升。我航天重点武器工程即将实验力保一箭中的

#### >>国防论坛

。拾物招领该不该要“赎金”？。网友热议广州亚运期间错峰上下班多数反对。马路隔离护栏缺口该不该堵上网友热议。大学毕业生自比诸葛亮出山质疑企业苛求经验。村支书旅游扮日伪军司令拍照引热议。娱乐会所当街挂横幅称新到一批佳丽。网民：“全民招商”闹剧早该休。微博爆料售楼员穿万元名牌服饰卖楼

#### >>网名热帖

。美国叫嚣：我们将长期保持在南海的军事存在。香港专家质疑中国领空不设防！。战争吓不倒中国人民。美国的“中国军力报告”为什么低估中国这支王牌？。准备接班 朝鲜制造金正银徽章。阿拉伯人心中，中国就像天方夜谭中的巨人。震惊！中国目前的杀手锏武器。中美互演“对抗升级”大戏各收其利

#### >>中国兵器

。天津直升机基地现雏形总装厂房和动力车间竣工。ARJ21-700 支线飞机静力试验取得重大进展。“北京一号”小卫星服役 5 年有望超期服役。中国首座 2 米超声速风洞建成并成功实现通气。中航工业再销 5 架运 12 飞机该机已出口 20 余国。中国第一座航天测控装备博物馆开馆

#### >>外国兵器

。AK 步枪家族将诞生新成员目前公开资料不多。AK 步枪家族将诞生新成员。

印度首艘国产护卫舰。单兵武器“保镖”。日本生产 OH-1 直升机。国 LD-2000

>>军事谋略

。晚清军事变革及军事近代化为什么失败。解放军强化信息、体系制胜。谨

防战场文化认知能力缺失。信息化时代陆军如何插上“翅膀”？。新概念战斗部

：信息化战场上的新宠。美国打阿富汗战争在战术运用等多方面超越苏联

史海回眸：1956 年匈牙利事件真相

50 年前的 10 月 23 日，布达佩斯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随后演变为

流血冲突。10 月 24 日和 11 月 4 日，苏联两次派兵镇压，史称“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事件在世人们心中是一个无法抹去的记忆。今年在它发生 50 周年之际，

匈牙利、波兰、法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都举行了专题研讨会，力求根据匈牙利

利、俄罗斯、中国等国解密的相关档案文献，超越过去简单地讲它的是非曲直的

做法，理性地分析前因后果，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

关于匈牙利事件的起因，冷战时期有两种基本的看法。西方认为这是一场革

命，是匈牙利人民对苏联的控制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抗，是为了实

现从“集权制度”向“民主制度”的回归；社会主义国家则认为，事件是匈牙利

国内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势力与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里应外合的结果，

目的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在匈牙利本土，这一事件在上世纪

70年代之前被定性为“反革命案件”，但在剧变后又被称为“人民起义”，“与

1848年～1849年的革命和自由斗争具有同等的意义”。

匈牙利事件真相到底如何？

山雨欲来匈牙利事件是在匈社会各种矛盾不断累积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情

况下爆发的。1947年以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即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后的

名称，事件后改称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主要领导人拉科西不顾本国的历史传统与

现实，一味照搬苏联模式。匈党和国家领导人听命于苏联的做法，损害了国家利

益，伤害了人民的民族情感。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新领导人的推动下，苏联和东欧国家对以

往内政外交做出了一系列调整。在匈牙利，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纳吉。伊姆雷实

施了“新方针”，比其他东欧国家更早地开启了“非苏联模式化”进程。

但由于苏联的干预，“新方针”实施了22个月就被迫中断。此后，纳吉以著

述方式进一步提出以匈牙利社会主义道路取代苏联模式、以主权独立与民族

平等

反对苏联控制，这些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共鸣。“新方针”中断后，匈

牙利向旧政策复归，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随之恶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但拉科西等人不仅对过去的种种错误一味加以掩饰，甚至打算用暴力手段镇压党

内外要求改革的声音。

最初两天就在匈牙利政治风暴欲来之际，10月20日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

央全会，顶住了苏联的压力，选举了主张走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哥穆尔卡为第

一书记。这极大地鼓舞了匈牙利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在22日的集会上，他们提

出了以反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为主要内容的“十六点要求”，同时决定第二天

（23日）举行静默游行声援波兰人民。

10月23日，布达佩斯的大学生拉开了匈牙利事件的序幕。下午3点，10000

多名学生从艺术学院和技术大学出发，向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的雕像和波兰将

军约瑟夫·贝姆的纪念碑行进。沿途不断有人加入，到目的地时人数已高达几十

万。游行人群高呼“是匈牙利人就站到我们这边来”、“俄国佬滚出去”、“把

拉科西投入多瑙河”、“我们要纳吉”等口号。游行队伍到国会大厦后，人们要

求纳吉出来讲话。经反复劝说纳吉勉强来到了游行人群前面，劝说人们保持冷静。

但接替拉科西任匈党第一书记的格罗在电台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他把几十万示威群众称为“匈牙利人民的敌人”

，将人们对匈苏不平等关系的指责斥为“卑鄙的谎言，怀有敌意的杜撰”。

这番火上浇油的讲话令示威人群由不满转为愤怒，示威者冲进电台，要求向全国

广播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他们开始向电台大楼发起攻击。流血冲突开始了

.....

为了缓和矛盾和稳定局势，匈党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的人事做出了调整：党的第一书记仍由格罗担任，纳吉取代赫格居斯重新

出任部长会议主席。

纳吉本人对这一切并不知晓。赫格居斯回忆说，纳吉被紧急叫到国会后，

“坐在那里喘气，有点心神不定”，“很疲惫”。但是，他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就

接受了要他在紧要关头出任部长会议主席的建议。24日中午，在通过电台发表的

“告匈牙利人民书”中，纳吉向人民承诺：政府将在“1953年6月决议”的原则

基础上，全力实现国家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

的彻底民主化，“走符合我们民族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匈牙利道路”。

苏联第一次干预23日事件发生不久，格罗就向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

请求苏联派军队对付游行示威。苏联领导人对匈牙利领导人没有命令军警向示威

人群开枪表示不满，认为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错误”。23日晚10~11点，苏共中

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多数成员同意立即出兵。24日下午，在没有获得匈牙利政府

正式邀请的情况下，苏联发动了代号为“行动波”的第一次干预行动。档案记载，

根据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的决定，由第128步兵师和第39机械化师编成的苏

军部队于2时15分越过国境线进入匈境内。

与此同时，由苏共领导成员米高扬、苏斯洛夫、谢洛夫组成的三人代表团赶

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他们到后发现，局势并不像格罗所描述的那样到了“灾

难性”的地步。但此时苏军已经进入匈牙利，事件变得更为复杂。一些工厂成立

了革命委员会，许多工人参加到抵抗苏军干预的行列，匈牙利军队纷纷倒戈，大

批武器流向社会。“一场匈牙利和苏联之间的冲突开始了”。25日，布达佩斯发

生两起流血事件：其一，当大批群众在议会大楼前集会时，有人从附近的屋顶向

苏联士兵射击，苏军的一辆坦克被烧毁。苏军随即开枪还击，打死了60名匈牙利

人。其二，在匈党中央大厦前，苏军坦克兵把走近的匈警卫部队当成叛乱者开枪

射击，又有10人被打死。此后，布达佩斯市内枪声不断，其他城市的形势也紧张

起来。全国各地掀起了总罢工，要求苏联军队撤出的呼声越来越高，游行示威演

变成了骚乱。

当日，纳吉在电台再一次发表广播讲话。他说，匈牙利政府将与苏联就两国关系，特别是苏联军队撤出问题进行谈判，匈牙利局势一旦恢复正常，苏军就应

被立即召回。苏联代表团却发表声明说，苏军撤出匈牙利是不现实的，“但可以

宣布在布达佩斯恢复秩序以后，苏军回到自己的驻地”。

无力回天 25 日流血事件发生后，经苏共同意，匈党中央罢免了格罗的职，由

卡达尔继任第一书记，当天局势也趋于平静。纳吉期待着匈牙利事件能有一个

“波兰式”的解决结果。然而此时，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带来的痛苦和怨恨刺激

着匈牙利人，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吸引着他们，波兰的成功鼓舞着他们，西方的

宣传煽动着他们，苏军的坦克威逼着他们，多年来压抑在心头的民族屈辱感在激

励着他们。因此，人们越来越激进。纳吉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就试图以谈判作为解

决问题的主要途径，他开始不停地接待一波又一波的代表团。

此时，匈党党员纷纷退党，人数由 87.1 万骤降至不到 3.8 万，匈牙利社会主义

义的名誉也受到很大破坏，民众提出了各种各样混乱而激进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10 月 26 日，纳吉向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表示，鉴于前来与政府

谈判的各类代表团越来越强烈地提出更换政府的要求，匈牙利党和政府目前最可

行的是改组政府，具体来讲，就是从过去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以及知识分子、大学

生和工人中，吸收五至六名拥护人民民主的著名民主人士参加政府。这一选择经

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全体通过，也得到了米高扬等人的认同。27 日，纳吉宣布了

新政府的组成名单。

新政府成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定性这场骚乱。鉴于参与者中虽

有一些旧军官、刑事罪犯，但绝大多数是学生、倒戈军人以及工人和市民。所以，

在当晚召开的内阁会议上，纳吉要求改正对该事件性质的提法，承认这是一场

“席卷全国的具有人民和民主根源的运动”，建议与骚乱者进行协商以稳定国内

局势。

28 日下午 17 点 25 分，纳吉公布新政府宣言，认为这是一场民族民主运动，是

“不久以前的严重罪行引发了这次声势浩大的运动”；他还公布了新政府的施政

纲要；做出了两个有关时局的决定，一是制止流血事件，立即实行全面停火，二

是匈苏两国政府将就苏军尽早撤离达成协议。

29 日，停火令正式生效，苏军开始撤离。然而，这一切来得太晚，近 8000 名

刑事罪犯卷入到混乱之中，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了武器，四处打砸抢劫。

与此同时，民众对纳吉新组成的政府也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一个吸收了



几个非党派人士的政府仍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他们要求必须在自由选举的基础

上由多党联合组成新政府。

苏联第二次出兵最初，苏联领导人在如何处理匈事件问题上意见并不统一。

莫洛托夫等强硬派主张立即派兵镇压；米高扬等温和派则主张依靠纳吉来控制局

势；赫鲁晓夫则取调和立场，一方面迅速派出武装力量，同时对纳吉政府采取了

密切关注但暂不干预的政策。但 28 日以后苏联领导人的态度明显转变，赫鲁晓夫

在 31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宣布，苏联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在匈牙利整顿秩序”。

根据历史档案等史料，导致苏联态度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是西方的关注

以及各媒体报道产生的负面影响；二是中共和意共的支持；三是匈牙利局势的恶

化。30 日清晨，布达佩斯共和国广场发生了一周以来最为严重的惨案，国家保安

局新兵被活活打死，国防部两名上校被残酷杀害，布达佩斯市委书记也不幸遇难

；四是苏共中央领导层对事件和纳吉的看法渐趋一致，认为这是一场反苏、反社

会主义的暴乱，纳吉已背弃了社会主义。苏联领导人决定再次对匈牙利进行干预。

31 日晚些时候，纳吉获悉苏军正大规模地越过边境，向布达佩斯方向行进，

就向苏联驻匈使馆提出抗议。11 月 1 日 19 点 40 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代表政府

正式宣告匈牙利中立，同时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通报匈牙利政府立即

废除华沙条约，要求四大国给予援助来保卫这个国家的中立。

匈牙利政府宣布国家中立后，接到了苏方同意立即就撤军进行谈判的口头照会，纳吉随即派代表团与苏方开始谈判。苏军入境的消息使匈各政党和社会各界

层与政府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一致。与此同时，纳吉开始着手改组政府。11月3日

早，新的多党联合政府在团结一致的气氛下组成。共产党、小农党和社会民主党

分得三个部长席位，裴多菲党占两个部长席位。但名单中的共产党员部长之一、

匈党第一书记卡达尔已于11月1日晚“失踪”。

3日晚10点，帕尔将军率领的匈牙利代表团与苏方开始谈判。史料表明，谈

判进行一半即被苏联克格勃主席萨罗夫率人打断，匈代表团成员被抓。4日凌晨，

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一刻钟后，纳吉向全国人民发表

了最后一次讲话，“今天黎明时分，苏联军队开始进攻我们的首都，其明显的用

意是推翻匈牙利合法的民主政府”。匈牙利军队没有进行抵抗。15分钟后，苏军

17个师的兵力向布达佩斯发动代号“强风”的军事行动。

结果与余音历时13天的事件给匈牙利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人

员伤亡。据不完全统计，经济损失相当于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4。1991年匈牙

利当局公布了一份当年的绝密报告：事故中死亡人数共计2700人，其中体

力劳动

者 1330 人，大专院校学生 44 名，中学生 196 人。另有约 20 余万匈牙利人逃往西方。

纳吉个人的命运也很耐人寻味。纳吉及其政府成员携家人共 47 人前往南斯拉

夫驻匈使馆寻求政治避难。11 月 22 日，在得到匈牙利方面将纳吉等人送回各自家

中并保障其安全的承诺后，南斯拉夫同意纳吉等人离开使馆。可是，纳吉等人坐

的车刚驶离使馆就遭到苏军的劫持，第二天被送至罗马尼亚，软禁在靠近布加勒

斯特的斯那科夫政府别墅。1958 年 1 月 28 日，“纳吉案件”的审理在布达佩斯正

式拉开帷幕。纳吉被指控犯有“发动并领导阴谋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罪行和叛国

罪”。

1958 年 6 月 16 日，媒体公布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关于判处纳吉。伊

姆雷和他的同谋者死刑和徒刑的公告》。

斯大林批判与中国——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冲击

作者：[ 日本] 丸山升；王俊文译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冲击由于一九五五年开始的丁玲批判一直持续到

“反右斗争”时期，所以对它的叙述也将渐渐进入“反右斗争”话题。在此我想

再一次回到对五六年到五七年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和它转换成“反右斗争”的经过、以及其中包含的问题的检讨。为此，无论如何都必须首先关注的，是五六年二月苏联的斯大林批判。

我认为那之前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意识形态？文学艺术，虽然添加了各种各样的中国特色，但整体上还是不脱斯大林类型的“社会主义”的框架。虽自称其指导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基本上是用斯大林体制来解释来构成的。将它确认为“国家规定”的意识形态、由体制独占从内部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权，毫不留情地将超离这一意识形态的思想都视为“异端”等等是斯大林类型“社会主义”中特别显著的特征。世界上的大多数“共产主义者”在五十年代中期之前，也都深信斯大林类型的“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此几乎不曾有一丝怀疑。

这个信仰发生极大动摇的时期到来了。那是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党大会上赫鲁晓夫的斯大林批判，即所谓“秘密报告”。

现在我手头上没有正确回顾这个“报告”是如何传入日本的资料。我个人记忆中，作为斯大林批判的第一声传来的，是赫鲁晓夫演说前一天（或前两、三天）米高扬（Mikoyan）的演讲。当时的报道好像只提到他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几天之后，有报道说赫鲁晓夫发表了斯大林批判的演说，但好像报社尚未得到演说的详细内容。看到演说全貌有待美国方面公开了它搞到的演说文本后，大概是《中央公论》登载了其日文全译。

那的确极具冲击性。从一九三零年代开始的对布哈林（Bukharin）等革命元老们的“肃反”是冤案、其他还有无数的政治犯被不当地监禁在各地的“强制收容所”、斯大林的“农业集团化”实质上是强制性的等等，不是由别人，而正是

由苏联的领导者亲口承认了。这些事情都不是第一次听到。但以前是与社会主义没有自由一起，作为对苏“帝国主义宣传”的要点。而在认为苏联便是社会主义的当时，可以说对于支持“社会主义”的人们而言，听到这些“宣传”是如鲠在喉。他们当中有人将这些全部当作宣传而不予理睬，而更多的人尽管没有完全无视这些宣传，但会把它们视作以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取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过渡期的牺牲、或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下的一国社会主义建设必然会产生“恶”，以此来让自己接受这些现象。而且他们也倾向于认为这些来自西方的宣传肯定多少有些夸张的因素在里面。

然而，赫鲁晓夫将这些摆在了大家面前。他说：这基本属实。

不仅是日本的左派知识分子，赫鲁晓夫“报告”的冲击对于苏联党大会的代议员们好像也是一样。由于是本国的事情，毋宁说更具冲击力。

后来在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改革时代担任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的亚历山大·雅克福列夫（Aleksandr N. Yakovlev），在他的回忆录《历史的幻影》中这么写

道：“共产党第二十次大会开幕后，传言赫鲁晓夫将做什么重要的演说。我弄到了特别入场证。讨论开始，赫鲁晓夫站在了讲坛上。

“最初，很多听众不能理解赫鲁晓夫在说什么。我自己也觉得一切好像都是非现实的。像在听着什么荒诞的编造的话似的。还感觉那是无法言说的神秘的、一般人不许触及的事情。要知道，那时斯大林对我们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尽管如此，那个圆脸稍胖、秃头的矮个男子还是在讲坛上滔滔不绝，亵渎着我们的过去和我们的领袖。不，我们的领袖应当是给人们带来幸福、带领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全世界走向未知的幸福的人。和很多人一样，当时在我心中，斯大林的这种形象根深蒂固。

“可是，赫鲁晓夫不断地摆出事实列举斯大林的罪状。……演说进行到一半，我的脑中突然闪过这样的念头：如果这都是真的，那究竟会怎么样？那不是恐怖的悲剧吗？但是大会不会发布无根无据的谎言吧。

“各种想法交杂在一起。又不敢偷看周围人的样子。后来一问，不仅我，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好像话语从讲坛上就向我一个人袭来。你也有份，你也脱不了干系。

“我在会场里一动不动侧耳倾听着报告。鸦雀无声。不，可能就像墓场那般寂静。听众都屏息似的。怕漏听了赫鲁晓夫的一句话一个词。赫鲁晓夫以一种很抓人的独特方式热烈地演讲着。”

（中略）

“赫鲁晓夫在党大会上的报告结束后，走出会场的人们样子让我吃惊。楼梯上，大厅里，谁都不相互开口。……没有议论的迹象，没有高兴的表现也没有责难的声音。在我看来，大部分人都好像支持赫鲁晓夫。不如说他们不相信赫鲁晓夫。谁都发着呆。判断力麻痹，颓丧，完全垮了。

“就这样，新的时代开始了。”

这段描述栩栩如生地传达出赫鲁晓夫报告的冲击和当时人们的心情、气氛。

和他亲临现场也有关系吧，但就直率地道出个人真实感受这一点，我还不知道有超出他的。

中国的反响怎么样呢？据黄秋耘的《风雨年华》（1988年第2版），一九五六年四月下旬，这一报告的全部内容被传达给了在京党、政、军机关中行政十三级以上的中、高级党员干部。

“传达时虽然郑重宣布过不许记录、不许录音、不许外传，但这个秘密报告

不久就在美国的和日本的报刊上全文公开发表，北京有不少机关和大学是订阅外国报纸作为参考资料的，凡是看得懂英文和日文的知识分子很快就看到，而且它的主要内容不久就流传开来，成为众所周知的‘秘密’了。”

苏共的这次大会，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以朱德为团长、由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以及驻苏联大使刘晓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但“秘密报告”对各国共产党代表也是非公开的。

中国的领导层是如何理解、怎样处理斯大林批判以及以此为契机在“社会主义”各国引发的激烈变动的？五十年代后半期到六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动向，比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反右斗争”，既是国内问题，同时可看成是对这一冲击的反应。在此意义上，下文将稍微详细地讨论当时的国际状况和中共领导层的回应。

吴冷西（一九五六年的新华社社长）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报告的反应。他的文章叙述了至《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的始末，因此我将详细予以参照。

据吴冷西的回忆，“我党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代表团没有参加那次会议。苏共中共是在会后派人向我代表团通报的、所谓通报就是只向我们把报告宣读一遍就拿走了。”不要说全文，似乎连文件形式的内容概要都没得到。但是在大会结束后不久西方通讯社就陆续透露这个报告的内容。三月十日，《纽约时报》发表了这个报告的全文，距苏共二十大不到半个月。

“新华社收到《纽约时报》后马上组织大量人员翻译，译出一部分即印出一部分，全部译完后再装订成本，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开列的名单，分送中央负责同志、这是新华社一贯的作法。”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七日，晚饭后，我乘车从国会街的新华社总部出发……

由新华门进入中南海。……在丰泽园下车”

丰泽园是中南海里毛泽东使用的部分的总称。

他到这儿是为了出席在颐年堂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中共“八大”前的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八大”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吴冷西出席过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在中南海西门附近的西楼会议厅）、邓小平主持的秘书长会议（在丰泽园北面的居仁堂），也参加过毛泽东自己主持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中央工委书记处会议（一般在怀仁堂），以及最高国务会议（大多数在勤政殿）。但从未到颐年堂参加过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他写道，这是党的“最高领导核心会议”。

当他到达时，杨尚昆（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胡乔木（中宣部副部长）、张闻天（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王稼祥（中央联络部部长）已经坐在西边小厅里，“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小平同志、彭真同志也陆续到来”。

颐年堂由中央一个大厅，东西两个小厅组成。大厅约七十平方米，摆着足够三十人开会的大长桌，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在这里。西边的小厅是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和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地方，那里面十二张沙发围成一圈。东北的小厅是毛泽东请客人吃饭的地方，他会见将他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说法传遍世界的美国记者 A ? L ? 斯特朗便是在这儿。

“毛主席八点左右来到颐年堂。”他向吴冷西确认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分发情况后，“问大家看了没有，好几位中央负责同志都说看到了但没有看完。毛主席也说他刚开始看，很费力，还没看完。他问大家看了有什么意见。”

邓小平谈了参加二十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听到苏共中央联络部一位联络员通



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情况。

“他说，当时只听翻译读了一遍感到内容很乱，逻辑性差，说了一大堆关于斯大林破坏法制、肃反中杀错了很多，对苏德战争毫无准备、在战争中靠地球仪指挥，等等，还讲了一个南斯拉夫问题，其他政策性的问题无甚印象。当时，他向苏共中央联络员表示，此事关系重大，要报告中央，没有表态。他说，现在再看全文，还没有看完，印象还是不好。现在全世界都议论这个报告，许多兄弟党已表示了态度，恐怕我们党也要表态，采取什么方式可以考虑。”

接着，与会者纷纷发言。首先对苏共事先不同兄弟党商量就批判斯大林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很不满，认为这使兄弟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出现严重混乱，同时认为赫鲁晓夫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严重错误。之后，毛泽东简单地谈了中共在大会开始时的态度，然后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办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大家昨天才拿到全文，还没有看完。希望仔细看看，想一想，过一两天再来讨论。”

三月十七日的书记处会议就这样结束。

“我首次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印象终生难忘。”吴冷西写道。

吴冷西的回忆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他写作时是否参照了什么资料等疑问还留存着；内容方面也有不少是我们今天可以在其后的发展经过中从其它方面了

解的，并非什么有轰动效果的资料。但是由出席者自己如此具体地描述这种层次的会议的形式以及发言内容，我想很少见吧。

毛泽东又接着在三月十九日和三月二十四日先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十九日的会议将中央书记处会议，也就是以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扩大为政治局会议。上次会议的出席者全体参加之外，又增加了陆定一（中宣部部长）、陈伯达（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胡绳（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等。

关于这次会议，吴冷西先列举了出席者提出的问题，比如赫鲁晓夫报告的影响、中苏两党的关系等，接着只提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王稼祥的发言，便转入对毛泽东发言的详细介绍。

“少奇同志对斯大林主要的错误作了系统的发言，周总理讲了斯大林同我党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有关，小平同志着重谈了反对个人迷信问题，王稼祥同志详细分析了赫鲁晓夫报告内容矛盾百出。”

毛泽东也谈了斯大林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支持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又要中国共产党不要反击国民党发动的内战，知道中国志愿兵抗美援朝后才相信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的共产党。这些在今天都以各种形式被弄清楚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意，不过让人感到毛泽东好像一并发泄了对苏联以及斯大林所抱有的不满。

据吴冷西的文章，然后毛泽东着重讲了四点意见：第一、《共产党宣言》算起是一百年多一点，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在实现共产主义这一艰巨的斗争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第二、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罢了。

第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着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第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斯大林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

在三月二十四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对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中共应当表示态度，发表声明或做出决议都过于正式，因为苏共还没有公布秘密报告而且其后果仍在发展中，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对此全体成员表示赞成。吴冷西接着总结了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最后所作的发言：“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党一贯主张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

毛泽东要求一周之内写出来。

会议决定由陈伯达执笔，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

文章的初稿在三月二十九日写出。邓小平要求陈伯达邀集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吴冷西一起讨论。他们在三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两天开会讨论，最后又由陈伯达修改，四月一日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收有毛泽东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

史经验》稿的批语和修改。据此资料，毛泽东似乎在一日深夜到二日凌晨阅读了这篇文章，写好以下批语转送给刘少奇和邓小平：“少奇、小平同志：社论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二日）夜间即印成清样约二十份左右，立即送给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四日上午修改完毕。十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五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

毛泽东四月二日上午四时 “

可知到这时还是准备作为“社论”发表。

三日下午，在西楼会议厅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开始时，刘少奇说毛主席委托他召开这次会议。

作为会议的主要发言，吴冷西列举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的发言要点，但几乎都未超出毛泽东原有的发言范围，看不到各人的个性，因此这里省略。

会后，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和吴冷西连夜修改，于四月四日凌晨打出清样送毛泽东。毛泽东读后作了修改，批语如下：“照此改正，再打清样十五份，于今日上午十点，连同这份原稿，送交我的秘书高智，勿误为盼。

毛泽东四月四日上午八时 “

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上面的两条批语被列为一、二，毛泽东在文章标题下所加的说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列为三，然后注解道：从四到十一“是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至四日多次审阅这篇文章时所作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

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从四到十确实有宋体字部分，但十一全部为正体字，这个注解有意义不明之处。总之，可以确定这篇文章整体上是根据毛泽东的想法写成的。

反对苏联对波兰行使武力经历这样一番过程之后，《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以预定的社论的形式，而是作为《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论文，发表在四月五日的《人民日报》上。

此后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件（我们都已知道这些讲话当初和后来公开发表时的内容存在很大差异。关于这一点下面将涉及到）：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的扩大政治局会议上的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报告（这篇报告最初被整理问世是六七年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而正式公开发表则在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经这一年秋天的波兹南暴动（波兰）、匈牙利事件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抛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恐怕中共和毛泽东都未曾预测到的激烈变动，在东欧爆发了。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上午，吴冷西接到通知要他参加下午在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这是党的‘八大’以后我第一次参加新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我估计这次会议可能讨论苏联和波兰的紧张关系。因为在这之前三四天，从十月十七日开始，外国通讯社就传说，苏波关系突趋紧张，波境苏军调动频繁，苏波边境地区苏军向波兰东部移动，苏联波罗的海舰队正向波兰海域前进，华沙空气非常紧张。”

斯大林批判以后，东欧各国对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控制的不满？批判开始表面化，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内因主张对苏应保持自己独立性而在“民族主义偏向”“铁托主义者”等名目下下台或入狱的过去的领导者恢复权利的动向也趋于强化。

在波兰，六月份波兹南的要求改善工人待遇的 YX 示威发展为政治暴动，爆发了“波兹南事件”。这是身处日本的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东欧人民的反苏情绪。斯大林批判之后上台的党第一书记奥哈布政权虽然投入军队镇压这场暴动，但与苏联将暴动的原因归之于间谍的挑拨不同，他从社会矛盾中找原因，承诺继续推行民主化等，表现出与苏联相异的态度。于是，到了八月，被关进监狱的以前的领导人哥穆尔卡恢复党籍，进而于十月份被选为第一书记。

上面主要是根据矢田俊隆编的《东欧史（新版）》对事实所作的粗略介绍，这一时期波兰以及东欧各国的变动既激烈又复杂，很难简单叙述。具体情况请直接参照上书。

话题回到中国。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十八日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电话，要新华社注意收集波兰的情报。于是新华社动员所属的相关部局一天二十四小时加强值班，一有重要消息，马上报告中央。吴冷西于下午三时到达颐年堂。到会的除八大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林彪、林伯渠、刘伯承、康生因病长期请假）之外，还有王稼祥、胡乔木、杨尚昆、田家英和吴冷西。

“毛主席主持会议。他身穿睡衣，一开始就说明：苏共给我党中央发来一份电报，说波兰反苏势力嚣张，要苏军撤出波兰。苏联根据华沙条约有权利驻兵波兰，有义务保护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苏联不能允许反苏事件继续发展，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苏共在通知中表示想知道我们党对此有何意见。……看来苏联要对波兰实行武装干涉，但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情况很严重，很紧急，所

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苏共中央。”

毛泽东说明之后，吴冷西根据当天上午收到的外国通讯社的消息，报告说波兰军队已动员，保安部队也处于紧急状态，华沙工人也纷纷拿起武器。同时从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传出消息，苏联军舰已到达波兰港口格但斯克港外，原驻在苏联西部和民主德国东部的苏军也在调动中。

“毛主席听了后说，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是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更不用说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亲痛仇快的严重事件。我党中央一定要坚决反对，尽最大努力加以制止。大家一致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向苏共中央发出严重警告，表明我党坚决反对苏联干涉波兰。”

会议中，新华社的吴冷西的秘书打电话来，说外国通讯社报道苏联一个代表团到华沙谈判。吴冷西在刮号里附注：“后来才知道这个代表团是以赫鲁晓夫为首，包括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主要成员。”一报告这一消息，“毛主席说，事不宜迟，我们应该马上警告苏方，坚决反对他们对波兰动武。会议一致同意这个决定。毛主席即说，会议到此结束，马上约见苏联驻华大使。他要胡乔木和我留下作陪。

“毛主席这时仍穿着睡衣，乔木建议他是不是换穿中山装。毛主席说，就这样也没什么关系。

“约半小时后，毛主席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接见苏联大使尤金。尤金原是毛主席的朋友，过去两人多次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现在两人都表情严肃，尤金似乎预感到这次接见非比寻常。

“毛主席劈头就直接了当地对尤金说，我们的政治局才刚开过会，……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这样做，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竟然不顾我们的劝告，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共中央和中共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就是这几句话，请你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情况紧急，时间无多，谈话就此结束，请你赶紧立办。”

“尤金满头大汗，连声‘是’！‘是’！迅速退走。”

吴冷西写道，那天晚上他整夜守候在新华社办公室。以后几乎每天下午或晚上，毛泽东都在他卧室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

二十一日，苏共中央来电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和波党中央会谈。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派刘少奇和邓小平于二十二日前往，任务是调停；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也劝说波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同苏共或波党会谈，不参加他们两党会谈。代表团二十二日晨乘苏联派来的专机去莫斯科。从此每天周恩来都同代表团通电话，毛泽东也每天召开常委会，决定给代表团的指示。

“经过激烈的辩论和耐心的说服，代表团终于完成了劝和的任务。苏波双方一致同意：尽快举行两党正式会谈，改善和加强波苏关系；苏联政府单独发表改进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宣言，承认苏联过去在这方面有错误，并决心加以改进。

我党代表团同苏波两方商定，一旦苏方发表宣言，我政府将发表声明予以支持。”

这就是十月三十日和十一月二日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分别发表的宣言和声明。

在匈牙利事件上支持苏联正当波苏两党的关系好歹趋向和解之际，又爆发了

匈牙利事件。在匈牙利，一九四九年外相拉伊克被逮捕和处决，五三年当上首相



的纳吉于五五年因“右翼偏向”“反马克思主义？机会主义”被从政治局和党除名。在这之前，Cominform（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将南斯拉夫共产党除名，这是苏联霸权主义为了扼杀寻求摆脱苏联的独立性的倾向而采取的行为。之后东欧各国都在进行以“铁托偏向”“民族主义偏向”为借口的“肃清”。纳吉的除名便是这一历史脉络的一部分。

斯大林批判之后，匈牙利勤劳党第一书记拉科西作“自我批判”（五六年五月），并“辞职”（同年七月，继任格罗），纳吉恢复权利（同年十月），寻求“自由化”的潮流越来越强势。在此背景下，十月二十二日，首都布达佩斯的学生们提出十五项要求。其重点在于：一、召集党大会，选出新领导层；二、纳吉就任首相；三、与建立在新基础上的苏联树立友好关系；四、苏军从匈牙利撤军；五、实施自由选举。二十三日，市民，自然连作家同盟成员和士官学校的学生都加入了学生的 YX，示威 YX 从广播电视台前面的冲突发展成“暴动”状态，占领了广播电视台。格罗为首的党指挥部一面推举纳吉为首相，一面请求苏联军队的介入，于是二十四日凌晨，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

这里无法逐一回顾匈牙利事件的详细过程。大略而言，事态发展到格罗列辞去第一书记、纳吉就任首相，纳吉政权接受了多党制？苏军撤退等人民的主要要求，事态因此露出解决的曙光，但是一度开始撤退的苏军于三十日再度介入，在与抗议的纳吉政权的交涉中，在交涉会场的苏联军队司令部逮捕？绑架了匈牙利政府代表团，跑到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的纳吉虽然在得到南斯拉夫政府的安全保证下被引渡到苏联，但是五八年六月，发布了其被处决的消息。

以上的叙述参考了事后才得知的事实和看法（比如 F？费伊特《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当时很难得到清楚的评价。就我自身的体验而言，肾脏第一次不适

正好是五六年秋，我还记得自己在家中卧床屏息倾听着收音机的新闻（五三年电视正式开始播放，收视合同超过百万则是在五八年，我家那时还没有电视）。对这是由帝国主义策动的反革命活动的看法虽然感到不舒服，但对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的主张也有点难以苟同。说实话，当时我就处在这种矛盾和动摇中。我想日本共产党的看法当时和中国？苏联也并无不同。就我调查的范围，日本共产党首次明确要对当时的评价进行再检讨是在八二年出版的《日本共产党六十年》。书中这么写道：“关于所谓的匈牙利事件，此后二十多年间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资料和证言。无法独立获得正确的情报，再加上有第七次党大会以前这样的历史限制，就日本共产党当时发表的看法，有必要在今天党的国际政治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予以新的检讨。”

八八年的《日本共产党六十五年》这样叙述：“……苏联的军事介入，进一步激化了匈牙利人民的怒火和反抗，使事态变为武装冲突。匈牙利人民的要求和运动是为了摆脱苏联的霸权主义，寻求民族自由和多党制，即便有一小撮反动分子的策动，整体上也并非外国的反革命策动。……苏联对匈牙利事件的军事介入，是违反社会主义大义和民族自决权的干涉行为。”

回到正题上来。应是光考虑着波兰问题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获悉了匈牙利的事态。

中共中央是何时、如何得知匈牙利事件的，吴冷西没有谈到。不过对匈牙利的事态，他是这样写的：“从十月下旬起，匈牙利局势混乱，军警同示威群众不断发生冲突。反革命分子乘机挑拨；国外的帝国主义势力也大肆鼓噪，情况越来越复杂而紧张。匈牙利政府出于无奈，邀请驻匈境内苏军协助恢复秩序。这时，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一步策动匈牙利军队叛乱，到处发生反革命复辟、在这严重

的局势面前，苏共领导决定从匈牙利撤出苏军。”

可见，中国对于匈牙利事件的评价，到了吴冷西写作这篇文章的九五年，也和五六年当时一样没有变化。

刘少奇？邓小平等被派到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获悉此事后，在向北京报告苏波达成协议的同时，也报告了苏共决定撤退驻匈境苏军。

吴冷西写道：“毛主席在十月三十日晚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时，除同意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方外，还特意电告我们代表团，声明受中共中央委托，反对苏军从匈牙利撤退。少奇同志在十月三十一日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时，严厉指出：苏共这个决定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罪人。”

苏共中央在三十一日当晚还坚持撤退方针，不过，“第二天，十一月一日，赫鲁晓夫同志在送少奇去机场的汽车上，眉飞色舞地告诉少奇同志：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了整夜的会，最后决定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帮助匈牙利党和人民保卫社会主义。在我党代表团上飞机之前，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到机场热烈欢送，纷纷感谢中国党先在波兰问题上帮助他们，现在又在匈牙利问题上帮助他们。”

仅仅十天前，还在坚决反对对波兰的军事干涉、批判其为“大国沙文主义”，而对匈牙利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毛泽东或者中共领导层是如何处理、消融这其中的矛盾的呢？吴冷西没有写。也许是波兰的局势还未危及“社会主义”体制，而匈牙利的问题已关系到“社会主义”体制的存亡了吧。

总之，迎接了归国的刘？邓二人后，毛泽东于十一月二日晚，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会议。这个会议主要是听取刘？邓的报告，吴冷西写说同前几次会议的严肃紧张完全不同，整个会议过程洋溢着兴高采烈的气氛。上文提到的赫鲁晓夫在

去机场路上的谈话也是在这个会上汇报的。

吴冷西总结会上刘？邓的发言如下：“少奇同志指出，这十天的活动中，感到苏联同志的大国沙文主义由来已久，表现十分突出，由此而引起兄弟党对他们的强烈不满。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也由来已久，于今尤烈。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带来的恶劣影响，现在已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来。”

“小平同志说，波兰同志在莫斯科向我们诉苦，情绪激动，有时简直有点像我们土改时贫雇农‘吐苦水’。从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看，已经出现了否定苏联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倾向。各自夸大民族特性，否定国际共性。苏共领导人虽然开始感到过去大国主义一套不灵，但并未觉悟到必须改辕易辙。我们帮人要帮到底，今后还须要向两方面多做工作。”

两人的发言明显地反映出这样一种倾向：虽然他们都实际地感到了“苏联大国主义”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和恶果，但比起深入挖掘大国主义的危害，他们的关心点更多地在于警惕否定“社会主义”本身、“苏联的一切”的倾向，并将其原因归咎于“斯大林批判”的不良影响。

那天晚上因为代表团飞行劳累，宣布暂时休会，改日再开。

十一月四日，政治局会议在颐年堂再次召开，讨论匈牙利局势。吴冷西写道：“这时，苏军已重新返回布达佩斯，协助匈牙利政府恢复秩序。”周恩来首先发言：“当前西方世界利用匈牙利事件大肆反苏反共，各兄弟党内出现了动摇分子以至变节分子。……苏共领导人表现软弱无力。我们党应作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周恩来的姿态和刘少奇？邓小平也是一样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适应四月发表的《论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后的政治思想状况，有必要发表一篇新的文章。此项提案被通过，具体论点等开过十一月十日到十五日的八届二中全会再议。

对于斯大林批判的回应吴冷西写道：“从十一月二十五日起，毛主席差不多每天都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此前不久，十一月九日的周报《L ‘express’》上发表了J·P·萨特的题为《我弹劾》的访谈报道，此外十一日，南斯拉夫的铁托在普拉作了所谓的“普拉演说”。

二中全会期间，有一次吴冷西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到政治局常委的休息室去，毛泽东正同常委讨论“普拉演说”。书里提到“胡乔木也在席”是由于胡乔木不是常务委员的缘故吧。毛泽东叫吴冷西要新华社把铁托的全文译出来，并命他和胡乔木两人研究起草文章回答。当时以干部为对象的《参考消息》上只刊出西方通讯社的摘要报道。

在日本，普拉演说和萨特的《我弹劾》一并刊载于《世界》杂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号（“东欧的不安和苏伊士问题”专集）。也许是多余的解说，所谓“苏伊士问题”是指，由于七月二十六日埃及的纳赛尔总统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十月二十九日以色列军队侵犯埃及，第二天英法军队也加入的一场战争。目的在于阻止以苏伊士运河为代表的英、法在埃及和中近东的既得权益因这一地域的新兴独立国家的民族主义而受到的威胁，是一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政策。苏联对匈牙利的军事介入和英法出兵苏伊士这两桩大事件同时发生，在鲜明地暴露出东西阵营都存在的大国主义的同时，也把各种形式的问题摆在了东西方的知识分子面前。

《世界》的特集，还包含以南原繁的《世界的危机与日本的将来》和J·尼赫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演讲《抵抗良心与道义的崩坏》为代表的、关于这两个事件的论说、情报、资料，内容十分充实丰富。其中除了因这次批判而被法国共产

党除名的 J ? F ? 罗兰（历史教师？作家）的《是社会主义还是恐怖主义——批判法国共产党》之外，还收有罗兰、科洛德？罗阿（Claude Roy）、罗格？万朗（Roger Vailland）、科洛德？摩根（Claude Morgan ）等法国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与萨特、波伏娃、威尔克（Vercors ）等一起发表的声明。前面引用的周恩来发言中的“各兄弟党内出现了动摇分子以至变节分子”，具体就哪些人而发尚不明，不过从《世界》杂志上的文章能多少了解一点这些被如此定性的人的想法。毛泽东等人是否看过萨特的文章也还不清楚。

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始的政治局常委会大多数在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举行。有时也在颐年堂西边小会议厅。在毛泽东卧室开会时，他通常都是穿着睡衣，靠着床头，半躺在床上。中央其他常委在床前围成半圆形。一般习惯是，靠近床头右边坐的是邓小平，他耳朵有点背，靠近便于听话。以下依次从右到左是彭真、刘少奇、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陈伯达、胡乔木等，吴冷西坐在最右边，靠着毛泽东脚边的小书桌。据说“一般都是十人左右”。朱德年纪大，早睡早起，会议多在晚间召开，所以一般不参加这种常委会；陈云主持经济工作，一般也不参加。

最高领导层的会议在卧室召开，毛泽东睡衣也不换就参加，真让人吃惊。也许有人会赞叹这的确像是“无法无天”的毛泽东式的做法，可我却对此没有好感。另外，朱德和陈云平常不出席会议的理由，如果考虑到政治局常委会的重要性，还是有让人无法信服之处。还有，林彪那时还不是政治局常委，五八年五月的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常委后，也长期请病假，很少参加会议。吴冷西写道：“我参加的常委会议一次也没有见过他。”

五八年五月是认为五六年的第八次党大会制定的路线为“右”、为了向“左”

改正而召开的“第八次党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时间，也就是说此后中央委员会增选了，但仍属于第八次党大会的中央委员会，因此累计称作“五中全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五六年年底的这一系列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准备的是衔接四月那篇文章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吴冷西说毛泽东曾经有意将这篇文章的题目定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后来考虑到同四月份的文章相承接，决定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也是毛泽东。

吴冷西叙述了写作《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经过。具体过程这里就省略了，总之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十二月二日、三日、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断断续续地召开了政治局常务会或政治局会议，讨论胡乔木依据毛泽东等人的发言拟就的草稿，以及在会议意见基础上胡乔木、吴冷西，加上田家英三人起草的初稿，经多次推敲最终于二十七日提交常委会。

这时，除了毛泽东已在稿子上修改三四段之外，还有一些文字上的修改意见。

“毛主席要我们马上动手修改，修改一段送他一段，今晚要定稿，明日登报。

今年的事今年了。我们三人在会议结束后没有回家，就在中南海食堂吃了饭，立刻到毛主席住所背后的居仁堂（当时是中央书记处的办公楼），开始工作。我们修改完一段，由田家英给毛主席送一段。毛主席一直在卧室等着我们修改的稿子，随到随看随定稿。就这样紧张地工作了一个通宵。最后我们三人一同到毛主席卧室，把最后几段送毛主席审定，毛主席只改了几个字，对最后的结束语特别满意。他交代，要马上将修改处告诉翻译同志，中文已经定稿，译文也可定稿。他还确定，新华社于二十八日晚发稿，中英文广播也同时播出，人民日报在十二月二十

九日见报。

“我们从毛主席卧室出来，已是上午九点多了。”吴冷西写道。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里收录了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修改，其注释说，毛泽东在审阅第三、四、五稿的时候作过较多修改，这一部分用宋体字排印。

虽然不可能用这本书来全面地再检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过起码可以举出下面几点：第一，下面这种对匈牙利事件的评价，对照其后的历史只能说是不正确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开头附近的文字：“帝国主义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而在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今天，朝鲜战争是由于金日成的南进统一战略在斯大林的同意下，并且毛泽东也赞成的情况下推行而爆发的，这一观点已由苏联解体后“流出”的保存文件证明，现已被广泛承认。这暂且不提，认为帝国主义在匈牙利事件中扮演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不得不说是过低估计了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大国主义控制、以及至少作为其结果的遵从这种大国主义的匈牙利工人党指导层的路线所导致的国内矛盾。

第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毛泽东对斯大林评价部分所作的修改有这么一段：“只要我们是全面地观察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对于斯大林使用了“功过三七开”这样的说法。众所周知，“文革”结束后对毛泽东的评价也照搬这句话。其源头大概可以从上面的引文来找吧。

第三，承认斯大林“犯了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严重错误”，但几乎紧接着又说“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就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图削弱或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削弱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削弱或者否定党的领导作用”。将“无产阶级专政”当作勿需再检讨应当拥护的对象，即便在五六年那个阶段是不得已的举措，但很难否定存在这样一种倾向：虽然承认“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性，然而比起检讨其实际样态、或将其与对“阶级敌人”“反革命”的镇压的具体关系作为其本身来检讨，毋宁优先警惕它会削弱“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接着上面的部分，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显示了对“社会主义民主”一定程度的思考：“当然应该在国内外政治生活中逐步地发展和健全各种民主的程序，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民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发展国家管理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方法，密切国家机关和企业管理机关同广大群众的关系，撤除损害这种联系的障碍，进一步克服官僚主义的倾向，而不应该象斯大林那样，在阶级消灭以后依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因而妨害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全的发展。”

但是，当我们今天回顾仅仅几年后的六二年，毛泽东就在提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然后不久就突进到“文革”这段历史进程，从这段引文体会到的不如说是讽刺。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接着上文又说：“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

…如果有一种民主可以被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以被利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那么，这种所谓‘民主’就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但是，在匈牙利事件等被追问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施行的政治的实质；必须做的，难道不是对这一实质的检讨吗？倘若将是否“被敌人利用”当作区别是否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标准，那么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是否也不得不趋向消极了吗。像肃反问题、强制收容问题、农业集团化中的强制问题等，在“斯大林批判”里的很多批判对象，不仅对于共产主义者，包括广大追求实现更自由平等社会的人们来说，并非第一次听到，而是多少已经在担忧、不安的问题。但以前之所以一直未酿成大问题，当然其中有情报不足的因素，而且同时还正是因为这些人们出于警惕“被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所利用”的善意而进行了“自主控制”。“斯大林批判”之后，对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实体的批判喷涌而出，原因在于一种自责：以前那种“自我控制”是否削弱了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结果变成对这些错误的支持？当然，由于斯大林所做的事情已经超出“错误”这一词语所指称的范围，因此对它的批判必然会有点“过”。但是，如果眼睛只盯着那些，不去充分评价这些批判在整体上也包含能转化为有助于“社会主义”民主变革的有力能量的方面，而主要关心会“被敌人利用”、是“向敌人屈服”，那么就将导致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缺点消极对待、不去研究，将其当作绝对的前提，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只偏向于“对阶级敌人的镇压”一面的中国，其结果便无法避免“社会主义民主”终结在语词意义上，或者至少其范围被限定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

在当时，这些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将波兰和匈牙利首先爆发动乱的原因归结于在东欧诸国里这两个国家的农业集团化率偏低（这个认识本身是否正确

还未调查), 这种说明方式在当时的日本左翼中也存在。或许有“事后诸葛亮”的味道, 在今天之所以想再次探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存在的以上问题, 是因为即便在资本主义诸国的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再检讨、对苏联的整个历史作根本的再检讨之后, 还有中国自身经历了以苏联为敌、有时当成与美帝国主义并提的敌方、甚至比美国更大的敌人的巨大曲折之后, 这种思考方式依然根深蒂固地残留着, 就连把具体的政策批判和时而对干部的腐败批判也当作“颠覆体制的思想准备”的“理论”, 在“文革”时期再次盛行, 文革被否定之后的“六四? 天安门”事件中也登场了, 实际上, 这一点即便在文革后, 也完全没有得到解决。出于对此的重视, 有必要进行再次探讨。

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还有一处必须注意的是特别提到“知识分子”的以下部分:“(当匈牙利处在革命和反革命的紧要关头的时候), 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 他们不但没有提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反而出来反对苏联援助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的正义行动, 出来宣称匈牙利的反革命是‘革命’, 出来向工农革命政府要求给予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这儿所说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具体指哪些人尚不明, 不过其中匈牙利事件当时的知识分子集团“裴多菲俱乐部”确实应当占相当的比重吧。由此可以联想起文革之前的一九六四年毛泽东作出的“批示”里, 批评文化界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就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的确, 毛泽东老早就对知识分子抱有的不信任, 以匈牙利事件为契机更加增强了。

吴冷西记录了在准备《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一系列的政治局常委会中, 毛泽东“以深沉的语调”倾吐了自己对斯大林怀有的不满。是饶有趣味的记述, 不过由于今天通过其它资料可获知的东西也已经很多, 而且与本书的主

题多少有点偏离，因此在此省略。

虽然有结果论之嫌，但的确“斯大林批判”是对整个苏联型（实质上是斯大林型）模式进行再检讨的绝好机会。就中共而言，包含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个人情绪在内，这个选择的可能是存在的。但是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两篇社论，虽然告诫不可照搬苏联的经验，但把包含“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几条苏联经验当作应该绝对拥护的原则，强调斯大林功绩为主失误为副的倾向过强，没有更多的突破。也可指出中共具有的对于“整风”和“群众路线”的经验自信在此起了副作用。优先考虑维持“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当时来讲也有可以理解的一面，而且可以说当某一集团的缺点成为问题之时，主张不应忘记其先进性，这是所有集团和制度共通的倾向；但是对于过去的成果和缺陷能有几分清醒的认识，这也确实决定着这个集团内部革新发展可能性。这时提出的功过三七开的思考框架，之后也套用到对毛泽东的个人评价上。考虑到这种思考框架连着“中苏论争”时转化为将“斯大林批判”本身还原为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野心”的理论、加强以“修正主义”为主要敌人的思考、以及对八次大会上已公然否定的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复活强化，不得不说这时对“斯大林批判”的看法中，实际上已经显现出中国共产党带有的一个弱点了。

参考文献亚历山大·雅克福列夫（Aleksandr A. Yakovlev）《历史的幻影》

月出皎司译，一九九三年，日本经济新闻社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部会编《新中国资料集成》第五卷，一九七一年，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一九九二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一章《从评价斯大林说起》，一九九五年，新华出版社矢田俊隆编《东欧史（新版）》一九七七年，山川出版社F·费伊特《民族

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桥本一明等译，一九五七年，近代生活社《日本共产党六十年》，一九八二年，新日本出版社《日本共产党六十五年》，一九八八年，新日本出版社《世界》一九五七年一月号（特集“东欧的不安与苏伊士问题——和平尚在动摇”），岩波书店（丸山升《至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岩波书店，二零零一）第九章）

UnRegistered